

目 录

文献资料

- 冀鲁豫边区的概况(摘录)(1940年4月) (1)
- 叶剑英转报朱彭关于冀鲁豫边区抗击日寇战况
及辉煌战绩电(节录)
(1940年5月4日、27日,6月9日、21日、25日) (3)
- 支部工作与支部领导问题(1942年8月) 信锡华(6)
- 武装政策(1942年8月) 崔田民(20)
- 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几个问题(1942年9月) 万晓塘(32)
- 关于减租减息问题(1942年9月) 高元贵(42)
- 合理负担(1942年9月) 高元贵(46)
- 冀鲁豫军区1942年工作初步总结 (51)
- 濮县五个月民主民生工作总结
(1943年2月2日) 刘 涛(79)
- 对三种势力的认识及我们的态度
(1943年2月6日) 信锡华(84)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展开政治攻势以反汪反孙
宣传为中心的指示(1943年3月27日) (89)
- 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发表边区我军全年战果
(1943年6月28日) (90)

代论：纪念“七七”反对右倾情绪

- (1943年7月5日) 崔田民(91)
- 关于组织领导问题的报告(1943年9月7日) 张霖之(94)
- 我们能坚持平原根据地(1943年11月27日) 黄敬(108)
- 目前宣传要点(1943年12月11日) (111)
- 用终身的战斗追悼你
——纪念宋程、袁复荣二同志
(1943年12月18日) 黄敬(114)
- 边区一年来军事斗争的胜利(1944年1月1日) ... 杨得志(115)
- 认真地彻底地整起来！
——苏振华在干部会报告要点
(1944年3月5日) (119)
- 拥护冀南、冀鲁豫两区合并 军直召开全体人员大会
杨司令员传达中央指示 黄敬同志详谈合并意义
(1944年6月15日) (122)
- 关于拥护冀鲁豫中央分局成立 冀南冀鲁豫两区合
并报告提纲(1944年6月15日) (124)
- 纪念“七七”实现三大任务
——战争、生产、群众工作
(1944年7月5日) 杨勇(128)
- 冀鲁豫、冀南一年大事记
(1943年7月至1944年7月) (134)
- 滑县群众是如何发动起来的(1944年10月) 赵紫阳(139)
- 社论 准备全区大练兵(1944年11月23日) (175)
- 冀鲁豫四地委对滨河群众工作的指示(1944年) (178)
- 水东概况(1945年1月30日) 生琛(194)
- 今后的三大工作(1945年3月19日) 宋任穷(196)

回忆资料

- 黄克诚同志函复在冀鲁豫边区的任职问题
(1986年2月19日)..... (200)
- 战斗在冀鲁豫平原上..... 杨得志(201)
- 卫东战役和石友三的下场..... 李 达(255)
- 冀鲁豫军区部队发展概述..... 夏 川(260)
- 对冀鲁豫军区第二、六军分区一些情况的回忆
..... 裴志耕 鲍鸿光(267)
- 依靠人民 坚持抗日..... 刘镜西(278)
- 对于树本统战工作的回忆..... 罗士高(295)
- 回忆濮阳八路军办事处..... 王鹏程(298)
- 高陵县的创建..... 陈瑞光(305)
- 尚和县的建立和对敌斗争..... 杨敬仁(313)
- 濮范政民工作队纪实..... 张雨辰(340)
- 睢杞太地区武装斗争十年(节选)..... 王广文(344)
- 水东抗战..... 余克勤(371)
- 关于水东地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回忆(节选)..... 杨宏猷(386)
- 血海深仇“九·二七”..... 杨怀钧(406)

组织沿革

-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组织机构沿革(侧重河南部分)
..... (415)

大事记

-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大事记(侧重河南部分)..... (476)

反证材料

军占领地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

(1937年12月22日)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548)

东平湖西方剿共作战(“リ”号作战)

(1942年9月27日~10月5日)..... (555)

中共方面的贫困及其对策..... (558)

清丰事件..... (566)

新乡特务机关..... (568)

卫立煌向何应钦报告袭击豫北八路军密电

(1940年6月3日) (5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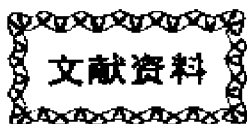
熊斌电蒋袭击八路军情况(1940年7月16日) (571)

高树勋报告袭击豫北八路军密电(1941年5月) (572)

汤恩伯报告袭击黄河支队密电

(1941年5月23日) (574)

我所知道的敌寇对冀鲁豫边区的一次大扫荡..... 邢汉三(575)



冀鲁豫边区的概况(摘录)

(1940年4月)

一、地理：南北 250 华里，东西 200 华里(小冀鲁豫)。

二、黄河两岸粮食收入很大。

三、铁路与公路交通。西有平汉铁路，南有陇海铁路，东有津浦铁路，有菏泽经濮县虽公路有破坏，因平原关系，无大妨碍，仍可通车。

四、辖区有山东所属之菏泽、鄄城、曹县、濮州、观城、范县；属河南省的有浚县、滑县、考城、内黄、封邱、安阳；属河北省的有东明、长垣、濮阳、清丰、南乐、大名、共 18 个县城，大小市镇 200 余个，村庄万余个，人口有 300 万。

五、农产以小麦为主，其次是高粱、玉米、谷子、棉花、工业生产量小。在粮食方面能自给有余，村庄相距有二三里，村村有沟道，便于开展游击战争。

六、军事工业仅有小铁炉、手工修配，无什么机器，遇敌扫荡随时埋掉或转移。

七、群众组织，有自卫队、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另外还有红枪会、会道门等迷信组织。

八、群众武装，一般每县有个独立团，县长兼团长；有的有个基干大队；根据地内有游击小组。

九、政权方面。在 1940 年我抗日政权有清丰、南乐、濮阳、内

黄、滑县、大名、长垣等县。

十、冀鲁豫军分区设置：一分区辖清丰、南乐、大名、观城，司令部由二纵队兼任；二分区由二旅兼任，辖濮阳、濮县、东明、菏泽；三分区由三旅兼任，辖滑县、长垣、考城、封邱、定陶、曹县；四分区由民军一旅兼任，辖内黄、浚县、安阳、汤阴、淇县。

十一、巩固与发展的条件：①军民关系好；②策略与路线正确；③大多数民众同情帮助；④党组织坚强；⑤党员能起模范领导作用。

应注意的是：①加强统战工作；②争取会门与敌伪军工作；③严格部队纪律，组织群众，武装群众；④加强地方党的工作；⑤对新老干部审查团结。

（摘自军事科学院1号卷）

叶剑英转报朱彭关于冀鲁豫边区 抗击日寇战况及辉煌战绩电(节录)

(1940年5月4日、27日,6月9日、21日、25日)

委员长蒋钧鉴:据报(甲)杨得志支队一部冬日于滑县东,伏击由田留固南开上官村之敌汽车两辆,战一小时,将敌全部消灭。毁敌汽车两辆,毙敌30余名,缴获步枪30余支,轻机枪1挺,其他军用品甚多;(乙)上月由日枣强敌汽车两辆载敌兵30余东开,被我东纵队俞团一部于大辛庄将敌全部消灭。毙敌中少尉队长(各一)以下30余名,缴获迫击炮1门,轻机枪1挺,掷弹筒1个,步枪20余支,铜盔26顶,指挥刀3把,弹药一部,其他军用品等物甚多等情,除分报外,谨闻朱德、彭德怀叩支西。

1940年5月27日电

部长徐钧鉴:据职部杨支队长宵晚电称,我支主力有晚分途向长垣城及滑县东南上官村、留固集等据点袭击,计一路进袭长垣城。因封锁消息不严,为敌侦知,行至城十里处,适与由城内向我前进之敌200余遭遇,当展开激烈战斗,我即占领阵地,以火力向敌猛射,敌死伤甚重,后敌由城内继续增援,我因众寡不敌,始向东北转移。是役敌死伤50余,我伤排长2员,以下伤38名;一路袭击滑县东南上官村(口)桥一度攻入村内,激战约一小时,毙伤敌甚众;另一路猛袭留固集,连破敌防线铁丝网两层,攻占镇西南端,残敌坚守东北房屋,顽抗未克。是后毁敌停放村内汽车四辆,毙死伤30余,缴获军用品一部,我伤亡排长1员,以下伤亡20余名等情,除

分报外，谨闻职朱德、彭德怀叩感辰。

1940年6月9日电

部长徐钧鉴据杨支队长得志齐亥电报称(一)冀豫鲁边区据点之敌总达万余人，于鱼、阴两日向我濮阳、濮县、东明地区大规模“扫荡”计；(甲)大名龙王庙之敌2000余向我南乐、清丰地区前进，正与我一部接触中；(乙)濮阳方面之敌千余名分两路西犯与我激战，刻已进至小滩镇；(丁)长垣之敌千余人正向我濮阳推进，刻与我主力一部在濮阳南之大桑树村对战中；(戊)白道口之敌600余人东犯，被我阻击于中召集(濮阳西附近)，并有飞机4架向井店镇进犯，与我另一部对战中；(庚)战庄集、旧县、楚旺之敌兵2000余正向我清丰、南乐地区东犯中；(辛)安阳增敌4000余人正向我合击中。(二)以上各路之敌均于虞齐两日，向我猛烈合击，各路均与我发生激战。同时，虞日在桑村附近敌4000余，飞机10余架，坦克车共百余辆，炮30余门与我韩旅主力展开恶战，敌我伤亡均重，尤以该旅陈团第三营遭敌四面围击，在战车、飞机、大炮猛攻下，全营壮烈殉国，详情待报等情，除分报外，谨闻职朱德、彭德怀叩佳亥。

1940年6月21日电

部长徐钧鉴：据杨支队长马晨电称，内黄敌步骑350余皓晨向西南进犯，我一部节节抗击，诱敌深入。10时许，敌进至草坡附近，我主力即向敌两翼猛击，激战3小时，敌我反复冲锋4次，至14时许，将敌全部击溃，残敌狼狽向内黄城内逃窜，我乘胜追击，刻已进抵城郊，正向该敌围袭中。是役先后毙敌80余，缴获战马5匹，其军用品甚多。我伤亡48名等情，谨闻职朱德、彭德怀叩马亥。

1940年6月25日

部长徐钧鉴据职部杨司令得志江午电称甲、……乙、清丰之敌步炮兵300余，佳日向城东北进犯，与我四团在王毛集附近激战，我周政委钦复同志身先士卒与敌肉搏，头部负重伤，但仍坚持指

挥,激战约 16 小时,卒将敌一部击溃,残敌向清丰回窜,现在追击中,我周政委因伤甚重,于是日 7 时许,光荣殉国。是役毙敌百名以上,缴获正清查中。我军伤亡团政委 1 名,以下伤亡 20 余。又同日,我另一部打击清丰以西韩村集之敌,激战数小时,敌退房屋顽抗,拂晓我始撤出战斗,是役敌死亡甚重,我伤亡 30 余名。丙、数日来职部向敌反攻战况如下:(一)马日,我韩旅一部伏击文留集(濮阳东南)击犯之敌 400 余,已被我全部击溃,一部为我歼灭,一部袭占坍塌镇(濮阳东),当将守敌 200 击退,毙敌 40 余人,获步枪 20 支,军用品一部,残敌向文留集一带退窜。我正追击中;(二)春晚我韩旅陈旅主力袭击王堡寨(清丰东南)之敌据点,当时冲入寨内与敌肉搏,毙伤敌 50 余。该敌进入炮楼,我继续施行火攻和掘挖楼脚,战至天明,该敌施放毒气,我伤亡官兵 200 余人,我营长王和阵亡;(三)韩旅一部于 日晚一度袭入清丰城与敌激战数小时,敌我伤亡均重,俘伪军 10 余名,获步枪数枝;(四)梗日我韩旅主力攻溃兵 300 余名,追至濮阳东南之哈庄附近,为我截断一部,毙敌百余,获无线电台 1 架,步马枪 70 余支,洋马百余匹,军用品甚多。敌军窜入阵地,我军刻已进迫濮阳城下,又我直属队五营配合,游击部队于梗日晚袭敌占清丰城,毙伤敌伪 60 余名,缴获甚多。敬辰南乐方面之敌汽车 20 辆来援,刻已与我城郊对战中。我另一部同日于张广寨(濮阳北)伏击敌汽车 10 余辆,当击毁 3 辆,毙敌 20 余等情,谨闻职朱德、鼓德怀叩有。

(以上电文摘自《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第三辑第五册)

支部工作与支部领导问题^①

(1942年8月)

信锡华

一、支部是党的基础

(一)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支部是党的最下层,没好的支部工作,即没巩固的党。支部譬如墙脚。她要团结群众,率领群众作革命工作,求得革命胜利。党是否能团结争取广大群众,就看支部工作好不好。无产阶级的党,只有口号、号召鼓动工作是不行的,她的主要力量即是组织。支部是联系广大群众的纽带,没支部工作,什么工作都是空谈。上级党只有通过支部工作,才能团结广大群众。党的主张正确与否,必在下层支部中了解群众呼声、意见,反映意见才能使党的政策主张适合群众口味。没支部工作,你的决议、主张、政策、口号群众不会关心,你的政策、主张、口号就都是空的,就不能实现。由于我们边区支部工作未做好,所以边区党与广大群众关系就不密切。这都是因为没给广大群众解决问题,没作好支部工作,所以一切工作都不能很好完成。今后要想把革命的要求变为群众的要求,想团结广大群众,只有解决支部基本问题,每个同志都必须把这个观念明确起来。没支部就没党,没好的支部工作,就没有巩固的党。

(二)支部是党的力量生长的源泉

^① 在冀鲁豫区党委轮训队的报告

1、党要想巩固壮大，必须排泄过时的东西，吸收新的血液，必须通过支部在群众中活动，不然是不可能的。

2、要生息干部最基本的地方就是支部。一切好的干部只有从支部中提拔，必须认真的从支部中、从群众中找能作干部的人，每个同志要把这观念肯定起来，支部是生长力量的源泉。

(三)支部是按生产单位组织的，这是列宁的组织原则，这是生长壮大力量的基本根源。在工厂、铁道要按手艺组织与分段组织。矿山支部由矿工组织或按伙食单位组织。学校支部一般是按学校组织(班为单位，全校有总支)、机关支部如政权、群众团体，是以科、处、机关为单位。街道支部是大都市的贫民、自由职业者，以街道为单位组织。商店内的店员，是以商店为单位组织支部。农村组织农村支部。乱拉乱组织支部，是违犯组织原则的。(一般八十户以上者才为一行政村，十户八户的自然村应合并为行政村)支部应按行政村组织，人数少(一个两个)应个别领导。随便组织都是不对的。因为按生产单位组织，他们的作息一致，彼此关系密切，接近容易。若不这样组织，是不容易开会与作工作的。(生活工作不一致)一个生产单位如人少，一定实行个别领导，慢慢求得发展，这对团结接近群众，领导群众斗争都是适合的。

二、支部的基本任务

(一)团结群众在群众中来实现党的决议。要想把党的决议变为广大群众的决议，支部必须做艰苦的宣传鼓动工作，把决议具体的在支部内实行，大搬家式的从中央搬到支部是不能实现的。只有艰苦的宣传鼓动工作还不够，(这是必经的步骤)还必须通过每个党员的积极努力去作团结群众、领导群众的工作，把群众组织起来，党员真正成为团结核心，使党的决议成为广大群众喜欢做的事才行，这是个艰苦的组织工作，没这工作决议不能执行。不能团结群众。

(二)征收党员增强党的力量。革命是艰巨伟大的任务,必须有庞大的力量与坚强的组织。特别中国,必须增强力量,征收党员,才能达到革命任务,所以这是最基本的任务,不发展是“绝”支部。特别目前,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是提高了,广大人民对共产党有了认识。而在实际斗争中及群众亲身体会中,中国共产党威信更提高了,特别知识分子等,要求入党的心情很高,所以我们必须大量的吸收党员,如不发展吸收他们,是关门主义的错误。我们只有吸收他们,才能壮大我们的力量,在革命培养下,使他们成为坚强的力量。华北今天党所以这样伟大、有力量,就是因为大量的吸收了党员。所以今天农村吸收进步分子入党仍是必须的。目前党内宗派主义是很严重的,必须克服。今后必须作征收党员增强党的力量的工作。

(三)教育党员提高党员政治认识与文化水平。这问题很多领导机关不明白、没认识。大多数干部到支部只是要“帐”,要工作成绩,对教育党员(上课、讲个道理)提高党员认识的工作一点不作,致使党员感到参加党没好处。我们干部必须把这问题提到高度来认识。支部也是教育党员的学校,一些基本问题必须在支部内作实际的教育,培养党员明确些基本知识。对农民的培养与过去培养知识分子是不同的。(目前边区干部脱节,即是主要原因)必须作艰苦耐心实际的教育工作,必须模仿过去白色恐怖下的教育方式。所以今天教育党员、培养干部是最重要的,每个同志必须了解这个工作。

(四)根据地的支部有领导党、政、军、民、学把力量统一起来加强对敌斗争、战斗动员工作的任务。在根据地我们占优势,革命要求与群众要求是一致的,所以必须把党的最基本组织战斗起来,掌握一切力量对敌斗争,加强战斗动员,才能使根据地巩固,才能保证胜利。这一点目前做到的是很少的,阻碍了根据地的建设,影响了党的巩固,党内的宗派主义是相当厉害的,这使各种工作受到很

大危害,是值得我們检讨的。

三、支部的基本工作问题

(一)支部的群众工作。党员如何成为团结群众核心的问题,党的巩固与否,有无战斗力,就看是否能团结广大群众,这是具体标志。党员如何团结群众呢?要根据当时当地具体条件、地点、时间来决定,不能有固定的办法。一般说有两个方式。一个方式是通过组织去团结群众,党员参加各种组织中起模范作用,不只为革命事业起模范作用,特别在为群众利益斗争的时候起模范作用,这样才能使群众愿参加群众组织,在群众组织中去团结教育群众。另一个方式是以无定形的组织去团结群众。这是依靠党员在群众中“济公好义”、“见义勇为”为群众着想,以提高党员在群众中信仰,在不断解决群众困难中来团结群众,使群众都认为你好,都愿跟你走,说你是“好人”、“明白人”,培养党员成为本村、本街、本胡同的好人,使党员成为群众依靠,(最不好的也叫群众认为是忠厚老实人)党员都成为大小领袖,这即无形中把本村群众团结起来,这方式适合于不能组织工、农、青、妇、各团体的地方或利用敌人合法等形式去充实新内容。这都是团结群众的办法,这是在根据地及其它地区适用的办法。

党员如何在群众中活动呢?一般有两种:一个办法是利用政府法令、上级指示、自己决议来活动,(这大都在根据地适用)进行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另一办法是根据上级指示以“听说”、“见到”、“认为”或“应该”的方式来作宣传教育工作。以生动内容事先准备来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使群众信仰我们的政府法令、决议、指示,扩大我党、政府影响,这才能团结群众。再即活动时要有计划,要掌握住群众特点、觉悟程度来巧妙的宣传我们的任务与口号,以灵活的方式来提出群众喜闻乐作的口号和组织形式来组织群众、团结群众,以通俗的口味去作群众宣传工作。

如何领导群众斗争问题。民主民先是群众对革命的要求，我们领导斗争应抓紧几个原则。首先是团结一切中国人反对日寇。斗争是为团结，我们既反对只管团结的右倾，又要反对只管斗争的左倾。我们要认清，要使广大群众起来，必须领导斗争，不斗争基本群众不会发动起来，也不会达到团结目的。其次是抗战问题。一切斗争必须联系到抗战，这才不致使一些眼光狭小的人只以为斗争是单纯经济。第三是联系到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只要对建设根据地工作有利，任何小的局部利益，都要服从大的利益。

(二)支部武装工作。根据地的党要巩固，第一个问题是群众工作，第二个问题即是武装工作，没武装就不能对敌斗争。放弃支部武装，即等于放弃整个根据地的正规军。分以下几点：

1、已有武装(民兵、联防、自卫队等)，支部应号召党员参加，要领导它，注意过去武装工作中的几个弱点：甲、党员不参加，只让群众参加，甚至掌握在地主富农、土匪、流氓手里，这就等于把武装交给反革命，枪口对自己。敌人一来即妥协、插枪，不敢打。若掌握在基本群众手里，对敌斗争坚决，就能团结各阶级抗日。乙、都是共产党员参加，不让群众参加，自己活跃，群众在一边看，以为是“暗八路”，不是群众武装，孤立自己，不代表群众利益。结果群众不愿参加，党员孤立，情绪不高。丙、为武装而武装，不管群众干不干，上名册，有名册没工作，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只会强迫命令，不了解群众要求，这些应坚决清洗。丁、已成立起来是空架子，其中一定有问题，应深刻检查其原因，如群众不了解，即应通过党员宣传鼓动；如群众生活痛苦没民主，应改变其民主民生生活。不要只注意形式，而要注意实际行动，必须去解决实际问题(县委要帮助区委)。戊、组织起来的民兵联防，仍有很大问题，我们要认清我们的联防是革命的，不是迁就旧的，而是以旧形式来充实新内容改造它。而各地联防有的过于迁就落后，掌握在地主、流氓手里，没战斗力(个别吸收可以)。民兵、自卫队内党员应起核心骨干作用，领导应掌握

在基本群众手里,这只有依靠支部在其中活动。要纠正民兵中“钢枪主义”的偏向,要利用旧武器。

2、没武装地方,应由消极防匪自卫到抗日自卫的来组织,由秘密到公开。由个人到联合干,到配合地方武装、主力军干。要适应群众心理,不要注重形式,要注重内容。这主要看支部如何活动的问题,反对求成过急、要求过高的现象,要作艰苦的工作。

3、武装领导权的问题。武装内是不能讲统战的,但共产党员要争领导权,要起模范作用,使广大群众赞成你,愿叫你领导。武装内的领导与成分是不能讲统一战线、三三制的。

4、武装如何活动问题。要常研究游击战术、空舍清野,作破破路、扰乱据点、割割电线等工作,不要要求过高,这就看支部工作的作用如何,要少说多做。

(三)支部政权工作问题。“政权是刀柄”,掌握在反革命手即刀刃对革命,革命掌握,即刀刃向敌人汉奸、反动派。敌人掌握即杀我们,这是革命基本问题。村政权是革命的可给我们很大方便,这是我们应有的第一个认识。如何掌握政权呢?(过去的改造是换汤不换药的)。

1、首先必须了解情况。要少说多作。(改造村政权是党的口号)了解他们的具体情况,是选的,民主的,几个人的,贪污在那里,账目如何等,要看群众舆论,通过支部作宣传鼓动工作,争取多数群众,扩大其内部矛盾,分化孤立,争取其力量,打击最坏的一个,到他完全孤立,动员起群众来,一斗争即胜利,若不成熟,即会脱离群众。要坚决,要有信心,不要只依靠上级,要真正依靠广大群众,向群众作艰苦耐心的说服动员工作。

2、其次必须配备力量。要在农村政权中坚决执行“三三制”,不要一党包办。共产党员应坚决起模范作用,一般超过三分之一,但要调剂,在人民代表会中要群众多些,如农村支部无力量,党员不代表群众,应大胆的选举进步的能行的群众,不一定是党员,(改造

是改坏换好)但支部要监督他。如过去村长坏,现党员村长更坏,要进行教育,不听即开除。洗刷改造,够程度即枪毙,革命的共产党绝不要这样的党员。改造前要有准备工作,加强群众教育,不要只盲目的听支部的意见,要了解具体情况,慎重在处理。如党员与群众矛盾,改选只是党员意见,群众不敢说,这即不能使党与群众打成一片,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今后必须纠正。“只要有决心就能改造一切坏的村长”,每个同志必须有这个观念,一切坏村长必须以群众力量来坚决改造,是一定能胜利的。这是艰苦工作,必须下苦功,要反对官僚主义,不深入、不起模范作用的倾向。

3、改造的政权如何去领导与巩固。首先对党员村长要通过支部讨论工作;布置计划,每个党员起模范影响推动群众,积极完成工作,以群众舆论来镇压顽固的。其次对非党员村长,应以私人资格、“好人”、“明白人”的资格来提意见给他,并布置各组织起模范作用,积极完成,要了解他的困难。另外不管是党员是群众,他是进步的,必须了解他的困难,他错了要动员改正,办了好事要多宣传鼓动,以提高他的威信,这才能使新政权巩固。

(四)支部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

1、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中国是半封建社会,农民知识落后,接受革命思想难,中国知识分子受压迫剥削受痛苦,易接受革命思想真理。中国共产党产生即首先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如毛泽东、周恩来等。今天敌后党的发展,干部中知识分子是占绝大多数的,通过知识分子才能动员农民群众,知识分子对革命起着桥梁作用,只有同他接近、动员、团结、吸收广大农民,党才能成为有力量的党,所以团结知识分子是很重要的工作。

2、团结什么知识分子。首先要团结小学教员,通过他们团结群众,教育儿童。教员是农村“圣人”,必须团结他们,通过他们能做工作,做宣传工作,能教育革命后备军——儿童。其次更要团结农村中知识分子,通过他们教育群众,争取他们将来参加革命,现在帮

助我们工作，将来建国可解决我们很大问题。所以，日前必须团结他们，帮助他们了解些革命新问题，使他们在政治上进步。

3、团结的办法。有以下办法，当“学东”天天接近他。或当个“好学习的”领教他，与他谈些问题，高抬他，争取团结他，动员他帮助村的工作。

(五)支部本身工作问题

1、支部领导机关的产生。党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大会不选举支部委员会。但在战争环境下一般应由上级指定，挑最好的，由小组通过，经县委批准产生支部委员会，不准随便改选，要有一定手续，要慎重。

2、支部的分工问题，支委会基本上是民主集中制，但也要分工。支书要了解全村，推动全面工作，总结工作，报告区委，传达指示，动员全支部工作。付支书是帮助支书(支书不在家可领导)。支组是吸收党员，收党费，检查党员思想意识及纪律执行，填表，领导自我批评、思想斗争会议及统计本村与本支部内一切情况，划组等。宣传，作教育党员、领导本村教育机关(如小学、识字班、夜校)、发文件、宣传品、贴标语、布置宣传工作等。青年、妇女委员，负领导公开青年、妇女群众组织及领导青年妇女党员、儿童团之责。武装委员，领导民兵、自卫队、青抗先等武装及动员参军、参战、归队等工作。其它如农、工、妇、青、文会的主任和村长是党员、资格够可作委员，保证他个人工作完成。凡做公开工作的，只管公开的，青年、妇女委员只管公开群众组织与青年、妇女党员。小组，支书可管一个(直接领导)，组织、宣传可多管几个(最多三个)，不管公开工作，只管秘密工作，以应付环境变化，坚持工作。

3、支部如何工作。这问题至今未解决，只有个别的做工作，没计划，对支部布置工作一大套，所以今天谈支部如何工作仍有必要。一个办法是在根据地内，党、政、军、民的任务下来后，要首先在支部委员会上具体讨论布置如何具体实现。另一种办法是在敌区，

没上级指示决议,这必须看支部与群众关系如何,要团结群众,把个人要求变为广大群众要求,领导群众斗争,在斗争中找积极能干、成分好的分子,(一定不要吸收流氓、地痞)发展他为党员。(不要突击,要个别发展)要进行保守秘密、守纪律与接关系的教育。必须了解边区党的发展历史,一定要适合具体环境,首先县委、区同志要做隐蔽工作的模范,教育支部同志做隐蔽工作。

四、如何整理支部

(一)目前边区支部现状及其内部的严重问题

1、有种支部组织混乱,组织上不分工或分工有名无实,小组不划分,划分不一致,有支干无党员,各种工作制度混乱、马虎,这是目前边区支部普遍现象。那种根本未组织支部仍以“救国会”、“秘密道”、“暗八路”为支部者,边区基本上是没有了。这种支部组织上是涣散的,没战斗力,党员政治开展差,普通知识不了解,环境一艰苦即无所措,若不抓紧教育即要垮台。

2、掌握在坏分子手中的支部。地主、富农、流氓、地痞、土棍、逃兵等占支委的大多数,好环境“为非作歹”,好人不敢接近,坏环境就动摇、投降、变节,这种支部在目前边区中虽是少数与部分现象,但今天站在革命观点上看,是没革命性的,是反革命的,是革命的对象。农民在现阶段有他革命一方面,但他封建一方面是反革命的。富农知识分子与地主富农成分有分别,他剥削封建意识不浓厚,他可能小资产阶级意识浓厚。对地主、富农,在目前抗日阶段看,他一时积极,而以为有革命性,这是阶级意识模糊。有的认为无产阶级没革命性,这是不了解无产阶级痛苦生活的,是对“共产党”三个字不了解的,致使很多地主、富农趁隙混入,掌握了统治,这种人我们应坚决刷洗。对地痞、流氓投机混入者,(他会说会道,会应付,往往迷惑人)混水摸鱼、投机取巧者,欺压群众、贪污腐化、为非作歹者,应坚决刷洗。不然支部不会起堡垒作用,会使党员迷失政

治方向,对外也破坏了共产党的威信,使党脱离群众,使根据地建设受到损失。

3、过去我们所谓的“模范支部”或一时活跃的支部,由于未很好的提高它,形成支部内问题一堆,这些支部亦不少。主要原因是只给支部要工作成绩,“模范村”成了“麻烦村”,使党员情绪消沉,脱离群众,再加坏分子捣乱,好党员任务累累,忠实党员对党怀疑,思想混乱,致模范支部垮台。基本群众分化,地主、富农趁机抬头、反攻,恢复统治。支部工作死气沉沉。

4、整理过的支部虽经整理与改造,但斗争过“左”,“光棍”作用,不团结群众,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现象仍严重存在。由于目前对敌斗争残酷以及困难增多与领导上的毛病,这种支部又表现消沉,有的自己干,群众看,环境好尚能干,环境坏即完全脱离群众,消极怠工,这是整理过支部的一般现象。

5、目前虽有些支部起作用,但是很少的,并且起的作用是很少的。今后边区支部必须整理,这是坚持边区抗日根据地、坚持边区工作的基本问题。

(二)如何整理支部

1、必须了解支部具体情况及支部特点,这是初步工作,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个真理。所以要整理支部,只有了解支部。了解什么?首先要从客观上了解:甲、本村人口、户口、地亩、土质,本村副业,群众文化程度,阶级关系(占百分比)群众生活好坏。乙、本村租佃、高利贷、家族、党派关系,了解阶级对立是否厉害。丙、抗战以前的富裕情形、生产情形、抗战以后的变化,参加劳动情形,经济变化及关系,经济是否繁荣。丁、本村风俗习惯,革命组织与封建组织,群众特点、历来斗争及杰出人物。戊、本村地理条件,群众对抗日认识及敌、伪、特活动,我党的斗争历史和群众关系,我军的影响,村的位置如何等。其次在主观方面了解:甲、支部的建立是在什么情况下发展的,党员多少,谁最早,男女成分,组织

生活如何,在不同情况下的变化特点。乙、支委负责人,他经过什么斗争,支部调出多少干部,目前支部组织、成分、工作情形,支部在本村威信。丙、党员与群众关系,过去斗争、成功、失败及原因,群众对斗争的认识。丁、党员与群众团体、政权的关系,是否起核心,是法定的核心作用呢?还是从斗争中、工作中名副其实的核心作用。以上是必须了解的东西,如何了解呢?只有从支干报告、组员报告、小组会上、群众中、群众团体中、统战对象中去了解支部情形,不只了解其事,还要了解其过程及成功失败的原因。

2、整理支部的方法方式

甲、肯定的讲是自上而下的整理。必须自上而下的进行艰苦的教育,使他们了解整理的必要。(首先参加整理的同志要经过审查,对党忠实的人,坏的干部不要参加,要了解组织原则的人参加)。千万不要自下而上的整理。县委应更多帮助区委总结经验,要着手抓紧一个支部创造模范例子,以影响其它,要以带徒弟的办法提拔干部。不是为整理支部而整理支部,而是为了解支部问题而整理支部。

乙、整理支部要实行重点主义,抓住中心问题,其它工作放弃点也可以,但防止“狗熊掰棒子”的办法。

丙、清除坏分子,审查党员。边区委员成分复杂,教育是主要的,但成分也是重要问题。各阶级有其不同意识与信仰,共产党信仰只有一个共产主义。一切坏分子,对党有害教育不改者,坚决不要。贪污腐化、口是心非、吸白面、参加其它党派不报告,查出不承认者,无条件的开除清洗。从斗争中去整理,坚决清洗教育无效分子,但必须使党员了解为什么,绝不是造成党内恐怖。也要刷洗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为升官发财参加,不为共产主义奋斗)、别有企图分子(敌特、阶级敌人)、太落后分子(不守纪律、死不进步)偶然分子(为时髦、好奇参加)等,这些分子要从斗争中认识他们。如何刷洗?能公开刷洗者公开刷洗,不能公开、环境不允许者,

可秘密方式。支部内教育好,另划组,他如破坏工作,即对他劝告,再不改再破坏,即通过政府逮捕,但要弄清共产党只有铁的纪律,没有血的纪律,最高是开除,没杀人权。

丁、整配组织支部。一般以行政村为单位,1村不能两个,不能按成分组织。妇女党员多可组分支(不独立)。够3人方可成立支部,2个、1个是个别关系,绝不能两个村联合组织。在根据地内,凡1个行政村够3人即组织支部(只有1书记);7人至9人可再设付书记;9人可设3个支干(书、组、宣);10至20者,可增妇、青干事,但不准超过5个支干。20至70者,支干可增到7个人;70至100人者,支委可9至11人。但必须规定支干5至9人时,必须有3人不兼公开工作,以便专门作支部工作与应付环境严重时工作。百人以上者,支干亦不超过11人。也可分两个或3个分支部受总支领导,分支只有书、组、宣3人,大部分支干可兼乡支书。以上是根据地内。

敌区支部,5人以下只设支书,5至9人可设一付书记,最多不超3人,以适合短小精悍的原则。一个支干最多领导3个小组(每组3人),乡、区委1人最多领导3个支部,缩小各区单位,不开联席会议,多提不脱产的乡、区干事。支干要尽量有2/3的贫农。党内无统战,下决心清洗坏的,不要看“无产阶级不中用”,无产阶级的事应由无产阶级管。小组划分,除青年、妇女小组划出外,其它的一律按居住、感情划,3至5人(根据地)敌区3人以下,以年龄、以阶级划分都是错误的。制度:会议,一般支干会10天;(7人以上者可建立常务干事会,5天或7天,分别开,有全体干事会)小组会最好3天至5天,支干会、小组会要分开。小组会不超1个半钟头,支干会不超3个钟头。不要拘形式。报告制,支书报告乡区委,组长3至5天报告支干,党员有事随时报告,其它制度慢慢建立。组织纪律问题,必须慢慢建立起来,进行教育,使党员自觉的执行,如发展党员、介绍关系一切纪律与手续都应注意。

戊、整理支部是教育建设过程,不是关起门来整理,必须从日常工作斗争中去整理,整理与建设分不开,关门建设是不行的,单纯的填表、上名、登记、开会是不行的,解决问题是必要的,但不进行教育,被动的解决困难问题整理不好,必须从教育中提高党员。

五、支部领导问题

(一)这是各级都应负责的问题,特别是地委必须具体领导。1、目前乡区委干部不是质量差,而是没有,少。1个人领导几十个,工作顾不过来。区干部至少要3个、5个支部以上成立乡、区委,1、2个支部或中心支部可直接归县委领导。取消干事,干事能力强的可为分区委员,能力差者回村作支书。如支部很多、干部少,可委托支书能力强的领导几个(这是例外的过渡办法),乡区委干部很少,乡区支书可以带徒弟的方式提拔好的支书,保证起码3个干部,这是地委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2、地委必须解决区委干部能力问题。提拔干部,地、县委组织部必经审查、教育培养,反对乱提乱调,要下决心提拔培养成分好,将来有前途的干部。乡区委干部脱产的最多3个(最好1个),每人最多领导6个支部,不脱产的最多领导4个支部。给分区委干部有学习时间,地委办训练班,出教材解决乡、区委干部能力问题。

3、地委直接领导问题。可直接领导1个支部创造经验,更要抓紧县委直接领导支部,这些支部的经验总结出来教育全区,使乡区委了解如何工作,(不准随便加模范支部的帽子),根据不同情况,有计划有系统的到下层去具体实现。

4、地委对县的指示问题。根据县委的报告,支部情形、乡区干部情形、能力大小来制定工作计划。因此要求地委把整理支部作为议事日程的一项。

(二)县委如何解决支部领导问题

1、首先是抓住一个彻底干,一定将自己这个整理好,找出要领

办法,作出总结作标准,根据不同类型支部,具体帮助区去工作,帮助区整理一个,提高乡区委能力。

2、其次,县不是为整理支部而整理支部,而是解决一切实际问题,为提高支部党员干部而整理,是为教育分区委,不能光说不做,也要防止包办代替,要将经验及时总结出来供分区委参考。

(三)分区委如何领导

1、首先转变不深入工作的做法,纠正只开开会、接接头的领导。今后不仅要领导支干,更要领导小组、党员,了解小组、党员。必须把个别谈话、接头与解决问题,开会分开。(接头谈话不等于解决问题)要了解全村问题,才能解决支部问题。

2、其次是大大发扬民主,反对简单要帐式的领导。要使支部敢说话,提意见。叫他明白不是为工作而工作,是为解放而工作,不是想怎样干就怎样干,而是本村要求怎样干就怎样干。

3、工作中心问题。反对“跑支部、趟支部”的领导,要有中心不要“推磨”与平均使用力量,要做好一个保持一个。

4、个人活动问题。衣服要通俗,要懂风俗人情,要善于掩盖自己目标,要群众化。个人活动要注意个人行迹问题,不要使群众怀疑。工作隐蔽,开会要伪装,不要大呼小叫,要用闲谈方式开会。

。(张雨辰记录整理)

武 装 政 策^①

(1942年8月)

崔田民

第一部分 武装问题的重要性

一、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必须有坚强的武装力量，武装问题是根据地的基本问题。由于敌强我弱，但敌国小、人少、兵少，我国大、人多、兵多，即决定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要抗日，要支持长期抗日争取最后胜利，就必须有根据地，要建立根据地必须有武装，武装是根据地基本问题，武装也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没有武装就没有中国无产阶级的地位，建立武装是建立根据地重要一环。没有这个东西，或有而无，什么都是空谈。这在中国革命史上与抗战五年来都证明了这一点的正确。

二、华北敌后游击战争的长期性。因为中国地形是西北高，东南低，华北有很多的山很重要，谁占领了华北就能居高临下统治其它，所以敌决心占领华北，我要胜利就要坚持华北，这是敌我必争之地，所以说敌人“始于华北，终于华北”。华北是敌最先进攻的一块地方，而我们收复又最后，所以说华北抗战是长期的，华北武装则更重要。

三、边区武装问题更加重要。边区开辟迟，华北的最前面即是边区，边区是华北、华中、泰山、太行山的中间，是极重要的一块地方，他又是磨擦的前线，如没大的武装，工作做不好，即会影响整个

^① 在冀鲁豫区党委轮训队的报告

华北。边区位置重要但地形不好,首先没山、没河,山少又是孤立的,又没树林,武装又少,顽固力量又很大,根据地建立晚,工作上又犯了错误,根据地即不巩固,所以,今天的武装在边区是很重要的问题。今后必须扩大民兵与正规军,以开展扩大我们的根据地。

第二部分 边区武装工作收获与缺点

一、收获。抗战以来边区抗日武装斗争的过程中有些什么收获呢?1、建立与扩大了党军,扩大了一部分正规军,打击了敌人,并补充了正规军;2、发展与组织了人民子弟兵,如基干团、我方武装;3、粉碎了敌人多次扫荡,打击了敌人、伪军、伪组织,打击了叛军的联合进攻(赶走了高树勋);4、团结群众建立了政权,我党我军在群众中有了威信,基本上团结了群众,坚持了阵地,保证了联系。

二、缺点、弱点。

1、从武装数量上来看,边区武装工作的缺点弱点:

甲、正规军方面,不够今天需要,不能保证正规军的满员,不能很好得到补充,不能得到相当时间的整训。

乙、地方军少而弱。规定1个区50人,1个县3至500人,现各县、各分区够数的很少,大都少2/3,正个边区更少得多,再加不能打仗,所以坚持工作是有困难的。

丙、民兵自卫队群众性游击战争还是才开始;我们要求数目字(半脱产与不脱产的)是与吃公粮的人数相等,过去全边区民兵差3/4(只组织了1/4),自卫队是把壮年人都组织起来。

2、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没很好开展广泛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对地方武装的发展掌握更差。

甲、野战正规军对地方军、人民武装民兵帮助培养不够。

乙、政权也没很好的配合武装工作,领导不够,对武装的困难解决也不够,没把1/3的地方款拿出来作武装经费。优待抗属、爱护抗属做的相当差,甚至先优待地方军,把正规军忘掉,给养问题

解决也不够。

丙、党内同志对爱护党军也不够，保证补充军队不够，送逃兵、动员战士、干部补充、战士补充都很差。保证供给，一切为战争胜利、战时动员工作都做的不够。从政治上帮助党军、注意党军纪律、提高党军威信作的不够，对军队群众纪律建议不够，也没很好在群众中解释说服，扩大党军影响，使群众谅解。

丁、群众团体在动员会员参加野战军、民兵、自卫队等武装做的都不够，发动群众工作差，甚至有的参加了救国会不站岗，群众与八路军两分离。

3、武装政策上的错误。

甲、不相信地方干部，不建立地方武装，对地方武装干部培养不耐心，对地方武装连根拔，结果垮台，再也建立不起来，武装难以发展。

乙、保守观念，不愿把地方武装正规化，甚至破坏正规军。因武装编并，地方干部即不发展武装，这等于取消运动战。

丙、扩兵工作的错误，用招兵买马、欺骗收买等办法，致使武装乱七八糟不巩固，最后垮台。土匪路线脱离群众，没骨干，土匪流氓成分很多。还有参军为发财，最后垮台逃跑。这都是违犯政策的现象。

丁、战术与工作上的严重倾向，固守、硬拚是不合乎战术的，我们打仗的原则是“打死敌人，保存自己”，而我们没很好运用。死打硬拚是左的倾向，游而不击不打仗是右倾现象，不相信群众、怕敌人、唯武器论、钢枪主义等，都是右的倾向。

第三部分 我们的武装政策

一、建立三种军队

1、野战正规军。

甲、什么是野战正规军。他的标准是完全脱离地方性（能到各

地去),有高度的严密组织性,适当的集中使用,避免过于分散;在战斗方面要真能有肉搏的精神与顽强性;政治工作方面要有巩固的政治制度(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执行制度),有模范的群众纪律,有服从制度执行政策的习惯,要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有这些条件才是野战正规军。

乙、野战正规军的基本作战任务是,帮助地方军粉碎敌人的围攻扫荡,在运动中消灭单独行动的一路敌人,开辟必要地区工作,夺取某些可能的必要据点,完成某一时期的战役任务。因此,野战正规军必须有相当时间的整训,尽量改并其装备,提高政治质量与战术。

丙、野战正规军要善于帮助地方武装培养干部,训练作战,使用爱护武器,这是经常的任务。

丁、野战正规军要帮助民兵与群众团体建立亲密的联系制度。

2、地方军。

甲、什么是地方军。凡脱离生产之地方游击队及地方正规兵团都是地方军。他的任务基本上要求不脱离地方性,要求他坚持地方的斗争,不能出境。他有保卫地方政权与地方党的领导机关的任务,他要保卫群众利益。

乙、地方军作战任务。地方军应积极的缩小敌占区,封锁敌据点,破坏敌交通,打击敌游击队、便衣队,对付敌小规模扫荡,使敌人行不安、坐不宁,经常受到袭击。

丙、战术。地方军要有灵活的游击战术,要有坚强的的战斗力的,成分要纯洁,组织要精悍,要建立一般必要的制度(特别政治制度如支部、指导员、政委等),要爱护群众利益,保证党的政策的执行,要高度发扬作战的自动性,战术要灵活。

丁、地方军要善于领导民兵配合作战,与地方的群众要有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地方军要坚强,要靠党送好的党员与干部到地方正规军中作干部、骨干。

戊、地方武装不能随便编并到野战正规军里去。基本上它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慢慢的提高到正规军的程度。要在正规军方面反对编并,在地方党内反对保守主义,不愿提高游击队的现象。另一方面要将正规军内的模范例子介绍给地方军,以提高地方军。

3、民兵。

甲、什么是民兵,民兵是一种半脱离生产的人民抗日自卫武装(如青抗先、模范班等),他高于自卫队,他应成为将来发展义务兵制的基础(现在是自愿兵役制)。

乙、民兵任务,封锁敌人,破坏敌交通,打击敌便衣组织,侦察情况等。另一方面敌扫荡时可掩护群众转移,配合主力作战,没特殊情况不要离村、区。

丙、怎样组织民兵,参加者完全采取自愿原则,不能丝毫强迫或以收买、抽签、等方法,要靠充分的政治动员,在斗争中组织。党的支部、各教会的会员都要了解参加民兵与掌握民兵的重要性,党要首先送党员去参加,各教会动员好会员到民兵中去,组织起来,要经常教育他们,提高他们。

丁、民兵中的制度要完全采取民主的原则,各级干部都应由选举产生,任何官办强制都会失败。

戊、抗日联防问题。性质组织不讲了。

目前应注意的问题,一是领导问题,争取士绅、地主参加(开明的),但主要领导权要尽量争取掌握在我们手里(尽量成立武委会)。二是干部问题,应派好干部去领导。三是经济问题,要适当解决,子弹情况与枪的问题。四是减轻人民负担,要高度注意。使群众负担加重,即会脱离群众。

目前工作,是在民主民生中去动员群众,普遍建立联防,已建立的联防应从改善民生中去巩固。联防对外是反对敌伪,对内要反对贪污,实行民主斗争,以减轻群众负担,扩大巩固联防,使联防在群众中建立起威信。

4、野战正规军的补充。

甲、来源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从民兵中动员加入，不是随便扩大，编并地主武装是在特殊条件下抽一部分地方军，在不妨害地方斗争的坚持下来提拔，不能采取简单方式，一般不允许编并（要经区党委批准）。地方军主要来源是民兵。

乙、什么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动员，是在党内、各教会内、群众中去广泛动员，要经一定时间与步骤，应遵守自动报名原则，尽量争取，一班一批的参加，绝不允许采取简单方式。

5、地方武装与群众武装的组织。甲、军分区成立基干团 1、2 个，各为冀鲁豫边第×基干团（几分区即几基干团）。乙、县成立基干大队，县长兼队长，受军分区领导，名按军分区排列第×军分区××县基干大队。丙、区成立区基干中队，区长兼队长，受县大队领导，名为××县第×基干中队。丁、不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人数与吃公粮人数相等。

二、保证党在地方武装游击队中的绝对领导

1、确立政治委员的制度。党要派好的干部去担任，他对一切大的问题有决定权，环境越恶化政委越重要。

2、建立政治工作制度。首先要建立政治组织，如支部、指导员必须有。

3、加强连队的支部工作。要发展战士，纠正单独干部是党员，不发展战士的现象，要团结群众，使支部在部队真有威信。

4、党、政、军在武装工作上的关系问题：

甲、基干大队、中队与政府的关系：（一）基干大队、中队在建制上是属于军分区，党的工作、计划、供给等都归军分区，政府不能调动其人枪，一切有关变更建制与内部组织的问题都属于军分区。（二）今后战争环境，在军政化一为统一力量对付敌人，一般可由县长兼大队长，区长兼中队长。军分区可向县长、区长下正式委任，他有执行权，有责任，可下命令，可使用这武装，但不能违背军分区命

令。(三)县长、区长主要仍是政权工作。除在大政方针负责外,其它工作由队付负责,防止只拉武装不管政权工作的现象。(四)县、区政府不要另有武装,要统一在基于大队、中队下(不要警卫武装),如军分区命令配合工作,可留一部分保卫政府。

乙、基于大队、中队与党委的关系:(一)县大队、区中队受县委、区委的政治领导,政治上要执行县委决定的中心任务。(二)如军分区、专署任务与县任务冲突,指挥上要在不违背军分区的命令下,县委来决定方向与计划。(三)县、区委有权检查县大队、区中队中的党的工作与政治工作。(四)大队、中队要向同级党委报告工作(1月1次),党委要讨论部队工作,保证军分区的命令执行,如大队、中队违犯命令,县委、区委能干涉其行动。为关系密切,队长、指导员条件适合者可参加为党委委员,以便于领导。各级党委必要的保卫武装,统一地方军,地方军负责保卫党的机关。

丙、各种武装的成立,都要由军分区批准,除青教会、青抗先外,不准成立其它系统武装与随便拉游击队。

丁、武装部与党、政、军的关系。(一)纠正过去对武装部领导的忽视,现规定由军分区与政府领导。(二)武装部是政府的组成部分之一,各级武装部门取消伙食单位。(三)关于武装部的干部调动、委任,由军、政联合负责。(四)军区与政权在工作上共同负责。分工上,组织计划执行、检查、供给由政权负责。指挥作战、教育训练、突击检阅等由军队负责。(五)武装部与党的关系:(1)党委在工作上不是直接掌握与间接指挥,主要通过军区与政府武装部门去实行党的武装工作,有权检查其工作。(2)武装干部条件相当可兼党委委员,但武装部长、科长不能脱离本职,条件不合可由司令、政委兼党委。(3)县以上武装科长的调动需经军区党委批准,不许随便调动。(4)武装科是县武装组织,可吸收非党干部参加。(5)武装科领导的半脱离生产的模范连、排、班,如程度提高已脱离生产,仍可领导,但应很快的过渡到军分区领导。(6)武装部门的党的生活

归地方党领导。

戊、指挥部的问题(县、区、村)。(一)组织问题:县长是指挥长,县大队副与武装科长是副指挥长。县书是政委,但一般不能公开。区长为区指挥长,副中队长武装助理员为副指挥长。村长为村指挥长,自卫队长为副指挥长。(二)权力:(1)指挥部为党委直接领导。(2)各级指挥部要保证军区、军分区作战命令计划与任务的执行,在命令下具体布置。(3)下级指挥部绝对服从上级指挥部。(4)县、区、村范围内的武装要归指挥部指挥。(5)指挥部不能设机关,不能开支。(6)对军区、军分区命令,县、区委如有意见,仍必须在指挥部内执行,执行中向地委提供意见。

三、建立军区、军分区制度

1、什么是军区、军分区。军区、军分区是边区人民、八路军抗战以来斗争中造成的。军区是军事组织形式的一种,他包括地方武装、基干团、游击队等与半脱离生产的武装,他是地方军直接领导指挥机关,同时又是同级党、政对不脱离生产武装的领导机关,所以他是积蓄力量与使用武力的机关。因此,他的组织机构必须一方面适合作战、教育、行政管理,一方面适合动员武装。

2、军区、军分区的任务。甲、组织与领导各种地方性的武装与敌、伪叛进行坚决斗争,成为野战正规军的助手。乙、动员训练广大人民参战、参军,成为野战正规军的补充源泉。丙、普遍建立民兵组织,认真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成为野战军的后方。

3、为什么建立军区与军分区。甲、华北抗战是我党既定方针,坚持边区斗争是不变的任务,因此,为应付将来的情况,在敌人退却时正规军追击北去,即靠军区、军分区坚持局面,在正规军另行新的任务时,仍能支持各方面斗争。

乙、为加强地方军、游击队的政治教育,提高它的战斗力,与敌伪顽斗争,扩大根据地。

四、对反共军(叛、顽)的政策

1、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军队可分四种：一是已与日本勾结好了，节节反共的即叛军，也可说是隐蔽的汉奸队伍；二是与日本没勾结好，但也节节反共，这即是顽军(形成三角斗争)；三是对反共暂守中立者是左军；四是对我同情者，是进步的抗日军队。

2、我们的总方针是，联合同情的，争取中立的，削弱顽固的，消灭与日寇勾结的隐蔽汉奸，要区别对待。

甲、慎重分清四种军队，真正区别判断其本质，不要只看现象，不要为个别现象所迷惑，要分别对象，打拉并用，光打不拉，光拉不打，一律打，一律拉都是不对的。

乙、注意各种军队互相变化，矛盾倾轧，抓紧时机采取适当的政策。

丙、利用敌人与叛军矛盾，利用正规军与地方军的矛盾，日寇与叛军的矛盾与其保存实力心理。

丁、要分别官与兵，上层与下层。

3、具体政策。

甲、对隐蔽的汉奸队伍的方针，总的必须认清磨擦是长期的，对隐蔽汉奸的斗争也是长期的艰苦的。因此，单纯的军事观点与想很快解决都是不可能与错误的。所以，对他总的方针是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工作上要与建设根据地联系起来，作战上要与反扫荡联系起来。具体办法，一是对内要作深入的教育，与隐蔽汉奸的斗争是抗日战争的一部分，是长期艰苦的斗争，以提高信心。要有主要目标，军事上打击到消灭为止，要优待俘虏。二是进行瓦解工作，利用其家属劝他，派人打入掌握，正确执行俘虏政策，发展党的组织。

乙、对顽军政策，应以革命的两面政策。

一方面赞成他与日寇作战，制造他与日寇作战机会。在与日寇作战时给以赞助(精神的)，我应乘机发展，切不要乘机进攻他，如

他有被消灭的危险，我们可以较大力量帮助他。另方面对他反共政策应采“人不反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对付，要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进行。

一方面揭破其反共政策，指示反共必然投降；另方面要与他拉关系，对杂牌军要指出反共是国民党消灭杂牌军的阴谋。

(三)建立党的秘密工作，在其反共投降时拉出来，给以打击(但番号不变，进行抗日工作)。基本上长期埋伏待时机，但在暴露时，即要想法拉出来。

(四)对拉出来的队伍处理，虽保留其原番号，但须使其离开其军队，靠近我军给以适当位置。旧军官要坚决撤换，肃清军队内不可靠分子，给以其它位置。对可靠的军官要坚决的利用，以巩固其组织，加强其领导，使其进行抗日工作，我们必须很好掌握。

丙、对进步同情我们的，应保持他、帮助他巩固发展。(一)经济、人力、物质上帮助他，扩大培养干部。(二)帮助他改造部队，使进步分子掌握领导权，并改造其制度(使他同意)。(三)帮助他作战，对敌、伪顽的进攻要帮助他抵抗，要以灵活的方式。

丁、对友军应加强对其联防工作，对有影响的人物，可聘他当参议(优待他)。不要以为他内部有坏分子就不是友军了，不能在友军内发展党。

五、创造外围军

1、为什么创造外围军，中国过去有许多军队、部分军队接受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现在也有。他虽大部分不愿八路军、新四军化，这样的军队不应也不可能要求他八路军化，但他不喜欢中央军，这军队可当作我们的外围军。

2、过去这工作有些成绩，但也曾有错误，如吞并、打击，结果因小失大，我们要有无产阶级政党伟大的政治气度对待之。

3、今后对外围军的原则，对愿接受八路军改编指挥的，不管他的来历如何，都应争取成为我们的外围军。应分别看待，要求对我

军要严,对他要宽大。

4、具体方针。甲、一般的要求是遵守命令,服从指挥调动,遵守群众纪律,即可为外围军。乙,不强迫改编其领导与制度,不强迫派政委,不强发展党的组织,如他自愿时可派干部去帮助他。丙,对外围军争取团结,主要方式是不采强迫方式,使他永远愿受我的领导,是以宽大政策,扩大政治影响,以我军模范例子及群众的抗日情绪来感动推动他进步,使他乐意接受我们的领导。丁、在他自愿原则下,自愿八路军、新四军化,即不能阻止他,应以长期艰苦的争取工作去达到他八路化,但改编番号需要经上级批准。戊、外围军可以自由脱离我们的指挥与领导。己、要帮助他物质、供给、经费。他又分高级外围军与低级外围军。

六、对土匪的政策

抗战来遗留下的土匪很多,特别山东多。有以下几种:一是来自民族敌人的,是日寇组织的;二是来自投降派,反共派的,他组织起来反对我们。因此,对土匪问题的原则,应从各方面去感化他,达到消灭他的目的,使他走向抗日。因为,他是与民众对立的东西,在争取瓦解土匪时,一方面要顾及到人民利益,另一方面要顾及到是否能消灭他,不致使对群众危害更大。分别如下:(1)抗日根据地内的,应将他收编改造他,通过政府叫回他来,经争取无效者即坚决消灭之。(2)敌占区土匪,敌不可能消灭他,我又争取不过来,不要多树敌人,可利用他起下面作用:抢日本的财物,保护交通,给我便利,不与他交朋友,利用他偷东西给我们,经过艰苦说服教育,把他组织成为游击队。(3)敌区敌人组织的土匪,应一方面争取他,一方面在防匪的口号下秘密组织民众对付土匪,利用土匪与会门矛盾,在有利条件下决心消灭。(4)对接敌区的土匪,如能消灭时即消灭,可利用群众防匪口号来打击他,使群众明白他是日寇组织的,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同时不放弃对土匪的瓦解工作。(5)土匪愿归顺时,基本上采宽大为怀、创造外围军的办法,慢慢改造他。(6)土匪如要

委任、要枪、要名义,不要给他,以防破坏我名誉。(7)与土匪接头要以秘密方式,不要以政府名义。(8)轻易打土匪是不行的。

七、对会门武装问题

1、会门性质有以下几种:一是日本汉奸组织利用的;二是顽固反共分子组织利用的;三是地主防匪保命组织起来的;四是仍然隐蔽活动的(根据地)。

2、对不同会门解决的不同原则。加强瓦解争取会门是很重要的,对他的基本方针是争取瓦解的方式,会门种类不同,我们的政策也不同。甲、这是长期耐心的工作,没艰苦耐心的工作只以打击急性是不会成功的,收效也是表面的。对日寇利用的最坚决反动的,在可能范围内可给以相当的打击(以汉奸名义)。打击也是为了争取,要在正确统一战线下面进行。只有在群众工作作好时,才能教育群众,彻底消灭会门。乙、对敌区会门不能采取强迫取消名义的办法,要利用原有形式打入教育提高他,发展他成为合法的群众武装组织。丙、对接敌区会门是采取有效的办法停止他的蔓延,加强宣传,出布告阻止,使群众不参加。据点附近已组织的,可争取他实际上成为抗日群众组织,使他合法在会门掩盖下进行工作(不要打)。对反对我们的会门(通敌),应一面打入长期争取,一面抓住有利时机消灭之。

3、争取瓦解会门的办法。(略)

(张雨辰记录整理)

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几个问题^①

(1942年9月)

万晓塘

一、民族敌人的特务活动

(一)日本帝国主义特务机关活动的全面性与其政治指导作用

1、日在华特务机关是属日陆军系参谋部的组织,受各地驻屯军各方面军的总司令官与参谋长的领导。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侦探机关,而是进攻中国的政治机关(等于我的政治部)。现山东敌特机关总长是大桥。根据了解敌特任务有以下几个:

甲、伪政权的建立、统治与指挥,一切伪政权都归敌特机关所领导。

乙、伪群众团体的组织、训练、监督(会门在内)。

丙、作欺骗宣传与怀柔政策。

丁、收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种情报。

从这里可看到日本特务活动的广泛,他主要是政治作用。所以,我们对反敌特斗争主要是政治斗争,而不是单纯的反奸细、反特务斗争。这是敌后对敌斗争的主要对象,不然斗争胜利也是困难的。

2、由于过去我们对敌特务机关担负的任务其性质及所管范围等基本问题没明确的认识,即产生了对敌特的错误认识与麻痹。

甲、只认识他的侦探性质,没认识到他政治上的指导作用,就

^① 在冀鲁豫区党委轮训队的报告

只看到反间谍斗争,没看成是全面的斗争。所以,今天的公安局没起他全面作用,把锄奸工作孤立起来。

乙、不了解敌特工作范围,所以把一切被敌训练的人都以为是特务,而产生了锄奸工作的扩大化与左的观点。这认识直到今天仍很严重。更有的把敌特指挥下的组织(新民会、伪组织、会门等),都以为是特务组织。

丙、由于不了解敌特本质,所以对敌核心的特务组织不了解,他一般的不到下层活动,所活动的都是其指挥下的外围,即使对敌斗争没抓住核心组织,仅是其外围,没认清主要敌人。

3、我们对敌特务机关应有的认识与对策。

甲、由于敌特活动是全面的東西,并是对中国军事侵略、政治进攻、群众工作联系着的东西(这是他的厉害),因此,我们不能单纯的限制在反间谍斗争,我们必须动员党、政、军、民来进行反特务斗争才行。若不是这样不会胜利。必须把各种斗争配合起来,保证各种工作的完成。必须把反敌特斗争认为是今后对敌斗争的主要内容。

乙、要认清敌真正的特务组织与敌特务外围组织,必须根据不同的对象,组织决定不同的对策,不要迷失方向。

丙、要在不同地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问题上来分清那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敌人组织与活动是相当狡猾的)。

丁、对敌特下层组织与被敌特利用的外围组织,必须采取广泛的瓦解政策,来争取他、利用他、收买他。

(二)日本特务组织与活动的简单介绍

1、日本的间谍组织:

甲、宪兵队,这是对我破坏最厉害的组织(一切都由他处理),他直接受日本内阁陆军大臣领导,在中国的总司令××,以分华北、华南、华中三个分司令部。宪兵队与其它陆军系特务是平等系统,不是领导关系,他有逮捕 10 级的权力(有上级命令)。边区各

县大都有。一县三人，一会长，两个伍长，有的两个人，还有伪宪兵（有的叫新民宪兵队），有的县没宪兵队。他主要任务是，侦察破坏共产党与监视敌军内部共产党活动与日兵反战，有枪毙人的权力。相当我们过去红军时代除奸保卫部，相当于英美的侦探局，德国的密探，苏联的×××。

乙、日陆军特务机关（陆军系）。大城市有特务机关，没有的县或城市即是顾问（领导伪政权），区、镇有的有新民指导员（特务）。县顾问指挥县长实行一切工作，对群众团体也经过县长领导，情报经情报室、警察所来进行。他在县里具体的执行他的各种任务。除此以外，有的地方有“兴亚院”，在中国有支那联络部（与特务机关是指导关系），他一般没下层组织。一般县有新民会、伪县府、警察所（除顾问与新民会是指导关系外，其它都是领导），顾问与他司令部是平行关系。

丙、敌参谋处二科（军事特务、敌探），只负责侦查情报。

2、伪政权系统的特务组织

甲、警察所（有的叫公安局），他有直接系统，内组织复杂，这是敌在伪政权下利用它统治农村的东西。他的任务就是办保甲、照像、成立自卫团等，他侦查机关是由特务系，他的系长往往兼特务队长。带特务性，不完全作特务工作。一般由旧警察、地痞流氓等组成，纪律坏，群众对他不满。争取易，争取他干好事难。它主要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等工作。一般是老家伙、叛徒、国特等破坏厉害，地方上的不怎么厉害，我们可争取瓦解他，使其少对我破坏。

乙、宣传室（过去叫情报室），华北有情报局（局长李××），专门造谣欺骗，搜集情报，进行宣传。各村联络员、情报员受其领导，一般县长兼，有的县在警察所内，他有一套系统组织。

3、新民会（华北敌特别组织，是反对汪伪的），包括华北及苏豫北部，它也是群众组织，但在敌特机关领导下，所以带有很浓厚的特务性，特别它内部一般干部都是特务机关派来的。它在不同地区

的作用也不一(它带党派的性质)。

4、敌伪特务活动的几种主要方式。

甲、诱降自首政策。企图从政治上、组织上来瓦解我们,向我们争取群众,是最毒辣的办法。

A. 利用群众或干部对我主张与政策的不满意、不了解或我政策上、工作上的某些缺点,进行扩大宣传,制造不满的情绪,抓紧对象进行瓦解、收买争取工作,如各种宣传品与诱降机关。

B. 在一般接敌区,开始以比较大的兵力来扫荡清剿,造成混乱局面再来诱降群众(要求由低到高)。我工作较好的地区,则实行保甲、集体自首。

C. 对党员、干部引诱办法:

①抓紧我党员、干部弱点、落后性来进行拉拢、引诱(利用干部对我的不满),采不逮捕办法。

②利用干部或党员的觉悟的不够及一些问题(如家庭问题,本身问题),通过各种关系来引诱写信,或秘密自首。

③逮捕家属引诱干部自首,利用群众舆论来打击我干部。

④捕了干部、党员后,放一部分,留一部分,威胁未被捕的党员、干部。

⑤捕我干部后,主要根据干部的特点与弱点来进行:(1)抓紧干部弱点、着好来引诱、收买、腐化(如好女人,好吃,好赌,好吸大烟等);(2)硬的、软的,硬软并施,也打也拉,一黑一白,一硬一软;(3)得寸进尺,一点一点的、一步一步的来;(4)利用家属的关系诱降;(5)利用狱奸来引诱,想一切办法把你引诱出来,用假革命面具来给你谈。

⑥利用两面派与敌伪关系来破坏,进行内奸活动,引诱自首政策。

乙、内奸政策。是敌惯用的,他抓紧我弱点,打入我内部作内线工作,过去我已受到很大损失。有的托匪甚至掌握了我主要领导机

关,借我锄奸杀我党员,破坏我的工作,这是很多的。去年连区地方武装叛变,二分区 25 人次,1000 人;四分区 14 人次,900 多人;秦西 3 县 1300 多。(这是半年来的敌内奸活动)可见敌内奸对我危害了。其活动主要方式:

A. 训练伪军伪组织中人员,(现正在作)利用各种方式到我内部活动。(这是对地方武装)

B. 对我主力则采取个别扩大,打入活动。

C. 利用社会关系、环境困难、干部思想紊乱,进行引诱收买工作。

D. 收买党内动摇、腐化分子,阶级异己分子。

E. 实行速捉速放的办法。

F. 有计划训练特务分子,通过关系混入党内来,作长期埋伏工作。

G. 收买我利用的两面派,进行反侦查,或利用我敌伪关系,作我们的工作。

丙、敌大量使用叛徒。敌所谓“以毒攻毒,以党治党”的政策,企图从政治上瓦解我与群众的关系,破坏我的工作。各处特务队等大部是叛徒闹的。敌使用叛徒是,根据不同分子给以不同任务,对大的叛徒,一般最初采信任态度,地位提的很高,以发挥其力量,最后就暗暗杀掉。对最坏的,则组织特务队。对不明的我不易发觉者,则派回作内线工作。这是目前很严重问题,对他的对策我们必须研究。

丁、对我工作较好地区,敌实行所谓“重点主义”,平时不管你,麻痹你,当工作完全暴露后,再彻底破坏,所以我某些地区损失很大。

(三)关于汪派问题。(缺)

二、关于锄奸政策问题

一) 锄奸政策的原則：

1、我们的政策必须适合于统一战线的方针，要认清主要敌人是日寇，主要对象是日本特务。反对锄奸政策一般化，把锄奸主要对象放在汪派、国民党上是错误的，必须把敌特与国特分开。（不管他如何活动）我们必须把日本的幹探（基本组织，基干偵探）与普通下层组织分开，同时要把自愿的与强迫的分开，更必须把与日本服务的汪派、托匪分子与参加伪组织的国民党分开，（这分子与敌人没什么不同，不同只是受国民党领导，但在一定条件下日本也不允许他合法）有的是借口他上级（国民党）指示而参加伪组织的，也要分开。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研究，不要一般化的处理。要肃清、打击真正坚决的汉奸，我们绝不牵连一个好人。若不具体分析，即没法处理。要认清我们是从政治上瓦解敌人。杀人不是杀的多少的问题，是杀的正确与不正确的问题。

2、我们政策必须适合于抗日民主政权的方针。公安局是抗日民主政权的一部分，他的工作必须适合政权方针，必须彻底执行保障人权，提高警惕性，防备各种奸细混入，防止任何敌人的伪装。另一方面必须防止主观的扩大化（警惕失措），要随时来布置我们的侦查工作，及时了解奸细活动，要把落后观念与真正敌奸行为分开。必须反对无证据的乱捕，一般落后的话与两面的话不应当作证据（证据不用多，要确实，使他无法变）。要反对无原则的乱杀与严刑拷打。我们要有“不放过一个汉奸，不错杀一个好人”的原则。

3、我们的政策要正确执行，必须灵活的利用执行政策的策略，反对简单化。对敌要分别处理，个个击破，要把奸细分子具体分析（死心塌地、被欺骗、觉悟的程度如何），按具体情形来具体处理。再一办法是利用敌人瓦解敌人。

4、我们锄奸工作必须执行保卫内部的方针。必须针对敌人阴

谋来破坏敌人的内奸活动,若没很好的保卫工作,党内奸细就不能肃清。不只光在内部保卫,更要深入敌内部去保卫,去破坏敌人对我内线活动。但要在处理时搞清楚,反对无原则的怀疑分子。

5、我们的政策必须通过广大群众执行,正确与否就看群众是否拥护与了解。反对把锄奸工作简单化、神秘化,只有使锄奸成为广大群众的运动,才能得到各方面的奸细活动材料,这就要看我们利用各样的人的方式的问题。锄奸工作没群众依靠是不行的,要使群众了解才行。

(二)过去执行政策的检讨

在过去很多地方执行锄奸政策是右,如开伪家属座谈会,有汉奸不捕,公开与伪军和平共居。在左的方面也有,如捕了汉奸以为只有杀才行,若不杀工作即受损失,以为将来他可能当忠实汉奸即早杀之。自去年较前正规了,但仍有很多缺点:

1、党、政干部对政策掌握是有了进步,如对叛徒的争取,伪军政策的转变。但另一方面,在执行政策上不会掌握,掌握不稳,没加强政策教育,干部对政策模糊,掌握不住原则,主观,具体的情况不了解,处理不当。

2、侦查工作上。没侦查工作就没锄奸工作,这是个主要问题。边区虽开始注意了,但仍是极差的,特别敌内部工作差,对敌了解也就很不够,到逮捕后也没材料来适当处理。

3、逮捕工作上,一般县以上乱捕现象已停止,但在区很严重,乱捕、轻捕、轻放的现象仍有。

4、审讯工作,严刑拷打的现象仍有,并很严重(花样很多),这是脱离群众的。这种现象虽已基本上纠正,但较轻打骂现象在政权系统上仍存在着。在看守工作上则更差,不注意犯人的生活与卫生,一般犯人出去都病、残,并发生使钱与犯人的逃跑现象。

5、案件的处理上,由于我没很好的侦查工作,致使很多案子不能很好的处理,致发生下列现象:

甲、处理手续不严格，放了不管，轻易放，不很好的进行教育，使群众怀疑。

乙、杀人手续简单，不公布名字、证据，很简单的现象都是不对的。

丙、处理太慢，长期扣押，有押一年多的，有的甚至押死了，表现了无能处理。

丁、个别地区阳奉阴违的现象仍有，表面执行政策、保障人权，实际上马马虎虎欺骗上级。

戊、对犯人的争取教育工作很不够，名为“争取教育释放”，实际上没教育。

(三)正确执行政策的几个先决条件：

1、加强对政策的宣传教育。对群众加强宣传教育，首先使干部与群众对政策有个了解，正确了解政策是执行政策的初步。由于干部认识差，在执行起来就不正确。

2、必须进行逮捕、拘押的教育，才不致发生捕错现象与捕来没有人管的现象，今后必须加强对这个工作的领导。

3、想正确执行政策，必须加强侦查工作。

4、必须开展群众性锄奸运动，必须加强下层锄奸组织。

三、今后反奸细斗争的几点意见

(一)提高全党警惕性，加强全党反奸细斗争的教育。根据以上问题证明，民族敌人与阶级敌人随时随地在破坏我们，我们必须了解敌人，警惕敌人，要有一套正确的锄奸办法，这是个经常工作。

1、正确认识、估计环境与敌人特务活动，要认清敌人的复杂与残酷的进攻，要时时准备着敌人袭击，使敌没法破坏我们。

2、必须更进一步的重视反奸细斗争，要认为这是个生死问题，要提到最高度，没反奸细斗争的胜利，革命成功是困难的。所以，我们必须号召全党开展反奸细斗争，把反奸细斗争当作全党的重要

任务。

3、必须加强思想教育、阶级意识教育及锄奸教育，使奸细不能在党内活动。将全党巩固的像一个人一样。

4、加强蔽密工作的教育与被捕后在法庭上、监狱中进行斗争的教育。

(二)加强对政策研究与具体的掌握，特别党的工作干部，经常处理各种事件，要总结经验，反对粗枝大叶。

(三)加强对公安局的领导，公安局的工作党委要负责任，要具体领导它，如它在工作上有了错误，县委一定负责掌握，求得工作上的密切配合。

1、必须认识公安局的性质。公安局是党的保卫机关，所以党委要常供给公安局锄奸工作上的材料，加强对除奸委员会与公安局的领导与教育。

2、必须加强领导，党委要检查它的工作，特别领导方面，工作毛病与干部意识要检查。公安局要向党委定期作报告，党委要负责给公安局配备干部。

(四)加强侦查工作。今后方针是开展全面侦查工作，造成广大群众锄奸运动，掌握政策，公安机关工作特点是三分之二的侦查工作。

1、必须正确认识侦查工作，侦查工作是锄奸工作的灵魂，没侦查就没锄奸。

2、今后要加强侦查组织与侦查干部。

3、善于利用各种组织、利用各种力量全面的开展侦查(全面侦查，包括对敌侦查全面，使用力量全面，任务是全面的，主要是使用全面力量)。

4、加强敌内部的侦查工作，即点线工作。

(五)严格建立保证政策执行的各种制度。

1、侦查工作：

甲、一般干部在一般情况下不能随便进行侦查工作,要有一定组织、一定机关批准。

乙、构成一定的现有材料或事实后,才能进行侦查,必有一定机关批准(超一级)。侦查中不能随便取消侦查(要经批准)。

丙、同级不能进行直接侦查,下级不能进行上级侦查,非党员不能侦查党员,这是组织原则问题。

丁、在一定时间内侦查材料不能侦查证实其有嫌疑,应取消侦查。

戊、对反革命分子进行反侦查时(布置到敌伪内部去)一般不能布置,应超两级批准,如侦查是一般党员应由公安局。

2、逮捕工作。现规定区有逮捕权(政权),县以上武装有逮捕权(一般的汉奸都可逮捕)。逮捕干部一般超两级,党内区委要经地委,县委要经区党委。一般党员经地区(这是一般犯),如内奸分子或当汉奸不算。

3、案件审讯问题。

甲、政治犯、内奸问题,按一般是公安局预审,如没办法时交上级,不经司法机关。逮捕只有由锄奸机关。乙、公审问题,一般不能实行公审,有的可实行干部公审(如国特)。在部队可公审,没教育意义的非公审。

4、案件的处理。

甲、专署在一般情况下有证据,口供、判决书,有杀人权或判徒刑。对大的敌探、政治犯、汉奸应经锄奸委员会,由地委书记同意。

乙、紧急情况下具有杀人权,尽可能经县委书记知道。

丙、公安局长在特殊情况下可处理,有事实材料。

(张雨辰记录整理)

关于减租减息问题^①

(1942年9月)

高元贵

第一部分：讨论几个问题

一、张三借李四大洋 100 元，二十九年借的，按年利 2 分利（一年 20 元），因减息打了架告到县政府，如何处理呢？（去年以前的息已交）——不减。

二、张三民国二十年借洋 1000，每年 3 分利，10 亩地作抵押，民国二十五年已不能交息，10 亩地给人家种了，到现在实行减息，打了架，10 亩地张三如何收回来？——不拿钱收地。

三、赵×二十年租×××地 10 亩，每亩 10 元地租，今年如何减租？——不减。

四、范县×地主出租地 10 亩，二十五年是 1 斗麦、2 斗粮，在二十九年他听说减租，即增为 2 斗麦、2 斗粮，现在减租如何减法？——按抗战前的数内减，即 3 斗内减。

第二部分 减租问题

一、减租原则问题

1、减租是减今后的，不是减过去的，（一般以抗战为标准——按情形）这是因为过去的已交了，不能再倒，没交的可减。（退租不大讲统战）从抗战前租数中减，因为战前租额较固定，剥削很厉害。

^① 在冀鲁豫区党委轮训队的报告

战后租额已变化,一是已实行过减租,二是地方战后将地租抬高。

2、减租的标准:大种地、定额地租减去 25%(大种,包种);小种地实行二五增佃,(有一九、二八、三七,地主出种子、肥料、农具、佃户出劳力)是从佃户得数中增 25%。逃亡地主的地租不能超过 25%,如果减租后仍超过 37.5%(地主得)可不管,少于 37.5%,双方自愿可不管,如地主争执,可调解。

3、怎样应付地主的勾地,减租后地主不准随便勾地租给别人,(减租后一定是新的,尽量鼓励双方定长期的契约,有永佃权更好)这是边区政府土地使用条例 17 至 23 条的规定。减租后佃户有永佃权或较长期的契约后可实行下一条,即地主有收回出卖、点等权,在一定条件下即在增加生产的条件下,可允许地主收地,这不是妨碍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地主收回地出租、出卖、出点者,佃户有优先权(先点、先买、先租的权利),如地主真卖给亲近人的时候,可先叫他买,其余不行,但必须强调佃户优先权。

4、欠租问题。年岁多,可免交。最近者,可使用条例 41 条,减租后交。如欠的已超过两年总数,可分期交,不可强迫佃户交。如灾荒不收粮食,可免租、少交租(因为生产成本多,收粮少)。

二、今年麦季减租中的偏向

1、因为不实行合理负担即不减租。他的理由是负担双方拿(如大种地,佃户夏拿 4/10),不实行合理负担就不减租,这是不对的。减租是一定的,无论合理负担实行不实行,一定减。

2、因为贱年不减租,这也是不对的,这不但减,而且要多减,甚至要免租。

3、以为环境不好即不减租,这在接敌区可按 10—20%的减,在根据地是绝不能变更的。

4、因为地主负担重而不减,也是不对的。他说佃户不愿减,这是我们动员工作不好,这些地方如因新合理负担没实行,地主负担重,可快实行新合理负担。

以上这些都是右倾观念,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必须严加纠正,如不,广大群众是发动不起来的。

第三部分 减息问题

一、减息的几个原则

1、减租是减过去的,不是减现在的,一般按抗战前后分。我们要发动群众算算帐,结束以前的债务关系。抗战后是借着借不着的问题,而不是减不减的问题。因为抗战后一是纸币跌价;二是在目前环境下放钱出去不见得保险;三是有钱的都不愿暴露自己的钱;四是过去我曾规定分半减息,使地主不愿暴露有钱,所以抗战后的息听群众自己处理。抗战前的利息如何减呢?甲、抗战前的息至今没交的,可按分半计算交。乙、如年年拿息直到今天,也不能倒回来。要看如何拿的,如息已超过本钱1倍,可停利还本,(分期交,三年四年还完,这期中不再交息)如拿的息已超过本钱2倍,可本、利全不再付。

2、一般点、当地的,地主可按契约随时收回地(原价),但因纸币跌价,可由政府调处增点。

二、减息中几个实际问题

1、借粮还粮,春借秋还者,基本上是借贷关系,这问题基本上不应管(不减),但因太高可借多少还多少,如真拿不起,可调处。如年景好,明年保证不借,可在群众自愿下减,双方说明也可以,政府不应规定。

2、由债务关系变为点当关系者(地或房子),可分抗战前后,抗战以前的按分半减息,超过者可还本或不还。可在变债务为点当关系时,即按点当关系处理,拿钱回回来。如点当关系没税契,可按债务关系处理。没拿的息(点当以前)可按分半算,点当关系以来的可按三分利算,(因为地的生产可当利)可按超过多少可处理(按以上)。抗战后的可听群众自己处理,如已成为点当关系者,可按原价

收回。因纸币跌价可调处。

3、籽利地。即借出钱、买亩地，借钱主仍种地，每年拿租（不死契）给放钱主。（以地租代利息）这基本上是债务关系，如是战前的，可按放钱时那年的利息额算（地租数额等于多少利息），按拿的多少照以上办法处理。战后的基本上是不减。调处由群众自由处理。

4、战前借的钱地主不要息、不要本，农民还他也不要，这是因为纸币跌价的原因。他到敌据点后可能还要，或者中央军来了再要，这个可叫农民交，他不要可告他，政府调处解决。农民不愿交即不管。

（张雨辰记录整理）

合 理 负 担^①

(1942年9月)

高元贵

一、对合理负担的认识

过去一般同志对合理负担认识不够正确。一般同志认为合理负担是简单的征收办法,以为会不会没关系,这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认清合理负担是改善群众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阶级斗争的问题,是农民与地主、富农斗争最激烈的东西,是反对最不平均、最不合理的平均和摊派的。合理负担是,有的多拿,没有的少拿、不拿的合理办法。所以说,合理负担是改善群众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又是一个征收办法。

二、合理负担的原则(不管新、旧合理负担)

1、富力大的多负担,富力小的少负担,极穷的不负担。以累进的办法,也是反对平均摊派的。

2、地主最大的,负担不能超过其收入的30%。

3、以县为单位负担的农民不能少于80%,因为抗日负担是人民的义务,如不拿负担的人太多,地主、富农必然拿的多,必然要超过30%,这是统战原则。

4、不要因拿负担而妨碍生产。农村有以下几种生产方式,必须分别奖励与削弱:

甲、封建的生产方式,是地主的租地方式,第一种是大种地,地主什么不管只分粮;第二种以小种地,地主出东西,佃户出劳力,按

^① 在冀鲁豫区党委轮训队的报告。

三七或二八分；还有一种定额地租（一定的数目收多少都要交）。这是最普遍的三种，大种地是最落后的生产方式，小种地是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因为地主劳心，生产量也多，大种地地主不劳力又不劳心）所以我们应提倡小种地，尽量使大种地减少，（叫大种地地主多拿点，小种地地主少拿点）以增加生产，有利抗战与根据地建设。

乙、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富农）是更进步的，我们要奖励它，（他是自己又劳心又劳力）使他负担较少，以发展这种生产方式。

合理负担的改进，是要合乎以上这四个原则。

三、标准亩

1、为什么定标准亩，地有好坏，要求算为一个标准，必须折合为一个标准亩，从标准亩多少来看穷富。

2、如何定标准亩。

甲、标准亩大小，每官亩 240 方步，每步 5 市尺，每方步是 25 平方市尺（长宽乘即官亩）。

乙、收获量，每亩每年收粮 1 石 2 斗至 1 石 4 斗（每石 10 斗，每斗小米 15 市斤）。

3、标准亩算法；土地分五等、十一级，见下表：

等 级	收获量(石/亩)	每亩折标准亩(亩)	
特等地	1	2.5 以上	临时折
上等地	2	2—2.5	1.8
	3	1.8—2	1.5
	4	1.6—1.8	1.3
中等地	5	1.4—1.6	1.15
	6	1.2—1.4	1
	7	1—1.2	0.85
下等地	8	0.8—1	0.7
	9	0.6—0.8	0.55
	10	0.2—0.6	0.3
劣等地	11	0.2 以下	不负担
注	第 6 级为标准亩		

四、负担亩计算办法：

1、鲁西老合理负担，是按等折合地后，全家人口平均，每人去1亩基本田，下余平均数超过者，按每3亩1级，直到6级，1—5级每亩分别按1.2亩、1.4亩、1.6亩、1.8亩、2亩来折算，共负担多少亩（即每级2分的累进率）。

2、最新的合理负担累进率是1.1亩，分20级，每级1亩，每人免征点1亩，以分为计算单位。（4舍5入）如：1人有地21亩零4厘，去免征点1亩下余20亩，每亩1级分20级，1级不累进，2级1亩计1亩1.3级1亩计1亩2.4级1亩计1亩3.5级1亩计1亩5.6级1亩计1亩6.7级1亩计1亩8.8级1亩计1亩9.9级1亩计2亩，10级1亩计2亩4.下类推。算法是从三级起 1.1×1.1 ，每加一级乘一个1.1，到20级即1.1乘18次。这样到20级1亩即负担6亩1分，20级为累进终止点。平均每人20亩地，经累进共负担地为57亩4分。

五、三个合理负担的比较：

1、新、老合理负担的比较：

甲、老合理负担地主负担重，新合理负担地主负担轻，带有统战性。

乙、老合理负担折合土地简单，新合理负担折合精细。（3等与5等11级）。

丙、老合理负担动产不负担，新合理负担动产也负担。（资本五百元折中地1亩）。

丁、老合理负担只说土地与房子，树木及其它副业不算，新合理负担都算负担（出卖的时候算）。

戊、老合理负担是地主一方面负担（不管大种地，小种地），新合理负担是双方负担，大种地是地主负担6/10，小种地三七是按

二八负担,二八是按一九负担,但一定要实行减租。定额地租完全由地主负担。

2、将来的新合理负担与新合理负担比较:

甲、将来新合理负担动产不负担(不好计算)。

乙、将来新合理负担房子也负担,以前不负担,易瞒黑地。

丙、将来新合理负担大、小种地负担改了,因为新合理负担妨碍生产,将来是使小种地负担轻(由地主负担),大种地负担重(是三五、六五拿负担)。

丁、将来的算法更简单一些。

六、今年实行合理负担中的经验教训

1、过去实行多是强迫命令的,致使全村民众联合对付我们,与我们对立,公正人都是代表地主利益的,将来要使群众与群众对立(穷富),以大多数赞成的人,反对少数不赞成的。不要以强迫命令的方式,要发动群众。

2、实行合理负担是为改善群众生活,一定要将群众发动起来,要使封建势力削弱。

3、评议土地是最复杂的事情,要一律差不多,防止全村暗商量,要先成立县评议会,将全县大概情形定一下,要发动群众,公正自报。

4、反瞒地,反黑人,要从群众中去调查。

(附)今天的合理负担计算负担亩数办法是:首先登记土地,经过反黑地,评议地按5等11级得出每户标准地亩数,再按累进率计算负担地亩数。今天的合理负担算法,仍是20级-仍是以分为单位(四舍五入)。累进率是有规律的-20级又分为11级累进,算法如下表:(单位:亩)

每人平均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负担亩	1	2.1	3.3	4.5	5.8	7.1	8.5	9.9	11.4	12.9	14.6	16.3	18.3	20.3	22.7	25.1	28.0	30.9	34.4	37.9
累进分级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各级每亩折	1	1.1	1.2	1.3	1.4	1.5	1.7	2	2.4	2.9	3.5									
逐级增加	0	0.1	0.1	0.1	0.1	0.1	0.1	0.2	0.3	0.4	0.5	0.6								
注	1. 每人平均地应为标准亩。 2. 负担亩是经过累进增加后应负担亩数。 3. 各级每亩折, 为这一级标准亩折负担亩数。 4. 逐级增加, 为这一级比上一级每亩累进增加亩数。																			

冀鲁豫军区 1942 年工作初步总结

(壹)敌人进攻边区的形势：

(一)敌人进攻总的形势。敌人本其既定的灭华方针，进攻华北总的阴谋，一年来对边区的进攻是全面的蚕食，面向根据地内部压缩。但由于敌人兵力不足的基本弱点，加以我们力量不平衡，根据地工作基础不同，所以敌人进攻有他的重点的。这不仅表现全边区工作方面，即便各县甚至各分区也都有他的重点。兹从以下几个事实来看，对全边区进攻的方向，仍是由东向西，推进压缩，首先是完全控制秦西，继之控制东平湖地区。从各分区的形势来看，一分区进一步清剿秦肥山区，待我完全退出后就积极进攻长清以南，安了不少的据点，把我一分区武装完全逐出秦西山区，逼到黄河以西狭小平原地带。二分区则积极进攻鄆南、鄆南、钜荷边，按 30 多个据点，由南向北步步压缩，直接威胁我濮、范、观中心地区。三分区积极进攻堂邑、聊西、观北、控制朝南，向卫河西压，南面隔断我濮、范、观中心地区的联络。(现在要经过四十里的堡垒线)四分区以聊城、阳谷为依托向东进攻，同时积极控制东平湖地区。防止五、六分区向东发展，隔断与濮、范、观中心地区的联络(中间有清南、清濮两公路)。七分区是由东北向西南压缩，切断与钜南联络。

(二)敌人进攻边区的方式：

(1)采取分区连续扫荡。从 1 月至 10 月敌人扫荡 67 次之多。除 9 月 27 日对濮范观中心区，4 月 28 日扫荡高树勋外，余均是以联合讨伐形成频繁的战斗。其联合讨伐特点有三：A、联合讨伐一般

以伪军为主,日军起指挥突击作用;B、扫荡的目的,在于破坏我抗日秩序,摧残我抗日力量,摧残我地方工作,使我没有休整恢复工作余地;掩护修筑据点公路。C、对每地区扫荡之前,有相当特殊准备,如调查工作,准备按设伪军伪组织的工作人员。如在扫荡时按据点,敌寇即将所准备的伪工作人员公开其面目成为伪军伪组织。同时因对我地方工作事先已有充分调查研究,敌人即在扫荡中或扫荡后大肆破坏。

(2)据点公路堡垒的发展和过去也有很大的不同。全年增加据点公路数目如下:

日军据点增加 26 个,如和今年减少的据点对比起来,则全日军据点无甚增减(1941 年 12 月统计)有日军据点 294 个,今年则减少 24 个)。

伪军据点增加在内,共 759 个,这里说明了敌人已由点的占领,发展成为面的占领,密度比去年增加,除增新据点外,还把据点间用公路贯通。

公路现在 160 段(以 1 县为 1 段)共长 3038 里,封锁沟 14 段, 220 里,这说明敌人已由线的占领,发展到网的领导。另外从今年据点公路的构筑上,也有它的不同。一般是用堡垒与公路,把据点与据点间联络起来,孤立的据点比较少了。一般据点都是离开村庄修筑,加强防卫的作用,以强大的据点为中心,控制相当机动的兵力,向外发展,修筑很多小据点,以巩固大据点的安全。安设的方法事先准备好民夫,动员砖瓦、器材、木料,选择位置,集中兵力掩护,完工以后再把主力撤走。

(3)对不同地区的进攻也采取不同方式:

A、实行过清剿之后的地区,预定据点公路已经修成,我公开力量也已退出,敌人主要进行政治清剿,破坏我地下组织,破坏我敌伪军工作关系,镇压抗属,培植伪军伪组织的力量与威信。

B、对敌我游击区进行小规模讨伐;按据点修公路,驱逐我

公开力量，建立伪军伪组织，树立伪秩序逐步变为其完全占领区。

C、对我基本地有坚强地方武装和民兵武装区，如沙区、三、四分区鄂北，一面暗地派遣奸细瓦解联防，另外还使用两种办法进行其军事进攻：其一，进行大兵力压迫联防；其二，是在镇压不成功时，即用一部兵力对峙，另用一部兵力转移到我之薄弱方面，侧翼突击，同时由外逐步蚕食。在我有主力正规军驻在之基本地区，以日寇为主组织大扫荡，战术上采取铁壁合围，经济上大破坏。

(4)在敌人进攻战术上，是采取了防御与进攻两种战术，兼并使用。但，敌人基本上军事方面是对我进攻的。这种兼并使用的特点，敌人利用军事上的优势，采取深沟堡垒政策，以少数兵力固守据点，以巩固进攻的战果，控制广大地区，掩护推行治安肃正，建立伪秩序。同时敌人凭借据点、公路，便于其运输，隐蔽集结兵力，利用了坚固的工事，节省与抽出相当大的兵力作为他们的机动部队（如郟城之村上讨伐队、清丰之本公讨伐队，对我不断的分区轮番扫荡，铁壁合围，突然袭击等。其次在敌人屡次采取铁壁合围战术，如：“四·三”南、清、观之扫荡，3月钜南之扫荡，“九·二七”濮、范、观之扫荡，“十·三十”沙区之扫荡。这个战术的特点表现在：

A、事先准备充分，计划周密，有充分的调查研究，特务活动，兵力活动，造谣演习，部队出发时间；

B、隐蔽集结，突然出动，出我不意；

C、采取凝兵战术，插旗帜迷惑我军；

D、到第二圈击圈时特别大；

E、三面合围，一面设伏。

但同样也存在着他不可弥补的缺点。

A、由于其战役形成，在旅团、师团以上，准备时间要长，而我们的目标是分散的转移不定，使敌不易捉摸，可是它的计划又不容易变更，敌人则容易捕空。这里我们体验到，只要我们部队里进一步分散活动，精兵简政工作作好，情报工作贯通，那是更容易使敌

合围落空的。

B、因敌轻装，必须减少轻重，无疑地将增加士兵的重量，消耗了士兵的体力，便于我部队的突围。

C、要形成合围，必须形成宽大正面的疏开包围压缩，容易使我突围，其各部队中间的空隙距离要宽也便于我们钻空子。

D、由于敌人兵力不足，合围部队都是从各地抽调而来，因此，便利我们在侧翼后方打击敌人。

另外，在敌人铁壁合围中，对我党我军政治上破坏，则更加毒辣。敌人企图打破我与敌的不可超越的界线，模糊我民族意识，消降我党我军对敌仇视心理。敌人到处散布不杀俘虏，与我交朋友释放俘虏。如在范县合围时，捕去的我军俘虏到郛城时，敌人发动小学生喊口号欢迎，发给纸烟，设立招待所。因此，我们部队中，个别落后分子，所受到的影响，是认为敌人不可怕，从政治上思想上解除了武装。同时敌人利用一批变节分子，做为瓦解我们部队的工具，如泰西敌人就提出过，以军对军，以党对党，以地区对地区，以政权对政权，利用叛徒破坏我根据地的具体办法，此外运用了各种办法破坏我党在伪军伪组织中的工作，如发现我们在伪军中的关系时，即用特务分子，来和我们建立关系，用以查明我们在伪军伪组织中其它的关系，加以破坏。这里告诉了我们，对被敌俘虏过的分子归来后，要经过严密的考察与考核，并应在部队中进行深入气节教育。

（三）一年来边区敌人的变化

总的方面可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新加坡失守前，这个时期敌人的主要变化，表现着厌战，厌战情绪生长着，各个据点日本士兵自杀，逃亡者相继发生。如泰西即有日本兵两名逃亡，其中一名投诚我军，一名不知去向。郛城也有一名日军逃跑。据敌工部门统计，敌兵在边区自杀的 17 名，投诚的 13 名，尚有失踪的数名。这个时期敌人对边区进攻稍有降低，除个别

地区外,一般的敌人活动是不大活跃。另一方面敌人是不得不加其对日兵、伪军、伪组织的监视。从伪军伪组织方面来看,由于当时形势变化,降低了对日寇依靠的信心,同时在我年关政治攻势影响下,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要调伪军到太平洋作战的宣传(事实上敌人这个时期也改编了不少伪军),伪军伪组织当时陷入极度恐惧的状态,当时有不少的伪军与我们接头反正,要求下委,自买公债等。从顽军方面来看,以高树勋为首的顽军,一时速胜论观点冲昏了头脑,与日寇的关系转向恶化。如高军在濮阳办事处的被监视与取消,部队进行对敌备战工作,开始挖路沟,对我军态度开始好转,如写信派代表等,停止对我军事进攻,双方相峙。(当时在我军内部也受到一些影响,个别的抱有速胜论观点,轻敌苟安心理,对敌备战松懈,政治上发生麻痹现象)。

第二个时期是在新加坡陷落,日寇在南太平洋方面,取得暂时的胜利之后,在日寇大肆吹噓宣传方面,在敌伪顽方面,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敌人方面由厌战失望暂趋稳定,继续太平洋战争暂时胜利的余威,加紧对后方及我根据地的扫荡,如对昆山、钜南、清观等地区的扫荡。对顽军的政策也有了改变。本来在太平洋战争未爆发前,敌人是利用顽军反共,来同我军对消力量,敌人在政治上,极力拉拢,军事上采取监视态度。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暂时取得某些胜利时候,则对顽军采取了直接逼迫顽军伪化或把它逼走。在伪军方面也表现了一时情绪恢复和安定,又兼当时在执行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加以整理伪军更进一步伪化,伪军也有了新的发展。如敌人对齐子修、卫河各杂牌伪军的整理改换番号,逼迫他们脱离地方性;钜南扫荡后孙良诚、赵云祥的叛变投敌等。这时伪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也就疯狂起来,如像刘本功对昆山,齐子修对三分区,刘景超对四分区的进攻等等。在顽军方面,很显然的,由速胜论转到悲观失望的途径上,但又看到苏联的反攻胜利。英美还有强大力量,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仍想与敌秘密订立条约,勾通、和平

共存(?)，以保存实力，等待时机，适当敌人推行四次治强运动，不光改编伪军而且还要那些谋略部队公开伪化，因此，敌人对顽军采取了威胁性的扫荡，如3月扫荡孙秉贤、孙良诚、赵云祥、朱世勤，4月扫荡高树勋等。

其次是从敌伪顽军内部实际变化情形来看：

(1)敌人方面：

A、敌人战斗力的消弱。具体表现新兵增加，老兵减少，根据清丰松本大队一个阵中日记和一个日本俘虏说出的情况是这样：松本大队每个中队有180人，分初等兵(1942年4月入伍22岁)70个，2年兵(1941年入伍者23岁)60个，3年兵(1940年来华者)每中队只有3个，预备役(明年才能入伍者)20个，后备兵21个，1937年—1938年的老兵，原有50个，今年夏天3月间完全调走了。因为新兵战斗经验、军事训练均不如老兵，战场动作不如老兵熟练，射击技术减弱，战斗顽强性降低，一遇我军追击即无组织的溃退。缴枪容易。在政治攻势中的楼集战斗，敌兵自动从炮楼上爬下来缴枪，在陈庄战斗中，也于很短的战斗中俘虏日军2名，娼妓1名。在扫荡元城时，1个日本兵携带机枪1挺，子弹70发，与主力失去联络，被我民兵捕住时并没抵抗，也未破坏武器，把机枪交给我们，放他回去后自杀了事。10月扫荡沙区时，也是在我游支摸到村之后，打了几个手榴弹，敌人丢下机枪掷弹筒就跑了。敌人不轻易进行白刃战，很远就打枪，四、五里以外就打炮，小部队活动下的下级军官指挥能力大大削弱，一遇到我军打枪时，就往后退，退却时组织也很零乱，表现不敢打硬仗。

B、敌人兵力虽然没有增加，但敌人的机动性与集中程度却比过去有了增加，一年来敌人的数量没有大的变动，去年为5000人，现在还是如此。可是敌人的据点减少了。去年12月的统计，日军据点有204个，现减少24个，有的因为变成敌占区而撤走，另有46个变成伪据点；连同今年新增加的26个，现共有日据点160

个。其具体的分布情况是：汶上只有 3 个，日本兵有时连一个也没有。朝城有 43 个据点，只城内有几个鬼子。七分区定陶有 26 个据点，连碉堡在内共有 40 个据点，其中仅有 3 个日军据点。菏泽共有 28 个据点，仅有 3 个日本据点。由此就说明了敌把守备兵力减少了，机动兵力增加，如郓城经常保持 300 名以上的日军，郓城仅有二、三十名日军，现已有 200—300 名的日军。另外在兵力配备上也有了变化，主要把兵力配备在与我根据地交接的第一线，其占领区后方很空虚，越是接近我主力军住地的地区，敌人的兵力越大，据点越多，如南乐、清丰、郓城、濮阳都是如此。

C、敌在边区指挥系统上虽未完全统一，但配合上则比以前更加密切起来。

(2) 伪军方面：

部 别	1941 年 人 数	1942 年 人 数	部 别	1941 年 人 数	1942 年 人 数
李 英	2500	3700	李岐山	1500	4000
刘本功	19 个连	22 个连	田福九	600	1000
王文光	300	900	李新林	400	800
齐子修	7000	10000	刘绪安	800	900
文大可	2000	3000	孙良诚	8000	22000

A、伪军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根据我们了解，去年伪军总数大概 30000 余人，今年则发展了 32000 人，现在共有伪军总数 60000 人，较去年发展了一倍。分别计算则为：

如将上列伪军分成甲、乙、丙三种，我们就可透视到它的特质（甲种）包括剿共第一路、东亚联盟自治军、文大可、齐子修、刘本功、李岐山等部，可能有机动部队 32500 人较正规化，能脱离地方性，配合敌人扫荡，装备较好，大部分由抗日阵营叛变出来的。（乙

种)包括县警备队,共 23000 人,带有地方性,都是土著的力量,民团、会门、土匪,由敌人直接培养出来的,少数是由我们地方武装叛变过去的,及抓来壮丁凑成的,装备很差。(丙种)包括乡、区自卫团,少数会团壮丁均有 13000 人,地方性极大,装备及战斗力很坏。

B、伪军得以发展的原因:①由于敌人在太平洋暂时胜利的影响,在伪军伪组织中起了相当大的麻痹作用,并推动治强运动,敌在军事上保持了暂时的优势,统治上集中程度的加强,还能采取强制办法,如强抓壮丁等。②敌占区在边区的扩大,其统治人口增加,我根据地某些地区变质,敌人对群众进行了麻痹宣传,使其能在这些地区发展了伪军。③敌人诱降政策收到了效果,如对孙良诚、赵云祥的诱降。④敌人利用边区灾荒,并且大肆利用流氓份子。⑤我们对伪军发展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破坏,这表现在:在群众中从政治上打击伪军不够,如教育当伪军最可耻少,反而产生伪军三保险的论调,对伪军五大保证的错误政策影响没有根除,对伪军反正光荣的口号解释得不够,如孙良诚叛变后,我们始终没有讨论出政策来。

C、伪军过去伪化的程度上更进一步,如齐子修、孙良诚,卫河西伪军等比过去严密,进行了整编,装备改善,听敌指挥,配合扫荡,伪省警备队配备掷弹筒、轻机枪,齐子修、李岐山、刘本功、李英等均有小型兵工厂,伪军企图不但吃穿自给,而且武器弹药也要自给。从屡次扫荡中也可看出来,伪军不仅能守据点,而且能够联合讨伐,和不断地向外出击。伪军开始脱离地方性,经济互相调剂,对我根据地的进攻蚕食也更加积极起来。

D、有不少伪军、伪组织为国民党所掌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抓紧了伪军的动摇,积极地掌握伪军伪组织。如齐子修、王天祥、李英、刘本功、李岐山、王文宪和国民党均有极密切的关系,并有委任。因此伪军盼望中央军来,反正到中央军去。伪军在敌人直接掌握下,国民党暗中利用进行反共,使我军对伪军争取工作增

加困难。

(3) 顽军方面：自从 3 月份扫荡孙良诚、赵云祥、孙秉贤及 4 月份扫荡高树勋之后，顽军内部起了基本的大变化。这表现在：

A、军事力量削弱内部分化，由军事反共转到政治反共为主，由进攻转到防御，其内部分化，以孙良诚为首的顽军叛变投敌，以高树勋为首的更靠近了国民党，退出陇海路以北，逐渐使土著的地方派（如孙秉贤、马逢乐、邵洪基）失掉了军事上的依托，他们今天是互有矛盾，力量大小不一，具有极浓厚的地方色彩，加以敌人的分割，使得谁也不能指挥谁。同时由于我根据地的发展，使得顽军更加分割了，他们都兼有政权，如邵洪基，孙秉贤等。由于去年军事反共失败，乃由军事反共转为政治反共，在政治上一面以现有武装掩护顽固政权和特务活动，一面在我根据地积极的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公开非法的破坏我根据地。如我九团得到濮阳国民党大量发展党员的指示中说：要破坏我党我军的威信，大肆造谣，如说：八路军精兵简政是要实行长征，要到满州去。（主要是利用小学教员）利用进步法令与我进行合法斗争。同时他们还利用伪军伪组织跟我们斗争，来反对我们。掌握伪军伪组织的方式是这样的：第一利用伪军的正统思想及国民党的合法地位，强调曲线救国论。如主张联合一个敌人打击一个敌人，齐子修在三、四分区即说：八路军抗日才不是保护群众利益呢，抗日本鬼子会来烧杀我们，不抗日，鬼子即不来烧杀我们，这样才是真正保护群众利益。积极发展国民党员，如同我们一分区，不论成分和条件，只要能掩护国民党员在伪军中工作，与坚决反共，即可被介绍为国民党员。如同我们一分区会得到伪军李岐山部一个国民党员人名单，该部 4500 人中，2731 个国民党员，约占 1/2。其中或有虚报之处，但可以断定，总算不少。第三、利用伪军伪组织升官发财的心理，用高官厚禄拉拢他们，国民党到处下委任状。第四、利用伪军掩护顽固政权，四县联合办事处，国民党训练班等，都隐蔽在内，并利用这些组织来收集我们

根据地的材料。第五、特别利用过去被我打击过的豪绅、掌握伪政权。

B、敌顽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由于敌要更进一步的使其伪化，但顽军要保持其独立性，加以国民党正式对日宣战，国际形势的影响，使顽固军感觉投降没有出路，就使得敌顽的矛盾更深。敌人并不放弃打击顽军，如对邵洪基几次袭击，因此顽军内部在逐步的分化着。如果我们能好好地争取，则我们同顽关系，可能好转。否则仍会有一部分顽军叛变投敌。

C、顽军在军事上改变了深沟堡垒政策，原因是顽军力量削弱，使他失掉坚守一地足够力量，历来三分抗日、七分反共的军事堡垒政策的失败教训了他们，不但没有达到反共的任务，也没有抵抗了日寇的进攻，而且增加了群众的负担，惹起民众的反对，因此也采取了游击活动。

(四)在敌人严重的进攻下，给予我们的损失和困难。

①边区根据地基本上是缩小了。战争频繁，特别是我失去的地方如昆山、卫河、阳谷等地，都是工作上较有基础，物产丰富的地方，使我物质上困难增加，影响了中心区的建设、部队的休整、物质的供给。

②地区分割，单独坚持地区的工作更加困难。单独局面比过去更加发展，把整个边区分成了五块。如一、四分区，三分区，五、六分区，钜南及中心区。分割局面已不是点线而成了面封锁。如四分区到军区要通过七、八十里的封锁线，三分区到中心区有40多里的封锁地区，沙区到军区有30多里的封锁区，这种分割增加军区与分区密切联系的困难，容易遭到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③由于根据地分割，某些地区变质，根据地游击性增大。另一方面，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敌伪工作开展，把某些地区收复了和发展了，成为新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因此就产生了各个不同地区的性质(根据地，敌占区，游击区，接敌占区，我占优势的敌区，敌占优势

的敌占区,还有地区处在敌人第一阶段蚕食的,第二阶段的和第三阶段的等等),增加对敌斗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4)敌、伪、顽对群众无限制敲榨、勒索,群众遭受很大的摧残。又加上连年天灾(如三分区三年未收成好,沙区也是如此),群众经济上极大的贫困,逃荒壮丁出口现象,已极严重。另一方面,过去建设根据地工作,没有抓住发动群众的环节,尚未把群众组织起来。因此一方面群众生活下降,对战争的供给受很大的影响,甚至有些地方不但群众不能负担,反而需要我们救济。另一方面群众没有动员起来,使我们军队处于孤立作战,没有发挥群众力量,展开对敌全面斗争。

(5)敌人据点碉堡、公路的密度加大。在我军今天的技术条件下,尚不能打破敌人囚笼政策情况之下,我们对敌作战方面感到很大困难,尤其歼灭敌人更加困难,而我军则随时随地有遭受敌人合击危险。战斗将更加频繁,伤亡将更大,而补充更加困难。

(贰)工作方针的确定:

在敌人对边区严重进攻的形势下面,加上去年我秋季对政治攻势结束后,没有能从政治上巩固秋季战役胜利,因此遭受到敌人去年秋季与冬季的向我进攻扫荡。齐子修西进,高树勋北进(占领东北庄)。当时边区的形势是极度混乱,敌进我退现象异常严重。同时我们在主观上,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和某些带有原则性的错误——我们在观念上没有重视军区工作;军分区存在着单纯的基干团主义,放弃了县区武装的掌握,地方武装的进犯政策,溃散投敌相当严重。在3个月中,就有4500人,包括43个单位溃散,损失枪支在2200支以上。发展地方武装中,存在着土匪路线,没有发动起基本群众,收拢游民分子,对民兵工作更是忽视的。在正规军方面,则表现在观念上存在着客军观念、正规军主义,根据地观念的削弱,因而也就没有积极的去参加地方武装建设工作。在战术上存在着死打硬拼现象,以致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共损失七个连)。集中正

规军打大仗,没有把军事斗争与其它斗争结合起来。根据以上这些严重的事实,并遵照去年9月11日扫荡晋察冀以后,北局军分会对于反对敌人扫荡指示,11月7日军委关于根据地军事建设指示,以及敌人扫荡鲁南后12月师部关于扫荡与加强军区工作建设的指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央12月的指示重要决定,我们确定1942年军区工作方针:

(一)强调军区建设工作:

(1)转变对军区工作的认识,强调军区工作建设,是根据地武装建设主要问题,反对轻视军区工作,彻底纠正把军区看成是正规军支差援兵的附属观念,反对军分区的单纯基干团主义,彻底纠正扩兵中的土匪路线。

(2)统一军区编制,健全军区各级部门的组织,加强分区级的领导,培养地方干部。

(3)加强县区武装的整理,培养区基干武装,建立基干团,整理县区武装,提出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治工作,清洗坏分子,统一编制,统一供给,利用时间,进行必要的军政教育,建立初步工作制度,纠正违犯政策,破坏纪律的严重现象。

(4)强调民兵建设,利用旧式武器,反对钢枪主义。

(二)正规军方面:

(1)缩小编制,减少机关,充实连队,改变小团制。

(2)确立各旅坚持斗争区域(三旅二分区,南支三分区,七旅七分区),正规军分散活动,成立游击支队。

(3)反对死打硬仗的单纯的军事观点,确定运动战减少,主要采取游击战术。

(4)利用时间,集结适当兵力休整。

(5)强调正规军爱护根据地,帮助地方军带领民兵,纠正客军观念。

(6)强调对敌伪调查研究工作,加强侦察工作。

(叁)一年来工作检讨:

(一)收获方面

(1)关于军区本身工作的建设,自去年12月底召开了军区高干会以后,强调了军区工作建设之重要,在对军区认识上,有了基本的转变,纠正了某些干部过去不愿做军区工作的观点。深入地认识了土匪路线对地方武装建设的遗害,各级党对地方武装也更加注意了。克服了军分区单纯基干团主义,提高了地方武装对军区的认识,军分区在群众中建立了威信。其次统一军区编制,健全了组织,加强了军分区级的领导,自山谷高干会议之后,全军区番号统一,确定了各级武装,而注意全面工作的领导,培养了地方基干武装(四分区基干团约1000人,顶少的也有300人)。在军分区级领导也被加强了,统计从正规军派到军分区去的干部有:军分区级干部25个(从地方上只提拔3个),团级的9个,营级的39个,连级的51个,排级的28个,另外抗大培养3808个军政地方干部,60个供给干部,51个卫生干部,48个敌工干部。其次各分区在司政供卫机关方面,基本已经建立起来了。

(2)在地方武装的建设上,首先是停止了吞并地方武装的毛病,不但军区对分区停止了吞并现象,即分区对县区的吞并也停止了。进一步密切了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的关系,粉碎了敌人和顽固分子的造谣,个别地区随便下委,乱搞武装的现象也得到纠正。对外围军已加以整理。在整理地方武装方面,采取了普遍地短期训练。计分为两个时期,最初集中整训,如二、三、五、七分区,都集中一千以上,这样便于进行教育,情绪容易提高,对分区的认识也容易提高,坏处则容易给敌人以进攻的空隙。另外一个办法,是采取分散整训,分县分区的整训,经过这次整训以后,主要收获是:A、建立党的组织,加强了干部,从没有党的组织到有党的组织,去年区县武装60%没有党的组织,而今天有支部的单位则有191个,临时支部17个,没有支部只有小组的共34个,没有支部小组,而有个

别党员的是 52 个,没有党员的 28 个,党与非党的比例 25.2%,军分区直属队及基干团,占党员中比数 40%,区县中党员则很少。干部党员较多。这里我们对根本没有党的组织的部队,建设党的办法主要是这样:首先调查对象,选择青年成份好的,召集上课进行特殊政治教育及党的教育,抽调干部受训,在受训中发展,动员地方党参加地方军,调遣党的干部到地方武装中去。介绍入党手续要严格,经过批准举行入党仪式。至于培养党员去作工作,要把新党员召集来参观老党员的支部会、小组会,并且要注意新党员、支委、小组长的训练,开办训练班,专门训练如何去作党的工作。B、淘汰和洗清了一些坏分子,改造了一批干部。至于发现坏分子的办法,必须在当地群众中去考查,从战士中去考查很不容易。要经过地方党,群众团体、地方机关,在地方武装中适当地提出口号,发动其内部斗争。对坏分子不要轻易处理。处理要公开地进行战士中的教育,使战士认识坏分子的政治面目,经过相当的准备工作,发动战士中的斗争,对不能处决的坏分子也要揭发他的错误,采取长期的感化。C、调剂了地方武装干部的质量。逐渐派入一批经过锻炼的干部进去,不过在派入干部时,最好先经过巡视工作,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建立起威信来,临走时发动进步分子挽留。派干部进去,尚不如培养其中的进步分子,连排干部以地方干部较好,只要他政治面貌纯洁,政治条件好,军事条件是次要的,把他调出来受训,训练的时间不可过长,应以政治训练为主,军事次之。D、地方武装战斗力提高了一步,以一年来战果来看,地方武装超过了正规军(见后面战斗统计),战斗指挥上过去只能指挥直属队、基本武装,现在能指挥到区。如一、四分区都能做到集中一两千多人,并进行了很多次远距离的奔袭。主动作战比过去增多了,创造围困据点的新办法,去年区武装还有些初步纠正。供给制度上也能作到分区来报销。能够上些军政课,区队能够到区汇报,并能够执行上级指定的一些任务。在训练地方武装中得到了以下的经验:A、从领

导干部与机关打破了认为整训就垮台,分散整训困难的观念。B、事先须有充分的动员与解释工作,只依靠下层工作,一般动员还不够,必须军分区干部直接下去说明,而且要注意言行的一致,以取得战士对分区领导的相信。C、事先要有充分的准备工作,如给养、操场、课堂,方式贵于活泼不要太严肃了。D、清洗坏分子,一般不要在整训时间来进行,主要是表现,训练回去以后再处理。E、整训中最好给他们一些补充,这样对建立上下级关系,提高上级威信上是有好处的。F、必须把一部分好的武装(或由正规军派去的)放在里边做骨干,给他们做模范。推动与影响他们,并借以密切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整训完毕时,必须举行一个庄严的仪式。整训期间要多采取竞赛方式,并发扬文化娱乐工作。G、要有专人负责,一般地要组织司令部或整训委员,分散整训时可组织巡视团来帮助工作。

数 目 类 别	县		二 分 区					三 分 区					六分区	七分区			八分区				
	范 县	鄄 城	郓 北	巨 野	濮 荷	合 计	冠 县	堂 邑	朝 北	观 城	莘 县	合 计		合 计	曹 县	荷 泽	合 计	张 秋	昆 山	寿 张	合 计
联 防 村	4	2	2	1	2	11						12		7	4	2	6	5	4	5	14
青 抗 先 模 范 班	120	81	40	50	110	401						198		138	150	95	245	119	70	148	237
自 卫 队																					
联 防 队 员																					
灰 色 武 装																					
灰 色 武 装																					
													会团 11 个,个别 关系 5 个	新的会 团 31 村 550 人				伪自卫 团共 120 村昆山伪团 100 村			

(3)在民兵武装上首先表现在自上而下,从观点上有了基本变化,克服了对这一工作无信心的毛病,开始重视了实际、艰苦工作。同时在执行工作方式上有了重点,开始注意了研究群众心理,纠正过去强迫命令,家长式的工作。一年来有着不少的成绩:A、部分的发展了人民武装,尤其是联防组织,全边区由 19. 3581 万人,发展到 22. 2153 万人,新发展了工人自卫队 53 人,妇女自卫队由 285 人发展成 446 人,青抗先由 3998 人发展到 6792 人,模范班由 4696 人发展到 5841 人(一、四分区下半年未统计在内),抗日联防由没有组织的地方建立了组织,由很小的组织扩大了组织,全边区一年来新建立的联防组织共计 49 个,包括 1445 个联防村,新建立发展起来的县联防组织有 8 个,包括有 28 个联防区,842 个联防村。B、人民武装的战斗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由单纯的防匪部分走向抗日保家,这表现在全年来民兵共单独作战 473 次,配合作战 391 次;毙伤日军官兵 49 名,伪顽 789 名,俘伪匪顽官兵 29 名,缴获了步枪马枪 405 支,冲锋枪 17 支,短枪 11 支,轻机枪 1 挺,迫击炮 1 门,步马弹 3396 发,迫击炮弹 9 发,炸弹 685 个,马 38 匹,自行车 13 辆,破坏公路 98 次,共 524 里,平封锁沟 61 次共 40 里,平毁碉堡 12 个,收电线 1. 020 万斤,电杆 1343 根。在平时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方面也比过去普遍和认真了。据不完全统计:一年查捕敌探奸细 38 名,嫌疑犯 32 名,毒品犯 15 名,敌伪顽逃兵 35 名,本军逃兵 9 名。查获驳壳枪 5 支,步马枪 8 支,炸弹 36 个,子弹 1714 发,步马枪 8 支,另外从以下几个事实也可以看出人民武装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如泰西长阿边联防同敌人百余激战了一夜,6 月间敌人扫荡泰西,民兵联防于桑海子与敌伪各百余进行了 6 时战斗,将敌人击退了。六分区高陵民兵的围困孙步月,东常节群众自发地把敌人据点拔掉,缴获了轻枪。四分区张秋之神枪手拔掉一个据点。二分区郛北联防,在 9 月 27 日扫荡中心区时与敌伪 500 余进行了战斗,坚持联防阵地。也正因为有着以上的收获,在广大人民

中间树立了人民武装的威信,纠正了过去群众对自己武装不正确的认识,有力配合了主力军,地方武装坚持了根据地的斗争,掩护了政权群众团体,开展了工作。C、巩固了人民武装的组织,并且部分的改造了旧的组织形式。这表现在训练成绩上,全边区县区级人民武装干部训练了四次,共 102 人,村级干部训练了 32 次共 1004 人,民兵自卫队训练了 90 次,共 7573 人。其次在清洗民兵成份上,淘汰了联防中一批坏分子。D、大量采用了旧式武器(附一年来武器增减统计),部分克服了民兵中浓厚的钢枪主义,并从旧式武器基础上还发明了一些新东西。如各地区人民武装本身能建立自己的小型兵工厂,各地区均有组织起不少的土炮队,四分区还研究出土造的掷弹筒。E、动员的一部分民兵,参加军队及地方武装。一年来计有 287 人参加军队,2058 人过渡到地方武装。

数 目 时 间	旧 武 器						现 代 武 器						合 计
	刀矛	土炮	抬枪	一响枪	鸟枪	火药	步马枪	短枪	子弹	手榴弹	炸弹	地雷	
1941 年底	41851	1414	190	49		531 斤	1485		2197	20	9875	8 个	
1942 年底	27154	2654	398		1235	856 斤	2155	331	2069	267	4610		

附记:其中一、四分区下半年的数字未统计在内。

我们在人民武装的组织形式上采用了青抗先、模范班、游击小组、自卫队(包括妇女自卫队、工人自卫队)及抗日联防等。在组织方式上,过去多是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起后才去组织我们的工作。有的是从灰色武装改造而来的(包括旧式封建组织及伪组织),有的是通过群众团体组织起来的。如青抗先,起初是发动参加救国会而号召组织成的,有的是政府强迫命令式组织成的(不过这种方式今年很少见了),但这些发起均包括了不巩固的成份。自下半年民主民生斗争展开了,部分解决了基本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对联防领导成份的改造逐渐有了注意。农村中反贪污、反资敌、反奸细

斗争开展之后,在人民武装方面,尤其是抗日联防,才有了一个比较稳固的基础。

(4)正规军由于一年来任务频繁,多处于分散活动下,对于整训上更增加困难。但在派遣游击支队工作上,是有着它不少成绩与收获。表现在:A、打击了敌人进攻气焰,如在昆山地区,正月十二日扫荡后,按了很多据点,敌伪非常疯狂,自明确八团坚持昆山的任务后,打开了东平湖以西的局面,稳定了社会治安。钜南地区也同样的,自确定七旅一个团坚持那块地区,才稳定下来。顽军高树勋南去后,濮南地区空出,敌人利用匪、会、顽、残余向东猛进,自九团进入该地区后,始镇压了敌人的疯狂,从军事上政治上不断地打击了敌人的进攻。郓北同样在侯集伪军及郓城敌特务积极进攻下,局面曾一度相当恶劣,由于三旅派去郓北游支以后,基本上没有大的活动。南清观自“四·二”扫荡后也同样混乱一时,南支派去游支后,也逐渐稳定下来。B、以自己小的伤亡,消耗杀伤了大量敌人。正规军方面,武器弹药除去一年消耗的弥补之外,还增加了18.6%,地方军增加了49%。在人员方面,除把一年弥补以外,还增加10%。军分区增加了18.4%。年减员数目跟去年比较,正规军减少71.6%,地方军33.5%(附表解)。对掩护地方党及政权工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如郓北、沙区、钜南、南华等地的工作展开等。并且,自从游支派遣之后,使正规军与地方军、地方党、政权的关系上更加密切起来,如四月扫荡高树勋,七团一连带两个独立营活动,活动一天一夜,使独立营安全出来,博得极好印象。D、培养了小部队和连队干部单独活动能力,创造了小部队活动的经验。(正规军的连队普遍的活动1至2次)。

以各部队派遣之外出游击支队的收获与成绩来测量,以派到沙区的南支游支为最好。它的经验有几个:A、游支的组织基本上以原来连队为基础,再由政治部派一些干部(敌工、民运、宣传员等),设有支队长,政治委员,政治办公室,军事上有便衣班(由旅出

两个,另有连队抽调)。另外多设一个供给员。B、游支派出时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动员,由旅的干部亲自教育,明确规定外出任务,把沙区作一个简单介绍,说明主要斗争对象,强调与地方党、政权配合,并着重提出外出游支单独活动,应注意政策与纪律等问题。不仅如此,到沙区后,由县委召集党政军民各负责人员会议,介绍游支任务,不仅是军事斗争,而且有许多任务以转变地方上对游支单纯军事观点,打破了单纯依靠游支打仗的认识。C、带有相当长期性、地方性,这样才能完成他的任务,沙区游支自进入该区后始终未调换,在活动的八个半月,进行了四十一次战斗,攻克了五个据点,缴获了轻机一挺,步枪 103 支,子弹 984 发,手榴弹 24 个,俘虏 83 名,打死敌 93 名,伤敌 219 名,打死中、小队长 8 名,缴马 9 匹,自行车 4 辆,被子 40 床,恢复 40 多村庄。游支扩大 77 名(洗刷 24 个,逃亡 11 个),巩固住 42 个,帮助了地方工作及民兵的教育与作战,计进攻 4 次,防御 11 次,还击 4 次,帮助民兵出操 87 次,军事 57 次,政治课 96 次,打野外 5 次,教会民兵歌子 7 个,召集民兵开会 4 次,参加民兵开会 8 次,助农 15 次,开群众大会 18 次,士绅会 10 次,登记伪家属座谈会 12 次,村干会 9 次(这仅是游支两个半月的统计数字)。他们之所以能在军事上不断的获得胜利,是由于:A、有着周密地侦察工作,依靠了地方党、政权,民兵亲属,这样侦察消息确实。B、小部队作战头一仗要打好,打要很慎重,不要死打硬拼,这样对我军内部及群众中影响是极大的。C、在敌伪据点附近的小碉堡,主要用民兵围困(不过,这要看对象使用之)。

至于他们训练民兵的办法,则采用了派人去,一律穿便衣,要有分区或政权的正式介绍信。帮助作战时,不要把民兵放在前面,不要让他受损失。在战场上要派人去指挥,教他们打仗的办法。退出战斗时,让他们先退。战斗后召集他们开检讨会。每次作战都要把胜利品给他们一些。经过这么几次和民兵发生关系,逐渐弄好,就逐步把我们部队抽出,不要一下把部队撤走以培养他不依靠主

力,单独作战能力。在教育上同样要采取诱导和示范方式去进行,或讲故事的方式,不要强迫命令。D、在对敌斗争,争取伪军工作上,他们首先确定了主要斗争对象和争取对象,适时的提出政治口号,具体而恰切、生动有力,事前有精细、深刻的调查研究,弄清原委后再逐步去进行。如对伪军孙步月的斗争,共争取223个伪军回家,投诚我军的四个,建立了两个伪军关系。抓紧了伪军改编时大量的展开了瓦解分化伪军的工作。在这方面他们有这样几个经验:其一、是深入了解孙步月内部情形,适当的提出了以下生动口号:如“伪军升官要升到太平洋去,五百块钱不卖命”。知道孙步月部××被我打死了或负了重伤,便喊××死了、伤了,你们还干什么?如果某某买了地,发了财,即喊某某买地发财了。这种喊话,是通俗而具体。经过亲戚朋友老百姓关系写信,特别是对孙步月最坏的几部分,经过军事上打击之后,使其再不敢跟我们碰,动摇起来。如孙部以防匪保家为口号,欺骗群众组织起来,现在压榨、征丁、长期为匪作乱,游支抓住这点,即提孙步月是破家、祸家、不是保家,已成了土匪,还说什么防匪?另外,抓紧我春耕时贷款,改善民生大大宣传,以扩大我抗日政权爱护群众利益影响,打破了孙对群众之欺骗。其二、游支对当地党政军民关系上是非常密切的。从游支刚进入该地区后,即把游支任务对党政军民各方面讲清楚,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在地方党委员会上,关于帮助游支工作及游支对当地关系,作出了决定,并把这一决定在游支及党内作了传达,打破了群众单纯要求游支打仗的观点。游支本身没有作计划,一切计划都是和地方党统一起来,他们没有单独进行扩军工作,没有单独要过给养,安置伤兵也经过军分区。他们参加地方会议,正确提出自己的意见。因此,未曾落任何埋怨。相对的群众是极度爱护和欢迎他们的。群众自动慰劳四十次,写过三十几次慰问信,老百姓帮助游击筹粮,作战时老太太烧香祷告,曾有一个班长负伤时,好多老百姓哭。群众自动捐钱,给游支每个战士买个大草帽。当地士绅组织与

发起扩军委员会,补充游支兵员。E、为了保证外出任务的完成,游支本身工作特别强调了党的领导,提出了党管干部,个人要服从党,在长期脱离上级活动的条件下,保持党内经常解决问题,干部中间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在这样长的时间没有一个党员逃亡。其次,强调干部模范作用,防止干部在单独活动中可能发生的偏向。再次,对连队组织制度上,根据实际情形减缩了一下。把不必要的会议取消了。政工在最初没有注意区队工作,以致连队工作与外边工作上脱节,以后政工室把连队工作担任起来了,使连队工作与地方工作取得更好的配合。再次,支部工作中特别强调支委小组长的单独活动,表现在每次战斗中能自动提出战斗动员口号,并且能掌握部队情绪的高涨。

(5)在部队整军工作上,因部队分散,战斗任务频繁,增加了困难,并且存在不少缺点,但也有相当的成绩,表现如下:

一年来战斗统计与去年的比较(见统计表)

以上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战斗伤亡比去年减少了 1/2,缴获比去年大一倍还多。其中以四分区战绩特别好,作战 163 次,克服 29 个据点,俘日军两个,缴步枪 1142 支,短枪 75 支,掷弹筒一个,讯号枪一支,刺刀 22 把。这说明直接受军委指示之后,改变了大兵团作战的方针。(改变了运动战,采取了避强打弱进行分散活动积小胜为大胜)部队刺杀、射击之进步,干部指挥能力向上。整训的结果,战术上的进步表现在主动地、机动地打击敌人比去年增加了(见附表)。

1941年至1942年战斗统计表

数 别		1941年		1942年		合 计
		野战军	地方军	野战军	地方军	
战斗次数		335	1387	467	1169	1636
攻克据点		48	17	47	77	124
死伤	日军官兵	24151 ^①	1139	1230	417	1647
	伪叛官兵	5587	3199	2361	3403	5764
俘虏	日军官兵	4	13	7	3	10
	伪叛官兵	5587	3199	2361	3403	5764
缴 获	步马枪	2764	879	2492	3013	5505
	短 枪	199	68	125	183	308
	机 枪	24	12	16	8	24
	掷弹筒	3	1	8	2	10
	迫击炮	2		1	2	3
	步枪弹	84997	19101	58426	64847	12373
	短枪弹	1172	51	610	1236	1846
	炸 弹	2946	678	1914	3687	5601
	马 匹	190	46	176	177	353
	自行车	248	177	180	309	489
破 击	电 线	4885(斤)	52524斤	7143斤	12348斤	19491斤
	公 路	214(公里)	509里	150里	524里	674里
我 伤	干 部	330	94	191+(46)+98		335
	战 士	1771	469	575+(81)+56		152
死 亡	干 部	144	70	63+(33)+56		152
	战 士	783	370	239+(53)+233		525

①编者说明：此处统计可能有误。

数 别		时 间		1941 年		1942 年		合 计
		数 目		野战军	地方军	野战军	地方军	
失踪	干 部			28	7	2+(267)+61		330
	战 士			556	121	39+(606)+1027		1672
被俘	干 部			1	3	(41)+31		72
	战 士			5	46	65+(75)+213		353
共 计 伤 亡				3034	1003	1364+(1202)+2296		
我 损 失	步 马 枪			785	1325	157+(1082)+879		
	短 枪			77	37	15	73	
	机 枪			13	4	2+(5)+5		
	(长)子弹			32850	10448	7696+(215193)+12382		
	炸 弹			1010	151	506+(1129)+1509		
	子弹(短枪)			588	66	81	92	
	马 匹			8	20	15+(49)+17		
消 耗	步机枪弹			410976	211169	150672	141351	
	短枪弹			4927	1141	1089	1098	
	炸 弹			22963	4903	8511	8564	
几 个 比 较 数 字	敌我伤亡对比			2.66:1	4.32:1	51.91:1	2.95:1	
	几个子弹 杀一个敌 人	子弹		51.76	48.92	21.43	21.02	
		炸弹		2.85	1.13	1.2	1.26	
	我军伤亡 比较	干		15.62%	16.35%	18.76%(32-18%)10.71%		
战			84.38%	83.65%	18.23%(67.8%)89.29%			

说明,1. 在1942年,我军损失统计中括弧内数字,系在9月27日反扫荡时的损失,野战军地方军都在内。

1942年战斗性质统计表

数 目 类 别	野战军	地方军
进攻(袭击在内)战斗	311	644
伏击战斗	71	147
遭遇战斗	39	106
防御战斗	58	88
不详战斗		184
合 计	479(1月1日至12月1日)	1169(1月1日至12月15日)

附记：1. 野战军全边区以9个团计算平均每个团6天半作战1次。2. 地方军全边区以48个基干大队为单位计算，每1个基干大队平均约 $14\frac{1}{3}$ 天打1次仗。

改变了死打硬拼的战术。我伤亡消耗上，也较过去少了，杀伤敌人比去年增多，注意了节省子弹，利用地形地物有进步。进攻敌人攻坚战术上主要是采取奔袭，坑道作业、火攻、伪军内应、伪装奇袭等。其次，侦察情报工作较过去有进步，攻势中各部队能了解敌人情况，多次扫荡都能预先发觉敌人局部计划，我们能够及时得到。如换防计划、五次治强运动计划。对敌战术研究比过去注意了，军区开了两次军事讨论会，各旅、分区亦有部分的研究。

(二)我们存在的严重缺点：

1. 对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政策认识差，执行的异常不够。表现在自上而下还没有了解到它的积极意义，因此，在认识上把它看成是消极的。在几次精简过程中，有的干部要求请假休养，脱离工作去学习，或认为精兵简政干部就要失业等倾向都发生了。在精简组织工作上，也做得很简单，只是简单研究编制表，没有估计更严

重的情况到来。保持维持现状的观点。因此,情况一变,我们的组织机构又不适合环境要求。所以,今年进行三次精兵,给工作带来很大损失。其次,没有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现状来确定组织问题,如每个编制表的确定时,没有研究各部门最低限度需要多少干部,人员马匹也没按工作上需要,特别对下层干部情形的了解不够,所以,编制表下去后,处处要求派干部,干部屯积在机关上造成头大脚轻的严重现象。从以上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对比来看,军直平均 2.5 人一支长枪,三旅 1.8 人,七旅 1.7 人,南支 1.9 人,二分区 2.7 人,三分区 2.3 人,四分区 1.6 人,五分区 2.1 人,六分区 2.1 人,七分区 1.8 人,全边区战斗与非战斗比例是:1.95。干部质量越往下越差。其次,对每次编余的老弱残废人员及退伍回家者,干什么的也有,如叛变投敌、被俘、当土匪、流氓、乞食等,五行生产全有,给根据地敌占区人民以很不好的印象,并给予敌人造谣口实。

2. 在军事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在 1942 年上半年,研究边区形势,打击敌人弱点是不够的。正规军分散之初,多少有些平均分散,分兵把守的现象,没有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弱点。如“四·三”扫荡南、潜、观,“九·二七”扫荡昆山、张秋地区,敌人很快就占领。没有采取有中心、有重点的对敌军事斗争,失掉了主动的突击的打击敌人的一面。其次,表现在对敌斗争还是正面抵抗,一般没有掌握敌人顾此失彼、前实后虚的特点,深入敌人侧翼后方有效的破坏是不够的。我们某些部队尚有不敢到敌后去的心理,各分区间的配合策应也不够,敌人利用过去遭我打击之反共分子齐子修、文大可、杨发贤向我们进攻,危害最大。我们一直从政治上瓦解、争取,还是不够,坐视他们发展。敌人并未花很大代价就占领我们大块地区。再次,在屡次政治攻势中,拔去了据点,但不从政治上去巩固,形成只注意拔据点的军事上的条件,并没有考虑到拔去据点,政治上的巩固。如三分区打桑庄镇,并未考虑到内线工作,结果没有拔下据点,反使内线工作破坏了。五分区打东庄,三旅汶上打了

庙等,都使伪军工作受到一些损失。有些是深入到深远的敌占区里,又不是配合粉碎敌人的扫荡,只是轻轻拔去一个据点,除了敌人对该地区更加注意之外别无收获。

3. 地方武装政治上还不巩固。表现在:A、区县武装政治认识模糊,不但没有为党为革命为群众利益而牺牲的奋斗目标,就是对日寇的仇视民族观念也很差。如不少人因家庭生活困苦参加部队,兵痞、流氓占相当数目(七分区 30%)。若环境稍有变化,地方武装就要垮台(如八分区和一分区)。B、党的领导很薄弱,党员数量小。如七分区 2200 人只有 250 个党员,战士党员只有 20 个,只占 1%。在质量上也很差,发展党员不久,又没有进行教育训练,党的骨干作用更差了。政治委员、政治机关的威信不高,如七分区的司令部参谋,不知道政治委员政治机关是干什么的。县区武装那就不用说了。原因是没把政治工作 with 群众联系,少数政工人员自己破坏自己的威信,如贪污腐化,破坏政策。七分区基干大队教导员贪污数目不能弄清,逃走时还带走了六万元,大吃大喝、嫖女人。政治工作空喊,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又不跟战士打成一片。同时没很好进行政治委员政治机关教育。C、脱离群众现象是相当严重的。违犯政策破坏群众纪律,如架票、劫路、打骂村长等现象,群众中间有“老八路好,新八路不好”的说法。

4. 人民武装工作发展是不普遍的,也是极不巩固的。如 A、民兵武装中的政治工作尚未很好建立,甚至很多地区还没有进行一次工作。因此,经不住敌人进攻和破坏。如二分区鄆北,八分区的联防,在九·二七扫荡中就垮台了。三分区朝北、八、十区全部民兵 200 余垮台。堂邑九区 30 人、莘县四区 60 人、冠县五区 180 人垮台。八分区张秋县 5 个联防区 119 村、昆山 4 个联防区 70 个村子,寿张 2 个联防区 48 个村的联防变质与垮台。多半是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后缺乏我们的支持与掌握。B、我们掌握人民武装的领导与改造领导成分也是极其不够的。如一分区昆山以东地区,个别联防不

准我们派人进去工作。二分区在联防中的干部共 36 人,其成份:地主 15 人、中农 16 人、贫农只占 5 人、出身老兵痞有 12 人、会门有 4 人、流氓 2 人、学生 6 人、士绅 7 人、农民 5 人。联防委员会的委员 120 人中地主富农 49 人、中农 50 人、贫农 20 人、士绅 81 人、会门 8 人、国民党员 1 人、兵痞 9 人、学生 2 人、农民 11 人。这个数字说明:联防是掌握在地主富农、士绅上层份子手里(其它地区也有同样情形)。边区基本群众还没有广泛发动起来,这是在基本群众发动起来的地区,对于内部的阶级矛盾,进行适当的调合,也就是联防中的统战工作做的不够。C、没有抓紧已经起来的武装斗争,进一步发展群众民主民生的斗争,把保护群众利益的武装斗争与政治经济斗争相结合是不够的。政权未改造,党的组织没有基础甚至某些地区没有党员,群众只限于很单的而且是落后的军事斗争,不讲政策,枪杀俘虏,与非联防区作对。在战术上是违背民兵游击战术原则的,如集中使用,正面硬抵,死守村落,不问敌人兵力大小与敌死打硬拼,因此,往往某一斗争胜利是不能巩固的。D、严重的浪费人力物力,联防组织起来立即有一大批脱离生产的人出现,加重了村民的负担。有的联防不问群众忙闲强制训练,影响群众生产,平时大吃大喝,战时大量浪费了子弹。因此,联防区的群众生活不但不能改善,相反的加重了负担。

5. 游支弱点表现在:A、除少数游支(如南支沙区游支,三旅鄂北游支,四分区二支队等)一般地都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游支的派遣多半是为了应付情况而派出,事先没有充分的准备工作。因此,也就决定了游支除了军事上给敌一些打击外,对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训练民兵、帮助地方武装、打击敌人特务、开展敌伪工作,就做得很少,也正因为如此,便落得跟敌人进行单独的斗争,不能阻止敌人全面进攻。一旦游支离开该地区之后,就会立即被敌人所控制。B、没有相当固定游支地方性。一年来游支活动的经验,如无相当固定的游支活动地区,没有长期打算的观念,不会胜利的完成

给它的既定任务。各部队所派出的游支(除南支二支外)调换太多,使游支无法与当地群众建立密切关系,进行组织工作。同时这样也无法使游支主要负责人来掌握部队特点,积累经验。C、游支组织太简单,游支任务频繁,只依靠 1 个连队的组织是不够用的。有的连队干部很弱,单独活动的连队干部不会组织战斗,甚至单独指挥部队也不会,如判断情况下决心等。另外在游支组织上有的不妥善,如三旅鄂北游支有政委,派该区的特务队又有政委,又是直接受游支指挥的,政治工作又归旅政。因此,关于锄奸政策问题,鄂北游支政策一点不知,形成了重复组织,领导多头现象。D、没有很好总结游支经验,没有很好整理与发扬出去,游支本身存在的一些弱点,甚至一些错误没有及时纠正。

濮县五个月民主民生工作总结

(1943年2月2日)

刘 诤

第一部分：濮县环境特点及今后策略运用

一、工作初开始时的特点。由于叛军对濮县民众的压榨，党领导群众对叛军进行了斗争，叛军走后我开展了工作，在群众中有了很大信仰(除少数外)。其次在顽固分子则与叛军勾结鱼肉乡民，地主逃避了负担，从中渔利，广大群众忍受压榨，极为不满，我军到来即报着一种报复心理。今分析如下：

1、地主，叛军表面下降厉害(有的村降低到三分之一)，变化虽多，但质未变，原因：一是大部分与叛军勾结，想法逃避负担；二是直接间接的掌握村政权，通过政权去贪污、免负担；三是一部分下降了(在野的)。

2、富农，一般不但受叛军压榨，在野者亦受地主压迫(负担放在他身上)，所以反贪污除个别者外，一般都原参加。

3、中农，部分起了质的变化，表现很窘迫，有的降为贫农，有的生活极困难。这变化与地主变化有本质的不同，他们吃的很坏，并出卖劳动力。是质的变化，他吃亏最大。与叛军有联系者极稀罕。

4、贫农，生活苦，出卖劳动，得不能补失(报酬)。

5、游民分子，特别疯狂，叛军走后恐怖。

二、五个月来形势的变化及今后策略运用。

1、五个月来形势有了基本的变化。广大群众已经基本发动起来，初步组织了大量的群众(农会大量发展)，目前，阶级力量的转换已进到严重关头，好坏转折点，表现在：甲、进步力量，包括中农、

贫农、雇佃农与无产者，其特点，是拥护抗战，又拥护民主民生的，他们在思想上已初步有了阶级觉悟，在减租增佃中都感到剥削，明白了自己是一个阶级，落后意识亦有了转变，并很愿接近我们，赞成民主并已有初步组织，感到团结的必要，一些富农亦倾向我们。但进步力量虽在巩固发展，但有些地方表现了自流，仍是相当脆弱的，他们的观点还是放在经济上（这观点是浓厚的），有利即下（反贪污要求大，并罚），这需要我们去提高他到政治上来。进步力量组织脆弱，干部的新贵脱离群众，目前严重的存在着。

乙、中间势力，包括中小地主，较开明的大地主与富农。他们有的参加反贪污，这些人赞成抗日与民主，目前，由于基本群众初步树立优势，对顽固分子作了斗争，所以他们与顽固分子分化疏远了，部分对我们怀疑恐惧，（一部分赞成参加斗争）对我们的政策不了解，有的怕借粮，再加顽固分子的挑拨争取，便更恐慌，特别减租增佃中，反贪污中，初即碰到顽固的打击之，所以有很多开明的给我们上意见。

丙、顽固势力，包括当权的地主，其特点是要求抗战，但反对民主民生。在工作队初，他们采取了进步手段（如以抗属反宣传），增佃初仍进攻，到我们政治攻势后，即表现了消沉，在群众中相当孤立，有的自动退却，有的以退为进（待时机），有的积极拉势力，抓领导权，以合法斗争方式，近又实行卑鄙无耻的办法（如以寡妇找佃户退佃），有的抓住我们的弱点，造成我们的弱点，（给干部钱，叫干部认干儿）利用我们来达到反对我们，并利用流氓来反对我们。

丁、游民分子，是没正当职业的人，如叫花子、破头、破鞋、土匪……等，其政治特点是两面性（有钱即行，有的为顽利用，有的为我利用）。对我们要求照顾他，虽倾向我们，但仍不是真正从政治上依靠我们。有一部分是过去与叛勾结为地主利用的，在今天与顽固分子勾结反对我们，由于我们的策略亦分化了。

我过去党政军民是抓紧群众要求进行了策略的斗争，虽顽固

分子积极反对,今天进步力量是已初步组织(当然有的干部表现新贵),中间力量是倾向我们(仍有的对我怀疑),顽固力量今天又改变花样,拉势力(游民),游民分子仍未坚决依靠我们。根据这些情况,今天是双方正尖锐斗争着,今后是否能继续巩固壮大,或转好为坏,即是一个严重关头,转折点。

2、首先对进步势力估计有三个前途:一是进一步的发展与巩固,二是维持现状,停留在现有基础上;三是走向坏的道路,过去成绩不能保持。这需要我们继续不断的领导群众斗争,将群众从经济观点提高到政治觉悟上去(这就要求我们看远些),最后达到团结抗战的目的。我们本身必须纠正过去的包办代替,要帮助村干,提高其威信,尊重其意见,加强小组生活,教育村干做事要民主,以免上下分化,不能替群众当家,要真正造成群众运动,纠正四大包办(政权包办群干,群干包办村干,村干包办群众,)特别今天斗争尖锐时,我们应集中一切力量争取优势。

我们应力争第一个前途,必须纠正干部包办、新贵、单纯经济观点,(不从经济上说起,不能发动群众,不从政治上打垮敌人,不能保持斗争果实)。

政治收获大,不一定经济收获大,经济收获大,不一定政治收获大,经济要求数目大,群众可能有可惜心理,对争取中间亦不利,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

目前我们工作基础薄弱,表现在:一是干部运动,新干部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浓厚;二是村干包办,光杆作用;三是过分依靠政权。今后应真正发扬民主,大事大家商量。

3、争取中间势力是目前工作中心一环,因为对方正积极拉他们,他们基本上不赞成民生,对民主与抗日是赞成的。

甲、民生工作应强调抗战的意义,说明我之政策。

乙、抓紧其民主要求,转移对我仇视,经济上照顾他,要耐心的抓紧其矛盾,分化争取之。

丙、从武装对敌上来争取他。

丁、查黑地、借粮等工作，要注意对他的过分刺激。

戊、尊重其社会地位与威信，留面子，对开明者表扬之。

己、今后斗争强调斗理，输理的事不作。

庚、政权态度要转变，使他们感到有依靠，要有统战面貌。

辛、开展青年、妇女运动，团结其青年、妇女参加群众组织。

中间势力的三个前途：一是与顽反我；二是与顽分化和我一起走（要看进步势力的发展）；三是仍守中立观望。（拉了套，打了膀子的条件下）我们必须以事对事，别小题大作。

4、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运用，主要是揭发、分化、孤立，但别脱离抗战。

甲、斗争分寸问题。我们应高度警惕，要观察对方的本质（是真退却还是以退为进）。我们应揭发其阴谋（他恐慌是否真恐慌，还是从恐慌中想办法，应分析清）。但要注意斗争分寸，适当而止。要教育群众，对方的阴谋要揭发，使群众明白组织的必要，以免上当。但不要乱斗一气，别上对方的诡诈、计策、圈套，如×楼即是教训。

乙、强调斗理。

丙、强调揭发其错误，抓紧其弱点，从政治上打击之，揭发上坚决别让步，但要分轻重，分化利用其矛盾。

5、游民分子，亦是一部分力量，并是敌伪顽都要争取的一个力量，我们必须认清。

甲、改造掌握，利用其参加斗争，照顾其生活。

乙、分化教育顽固分子掌握下的游民分子，其中要×打击、揭发顽固分子对他的阴谋，说明跟他们走一定不好。

丙、改造办法是由不劳动到劳动，使他参加生产。

第二部分：民主民生工作

一、反贪污；

甲、对过去回顾：

工作队来以前：

- 1、参加群众的观点是报复；
- 2、对方顽强；
- 3、领导没经验，被动；
- 4、果实处理不当，基本没达到目的。

工作队来以后：

- 1、参加群众觉悟提高；
- 2、斗争对方以威胁办法，群众已明白；
- 3、领导较好，但干扰严重；
- 4、果实处理达到了目的，发动了基本群众，争取了中间，孤立了顽固。

乙、斗争过程与缺点

过程：了解情况，决定策略。

1、了解情况，正确估计：

A、对方多少，主次，成份，威望，社会关系，压迫事实，贪污事实等。

B、本身队伍，领导人的动机，是否坚决，今后愿望，可能变化，人数，成份，力量。

C、环境，附近党派活动，力量，后台等。

2、决定策略：

A、原则，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分化孤立顽固势力，打击主要分子与主谋者，应教育对象说出主谋者，广泛揭发后台阴谋。

B、准备阶段，别告诉中间势力，开始时再告诉他，争取他同情、帮助。

C、决定全盘步骤。

说明：1942年9月冀鲁豫区党委组织的政民工作队到濮县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民生斗争，至1943年1月，先后近5个月时间。2月初，濮县县委会在三区杨集召开全县活动分子大会，总结了工作队5个月的工作。以上就是刘谡同志在会上作的报告。

(张两辰记录整理)

对三种势力的认识及我们的态度^①

(1943年2月6日)

信锡华

对三种势力的认识及其互相关系。三种势力即进步势力、中间势力、顽固势力。为什么提出三种势力,因为濮县工作发展阶段必须从三种势力的范畴来认识问题,因为工作发展已超过了分阶级、阶层的阶段,不分三种势力来看就赶不上形势的需要。这是中央根据中国社会特点来认识中国革命力量,已不是新的,今天在濮县则是具体的运用。

一、进步势力特点及我们应采取的态度

1、其特点,在今天他不只要求抗日民主,而且赞成民生改善自己生活。其数量最大,他是历史进步的推动机。他受压迫,历史即倒退,他组织起来,历史即进步快,他未形成力量历史即进步慢。

2、进步力量包括:

雇农(农村无产阶级)

贫农(农村半无产阶级)

中农(农村小资产阶级)

其它:青年(有他的特点,地主青年因没占统治地位来剥削,只说是地主家庭出身,不能说是地主成分,因他有天真、热心、认识真理的特点,对社会甚至对其家庭都会不满)、妇女(几千年来没地

^① 在濮县活动分子大会上的讲话。

位、没权力、受压迫，虽生活在富农、地主家庭、是不拿她当人的。俗语说“富人怕死骡子，穷人怕死老婆子”是有道理的。只要你把她工作做好，即可成为进步势力。她要求自由呼吸与民主）。

知识分子，他不仅是进步势力范围内的，而且某些地方、条件下替无产阶级起先锋模范作用。中共发展即由城市知识分子到农村。

再次是对游民分子，我们应力争他为进步势力。其特点：甲、其政治纲领，是“有奶即是娘”，为各种人利用。乙、其行动纲领，是“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彼处不养爷，回家卖豆腐。”丙、其手段，是威胁、吓唬，说干是英雄，说不干即成狗熊。丁、其经济利益，是为自己奋斗的。我们必须好好争取提高他，争取一个、减少一份顽固力量或一支枪，这些人大部分是进步方面的。

3、我们对进步力量的原则是发展巩固。

甲、猛烈发展，但要重质，使他能自己干，明白干的合理，一步一步提高他。

乙、着手于他们的生活改善，发动他，给以民主、争取中间。由经济利益提高到政治利益。到农村正常的统一战线形式形成，即转到对敌斗争，（巩固力量，刀锋转向敌人）接敌区则先采武装抗日，后到民生。

目前濮县群众组织是不巩固的，只是经济观点上农会组织起来，未改造政权，同时农会本身不巩固（干运）。

二、中间势力的特点及我们的态度

1、其特点，首先中间势力是抗日民主的（这与进步势力一致），但他不赞成民生（这又与进步势力矛盾）。在民主方面与顽固势力矛盾，我们必须掌握矛盾争取之。其次他有动摇性，看谁的力量大，看谁能给他解决问题，即靠近谁。

2、中间势力包括：富农（农村资产阶级，增资他不赞成。）中、小

地主，开明士绅，在野地主，他们对减租，增佃不赞成，但赞成民主（他没权）。

若按阶级划分，富农是农民，但他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带封建性生产方式。地主、富农的动摇性，顽固大地主当权，他即同他一块剥削农民，我力量大，他即靠近我们，对此要分清。如：甲、我力量大他退却，如是从退却中抽空等待时机和我斗者，即是顽固势力；如是怕与我误会而退却者，即是中间势力。乙、我力量大他恐惧，如他是害怕了再生办法来与我斗者，即是顽固势力；如怕生误会（怕打他）而恐惧者，即是中间势力。丙、可能争取者，必须很艺术的争取之。只认为人家是假进步乱斗一气，是树立敌人“孤家寡人”的政策，必然“包脚布子围脖子，嗅一遭。”

3、我们对中间势力的态度，对中间势力争取团结应是诚恳的，不然想转换农村政治力量，巩固进步势力是不可能的。今天民主斗争即是“一箭双雕”的斗争。但要想争取中间首先巩固自己，这是原则问题。争取中间不是发展中间，不是将自己力量给他点，如这样，是阶级意识模糊的。

目前中间势力正与顽固势力分化，我们争取他，由分化到中立，由中立到同情，由同情到跟我走。目前必须解决他恐慌，怀疑心理与要求民主。

三、顽固势力特点与我们的态度

1、其特点，顽固抗日，但不赞成民主民生。在民主上与中间力量矛盾，在民生上则一致。他们原则上与投降派不同（投降派是投日反共，他是抗日反共）。对他的斗争，必须限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范围内，他抗日是事实，但本质的动摇性，他在抗战中是一面走、一面哭、一面骂，我们应争取他一样抗日。所以中央决议说：“好环境弄坏他，坏环境弄好他”，这是正确的。

2、顽固势力包括农村中当权者。

3、我们的态度，原则是揭发、分化、孤立。揭发他对群众压迫事实与错误，分化他本身团结。孤立打击最坏的，缩小其活动范围，但不是消灭。

(附注：)

在一村内算顽固势力(或中间势力)，就不一定在一区是顽固势力(或中间势力)，这就要看他出身、成份、经济基础、地位、历史、群众影响及其一番事业，是否有力量，是否能代表一部分人或多少，村、区、县、省、全国，他的范围即不同了。

(信锡华同志是政民工作队大队长，政民工作队于1942年9月到濮县、范县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民生斗争，至1943年1月共5个月时间，2月初濮县县委召开全县活动分子大会，总结五个月工作，信锡华同志在会上讲话，以上是他讲话的一部分)。

(张雨辰记录整理)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展开政治攻势 以反汪反孙宣传为中心的指示^①

(1943年3月27日)

区党委发出指示,号召目前全区开展以反汪反孙宣传为中心的
宣传攻势,附有不少重要的决定,我们必须彻底执行。

一、这一攻势由党委统一领导,各级宣教部门,敌工部门应负
经常督促检查之责,纠正那种把攻势认为只是一二部门工作的坏
观点。虽然目前重点仍放在分区一级,但必须作到逐渐把政治攻势
成为县级(即县大队)的经常任务。

二、过去几次政治攻势中,有的以军事为主,有的认为攻势只
是发发宣传品,这种不足的认识,应该纠正。并且在部队中进行教
育,作到每一个干部在自己岗位上进行攻势工作。

三、各分区武装工作队,应以此攻势精神及工作方式进行短期
训练。须注意在敌后区隐蔽方式的研究,强调实际,力求深入,避免
千篇一律,形式铺张的办法。

四、必须认真的改进政治攻势中的发行工作,要把宣传品确实
送到敌占区里去,敌伪军伪组织手里去,反对那种漠不关心,乱发
乱贴的现象。

五、各分区要依照本地区的具体情形,另外编制传单小册子,
印刷注意清楚美观,标语口号要统一,团(县)以下不得自拟。

(原载 1943 年 3 月 27 日《战友报》第二期)

① 标题有所改动。

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发表边区我军全年战果

(1943年6月28日)

军区司令部,发表一年来(去年七七到今年五月底,边区我军战果)许多地方武装战斗未计、如次:

作战 2371 次,攻克据点 185 个,毙伤日军 2582 名,俘日军 37 名。毙伤伪军 11500 名,俘伪军 14003 名。

缴获长短枪 12129 支,轻机枪 62 挺,重机枪 1 挺,迫击炮 4 门。

各种子弹 359220 粒,炮弹 175 发,掷筒弹 554 发,炸弹 42052 个,掷弹筒 31 个。

战马 640 匹,自行车 719 辆,各种刀 421 把,电台 1 架,电话机 40 架,法币 46473 元,伪钞 13187 元。

破公路 344 次,共 542 里,平封锁沟 398 次,共 488 里,收电线 24288 斤。

我军负伤 2208 名(干部 671 名),阵亡 911 名(干部 318 名),失络 596,被俘 279。损失损坏长短枪 1712 支,轻机枪 29 挺。

(原载 1943 年 6 月 28 日《战友报》第十五期)

代论：纪念“七七”反对右倾情绪

(1943年7月5日)

崔田民

中国的抗战胜利坚持了六年了。经过这六年的艰苦斗争，我国朋友愈战愈多，国际地位大大的提高，全国团结也有进步，抗战力量日益巩固，斗争意志更加坚定，胜利的把握愈加明显了；另一方面，日寇的敌人越战愈多，国际地位越加孤立下降，尤其是最近盟国在远东力量加强，美国进占阿图岛，日寇全军覆没，使其内部矛盾加深，力量日益削弱，溃灭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也就是说，中国抗战快要胜利了。

抗战六年来，处在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不仅粉碎了敌人军事上的进攻，蚕食、清剿，及政治上的一切阴谋诡计，揭穿了顽固分子说我们游而不击的闲言。而重要的是团结了广大的民众，改善了民生，发扬了民主，创造了抗日根据地——是反攻阵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基础——有力的配合了全国抗战，坚定与提高了全国抗战的胜利信心，粉碎了顽固分子说我们是封建割据的谬论。

纪念“七七”六周年，将是同盟国家苏英美东西大军夹击希特勒的前夜，也将是法西斯轴心国家德意日面临崩溃的时候，我们要加强团结，克服困难，坚持斗争，配合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胜利前进。这是我们抗日军队，尤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应有的认识与精神。

但是，我们的个别干部，甚至部分同志，缺乏这种应有的认识和精神。对两大口号怀疑，对苏必胜，德必败，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的真理和事实不敢信任。因此，产生了严重的右倾情绪，事实表现在：

一、思想上的混乱。思想上的混乱，就是认识上的糊涂，就是阶级意识的模糊，也就是阶级立场不稳。首先说对两大口号怀疑的人，他把可能与现实看成一个东西，他不懂得可能与现实是有距离的，可能必须经过实践，才能成为现实。因此，他对一年打败希特勒，两年打败日本的口号，认为不需要斗争就会坐待指日而到的，英美的拖延政策，第二战场未能及时建立，致失良机，中国进步不够，民生不能得到应有的改善，民主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扬，这些问题他又看不到。这就是认识上的片面和糊涂，这就是思想上混乱的第一个表现。

其次是对苏必胜，德必败，中国必胜的真理和事实不很信任的人，除了认识上的片面糊涂以外，甚至变节，没有为真理奋斗到底的精神，这是思想上混乱的第二个表现。

再次如私人观念、部落观念、家乡观念等封建落后思想和个人享受、老婆第一、升官发财，不要群众等军阀土匪主义思想，在我们部队中是存在着的。同时，由于我们处在统一战线的环境，部队新成份（俘虏）的增加，阶级教育的削弱，正统思想的影响，在我们部队中也是有的。以上这些思想，都是非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认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党军，我们是要坚决的反对的。

二、右倾的表现由于思想上的混乱，思家厌战，对革命胜利怀疑，对自己前途悲观，具体表现是：

第一种是情绪低落不安心工作，如有个别干部甚至是部分同志感觉苦闷，消沉怠工，要求休养、住学或调换工作。（这不是说每个要求休养住学调换工作的就是右倾）甚至要求退伍、回家、装病不作工作，也有不出医院，不去住学，要在后方长期休养。此外某些人的贪污腐化，已相当严重。他们的特点是怕死、爱钱、老婆第一。怕死可以不要政治生命，贪污可由元到千到万，为了老婆可以不顾

工作,可以脱离革命,这就是个人利益超过了党的利益把自己看的过重了。

第二种是自由主义,不满意现状,不从组织上积极的提出意见,消极沉闷,放松工作,或到处不负责任的乱批评,小广播,却不知道这就是党性不强,因为这样会消损党的力量的。

第三种是违犯群众纪律和违犯政策,在某些部队中还是相当严重的,打骂群众的现象,仍不断发生,最严重的就是我们某些同志的根据地观念、群众观念还不强,甚至还是极坏的。认为根据地不如敌占区好,咒骂根据地群众落后,主张不受群众“委屈”(?)采取打击方针,或者把敌占区看成殖民地,去了就可以发洋财,乱搞一气,到今天还有杀俘虏,搜腰包的现象。和敌伪乱拉关系,敌我不分,认为伪军比顽军好。最笑话的,还有替孙良诚扣逃兵,帮他“巩固部队”!这些现象,是多么危险!因此,纪念“七七”要在部队中展开右倾的思想斗争,加强学习,每个党员、干部要从党的立场、从革命的立场虚心的彻底检讨自己,并领导全党全军,展开这一运动,彻底肃清这种思想混乱的现象。

(原载 1943 年 7 月 5 日《战友报》第十六期)

关于组织领导问题的报告

(1943年9月7日)

张霖之

(一)发展与巩固时期的组织领导问题,两种时期不同的特点及不同的组织与领导

A、发展时期:

甲、特点。

1、发展时期是没有组织或有而不大,现有组织不能适应目前需要,故其特点是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的进程。它的工作是建立组织。采取方式主要是从上而下,(因为下面没有东西)也就行政命令较多。各根据地均有此种情形。

2、我处劣势(全部或局部),有的虽上层有了优势,而下层我处劣势,或虽下层优势而上层劣势。正因劣势,群众的政治觉悟、政治经验低,根据地中群众没有经过斗争,觉悟仍很差。3、干部多外来或本地少数先进分子,有本地干部也不多,外来干部一般与地方联系较差,故发展较困难,而少数本地先进分子,在发展时期的作用也就特别大,(在巩固期间本地干部的作用相对减低)过去工作中也证明这一点。

乙、由于以上特点,决定了初期的组织工作在开始时不宜复杂(如太复杂,由于干部条件、群众条件是会搞不起来的),复杂一方面分散了我们的力量,同时也不易为群众所接受。过去这方面吃了一些亏,平均使用力量的结果就成了“狗熊掰棒子”。

由于以上特点,发展时期干部使用需要比较集中(突破一点),

因而我处劣势，干部分散结果即不能补救劣势的弱点。在领导上要有重点，不要复杂分散，工作要抓住中心（如搞群众工作首先是农会），乱抓一把，会使工作受到损失。地区上也应有重点，有阵地的前进，打开一点有了依靠，正是为全面的开展。我们如能掌握这些原则，工作就能得到胜利。

1、发展时期具体帮助一定多于原则领导（但不是完全没有）。这就是根据上面特点，在开辟区域多是一般的原则，从本地实际工作中得来的原则是较少的，甚至是没有的，把其它地区的原则往这地区来搬也是行不通的。因此，光满足于原则领导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把原则具体化到实际工作中，这不是一般干部所能做到的，因此，必须加强具体帮助。故在发展时期不能反对跑腿、反对具体帮助（这不是包办代替），领导机关本身也需要具体帮助，以充实自己，不如此是非失败不可的（如五地委对南华之原则领导）。

2、发展时期突击工作多于经常工作（但不是完全没有）。按部就班的进行工作比较困难，客观需要我们大，主观力量小，不用突击不能解决问题，主观力量与客观要求悬殊很大，打开局面不能不采取突击方式，精致细密是不可能的，不突击就与客观形势矛盾，但突击不是乱突一气，而是有重点的，不应强调经常工作。具体说来就是“集中力量打堡垒”的意义与作用，很快的将各种组织搞起来。“打堡垒”正是大量发展、普遍发展的一个步骤，“打堡垒”必须以优势的兵力。由于我们有上层优势，有着“打堡垒”的条件，能以上层优势补充下层劣势。堡垒打开后，可以锻炼干部，影响、开辟附近村庄，干部很快出来。封建势力的中心若打不垮，普遍大量的组织群众就很困难。如对堡垒抓不紧，似打非打就要失败。在对堡垒的使用上，我们创造了一批干部，应利用他们来开辟附近村庄的工作，因他们与群众有联系，熟习地方，开辟工作有很多好处。

3、使用积极分子。打开局面如何使多数干部敢干，积极分子有着决定作用，他们与群众有联系，可以减少群众的顾虑。这时群众

比较散漫，必须有核心组织才能领导起来。所以要把积极分子适当集中起来，形成强有力的核心来团结中间分子（把村干部组成一组有其作用）。

发展时期这些特点是逐渐在改变的，我们应掌握这个变化，不要定型，把发展全过程看成一点差别没有也是不对的。过去我们对这一点也是注意不够，不能随时改变我们的领导方法与观点，不是发展时无巩固就是巩固时无发展，发展时不为巩固作准备，将来就转不过弯子来。机械的搞农会，转入青、妇、合作社工作就困难，到了转变时不转变，机械的老一套是不对的。

B、巩固时期

甲、特点（提出巩固的根据）

1、我们有了相当组织基础，主要是从下而上的巩固组织发扬民主。

2、本地干部经过发展时期的斗争逐渐出现，培养了一批区干部甚至县的干部，他们在实际斗争中产生，对地方上有一定的联系，应特别注意对新干部的培养与提拔，提拔他们到领导机关来是有特殊意义的。从干部本身来说，我们的组织从简单到复杂，如不注意干部提拔，就不能把干部提高一步。

3、群众政治经验、组织要求日益提高，故发展时有组织形式与领导方式、方法，就逐渐与新形势发生矛盾。如过去抗联起了一定作用，但到今天抗联就不适合新形势，而成了一个阻碍了，阻碍了巩固工作，妨碍了工作的深入。

乙、由于以上特点，就决定我们的领导方式方法有一定的改善，充入新的领导方式与方法。

1、组织形式要从简单到复杂，由一把抓进入到科学分工。在领导上由量的发展到质的提高。情况复杂互相间的关系多，故要原则领导多于具体帮助，领导机关要适当集中，才能适当的研究问题，使组织由低级到高级，我们也有了条件进行原则领导。

2、由于下面有了基础，我主观力量与客观要求的矛盾减少，经常工作多，突击工作减少，也要建立部门工作，精致细密的组织工作增多，工作较麻烦，故以各种工作的互相分工来解决这一问题。

发展与巩固工作必须正确处理，它是对立又是统一的，单纯发展不能巩固，单纯巩固不能发展，故不能把巩固与发展机械对立。由于客观条件不同，时间空间不同，发展与巩固有主要与次要之别，应按具体条件来决定。一个区主要是巩固，但在某一个村主要是发展，千篇一律是不行的。发展和巩固是不能绝对化，发展时准备了巩固时的基础，就会顺利的走向巩固的阶段。

(二)目前组织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A、环境特点。自去年高干会后，我区工作的各方面起了很大变化，我们的组织工作必须与这些变化相适应。什么变化呢？

基本区一部或大部打开了局面，初步发动了群众，还有些正在发动，有的则没有发动起来。在已发动的地区，加强了党与群众的关系，群众的政治经验、组织要求也一天天提高，打下了我们组织大多数群众的基础及发展党的基础。经过我们这一段工作，党有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吸收了新的血液、好的成分，干部在斗争中受了很大锻炼，在阶级意识提高、群众观念加强上都收到了一些成绩，群众对我们有了认识。

但我们工作极不深入、不平衡。工作还很浮浅，工作还存在以下矛盾：甲、巩固与发展的矛盾，由于不平衡，某些地方已进入巩固，有些地方还是发展，既要巩固又要发展。乙、组织工作方针与客观形势的矛盾。有些地方必须加强上层领导才能深入组织工作，但客观形势要求我们精兵简政、人数减少，现在说起来我干部还是很少很不够的。丙、主观力量与客观环境不符合的矛盾。各种工作均在发展，各种组织要充实，干部缺乏不能应付客观要求，还有新的部门需要建立。

我们进行组织工作，必须顾及这些困难，在这些矛盾下组织工

作应解决的是组织形式问题,抗联形式必须加以改变,今后抗联不适合于今后的全面发展,如今后组织人民的大多数,必须成立青、妇的独立系统。由于抗联目前的重点是农会工作,青、妇工作上就要削弱,都管就都管不了,抗联就要形成第二党的倾向,并和民运部的工作混淆,因而抗联从上而下的分开,正在发展的地方,则主要是成立农会,其它不建立,抗联的存在只是配合的性质。合作社也要成立独立的系统,因以后的工作更加重要,甚至代替农会,今后团结农民、组织农民主要依靠合作社。武装部门过去归政府,因在我无基础下组织联防政府力量较大,今后条件不同了,武装部不成立,建立武委会(各级)才能适应今后发展。这样一来干部就要增多,不适合简政。故干部就备用兼职办法,总会委员兼分会工作,分会一级可较少,二人即可,这样往上提的干部较少。区党委一级建青委、妇委,以下不建立。各教会分别建立党团,经过党团建立群众团体之公开领导。

B、巩固组织问题

甲、目前我数量上有些发展,但质量上很差,有的村庄还没有党的组织,有的村虽有支部,但党的领导很差,今后建立党与整理党、加强党是很重要的。

乙、加强教育,过去把发展与巩固两个阶段有些机械(特别鲁西),故今天群众单纯经济观点相当厉害,群众的政治觉悟仍很差。

丙、巩固与发展不可分离,故现在已发动地区应开展青、妇工作与合作社,以认真组织群众的大多数。本村干部的独立工作能力应加强,外去干部的帮助要减少。过去绝对巩固农会主义是不对的,合作社工作之比重一天天增加,发展到合作社将逐渐代替农会工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农会工作将成为可有可无,故合作社工作要引起大家注意。

丁、我们的现有组织中民主作风很差,若巩固组织必须发扬民主作风,进行民主教育。主要是从上而下的巩固,在党内是选举支

委、小组长，在农会也应实行民选，有些地方可实行区选。

戊、加强新干部的教育，提拔并提高干部质量，“干部决定一切”的意义就在此。如干部本身不能提高，村组织的提高即困难，故应特别加强干部教育，抓紧青纱帐期间，大量开办干部训练班。调干部只望上看，望本处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往下看，把村干部提到区级，一级一级的往上提，不提拔干部就无法应付将来的局面。因此，配备干部要有中心（一个区一个中心干部），其它干部在其帮助与领导下来进步，打破新干部不如老干部、本地干部不如外来干部、农民干部不如知识分子干部的观点，尤其目前工作的需要，必须抽调干部，“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本位主义是吃不开的。

C、四级领导

甲、支部(村)

1、支部组织。支部以行政村为单位(特别在基本区,敌占区可略加变更),如行政村过大,党员过多,或有几个自然村,则可根据具体情况建立乡支部。因而行政村在工作上、斗争上是一个单位,如无统一领导,对政权、对群众团体均发生困难,其次也为了减少分区委的单位。它的毛病是,当几个自然村有单独的问题时,不一致问题时,领导上发生困难。因此,分支之权限应规定,一行政村中共同的事件应归支部,支部可给分支权力,单独处理本自然村的事,分区委领导上应深入分支,不要只在支部中打圈子。党员人数超过45人之行政村可建分支,自然村党员超过一小组可建立分支,分支不是一级,受支部之领导,行政村支部委员分别兼分支书,分支委兼小组长。行政村中有3个党员建立支部,支部和小组合一,以便发扬民主,防止支书包办。5人以上增付书记(付组长),发展到7人,可设立支书、组、宣。基本区内支委不超过7人,一般3至5人。

2、小组划分,一般五人为原则(三人亦可),便于开会。以住地远近为主要标准,照顾其工作。党员较多时,以其工作为标准,同时

照顾住地远近。如党员普遍时，尽量求得党的小组与公开组织之小组一致，（必须党员数量多）如党员不够，不应集中于一个组，这样布置工作、检查工作比较便利。村级党员干部在工作刚开展时，为加强积极分子的作用，可编为一个组，但不叫干部小组，各种组织逐渐健全，村干即要依各工作部门组织编组，小组实际起党团作用，这对工作布置与保证都较好些。

3、支委及小组长的产生。支委以民主方式产生，但要顾及将来环境，由各小组提出候选人，由分区委在候选人中圈定几个支委，再交小组去讨论通过并提出意见报告分区委，如有不同意，分区委还要另加改正。或由小组中提出候选人，分区委交到各小组去讨论，以其讨论结果看票数来圈定公布。选举中必须经过动员与教育。

4、支部的领导。

第一，首先建立几个制度。首要的是会议制度，这是领导的先决条件，发扬支部民主也应由会议开始，才能发挥支部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支委会，一般7至10天1次，工作忙时可开临时会。小组会，10天到15天1次，有事可召集临时会议。会议要有内容，如老一套就会使大家没有兴趣。会前有准备，会议就不致太长。再就是回报制度，用回报来补充会议的不足，党员5天由小组长回报1次，小组长7天向支委回报1次，以随时反映问题，节省时间。还有检查制度，支委把工作布置下去，支委应分别到小组检查，看布置是否正确，并分别到群众中去检查，争求意见，1月支部会检查1次，加以简单总结，把工作中的优缺点及时检查出来。

第二，其次明确支委会的分工。目前支部分工很差，多是一把抓。支书注意本村政治情况，掌握本村全面工作，负责召集支委会。支组督促检查开小组会，征党费，党员登记，执行党的纪律，注意本村党的秘密工作。支宣管理检查支部宣传工作，上党课，本村谣言的揭破与宣传，文件的保存。民运，本村群众组织工作等。

第三,支部领导一元化问题。目前支部还谈不到全面领导,领导上存在着两种偏向,一是几个干部包办全村的一切工作(或农会长、村长、队长,或当村的分区委),有的一个人包办,谈不到支部与会议。二是支部对政民不会领导,或根本不领导。在先建农会的村庄,往往发生农会包办,或是那个干部强,那个即包办一切,或把支部当成一个咨询机关,这样村中没有核心领导,工作无法统一,这些现象必须纠正。必须强调支部的领导,支部决定后,公开干部必须无条件的执行。现在有的村庄,发生钻空子,有的藉口区政权、区抗联不执行支部决议,必须弄清,除与区决议有抵触者外,必须无条件执行支部决议。

要实行一元化领导,最具体问题是干部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元化是空谈,首先要建立强有力的支委会,选择本村能力最强,意识最好的党员担任支书,才能真正实现一元化。在支部内找不出,公开工作的党员亦可担任(但只是过渡),如农会主任适合支书,可设农会付主任,将来完全脱离农会。如党内有人可以培养,目前不行可设副支书,将来提为正书记。

支部对政、民的领导,在支部不健全的情况下,党员少,公开干部条件适合时,可以参加支委,在支委会上讨论政、民工作。如条件不适合,可专人负责对他们的领导,支委专门讨论他们工作时,他们可以列席。各种公开组织较健全时,可将负各种工作的党员分别编成小组,这种小组是党团性质的,如政、民负责干部不是党员,则要经过党员的私人关系提意见,但不能强迫接受,我们可向非党人士提出意见,主要依靠说服。

5、政、民的组织领导。

村政权。第一,村政权改造有二种形式:一是群众没有发动政权阻碍工作时,改选不可能,多采取区里委派与撤销;二是群众已发动,将村长反下去,就要经过民主选举,这时要尽量照顾到三、三制。故村政权的组织形式有三种:一是经过政府撤消,由区长委任;

二是改选,形式是村政委员会,光有委员,下无小委员会,这是在群众基础尚未健全之处;三是村政委员会,下有小委员会(调解、财政等),民兵健全的成立武委会。

第二,村政权的会议制度。村政委员会,布置检查本村的政权工作(过去村政常是村长独裁)。再为了发扬民主可开村政会议(村各委员会委员、小学教员、各教会主任,各大镇之街长如在我掌握时亦可参加),讨论本村应兴、应革事宜,村长代表村政委员会报告,村长应执行村政会议的决议,打下民主选举的基础。会议制度首先是村政委员会,财政制度定期公布帐目,一般2至3月一次。

第三,村政权的活动方法方式,必须和群众团体有区别,群众团体不能命令政府,村政权也没义务执行群众团体的决议,弄不清这种关系是不好的。

村群众团体。

第一,目前主要是组织农会,但不能以组织农会为满足,农会是阶级性的,单纯农会不能组织群众的大多数,仅能组织基本群众。在农会树立基本优势后,即应很快的建立各种组织,过早就要分散力量,过迟就要影响工作的深入,使工作受到损失。故在几个主要斗争已完成时,即应很快的建立各种组织,抓紧时机进行组织,并要很好的建立青抗先、模范班等组织,巩固与扩大我们的力量。一个村庄有了民兵、青抗先、模范班等组织,巩固与扩大我们的力量。一个村庄有了民兵、青抗先、模范班,即应成立武委会以统一领导,武委会主任应成为村政委员会的当然委员。

第二,基本会员。15至23岁为青救会基本会员,18至23岁可为青农救会员,享有一切权利、义务。但生活、会费等不在农会(只参加会员大会)。15岁以下儿童建立儿童团,不分性别。15岁以上之妇女参加妇教会,不参加青救会。工会主要是雇工,手工业者亦可参加,青年雇工不参加青救会,为工会的基本会员,手工业为付业者不参加工会,如有3至5个雇工,即可成立工会,本村只一、二

个雇工时,可与附近村庄联合成立,如附近村庄亦很少,不得已可参加农会,只要能建立时即尽量建立。青抗先可在武委会下设青年股,或青年科,自己有其上下级系统。

第三,各种组织也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以自然村为分会,分会可设委员 3 至 5 人(与支部组织是一致的)。如不使会议过多,每人基本组织生活最多不过 3 种,各种群众团体会议不可太勤,一般情况下会议不要过长,并按农忙农闲有所伸缩,会议要有内容、有充分准备。村级组织的生活过去有些呆板,以后要不讲形式,一般教育放在夜校、民校中。各种组织的互相配合上,农会要帮助青、妇工作的发展,号召模范农会会员动员自己的姊妹、妻子参加妇救会。

第四,群众团体与政权的关系,群众团体没有权力命令政权,群众团体可代表其会员向政府提出意见,但只是意见,无权形成决议叫群众执行,政权应很好的考虑群众团体的意见。

乙、分区委领导

1、特点:

第一、最接近下层,具体问题、实际问题解决最多的一级,分区委直接影响支部工作。

第二、分区委单位最多且多半是不脱离生产的,且又注意秘密,不能召集集中的会议,故必须跑腿。

第三,分区委干部目前经验较差(特别支部工作经验缺乏),整理支部还没有一套定型的经验,现在还是摸索中工作。

第四,支部独立工作能力一般较差,需要乡区委的切实具体帮助。

2、由以上特点决定了分区委领导有以下问题:

第一,分区委的时间是最宝贵的,要抓紧时机,要有计划,县委要照顾他们的困难,不要把他们的计划打乱。

第二,乡区委领导方式必须以分散为主,集中是不行的。不但

分散为主,且需划定一定地区,且必须采取一把抓,科学分工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但不是没有一般的分工),建立部门工作是不可能的。在这样情况下有一些困难:一是长期分散会形成各自为政、割据闹独立性,全面情况各不了解,不民主,全权代表,个人主义领导。二是干部学习受影响,不能及时交换经验教训,发现缺点与错误,进步较慢,自己苦闷,有了问题不能很快解决。因此,分散原则下要有适当的集中,以解决困难问题。因之,区必须划小,才便于深入工作,一区不应超过45个行政村,(以30左右为宜),可合并村庄为一行政村。其次是增加分区委,3至5人,如条件不够的,可添乡委干事,并培养不脱产的分区委。过去不脱产的分区委一般质量较差,我们在这方面照顾与帮助是不够的,今后应在政治上、工作上更多帮助他们。不脱产的分区委可领导几个村庄(附近)。15个支部以上的区,党务工作者应有3人,25个支部以上的可增至5人。党、政、民工作干部统一使用,在一把抓时期可以用,今后最好分开,逐渐减少这种办法,干部不充实时,万不得已时,可以作为过渡办法。

第三、分区委的领导办法

分区委区域不大、支部不多的情况下,各分区委应有重点的分散,按地区的需要各分区委分工负责几个支部,几个支部中指定1个重点,而不是平均去跑,这样能有具体了解,同时要定期集中以交换经验。集中办法,如近时三、五天见1次面,较远在5至7天接头1次(最好在白天,因分区委工作多在夜间)。经常接头则解决问题快,可避免长期分散的毛病,并可开小组会,进行批评自我批评,1个月或20天开1次学习会,这样分区委虽分散亦可集中。

分区分领导的区域大,支部零乱,依靠分区委增加是很困难的,这时可采取党、民统一使用的办法,区抗联干部条件适合可参加分区委,将作党务工作的分区委划组来共同负责,将作民运工作的抗联干部共同划为一小组,由作党务工作的分区委来报告工作。

第四,分区委的领导重心,主要是支部(现在有的分区委力量分散),而政民干部参加分区委者,往往不能以党、团的一分子来讨论问题,而是站在党团之上以分区委的资格来命令党团,以致党团失去民主,起不了领导作用,党团有时不能成为组织,而成为人对人的领导,我们必须改正此种现象。

第五、分区委领导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是注意培养支部的独立工作能力,切忌包办代替,应耐心的加以引导,不要认为他办不了事。二是注意支部的积极分子,适时加以提拔,因而我们的干部多来自下面,故必须注意提拔。三是巩固的中心是民主,只有民主才能发挥群众积极性,分区委自己应首先成为实行民主的模范。

丙、县委领导

1、集中多于分散。因县是战斗单位,故建立正规领导。县占有重要位置(如搜集材料,了解情况),县委要注意全县工作的发展,故应较集中,并要建立其部门工作,像过去那样长期分散就不行了。县委一方面要集中研究,另一方面要深入下层,故县委今后要采取突破一点,集中帮助一个区,检查一个支部,将经验指导全县。发扬走一村作一村的办法,搜集材料帮助工作,但要注意不要破坏分区委的领导,我们所提意见,正是帮助分区委决议之实现,分区委如有错误,不应向支部说,应找分区委来谈,万一来不及找分区委时,也应注意提的方式,尊重分区委,并于事后告分区委。

2、建立部门工作,过去对部门工作认识是不够的。

第一、部门是在党委会领导下的,他们把党委会决议具体化的分发到下层党委,帮助下级党委布置其部门工作。所以派人到下级党委检查其有关部门工作的具体执行情况,并代表上级党委去传达关于其部门工作的决议,在同级则可帮助党团布置工作,帮助党团搜集有关本部门工作的材料,提出意见经过党委会的批准,拿到下级去实现。故部门工作的建立,是“将上级决议弄到下级”、“将下级材料弄到上级”的重要机构,过去由于搞不清楚,发生党委会包

办部门工作的现象,部门工作本身也分工不清。

第二、各部门的工作与分工。

宣传部:过去一般比较轻视,没有引起应有注意。对敌斗争,揭破敌性宣传,对封建遗毒加以揭穿,思想斗争我们过去作的很差,灌注新民主主义思想,肃清专制的思想,“如不能巩固我们的思想阵地,则是没有骨头没有灵魂的”,故加强宣传工作是很重要的。对内的教育,从思想上巩固党,肃清党员中落后的封建思想,用积极加强教育来做,如训练班等。领导政民教育机关进行教育,这点也作的不够。这是很艰巨的任务,但封建的落后的观念,提高到新民主主义思想,不是一时半时能达到的。

宣传部的工作,一是管理党校、训练班;二是代表党委管理文化团体;三是对政民教育部门亦可管理(经过党委与党团)。日常工作具体计划可进行检查,并可提宣教工作的意见,政、民宣教部门的党员,应无条件的执行。政、民出版的宣传品、出版物,应对其审查。

民运部:根据党委方针,制定具体计划来布置。代表党委向同级群众团体党团传达决议,领导群众团体党团(代表党委),帮助党团制定计划。民运部长代表党委到下边去传达决议,收集下级政民工作材料,研究材料与报告,提出民运工作意见。协同组织部、宣传部研究有关问题。

组织部:组织部的的主要工作,一是整理支部。要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重点是加强支部与群众联系,反对忽视群众、压迫群众。同时应贯彻民主(下情才能上达),发扬与开展自我批评,造成民主空气;组织领导上规定各级组织的关系;用民主的方式来改造领导成分(很多支部中农占绝大多数)。二是审查干部。在斗争中审查,看他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组织利益的关系,与群众关系如何?对领导机关关系,对上级对同级态度如何?完成任务如何,采取什么办法,为什么积极(是否为个人目的);个人

成份与历史。

组织科工作：一是研究掌握各时期的组织路线与组织形式。二是研究组织形式如何与斗争形势相适应，不但党内而且研究政民的。三是征收保管党费，管理秘密工作。四是研究组织领导如何改善适合于我们的工作。五是研究统计。

干部科工作：一是干部的管理，过去只管理党的干部，政民干部也应管理；干部发生什么问题要及时给以纠正与督促，指出他的错误与思想意识，并提出意见（政治上、组织上的管理）；以及干部的审查，故干部科干部不应经常调动。二是训练班、党校的组织生活。三是领导同级政民机关支部。

3、县委在领导上应注意的几点：

第一，集中与分散要很好处理，不应机械。

第二，斗争阶段莫机械的划分，主要的不是唯一的，中心与一般工作应好好掌握。

第三，对区要检查，反对包办代替，要制定些制度，那一工作那一级去作。

民运小组应注意，过去为打堡垒集中力量，目前局面打开了应分散使用，抗联不一定要住基点村，各部门工作要很好配合。

丁、地委领导

原则是应更多的帮助县，过分集中是不好的，另一方面也要照顾全面。（略）

（张雨辰记录整理）

我们能坚持平原根据地^①

(1943年11月27日)

黄 敬

在敌寇扫荡的第20天时,黄敬同志在军区干部会上,作了一个透彻的讲话,现在敌人扫荡已结束,但今天回忆起来,益显得其正确,对于纠正错误认识,坚定今后斗争信心,仍有重大价值。特追记原意如下:

黄敬同志在会上说:“我们边区不仅能够坚持边区反扫荡斗争,而且可以坚持边区平原抗日游击战争,不仅仅能够坚持边区平原抗日游击战争,而且可以坚持边区平原抗日根据地。”至于我们所以能够坚持平原抗日根据地的胜利条件,着重指出:我们边区和冀中、冀南、冀东地区的斗争还有不同处,其不同的、一般的和主要的条件有三:其一,我们的地区大,敌人的兵力小。这一点冀中、冀南、冀东和我们边区都不相同,在冀中、冀南、冀东等地变质前,他们的地区已经缩得很小,敌人可以集结优势兵力,摧毁他们的根据地。我们的边区比冀中、冀南、冀东都大得多,特别是我们一年来边区又扩大了很多,如×分区扩大了×千多个村庄,×分区活动地区增加了二倍多。×分区小部队能活动到广平、汶上。又如冀南的游击区小,我们的游击战争,我们的小部队活动,敌人容易压缩。我们边区不同了,北局、集总总结了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经验以后,我们接受了冀南、冀中各地区的斗争经验,我们已派了小部队到敌人侧

^① 黄敬同志在军直干部会上的讲话。

后活动,一年来我们的游击区扩大了,直属队同志知道朝城乡伪90多个据点一下拔去了80多个。这是我们边区根据地和其它地区不同的一个条件。地区越大,敌人越少。因此,敌人在同一时间内只能是分区性的分区扫荡。记得去年冀中“扫荡”第12天即到腹地,现在敌人扫荡我们已到第20天了,沙区还没到,濮县还没到,在全区范围来说,敌人扫荡是此起彼落的形势。只要我们指导扫荡不犯错误,不犯大的错误,我们边区根据地扫荡变质(冀南地区变质是敌人数年蚕食的结果),是不可能的。第二,在时间上也不相同了;今日何日?整个反法西斯快要胜利了,敌人很快就要失败,今天的形势和去年以前的条件全不相同了。苏联红军快打到明斯克了,现在快打到苏联边境了,就象我们明天反攻离鸭绿江边不远的时候了,德国一垮台,德国是大哥,日本二哥快变成二×了。快了!真快了!快在太平洋上决战了。我们知道冀中根据地变质经过四年,同志们,我们想一想,敌人今后扫荡敌后会不会作一个很长期的计划,像90岁(快要死了的人了)的老头作一个娶老婆的计划呢?时间已不允许敌人蚕食了。所以说冀鲁豫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坚持还是可能的。第三,我们抗战的信心更加坚定了,敌人的内部更加动摇了。“抗战7个年头了。敌占区的人民被敌人拉去当伪军都说格不着!几年都熬过了,现在谁肯落个汉奸名声呢?抗战的信心更加坚定了。而伪军呢?到处同我们拉关系,留后路,作战后保险的准备,这一切都是我们胜利的条件。”说到这里他提醒我们,坚定胜利信心。“要是现在有同志看不见前途,开小差,掉队,真太冤枉了!真太近视眼了!百里路我们走了90里,到前面宿营地就要会餐,还有再掉队再开小差,花不来,我们一定把这个信心坚持下去!”

以后,谈到目前抗战形势和边区的重要性。他说:“谁个失掉了抗战信心呢?只有反动派那些家伙。咱们抗战越积极,他越消极,因为他们没安好心!”这里他举出恰当的比例:蒋介石对付我们就像在户主对待他的老黄牛一样,户主对待他的牛,夏天用他时,有

料还有青草；冬天不用了，料也没了，只喂干草，再不，就一刀杀死了。你若问他为什么把做了活的牛杀了吃呢？他说：“那还讲邪呢！”说到这里，他挥动着拳头：“我们不作老黄牛呀！”蒋介石安的什么心呀？他对付我们就是这样，“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他强调地指出：“同志们，历史来考验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了。”我们要走毛泽东抗战的道路（大家有饭吃，大家有衣穿，大家有屋住，大家有书读的新中国），苏联在战时有很高的地位，到处都是咱们的好兄弟，大家不要睡觉，睁开眼睛，冀鲁豫是华北的大门，将来反攻我们要“一边把门，一边打虎”。坚持边区平原抗日根据地对全中国有着极大的作用，现在的困难是非常困难，我们要咬紧牙关，现在这一段要熬过去，我们一定要坚持！……（下略）

（卫华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摘自 1943 年 11 月 27 日《战友报》）

目前宣传要点

(1943年12月11日)

对象：敌占区群众、伪军、伪组织

时间：12月15日至明年2月15日

目前在敌占区加强宣传，争取人心向我，在敌占区群众及伪军伪组织人员中，建立和扩大我之思想阵地，排除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之影响，实为重要，宣传伪组织为：

(一)苏联的反攻胜利，仅夏季战役(7月5日——11月5日)4个月即击溃德敌144个师团，德军损失总计阵亡、受伤及被俘者官兵270余万名，敌寇损失计飞机10189架，大炮19800门，坦克17700辆，损失机枪77480挺，迫击炮19780门。4个月中苏联克服了35万平方公里具有最高经济及战略重要性的广大领土。在2000公里前线上前进300至450公里，收复了许多铁路干线。增加红军调动的自力条件，剥夺了德军的调动条件。目前红军还正继续前进，希特勒受挫折，已提出“保卫祖国”的哀鸣。

意大利无条件投降后，已向德宣战，轴心三足，已折其一，站立不稳。日寇在太平洋亦连遭打击，于是见势不好，乃大声疾呼：“准备决战。”伪报呼吁“防空防毒”，即是怕盟国反攻的准备，而这些亦即是他们溃败前的征兆。恐怖的悲鸣。伪军伪组织人员须知日寇是靠不住的。

(二)指出中国抗战有两条路：一条是以蒋介石在作代表，替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谋私利实际反共的道路，执行这条路线，就是

实行独裁专制压迫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路线,其结果中国必亡,前途黑暗。第二条是以毛泽东作领袖,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实行民主政治,为全国人民谋福利的,以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为目的的路线,执行这条,中国必胜,前途光明。

第一条路,国民党反动派正在放弃对敌作战,反共妥协,企图发动内战,这就是帮助敌人,延缓与阻止中国抗战胜利,加重了敌占区同胞的痛苦过程。为此,必须戳穿与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这种罪行:①国民党 58 个将领,20 个中央委员投敌,国民党当局并不处罚,庞孙两逆无耻投敌,是其抗战不力、乞求敌人及其他特务反共政策所造成的,反造谣八路夹击所致。②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法西斯独裁专制实行卑鄙的特务政策,造成全国人民不自由,抗战积极性受到限制,抗战胜利即受阻碍和延缓,敌占区同胞的痛苦即多一天。③国民党反动派在伪军中进行特务活动,这就是借刀杀人,压制与检举爱国分子的活动,实际上是帮助敌人统治伪军的帮凶,伪军中有爱国良心的要警惕。④国民党反动派由于实行法西斯独裁,一贯排斥异己,故当过伪军的,都在压制裁除之列,如内战暴发,必首当其冲,为他变成反共内战的牺牲品,伪军人员宣传此点,排出国民党特务的欺骗。

第二条路,正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所进行,前途光明不可限量,因为:①有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存在,其余全国人民的反对内战,内战仍有法制止,而即使不幸,内战爆发,我们仍有力量有本领挺身而出,收拾时局,抗战仍能胜利,革命仍能胜利。况且英美苏也反对中国内战。②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继承者,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因为他从诞生起就为人民谋利益,20 年来未曾稍懈,又因为他有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又因为他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有丰富的革命经验,他与中国人民有血肉相联的关系。又因他有伟大的决心,他将永远领导着八路军与中国人民共生死共患难,它将与华北人民共同首先收复失地,他将为

反攻敌人与保卫华北人民的利益奋斗到底！因为以上原因，所以依靠中国共产党是有前途的，最可靠的，谁要反对它，谁就会自取灭亡，没有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就没有中国。

(三)搜集材料说明抗日根据地、敌占区、大后方的好坏对比：譬如抗日根据地在共产党八路军的奋斗下，定能坚持，敌寇扫荡是死亡前的挣扎。1943年秋季扫荡时，人民所受的危害，完全是敌伪所造成的，只有坚决斗争才能免去灾害，只有赶出日寇才能安身。要辨别谁是敌友，在扫荡中所受灾害推於八路军之身，正是敌寇的挑拨离间，要揭穿他。八路军将为保卫根据地保卫人民利益奋斗到底，敌占区被敌伪统治敢怒不敢言、负担过重，过着被压迫的悲惨生活。(可各按当地调查情形充实材料)大后方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之下，民不聊生，物价高贵，毫无民主自由。例如孔二小姐(孔祥熙之女)则带价值可救2000灾民1年食用巨款的嫁妆，坐飞机到美国去结婚。

(四)说明共产党对伪军伪组织的政策是团结一切不愿意死心塌地做汗奸的中国人。实行三大保证，共产党绝不像国民党那样采取威协利诱，不讲信义，排除异己等特务手段，不要死心的给敌人办事，参加“讨伐”，中国人打中国人。本地人落怨于本地，□□伪军伤亡，抢粮抓丁，伪军所得无几。按据点深入我地，守备愈困难，容易被我消灭，应该及早回心向善，留后路，抗战胜利算总帐，现在回头尚不晚。

(原载1943年12月11日《战友报》第36期第1版)

用终身的战斗追悼你

——纪念朱程、袁复荣二同志

(1943年12月18日)

黄 敬

这次反扫荡中朱程、袁复荣二同志，率部与敌血战壮烈牺牲，我们感到非常的悲哀沉痛。英勇牺牲在革命年代是件平凡的事。但目前敌后正在艰苦紧张的关头，边区工作急待开展，朱袁二同志身负鲁西南负托之殷，竟不能与边区军民共同战斗到胜利，这实在是使边区军民深沉悼念的损失。

朱程同志参加党及八路军的历史虽不算长，但他富于朝气，能虚心学习，有蓬勃的进取精神。他对于旧社会中的坏习气及小资产阶级的恶劣意识能进行艰苦的自我斗争；所以在部队中能够较快的树立起信仰。复荣同志在过去鲁西南环境最严重的时候，能始终与鲁西南群众在一起，坚持了鲁西南的阵地。他们都正是在年青有为的时候，正期待他们为党为革命能有更大贡献，他们的牺牲实在是边区党和边区工作的损失。

在敌寇准备决战的方针下，边区环境将更加严重，敌寇的扫荡与蚕食将更加频繁，我们同志应深刻认识边区形势的特点，认真接受这次秋季反扫荡的经验，接受这次朱袁二同志牺牲的血的教训，提高警觉，充实自己，准备自己。我们要用胜利来为他们复仇，我们要用终身的战斗追悼他们。

(原载1943年12月18日《战友报》第36期)

边区一年来军事斗争的胜利

(1944年1月1日)

杨得志

首先,我将一年来边区的形势作一简略的叙述,然后再来谈我们的军事斗争问题。

在这一年来,边区所处的斗争环境有如下的特点:

(一)敌寇机动兵力的增加,这是随着整个华北形势变化而变化的,在今春华北原有敌军9个半师团,10个混成旅团,2个骑兵旅团,经过夏季敌对华北兵力防务作整个调整以后,虽有个别师团离华返国,但由于某些旅团的扩编为师团,故现仍有10个半师团,8个混成旅团,两个骑兵旅团,兵力并未减少。同时,由于国民党□反动□将领们的投敌,在正规性的伪军数量上,有大的增加,接替了部分的日军防务。

(二)正规性的伪军增加。如今春孙逆良诚的北上,接替了濮阳、东明日寇防务,今夏季伪“和平救国军”齐燮元部1个旅开入运东,接替了在平、博平、平阴、东阿、东平等县日军防务。以及随庞逆投敌之杜淑部,及国民党顽固派李仙洲率大军北进失败后,鲁西南土顽逐渐伪化,公开勾结日寇向我进攻,如最近常振山部配合日寇向我曹县东蚕食,曹县保安旅孙牲□部配合日寇向我曹县八、九、十区进攻。齐子修的垮台,李英西调,王天祥接替李英防地等变动。

(三)由于敌人抽调兵力到大据点中整训,准备力量与英美决战的战略方针下,我边区在去年4月到6月这一时期,敌人蚕食扫荡不甚积极,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空隙,这是对我有利的一点。

同志们！边区在一年来的军事斗争上，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特别明显的表现在对伪顽的斗争上，我们是完全胜利了。

（一）在小部队建设上，收获很大，这些成绩表现在，自从今春提出群众性分散性的游击战争，加强小部队建设以后，边区的军事斗争形势，基本上改变了1941年冬1942年春的某些被动地位，逐渐趋向主动。现在，我们的活动地区扩大了，在敌伪的腹地，纵深，经常有我们小部队的活动，时刻的在打击敌人的特务，最坏的汉奸，提高敌占区人民抗日的情绪。同时，正因为是在敌人的侧面有我小部队的纵横驰骋，有力的牵制着敌人，减弱了敌伪向我中心区进攻蚕食的力量，配合了主力部队胜利，保卫了根据地。

（二）粉碎了汉奸孙良诚、文大可、杜淑等对我根据地的蚕食进攻。在7月间我们以3天的时间，将汉奸文大可在朝城三年来疯狂蚕食所据的83个据点，打得只剩下3个，消灭了文大可1/3的力量。在8月间，我们打败了汉奸杜淑向我卫南的进攻，活捉了伪副旅长以下官兵2000余人，缴轻机枪22挺，长短枪1000多支，保卫了卫南抗日根据地。在11月间，6天的战斗行动，完全打破了汉奸孙良诚数月来进占濮县的阴谋，在八公桥及东考之间的战役中，活捉了伪孙高级军官以下1800余人，缴获轻机枪15挺，长短枪1300余支。孙伪被我军严重打击之后，狼狈的放弃了濮县及其以西之地区。在八里口附近歼灭了配合日寇扫荡之杜淑扈全禄的两个团。

（三）胜利的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李仙洲的军事进攻，顿南战役、曹东南战役，我们前后解决了李顽有生力量4000余人。缴获了轻重机关枪63挺，掷弹筒22个，长短枪2000余支。李仙洲、侯镜如等反动首领被我军围困在两个院子内，此次李仙洲恐是有生以来未有的失败。他领教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刀气，最后终于南窜。李军北来是失败了，我军在自卫的原则下，给李顽的还击是胜利了。

（四）1943年胜利的坚持了边区的根据地，坚持了一切的斗

争，粉碎了敌人的秋季大扫荡。在反扫荡中，我军攻入敌人纵深内的4个县城，拔掉了敌伪据点和碉堡60余个，杀伤了敌伪1300余，活捉了敌伪3000余，缴获了轻机枪8挺，掷弹筒16个，长短枪2000支，子弹40000余发，并且开辟了新的地区，很显然是敌人吃亏了失败了。我们呢？是胜利了。

我们自1月到11月对敌伪顽战斗据不完全统计有如下的战果，全区作战1459次，毙伤敌伪顽10091名，缴获长短枪104725支，轻重机枪138挺，掷弹筒94个，炮3门，子弹300440发，炸弹8300余个，电台9架，牲口640余匹，攻克据点和碉堡215个，其他车子布疋粮食等甚多。

同志们！这些胜利是我们在共产党和上级正确指示之下，在边区的党领导之下，在抗日政府的协助和人民的帮助下，军政全体同志共同努力之下，指战员的英勇所取得的胜利！

正当着1943年已经过去的今天，庆祝同志们的胜利！但是同志们！不要忘记了，我们在1943年还存在着如下的弱点和缺点：

（一）在战术上，我们尚有些部队不够灵活，个别部队侦察员疏忽，久住一地，留恋着大兵团集体活动，以至个别部队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二）小部队反对敌人的清剿不够积极，战术动作不够熟练，如采取时聚时散，秘密迅速接近，快打快走，短兵火突然大量杀伤敌人……等动作不够灵活。故在腹地反对敌人清剿时，尚未完成应有的任务，甚至个别小部队还吃了敌人的亏。

1944年是愈加接近胜利愈加艰苦的一年，敌寇可能更疯狂的向我边区蚕食进攻，国民党反动派也可能重新组织力量再次的向边区进攻。这是因为日寇一天未被我们打出去，它是一天不会停止进攻我们的，不会放弃来消灭我的念头。同样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山东的进攻也不会放松的，所以在一九四四年来临的时候，对同志们有如下的几个希望：

第一,要坚定我们的斗争意志和胜利的信心。我们边区是广大的,是人民的力量,是共产党的领导,是军队的力量,在客观与主观上均有许多有利条件。故此,只要我们不犯错误,不但能坚持边区斗争,而且能坚持边区的抗日根据地到最后的胜利。

第二,不放松一刻准备我们的力量。客观条件是存在的,但还要我们主观上的努力,应握紧我们的武器,睁大我们的眼睛,准备给任何进攻边区之敌予以有力的打击,歼灭之。

第三、进一步的建设小部队,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巩固起来,和创造更多的更新的活动方法,巩固我们 1943 年已取得的胜利,并进一步的与各种工作结合起来,扩展这一胜利。

第四、要加强我们的团结。不但军队本身要团结,而且要与抗日政府和广大人民团结,这就是要求同志们在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下,切实做到拥政爱民。尤其我们是工农的儿子,不要忘记了工农。我们要团结象一个人一样,才有力量,才会胜利。

第五、要加紧我们的学习。提高我们的军事技术和政治水平,提高斗争中的知识,充实我们的斗争经验。希望同志们平时努力学习,多搞学习比赛,战时多打胜仗,多缴枪炮,多捉俘虏,进行打仗竞赛,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原载 1944 年 1 月 1 日《战友报》第 38 期)

认真地彻底地整起来！

——苏振华在干部会报告要点

(1944年3月5日)

军区总学委会所召集的直属机关(二分区干部亦参加)整风动员会,苏政委作了重要的报告,兹记其要点如下:

我们的整风运动,从前年开始,但是或没有动员起来;或者动员起来而没有坚持下去。虽然也收到了一些成绩,但这些成绩还是不够的。过去有一部分同志是认真的整起来了,他们对于整风的态度不是拖,不是应付,而是切切实实的从自己开始,因此找到了自己主要的毛病,发现了自己的长处,对这些长处和短处,作了客观的分析,积极的改正了自己的糊涂观念,初步明确的树立了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适当的解决了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的正确关系,在工作上也打破了过去的老一套,改进了工作方法。他到那里,那里工作就有进步,一切情况就焕然一新。可是,这样的同志是不多的。

大多数同志还没有认真的整起来。他们对整风的认识是皮毛的,抽象的,缺乏勇气和决心,所以,就采取了拖和应付的态度,不把整风当作是改造思想的。因此,过去动员以后又落下去的原因,就在这里。

有好多人把整全党和整个人孤立起来,只整老干部不整新干部,只整高级干部不整我们三块五的干部,说来说去总是整别人,不整自己,如果都有整别人的观点,那么几十万党员还整谁呢?结果是大家都不整了。有的人即便在那里整,态度也是不老实,对整

风只了解一大堆抽象名词,联系到自己就不承认了,还有的为了争取模范,故意夸大或伪造错误,这都是不老实。甚至采取消极谩骂责备批评,而无实际的内容,这就是没有决心缺乏勇气的缘故,因为改正就要联系到自己,马上转变这又是很痛苦的事,因之,这些同志脑子里的糊涂观念是没有清算的,党的利益在脑子里是抽象的,个人利益是具体的,个人与党的正确关系没有解决,政治上的嗅觉一天天降低,对工作的好坏完全不管,如果是涉及到个人问题,嗅觉就很敏锐了,对党的工作是以个人利益和兴趣为转移的,这样的人到那里,那里的工作就搞不好,干部就不团结,我们检讨一下,谁脑子里还存着那老一套,谁就是还没有整起来。

为什么整不起来呢?主要的是认识问题,如果认识了真正的利害,那就非整不可了。过去对这几点认识还是不够:

(一)抽象的了解了整风是全党的思想革命,不了解党是由全体党员□□□□□□□□。全党的□□革命如果□□□□□□□□每个党员整起,整风就从那□□□□□□□□思想革命,去革谁的命呢?过去□□□□□□人不整自己,只整高级不整下级□□□□□□就是不了解这个道理的原因。整风是每□□员的责任,任何等待和依靠的心里,都是不应该的。这次整风,不是一般的,抽象的,而是要从自己整起,从自己的□□和重要□□整起,如果不从自己开始,那么认真的整起来也是不可能的。

(二)三风不正□□的危害仍认识的不够,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犯过几次大的错误,大革命时因为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失掉了阶级立场,只看见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的革命性,而没有看到他还有反革命的一面,便只采取了只联合而没有斗争的路线,结果使当时革命遭到失败。后来又出现了个李立三,机械的搬运苏联的革命经验,只看见革命发展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反革命力量的强大,便采取了到处暴动的左倾机会主义,结果又使党遭到重大的损失。再就是张国涛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都是当时领导

干部的思想问题,三风不正的问题。但是从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领导的党中央,因为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具体运用,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党才保证了长征的胜利,发动了全国抗战,壮大了党和党领导下的军队,建立了无数抗日根据地,这就是因为有了坚强的布尔维克的领导。从遵义会议以后,三风不正在全党来说,只是残余了,但在每个党员同志中,个别工作及个别部门中,还不见得是残余,有的还是占着统治地位的,例如个人主义和目前部队内部存在着的军阀土匪主义和右倾情绪,都是三风不正的严重表现,我们全党必须进行整风。中央已经提出,整风是我党20年来最伟大的创造,是建党建军的重要关键。

另一方面,抗战后大量新的成份渗进党内和旧环境的恶劣影响,在我们同志间或长或短的还拖着一条非无产阶级的尾巴,表现在:

①小资产阶级的极端自由主义思想,对党对人民缺乏高度的责任心,对工作不分析,专凭主观臆想不受客观限制,目无组织。

②封建思想的英雄主义和家长制度,表现反上又反下,唯我独尊。这种人是夸大自己,看不见群众的力量和组织的力量。

③资产阶级的入股思想,向党要帐,以为自己参加革命有功了,要向党“分红”。以上三者又是有联系的,是一个东西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其本质是个人主义的,时常在个人利益表现出来。整风就是要摧毁这些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来建设与巩固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所谓打通思想关键就是要每个同志从自己整起,打通最痛的一关,而走上无产阶级正确思想的康庄大道。这次整风要整起来,并且要坚持下去。

(王 堪 记录)

(原载1944年3月5日《战友报》第46期)

拥护冀南、冀鲁豫两区合并 军直 召开全体人员大会 杨司令员 传达中央指示 黄敬同志详谈合并意义

(1944年6月15日)

(军区消息)6月8日,军区直属队于驻地村召开前后方全体
人员大会,传达成立冀鲁豫中央分局,及冀南、冀鲁豫两区合并问
题。杨勇司令员宣布:中央为了加强领导和统一力量对敌斗争,决
定冀南和冀鲁豫两区合并,成立冀鲁豫中央分局。分局及军区的领
导者:黄敬同志、宋任穷同志(前冀南区党委书记)、李菁玉同志(前
冀南区党委副书记)、苏振华同志、杨勇同志等同志为分局委员,黄
敬同志为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为宋任穷同志,副司令员为杨勇同
志、王宏坤同志(前冀南军区副司令员),政治委员黄敬同志兼任,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为苏振华同志,代主任为朱光同志(前冀南军
区政治部主任)。当他宣布这个决定和这一些名子后,全体到会者
的脸上,都流露出了微笑的笑容,和内心的喜悦,他们深信领导力
量的加强,及对敌斗争新的胜利。接着,他们就讲为什么合?如何
合?怎样合的问题(略去)。

黄敬同志亦亲临大会指导,他用很通俗生动的语句,讲出了冀
南与冀鲁豫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密切关系。这时,他有力的
说:现在中央为加强两个地区的领导,统一对敌斗争,决定合并了,
这是一个最正确与切合实际的决定。最后,他说现在领导机关的担
子重多了,大家更应该好好团结,虚心学习冀南同志的长处,特别

因为冀鲁豫地区合并,我们更要多多照顾冀南来的一切人员和干部同志,决不要自高自大,关“班子戏”。

大会结束时,人们都有一个愉快兴奋的感觉,虽然会议只有两三个钟头,但却给人深刻的印象。归路上,大家纷纷议论如何迎接后天就要到来的冀南同志,总支也特召集各单位负责同志,具体布置动员及欢迎工作。

(方 青)

(原载 1944 年 6 月 15 日《战友报》第 62 期)

关于拥护冀鲁豫中央分局成立 冀南冀鲁豫两区合并报告提纲

(1944年6月15日)

——这个提纲,是根据6月8日黄敬同志杨司令员在军区军人大会上的讲话内容写成的。

一、拥护中央决定！拥护冀鲁豫中央分局！

党中央决定,冀南和冀鲁豫两区合并,成立冀鲁豫中央分局,并以黄敬同志、宋任穷同志(前冀南区党委书记)、李菁玉同志(前冀南区党委副书记)、苏振华同志、杨勇同志等同志为分局委员,黄敬同志为中央分局书记。这一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样一来,冀南和冀鲁豫党的领导统一了,领导力量大大加强了。党员加强了,军区领导也加强了,军区司令宋任穷同志,历任红军时代的政治委员,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冀南区党委书记、军区政治委员,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领导能力,军区副司令员为杨勇、王宏坤(前冀南军区副司令员)两同志,军区政治委员则为黄敬同志兼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则为苏振华同志,朱光同志(前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为政治部代主任,这□□□、都□加□了,我们要坚决的□□,并坚决的执行这一决定。

二、为什么要合?

合并的主要意义,就是在于统一对敌斗争,加强领导,交流经验。

一、首先从军事政治斗争上看，冀鲁豫和冀南关系是密切的。自武汉失守后，敌人开始由北而南大规模的扫荡华北敌后。但是，几年来我们冀鲁豫区始终比冀中、冀南缓和些，而且手里还始终保持濮、范、观三个县城；现在，又多了三个——朝城、内黄、清丰。我们仔细想想，冀鲁豫为什么会有这个局面呢？当然，我们主观上是出了力气，流了血汗，但是，绝不能说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已经做得比冀中、冀南好了，而正是因为我们的“大哥哥”（冀中、冀南……）搞得不好，创造了经验，拉住了敌人的大腿，使敌人的由北而南“而”不过来，特别是冀南，他直接的拉着了敌人。当然，冀鲁豫工作的开展，也配合了他们，他们那里环境太严重时，也可以有地方机动转移安全休息。除了以上所说的对敌斗争以外，还有一个反顽斗争，因为咱们要在冀鲁豫和华北敌后建设抗日根据地的，顽固分子就偏不高兴，还要派大兵进攻。开始时，是相当严重的，沈鸿烈、王金祥、石友三、高树勋、吴海洲……都来了，说不通就得打啦，于是，我们冀中、冀南的主力都来了，在宋任穷同志指挥下，首先把叛军石友三反跑了，这才打开了冀鲁豫的局面。去年反李仙洲时，也打得很漂亮，除了冀鲁豫部队参加外，那个冀南的骑兵团不是也去了吗！几年来，我们已经把边区周围的顽军反得只剩下了些小□头，今后呢？当然很难讲，如果顽固分子一定还要来，那就对不起，我们还要调队伍结结实实的打他一顿，山地的不好来，平原上的都好走，那首先还是冀南，他还要继续支持我们的反顽斗争。另外，他们对敌斗争的成绩，同时也配了我们的反顽斗争，如果没有冀南的坚持，各处敌人都要来的，也增加了我们的困难，至于我们的反顽斗争的胜利，同样也支持了冀南的坚持，冀鲁豫是华北的大门，咱们就是千万个“门神”，我们把守着大门不让顽固分子来捣乱，冀南、冀中就可以毫无忧虑的专心对敌了。因此说，在平原地区，冀南和冀鲁豫的关系最密切的，两边斗争的好坏，马上就要互相影响，如果两下合并对敌斗争力量就会更大，胜利就会更有保证。

二、其次从经济关系上说，我们和冀南也是最密切的。过去，我们不容易看清，这二年就可以看清了。前年冀鲁豫的鲁西北、沙区、鲁西南遭到了灾荒，中心区也正像老百姓说的“撑也撑不着，饿也饿不死”，也没法发粮食救济，于是大批灾民逃难。去年，冀南灾荒严重，我们除尽量为他们运送布匹、棉花和一些“破烂”以外，还拨给他们五百多万斤公粮，这就叫做真正的阶级友爱呀！有个别同志只知道说怪话，认为“好收了！还不叫大吃大喝的吃好些”，不知道我们虽然有这些富余，但人家要饿死了。因此说：合并后，就能够在经济上互相帮助，咱穷他帮咱，他穷咱帮他，一切经济上的困难和灾荒都是会被克服。

三、我们要注意什么？

1、不要开“班子戏”——在乡间里，有高调、平调、梆子、二簧好多不同的戏班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认为自己唱的好，人家唱的坏。因而互相看不起，互相对立，大家既然明白了合并的意义，我们和冀南合并，就不要闹这种“班子戏”，要斗就是“宗派主义”的表现，党的事业就要受到很大的损害。我们一定要好好注意，一般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往往常犯这种毛病，像一个农民，他总认为只有自己的什么都好，孩子好，老婆好，这好那好，连自己家里的月亮也要比别人家的好，为啥呢？因为他存有成见，其实月亮只有一个，孩子也不一定比别人的好。所以我们要反对存成见，反对自高自大，多拿人家的优点和自己的缺点比，另外要认识这次根据中央指示的平等合并，决不是谁主谁副，谁合谁。在团结问题上，在合并以后如果冀鲁豫与冀南同志间发生不团结现象时，强调：（一）首先是冀鲁豫同志要负主责。（二）发生问题的上级领导同志要负责。（三）干部要负责任。

2、向冀南学习——冀南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像冀南的对敌斗争经验，就要比我们多，因为敌人的规律是由北向南，发现

的一些东西(如敌数年来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铁壁合围,蚕食清剿、三光政策……)我们就马上警惕,等敌人花轿到了冀鲁豫,我们已经从冀南得来一套办法对付他,使我们当小弟弟的少走了许多弯路,少碰了好多钉子。去年,我们对敌斗争取得很大胜利,打开了很多地方工作,那就是因为我们从哥哥那里学了一套小部队活动的办法,在生产运动上,他们比我们早搞了半年,一个人都合三亩地(我们恐怕只合三分吧!)今年要解决半年菜金、三年月公粮、全部棉衣、咱们不如他们,那就须要多向他们学,加油赶上去。他们生活的艰苦精神,同样也值得学习。两年来,他们是在艰苦的过日子。生活方面,因灾荒关系,每人每天只发一斤半小米,吃饭时,装饭筐子里一点也不会剩下,煮多少就是多少,制度非常严格,那像我们这样饱。其次,工作作风的深入,建军工作,他们都有很多新创造,这里,军区号召,全区同志,要抱着真心诚意的,而不是虚伪的“向冀南学习”的精神。

军区政治部

(原载 1944 年 6 月 15 日《战友报》第 62 期)

纪念“七七”实现三大任务

——战争、生产、群众工作

(1944年7月5日)

杨 勇

冀南与冀鲁豫八路军，在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英明的领导下，在总部及朱彭的指挥下，我们已渡过了1941——1943年的艰苦困难的时期。在敌人碉堡据点林立与严重的旱灾水灾蝗灾的环境中，终日不得一饱的物质生活条件下，我们与全国人民一起，坚持了敌后平原游击战争，使敌人花样百出的扫荡，接二连三的“强化治安”都归於失败。

在1941年到1943年当中，虽然根据地有些缩小，部队也有些减少，但在艰苦严重的环境之中，我们坚持了斗争，学会了一套本事，学会了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后活动的办法，来反对敌人的“治强运动”与“蚕食”，学会了外线出击打退敌人扫荡。在困难的环境中，从实践中领会了正规军地方武装民兵三个环节结合的重要性，开始摸索着从自己动手进行生产中来解决困难的途径。又由于我们党政军民几年来的对敌斗争与工作成绩所奠定的基础，由于各个根据地的配合，加以国际形势的与我们有利，越加不利于日寇，西欧战场，特别是苏德战场上德国的溃退，太平洋上日本法西斯连遭打击，使敌人不得不重新组织力量，从华北抽调若干兵力进行在华战争，打通平汉与南洋交通，弥补他在南洋海空的劣势，所以某些据点被迫撤退紧缩。因此，从去年6月以来，我们根据地是走向稳步前进的一年，各方面逐渐恢复，使被分割封锁的小块变成大块，部分的碉堡据点被摧毁克服。地区的扩大，特别是冀鲁豫地区，

一年来恢复与扩大几乎超过去年一倍,如一分区太肥大峰山地区的恢复,二分区昆张地区的恢复,南(乐)、清(丰)地区的恢复(已恢复1941年状态并已在某些地方超过之)、朝城县的恢复,六分区打开国南局面,六分区因打开了鲁东西地区而使两区联络疏通。四分区亦向西及西南扩展了不少,现在北至卫河,南至长垣及延津、滑县。部队的本身亦有了相当壮大。这一切都是去年七七到今年七七一年中所□□□□。

从这一年斗争当中,以及过去的历史证明,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学习与进步的时候,当我们发展的时候,工作有了某些成绩的时候,看不起敌人。今天我们正是由困难转入比较顺利与胜利的时期,我们应特别防止骄傲,防止看不起敌人。今天敌虽然有了减少(原冀鲁豫区比1943年6月以前减少3/5)碉堡据点被我摧毁与被迫紧缩,某些地区自面的占领变成点线的占领,但决不是敌人就无力进攻我根据地了,我们应做足够的估计,应认识敌人力量还是非常强大。敌人在南洋即便连遭严重打击,也决不会放弃华北敌人所谓的兵站基地,尤其像□□棉粮丰产的平原区。因此,在正面告一段落之后,对敌人回师与扫荡,须有足够的估计,敌人重增设据点,重修封锁沟,都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敌人暂时减弱,据点减少紧缩,便乐观麻痹起来,我们要把他看为暂时现象,因而抓紧此时机,争取进步,巩固与扩大各方面的成绩,趁此时期,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占区,使根据地的小块变大块,小“格子”变大“格子”,加紧部队本身建设工作,提高自己,使根据地更加巩固起来。

目前的重要任务是什么呢?毛主席已经给了我们方向,就是他所号召的三大任务——战斗、生产、群众工作。

现在分开来说:

(一) 战 争

我们几年来，战争是获得了很多成绩，学习许多打击敌人的作战方法，发挥了平原地区游击战争的战术，学会单独作战与独立活动能力，这是我们成就的一方面。但是，由于近年来高度分散活动，使本身的建设与教育有了不少削弱，特别在军事教育上，是从上而下的有些放松了，这就不能不影响我们战斗力与对敌斗争。所以今天，所有部队除照顾根据地其他工作配合外，应抓紧每一机会和适合地区，进行轮番的整训，这是完全必要的。

整训的目的，使我们部队能做到“艺高胆大”、“要艺高”就必须加强军事教育及训练。要“胆大，就必须加强政治教育。在军事上要学什么？练什么呢？概括的说就是——学战术，练技术。战术是建立在一定的具体条件（地形、敌情、我情）上面的。边区大体相同（泰西除外）都是平原地区，作战对象是日军和伪军，我们装备是低于敌人的，但主力军与地方军亦有若干的差别，据此情况我们学什么战术呢？

战术包括进攻、防御、退却，我们学的中心是——进攻的歼灭战术。进攻的形式是袭击和伏击。不是防御也不是退却战术。进攻的歼灭战术又不是进攻的击溃战，当进攻中，求得完全歼灭敌人，所以要集中绝对优势力量打击歼灭敌人一部，击溃战是得不偿失的；击溃不如歼灭，打垮一个团不如歼灭一个连。时间：着重的是夜间战。夜间战的反面是白天战，而我们着重的是夜间战，不是白天战，这是由敌强我弱，敌人弹药充足，我困难缺乏的特点所决定的，夜间可以减少火力战斗，而我们是以士气旺盛为长处，待敌人发觉时，刺刀就已经杀到他头上，手榴弹就打在他们身上。

技术就是白刃战斗的短兵战术，我们使用的就是：破坏敌之障碍，进行刺刀手榴弹等短兵相接的技术，不是火力战斗，当然也不是完全取消火力战斗。我们今天应尽可能来缩短火力战斗，我们进

攻中没有什么“火力准备”只有“火力援助”，我们轻重机枪进行火力战斗时，是在最近距离开火的。技术如何提高呢？这不是靠一个突击所能练成，要经常，只要经常练，用了以后，检讨、然后再练，要重实用，反对形式主义，这样是可以练好的。总起来说，练技术就是练习刺刀打手榴弹和射击这三大技术。

学习上，干部与战士的学与练要联系起来，干部学战术，同时也必须学技术，因技术是战术的基础，只有干部懂得技术才能组织技术教育战士，学战术也只有懂得技术才能使战术不是空洞的，但技术并不等于战术，还要学习战术，学习经验组织技术。

在整训中，除学战术与技术之外，还要注意纪律教育，这是军队管理的基本部分。由于长期于农村分散环境中，纪律也散慢了，这也直接影响战斗力的减弱。因此要整顿纪律，并使纪律成为全军自觉遵守的。要了解纪律就是战斗力。

建设部队上还要做到全军皆兵，政治工作者、后勤工作者、饮食员、饲养员……都要有必要的军事知识，起码的军事技术，不是平均主义的要求事务人员与战士一样，但一点不懂是不对的，那不易配合军事行动。

以上是说整训目的之“艺高”问题，下面再谈胆大问题。

艺高而胆不大，战斗力不会强。

军事训练和技术的高明，我们是不如敌人的，但是我们的官兵总是勇敢胆大的，这就是个政治问题，所以我们要重视政治质量的提高。政治工作靠我们连队支部党员先进分子来进行，须教党员先进分子率领中间分子帮助落后分子的提高，抓住好的模范例子提高普及之。

在训练时间分配上，军事教育多于政治文化教育时间，根据各部队具体条件可加伸缩，一般在政治工作很弱的部队，政治教育时间可占40%（军事教育占60%），政治工作较强的可只占30%（军事教育占70%）。但虽军事教育时间多于政治教育时间，可决不能

误会军事重于政治。上述时间分配只是指正式教育时间，部队政治活动从各方面加强。应利用各种可能时间进行。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是我们革命军队的本质，任何人不应忽视，这就是我们整训的原则，这是实现战争这一任务中的一个具体重要问题。

(二) 生 产

毛主席号召我们自己动手解决困难，就是进行生产工作。根据地经过七年的战争与敌人掠夺破坏，加上连年的灾荒，财力有很大消耗。因为敌人存在，须要有足够数量的人民军队来继续对敌斗争，保护人民，保卫根据地，而因物质的困难，军队本身生活亦日渐降低，过去虽然吃苦耐劳，为人民利益而战流血牺牲，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是要继续发扬的，但我们决不是盲目的吃苦，在不增加人民负担的条件下，能够改善自己生活而不去改善，这也是不对的。

为增进根据地的财富，减轻人民负担，部队劳动力的利用是占着重要的位置。同时，改善部队生活的唯一出路就是自己动手进行生产。所以生产运动，我们必须认真抓起来。

今天敌后平原的我们，虽然目前还不能和陕甘宁边区丰衣足食的情况一样，但从生产中解决一些困难是可能的。生产条件是有的，冀南区部队和机关，在他们处处碉堡据点林立的小方格子里面，还能生产，自供粮食、棉衣就可证明，冀鲁豫区部队从今春初步生产中亦证明能够进行。

生产中间我们的口号是**武力与劳力结合，部队与生产结合**，把生产工作列为军政工作重要任务之一。生产是一门科学，我们号召我们军政干部来研究生产工作，要精细组织研究进行。我们军政干部要亲自动手来领导生产工作，否则不会有效果的。生产种类：以农业为主，手工业饲养业为副，反对带投机性质的商业，一般直接供应部队本身需要的商业尚可进行，否则不适当。在处理生产成果

时,要公私两利公私兼顾,成果 20%归公与改善部队生活。超过生产任务的生产产品,以 80%归私,20%归公。只有公,是不能提高生产情绪的,也不能达到大规模生产的目的。

(三) 群众工作

首先使我们全体指战员都有群众观念,要使每人知道,我们作任何工作,都是为了人民,打仗是为了保护人民,生产是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改善部队生活,使部队战斗力加强,能更有力量保护人民利益。同时使大家知道,一切工作离开群众就不会有任何成就,没有人民拥护,我们部队就不会壮大。所以一切工作言论中行动中,都要照顾群众,为了群众,□□群众,任何时候不能离开这一点,特别干部要注意群众观点,要深刻了解,军队中与群众观点相反的就是军阀主义,我们天天要洗脸,时时要防止才好。

其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精神,必须恢复,使每个战士,精通拥政爱民公约,精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新战士入伍后,必须学习这门功课,干部战士都要精通,经常检查,促其彻底实现。

此外,在群众工作上,我们部队今后每到一处,都要与当地政府和群众团体发生关系,与农会发生关系,在当地政权群众团体统一计划下,帮助进行其工作,在南面几个分区,帮助减租减息反贪污、优抗等工作,冀南各分区应帮助群众救灾、捕蝗虫等工作。总之,对群众有利的事,我们都要去进行,尽力为之。

趁抗战七周年纪念之际,特提出关于执行三大任务的问题,我所谈的,还只是三大任务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只作全军同志的参考,希望大家继续研究执行。我深信这三大任务是会在我军中更好的实现起来。

(原载 1944 年 7 月 5 日《战友报》第 66 期)

冀鲁豫、冀南一年大事记

(1943年7月至1944年7月)

冀 鲁 豫

1943年

△6月中旬李顽(仙洲)率部北犯,配合敌人向我进攻,经我坚决还击,即行溃败南撤。计战斗连续进行45天,大小战斗72次,我七团团团长龚世英,十一团政委刘仁贵二同志光荣牺牲。

△7月5日夜,开始讨文(大可)战役,全部获胜,俘旅参谋长以下官兵数百。碉堡七十余被扫光。

△7月中旬召开敌伪工作会议。

△七八月间伪逆杜淑进犯卫南根据地,我集中主力向敌猛攻,将敌二旅全部解决,连前次官桥营战斗、共生俘敌副旅长以下官兵千余,毙伤800。

△8月边区各界,伪国民党反动派撤消河防部队包围陕甘宁,及李仙洲进攻边区,召开制止内战挽救危亡万人大会。

△8月19日,四分区主力对李旭东及伪四十六师师部展开猛攻。同日杜淑由西南来援,亦同时被击退。李逆五旅全部及伪二旅之吴洪业营全部就歼,李逆带伤,涉水潜逃,共俘伪1200余人,缴机枪12挺。

△8月初,区党委军区再次颁发深入整风指示。

△8月30日,全军区一个调查研究评判揭晓,张同钰、赵凤岐、江川等30同志获奖。

△10月8日,敌出动进行跳跃式试探性扫荡,12日大举向中心区进犯。我一面坚持腹地斗争,一面以主力转移到外线,向敌人心腹奔袭,曾攻东平、平阴、考城、濮阳四县成,拔掉敌伪据点碉堡60余处。

△10月间,我五分区继续扩大反扫荡战果,光复曹单地区大块国土,克据点碉堡27处。

△11月2日,我四分区主力以三速战术袭击延津城。

△11月间,军区政治部研究思想领导问题。

△11月25日,国际友人、朝鲜独立同盟,召开盟员大会,决定进一步开展工作,深入敌占区扩大宣传。

△11月26日,区党委召开高干会,确定了对敌斗争,发展生产,深入群众,深入整风四大任务,战友剧社演出李秀成之死四幕大剧。

△12月16日,伪第二方面军司令孙逆良城乘机扫荡。遣调主力进占我濮县。我主力一部于16日进击孙逆巢穴八公桥,将孙逆司令部全部歼灭,毙伤官兵500余,生俘伪总参谋长以下官兵500余,孙逆由水东调来的增援部队两营,于21日在北上途中,被我部全部歼灭。由此濮阳大块国土再度被我光复,至此反扫荡战告一段落。

△12月23日,鲁西南各界为秋季反扫荡中光荣的牺牲者,五分区司令员朱程、专员袁福荣、民一团政委魏明伦、副主任何楚雄等同志举行追悼大会。

△12月,军区提出主力兵团整训任务。

1944年

△1月18日,边区各界庆祝贾副主任60寿辰,军区规定1月

15日至2月25日,为拥政爱民运动月。制定拥爱十项公约,地方政民也掀起拥军热潮,全边区均沸腾着坚毅和团结空气。寿节前后处处锣鼓,增添了根据地空前未有的活跃、欢愉。

△1月18日,军区颁发供给训令,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

△2月7日,我党少数民族的优秀干部,回民支队支队长马本斋同志病故,于鲁西北张鲁集举行万民公葬。

△2月23日,军区行署召开边区生产会议。

△3月16日,军直举行生产动员大会,苏政委号召组织劳动大军,并确定实行二八分红公私兼顾方针,接着展开全区热烈的生产运动。苏政委、闫参谋长、黄敬、张霖之同志,均亲自下井掘泥种菜。军直并远赴×地,在战备之下突击开荒1300亩,四分区春季开荒4000余亩。

△3月20日,《战友报》周年纪念,军区发出加强《战友报》的决定,各分区先后展开爱护党报周活动。

△3月20日,区党委召集各直属机关党员干部500余人,作整风大动员,次日区党委整风队开学,各分区亦先后抽调干部成立整风队,全边区开始进入深入整风阶段。

△4月前后,根据地人民踊跃参军,大批新战士骑马披红,前呼后拥的涌进部队来。

△4月20日,军直及四分区召开干部大会,欢迎扬勇副司令员返回边区。

△5月11日,二分区部队为保卫边区麦收,于昆张地区展开全面攻击,至15日,5天内共克据点20余,俘伪中队长以下官兵1100余,将“九二七”所失地区完全光复。

△5月28日,攻克清丰城,计:俘日顾问7名,伪道君以下1200名,缴载重汽车2辆,机枪20余挺,清丰全部无敌踪。

△5月21日,我四分区,与驻双村营准备抢粮的,伪十一军七八两师及特务团展开血战,毙敌300余,缴轻重机枪4挺,我分区

参谋长胡乃超同志光荣殉国。

△6月5日,军区政治部颁发,战场纪律、群众纪律奖惩条例草案。

△6月上旬冀鲁豫分局党校成立。

△6月16日,我五分区在郝庄俘伪少将副师长以下官兵140余名,并毙伤伪副团长以下官兵40余名。

△5月29日至6月4日,我一分区在打击冯二皮抢麦中,缴获机枪14挺,毙俘伪团长以下官兵750余。

冀 南

1943年

△7月,天旱不雨,粮食恐慌,部队于忍饥坚持斗争中,军区指出生产开荒号召,要求每人种地1亩。

△7月,军区发出开展运东、卫东工作指示后,该地工作大事开展。

△8月,军区发动拥政爱民运动,订出拥爱公约。

△11月,区党委总结第9期对敌政治攻势。

△12月,敌在平汉路东以1500兵力进行“扫荡”,准备大肆枪杀,我主力配合民兵在腹地斗争,截击敌人,毁坏运线,使敌“扫荡”计划完全失败。

1944年

△2月军区召开政工会议。

△2月中旬,部队整训开始,巩固思想,巩固组织,着重进行反军阀主义教育及支部建设。

△3月,召集除奸科长联席会。

△3月,区党委号召部队在生产中解决两个月食粮,6个月菜

金,1套冬衣。各地均掀起生产热朝。宋政委、行署王主任、朱主任也都无例外的赤着脚拉犁开地,经常“早到迟退”,处处走在大家的前面。

在接敌区游击区的部队,不能白天生产就在夜间进行,现平均每人种地2亩以上。

△去年7月到现在,冀南的生产救灾工作做了5件大事。

一、发动群众种□□,由政府贷种,解决了冬食困难。

二、政府贷麦及帮助群众种麦。

三、组织纺花织布,支持贫苦农民。

四、发动由冀鲁豫推运粮食,给运费。

五、春耕贷生产粮,组织互助组,变工队由公家支持发粮。——老百姓说:“八路军5件大事做的好,要不得饿死多少人!”

△3月19日成安、临□等日寇配合伪□□合围我卫县以南地区,与我一分区主力接触,展开巷战,经激烈的肉搏冲锋后,计毙伤日军40,俘伪团长以下90余,缴机枪5挺。

△3月29日,吴城□储队向我某主力包围,我发起反冲锋时敌大批缴械,其余全部被我解决计:俘伪官兵300余,缴机步枪170余支,掷弹筒3个。

△4月9日至26日,山东敌人1000,伪2000余,连续对七、三、四分区进行抢粮扫荡,各分区均予敌以反击。

△4月24日至26日,我四分区部队向邱营路展开攻势。邱县城被我光复并攻克焦路、坞头、程寨等碉堡3处。

△6月12日,分局发出关于中央冀鲁豫分局成立,及冀南冀鲁豫两军区合并的决定,两区即根据中央决定实行合并。

△6月17日分局发出表扬模范的指示,25日军区号召在七一、七七间举行连队群英大会。

(原载1944年7月5日《战友报》第66期)

滑县群众是如何发动起来的

(1944年10月)

赵紫阳

《平原》编委会按：

群众运动不能深入的基本原因，是我们群众观念薄弱，以致在领导方法上的包办代替束缚了群众的自动性与积极性，滑县工作是在纠正包办代替，实行大胆放手，从群众切身利益现有的政治经验出发，发动起来的，这是滑县工作成功的地方，个别区（二区）村工作未搞好的教训，就是包办代替，没有在实际工作中转变。

赵紫阳同志这篇文章从头到尾贯注了从群众中来的领导方法，望各同志读后详细研究。

滑县的群众，麦前展开了民主斗争，麦后进行了查减，开展了佃雇独立自主的运动。几千年来被封建地主压迫下的农民开始得到了解放，在某些地区（六区及七、九区一部分村庄）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短短的五六个月当中，农村中间真是两个样子。农民都是说：“现在和过去不同了，成了咱们的天下”。过去在村上谁也看不起的人，现在都当起家管起全村的大事来了。有的竟作几个村的联合农会的主任、委员、代表、管起几个村的大事；而向来是哧哧有势的地主、劣绅，却对向来被自己脚下踏的人们低了头，农会说什么是什么，不敢打拗，并且还得提心吊胆，怕开会，怕斗他或再斗他，对从来自己仗势欺人的小孩也不得不谆谆嘱咐“小心点，免招惹是非”。地主们的尊严被农民的斗争打垮了。群众的生活也和往年不

同了,春天正没办法时,斗争分了果实,许多人没有卖东西,没有借高利贷,度过了春荒;麦秋组织看青,分看青粮,尤其是佃户和雇工,生产更和往年不能比;六区大部分佃户吃到明年麦后都余粮,佃户要地已成一种风气,有的已要了。春天到现在,6个村佃户要地的33户,要地158亩多,而大部分都计划到今冬明春再要地。他们掌握了地经纪,有组织地压低地价,而卖地的却成了地主,有的被斗了争,地价抵罚款,有的为了躲负担,或卖地减少目标,怕群众斗争他,当然还有卖地是为了威胁或报复佃户的,目前地主卖地也几乎成为一种风气了。总之,半年以来,农村是有了天大的变动。

然而,这种“反常”的大变动,不是容易的,群众是用了极艰苦的斗争挣下的。

清算不法地主恶迹的民主运动

私仇与公愤

地主残酷的统治,对农民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和剥削是多方面的。不仅有旧法所保障下的“合法”的压迫剥削的制度和习惯,且有旧法亦不允许的罪恶行为;不仅有对农民一般的共同的压迫和剥削,且有对每个具体农民的特殊的压迫和剥削;这就造成农民对地主的“私仇”“私恨”。这种“私仇”“私恨”,正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压迫的具体表现。这不一个人对一个人的问题,正是残酷的阶级压迫。这种压迫表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极其复杂的,真是有“如海深”、“如山重”的如杀人,诬告,非法捆绑,侵占土地、庄院、借故勒索讹诈、强奸、挑词架讼、1940年地区变质后的通敌暗害等等。农民在这种剥削压迫下面,有因之破产,有因之丢了性命,这种“私仇”“私恨”,农民是死也不能忘记的。这种“私仇”“私恨”,在群众看来,比加予群众一般的共压迫的“公仇”“公恨”(反黑地反贪污)要仇恨得多,农民首先体会到地主的压迫不是“公仇”“公恨”,而是“私仇”“私恨”。因为这是非常具体,与自己的利害关系非常明显

的。过去的经验是农民一旦有了机会，是一定要报复和清算的。我们要让农民翻身，就必须允许农民来报自己的仇，雪自己的恨，而群众不在自己能洗去了这些仇恨以后，也决不会认为是自己已翻了身的。

过去的民主斗争，内容为我主观的想象来限制了，仅强调了“公仇”“公恨”而忘掉了“私仇”“私恨”，这是从上面来的。不是从群众当前的要求出发的。“公仇”“公恨”，反贪污反黑地既然是大家的仇恨，从来没有发言权的贫苦农民，自然不能成为领导者；因之，民主斗争的领导权就多半落到中间力量手里，广大贫民的积极性是不会很高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整天忍饥饿而奔波□□劳动，从来很少参加村的政治活动。地主的贪污，行私舞弊，群众很少知道，他们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清算与过问这些事，在觉悟程度未到一定的水平时，常是不积极的。

滑县的民主斗争，是□□重地组织农民对地主的“私仇”“私恨”的，不是先从定见出发。“民主斗争就是限制于反贪污，反黑地的斗争”，“而是从农民对地主仇恨出发，把每个农民对地主的仇恨组织起来，私仇结合起来，这就是大家的仇恨。把不同农民对地主的不同的具体仇恨汇合起来，成为公愤的。这公愤，大家的仇恨，是建筑在每个农民的“私仇”“私恨”的基础上的。但对农民共同要求的“公仇”是否放弃不管呢？同样的“公仇”既为农民对地主的仇恨，也是允许并赞助清算的，把“公仇”和“私仇”结合起来，把农民对地主压迫者的仇恨，组织在一起，给他来个清算，农民是由“私仇”而认识到“公仇”，公仇和私仇相结合，一方面提高贫苦群众之积极性，也可以把广大的中农群众及中间势力组织到斗争中去，使地主完全孤立起来。成为“孤掌难鸣”。

滑县就是针对着农民对地主的仇恨，确定了民主斗争的内容及政策的。滑县的群众就在这样的斗争中，吐诉了多年不白之冤屈，报了自己多年要报而不能报的仇恨，冤既伸，仇既报，便人心大

快。

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是为了斗争，但组织必须成为群众自己的事情，不是单纯干部的捏合，而是群众自己结合。因此组织，应是在群众“动”的当中进行，群众由小动变大动，组织就由个别变为集体，脱离了群众的“动”是组织不起来的。

鼓动和调查是组织起来的两件大事。但鼓动和调查必须是群众“动”的当中来进行。鼓动是为了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及斗争勇气，过去一般的光是采用干部对群众的宣传和教育，但群众的觉悟和勇气不是用干部的教育就能解决全部问题，他只能在一定的水平上起他一定的作用。群众的勇气通常是看到了力量时才会提高，要群众看到力量，一方面是要干部坚决勇敢，给群众以勇气，以信心，采用农民喜好的方式，兴风作浪，敢作敢为，不能拿出书生习气、闺女作风、畏前惧后，琐碎复杂，使群众看到你的神气就增加三分犹疑。但最基本的是农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时，勇气才会提高，思想才会起大的变化。农民看不到自己的力量（现实的具体的力量），任凭你说的天花乱坠，胜利如何有把握，仍是不会轻易相信的。因此，鼓动还应有群众自己的鼓动，有行动给农民的鼓动。当群众未组织起来时，是感不到自己的力量的，当群众一旦组织起来后，互相坚定，互相鼓励，积极分子看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使自己更加积极起来，群众受到积极分子的影响，看到大家在一起，有了信心有了勇气，都看到了力量（力量即是大家），有了“群胆”。因此鼓动工作，必须是在群众自己“动”的情况下逐步提高，必须是群众教育群众，群众的行动教育群众。积极分子对中间分子落后分子的鼓动，我们有些地区采取了这个方法，群众积极性及勇气就提高了，有的把群众变得死的，被动的，不让群众“动”，在非常“静”的状态下，干部在耐心的(?)细致的(?)进行鼓动，他企图教育好群众再让他“动”，他企图拉长个别和小组鼓动时期，为了提高阶级觉悟，愈

鼓动群众越觉办不了事,情绪更加低落了。群众说“你说的再好,光我们几个也办不了事”,群众意见是对的,深值得我们反省。

调查是发掘和集中农民对地主的仇恨。但农民虽满肚子怨仇,在没有看到“时机已到”时,是不肯随便讲出来的。怕的是仇不能报,反招惹是非。农民只有在看到了力量认为可以报时,才会吐诉出来。由此调查亦必须在农民行动中进行。在行动中,农民逐步提高了自己觉悟和信心,对地主的仇恨才会逐步地讲出来。首先发现积极分子,收集积极分子对地主的仇恨,依靠积极分子的积极活动、酝酿,一般的群众看到有人领头,便来参加。

人力愈多,力量愈大,农民的胜利信心愈大,伸冤诉苦的也就愈多。许多这样的事情,在斗争将揭开的时候,农民又提出了自己的冤屈,揭发了地主更多的罪恶。有的在斗争大会上,看到了大家的力量,才提出了自己的冤屈。许多村庄,是先有一部分群众,为了某一种仇恨而在组织,开会,准备斗争地主。由于这一部分群众的活动,刺激了另一部分群众提出其他的仇恨,这就是群众的要求,是随着行动来提高的。在每一个斗争中,群众揭发地主的罪恶,都是愈来愈多的。要想不叫群众行动,依靠干部单纯的调查,单纯的鼓动,而和群众的自我活动脱离起来,结果群众愈来对我愈冷淡。

群众在组织起来当中,由于怕地主发觉逃走,或设法破坏,开始常采取隐蔽的活动,在这一阶段,主要是组织骨干力量,主要是中农以下的贫苦农民,因为“都是自己人,干斗争,与地主说不上,不致跑风”。而对中农以上的群众及富农,除个别与要斗的地主有深仇者外,很少争取活动他们。因为他们动摇,不敢干,不相信“穷唧咕”的“胡闹”会成功。在大部分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就是骨干力量已形成时候,活动就由隐蔽转向了公开。这种公开活动主要是显示力量,猛烈地扩大组织力量,争取动摇的一起来干。这一阶段非常短促,而又非常紧张,群众公开的开大会,宣布要斗的地主的罪恶,全村实行了签名运动。而对要斗的地主即设法予以监视,有

的派人监视、站岗,对罪恶极大的地主干脆把他扣起来了。农村中,顿时显出了农民惊人的威力。大部分的中农看到胜利了,积极地跑到群众当中去,参加了斗争,提出了自己的仇恨,暴露了地主更多的黑暗和罪恶。中间力量看到大地主大势已去,怕在群众当中遭到了孤立,也赶快签名报到,即与大地主共同作恶的次要分子因怕祸延己身,也投降了群众,供出材料,并允许当场作证。总之,都争先恐后的签名,都怕被人看作与顽固分子一伙。于是,农村的大多数站到群众方面,要斗的大地主遭到了孤立。因之,群众只有在“动”的情况下才能组织起来。群众在行动中显示了力量,提高了胜利的信心,才能把动摇的,落后的群众带领起来。

总之,群众的组织与行动不能脱离。群众是在不断地由小动到大动,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的。群众组织起来是群众自己的事情,不是要群众不动的,等待着我们去组织去捏合。

斗争热潮

群众的斗争形式采取说理,叫“说理会”,也叫“诉苦会”。在这个大会上,真是有冤伸冤、有仇报仇。这种说理,与过去任何时候的说理都不相同,是农民占绝对的优势,地主处于绝对劣势下进行的。农民有力量作后盾的。地主是在群众力量下面被迫来和群众说理的。

很明显的,不是这样的形势,地主当然不会允许农民来和他讲理的。因此,说是斗理,又是斗力,理和力结合的非常明显非常具体。农民是讲理,但因自己有了力量就不能允许地主不讲理,不允许地主的强词夺理,当他恶理强辩时,群众就要以力量威胁之,“反对乱鸟理”(滑县土语)的口号就会普遍会场。群众的愤怒、威风,会迫使地主不得不低下头来。参加斗争的群众,对出面说理诉苦的农民以有力的支持,群众的齐声呐喊、表决,群众性的对证,处处给地主以力量的威胁,平日会花言巧语、没理能说三分理的地主,在这种情况下,也竟目瞪口呆了。说明没有理,巧辩不允许,真是理穷词

尽，群众愈来愈勇气愈大，地主精神上处处受到打击，气焰低了，不得不向群众承认了错误。农民胜利了。

斗争中，农民逐渐采取了联合行动。一村斗争，周围村庄的农民参加援助。一个时期，农民几乎整天忙于斗争了，今天应这个村庄之邀，明天赴那个村农民的请。每个斗争对象的罪恶和斗争中的窘态，农民到处传说着，大街小巷，都是谈论着斗争，真是轰轰烈烈，风起云涌，大有“山洪爆发”之势。这种宏伟的行动，给农民思想上的变化极大，鼓舞了农民斗争热情、勇气，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有些村庄本来自己的斗争尚未就序，参加了外村的斗争以后，鼓动了自己勇气，周围村农民的情绪，给他们自己以莫大力量。情绪和勇气大大的提高了。斗争的村庄的农民，看到外来援助的农民，信心和勇气更高了。农民觉得有了助手，有了靠山，积极分子在鼓动群众的斗争勇气时，常常提到外村农民的援助，农民的大联合。“不要怕，咱村斗不过他，还有咱这一带的农会来帮咱。”地主怕的是农民的联合会，地主到处反映是“有错说，叫怎样怎样，不要开会”；“要开会咱村自己说，可不要叫各村来。”农民的联合行动，给地主精神上很大的威胁，一到说理的场所，看到乌鸦鸦的一片陌生的面孔，先就软了三分。地主在广大的（不是一村而是许多村庄的）群众面前失了体面，伤了尊严，骂名在农村中被广泛的传起来。这种互相援助，互相鼓励，互相观摩的联合，使农民的斗争经验更加容易提高和丰富起来。一村的斗争，成功的失败的地方，在各村农民中展开了酝酿和讨论。成功的为各地农民所模仿。今古营的斗争形式，很快为各地农民接受了。农民学会了如何斗争，如何说理，如何主持会议，而且，农民更发展和创造了新的东西，愈来愈好了。但联合必须建筑在群众自己的要求上，不能使干部勉强的结合，不然就要发生外村包办本村群众的斗争，或本村群众因怕别村分果实，给自己惹祸而反对。联合规范的大小，要看斗争对象的罪恶的大小，及群众仇恨程度，不能小题大作，机械搬运。寺台村老卜为全区人民所

仇恨，斗争时万人参加，全区人民都发泄了自己的仇恨，人心大快。

在讲理中，有的较和平，有的则很激烈，吐唾沫，打耳光，□萝卜，甚至乱打，至于漫骂，严词责斥更较普遍。斗争地主低了头，向大家认了错，农民往往把他扣押起来，直到完全答复了农民的要求（罚、赔偿损失）并有人担保，规定期限，才予以释放；有的是有人担保不致逃跑，释放后再调解的。这些都是地主罪恶应该的报应。罪恶愈大，农民仇恨愈大，行动愈激烈。农民的眼睛是很清楚的，有轻有重，分别的很清楚。农民所以如此对待地主，正是过去地主曾数倍于今的对待了农民。今天农民翻了身，有了力量，当然是报仇雪恨的。过去我们曾对农民的这种行为表现了害怕，嫌太粗暴，太不文明，害怕刺激地主，想叫农民对地主客气些，文雅些，讲理不要用力，这样就束缚了农民，就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斗争热情，就不能在农民的充分行动中，鼓动出新的更大的力量，限制了农民积极性的发挥，保持了地主在农民面前的，不可侵犯的尊严。这种尊严不给以损伤，地主是低不下头来的）。是的，农民的暴力行动，确实有些不很文雅，确实使地主头疼，但这些正是农民自己仇恨，自己力量表现的形式。你说这是太粗暴了吗？农民就是依靠这个粗暴的暴力使地主低下头来的。农民用暴力的行动，丢了地主的体面，伤了地主的尊严，震动了地主的统治。农民亲眼看到了地主是在这种暴力的行动下面，屈服了，不是依靠工作人员，不是依靠政府有兵的逮捕扣押，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制服了地主、自己获得了胜利。农民的信心更加增强了，感觉到地主并不是不能在穷人面前低头的。因此，农民对地主的斗争，不是“文雅”所能解决问题的。客气是不能使地主低头的。地主向农民低头、屈服，并在农民力量面前感到恐怖和战慄后，才有可能。而这种暴力行动，正足以使地主感到恐怖和战慄的。或者是依靠政府，依靠少数干部的蛮干，来打击地主，这是群众能否发动的关键。而滑县六区的群众，正是以自己力量取得了自己的胜利的。

关于群众的暴力的行动,曾认为是一种违背抗日秩序的行为,应当制止。地主也是以此来跳叫的,说什么“保障人权的法令”,但农村的社会秩序,在农民未翻起身来,秩序并非抗日的民主的秩序,是地主封建剥削统治的秩序。农民的翻身、暴力,对这些秩序来说是一种“乱”;但“乱”——这种秩序不但没罪,反而有功,因农村民主秩序的建立,非要对旧的封建秩序先来个破坏,也就是非要“乱”一下不可的。群众的暴力行动,正是为了建立这种革命秩序。地主统治者不低头。这种秩序是建立不起来的。应当认识农民是要建立革命秩序,不是破坏革命秩序。农民运动一起,地主看来“不秩序”,农民看来则是“秩序的”。

总之,对农民的行动,应当放手、大胆,不要束手束脚的限制群众,应当让群众在对地主的斗争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勇敢和威力。这种勇气和威力愈大,对封建势力削弱愈加深刻,群众的解放事业的胜利愈有保证。但也不是,要我们故意制造一些过急的斗争形式,让群众勉强表演,或强制群众进行激烈斗争。

关于“左”的问题

滑县群众之所以能够蓬蓬勃勃的运动起来,首先就在于滑县干部的思想,他们关心群众的痛苦,把群众的痛苦当作了自己的痛苦。他们看到了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决心来为群众解决痛苦,敢于支持群众对自己压迫者的斗争和报复,对罪恶极大的地主,愤恨异常,敢于让群众大大地斗他一下,不是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群众还未发动就怕群众“左”,就先去警告群众“安分守己”不要“过分”。经验证明,只有坚定的立场,不怕群众解放、翻身的人,才能带领群众去求解放求翻身。那些表面说要发动群众,但脑子装满了害怕群众动的观念,他们照顾地主,比关心群众的地方还要多;这些人是只能限制群众的解放,决不会把群众发动起来的。然而,我们曾一度认为干部的这种思想是“左”的,是过分的,是

只管发动群众不管统一战线的。是的，干部是主张重罚的，但对万恶的大地主，重罚一些，有什么可怜悯的地方？当然，不可否认，对某些地主的处罚稍有严重之处，但这仅是个别的，是在工作中难以避免的缺陷，决不应大惊小怪。

在干部的思想为群众接受以后（我们干部的思想对群众的斗争勇气以很大的鼓励和支持），群众真的行动起来。由于群众的充分发动，更加鼓舞了群众的勇气及要求。群众大干起来了。群众某些“左”的行动产生了（对次要份子的重罚等）我们便害怕起来了，要群众停止这一行动，但发动起来的农民，就不是那样的容易包办了，没办法，就强迫群众，硬说服，所谓“宁要政策，不要群众”的理论来了。工作人员奉了上头命令，硬向群众中坚持，群众便与工作人员发生对立。不了解群众“左”的纠正，是要建筑在自觉的基础上的，应在群众的行动中，总结工作，大家讨论，逐步提高群众觉悟，来逐步引导群众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某些村庄就是与群众共同讨论，开活动分子会大家检讨中使群众接受了领导的意见。

群众行动起来，产生“左”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对于“左”不是熟视无睹，或继续助长“左”的发展，那样是危险的；但亦不应泼冷水，强迫命令，这样亦是危险的。

包办代替

在群众斗争的准备阶段（即开始组织群众的阶段），还存在不少包办代替的毛病；主要的是准备工作，即组织工作与农民的行动相脱离，把群众变成死的、被动的、孤立的，由我们的干部去摆布。我们干部幻想于一切准备停当，群众教育得阶级觉悟高了，再让他们动。因此，有的就强调所谓“稳扎稳打，零打细敲”，用了一套复杂的形式，向农民身上套；但这是完全脱离了群众的。群众不行动，看不到力量，光说干，农民看不到干的样子，因此情绪低落。这种干部的摆布，不相信群众的结果，使组织群众不是群众的事情，是我们的事情；但群众不活动是组织不起来的，这在开始的一个时期，更

加严重,以后转变快的地区,农民发动的快,转变慢的地区,把准备阶段拉得很长,但未把群众的积极性提起来。有个农民干部说:“这一套与农民口味不适合,农民是麻烦这种复杂的,农民是说干就干,非‘□’不行”,意思就是说:非要在行动中来组织不行。所以这样子是春天检讨了过去的工作,把一切缺点归纳到鼓动工作不成熟,准备工作不细致,就是没有把群众教育好的关系,更加助长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复杂的幻想,真要企图把群众精雕细刻才行,这一问题对我的教育是很大的。我在岳营工作,就是在实行这种办法下遭到了失败的。其次,就是由于不敢放手使用积极分子,过去的村干新贵,使我们害怕了,还未动,就怕他包办,怕他突出,结果,就叫工作员代替了积极分子,每个干部分割一部分群众,群众之间很少连系,干部分割了积极分子与群众的连系,把他包办完了。由于这种原因,就使部分村庄培养不出领袖,群众中没有中心人物,组织就显得没有力量。

不从群众要求及水平出发,制造斗争,在脱离群众,成为少数人的蛮干,三区较严重(从略——详三区问题。)在六区有个别制造过激的斗争形式的,群众不爱开联合大会,怕分果实,怕联合大会杀了顽固分子;我们偏搞联合斗争,结果群众由斗顽固分子变为讲情,喊反口号,本村群众与外村群众发生了对立。

在六区,主要村庄的农民已发动起来,宏伟的运动,刺激了周围村庄农民的斗争热情,纷纷酝酿要求斗争。这种形式,要求我们放手,掀起普遍的群众运动;但我们代替包办成性,害怕自发斗争,已发动的村庄,干部不敢离开,害怕离开,农民自己办不好,干部离不开,周围村庄的群众斗争没人去领导,又怕他们自己斗不好,因此就限制这些村庄的运动要他等着,这样就把活活的群众的斗争热情冷下来,使农民更大规模更广泛的联合为我割裂了,群众更宏伟、更普遍的运动在我限制下,受了很大的损失。此点,是六区工作上一个很大的损失,殊为可惜。

注:以上主要是滑县六区的材料。

佃雇独立的运动

(内有滨河部分材料)

去年麦前,滑县在民主运动中,亦曾进行了佃雇的增佃增资工作。但由于主观上认为增佃增资已进行过了,即有不彻底外,亦属于零碎的,佃雇的要求估计不会很高,不可能造成大的运动,特别是民主斗争一起,干部视线完全转移到这一方面,对佃雇运动不感兴趣,因此佃雇运动受到了限制,成为民主斗争中附属的斗争,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展,发动极不充分。麦后检讨了这一缺点,认识到佃雇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他们迫切要求着解决,佃雇在农村还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因此决定贯彻查减,开展佃雇独立的运动。

群众把自己的运动造成一个阶级的运动

群众是整体的,历史上的农民运动(农民暴动,会斗蓬(蜂)起),都是把自己结成一个伟大的力量,都是先运动起来的村庄的农民,发展其他村庄,如此村村发展,在运动中结合起来。这种形式是农民自己所熟悉的,这种运动是群众自己的运动,是自己发展自己。因此运动带有非常大的威力,其规模和魄力是非常之大的。其速度亦常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抗战初期,我们的干部以经验少,包办不了群众运动,因此有些地区群众也是这样轰轰烈烈的搞起来了。据说,过去白色恐怖时代的农民运动,也是这样搞起来的。但目前我们有了一套固定框子,不采取农民自己运动的经验,常常把群众运动以村为单位把他分割起来,一个或几个干部作一个村的工作,作了这个村再作那个村,每个村的群众都是孤立的被发动,因此群众要迅速地发动起来,一县就非有几百个干部不可。群众过去自己的运动是轰轰烈烈,我们现在的作法,是零打碎敲,村与村的农民不是结成一体,先进村庄的农民与一般村庄的农民不是联系的结合的,而是从村庄到干部到村庄,不是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

的结合。因此群众不能在运动中形成一个整体的力量。农民不能在宏伟的运动中来受到鼓舞，思想上不能起重大的变化，不容易造成运动的热潮。此次滑县和滨河的佃雇运动，领导上由于大胆，让他们自己充分动。因此他们又形成了阶级的宏大运动。这种运动的形式，有的采取联合——即联合大会，有的采取村村发展的攻村团，由攻村团再走上联合。联合的形式，都是在过去已经过减租增佃、但还不彻底，各村工作发展上差不多平衡，在工作上没有明显的领袖意义的村庄，他们采取了相互联合。

未联合前，先是分村酝酿，抗联干部到各村启发，或召开各村积极分子会，由他们回去找佃雇商讨，各村讨论各村的问题。从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要求，然后再启发群众的联合要求。“不是一村的事，应当和外村共同商量商量，大家干才能成功。”然后由一村通知周围村之佃户及雇工来开会，共同商量。这种办法，是群众自己的要求，自己执行自己的要求。在群众看来，不是为了单纯给上边执行法令，而是为了解除自己的痛苦，是群众要求合理，合理变成合法，政府以法保障。我们的查减政策，不是先制造一套，硬到群众中坚持，是根据群众在讨论中提出的要求而确定的，我们的法是从群众中来，和群众要求相结合的。

联合的意义有两个：一是集中大家的意见，大家做出决议来，一是集中大家的力量，不仅看到一个村的力量，而且看到自己阶级的力量，以提高斗争的信心及勇气。大会的优点：是自己人召开，自己人主持，讨论自己的问题。许多大会开得很好，粉碎了不相信群众的那些人的说法，对于干部的教育意义很大。大会讨论是否热烈，就看是否发扬真正的民主精神：是真正的让群众来商量呢？还是有一个民主的形式？由于我们一向的缺乏民主作风，群众没有和我们商量问题的习惯，干部一说话，群众就当作一种规定，内心不同意也不提，这些必须充分的照顾到的。经验证明，只要群众认为正确，他作主，他就会认真负责联合大会的召开，对群众是一个很大的鼓

动,思想上是起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心不齐,大会以后心齐了”,“原来认为办不成,大会上却能办”。大会以前,群众有事找上级,现在群众有难题,常说“叫咱这一带的佃户雇工开会”,群众相互鼓动时,也是如此说:“干吧,怕什么,有事咱这一带的都帮助”。群众在会后,开始依靠自己了,大会鼓动了群众的情绪与勇气,也提高了群众的要求。未开大会前,有的不积极,或仅倒今年粮和柴,不倒去年的,大会后,连去年的也要倒,伟大的运动,给农民的鼓动意义是太大了!大会讨论了决议,规定了工作计划,这些决议是必须执行的,这些计划,是要按天完成的,这是群众自己的纪律,是群众自己的一种民主集中。因为相互联合的各村,都是水平相差不多的,故个别先进的村庄强迫大多数较落后村的现象不易发生;但农民的共同意见,对极个别的村庄加以群众的强制,亦是不可怕的,因为这是统一行动中难避免的现象。

分村执行,佃雇有了自己的计划和决议,回去就普遍展开了斗争,农民并不等待我们,便自己行动起来。许多地方在联合大会后,干部忙于会议,未及时到村上,农民却在热烈斗争,或者已结束了斗争,他们自己斗得很好,真出了干部的意料之外;群众自己事是能够自己去办的,而且办得好,有些村庄,干部早到了,农民为了贯彻自己的决议,要求立刻斗,但干部说“慢一点”,他要来进行“调查研究”一番,结果,群众不管干部自己干起来。为什么要分村斗争,不采取联合斗争呢?因为各村的斗争对象不同,要求不是那样的划一,各村群众解决各自的要求,容易具体深入。正因为是群众自己的运动,采取的斗争形式就不是划一的,没有一个框子能套住他们,都根据斗争对象不同,及自己的经验、觉悟水平,发挥自己的创造,斗争形式真是多种多样的,但又都是非常自然的□便于群众积极性的发挥。有的回去开群众大会宣布决议,第二天开始倒粮倒柴,或先集体搞一家,再分散各街的,这叫做“平楂”,先平了楂,其他的头就好剃了(就是打强点的意思);有的先讲理,再倒柴粮,梁

二庄佃户说“先揭他几条短处，压住他，提出要求，‘要什么，有什么’”，就是先使地主政治上占下风，实行政治揭发；其他有开雇工联席会的，这多半是小村，地主没有什么统治威力，把他叫庙台上，乱吵一起（气），最后也把问题解决了。

分村斗争后，就开联合大会集体检查、庆祝，有在此大会表扬模范的，佃户雇工经过斗争，情绪及觉悟更提高了，常提出新的要求，如捐枪，改选农会主任，讨论要地，掌握地经纪，讨论防止地主的办法，有的自己还订了会规（指纪律及组织生活）。总之，佃雇觉悟高了，真的站起来了，由于切身利益的体验，使他们民生民主，及更高级的要求。

攻村团的组织形式，多系在白板地区及工作发展极不平衡的地区采用的。一村群众运动起来，由群众自动的向外发展，村村波及，这种形式，农民是熟悉的，过去农民运动，大家是这样波及蔓延起来的。

首先在突破一点，一个村的佃户雇工首先动起来，在斗争大会或是举行庆祝胜利时，通知周围的佃户雇工来参加（用行政力量通知他也可以的）。目的，在于使一般的佃户雇工的要求迅速生长起来。首先动起来的佃户雇工的地位，在一般的佃户雇工眼中抬高了，无形中居于领导的地位，参加斗争后，各村佃户雇工自己开始酝酿起来，积极分子开始明显。已动起来的佃户雇工虽然自己胜利了，但感到孤立，怕坚持不下去，怕地主说“人家外村都没有，就是咱村坏”。拿话头威胁。因此，他们愿意别村也很快的干起来，大家联合一起，力量很大。因此，这时可以动员他们到外村发展，外村也欢迎他们去指导。这样村村发动起来，很快就成了运动的热潮，群众在热潮中，更加鼓动了自己的情绪和勇气。

滨河邵二砦，佃户雇工斗争胜利后，12个积极分子，便到外村去活动，选了个团长，名叫“攻村团”，开始向三个张故砦，及牛庄活动，并且有的攻到滑县太平庄了（后来叫抗联同志叫回，因为是滑

县地)。9天,张故砦,牛庄佃户雇工斗争起来,因离得很近,在一起举行了联合斗争,斗争后,影响更大,周围各村的佃户雇工情绪更高,纷纷要求4个村的积极分子再向外发展,活动,3天之内,10余个村的佃雇都斗争起来。在热烈的时候,有9个攻村团一起出动,蓬蓬勃勃,大有疾风扫落叶之势。

攻村团之出动,是建立在群众要求之上,行政命令是要失败的,滨河一区,有些攻村团是训练班出来的,本村的事还未办好,就去攻外村,外村不服气,说是看不起他,“你要攻我村,我还想攻你村呢!”攻村团到外村,不是找村长、找农会,而是找佃户、找雇工,大家都认识,不要谈大道理,主要是介绍自己的经过,根据自己的经过,来解答佃雇的怀疑,很现实、很具体,群众容易相信;活动方式多系秘密的,斗争由本村的群众自己干。

滑县大子相和这种形式差不多,佃户雇工斗争后,波动了一串子相、三县堂和几个板城。大子相的佃户雇工在那一带地位提高了,雇工主任王明月,因为斗争会他主持,那一带的佃户雇工都纷纷找他,叫他领导自己也办办。王明月的小屋里,整天挤满了人,都请他去领导。王明月分不开身,他有时找大子相佃户去,说“你是已经过阵了”。那一带的佃户雇工,就是这样运动起来的。群众在运动中结合起来,王明月成了那一带的领袖。

宏伟的运动中培养领导 建立领导组织和运动相适应

佃户运动,使我们领会了,只有真正是群众自己的运动,才能涌现出自己的领袖。群众一有了自己的领袖则更能指导群众运动,他集中了群众意见,并带领群众前进。

领袖大批的产生涌现出来了,群众的事情就必须由群众自己去办理,由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领袖去直接领导。但领袖的能力,不是天生的,要在领导的实践中不断锻炼,领导的威信,也只有在领

导的事业进行中,才能建立起来。此次佃雇运动,由于我们大胆放手,一切事情由群众自己去处理,由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去领导。出现了许多英雄和才子。他们在自己领导中,又大大的锻炼和提高了自己。由于运动的规模的宏大,不是一村,而是许多联合的村庄。因此也就产生了地方的群众领袖。王明月经过佃雇斗争,能在他那一带几个村指导几千人进行捕蝗运动,可以主持几百人、几千人的大会,能掌握自如,能处理几个村佃雇中的问题,且为大家所心服。这样的事情过去真是闻所未闻。他们所以能有这样的本领,就是在运动中丰富了自己的知识,锻炼了自己的本领。从此不难看出,过去的群众运动中,为什么不能涌现出大批的群众领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包办了,把群众领袖的事代替了,把他们借以锻炼能力的机会挤去了,一切位置占据完,群众领袖自然露不出头来。

群众在运动中建立了自己的领导组织,组织与运动是结合的,是相互适应的。所谓组织,是组织群众的行动,是为了行动(斗争);领导是领导行动,亦是为了行动。群众要减租增佃,就得组织领导这一运动。滑县群众是如何建立自己的领导呢?联合大会召开后,各村的积极分子马上会露出来,当场就建立了佃雇代表会,选择积极分子为代表。这个代表会的组织,就是为的领导群众这次的斗争。代表分了工,规定临时会议制度,这种方式是很好的。本来积极分子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来影响(领导之意)着群众,群众也在不自觉的状态受其影响,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原来客观存在的,加以组织,就是把这客观存在、但这是不自觉的状态,变为自觉的,提高一步。这种领导机关是群众自己的,是建筑在群众当前要求的基础上的。群众是如何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呢?什么样的斗争,建立什么样的组织,组织是为了进行斗争,佃户雇工在一起斗争,在一起开会,因此就建立了佃户雇工会,或叫联合会。这种组织是在运动中自然形成的,群众认为是自己所需要的。代表会、佃雇会,虽都带临时性的,但却是建筑在当前的群众要求上,群众

目前要这样行动,故要建立这样的组织,这样的组织与领导,都是应行动的要求而产生的。过去我们常是在群众行动中不建立组织、不建立领导,行动过去了,又来建立组织、建立领导。这些都是以我们的要求而非从群众的要求出发,组织和领导,好象不是为了群众的行动。由此可看出□□个群众运动代表一部分人要求,有一部分人参加、产生一种领袖,与之相适应的,就有一种组织领导的建立,虽然是临时的,但正因是临时的所以恰是当前所需要的。

群众领袖既然产生,就应大胆使用,代表会已经建立,佃户运动就应大胆交给他们领导,抗联干部仅应居帮助指导地位,帮助群众执行佃雇大全会及代表会的决议,不应因分村工作,而割断其领导。这一点有的作的较好,有的仍是包办代替。群众的组织领导既然建立,就应逐步提高。滑县六、三等区,过去民主斗争中发动了贫农及中农,产生了领袖,此次民生斗争发动了佃雇、培养了自己的领袖。因此,群众的事情应该交给群众自己的领袖去领导,过去抗联之小组,应宣布取消或改变性质,建立工农联合会,把群众领袖选举出来,正式转换了领导,抗联干部仅留一部帮助工作。

在滑县七区及滨河,仅在民生斗争中发动了佃户及雇工,因为广大的贫农及中农尚未发动和组织起来,故不能建立农民联合会,已发动的佃户雇工,仍受其自己的领袖——代表会来领导。抗联对佃雇的指导,通过其代表会,这样已发动和组织起来的群众,我可独自进行自己的活动。为了培养扶植地方干部,抗联干部在各区之小组(等于小区之抗联),吸取代表会主要代表参加,准备在发动农民的民主运动后,再在运动中产生农民联合会。由以上的经验,说明在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开展、领袖大批涌现、农民情绪正在高涨之时,也正是提拔与扶植群众领袖之时机,应立即大胆使用,应给以岗位,给以权利,以提拔干部。在运动中培养扶植群众自己之领袖来领导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斗争坚持下去 佃雇日常生活的集体化

过去,已有很多的教训,当群众大的运动过去后,领导者常麻痹起来,而地主则利用一切空隙来进行反攻。佃户及雇工,在日常生活与地主有多方面的“交谊”,经常出入其门,经常在地主面前进来出去,其关系,几乎贯穿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当佃户雇工集体向地主斗争时,地主在群众集体的面前让了步、给群众要求以允诺,当斗争过去后,农民又恢复到分散的状态,因之,地主的“反攻”来了,允诺的东西不给了,佃雇的斗争果实巩固不住,大者退佃解雇,小者“精神封锁”“比鸡骂狗”。特别是佃雇斗争果实中有一部分不是马上兑现的(有利习惯取消超经济剥削等),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去贯彻,农民成为分散的,以个别对地主,必然斗争不过。斗争是要积极分子领头的,分散,则中间、落后的群众与积极分子失去了关系,便不能独立的单独进行斗争,这样便大大便利了地主的“反攻”。

克服这个弱点,要使佃雇的日常生活集体化,以集体生活来贯彻日常生活之斗争。雇工佃户都必须单独组织起来,雇工为工会,佃户单独在农会里划成小组,把佃雇的领袖和群众结合起来。过去佃户分散编到农会小组中,正是使领袖与群众隔离起来,助长了群众分散状态。佃雇的单独组织,内容就是讨论日常斗争,一人的事大家讨论研究商量,需要时,随时大家来援助。在有利习惯及超经济剥削的取消上,为了坚持下去,应尽量求得行动的一致,特别在开始,还未造成一种习惯时更属必要,直到地主承认了这个习惯为止,这样,便可互相鼓动,互相督促,互相长胆,领导更易带领大家。

朱口村(滨河二区)过八月节时,佃户雇工先开会,怕地主捣鬼(不请或请得薄),决定分散集体过节,每家地主把酒费送到规定的地方,每家地主只能有一个人作陪,有一家地主仅上八个碗,没有

八个碟，佃户集体看□，那地主出了丑，不得不又端出了八个碟。出粪，各村都规定了统一的时期。每到出粪时，大家都在街上吃饭，地主没空可钻，不得不管饭。这是群众以集体力量对付地主从中捣鬼的办法。虽然这样长期下去恐难坚持（佃户自己可能也感到束缚），但目前未造成习惯，这种办法确属必要，将来地主承认了，佃户感到不必要这样作时，自然自己就会来改变的。

在滑县有些地区，佃户雇工的日常生活集体化，还未引起注意，可能给地主以空隙，将来在这方面可能更容易发生问题。

从行动中逐步提高群众

群众的要求及斗争内容，是随着群众的行动而逐渐提高的。群众在解决了当前的迫切要求后，新的要求会升涨起来，又成为迫切的要求，我们应当是永远的从群众当前的要求作起，而又引导群众解决新的更高级的要求。这样便可引诱群众步步提高。因为群众提高是一个过程，过程有长有短，但总是有个过程，过去我们是不了解此点的。我们什么都主张一次“彻底的”，但群众觉悟及要求却常常不是一下子能够接受我们提出的全部要求的。我们过去的毛病，就是硬要群众接受我们的全部要求，不然就不让他们行动，要他等我们说服了再行动，于是硬鼓动、硬教育出来了，宣传鼓动工作的神秘观点也出来了。岂不知，不叫农民行动，农民是不能提高的，教育鼓动不能完全代替了他实践的经验的，硬叫群众彻底也是彻底不了的。从群众当前出发，即从不彻底处作起，行动起来，逐渐就会彻底的。佃户的要求，常首先是减租增佃，然后才是超经济剥削，有利习惯的即关于股分问题及其他不合理事情的解决，都应是逐渐的。我们常常不作则己，一作就样样俱全，非群众当前要求是集中上来的，而坚持下去，只能是硬塞。回想一年前，减租增佃未进行，即曾把各样各色的应有尽有的问题提出来，结果提和不提是一样。今年佃雇运动中就证明：中心区的佃户和边沿区的佃户要求就

不同，群众没有走第一步，第二步就自然没有兴趣。即在中心区，开始要求亦都是不同的，有的只顾倒今年的、不顾倒去年的，有的只顾倒柴倒粮，不愿提各种习惯，但这些要求一旦解决了，又提出了原先不愿意的要求。有些佃户雇工原来要求低，联合大会后要求就高了，这也就是从行动中提高了。佃户经过了查减运动，要求更高了。七区提出民主、武装掌握地经纪，六区东南部斗争胜利后，提出了过去的问题，大种地使死牛、欠租卖了老坟地、去年没有增，这些都要求解决，由许多村的佃户雇工，提出过去的债务与地主“私仇”，由此则说出了过去的明减暗不减，而这些农民未行动前是不说的，行动提高了他们的觉悟，就提高了要求。

对落后及走里分子（指有贴里行为的佃户雇工言），应是从行动中逐步提高，一般的落后分子、或走里分子，大都与地主有封建关系或是历史关系，他们没有了解地主的“苛”和“薄”，一般的地主对他们也确实没有对一般人的那样苛薄，因此对这些人不能要求过高。

在群众已经起来斗争时，首先就需要内部的团结和一致。群众应是依靠自己干时，积极与落后的界线常易明显，积极分子最怕孤立，怕涣散，因此对走里分子，常常很仇恨，群众说：“要团结就要反走里。”群众为保持自己阵营的一致。是不允许有破坏行为的存在，必然要用群众力量来打击威胁，直到他改正为止。许多的贴里分子，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停止了贴里，开始跟着大家走了，有的向大家悔过承认错误。群众为保持自己行动的一致，亦不允许有个别的走里及落后分子例外的，要用群众力量拉着他们一道走。争取落后分子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先孤立，只有孤立，他才能跟着走。落后分子拥有多数群众，斗争决搞不起来的。这种以群众力量强迫他们跟着走，并不是可怕的，它是群众中的一种民主集中制。但我们应指导群众，把被强迫的缩小到最小的限度，就是要照顾争取落后的。

落后分子走里分子跟着走了,行动了,就要在行动中帮助他了解地主的“薄”,来认识到斗争的正确,提高他们的觉悟。地主的小恩小惠的目的,是为了多剥削、少出东西,但当看到落后分子及走里分子也真的跟着大家来要东西了,地主当然是要来计较的,地主的“薄”就暴露了,群众了解了他的“薄”,就以“薄”对“薄”。七区不少的这种生动例子,许多的落后及原先走里的佃雇积极了,原因,就是他原来认为自己掌柜“厚”,谁知一要东西就“薄”起来,于是佃户对地主也认起真来了,和大家一样,少一点也不行。有的说“如这样和我算小帐,咱们干脆算个总帐吧!”把过去吃亏处,原来不愿说的都说了。有的看到别人斗争积极、很快从地主手里得到了东西。自己不积极,后来失望了,才知道东家的“厚道”,没有斗争可靠,也积极起来。

总之,对落后分子及走里分子,首先就是以群众力量拉他跟着走。(要求不应太高,跟着走就行),只要跟着走,就有机会使他看到地主“薄”,就会提高他们觉悟;不拉他跟着走,就没有在实践中提高的机会了。

佃户雇工的运动应当是独立的运动

要使佃户雇工得到充分的发动,必须使佃户雇工形成自己的独立运动。过去佃户雇工不能真正被发动起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佃雇的运动为另一部分群众所代替,把佃雇运动当作了从属的次要的,因此佃雇不能在自己充分的运动中受到锻炼,看不到自己的独立力量,而培养不出自己的领袖来。滑县此次佃雇运动规模所以如此之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己进行了独立的运动。同时因佃雇独立运动而造成自己暂时的突出和孤单,是群众发动过程中难免的现象,因为群众是由一部分的发动走上整个的发动,不能设想:一次,一个斗争就把所有的群众发动起来的。有的地区提出“混合性的斗争”,来以佃雇为主并发动非佃雇的基本群众也来进行斗争,这种斗争,一经发动,由于非佃雇的群众在数量上多于佃户及

雇工，民主斗争的范围及规模常化民主斗争要大，很容易转向非雇佣基本群众为主的斗争，而使雇佣运动实际上变为从属的，影响其充分的发动。如果在雇佣斗争某一个地主时，刺激了一般贫农对他的仇恨，要求斗争，那时只有从群众要求出发了，但我们指导观念上，不应以为“混合性斗争”比雇佣自己运动好，而有意的去组织和启发它。

我们的“框子”是群众运动最大的障碍

滑县雇佣运动的初期，主要是以繁杂的形式来摆布群众，为了把群众教育得觉悟，拿出许多会议来让群众开，如××村光会议的名字就有六七种之多。群众为了斗争果实，被迫的应付着，但积极性自动性就一点也没有了。其次就是害怕群众斗争，用评议来代替，限制了群众斗争热情发挥，但自提出大胆放手以后，有些地区又把大胆放手当作一个“框子”，认为是“大干”就是粗枝大叶，于是又制定了“框子”来套群众，不叫群众酝酿，就来开联合大会，群众不要联合，就来联合，结果大会上不是群众的讨论，而是干部的“发言”，不是群众的热闹，而是干部的在那里“大干”。

滨河有些地区嘴说是放手群众运动，实际上有一个框子要强迫群众去戴。我们提出打退地主反攻，农民对地主反攻的认识是倒粮倒柴打了折扣，彻底倒粮倒柴就是反地主反攻，可是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就是“倒苦水”，本来群众的苦水来倒是应该的，但没苦或不愿倒时也非得倒不行，不倒苦水就是不彻底，就应反对，就是走狗，于是出了逼倒苦水的现象。有些群众为了怕说走狗，或是怕不叫增佃，就来应付我们，没苦亦倒，把诉苦成为笑话，有的因不愿倒苦水便不斗争了。

有些同志认为非倒苦水觉悟不能提高，但试问这种硬逼着倒，觉悟就能提高吗？我们（在）这个固定的格式下脱离了群众，使有些群众本来在行动中可以逐渐提高，因怕倒苦水，而停止了行动；这在另方面来说正扩大了“走里”的人们，亦正便于地主的收买了。

在斗争普遍地掀起后,农民情绪高涨,要求减租、增佃、增资,纷纷欲动。而地主□增佃增资□不可免,为了避免大斗或罚,主动让步,愿意减租、增佃,找佃户、找雇工,向佃户要求不开大会,不揭短处,向群众承认错误(没有执行政府法令),这给农民心理上以变化,而在今天地主请求下,气就消了不少。激烈的斗争形式必须有农民的仇恨作基础,在此种情况变化下,我们不改变斗争形式,仍非要一个一个的经过大会斗争诉苦不行。农民认为这是多余的,但我们决定不经抗联允许地主不得减,农民不得要,否则双方犯罪,有的农民已把粮食背到了家,又叫背回地主家里去,重新斗,开会,诉苦,但农民重又把粮食背回家里时,仍是那样多,农民到底不知道我们开会诉苦是为什么?这种形式下,使农民的自发斗争变为“私了”的形式,因农民已感到不需要那样开大会了,但抗联又不允许,农民只有暗地和地主“私了”,共同欺骗我们,把农民的自发斗争,逼得成为了秘密。

执行政策中的“乱”和“左”

因为群众充分的行动起来,政策的执行比较彻底,但由于群众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执行上不是那样的划一,就显得“乱”。比如关于股分问题:有一律推平的,有保持活头顶大股的;去里搭股之股分,有烂里边的,有加在外边佃户身上的;取消地主股分倒粮,有按股分的,有是光佃户分的;关于退佃问题,有复佃者有赔偿一季,有叫赔偿一年的;关于恢复旧的习惯上,更是有的添了新规矩,有的恢复多,有的恢复少,真是规定不一,名目不一,总之是很乱的。然而这种“乱”,我们认为是在群众轰轰烈烈的行动下不可避免的,因情绪不一,觉悟程度不一,很难那样的齐臻。我们不应大惊小怪。群众在大的“运动下”,破坏了旧的、建立了新的,暂时的“乱”,往往是不可免的。

群众的行动,鼓舞了群众的要求,某些“左”的过高要求,必然要产生的。某些地区群众要了棉衣,某些地区要了单衣,在热烈的

行动鼓舞下，群众对过去的东西“打倒”“取消”的更多一些。其次就是一般的对富农小地主照顾不够。我虽然从开始到结束都在叫喊着这个问题，但群众未有理我，一样的干下去了，这是群众策略水平的问题，群众未有体会到照顾他们的必要。群众在宏伟的运动中，强调团结一致，对大地主、小地主的不一致，会影响佃户内部的一致，会打击一部分佃户的积极性。

这种政策执行上的“乱”和“左”，在群众自己行动起来，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不应大惊小怪，更不应在群众热情正高时来“泄气”，七区九区佃户运动后，我们虽进进了些工作，某些乱的现象已有改正；有些佃户在自己开会检查时，也指出了“顿出了圈”。这些现象，在群众的最后实际行动中，经过我们的教育，是会逐渐改正的。

关于滑县三区问题的教训

三区的历史

滑县三区，1940年，曾短时期为我们根据地。有些零星党的工作，但非常薄弱，群众未有发动，但因打狗，拆楼，借款，乱杀人的盲于行动。得罪了地主，也脱离了群众，“五五”敌人大摇荡，地主首先搞起会团与我对立，我们被迫退出，以后就形成了长期武装对立的局面，地主亦长时期的（1940年上半年到1943年春）依靠武装在三区进行了专政的统治，与敌伪顽勾结，并在他们面前求得合法。因此，这里就有许多的特点了；首先地主阶级有统一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会团，有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由于二年多的武装对立，对我有较深的仇恨，大地主有1940年组织变天的经验。1940年，滑县地主阶级首先在这里武装反对我们，因此变天思想特别大，认为我们的秩序，不是不能推翻的，“变天”是有信心的，这与长期根据地的地主阶级是不相同的。过去在我退出滑县后，与敌伪顽曾进行了共同的统治，与他们有过朋友关系，而今天他们的这些“朋友”，并没有远去，还在根据地的边沿，甚至根据地的当中盘踞，这

就是他们的出路,不得已时的靠山。在地主阶级的内部,由于地主的武装统治,得以幸免伪顽直接盘踞下的破烂局面,秩序有某种程度的安定,保护了中小地主一部分利益,这与他区不同,因此中间势力与顽固势力分化并不明显。去年春天前的情况大概如此。

去年的蛮干

去年春,我们武装开始能出进三区会团区活动了,当时由于我们声势浩大及群众情绪的向我,及会团内部的矛盾,使地主并不敢公开与我顽固对抗下去,并在我过往不究的口号下:大部的会团主要分子都留下未有逃之夭夭,但对我恐怖怀疑却未减轻,注视我们究竟对他们作如何处置,利用其内部矛盾,杀周烈文是正确的(会团最坏首领之一)。但我杀周后,对当时的地主是一连串的实行了绝对打的政策,提枪,借粮,但因为是对整个的地主、除引起阶级关系不利的变化外,主要分子并未逃走。

去年秋提出发动群众,由于过去长期武装对立,曾给我们造成过很大困难。三区会团的复燃,是大家所担心的,都想把几个会团主要村的群众彻底发动起来,把几个主要分子彻底打垮,从此出发便忽视了三区的历史特点,及我们当时的社会秩序还未有某种程度的巩固,忽视了刚解放区域之群众的水平,领导上产生了过分的心理,没有从群众水平逐步提高,几个明显的突出重点(都是过去之会团村,即几个主要头子的老家),安上大斗周玉明并牵上周凤明,在路砦大斗方振宇,台上放上了许多个干部,来势汹汹,大地主本心怀鬼胎(如此一来,看到我们的报复来了,因为过急超群众水平,故显得是我们要斗他,不是群众要斗他,大地主自知欠我们不少的血债,既然我们报复,当然就非同小可,感到自己岌岌可危,生活不下去威胁了他们。但当时,局面刚刚打开,我们的优势还不为大地主所承认,他还象 1940 年一样,认为根据地仅是暂时的现象,不是不可以“变”的,周围有人向他招手不是没有出路,这种情况下,他们考虑了自己“利”“害”的问题,在家低头,或是□其危险,不

如外逃,周凤明、周玉明、肖佔之,就是这样情况下逃走的。从当时走的时候,还有些具体原因,如方振宇与县长谈了话,更加怀疑,肖佔之因我要抓他妹夫(伪军),使他也害怕;但这仅是些具体原因。

今年的蛮干

今年春天,三区群众工作上,最主要的毛病是干部的“左”的蛮干。首先,我们企图组织群众斗几个尚留家未逃走的地主分子,但这些分子,罪恶未那样明显。群众不斗,但干部总在想法要斗他们,群众发动不起来,干部在日常生活却给主要分子以不少刺激,(干部□故扣、捆)。在滑县六区斗争蓬勃开展后,县对三区也以六区的要求来要求,于是三区干部苦于搞不起斗争来,没有大的斗争,只有搞小的对象,小的对象也要搞起大的斗争。制造斗争的现象出来了,□流漓一个小村,群众不愿大斗,偏要大斗,联合斗,本村群众□走了,只有干部和外村群众在斗争,万集群众不斗王××,我们非要斗不行,结果将王扣区,招集群众来斗,但群众仍是勉强的,形成我们和王斗,群众旁观,罚了果实给群众,而王××在群众面前,并未伤了尊严,冢上打不到大斗争,便斗争和尚,这些硬斗的事情是很多的。

由于对次要分子的大斗重罚,由于我之蛮干,使留家的主要分子及大地主,更感到自己的危机,虽然未打到他们的身上,但关系却日益紧张起来,他们对我们的“必斗”只有向严重方面想,没有丝毫侥幸的希望,对我们究何以对待他们,是不好捉摸的,因此极端警惕,在他认为稍有征候拔腿就跑,这些征候,有些并非事实,足以说明关系的紧张,冢上(三李)因我干部在大会上说“有些人没有事,看个报,造个谣”,而冢上看报的地主只有“三李”,于是恐怖起来,后来有人号房子,认为要抓他,便逃之夭夭了。×保几个地主突然向北乱跑,因听说要开会斗他,为我村干部阻回,北苑村黄化民,因为自己觉得我们要斗他,后为我干部扣了一次,害怕跑了。刘××因为民兵扣了他一次而跑了。逃走的愈多,剩下的大地主愈觉得

突出和危险,愈觉得自己被斗期间的逼近。×××说“象我们这一号的快没有了,快该斗咱们了。”主要分子一跑,次要分子就显眼了,逃跑的愈多,对已经逃走的更是一种支持,鼓励,争取回头更加困难。这样,就造成了逃走的逍遥复逍遥,在家的挨打复挨打的形势了,更加助长了外逃。

所以造成“逃走的逍遥复逍遥,在家的挨打复挨打”的形势,主要我们在政策有毛病,一是逃跑的未有从严,从严应从二方面,一是对敌斗争,使之借以生存,依靠的伪军不能逍遥活动,给其许多困难,迫使地主从根据地中找出路,不能那样放肆地投敌。一是逃走的代管,投敌后收其家产,这样一来,严于在家地主之被斗,但对敌斗争未有很好开展,家产也原封不动,因此显得外出投敌的逍遥复逍遥。其次,留在家的次要分子处罚过重(多是我们干部蛮干),更显得对逃走的不严,如果不逃走也要弄个倾家荡产,他当然就不怕逃走后你没收或代管家产,方老生斗后又走,就是处分太重,在家交果实也是把地卖完,不如逃走等着变天。对次要地主的严,使大地主更加害怕起来,不仅想到家产,而且害怕性命。总之凡估计到(生活)不下去的都跑了,特别是在外边有出路,有活下去的依靠,逃走和留下相比较,还是逃走对他有利。凡估计到可以生活下去的都留下了,土地主,小地主,虽有被重罚,但未倾家,出外没出路,“穷家难舍”的仍留下了,在外边没出路的情况下,根据地有一点出路也勉强留下。

由此看出:地主在经济上虽有保守性,便于控制,但我政策超出了保守的限度,即没财或很少财可分时,则会坚决起来。政治上顽强的地主,一向高高在上,有统治野心,是很难向群众低头的;特别在抗日秩序不够巩固的情况下,外边有出路,是不肯安分守己的,他不愿屈服群众,勉强求得生活下去,他要找到靠山,来踢翻我们的。因此,我们力量的大小,根据地是否巩固,对政策的执行上应是不同的。

地主的逃走和投敌，加深了群众中的恐怖及变天思想，投敌地主的武装威胁，深深印在群众的思想中，一想到扫荡，就想到地主的报复，特别是去年扫荡时，安上逃跑地主，配合伪军惨杀安上村干部的事实，给群众留下了可恐怖的印象。因此，群众中就要分化，一部分积极分子滋长了蛮干，中间分子及落后分子，就要消极下来。去年曾轰轰烈烈的安上，现在连农会都开不起会来，许多会员不敢承认是农会员，家庭拉腿，连政府的贷款都不敢要了。目前安上只剩了一个农会主任和几个民兵了。由于地主纷纷外逃，群众斗争拖延不能解决，不能迅速得到果实，而却增加了精神上的负担（恐怖），而我们的动员工作是按先进村一样的要求，农村的阶级关系，呈现了长期的紧张而□□的状态，群众就支持不下来，就要消沉。群众消沉，村干部就孤立，突出，强迫命令愈利害，就脱离群众，工作搞不好，问题愈来愈多，我们的干部情绪就低落下来。

流氓及民兵的投敌

三区地主逃走之势未下，流氓投敌之风又起。流氓为什么投敌？检查所得，一般原因是：一、流氓在生活上没有出路，许多流氓欠帐甚多，没法偿还，旧的谋生道路已被破坏，新的生产道路又未提出，许多民兵中的流氓成分，老背枪不生产，过去乱缉私，现在不允许，看家粮取消，生活没办法，家中人责骂；二、流氓的被打击，被孤立。一般的流氓在村中都受到我们的排斥，不让参加农会，舆论上打击，讽刺，民兵夜间站岗不让跳墙头（这是极普遍现象），处处限制、处处打击，绝对孤立。本来，三区工作开始，有一批流氓靠近了我们，有的参加了民兵，有的当了村干部，在反新贵时一部被打下来，一部因行动不轨被清洗，他们认为有功，不赏还罚，心怀不满，与新起的民兵及干部闹宗派，但又怕被斗争，或清算他们的错误，因此又恐怖。

由于这种原因，对我不满，政治上经济上感到没有出路，但外边有出路，伪军王树林（白道口伪军头子）有计划的收容他们，放纵

他们,因此投敌的渐渐多起来。

此次滑县敌人扫荡时,民兵及流氓投敌更多,有些流氓因早有此意,乘机投敌。而大部分民兵是在恐怖变天,找出路的情况下投了敌人。投敌的民兵大部在我未发动群众的地区,民兵成分多系流氓,有的掌握在地主手里,扫荡后,谣言纷纷,王树林有计划的散布变天恐怖思想,并利用已投敌民兵纷纷活动,民兵在这种恐怖下,先放下了武装,有的被迫投敌,有的在恐怖下投敌的。

未有尽力的开展对敌斗争,是我们最大的失策

三区是处于白道口、周村、小砦、两门四个据点其中的一个地区。入春以来,白道口、小砦的伪军王树林、吴兰田改变了活动方式,主要是夜间偷袭。由于投敌之地主及流氓的配合,给其夜间活动以许多便利。据之,投敌地主肖健之曾到冢上活动五次,但都未得逞。安上也几次进入村上庄,这给群众,尤其是给积极分子以很大的威胁。民兵成年不能分散回家住,村干部一到夜间不敢离开民兵,有的村干部夜间睡觉不让人知道地方。总之,白天好象秩序很安定,但一到夜间恐怖就来了。过去三区的民兵本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但对敌伪这种夜间偷袭却感到没法对付,仅处于一种消极的分村防守状态,给吴兰田、王树林更放肆的机会。

三区群众中经常酝酿着伪新五军到三区打钉子,吴兰田按据点了,群众思想上时刻怀着恐怖,人心可谓有些“惶惶”。

由于对敌斗争不能有力的开展,给王树林、吴兰田以打击,更多的造成他们的困难,使他们不能与不敢这样放肆的活动,不能在实际的对敌斗争中,来显示我们的力量。三区地主、流氓的投敌,主要的出路就是吴兰田、王树林那里。我们对敌斗争表现得没有力量,更加显得地主流氓有出路。吴、王的逍遥法外,放肆的活动,更加助长了地主流氓外逃的信心,更加敢于依靠他们与根据地与群众对立。群众、根据地、对他们控制的力量就愈小,逃走的增多,投敌的增多,更加壮了敌伪的气焰,活动更加积极,对我威胁愈大,这

种形势下,就更加助长了敌人的威风,灭了自己的志气,敌伪成了逃走分子的支柱,依靠敌伪就可逍遥法外,就可乘机报复,增加了我们发动群众的许多困难,设若我们在这方面作更多的工作,更大的努力,给敌伪以更多更大的打击(包括群众的联防,主力的配合),使伪军造成更大的困难,自顾不暇,作别人的靠山自然更加困难,地主流氓跟着他们危机四伏,自然不会当作自己出路。而另一方面,也显得根据地更加有力量,群众积极分子信心更高,自己阵营必然更加巩固。如此地主流氓也会更加老实一些,此点应当是三区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教训。

几个问题的提出

群众的解放事业是群众自己的

群众的解放事业是群众自己的事业,过去总是在怀疑着这个问题,群众会不会进行自己的解放事业呢?群众有没有这个能力呢?滑县群众运动的实际给了我们一个肯定的回答,如何才能成为群众自己的呢?根据滑县的经验,最基本的有二个问题:

其一、从群众当前的要求,从群众当前的水平出发。许多事实证明,当我们从群众当前的要求及其水平出发,群众认为是自己的,会积极的行动起来。当我们与群众当前要求及水平脱离时群众认为不是自己的,就会不积极行动。你要勉强,只有去包办。过去我们常常不肯从群众当前的要求出发,我们有一个要求,强迫群众行动,我们总觉得群众要求太低,其实是我们要求太高,一切事情我们常想一次作好,作彻底。但一切事情彻底都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我们常嫌群众水平太低,其实正是我们脱离了群众。群众的要求,群众的水平,是逐渐提高的。群众是必须经过自己的行动与体验,才逐渐提高起来,这个行动、体验,是谁也代替不了的,非让群众自己去走一走不行。我们过去主张宣传鼓动万能的人,就是不了解这点,他认为宣传鼓动,可以代替群众实践,还可超阶段的提高

群众,这种观点下,产生了单纯教育群众的观点,要把群众教育得完全接受了我们的主张,按照我们的模式时才允许行动,不然仍是教育,或是认为太落后,不理群众。这样,结果,不是包办群众作,强迫群众作,便是丧气灰心,群众仍然是提不高的。许多经验都证明,要提高群众,必须首先服从群众目前的“低”,在群众用行动来达到了自己的“低”,“高”的东西才会来到。我们同志们,光害怕提高不了群众,因此用我们的“高”来代替群众目前的“低”。但群众根本不动,“高”也没从来。可怕的不是目前的“低”,而是不叫群众去行动,只要行动起来一定会提高的。上面好多的事实都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千真万确。群众如何才能行动起来呢?就是从群众当前的要求出发。因之,从群众目前要求、目前水平经验出发,让农民行动起来,在行动中逐渐提高,是群众运动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其二,就是放手群众运动;群众自己的运动,自己是有能力进行。滑县查减运动中已完全证明此点。群众事,应当让群众去讨论,让群众自己去主持。一定要相信群众能办,而且办得好。只有让群众去办,群众才能在行动中锻炼自己,领袖才能产生出来。即使群众开始自己办的不很好,或是犯了错误,也是不应当害怕的,因为开始办不好,慢慢就会办好的。由办的不好到办好,能力就是一个提高。犯了错误会改正的,由错误到改正,就是锻炼。你说谁能不犯错误呢?我们过去就是害怕群众办不好,他们的事不交给他们自己办,我们去包办,即使你办的好,但也不是群众的提高,那“好”有什么用呢?有些,我们要求群众过高,摆布群众,更显得群众不会办。因此又提到了“从群众水平出发”问题。我们同志常怕群众自己不会开会,因此自己去主持,你说群众真的不会开会吗?群众□□有很好的开会的办法,不过不同我们干部的那种开法。你硬叫群众去学习干部开会,那群众可就有些嫌笨。所以过去认为群众办不好,与不从群众出发,要求过高有很大关系。

放手让群众运动的另一个内容,就是不害怕群众运动,敢于让

群众充分的动。不事先给群众来一个束缚，群众未有行动，不要先怕群众“左”。目前许多地区群众不能充分发动，就是这个问题在作怪。怕“左”的思想经常左右着他。群众稍一动，他就害怕了，就来限制和束缚群众，给群众“泄气”。照他想的，一切是非常文明，非常圆满，但对群众却是一种限制，群众起来后，“左”的行动必然要发生，我们不应害怕，应在产生了“左”的行动后慢慢说服群众，不是镇压、强迫、泼冷水，也不是群众没有“左”时，你就去作防止“左”的工作。那只能增加群众的犹予，减少群众的勇气，那只能限制群众运动。但不应把农民对地主斗争一些必要的手段，也都夸大说是“左”，那样只有叫群众不动，安心受地主的压迫。在我们领导上，应当多多用些力量，来支持和鼓励农民的斗争勇气和情绪，对农民运动中所造成的伟大成就，应当称颂，不应在群众运动的后面，来光拣他们的“毛病”。当然，这也不是要我们去故意叫农民错误。

群众运动一般的过程

群众是具体的，不同的群众有其不同的要求。虽然群众有其共同要求，但亦有其切身的特殊的要求。群众是从“私”才能认识到“公”的。因此，开始发动群众，很难以一种运动把整个的群众发动起来，常常是一种运动，代表一部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一部群众参加，建立一定的组织，另一种运动，代表另一部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另一部分群众，积极参加，又建立另一种组织。最后群众在共同的要求下，发动了共同的运动，建立了共同的组织。但群众不经过部分的发动是难以走上整体的，群众的特殊具体的要求得不到解决，对共同的要求的解决亦难以积极的。佃雇不经过减租增资，对民主斗争是不积极的。贫农只有从私仇、私恨中才能认识到对地主的公仇，就是证明。因此一种斗争内容，只能代表某种群众要求，不能把一种斗争幻想把所有群众发动起来，不能以这部分人的要求去代替那部分人的要求，不能用这部分人的运动代表那部分的行动，互相之间都是包办不得的。因此群众运动的一般规律应

是由分散走上统一的，统一的发动，必先经过部分的分散的发动才有可能。

组织是和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是由分散到统一，由部分的发动到整体的发动。因此组织如果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变为群众自己的组织，就应当是什么样的运动建立什么样的组织，应当是由分散的部分的，临时的，多样的组织，在运动联合起来时，组织才走上整体的，统一的。过去我们以一个固定的永远不变的组织来套向群众身上，因此成为组织是我们的，而不是群众的，是与群众自己运动相脱离的，不是相适应的，不是在运动中产生的。

由分散到统一，由部分到整个的过程中，一般的，正常的道路是什么呢？去年高干会区党委霖之同志的群运报告上曾提出了这个问题。一年的群众运动的实际，证明霖之同志的报告是正确的。滑县七区的运动，给了这一道路以具体的指引：

首先进行佃户雇工的发动，在佃户雇工较充分的发动后，佃雇的要求进一步的提高，从切身利益的需要，产生了民主的要求，改换村长，改换农会主任，掌握武装（七区）的要求提出了。佃雇在斗争中形成了独立的力量，有了领袖，已有能力，来作为民主斗争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由于佃雇的发动，大大刺激了贫农、中农的要求。开始，贫农对佃雇斗争的利益，感到嫉妒，对保障佃雇不满意，对反抽地不满意。因为这样，自己就没有当佃户、雇工的机会。因此要求利益均占，要排斥外来佃户，要挤较富裕些的佃户的佃权，要求大家轮流种地主的土地，有的则要求二五增看青粮。总之，是贫农的经济要求升（生）长了。此时解决贫农的问题已提到当前的议事程上来了，成为当前的迫切问题。解决贫农的经济要求，有些同志在此时主张单纯的调整佃雇与贫农的关系，原因系害怕贫农与佃雇因佃雇得到利益而产生的裂痕。其实这种裂痕，是在贫农要求提高，但未有方向解决的情况下产生的，单纯的调整是解决不了，只能发展自己挤自己的现象。此时唯一的道路就是把贫农引导

到正确的方向去解决自己的要求。这个正确的方向就是民主斗争。谁领导贫农进行民主斗争，答复了贫农生长起来的经济要求，谁就把贫农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上面已经谈到，佃雇已有能力来团结贫农进行民主斗争。因此以佃雇为核心来领导贫农中农进行民主斗争，在斗争中统一和团结起来成为当前的急务。在民主斗争中，佃雇的领袖积极领导，获得了中农贫农的拥护，变成了全民的领袖，佃雇的核心作用就巩固的树立起来了。但民主斗争一起，贫农中也迅速会涌现出领袖的，我们应注意发现和提拔，民主斗争后的农村，就造成了以佃雇为核心的农村了，农村的领导权就操纵在他们手里了。七区群众运动的过程就证明了这一个过程的全部。

民主斗争与生产不可脱离，应紧紧的衔接起来。因民主斗争，不能全部解决贫农的经济要求，尤其是赤贫和极贫部分。在群众进行民主斗争，分得了果实，应即时注意引导群众用之于生产（必须是可能与自愿），“坐吃山空”，将来生产时仍是一样的困难。我们同志们，幻想民主斗争告了阶段后，再提生产，觉得群众有了资本。但“实际”告诉我们，贫农分了果实，不是放着等我们提生产，饥饿迫使他随时吃掉。因此，生产必须是与群众的民主斗争紧紧结合。是的，民主斗争深入下去也是一个过程，但不能深入完了以后再生产，应当相互结合。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生产与民主斗争脱离过久，群众要求没法解决，则容易因失望而低落，或是发展了乱斗。

这就是正常状态下的群众应走的道路。这一道路，当然不是机械的要刻板式的向群众身上套。基本上是群众要作什么，我们作什么，但不能否认我们启发、领导的作用。常常是一个地区的群众，首先作了什么，对其他群众的某种要求会很快使之膨胀起来，这个地区进行了增佃，这个地方的佃户就启发了自己增佃的要求。当民主斗争烽起时，群众的民主斗争要求就会很快升长起来。因此，一定时期，有一个最中心的运动，还是可能的。

在这个运动转到那个运动当中，领导与群众，都需要一个认识

和酝酿的时期。因此,当中常不可避免的有一个低落与消沉的时期。但我们领导者的任务,在于把这个低落与消沉的时期缩短,使运动与运动当中的空隙愈小愈好。

政策与力量

一定的政策的实行,是建立在一定的力量基础之上的,撇开力量,专谈政策是不行的。群众运动之政策,亦应照顾到我们的力量。在滑县六区及三区对照一下,就不难明显看出这个问题来的。六区比三区的群众运动上,对地主的削弱更大,罚得多、打得很,然而六区的地主向农会屈服了(当然不是说不反攻了),而三区地主却大批的投敌了。当然,其他原因很多,但基本的原因是我们力量不同,六区秩序巩固,使地主感到要打翻它是不容易的,离敌较远,没有出路。三区这些条件是远赶不上六区的,我们对三区的指导上最大的错误,是没有从三区出发,而是以六区的要求搬到三区的。因此把三区弄的问题很严重,这就教训了我们,不能乱搬家。要从各地具体情况出发。以上所谈到的滑县的一些经验,各地如要运用时,希能特别注意此点。

社论 准备全区大练兵

(1944年11月23日)

目前,国际上和敌后的胜利越来越大了,不少的同志都笑着说:“快啦!快啦!”是的,真正快了。毛主席指示说:“反法西斯阵线的高涨与法西斯的衰落,和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高涨与反人民势力的衰落,是目前时局的两大特点”。反攻是接近了,但反攻前的艰苦也是必然的,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加紧斗争加紧准备,□□的整理、训练、巩固、提高我们自己,才能掌握将来新的形势。况且现在全世界全中国人民都对于国民党蒋介石越来越失望,都依靠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成为反攻的主力。总之,胜利越近,咱们肩膀上的担子就越重,也就越需要练练自己,整好自己。

根据各地报纸文件的反映,在党中央统一的号令下,西至陕甘宁,东到沿海各地,大部都动手动脚的练起来了。这次练兵整训,可不跟过去一样,不光是干部整战士,而且还要“兵教官,兵教兵”,大家一起动员起来,所学的东西,也完全是为了用,为了坚持斗争准备反攻,决不是为了摆样子好看。现在我区也蕴酿大练兵的到来,全边区轰轰烈烈的大练兵运动,不久就会出现,趁练兵运动开始的先头,特提出几点准备工作的意见。

一、检查工作。检查工作的目的:其一,在于了解部队的现状和部队军事技术、战术、政治、文化的现有水平,好使我们的练兵运动,能从今天的实际情况出发,逐步提高。其二,在于发现过去部队工作没在做好的“病根”是什么,如某些工作为啥没完成,过去整军

为啥不起劲(战士为啥怕整),部队战斗力或政治情绪为啥不高……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步摸着打开练兵局面的要害和门道。其三,在于发现好的典型和群众的创造,如某件工作做好了,就要讲讲做好的原因,那里领导者和群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而且,进一步把他们经验方法总结起来,再坚持到群众中去,使他们的的方法,变成医治整个部队工作“病根”的一副好“药”。

检查工作的是否深入,要看检查者是不是确定了向群众学习和首先检讨自己的立场。过去检查工作,由于这个立场糊涂,往往形成上边专门找岔子,下边努力打埋伏。结果,缺点又多又具体,优点又少又抽象。有了缺点,领导上很少检讨自己的责任,被检查者则不痛不痒,弄得上下不通气,互相脱节。这里,军区最近的一些检查工作的态度是值得学习的。十月下半月,宋司令员和黄政委曾到军区卫生部检查工作,一去时,不少同志觉得连军区首长都来了,一定是有啥大岔子,但首长们的表示是:“你们有了缺点,更说明我们领导上有缺点”。于是,上下马上更加亲密了。另外,军区最近曾调来三分区肥乡二中和二分区尧山基干连检查工作,由于这个立场明确,也收了很大成绩。

二、学习文件。根据分局整风指示,要学习“谭政同志报告”、“古田会议决议案”。另外,还应该学习“七七〇团第二连”、“第七团第七连”、“延安×旅练兵总结”和其它区练兵的经验介绍等文件,这几个文件,可以说是不可不读的。读了它,我们才能知道部队工作进步迟慢的基本原因,才能获得检查自己群众观念的尺子;同时,还应该学习他们的领导方法,看看用啥法才能把一件工作变成群众自己的事,造成一种热热闹闹团结前进的群众的运动。当然,这些文件不是一下子所能“嚼烂”了的,还必须在练兵运动和今后的工作中去体验它,充实它,发现它。

三、反省自己。根据部队工作的实际检查和文件启发,应该进一步反省自己,弄清过去部队工作搞好的没搞好的,领导上究竟应

该负什么责任,领导上思想和领导方法究竟有些什么原则错误,究竟我们有没有军阀主义的严重倾向?对士兵群众的关心究竟如何?群众力量为啥不能发挥,群众创造为啥不能发展,从这里面,最后地确实实的掌握开展部队工作的唯一关键。练兵一开始,马上就打开了打开练兵大门的“钥匙”。

最后,为免得练兵时工作堆成一堆,应该很快的把其它工作结束一下,如群众工作,生产总结分红等等,时间是紧迫的,晚练一天就会少收到一份成绩,马上动员起来,在全军中进行大练兵的准备与酝酿,准备从练兵中把部队领导作风来一个大改造,把部队的文武本领提高提高再提高。

(11月23日)

(原载1944年11月30日《战友报》第94期)

冀鲁豫四地委对滨河 群众工作的指示^①

(1944年)

一、地委对滨河工作意见

主要是创造群众自觉自愿的运动，不作超阶段要求。

滨河尚有两个问题未解决。即：一、“一次彻底论”把斗争运动制定一套定见形式，不合此点即硬来，不管群众觉悟程度；地主已退却也要拉着斗，这都不是从群众水平出发，不是从群众实际要求出发。

宣传鼓动不是决定的，提高群众主要应让群众在行动中提高（我们干部即处在这一行动中提高群众）。现在不是这样，结果我们的要求与群众要求结合不起来，以我们要求代替群众要求，遂形成脱离群众，强迫命令。

事实上滨河群众已逐步提高，作超阶段要求，只是主观愿望，仍然是包办、不民主问题，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摆布群众。

群众运动中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是：

- 1、从群众水平出发。
- 2、敢于让群众干，相信群众自发的威力。

“左”有两种：一种是干部强制蛮干的“左”，另一种是群众威力行动的“左”。这两者不可混。今天滨河问题，还是属于第一种，是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未从群众觉悟出发，未从实际环境特点出发，未从各阶层动态考虑。

反黑地斗争是可以搞混合的（民主斗争）。关于群众的“左”，群众要斗中间势力，接受不了我们的要求时，当然不能硬强制。群众动了，就应该让他们动，因为只有在群众动中才能提高，否则限制在停止状态中，便永远不能提高。

传统思想的结果，往往使干部一面提出发动群众让群众充分动，一面又平列着提出别让“左”了，这样实际上是怕“左”，是给冲破正常局面以一种障碍。其实所谓“正常”，往往是旧形态的安定状态。但我们正是从旧的“正常”，到新的正常，真正的正常。其中过渡期间的不可避免的混乱是必然的，只有大胆让群众去冲，才不致使这种冲犹豫不决。

不过在实际中往往因为旧秩序的社会潜在势力影响，群众的冲是逐渐强而有劲的（特别是在民生斗争中）。我们要从这种水平出发，某些比较超出常规的行动，如不礼貌，就往往为这种社会潜在势力所不满。如果我们的认识也受到这种影响，便会感觉过“左”，特别是政府同志往往有这种想法。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某些真的越轨行动，往往出于报复，也应加以谅解。

积极分子与群众结合问题。积极分子的意见往往是群众意见的集中，群众的要求在个别情况下往往不敢说出，而是在集体行动中。说服个人比说服大家容易得多，但个人被说服不一定是真服，一到集体后就又变了。因此，群众的意见也往往是从集体中来，民主讨论也真能代表群众意见。

今天滨河的主要问题不是“左”，而是不从群众出发，一套定见，不让群众充分动，是强制包办的问题。

爆发暴动事变，不一定在今天，即在群众发动后，即在我对地主客气下也会有。在发动群众工作阶段，在“扫荡”等的情况下，都可能发生暴动。当然也不一定。不过主要还是在“扫荡”后的人心

惶惶，加上群情某些不满给地主最好的机会。因为地主时刻想反攻，天天等机会。再逢我们的弱点更给地主造机会。另外民兵（非群众）的蛮干也会刺激群众，为地主造机会（地主反攻主要利用宗派矛盾和官僚主义不民主）。这样益见善后工作的重要。

群众运动的一般过程

一、群众运动是由分散到统一，亦即由部分到整体，一个运动开始祇能代表一部分群众。因此，不能以这个斗争代替那个斗争。一方面是分散的，一方面也是独立的。

二、组织是由行动而来的。因此组织有许多是临时的组织，也是当前所需要的（如佃雇会），是群众所需要的，它的组织和领导也是群众自己的。过去我们以一种固定形式代替了，如农会。可见组织也是由分散到统一的。

三、一般道路是先搞佃雇运动，佃雇有其领袖，他们成为突出的独立力量，经过民生斗争他们的要求也提高了，民主要求遂被提出，有村政权、农会、武装等方面。土地、经济等一般是要求在民主斗争中分果实。这就奠定了佃雇群众在民主斗争中能成为核心的根据。非佃雇贫农被运动、果实所刺激，加上不满现状，于是往往跃跃欲试，但新路没有，就要走老路而发生内挤，排挤外村佃户，不满佃雇的永佃权等。这种内挤矛盾不能用调解来解决，而只有开新路，如果佃雇能解决其迫切的经济要求，它就团结在佃雇的周围，佃雇就可能成为全体农民的领袖。当然运动不能只满足于佃雇贫农，佃雇贫农也不能包办民主斗争，必须吸收非佃雇贫农中的积极分子来充实领导，成为另一部分群众的独立领袖。又因民主斗争不能解决贫农，特别是赤贫等经济要求如豁粪等，甚至反受相当损害，因此斗争中虽积极，也得到了利益，斗争后会重新情绪不满低落，因为他的要求提高了。这时如果他的要求不被及时适当的解决，即会再走老路——斗争（乱斗，从中间势力到进步势力）、或村干出问题（新贵），如吞果实（因生活要求未解决而出现这种情况的要给以

原谅)、浪费、贪污。这时如果生产问题不被及时提出(拖长了),则积极者挺而走险,消极者消沉不干。因此,在事前分斗争果实时,可以通过群众路线多分给他们一些。

生产问题的提出不是马上能解决或即刻能转上的,这中间出现一个消沉期间是必然的。但此期间也是酝酿期间。我们主观上应使这种间隙尽量缩短。怎样缩短呢?可以在民主斗争掀起后,即开始找出重点来,以一个专门干部来搞生产(合作)示范,以创造经验,影响全盘,待全盘斗争一结束即可马上转入生产。

在生产中有几个问题要注意

1、大力支持重点,采取由一个村向外发展,由该村支持外村,起初借助于主村,以后逐渐独立。

2、开始搞合作社时,搞个体经营(小本生意),作大量小本借贷,支持、支持、再支持(贷款不必单纯说明限制用途,实际是财政不经济)。(缺页)

模范班花费一般在承认错误后,可允报销,个别私人吃喝例外。(缺页)

这是不对人民负责的群众观念薄弱的表现。

纠正这种问题应通过群众路线,应基本从教育、反省着手,不得已才采用调整、撤换、解散等组织手段。同时,政府把一些必要的制度也要严格起来。

领导上自满所产生的这种恶果是长期不到下边去,不仅不深入,不了解下情,而且不大愿意听取汇报反映,不再冷静慎重的考虑问题。

党内民主生活不足,使党员积极性降低,拥护真理的顽强性也差了,因此若干问题不能集思广益。

几个具体问题:

卖地有真凭实据,确知其为卖地因而不许外,其余均应准许。

中小地主之增加里打股而抽地及孤寡地主生活困难,应协议

调解(先动员一下)进行。

模范班、农会无权动支村款。妇会、儿童团罚人,应经过农会。

今后工作:

(一)查黑地工作,凡自报时间在秋前者追交3季,自报时间在秋后者追交4季,追1%到100%,贫农中农以下一律免追,富裕中农不超过30%,中间势力不超过60%,顽固势力可到100%,村款倒3年。

被查出者除全部追交外,处罚1%到100%,贫苦中农以下可不罚或只罚一部分不追交,对顽固分子不超过原家产1/4损失。

果实分配:

1、70%归斗争群众,30%归全村,包括自报追交者。

2、70%归斗争群众,10%归告发人,20%归全村,包括被查出者。

(二)关于打退地主反攻与倒苦水问题。当时对于打退地主反攻,原是为了贯彻减租增佃,但也应从群众水平出发,从低级到高级,群众愿意要粮食,我们要倒苦水,结果群众怕因要不了粮食而以倒苦水与我作交换条件,给地主以空隙,地主恶迹反不易揭发。

群众情绪觉悟提高,积极分子(英雄)出现,往往在斗争以后,因此不应急于制造积极分子。

(三)关于制止群众运动自流问题。我们强调制止自发斗争,强调制止自流是害怕群众自发斗争的表现,其实自发斗争也可以提高群众,在目前情况下,自发斗争所以出现,有其产生条件,群众是因为简单的粮食要求,地主一让步,群众要求更简单,我们如硬要求,结果勉强接受,群众对我感觉别扭,反而产生同情地主的情感,对我采取应付的两面态度,地主也会感到不是群众打击而是我们和他为难。增加对我们的仇恨与反感,给予他们以空隙(其实地主自动退却,正表示群众已动,有力量存在),我们应是一切为群众的精神。

(四)关于独立的佃雇运动,攻村团与佃雇大会是在群众要求情形下产生的,如非群众要求,反成为群众负担,应从自觉自愿出发。

但是,比较单纯的独立运动还是应该强调,目前提出混合的似嫌过早,激烈与否应根据群众要求出发,因追求激烈而妨碍了独立运动,妨碍充分发动就不好。当然,放任也不是民主精神,因为它接近极端民主。

攻村团如是先进村攻落后村倒是可以。群众领袖是自然存在,其作用往往不自觉的起了,我们为了发挥其领导作用与培养干部,是可以把它放在更明显的地位,建立临时领导组织时(如佃雇工大会),我们只要把它放在适当地位,就可以发挥其领导作用。

在一个村里,发动群众的正常规律,还是以独立的佃雇农斗争为首,为了树立无产阶级领导骨干,要帮助其提高,并学习领导工作经验。

减租增佃后,佃雇产生了民主要求与武装要求,我们应培养其民主兴趣。

(五)关于策略与政策问题

有些地主逃跑,和对历史问题(如抗过战等)照顾不够有关,还有对新地区问题考虑不够,打草惊蛇。群众的混乱要求是不可免的,主要看我们是否曾做说服工作。

现在,佃雇已得利益,非佃雇尚未得利益,生产问题是否到明春就开始(民主、民生斗争结束后)脱节不大好,可从村情况出发。开办合作社,起初是按支持重点精神搞的,区、村都争着多要,一个村得到10万、20万,再加上村集款,村干部把住这一部分款,思想上就起了变化,光想做大买卖,对于支持小本经营多是应付。群众认为贷款是救济困难,并没想到以自己掏力为主,致使小本经营也没出路(粮食不出境,没经营门路),运棉花、牲口,又须大本,群众没办法,我们也没办法,更加重村干借口(做大买卖),群众留恋斗

争。即有群众参加付业，也被村干私人掌握，大吃大喝，有一部分款完全是借出自己用，结果群众和村干发生矛盾，村干既集中精力搞买卖，对互助即不关心，虽提出互助，也被群众怀疑（钱，您得了，掏力的叫俺干），相反没贷款的一些小村，原来有些经验（馍房、磨油……），倒自己搞了起来（集股），且搞的很好，我们这时感到大村的整顿、改造又很棘手，于是对小村开始注意加以鼓励、支持，就逐渐搞得更好，倒是真正的“民办官助”，不象大村的官办，现在款又抽不出来。

经过是：原来在群众分果实时即有搞合作社的思想准备，经过组织动员，集股很多，搞起后选社干，收款，讨论怎样经营使款，一面收款，一面分配支持，先促贫农（但有村干想把持）。

分红，还未得经验，但有些是出利，他们认为抽红麻烦，都不说实赚多少，所以都用出利办法，现在也不敢肯定说这种办法好不好（感到利有大小很难定，因为你使不使都要利，分红就无这种限制，可以做多少次就做多少次）。低利借贷在一般小本经营中可用，月利也不能超过一分，个体经营先搞。农业付业是看时间（忙闲季）、土地关系及村子穷富而定。小村以付业为主好，富村以农业为主，剩余劳动多用在深耕作用上。

领导上不要过急，要亲自作出经验，了解群众心理需要，再逐渐搞起，发展。

互助不要搞的过快、过早，开始在太行山是先提倡生产，培养生产模范，以他为主来团结他人成立互助。伙佃是一种更高的形式。

伙佃提的过早，大家会在认识上有问题，都认为是“沾光”、“拉把穷人”，地主在稳定后又想法“剥削穷人”。另外是共产思想也发生了，有不少都是在热情鼓舞下搞起的，因此搞的形式极不一致，真正说还不了解，发展如何很不敢定（如地里上的粪多，给大家在一齐分配在麦收后就会逐渐发现问题）。

滑县在领导上深入,为一个问题下去研究,亲自试验,虚心,常用走着瞧,一个工作一个问题大家都下去搞,因此一元化也没问题。

转入生产后区、村干的思想作风,都须先有大转变,改变轰,呼呼拉拉的架子,转入细致、虚心、钻研、关心群众上去才行,不象群众斗争需要的魄力和一般号召,领导生产是需要启发诱导,细细来,待得有了典型经验再号召。

(林远记录)

二、赵紫阳同志对滨河工作意见

(一)关于群众自己动的问题

1、这次民主运动在滨河是空前的,由于村干的活动,群众的酝酿,我们只是一般号召,由村干自己主持,这种领导方式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只是促成和启发,我们是大力支持群众,群众经我们在思想上的启发,是无所顾忌的动了。其中突破一点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和分村割据不一样,在群众自己要求动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让群众自己动或等着我们提出,起了是否形成运动的决定作用。群众自己动的形式是很简单很朴素的,我们不应以为是个别或少数人的包办,而必须相信它。

在蓬勃发展的运动中如何实现领导,滨河主要是一般的启发,必要时在紧要关头具体帮助一下,这种方式在斗争快揭开时,是合适的,特别是使一般号召与突破一点结合起来,是很好的方式(积极分子联席会)。

2、联合行动问题。

联合行动的采用和群众在斗争中的威力发挥基本上是成功的。因为在这种行动中斗争威力是比较容易发挥的,给群众思想上的教育是很有效的,尽管其中还有不少缺点,但这种行动,却实在压倒了地主。现在群众已熟悉了这种方式,而且知道斗是对的,知

道怎样斗。知道“斗是对的”这一点是不容易的，现在已经知道斗争不仅是为了发泄仇恨，而且是为了削弱地主发展自己。这一点说明了群众的水平已经提高，今后群众对斗争形式缓和些会容易接受，但轻罚却不容易接受。

3、大量使用联合农会干部。

群众联合行动除了互相观摩互相援助外，联合农会干部的统一使用与领导是同样重要的，同样具备群众联合行动的意义。因为他们是各村产生出来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要使他亲自创造经验，把自己村搞好。

4、斗争内容从群众仇恨出发，也是成为运动蓬勃发展的原因。但领导思想转变和原来工作基础，即群众自己的斗争锻炼则是形成蓬勃运动的主要原因。

(二)大胆放手问题

基本上是照顾群众水平，即群众的自愿自觉，一方面照顾群众的低，一方面照顾群众的高；一方面等着群众，一方面让群众搞。过去了解上有毛病，大胆放手提出后，又产生了新的不从群众出发，即把放手大胆以为就是大干，主观上制造大斗争。群众情绪主要是指当地群众，指参加斗争的主要部分说的，如打的问题，群众运动的轰轰烈烈必须通过群众的自觉，否则斗争过后，思想会起相反的变化，因此干部必须和群众情绪结合起来，以看群众情绪的火侯，是否是自然的揭脸，硬揭脸会仍然和地主妥协，因为他觉得太过、亏心。关于大胆放手和领导问题。大胆放手不等于不领导，不等于放任。大胆放手依然要进行教育，使之了解自己的行动是阶级行动。什么是敌人？什么是自己人？“中农是自己人”就一定使之了解，富农和地主也不一样，否则将走大弯路，当然有时是不可免，但不能听其发展，在我们思想上不做准备，更不能暗示号召。这个问题也正是我们要领导的地方，否则运动就成为没有路线的运动，成为单纯经济观点的运动。阶级行动是有立场的行动，不能把削弱地

主变成削弱别人，因如此将成为互相削弱。

群众接受不了，要慢慢来，不能放下听之不管。对小地主以下不能罚的过重，不能把削弱 1/2 作为一般标准，一般应在 1/3 左右。这种偏向不能助长，现在群众不大了解，中农、富农都很害怕，认为跑不了，总得挨斗。

(三) 佃雇和贫农矛盾问题

民主斗争中一定产生贫农领袖。贫农和赤贫是民主斗争的主力与骨干，佃雇可以成为积极参加者和领导者。因为，只有贫、赤在民主斗争中毫无顾忌，他在斗争中只有得到东西，不会失掉东西，但佃户却为佃权攸关而不一样。其次，过去地主给农民压迫，对于贫、赤的私仇私恨更严重些。佃雇如不是本村人，其在历史上关系也不一样，特别对于一些公愤性的事情，加之有些佃雇还向着自己的掌柜。再者，贫农尚未得果实，这是民生斗争在前，如果是民主斗争在前，则佃雇往往不参加。

经过民主斗争后，领导成份应该有变化，吸收贫、赤参加。民主斗争应为此作准备。贫、赤参加又将使领导成份起新的变化。一区有些村问题严重，基本原因是由于领袖问题未解决妥当，即由于外村人太多，外村群众容易不从本村群众情况出发，不联系群众，容易脱离本村群众。因此，必须培养当地群众领袖。其次局部群众领袖（佃雇的），当其成为全民领袖时，极易不对全民负责，只从佃雇立场出发，使其他群众感到限制，甚至是压迫，再次，民生阶段搞的太长，也是原因之一。

(四) 今后意见

1、继续贯彻民主运动（时间约一个月）。领导上仍要贯彻放手大胆，要多从思想上解决这一问题。集中力量搞大地主，对小地主以下要注意掌握。如地主已服，可以允许群众采取软性斗争，对富农可采取反省性质。对中农及群众之间问题，应基本上采取内部检讨方式。农会自村到区进行农民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召开与选举，模

范的选举是个提倡整风吸取经验的好办法,也可与检查提高领导结合起来,这个会要下大力在运动中注意搞好。

2、在运动中注意开展青妇工作,特别是妇女工作。要逐渐做到妇女干部除主任外,大部不脱离生产。

3、注意开展小村工作,开展生产,答复群众经济要求,免走弯路。

4、领导问题。县区应注意适当的集中,实行集体领导,不需那样分散,多注意研究典型,开调查会,走向细致,如帮助一个村的工作。在民主斗争到生产过程中,还有一个村级工作建设问题,要注意动罢后的新问题,要深入、细致,区的领导也要注意集体领导,区委书记和主任可以在一起,今后问题逐渐复杂,青、妇工作和党务工作应逐渐注意抓起来,主要负责干部的作用不在于亲自打开重点,而是在于核心作用。县委的领导作用更要求发挥,特别是集体领导的作用。

5、联合农会干部,一方面大量使用,一方面逐渐求其不脱离生产,采取奖励(津贴)办法,既不脱离群众,也不影响其经济上升(约等于半脱产),对旧的如此,对代表大会产生的模范及新的领袖更要注意这样培养。

6、一、三区,四区边沿区的对敌斗争,应该开始强调(不仅从群运发展阶段着眼)加强民兵斗争,别的区民主、民生斗争不能硬搬家。

7、佃雇失业问题,可以根据其家庭情况和斗争收获处理,谁下工谁可多分,以后在生产问题上再得到补充。

(林远记录)

三、地委会对滨河群众工作的指示

(一)开展更独立的佃户和雇农运动问题

1、去年减租增佃增资运动最大的教训和缺点是啥?

①就减租增佃增资运动说,不是佃户雇工自己的运动。除我们的包办外,积极分子不是佃户雇工自己的积极分子,而是被流氓包办,他们不对佃户雇工负责而是对我们负责(甚至还不如)。佃户雇工的依赖性更促成这一点,因而没有形成真正自己的组织,自己的领袖。

②正因为如此,所以本身没力量,当然也就不能进行日常生产的斗争,不能巩固果实,地主一反攻即被夺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是分散的,地主是集体的,被反攻的基本原因在此。

③从领导上来看,我们不是对群众负责,而是只对上级负责。上边教干啥就做啥,这是因为我们干部出身不是佃户雇工,村干出身也不是佃户雇工。其次工作放松也是原因。这种反攻的结果,在有些地方就给佃雇增加了苦痛,甚至互相怀疑、互相惧怕,而向地主低头。

2. 对今年佃户雇工运动的估计。

①最明确的指导,是在开始时以检查减租增佃的形式出现,接着提出了贯彻减租增佃,这条路是一条比较正常的道路(滑县则把这一工作做为一个序幕没作为中心,因而今天不得不重做民生斗争)。

②在使用干部上也比较大胆,提出了反对包办代替问题,提出了让群众充分动的问题。

③大部分村庄没动是必然现象,但不能听之任之,而必须抓紧,否则必使工作自流、下降、退步。

(二)重新认识佃户与雇工工作及今后的意见。

1、我们应强调认识,佃户雇工是最受剥削的一个阶层,首先要解放他们,而不应看作是农会的附属工作,它是农民运动的主流。

2、要认识佃户雇工工作的复杂性与长期性。①反贪污之类的斗争,进行之后不易反攻,但减租增佃增资,则地主时时刻刻准备反攻。生孬点,超经济剥削会层出不穷的变化。②地主与佃户雇工

的斗争是日常的，集体对分散的。③同时佃户雇工的被剥削（劳力上经济上）是复杂的——从地里到家里（担水、抱小孩）规矩复杂，形式复杂。④另一方面佃户雇工与东家的私仇和私恨在实质上都是复杂的。⑤地主的反攻造成这种剥削关系更复杂，如积极分子受打击，新旧佃户也矛盾，不仅是原来佃户之间的互相疑忌。

3、佃户雇工与地主的斗争应认识其艰苦与长期性，佃户雇工与地主的斗争是具体的复杂的，同时也是长期的艰苦的。我们不仅从政治上来启发觉悟，还必须计算具体利益的获得如何，因为政治解放是建筑在实际利益上的。

4、今后我们要在组织上建立独立性，成立雇工小组、工会及佃户小组（大种小种）。利益的获得和享受、生活行动等都应尽量集体化，使日常生活、工作与政治生活都集体化（如粘糕一起吃）。

5、地委同意滨河工作布置，留两个星期搞合理负担。同时，要防止干部中的自满现象，对群众运动估计过高，以致偏于向群众要，不再关心群众切身要求。

（三）关于思想上的包办代替，不相信群众，必然使群众运动（要求合于自己标准，摆布群众）消沉。这一问题依然是目前的严重问题。

思想包办的结果在我们脑子里常存在一种幻想的标准，看不见具体条件下的优点，好指缺点，少发扬优点。越想搞好，越搞不好（其实是越包办得厉害）。只是思想上想的一套，夸大主观力量，忽视客观条件。一切问题，只有从具体出发才可以搞好。

“左”不“左”的问题决定于是否合于群众要求，还是干部蛮干。激烈不激烈也不是标准，而是看是否与群众情绪结合。

今后要反对摆布群众、指教群众的观点，一切要和群众商量，从群众水平出发，要善于掌握和利用群众中光明的东西来反对群众中黑暗的东西，如表扬模范。

新贵流氓问题，过去是反对多，改造少，教育精神差，甚至形成

外部斗争。农会是阶级组织，有问题必须内部解决，党与农会的关系是同阶级组织的关系，不应认为是外部的，如农会中反新贵党员的斗争。

今后还是继续打的阶段，查黑地在重点村可以做，不是等待而是积极结合。

内部问题是当前一个大事，包括：果实、土地、新贵问题和反攻问题。这里听说反攻是指我们有些干部被地主利用，上了地主的当，成了它反攻的工具。

现在的运动形式，轰已不是主要的。另外，干部的自满疏忽、浮躁、也已值得注意，应当谨慎！

这些问题是现阶段极易产生的，不足惊，但却极易疏忽，因为现在大家情绪高，极易满足。

(林远记录)

四、紫阳同志意见

1、防止乱斗。对中农政策，青妇斗争，斗二楂。这是主要的，要注意稳定中农生产情绪。

2、内部问题。如果实(交不交、分配)、民主作风(不能说成新贵问题)是较明显严重的。另外农会对中农开门，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将成为以后搞生产的障碍，因生产必须中农援助。

生产问题中的一些急需解决的，如牲口问题，需依靠伙拉犁(先示范)换工互助，否则就会出问题。(不许斗争对象卖牲口，中农怕调剂牲口而乱卖牲口)、合作社的集股比较困难，地主看见斗过去了，贫农经济力量已全买成土地，中农怕孤立，因此我们必须以较长的时间来号召与争取。佃户的善后问题，最好和地主伙种，喂牲口要说服佃户负一部分责，否则大卖牲口结果生产、支差会成大问题，土地问题要集中注意解决，尽量做到平衡。

青妇问题。(儿童团、姊姐团不应鼓励斗争)。

家庭问题基本上不应用斗争来解决，因家庭又是感情结合体，否则以后很难维持常态，甚至产生新问题。

妇女斗争中的处罚是必须避免的，否则会影响到妇女的解放，并使生活同样受到威胁。离婚问题，基本上不需提倡，因基本群众的婚姻问题和工作员不同，妇女工作是在农民自觉自愿原则下搞起的。青年工作的特殊性不应强调，它的作用可以在农会中发挥，否则会妨碍生产而培养闹独立性，必要的特殊问题可在农会中尽量求得解决。

(林远同志根据当年的笔记整理)

附：林远同志的说明

这几个历史资料，现在回忆，是1944年一年中冀鲁豫边区四地委对滨河县^①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除了直接标明是当时四地委副书记赵紫阳同志讲的以外，其他几个材料(包括几个缺页很厉害的另碎片断)，根据当时滨河县委书记徐枫同志(原河南省林业厅副厅长，现已离休)回忆，也像是紫阳同志讲的。他说，当时紫阳同志代表地委领导滑县、滨河两县发动群众工作。在那期间，一般都是他直接向紫阳同志汇报滨河的工作情况，听取地委指示，然后回县作传达。他回想到，有些内容如对朱口事件的分析；对以减租增佃为中心的提出；对妇女家庭问题不要像斗争地主那样处理；不要让儿童团、姊妹团自己搞斗争等，都有很深的印象，包括在口气上也很象紫阳同志讲的。

紫阳同志当时根据平原分局指示，要在根据地开展以佃雇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斗争。即先民生后民主的雇、佃、贫运动道路。冀

^① 滨河县是由原河北省的长垣、东明、濮阳三县和原河南省的滑县相互接壤的一部分地区所组成，由于这块地区滨临黄河，所以定名为滨河县。滨河县共辖六个区，北部的一、二、三区离敌人占领的长垣城较远是滨河的基本区。

鲁豫日报曾发表题为“站稳脚根，打破框框”的社论。认为佃雇是农民阶级中最受剥削的阶层，必须站在这部分人立场上，要先把这部分人发动起来，解放出来。我回忆，当时滨河的土地比较集中，贫富悬殊，佃雇之中，“小种地”形式最多，实行多为赤贫。因为本身没有生产工具，受地主的剥削控制更厉害，矛盾也更为尖锐，至于雇工就更贫苦了。敌情方面，由于日寇在长期战争中的巨大损失消耗，滨河一带又是冀、鲁、豫三省的接合部，除秋后一段外，一般没有比较严重的敌情威胁，因此阶级矛盾更显突出，雇、佃、贫要求改变生活待遇和政治解放。滨河的雇、佃、贫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情况下发动起来的，即以减租增佃减息增资为主要内容和诉苦斗争的形式，集中优势力量从一个点突破，一片一片展开。

紫阳同志的讲话，贯串了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即放手发动群众，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按照群众的觉悟水平，开展农民对地主的斗争，并在群众自己的（自觉自愿）行动中，逐步提高群众，锻炼群众，把运动推向前进。

紫阳同志这些讲话，对当时滨河群众运动的发动和各项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因而全县基本区、一、二区的工作局面很快打开，不仅群众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而且从贫雇农中涌现出许多干部、积极分子，他们在斗争中锻炼了工作能力，提高了思想觉悟，改进了工作作风，滑县、滨河群众发动的经验，是在当时冀鲁豫边区濮县、范县、观城、鄄城四县发动群众运动经验基础上的新发展。

这几个材料，有些观点和提法，如对佃雇农和当地贫农作用的分析，前后有不尽一致的地方，这主要是由于当时运动不断发展变化的结果，这个不一致，是和当时全边区都很注意的“先民主”还是“先民生”问题的争论有联系的，而“先民主”还是“先民生”的问题，直到1945、1946年大片新区工作开展后，才得到解决。

水东概况

(1945年1月30日)

生 琛

水东区(即十二分区)因位于新黄河之东,故名水东,处于归德、周家口、开封之中,形似牛角,故有三角地带之名。盛产高粱,小麦、绿豆也甚丰富,年来灾荒严重(水、旱、虫)均为欠收。

1943年下半年时,水东区甚为狭小,东西南北不过一二十里。甚至八九里地皆可碰到敌伪据点。大股顽军也甚为活跃。我军昼伏夜出,备当艰苦;三角地带充满了尖锐的三角战争。

国民党反动派专员不管人民死活,把杞县大堤掘开,以致河水泛滥,一片汪洋,因而敌伪活动亦渐缓和。

1944年敌人西犯郑洛,相继撤出龙曲、高才、官庄等据点,我军连打带吓拔掉了10余个据点,根据地焕然一新,顿形扩大,我军主力日益扩大,战斗力日渐提高,对敌人展开痛击战斗(如旧城、长岗、邢岗之战),特别是对典型的民族败类孟昭华打击以后,周围敌伪大为震惊,莫不俯首承附。自此群众更加依赖我军,军民关系为之一变。接着政府实行了合理负担,军民更是休戚相关、和衷共济。

环境日趋平稳,根据地的一切法令制度也见诸实行,先后建立了艺圃、克威、达生、清华、睢县、宁拓、淮阳等七个县单位,县大队的数目也日渐增加。

许多公路变成了抗日沟。

地区的扩大,干部对水东地形不好的感觉也慢慢地减少了。

水东区北接九、十、十一分区,东临新四军,西毗太行,水东区

孤军奋斗的局面，逐渐分化和改变。

在 1944 年的下半年，干部工作情绪大为提高，一切实际问题得到了相当解决。

现在水东区的一切，呈现了新的朝气。（完）

（摘自 1945 年 1 月 30 日《战友报》）

今后的三大工作^①

(1945年3月19日)

宋任穷

我们这个会开了整整19天,开得很好,在这19天当中,同志们介绍了很多而且很好的经验。这些经验,我们要学习,对领导上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应该感谢同志们的。今天我在这里提出几件事情来和大家商量。什么事情呢?

去年一年中,我们做了很多事情,而且都做的还好,今年还要继续做,今年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要首先看看边区的情况,去年一年中,边区扩大了,南边也好,北边也好,敌人的守备兵力与据点较从前已经少了些,而得到这个伟大的成绩,是我们军队政府和老百姓共同努力的结果。到会的同志们也是有很大功劳的。但今天有些地方还被日本人和伪军占领着,还需要我们打他,不打他,他不走的。过去因为边区被敌人分割,正规军游击队长期分散打击敌人,因此没有机会开会、上课、上操,也就是说没有进行整训,所以,我们部队中有些工作作的还不很好。第二,在前几年各地都闹灾荒,经过我们全体军民的努力,大部分地区虽都渡过去了,但今天各地还有很多人没有饭吃,如果我们不设法解决,还会有饿死人。有些地方,特别是北边,几年以来,减租减息,反贪污、反资敌等工作,作的还不好,而这些工作政府早已有政令,就是我们没有很好的执行。我们贫苦老百姓没有钱就不能生产,没有本钱就不能纺花织布,没有牲口就不能种庄稼。譬如临清县今春拿出50000斤粮食支持生产,可是有一个村反贪污倒出40000斤,你们看,要生产

^① 在边区群英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光依靠政府行不行；我们要坚决执行政府的法令，改善我们的生活，这样才能够好好的进行生产。在南边，减租减息，反贪污、查黑地等工作做得很好，但也有缺点，就是生产工作做的还不好。我们减租减息，反贪污得来的钱光吃掉是不对的。我们要拿这些钱来进行生产，我们从长期进行打算，才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起来。第三，高级领导机关，因为长期在上层，所以对下面的事情知道的很少，不能很快的改进我们的工作。今天军队里还存在着军阀主义的倾向，如对老百姓的痛苦关心的不够，对病员和战士的吃饭、穿衣、抗属等事的照顾也不够。地方上则有官僚主义的毛病，如对减租减息，反贪污事注意不够，在政权方面还有用旧政府的作风来对付老百姓的。

1945年的任务，毛主席提出了15项工作，我们要坚决做。那么，在我们边区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决定我们的工作应该注意那几件大事呢？我向大家提出三大工作。

第一，扩大解放区。什么叫扩大解放区呢？就是把我们的解放区扩大些，但不是把所有的敌伪据点都拔掉。怎么扩大呢？光靠军队是不行的，还要老百姓共同努力。去年郟城打刘本功，湖西打叛军，有几万几万老百姓参加抬担架，运输，送子弹，当时如果没有他们，这些仗就打不好。关于打法的原则，要作到我们少死，敌人多死。打谁呢？日本也打，伪军也打，特别要打那些压迫老百姓最厉害，而为老百姓最痛恨的伪军。这些伪军被消灭，日本没有了爪牙也就站不住脚。还有我们不打就不行，一打就坚决消灭他，这样他才害怕。我们打仗更应结合民兵，同他们在一起，好好的商量，得到胜利品，如枪、手榴弹要分给民兵，而民兵要配合军队围困敌人，进行侦察等工作。同志们要问打什么地方？还要同志们看看那里该打就打那里，那里有把握就打那里。

军队光打仗不行，还要整训；干部不关心战士，打仗就打不好，（一）干部要关心战士的伤病吃穿及家属等事。同志们不要认为这

些是小事,战士们他们认为这是大事。尤其医院工作更重要,对伤病号照顾不好是不行的。这些事做好了,打仗就有把握。(二)要发扬民主,过去军队中光说如何革命,这是对的,不过有事还要大家商量,是会把事情办的更好些。总之,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即“拥干爱兵”运动,如果干部爱护战士,战士自然就拥护干部。这样才能做到干部和战士是一致的,一个心眼。民兵要发展与整训。现在兵还不多,还要大大的发展,发展起来还不中,还要训练,学打枪。埋地雷、使用旧武器。

第二、做群众工作,要老百姓了解组织起来干啥?打敌人。现在南边好多地区的群众发动起来了,所以他们抗日就很积极。但目前还有很多地方没有组织与发动起来。怎么组织呢?要打日本不能没有吃的,要有吃就要实行政府法令,进行减租减息,反贪污、反恶霸,查黑地等工作。同志们回去以后就要干起来,但应和老百姓商量怎么干才合适,不要一两个人包办。还有我们要发展妇会、青会、而这些工作也要和老百姓商量着做。

第三、今年要大生产,种庄稼,纺花织布大家都赞成,但没有本钱,就无法搞起来,那么怎样办呢?我看,有两条路,一个是政府贷款,一个是执行政府法令,做好减租减息,反贪污查黑地等工作,把倒出来的粮食作为生产的资本。现在政府的贷款都已贷出来了,但贯彻政府法令还不够,甚至很差,减租减息工作尚未普遍的彻底的做好,是不是把全部倒出来的粮食都拿来生产呢?这要看看老百姓是不是愿意,如果穷人眼前没有吃的,就叫他吃,拿一部分生产,生产啥东西呢?(一)种庄稼、种棉花,而要种好庄稼,除研究技术外,还要组织互助组。(二)副业:纺花织布、淋小盐造纸……等。(三)运输,这个工作去年做的很好,今年应该做的更好些。把根据地的粮食棉花布匹牲口南北交流,减少我们的困难。(四)还有灾荒地区,我们应该继续发展生产设法把它渡过去。

明天同志们都要回家了,我们希望同志们把这三件事都带回

去都要做好。怎么做呢？你们起三种作用——带头、骨干、桥梁的作用。今年工作做好与做坏与诸位关系很大。因此，第一，希望地方上的英雄们时时刻刻和老百姓在一起，希望军队里的英雄们时时刻刻和战士在一起。这就是叫做联系群众。你们和群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你们生产好，你们家里有吃的，你们懂事懂得多些，你们来开会，得了奖品，你们去因为你们有些好处，很容易忘记群众和战士的困难，如果不关心老百姓的痛苦，不关心战士的生活，你们就是脱离群众，就会落后。怎样把群众的痛苦和把群众的穷苦解决了，就是联系群众的一件事。第二，希望你们在村中，在运输中办事要和群众商量。这次你们听到了那个分区的工作做得好，回到村里□□□□上，不管群众愿意不愿意，也不进行宣传动员工作，就照着人家的样子干起来，是干不好的。总之，要联系群众，就要关心群众的痛苦，办事要和群众商量。

另外，你们还要提高自己的技术。你们光能联系群众，如果技术不好，也不能成英雄的，提高技术包括两种内容，一种是细活，纺花纺得好，种地种的好，打仗打的好；一个是能走在人家前面，能刻苦耐劳，能做模范。联系群众与提高技术那个条件重要，我们说那个条件都重要；但联系群众是基本的，如果不联系群众，光技术高就不能当英雄，光联系群众，但没有技术，人家就不向你学习，也不能成为英雄。

最后，希望同志们不要因为到了濮阳城里，见了什么人，住了洋楼，骑了马，得了奖品就抖起来了，走起路来也不一样了。如这样的话是不对的。你们回去更要和气，遇事要商量，这样才不会脱离群众以及将来当不成英雄；还有，你们村里对干部对领导都要尊敬，如果你们看不起他们，自己就永远不会进步，咱们边区的工作也就不能通过你们作的更好。最后，祝你们继续努力进步，身体健康。

（原载 1945 年 3 月 25 日《战友报》第 114 期）



黄克诚同志函复在冀鲁豫边区的任职问题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征编委：

来函奉悉。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40年春，中共中央作出八路军一部分主力南下，新四军一部分主力北上，控制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1940年1月底，中央决定组建八路军第二纵队（辖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和新一、新二、新三旅及由杨得志任司令员的冀鲁豫支队），任命黄克诚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我建议另选派司令员，自己只任政委。中央旋即派左权同志任第二纵队司令员。不久，左权同志回总部工作，即由杨得志同志代理第二纵队司令员。我自太行山区率部进入冀鲁豫与杨得志同志会合后，即以八路军第二纵队政委兼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冀鲁豫军政委员会书记，张玺任区党委书记。在奉命消灭了顽叛石友三部后，我即率三四四旅、新二旅分别于五月下旬和六月初，离开冀鲁豫南下豫皖苏，继之进入华中。杨得志同志继续留在冀鲁豫边区。

专此奉复

黄克诚

1986年2月19日

战斗在冀鲁豫平原上

杨得志

编者按：《战斗在冀鲁豫平原上》，选自杨得志同志的回忆录《横戈马上》第五章原题为《在民族危亡的岁月》。抗日战争时期，作者是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他以朴素的语言描绘了在冀鲁豫平原的6年战斗经历，内容真实、生动，既是一篇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良好教材，也是研究我军历史的宝贵资料。本书编用时重拟了现用标题，并做了些小的删动。

一、向冀鲁豫挺进

1938年春，日寇为继续扩大侵华战争，调集曾参加过淞沪战争的主力 and 驻华北重点地区的部分兵力，企图占领战略要地——徐州，彻底打通津浦线。这样，它在华北地区的兵力便相对减少。为了在冀、鲁、豫平原开辟、发展我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配合和支持正面战场上国民党抗日的部队在徐州一带作战，毛泽东等同志发出了关于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的精神，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的部署作了相应的调整。其中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的一部分和一二九师的主力部队，接受了由太行山向冀南、豫北发展的任务。

因为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同志有病，这年夏天，朱德总指挥命令我由六八五团去三四四旅任副旅长，代理旅长职务。

当时，三四四旅旅部住晋东南长治附近高平县的安昌村。八路

军总部驻故县村。两地相距不远。据说长治市自秦汉置郡以来就是晋东南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这里，四面环山，形成一个小盆地，夏季气候异常炎热。我去总部朱老总那里接受具体任务的时候，机关的一些同志正坐在树荫底下，学习研究毛主席刚发表不久的《论持久战》讲演稿。朱老总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一本好象是油印的讲演稿，见我来了，扬了扬，问：“毛主席的这个讲演稿，你读过了吗？”

我告诉朱老总我从介休赶到旅部后，才见到毛主席的讲演稿，读是读过了，领会得却还很肤浅。

朱老总摘下眼镜，说：主席说了二十几个问题，很重要。各方面都讲到了，讲得很全面。特别是持久战的三个阶段——要我们有耐性，不要犯急性病。抗战一开始我们就坚信日本不可能灭亡中国，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一天两天也打不败他们。

他拿起毛巾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接着说，战争嘛，就是政治、经济、兵力和武器装备、指挥艺术的较量，看谁的优势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民心所向、或者叫作政治优势，这是任何敌人所无法和我们比拟的！毛主席说“兵民是胜利之本”，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朱老总谈到我们的具体任务时说：海东同志身体不太好。你是代旅长，要把所有工作“带”起来。前一段，中央派徐向前、宋任穷、陈再道等同志到冀南去了。你们去的这一片，属于冀鲁豫三省边区，是古战场。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啊。著名的城濮之战、楚汉相争、官渡之战、朱仙镇破金，以及唐末的黄巢农民起义等都发生在这一带。如今，这里对确保太行山，沟通山区与平原的联系，扼止日军南下和西进，起着很大作用。所以，无论如何要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里。任务艰巨啊！

我对朱老总讲，冀鲁豫地理位置的重要我知道一些，但对在平原作战，特别是在敌后作战，自己还缺乏经验。

朱老总说,困难不会少的。而且你这次去,号称一个旅,但你的政治委员黄克诚同志和主力部队不能马上和你一起走。你和崔田民只能带一点部队先去,所以叫做开辟根据地嘛。朱老总特别强调了“开辟”两个字,他还指出在那个地区很早就有我们党的工作,也有一些革命武装力量,群众基础也还不错。另外,还有不少有志于抗战的上层人士。至于平原作战,可以学嘛!当初上井岗山的时候,谁想过要强渡大渡河,要过雪山草地,要在平型关打坂垣师团呢!

朱老总的話把我說笑了。

朱老总见我汗水直淌,叫警卫员拿来一个西瓜切开,一边让我吃,一边继续说:到那个地区后,对日军作战我倒不怎么担心,因为据了解,那里日军主力比较少,但汉奸、顽固派、各式各样的杂牌军、土匪多得很。群众反映,那地方的“司令多如牛毛”哩!怎么办呢?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说中国要战胜日本有三个条件,而主要的是“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工作艰苦,形势和斗争也会错综而复杂,不过我看没有啥子了不起的嘛!

朱老总总是这样,在谈古论今,闲聊似的谈话中启发我们,教育我们,使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得到提高,学到许多既有理论又有实际的东西。

根据朱老总的指示,黄克诚同志和我研究确定,将六八七团(团长田守尧、政治委员吴信泉)留晋东南;我和旅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带着一百多人去河南滑县,与先到那里的韩先楚(团长)、康子祥(政治委员)等同志领导的六八九团会合。

三四四旅原来是红十五军团的底子,战斗力很强。但是我对这支部队的情况很不熟悉。所以,在黄克诚政委不在的情况下,如何带好部队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心中不太有底。黄克诚不仅年长我好几岁,而且早就是红三军团的领导人之一,为人正派耿直,原则性强,又有丰富的军事指挥和政治工作经验,我很尊敬他,思想上也有些依赖他。因此我便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

黄克诚同志听罢我的话，在自己的头顶上划了个圈，笑着说：“你有这些想法不奇怪。平型关战斗后上级派我来的时候，我也有过类似的思想。这次朱德同志亲自找你谈了话，任务交代得很明确，老杨，这种时刻派你来接替海东同志的工作，担子满重的啊！关于这支部队的情况嘛，一是去了以后就会慢慢了解的；二嘛，崔田民同志是老陕北，他可以协助你；三，大家都信任和支持你，你就放心大胆地干吧！”

告别留守部队和安昌村的群众时，黄克诚同志一直把我们送出村外老远。他握着我的手说：“你们先去打前站，说不定哪一天我们都得去。有什么情况我们及时联系，好在离得不算远嘛！”

这时已经是 1938 年的 9 月了。

我们经过十多天的连续行军，翻过太行山，从豫北的淇县、汤阴之间越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在滑县地区同六八九团会合了。沿途这一带虽未被日寇侵占，但由于国民党政府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地方反动势力的敲诈勒索，土匪的胡作非为，以及洪涝灾害，群众生活十分贫困，精神非常紧张。为了防范“兵匪”的骚扰，几乎村村寨寨都修起了土围子。我们经过的许多村庄，老乡们也都是把围子关得紧紧的。大人们躲着不照面，只有一些面黄肌瘦的孩子，瞪着一双双惊恐好奇的眼睛，远远地望着我们。但是到六八九团驻地，情况却完全相反，群众的衣着虽然也相当破烂，但情绪高涨。他们欢迎我们，送茶送水，问长问短，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喊着：“快来看啊！又来了八路军的大部队啦！”看到这样热烈的场面，部队受到很大的鼓舞。

“你们的群众工作搞得很好呀！”我对韩先楚同志说，“有些什么经验，给新来的同志们介绍介绍嘛！”

韩先楚团长这位 1928 年参加红军的老同志，操着一口湖北红安话说：“什么经验？还不是咱们那老一套——事事严格纪律，处处爱护群众，尽力帮助他们解决些实际困难。再加上一条，就是对敌、

伪、顽和土匪不客气。打几个胜仗，替群众撑腰、出气，这就行了！”

韩先楚的话说得简单，但我知道眼前这一切他们是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的。

韩先楚还告诉我，我们党的直南（指河北省南部，因该省曾称直隶省而得名）特委成立以来，陆续在各地成立党组织，发动群众武装抗日。但由于这一带反动势力比较大，党的活动暂时还处于秘密或半公开的状态。目前虽有了几个游击队，但武器装备很差，成分也比较复杂，思想政治工作又没有跟上去，所以战斗力比较弱。最主要的问题是党的统一领导还没有完全形成，中坚力量不强。他最后说：“你们来了就好了”。

“你们搞得不错，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说：“我看，关键问题还是要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就我们来说，要多打几个胜仗，煞煞敌人的气焰，鼓舞群众的情绪，一句话，局面已经初步打开，经过大家的再努力，形势会越来越好的！”

大家都高兴地笑了。

我们胜利会合后没有几天，总部指示我们堵截在冀南地区受到宋任穷、陈再道等同志领导的部队沉重打击后，正在向南逃窜的一股伪军。这股伪军的头目叫扈全禄，原系国民党军。我们从滑县经浚县过平汉路追到汤阴以西，将扈全禄部全部歼灭。俘虏伪军1400多人，其中还有两个旅长和一个团长。这一仗打得顺利、漂亮。在当时当地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大胜利。滑县县城从此得到解放。由于军事上的胜利，特别是中央加强了直南特委，我们在特委的领导下，又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基本上肃清了平汉路东、漳河以南、卫河两岸近百里地内的伪军和土顽部队，开辟了一大片游击根据地，建立了安阳、汤阴、内黄等县的抗日政权。

深秋，卫河流域发生了严重的鼠疫传染病。为了在少医缺药的情况下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部队的战斗力，上级一面要地方党组织尽力安排好群众的预防和治疗，同时指示部队返回晋东

南,在长治、高平(县)一带进行冬季练兵。

1939年的元旦,我们是在长治以南的柳林村过的。白雪皑皑的太行山,雄伟壮丽;银装素裹的长治盆地,千姿百态。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正兴高采烈地筹办春节,热闹非常。在烽火连天战乱不已的年月,能看到这样一种比较和平宁静而又热烈欢腾的气氛,给人以巨大的安慰。

过了新年不久,1939年2月初,我和崔田民又一次奉命东进冀鲁豫边区。

总部给我们的任务是:到冀鲁豫扩大部队,待命回山西。

由于那一带有了一定的群众武装,这次我们由山西高平县出发,只带了一个工兵排和一个炮兵排,总共不足100个人。黄克诚同志担心我带的人太少,要我再带点部队。我把和崔田民研究的意见告诉他说:“太行山是日寇目前扫荡的重点,更需要部队。根据我们的体验,冀鲁豫边区地带是把‘干柴’,一点就能燃起熊熊大火。既然总部要我们去扩大部队,你就放心吧!”

我们出壶关,经合涧,在汤阴以南宜沟过平汉路日寇封锁线的时候,正值春节。但车站附近的气氛同我们刚刚离开的晋南抗日根据地相比,真可以说是天壤之别。节日的欢乐气氛一点也没有,冰雪遍地寒风凛冽。看到的尽是衣着破烂、携家带口的难民。孩子哭,婆娘叫,老人们拄着拐棍四处乞讨。他们失神的眼睛望着我们,也许因为不了解我们,眼神中似乎还有些恐惧。

这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和父老乡亲啊!战士们心里很难过,他们谁也没吭声,只是默默地掏出自己为数不多的口粮,放在一双双伸过来的、干瘦如柴的手里,眼里无不饱含着热泪。

我的挑夫老谢,一位江西老倌,把自己身上的口粮全部送光了,又在他挑的破箱子里寻找着什么——那里边除了地图、文件,还能再有点什么呢?

我让警卫员把我的口粮交给老谢,让他送给群众。“不!”他说,

“你的口粮一粒也不能动！”

这位老谢同志，年龄比我大，当挑夫的时间也不短了。他身上凝结着中国农民忠厚质朴的美德，曾经多次负伤，身体不怎么好。我动员他不当挑夫，去当上士管管伙房。他说：“我一不识字，二不能算帐，顶个上士的名不工作有什么意思？不干！”我动员他去当马夫，那活比挑夫稍轻一点。他说：“我没有经验，喂不好马，误你的工作，万一让马踢了还得分你的心，让人伙照顾我，不去！”我说：“你总不能跟着我当一辈子挑夫呀？”“当一辈子挑夫又怎么了？”他有点急了。“你现在离不开我，未必日后就能离开我。只要你还打仗，就得有地图，有文件。有这些东西就得有箱子放。有箱子就得我来挑。”

这就是老谢。

老谢多年来还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在战场还是到驻地，看见什么人家不要的破布烂绳、针头线脑的总拣起来放着。年轻的战士们和他开玩笑说：“老谢，你拣这些破烂下小崽呀！”他不笑，只是说：“年轻娃娃懂个啥？日后总有用。世上没有白费的东西哩。”

这就是老谢！

老谢不让警卫员动我的口粮，却从箱子里翻出两块老羊皮。“这还是在陕北一次战斗中拣来的哪！”他说着把羊皮披在两个浑身发抖的孩子身上，挑起担子走了，一边走一边回望着那两个也望着他的孩子……

这就是老谢。

他用无声的语言给大家多么大的力量啊！

我们过平汉路，从五陵集渡卫河，在浚县与内黄之间的井店一带与刘震同志带领的一个大队会合。这个大队当时只有一个营的兵力，是从三四四旅三个团各抽一个连组成的。我们从这里经濮阳到达鲁西南边边上的东明地区，同地方党建立起来的两支游击队，组建成了八路军冀鲁豫支队。

冀鲁豫支队由我任支队长，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后为政治委员），卢绍武任参谋长。支队下辖三个大队。一大队长刘震，政治委员李雪三；二大队长覃健，政治委员常玉清；三大队鲍启祥，政治委员刘汉生。共约2000多人。以后还增加了四大队和五大队。四大队大队长是吴大明。是一个在“不愿做奴隶的人拿起枪来一致抗日”的口号鼓舞下，背叛地主家庭的同志，拉起队伍组成的。五大队主要是由当地一支成分相当复杂的部队改编过来的，大队长是胡继成。这时整个支队约4000余人。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冀鲁豫边区由我们党统一领导的一支比较早的抗日武装力量。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精神，我们的任务是在这片土地上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壮大抗日武装，建立民主政权。

开展工作比较困难，花力气最多的是鲁西南地区，也就是现在菏泽市周围的东明、定陶、曹县、成武、金乡、巨野直到梁山这一片。菏泽又名曹州，是著名的牡丹之乡。据说从明朝嘉靖年代就开始种植这“花中之王”，有红、黄、蓝、白、黑、绿、紫、粉等多种颜色和300多个品种。但我们来到的时候正值春末，不但不见牡丹，群众连粮食也吃不上，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菏泽东北的梁山县，是水浒故事中梁山泊英雄们聚义的地方。我们来到的时候，距宋江起义已近千年，只能看到一些传说中的“宋江寨”、“忠义堂”，“阮氏三雄故居”等遗迹。当时这里有两多：一是“土匪强盗”多，而且几乎所有的土匪头头都有绰号；二是土围子多，而且土围子都比较高、比较厚。群众的房子却很简陋，是用高粱杆糊上泥巴盖起来的。

由于受敌、伪、顽反动宣传的影响，我们刚到时，群众一见便往土围子里跑，跑进去就把围子门关得紧紧的，男男女女抄起大刀、梭标，架起土枪、土炮大喊大叫着不许我们靠近，气氛十分紧张。

进不去围子我们就在外面做群众工作。围子里的群众见我们不攻打他们（他们知道凭我们的武器装备攻打他们是不成问题的），不侵犯群众的利益，说话又和气，慢慢地白天把围子门打开，

让我们过路。但只许过路不许停宿——现在想，那也许是对我们的考验吧。后来，他们主动让我们在里面休息，有时还送些开水来。利用休息的机会，战士告诉他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来和他们一块打鬼子，打汉奸，打土匪的；喝水给钱，因为开水是柴火烧的，而柴火是他们砍的。不仅喝水要给钱，损坏了盆子、碗也得赔钱，这就叫八路军的纪律。这样的工作崔田民政委和我都亲自做过。这样的事情做多了，有的青壮年就说：“你们这伙子队伍俺们看真不孬，可就是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打得鬼子和汉奸，保俺老百姓过安生日子。”有的老年人问：“你们叫什么支队，支队最大的官，有没有俺们这里的司令大呀？你们有多少兵？那时候鲁西南土匪部队不少，司令多如牛毛，群众确实搞不清楚。”

我和崔田民、卢绍武等同志分析了这些情况，觉得通过工作，群众在了解我们的基础上，对我们的感情加深了，他们希望我们能打败日寇和汉奸，但又不那么相信。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要取得群众的完全依赖，最有说服力的是打些胜仗给他们看看。

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4月底我们夜袭了金乡县城的日寇守军；接着在金乡县白浮图袭击了日寇的一个汽车队。那天敌人没有准备（主要是他们没有想到会有人“敢”打他们），一接火他们就跑，战士们一边喊一边放枪一边追，战果虽不大，但煞了敌人的威风，长了群众的志气。群众说：“沈鸿烈（当时国民党山东省的主席）的兵听见日本人的马靴响就溜，八路军撵着日本鬼子的大汽车跑，厉害，‘蝎虎’，中！好！”6月，我们又连克曹县、定陶，歼灭了两个县城的反动武装2000余人。群众看到我们真的打了胜仗，原来的疑虑打消了，相信我们的战斗力了。有些青年人要求参加八路军和游击队了。我们帮助曹县建立了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支队，成立了民兵和民兵联防组织，还组织了“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的简称）、妇救会等各种抗日团体。曹县县委也由秘密转到公开活动。曹县成为我们在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区之一。

当时日寇在鲁西南的力量并不大，有的县城只有个把班或者一个小队，最难对付的还是那些“牛毛司令”的队伍和土匪武装。这些队伍的特点是成员复杂。有一部分人是死心塌地跟日本人当汉奸的败类和坚决反共的分子；更多的却是满脑子“杀富济贫”思想的无业游民（流氓无产者）和极端贫困的农民。后一部分人动摇性大，反复无常，和一些反动会道门有密切联系，又和群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男的外边“混事”（当兵），老婆、孩子却在根据地，有时他们还回来探家，当然也了解我们的情况。前一部分亲日反共分子大都与日寇和国民党有勾结，经常给日本鬼子通风报信，不准群众和我们接近，否则以“通共匪”论处，甚至把无辜群众抓去送给日寇杀害。对待汉奸武装和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自然好办，但如何对待这后一种情况复杂的队伍，以至把他们改造成为真正抗日的武装力量，政策性很强，也确实不易。

我们确定首先惩治那些民愤最大的汉奸头子。有一个名叫白毛集的土围子，不但群众发动不起来，平时我们进都进不去。后来一打听，就是由于有几个汉奸头子趁我们不在时，经常打着日本旗威吓群众，谁要反抗，甚至说几句我军的好话，便被送给日寇或在当地杀害。我们警告过多次，他们仗着自己有武装，有围寨，硬是不听。于是，我们决定打他们一下。打这样的土围子，我们的力量还是足够的。战前，崔田民、卢绍武对部队说：今天的主要任务是抓汉奸头子。抓住了决不客气，叫作杀一儆百吧！攻进土围子后，几个汉奸头子全被我们抓住了。于是，我们趁热打铁，就地召开公审大会，宣布其罪行，当场枪决。群众拍手称好，不少青年人马上报名参加了我们的部队，大大震慑了附近的顽固分子。也有另外一种情况需要计谋。记得支队建立不久，上级要我们将50多位从延安带来的干部护送到陇海路以南转交给新四军。我和刘震同志带这批干部从东明县和曹县之间出发，前面几十里地有个叫尹店集的村子，是我们的必经之地。这个村里盘踞着一股土匪武装，但究竟有多少

人一时搞不清楚。我们便派支队司令部侦察参谋唐毅山带一个侦察班先去侦察，见机行动。唐毅山原来是六八九团的一个连长，跟韩先楚到冀鲁豫一带活动，对这里的地理、民情、风俗习惯，乃至帮会的内幕都比较熟悉。唐毅山去了很长时间没有消息，我担心意外，便和刘震带领部队往前赶，随时准备战斗。我们刚赶到尹店集土围外面，唐毅山却高高兴兴地跑来向我报告说：“那股土匪武装解决了。”我问：“怎么这么快？”他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了一遍：

原来唐毅山伪装成敌人从开封派来的什么副官，带着几个侦察员趁黑夜闯进了围子，先捆起岗楼上两个呼呼大睡的哨兵，然后扑向司令部抓住了那个司令，缴了他和马弁们的枪，逼着他下了投降命令，俘虏了他全部官兵 280 名。“连一枪也没放呢！”唐毅山兴奋地说。

“俘虏在什么地方？”刘震问。

“全押在他们的司令部的大院里，一个也不少。”唐毅山说。

我和刘震等同志去看俘虏的时候，那司令战战兢兢地坐在板凳上，其他人都蹲在地上，斜头恐惧的眼睛，瞅我们。一个个穿得破破烂烂，头发、胡子长得象刺猬。我说：“你们不要怕，我们八路军主要是打鬼子，打汉奸的。只要你们不当汉奸，不害老百姓，我们一不打，二不杀，还可以放你们回家去。”他们开始很怀疑，我又给他们讲了这是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出了尹店集不远，我们就把这 280 个俘虏遣散了。他们很感激，有些人临走时还流了泪。但那个司令却很顽固，半路上逃跑时，被游击队打死了。到尹店集以南地区，我们把延安来的干部全部交给了前来接应的新四军六支队副司令员吴芝圃。

这件事证明：即使是被群众称为“土匪”的武装，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大多数人也是可以争取过来的，起码可以使他们不再与我军为敌。记得有个绰号叫“王四拐子”的“牛毛司令”，过去曾在冯玉祥部队干过一段，以后自己拉了一二百人，搞了这块地方

“占山为王”，当了“土皇帝”。他既怕日寇消灭他，也怕国民党军队吞并他。我们抓住他这个弱点，先派人同他联系，然后我和崔田民直接去做工作，鼓励他抗日。他见我们不但没有“吃”掉他的意思，而且不歧视他，便向我们靠拢，先是给我们送点情报，后来真和日本鬼子打起了游击，有些仗打得还满不错，并且在不少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对付这些“土皇帝”式的“牛毛司令”，当时有几句很普通，但很能震撼人心的话：“你们还是中国人吗？”“你是吃中国粮食长大的吗？”“你忘了自己的‘祖宗’是谁了吗？”这些完全是群众的语言，力量很大。还记得有个叫刘杰三的人，当时就五六十岁了。他有几百人的队伍。身边有一个卫队，每人一支步枪一支驳壳枪，叫作“一长一短”，全部骑自行车，满有点“山东响马”的豪放劲头。我们把他争取过来，委任他为这支队伍的司令，他逢人便讲：“我是八路军委任的司令，正牌的！”对我们很尊重，也一直表现很好。刘杰三有三个老婆。这一点在主力部队的同志中间便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想不通，说：“一个人三个老婆，怎么能当八路军领导的游击队司令？”我们告诉这些同志：你们是先动员他去抗日好，还是先动员他退掉三个老婆好？而且你先动员他退老婆，他还未能参加抗日活动。有一次卢绍武同志开玩笑似地对大家讲：“你是打土豪劣绅出来革命的；人家刘杰三是拦队伍占山为王；你是共产党员，党教育多年的红军战士、八路军战士，是为打日本到敌后来的；人家刘杰三在我们来到之前还不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哩！三个老婆有什么要紧，带着三个老婆打日本鬼子，对刘杰三这样的人来，我看可以。可我们这些人不行。支队长、政委、我和你们大家现在没有老婆，日后也只一人一个老婆。我们是共产党员嘛！”

对这些“牛毛司令”、“土皇帝”，我们的支队政委崔田民头脑冷静，很讲政策，又有耐性，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的活动自然引起了日寇极大的注意。秋末，他们纠集顽军

卢冀之部，企图在定陶、曹县一带包围我们。我们跳出包围圈，转移到湖西（微山湖、昭阳湖、南阳湖西部）地区，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政权。

转眼冬天到了。那时我住微山湖边上的一个小村里，组织筹备过冬的物资。一天，崔田民飞马从单县赶来，说中央军委从延安发来了电报，电报的主要意思是：冀鲁豫地区战略地位重要，你部应作长期打算，在该地区进一步创造、发展和巩固抗日游击根据地。这就是说，中央改变了原来交给我们“扩大部队，待命回山西”的任务。这当然是中央对我们的信任，但随着任务的变化，大量的工作必须跟上来。

这时，冀鲁豫支队已发展到了17000多人。要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这个地区，最突出的困难是要解决这17000多人过冬的粮食和棉衣问题。原来，我们跟国民党直南专员丁树本搞统一战线，他多多少少还补给我们一些钱、粮和其他物资。现在他变成了反共顽固派，不但什么都不给，还同我们搞摩擦。加上这一带的群众生活本来就苦，我们不能再给他们增加负担了。我对崔田民说：“这个问题不解决，我真睡不着觉。你看怎么办？”他也发起愁来，想了一会，说：“听说彭总现在在内黄，你是不是找找他去？”我一听，觉得这是个办法，就说：“好。就这么办！”

我带着警卫员骑马由微山湖向西北方向日夜奔驰。赶了二三百里路，到达内黄见到了彭老总。

彭老总住在一户农民的破草屋里，土炕上铺着一张旧席子。炕头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床薄薄的旧被子。他没有戴帽子，看来好长时间没有理发，原来的短发已经变长了，胡子倒刮得很干净，满脸红光，就是额头上多了几道皱纹。我见他盘腿坐在炕上，同司、政、后的干部正在谈话，就悄悄站在一边，没有打搅他。过了一会，我才向他报告。彭老总立即下了炕，大步走过来，拉住我说：“啊，一年不见了，大家都好吗？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我把冀鲁豫边区一年来的情况扼要地向彭老总作了汇报。彭老总高兴地说：

“你们搞得不错嘛！”

我说：“总的形势还可以。但也有使人伤脑筋、发愁的事呀！”

“发什么愁？”彭老总关切地问。

我说“17000多人，要吃，要穿，要用，都没有着落。冬天又来了，怎么能不发愁呢？”

“噢，17000人的‘大军’、吃穿用没有着落是个大问题，让我也得发愁呀！”彭老总说到这里停下来，笑咪咪地望着我。“这么说，你是从微山湖来向我‘讨税银子’的了！”

这是彭老总的-一个特点：他在听取下级汇报时，一般不插话，一讲话，就一语道破问题的实质。

于是，我直截了当地笑着说：“你说准了，就是找你要钱、要粮、要东西来了。你是我们的副总司令嘛！”

彭老总没有笑，也没有马上回答我。他默默地走到门口，凝视着前方，两手插在腰间的皮带上，魁伟结实的身躯几乎把整个门都挡住了。

我不知道将得到怎样的回答，心里有点惴惴不安。

过了一会，彭老总转过身来对我说：“困难哪，得志同志。你困难，我也困难。现在每个根据地几乎都相当困难。我们‘财神爷’（指供给部）的腰包里，据我了解也没有多少油水可挤。”

彭老总的-话使我的心儿猛地沉了下来。我知道他说的都是实际情况，我感到可能要空手而回了。不料，彭老总突然转过身来，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

“可我也不能让你这个10000多人的支队长白跑一趟。怎么办？我批一个条子，你去找供给部的同志，让他们给你——”彭老总停了停，象下了很大的决心。“给你10000银元吧。数目不多，一个人还摊不到一块。这些情况你要向各级干部讲清楚。还是要象在

井冈山、在中央根据地那样，一靠自力更生，二靠从敌人那里夺取！”战士们那个歌是怎么唱的？没有吃没有穿，敌人给送上前嘛！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嘛？”

彭老总笑了。

在场的同志也笑了。

我当然更是心满意足地笑了。

我和警卫员连日连夜返回鲁西南，崔田民和卢绍武同志已经把部队带到单县、曹县地区。他们一见我就急切地问：“怎么样？”

我把彭老总的指示向他们传达之后，说：“这 10000 银元是彭老总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拿出来的。以后我们再也不能向上伸手了——大家都困难嘛！没有别的办法，还是得去找敌人要！”

我们三个人商量要打一次汉奸，而且要打一个民愤大，又有钱、有物的。

打谁呢？

“‘打高二穷种’！”卢绍武说。

“高二穷种”是单县西南青堌集的一个大汉奸。虽然有个“穷种”的绰号，实际上，他地多、粮多、钱多，一点也不穷。这个家伙和日寇勾结很紧，家里挂着两面日本旗，还有日军授给他的委任状、指挥刀。依仗日寇的势力，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他本人丑陋不堪，又半身不遂，却霸占了 30 多个年轻妇女做他的老婆和姨太太，群众恨透了他。打这样的汉奸，既可以为民除害、出气，也可以解决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崔田民和我都同意卢绍武的提议。

我们把“高二穷种”捉住后，在当地游街示众，揭露他的罪行，并勒令他家里拿钱来赎他的命。

我们这一行动不但得到了 70000 块银元，而且把当地群众也发动起来了。我们用这些钱买粮、买布、买棉花，群众积极地为部队赶制棉衣。17000 多套棉衣很快做成了，针针线线凝聚着人民群众的深情厚谊。当部队穿上基本上是一色新的军装，向东明和濮阳地

区转移时,沿途的群众都高兴地说:“八路军越来越威风了。”部队的战斗情绪和坚持敌后斗争的胜利信心也更加加强了。

1940年春,我们向不断进攻我军,制造磨擦的顽军石友三、高树勋、丁树本及卢翼之等部,接连发动了较大规模的讨伐作战。经过近半年的战斗,将数万顽军消灭、打垮或逐出了冀鲁豫边区。这中间最漂亮的一仗是打丁树本。

丁树本是安徽人。据说曾在冯玉祥将军部下做过什么书记官。后来被国民党委任为濮阳专员兼保安司令。这个人开始和我们接触的时候,表现还好,以后越来越反动,还杀了我们好些人。丁树本当时有20000多人,每县都有一些人数不等的保安队。我们想,要打就得打得有理,因为当时他在表面上还是和我们合作的。要打就要打痛他,而要打痛他确实并不那么容易。多少日子,我们都在思考如何把这一仗打好。

有一次,我们在东明与濮阳之间发现了丁树本架的一条电话线。我让电话兵把线搭上,接到我的电话机上。我拿起听筒便听见东明县伪县长正在和丁树本通话(这些人我们都见过,声音挺熟)。丁树本在电话里点着我和崔田民、卢绍武等同志的名字,破口大骂,说他们这里本来很好,因为我们来了,日本人才来这里“扫荡”,这里才“乱了套”,他已经和其他各县县长商量好了,一定要把我们“挤走”、“挤垮”。

听完电话,我们把三个大队的主要干部找来,共同研究如何打好丁树本这一仗。他要“挤”我们,我们以“挤”对“挤”。他们公开打着“联合”的旗子,我们将计就计。具体方案是,用“联合”的名义派部队(一个连或一个营)去南乐、清丰、濮阳、东明、长垣等县驻防,待机行动,各个击破。各县顽军头目心中有鬼,开始都比较紧张。我们却纹丝不动,麻痹他们,慢慢把他们的兵力部署,火力配备侦察清楚,做到战前心里有数。这一切准备好,我们便和丁树本“摊牌”,指出他依靠日寇“挤走”、“挤垮”我们的反动计划。他不服,我们便

有准备地在同一时间从各地发起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丁树本的两万多人及直南五县的顽军绝大部分被歼。他本人只带了千把人逃往豫西去了，连他的大衣、图章都没来得及带走。

讨顽战役结束后，为了统一领导冀鲁豫抗日武装，按照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建立了冀鲁豫军区，我任司令员，崔田民为政治委员，卢绍武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下辖直南、豫北、鲁西南三个军分区。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冀鲁豫地区党委和边区行署，统一领导直南、豫北、鲁西南地委和各县抗日民主政权。

在残酷、紧张、复杂、多变的对敌斗争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也有极个别的人，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走上了可耻的道路。王凤鸣就是一个典型。这个人当过红一军团的青年科长，参加过长征。在战斗中也负过伤。我从六八五团到三四四旅去时，他还和我一路同行过。后来到山东地方党领导的湖西区当游击支队政委。他在那里大搞“肃托”，整了不少党政军干部。他还打电话给我，说鲁西南地委书记以下的不少干部是“托派”，要我们“逮捕起来交给他们处理”。我和崔田民同志商量，认为一是不能随意怀疑自己的同志，二要记取历史教训，三是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决不能这样做。于是，我们一面向上级写报告反映情况，同时也给他回电报表明了我们的意见。我们到湖西时还当面给他谈，要注意吸取中央苏区搞所谓“肃托”和陕北地区对刘志丹同志等错误处理的教训。他就是听不进去。以后，罗荣桓政委亲自去解决问题，严肃地批评了他。他当时表面接受，可是没过多久，在一次日寇大“扫荡”中逃到徐州地区，当上了伪军，还竟然到处写信，为敌人做瓦解我军的工作，成了可耻的叛徒。

这虽然是在艰苦的革命路程中的一个小小的、和整个斗争极不和谐的插曲，但我觉得今天写出来，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冀鲁豫军区成立后，黄克诚同志从太行山率领八路军二纵队来到冀鲁豫同我们会合。他给我捎来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同志

的一封亲笔信。左权同志是我一向尊敬的老首长，已经有几年没有见面了。听说是他的来信，我就迫不及待地拆开来看。信是用毛笔写的。字体刚劲工整，内容简短亲切，大意是：

得志兄：

现在二纵队大部分已经回到平原地区。中央决定我不再兼二纵队司令了，由你担任这个职务。请你务必把部队带好。我很想念你和同志们。我们不久会见面的，到那时再畅谈吧！

我等待着与左权同志会面，等待着我们的畅谈，我有许多话要向他讲，也有许多问题要向他请教。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这封简短的信竟成了他对我最后的嘱托和期望。1942年6月2日，年仅38岁的左权同志，竟然牺牲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与日寇激战的战场上。可惜的是，由于战乱，他给我的信没能保存下来。每当我想起这封信，总要勾起对他的无限怀念，想起在赣南、闽西的艰苦岁月，想起在艰难跋涉的长征路上，想起在陕甘宁战斗的日子里与他相处时的种种往事，左权同志热情、朴实、谦虚和大智大勇的形象，好象又出现在我的面前。太行山边陵川县有座佛子山，人称太行第一峰，海拔1800多公尺。古人形容“佛山之高，黄河之捷”，“俯视中州九千四百八十仞”。登峰远眺，黄水东流，云海翻腾，风卷大地。左权同志就长眠在这太行山的群峰之中。他和太行山永存。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黄克诚同志来冀鲁豫边区不久，6月，遇到了日寇10000多人分11路的大“扫荡”。天上是飞机，地上是坦克、大炮、汽车、摩托——机械化加骑兵，来势极为迅猛，而且应该承认他们对付我们也是有些经验了。他们的战法可以说有八条：一，集中兵力，有准备；二，歼我主力，而不单纯占点占线；三，战术慎重，分进合击与突然袭击相结合；四，夜行晓袭，走小路，住小村；五，夜间包围村庄，使群众不敢留我；六，与汉奸配合；七，用毒气；八，夜间如受我攻击则死守到明以待支援。根据敌人战法的特点，我们向部队提出了四项

要求：行动要轻装、秘密、迅速；侦察要日夜进行，情报要确实可靠；部队要多分散、多移动，四处迷惑敌人；不攻城、不占村，随时以有准备的遭遇战的形式消灭其有生力量。这也就是毛主席一再讲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法。

这次反“扫荡”打了整整 13 天。我们伤亡近 700 名同志，虽然会失去了整个濮阳地区，却歼灭了敌人（特别是伪军）大批有生力量，胜利还是不小的。

这次反“扫荡”胜利不久，黄克诚同志奉命率由原冀鲁豫支队改编的新二旅主力和四旅到华东加入了新四军。他走后，留在冀鲁豫边区的主力部队只新二旅的四团、军区独立团、独立游击支队（即赵基梅、谭甫仁支队）和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实际相当一个团的兵力）。当时由于日寇接连不断的大“扫荡”，各军分区的部队都在独立作战，军区能掌握的地方武装很少。要战胜大于我们一二十倍的敌人，困难是空前的。

这时，中央军委发来电报，征求我们的意见：是继续留在原地坚持下去，还是去（江）苏北（部）地区发展根据地。我和崔田民、卢绍武等同志都知道，这是中央体谅我们的困难、爱护我们。但是大家也知道，开辟冀鲁豫边区这块根据地是不容易的，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以说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有我们血汗。我们不能离开这里亲如父母兄妹的人民群众，也不能离开这块洒着烈士鲜血、埋着烈士忠魂的土地。

我们向中央发电，代表全区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请求允许我们和人民群众一起坚持冀鲁豫边区的斗争。

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请求，并给了新的指示。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将当地独立游击支队和当地几支游击队合编为第七、八、九三个团的新三旅，加上新二旅的四团，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和独立团，组成了新的第二纵队，去迎接新的、更加艰苦的战斗。同志们说：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打出来

的,现在虽然暂时失去了一些,但终究是会夺回来的!

二、斗争 生存 发展

1940年7月,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卓有远见地明确指出:“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在这之前的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在为党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中,尖锐地提出了要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敢于在日军占领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严重性要有足够的认识,要有充分的精神和组织准备等一系列极为重要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正确意见,是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及发展趋势提出来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都是很强的。就国内来说,1940年冬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以他的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表了臭名昭著的“皓”(10月19日)“齐”(12月8日)两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污蔑,强令黄河以南的抗日部队限期撤至黄河以北。我党为顾全抗战大局,在驳斥蒋、何、白造谣污蔑的同时,表示可将在皖南的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国民党一方面在电台上大肆宣传皖南新四军将要北上的消息,实际上要求日本人封锁长江,阻止新四军渡江;另一方面又调兵遣将,阴谋伺机歼灭新四军于北上途中。

毛主席的重要意见和当时严重的形势虽然引起了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的极大注意和重视,但极个别存有严重左倾观点的同志,并没有很快觉悟。时过不久,1941年1月,新四军9000余人,在泾县的茂林遭到国民党军80000余人的伏击。血战7昼夜,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及众多干部被捕,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被害,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同志大部分壮烈牺牲。这就是被毛主席称为“惊天动地的大事”的“皖南事

变”^①

“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命令陈毅同志为新编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毛主席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谈话，揭露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罪恶目的，警告日蒋反动派“放谨慎一点”“仔细……自己的脑袋”，大义凛然地指出：“……决不能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时局不论如何黑暗，不论将来尚须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和在此道路上须付何等代价，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②

我们是在豫北卫河东岸的内黄地区得到“皖南事变”的消息，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处理这一事件的命令、谈话及重要指示的。当时全区军民愤怒、悲痛的情绪可以说达到了顶点，求战欲望简直达到了不可抑制的程度。我个人也是这样，几天几夜总也冷静不下来。新四军中有我许多的老战友，他们如今怎么样了？他们的音容交替地在我面前出现。当我听说周子昆同志确实被害时，我非常难过。

我和周子昆是在延安“抗大”认识的。那时我是军事第七队的学员兼队长，他是我们队的教员。他对教学严肃、认真、负责；对同志热情、谦虚、诚恳。为了完成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尽快培养出深入敌后抗战的军事指挥员，经常顶着烈日，爬山越岭，带领学员搞现地教学。有一次，毛主席要我给大家讲讲游击战争的问题。我怕讲不好，周子昆同志便耐心地帮我准备发言稿。为了搞好教学，他经常向我了解红一团的作战情况。有一次，学校要每个学员写一份带理论性的关于游击战争的经验总结。我是打了多年游击战的，但要把实践经验变成理论确实有些困难。一天晚上，我冒着大雨钻进他的窑洞，他正伏在灯下备课。听我说明来意，他立即放下手里的工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732页。

② 见毛泽东《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

作,高兴地和我研究起来,直到鸡叫。象这样一些经过党的长期培养和战争考验的好同志,没有倒在与异族侵略者厮杀的战场上,却惨遭暗算,饮恨牺牲于卖国投降派一手制造的“千古奇冤”之中,怎么能不令人痛心疾首呢?

那些日子,我们抓紧时间向部队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我和崔田民、卢绍武等同志也交谈了许多、许多。我们从“皖南事变”谈到全国面临的危机,从华北战场谈到冀鲁豫根据地,从敌我力量对比谈到部队今后的艰苦战斗,越谈越感到:在整个战争形势恶化,抗日根据地被日、伪、顽蚕食、分割、封锁的情况下,要把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巩固和坚持下去,只有紧紧依靠党,依靠人民群众,以斗争求生存,在斗争、生存中求发展。必须教育、动员全区军民“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强烈的民族义愤和阶级感情,迎接抗日战争最黑暗、最艰难、最残酷和最严峻的考验。

凶残的敌人给我们增加了巨大的悲痛,也增加了我们战胜敌人的力量。

“皖南事变”后,毛主席代表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了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指示,为我们坚持敌后斗争指出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和政策。

国民党的反共高潮,直接助长了日寇的侵略气焰。1941年4月12日,日寇在从内黄到清丰、濮阳、浚县、滑县一带的沙区内,开始了极其残酷的毁灭性的“大扫荡”(通称“四一二大‘扫荡’”)。

时值春末,整个沙区风沙弥漫,一片昏黄。只有极耐干旱的枣树发出嫩叶,给荒凉的平原增添了一线生机。大“扫荡”开始的时候,我们和部队驻扎在濮阳以西地区,边区党委和行政公署机关也住在这一带。首先向我们驻地发动进攻的是国民党“剿共第一路军”李英部。这股伪军约两千余人,来势很猛,对根据地指挥中心威胁很大。我们决定以二纵队主力一部投入战斗。就在这股伪军即

将被打垮时，事先集结隐蔽于内黄、五陵集、白道口、滑县、濮阳等地的日军主力（三十五师团、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和骑兵第四旅团），加上伪军共约 10000 多步骑兵，有 100 百多辆汽车和坦克，20 余门重炮，兵分五路，向我们所在的沙区中心地区猛扑过来。

这天傍晚，只见东西南北沙尘弥漫，遮天蔽日，日伪军的坦克、汽车和骑兵蜂拥而来。远者相距五六公里，近者不到三四公里。不一会，敌人发起猛烈的炮击，炮弹接连不断地落在我们周围的村庄、田野、沙岗和森林中间。弹片如雨，爆炸声震耳欲聋，浓烟烈火，在大风中冲天而起。这种所谓“铁壁合围”之势，我在望远镜里看得很清楚。敌人靠机械化，我们只有两条腿，要想马上突围，显然来不及了。我和崔田民政委当即决定，由我在前，他居中，卢绍武参谋长压后，率领机关和部队就地荫蔽，待机转移。

在烈火硝烟中，我们先撤到沙岗中的枣树林里。这时，夜幕已经降临，由远而近的日军，用机枪疯狂地扫射。走在前面的伪军不敢贸然进入枣树林。等日军赶到，我们已借助于夜暗和大风的掩护，从两路敌人中间，穿插到濮阳西北地区。接着，继续转移到内黄东北面，靠近敌人守备空虚的据点休息了两天，最后到山东省范县西北的观城，这才突破了重围。

部队刚刚住下，四团政治委员孙仁道同志跑来向我报告：在最后边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的四团二营，在近百倍日、伪军的合击中，经过反复冲杀，只突出了五连的部分同志。六、七两个连队的 200 多名指战员，抱着宁肯自己战死也要掩护大部队转移出来的决心，同日、伪军搏斗了一天一夜，至今不见一位同志冲杀出来。两天两夜过去了，派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那里全部被敌人占领，看到了我们不少同志的尸体，200 多个同志啊！一个活的也没有找到……他们还说，战场上我们的武器不少，但没有一件是完整的……”

听这样的汇报，每一句话简直就象一把直刺心脏的钢刀……

孙仁道同志泪流满面，激动地用沙哑的声音几乎是喊着对我

说：“司令员，让我们打回去，为战友们报仇吧！”

我非常理解孙仁道同志的心情，我也知道他代表的是全团指战员的请求和决心。此时此刻，难道我还能有另外一种与他们稍有一点点不同的心情吗？……在热血沸腾的时刻要冷静下来是困难的。但是，残酷的战争锻炼了我们，要求我们越在这样的时候越要冷静，特别是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做到这一点。牵一发而动全身，错一步而输全局啊！当时，我们部队是打出来了，而被冲散了的地方党、政领导同志和机关的大批工作人员怎么样了？他们的战斗力不能和主力部队相比，他们如今在哪里呢？还有成千上万真心实意拥护我们的沙区人民群众呢？他们大部分人手无寸铁，而且多系老人、儿童和妇女。他们的处境是可以想见的。我们要打回去不是不可以，也不是没有取胜的可能，但要付出极大的代价那是肯定的。二百多位同志，难道仅仅是为了掩护我们主力部队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的吗？不，他们是为了保卫党、保卫人民政府，保卫人民群众，保卫来之不易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我们倘若只是为给他们报仇，而不顾后果地打回去，他们在九泉之下也是不会同意的。

“老孙，”我拍着孙仁道同志的肩膀说，“回去告诉大家，要很好地向六连和七连学习，化悲痛为力量……”我要说的话很多，可只说了这两句就止住了。但是我相信他能理解我的全部心思和感情。他一句话也没有说，郑重地向我敬了个礼，便走了……

孙仁道同志走后，崔田民同志过来对我说：“整个部队的情绪波动很大，我下去看看。”

“不，”我说，“你暂时不要走，咱们商量商量下一步吧。哎，卢绍武同志呢？”

我的话音刚落，卢绍武同志和几位团的干部一起进来了。看来他们不知在什么地方研究过了，一进门便一致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把日寇赶出沙区，保住根据地。

这是个实质性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具体办法却不一致。

“攻他的一路！”有的说。

“打他的侧后”有的这样主张。

“多面出击，把敌人搞个顾此失彼，尔后打它的回头！”有的这样提议。

我一边听大家的意见，一边思考：

这次日寇“扫荡”的目的，是找我主力决战，企图予以歼灭。我们若打其一路，必然引得多路齐来，正中敌人的下怀。更重要的是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我们身边只有四团、九团、独立团、民一旅和南下支队。而且突围中失散人员过多，实力都不足。在上万的敌人中，日军又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以硬对硬历来不是我们的战法，因此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另外几处办法虽各有所长，但弱点也是明显的。这一切都说明，目前在部分领导干部头脑中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那种无可指责的激动和急于报仇的情绪。骄兵必败，躁兵也是很难取胜的，特别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想到这里，我说：“敌人这次‘扫荡’，可以说是倾巢出动。这样一来，他的后方必然空虚。因此我提议，暂时绕开他们的主力，直捣他们的老窝。敌人的老窝不止一个，我们要一个一个敲打，目的是逼着他们分散兵力，以便我们争取在运动中杀伤他们。在中央苏区打过仗的同志还记得敌人军官的一句话吗？他们说：中央军是肥的被共军拖瘦，瘦的被共军拖垮，才被打败的。我们这次还用这个老办法，拖一拖日本鬼子，你们看怎么样？”

崔田民同志第一个支持我的提议，并且进一步分析了敌我态势和这种打法可能取胜的根据，各团来的干部也都表示赞同。于是这个“掏老窝”的方案便定了下来。

我们选定的第一个攻击点是豫北边边上，靠近鲁西南的清丰县。因为清丰离敌人“合围”我们的地区较远，而且守备力量不足。我们拿去一部分主力攻城，其余部队打据点，端炮楼，炸碉堡，夺物资，就是不让他们安宁。

实践证明我们的决定是对的。我主力部队在沙区游击队和民兵的配合下,到处袭击敌人,搞乱了他们的部署,打破了他们的“合围”,消灭了他们 700 余人,缩短了敌人原定的“扫荡”时间。

这次反“扫荡”打了 9 天。血与火的 9 天过去,我们再回到沙区中心地带的时候,除了人民的心,几乎一切都变了,变得我们都不敢认了。

反动的大资产阶级不是也讲“人道”吗?日本侵略者说他们来中国实行“大东亚共荣”,是“拯救”中国人民出苦难,也是实行“人道”的。请看看这些法西斯匪徒在沙区“扫荡”中所实行的“人道”吧:

法西斯匪徒们把无辜的群众(包括老人、儿童)赶到一处,让人们自己挖掘土坑再跳下去,跳满了,挤得身都转不动,他们就往上面泼开水,浇汽油,点上火,用机枪扫射。他们称这是“不封顶的活埋”!

法西斯匪徒们把无辜的群众(包括老人、儿童)硬推进深深的水井里,直至人体到达井口,再压上沉重的石滚子、碾盘,将井口封死。他们称这是“凉水煮人”!

法西斯匪徒们对我们妇女同胞(包括老妇和幼女)所犯下的罪行,是代表人类文明文字所无法记述的,凶残的野兽看到他们的暴行也会大为震惊的!

我们作过一个并不完全的统计,日寇在沙区中心地带的 3 天中——他们仅停留了 3 天,72 个小时:

烧毁村庄 139 个,其中全部变为一片焦土的 80 个!

杀我同胞 3400 人,其中有 53 户人家连 1 个人也没有幸免。

至于群众赖以生产和生活农具、车辆、牲口、粮食,荡然无存。

他们实行的是“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共荣”!

这就是日本法西斯的“人道”!

如果我们对日本军国主义者这些禽兽不如、令人发指的暴行没有仇，没有恨，没有怒，没有愤，我们还算得上是中国人吗？！

指战员在悲痛中大礼安葬自己的同胞。把自己仅有的粮、物，甚至身上的衣服脱下来，送给还活着的人民群众。

复仇的烈火在泪水中燃起，求战欲望被烈火燃烧得再也按捺不住了。

这时，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张玺，行政公署主任晁哲甫等同志带领区党政机关的同志们来了。这几位同志很早就在这一带搞地下斗争，可以说都是开辟和创建冀鲁豫根据地的老同志了。在一直为他们担心的时候看到了他们，本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但我和崔田民、卢绍武等同志同他们见了面，一时竟没有说出什么话来。

大家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

张玺同志为了打破这难耐的寂静，从破旧的挎包里掏出几个红辣椒递给我，说：“你是湖南人，这个给你！”

晁哲甫同志在河北大名第七师范学校当过教务主任，是1927年入党的老同志。他说：“这次‘扫荡’，可以说把我们的家底大部分都折腾光了。现在群众要吃、要穿、要住，一句话，要生存下去！救民如救火。我们和各县都讲了，首先要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另外我想，1933年黄河决口的时候，我们曾发动群众用‘吃大户’的办法，度过了‘生死关’，这一次的灾难不比那次小，那个办法可不可以再用？”

张玺同志沉思了一下，望着我们军区的几个领导同志，问：“你们几位的意见呢？”

我觉得，张玺同志的询问说明，他在考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问题。

崔田民同志大概也是这样想的。他慢条斯理地说：“我觉得‘吃大户’作为一个口号，目前可以不提。但是提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救济难民就是抗日爱国，是应该的。我们可以向一些开明的

地主士绅进行募捐……”

“但主要的要靠打汉奸和亲日派，强迫他们拿出粮食和钞票来。”我接着崔田民同志的话说。

大家同意了这个办法。

经过党、政、军、群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们终于筹集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边币”92000余元，粮食80000余斤，衣服千余件，以及柴草和大量的锅、碗、瓢、盆、农具、家具等，全部救济了难民。军区还派出了一支支小分队，帮助群众修房建屋，重建家园。这样，遭受劫难的沙区人民才度过了“生死关”，逐渐安定下来。使我们重新在这一带立住了脚跟。

我们在当时曾总结了敌人这次“大扫荡”的八个特点。即：一，大分进合击与小分进相结合；二、集中全力“扫荡”一点（沙区）；三，夜行晓袭，寻我主力决战；四，反复派人或用火力进行严密的搜索，夜晚用探照灯照射，企图使我无处存身；五，在次要方向大造“扫荡”舆论，以便在主要方向采取秘密的突然的行动；六，伪装我军，制造混乱；七，先占领我边沿村落，后以主力合围，层层包围，向内收缩，造成我难以突围的局面；八，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

这些特点显然与1940年“6月大‘扫荡’”的战略战术有很大变化和不同了。

我们也总结了自己的经验与教训，检讨了自己的缺点甚至错误。我们的主要经验是：一，根据敌侵华兵力不足，“扫荡”队伍多由各地拼凑而成的特点，抓准时机打其“老窝”。但发现其主力集中后应迅速转移；二，要学会在两路（或多路）敌人之间荫蔽自己的本领和抓住战机侧袭他们的办法；三，组织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牵制敌人，配合我主力行动；四，后方人员应分散，高级机关应经常流动；五，尖兵连应有两个向导，尖兵带一，连长带一，以免走错路，迷失方向；六，骑兵夜间不可走沟内，以免遭遇时难以机动；七，要有带夜光的指北针；八，我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我们主要的教训、缺点

甚至错误是：一，侦察网不好，在敌人内部（主要是指机关）没有可靠的秘密工作人员，以至这次大“扫荡”前我们没有掌握准确的情报，准备不足，有些地方和部队甚至毫无准备；二，部队极少数人中不仅有严重的右倾情绪，甚至发生过埋枪逃亡现象。

这些经验教训是我们稳住脚跟，部队展开整训时全区同志共同总结出来的。

这期间，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向苏联不宣而战，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打响了。

在中国，日寇抽调了7个师团的主力回师华北，开始了更为残酷的“治安强化运动”。在冀鲁豫周围的平汉、津浦、陇海三条铁路线上日军集中了6个师、旅团，根据地内日、伪军的总兵力达70000余人。根据地越来越小，回旋余地越来越窄。群众形容说：“一枪可以打透根据地。”当时，与我们紧邻的鲁西军区，也基本上处于同样严重的形势。据不完全统计，这两区的日、伪、顽据点，就多达多600多个。根据这种形势，为集中兵力使部队在更大范围内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我们和鲁西军区的领导同志商讨了两区合并的问题。经十八集团军总部批准，7月7日实现了两区合并，成立了新的冀鲁豫军区。野战部队仍为第二纵队（辖三个旅），其余部队均放到7个军分区。全区兵力共有27300余人。与此同时，经中共北方局批准，两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合并，成立了新的冀鲁豫区党委和行政公署。

新的冀鲁豫军区，由我任司令员，原鲁西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同志任政治委员，卢绍武同志任参谋长（不久卢绍武同志因病调离，参谋长由八路军总部巡视团留在冀鲁豫的阎揆要同志担任，）崔田民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原鲁西军区司令员杨勇同志，当时正去延安学习，但仍担任军区副司令员的职务。直到1944年1月我去延安，他才回到冀鲁豫军区接替我任司令员。

杨勇同志早先是红三军团中一位优秀的团政治委员。在中央

根据地我就听说过他的名字。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我们行军、作战在同一个战场上，但没有见过面。直到1936年毛主席率领红军东征胜利回师，在陕北召开的一次团干部会上，我才第一次同他相见。那次会议期间，大家兴高采烈地在一起会餐，杨勇同志坐的桌子离我不远，我们以茶当酒，互相祝贺胜利。因为他听说我年龄比他大两岁，就脱口叫了我一声：“老杨哥。”以后每次见面他总要用这种亲密无间的称呼来表达对战友的情谊。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一同参加平型关战役，又先后从晋东南转战到冀鲁豫平原。虽说分在两个军区，但在共同抵御日寇侵略和打击伪、顽的战斗中，我们都不忘紧密配合，互相支援。原想，这次两区合并，我俩可以在一起朝夕相处了，不料，我来他去，连面也没有见着……

有一次，苏振华政委问我：“你怎么不把杨勇同志留下住几天？”

我说：“杨勇同志我了解，只要命令一下，他饭不吃觉不睡也要立即执行。我留得住他吗！”

是呀，杨勇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对自己非常严格，对同志非常宽厚，党性原则性特别强的好同志。所以他在全军（特别是后期）享有很高的威信，受到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热爱。

新的军区成立不久，我和苏振华政委主持，在山东观城东南的红庙村，召开了第一次全区性的高级干部会议。这里离黄河故道不远，周围树木成荫，土岗环绕，十分隐蔽。时值夏日，天气很热，但从黄河那边吹来的微风，带着丝丝清凉，令人有说不出的舒畅。这天，除军区司、政、后领导同志早早到达外，各旅和军分区的领导干部也都来得很早，会场内外，充满了欢声笑语。

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领导人员有：教导第三旅代旅长王秉璋和政委曾思玉；教导第七旅代旅长余克勤和政委赵基梅；南进支队司令员赵承金和政委谭冠三。还有一分区司令员刘贤权和政委李冠元；二分区司令员周桂生和政委刘星；三分区司令员刘汉和政委

王乐亭；四分区司令员刘志远和政委石新安；五分区司令员朱程和政委王凤梧；六分区司令员李静宜和政委裴志耕；七分区司令员张耀汉和政委张应魁等。

他们当中，有来自江西、湖南、鄂豫皖等根据地的老红军；有在当地“揭竿而起”，发动、领导和参加各种农民暴动的老同志；也有抗战开始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大家过去虽不尽相识，但经过几年的共同战斗，已结成了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了。

会议期间，大家交流了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以及政治工作等各方面的经验，检查了以往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总结了教训。会议开得很团结，很顺利，也很圆满。

这期间，由于德国法西斯在欧洲战场特别是对社会主义苏联的进攻取得了暂时的“优势”，日寇的气焰特别嚣张。但偌大一个中国并不是小小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一口能够吞下去的。战线拉得越长，兵力越显不足的弱点，逼迫他们不得不采取“滥竽充数”的做法，以大批伪、顽军作“反共谋略部队”，企图以此把我军限制在狭窄地区。根据敌人的这个特点，我们会议确定了摆脱伪、顽军的箝制，将主力部队推到外线，反“清剿”、反“蚕食”、反“扫荡”，力争主动的军事斗争方针，决定以濮县、范县、观城、清丰、南乐等地为根据地中心区，立即分兵向东南和西南推进。10月上旬，我带着教三旅、教七旅和教四旅（从冀南军区调往山东军区，受阻后留在我区）共5个团的兵力，由观城出发，经范县、鄄城，到达山东省巨野县地区，同顽军孙良诚打了一仗。

孙良诚原归国民党三十九集团军冀察战区总司令石友三指挥，当时是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兼国民党鲁西行署主任。1939年12月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因遭冀中军区和冀南军区部队痛击，随石友三由河北沧州、石家庄以南逃窜到清丰与濮阳一带。1940年春又遭我军区部队打击以后跑到山东定陶以东成武以西地区，猖狂“蚕食”我根据地。他有3支主力部队，共约8000多

人。其中最大一支，是第十五纵队段海州部。因为此时他还打着“游击日军”的旗号，没有公开投敌，我们为争取他，先派代表去同他谈判，晓以国家民族大义，促其放弃反共政策，退出我根据地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日寇。但这个家伙却说什么：“要退，各退一半！”我们的代表便正告段海州：根据地是我们打出来的，你们不去打日本，却来这里抢掠人民财产，安的是什么心？你们要求“各退一半”是毫无道理的，也是我们断然不能接受的。谈判由此破裂了。孙良诚投降派的真面目也就彻底暴露了。然而，我们却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

当时，段海州按照孙良诚的命令，正进到巨野与定陶两县之间的柳林集、楚楼、黄庄、曹楼等地，处在我3个旅的中间地带。时值秋季，这一年虽干旱严重，青纱帐不大茂密，但对我们还是有利的。他们既然已经占了我们的根据地，而且继续推进，那我们就不能再忍让。于是决定打这一仗。经过三面夹击，5次激战，终于将段海州部大部歼灭，连他们的政治主任也被教三旅九团活捉了。随后，我们又以教三旅奔袭40多里外的金乡城北的羊山镇，捣毁伪自卫团总部。这一仗打了20多天，总共歼敌1000余人，俘获敌人600余名，缴获武器四百五十多件，迫使孙良诚向成武县以西退去。战役结束后，我们把巨南（新设）、成武、金乡、嘉祥、郛巨（新设）五县划为第八军分区，留下教七旅一部分主力，派赵基梅同志兼任军分区司令员和政委，使这块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巩固，与以曹县为中心的第七军分区联成了一片。

我们从巨野北返南乐时，按农村时令，已是“三秋”大忙季节，可是由于异常干旱，庄稼见长不见收，玉米、高粱杆子长得还可以，穗子上却没有几颗米粒。收不到粮食，秋耕秋种又难，这不仅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而且对部队影响也很大。人民有我们有，人民富我们富，我们是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啊！

我从郛城去南乐就接到了五、六分区部队严重缺粮的报告。崔

田民主任拿着报告对我说：“现在不只是这两个分区缺粮，其他分区包括主力部队也开始闹粮荒了。在目前，我看这比日伪顽军对我们的威胁还要大哩！”

苏振华政委说：“现在各部队钱有的是，可眼下群众自己还填不饱肚子，让大家到哪里买粮食呢？供给部的同志曾提出到敌占区去买，但我想问题也不那么简单，因为敌人对我们封锁很紧，要去买，就得有武装保护，难免要打仗。仗可以打胜，粮食问题的解决却没有多少保证。”

这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建议请地方党、政领导同志一起来研究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当时担任冀鲁豫行政公署副主任的段君毅同志，原是鲁西行署主任，对这一带群众情况很熟悉。他的老家就在濮县白衣阁，从延安回到边区，一直活动在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地区，当过特委书记、地委书记，是位很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同志。

我们把部队严重缺粮的情况提出来，和他共同研究解决的办法。

段君毅同志当然也很困难，但他还是相当乐观而又实在地说：“沙区今年旱灾最严重，几乎颗粒无收。咱们虽然管不着老天爷，但可以动员群众。我们已经要求其他县支援沙区，五、六军分区的缺粮问题，我们一定设法解决。”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自古讲兵马未到，粮草先行，部队饿着肚子打仗总不是个事，我再和各县同志商量商量，尽量为部队多筹集些粮食，不然不但今冬的日子不好过，我这个行署副主任也得‘辞职’了。”

段君毅同志的话给了我们信心和力量：只要有地方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支持，部队遇到再大困难也能挺过去。但我担心的是，部队筹粮过多，会增加人民的负担，尤其是灾荒年景，人民的生活已经够痛苦的了。想到这里，我对他说：“粮食我是得找你这‘父母

官’要，但筹粮不宜太多，不能过重的增加群众负担。不然，我这个当司令员的也于心不安哪！”

段君毅同志说：“军队是群众的命根子，这个道理，老百姓心里是透亮的。当然，咱们五话说在前头，就是我们尽上十二分的力量，也很难完全满足部队的需要。所以说，我们只能给部队一点小小的支援！”

段群毅同志就是这样一位非常纯朴而又十分实在的人。

段君毅同志走后不几天，行署通知在尚和县搞到一批粮食，要我们速派部队去沙区押送。我立刻命令民一旅旅长兼五分区司令员朱程同志带队前去。不料，运粮部队路过清丰县的宋村时，五十余车粮食，全被盘踞在那一带的顽军高树勋的部队截走了。经过几个小时交涉，据点里的顽军不但不交出粮食，反而嬉皮笑脸地无理纠缠，说什么“粮食嘛，你吃我吃都一样。你们八路军不是讲联合吗？这粮食我们先‘联合’了吧！”

接到这个消息，我的火真压不住了。这是地方党政机关不知花了多大力量组织人民群众勒紧裤带、一粒一粒省下来支援子弟兵的，这帮顽军竟敢截留，真是欺人太甚。

我告诉朱程同志：“你给我把宋村包围起来，限时要他们把粮食交出来。过时不交，就武力解决。”

朱程带部队把宋村团团围住后，这帮家伙才把粮食交了出来，但不是全部。他们还扣了十几大车。

朱程又连夜赶到军区司令部，眼睛不知是熬的还是气的，红红的。他激动地说：“司令员，这样不行，还是得打。你不下命令我自己去打，打完了回来你处分我。”他那双眼睛好象在喷火。

高树勋的部队拦截我们的粮食，威胁我根据地中心区和基本区的安全，我们打他们一下，教训教训他们不是不可以。但这样比较大的行动，特别是对于高树勋这样一个具体对象，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同其他领导同志商量一下。“这样吧，”我对朱程说，“你先回去

掌握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我们研究后再通知你。不过,你要记住一条:没有命令绝对不许开枪!”

高树勋原来是国民党新八军的军长。1940年底,他和孙良诚密谋,杀了石友三及其弟石友信(该部教导师师长),夺取了国民党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在当地叫做“石高事件”。这个事件从本质上看,当然是他们内部的斗争,但他杀死了反共摩擦最厉害的石友三,对冀鲁豫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是有利的。经过我们的工作,高树勋为抗日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后来在日寇诱降和国民党政府的压力下,逐渐转向亲日反共。即使这样,我们考虑到他不是国民党的嫡系,并和我们有过合作抗日的历史,所以一直对他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在这次“粮食事件”中,我们也是“先礼后兵”。谁知,他却乘机进犯我根据地中心区,以两个团进占了清丰东南的东北庄,于是我们只好决定实施反击了。

11月13日夜,月色朦胧,寒风阵阵,我带着南下支队和教三旅的七团,从南乐县东的陈村出发,赶到清丰县的东北庄。东北庄只有百把户人家,不大,我们的目的是引诱高树勋住在此地周围的部队来增援,以便消灭他的主力,打狠他,打疼他,以至迫使他退出东北庄地区走抗日的正路。部队是佯攻,直打到第三天拂晓,高树勋才调集了四个主力团赶来增援。他们从侧后迂回到东北庄东南地区,三面夹击了教三旅七团三营。这个营在一片开阔地上,硬是顶住了顽军多次集群式冲锋。敌人密集的炮弹,机枪和步枪子弹,几乎把那片开阔地翻了个儿。突出在全营最前面的九连指战员,在数十倍敌人的轮番进攻下,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我得到这一情况心疼极了。我要部队立即向敌侧后迂回,形成包围圈,在犬牙交错的激烈战斗中,毙敌600余人,俘敌200余人,给了高树勋一个沉重打击。后来获悉,高树勋在听到他的主力被我们消灭这么多时,抹着眼泪说不出话来。

这一仗,我们在高树勋手里伤亡了250余名同志。这之后不

久，当日寇以武力开始逼高树勋，使其损失 5000 余人时，我们仍以民族利益为重，不念旧恶，派了两个旅掩护他们撤退，从濮阳、濮县转移到范县根据地内休整，然后又经过湖西地区，把他的残部送到陇海铁路，并将其失散人员和枪支收集起来，送还于他，才使他免于被日寇全歼。临别时，高树勋曾让人捎话给我：八路军对我仁至义尽，从今往后，我决不和八路军打仗，请杨司令员相信我。解放战争初期在邯郸战役中，经过刘帅和邓小平同志的耐心说服和教育，高树勋终于率部起义，脱离了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军偷袭了美军太平洋基地珍珠港。次日，美英等国对日宣战，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根据上级指示，从主力部队中抽出部分干部，组成了十五个游击支队，深入到敌后纵深，发动群众，展开更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但由于敌人频繁地“扫荡”，疯狂地经济掠夺，和异常严重的旱灾，1942 年刚过，饥饿和瘟疫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冀鲁豫平原蔓延开了。

饥饿和瘟疫造成的破坏，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亚于敌人的进攻。因为敌人进攻我们可以还击，可以取胜；而严重的饥饿和瘟疫在当时条件下简直是不可抗拒的。

群众开始了毫无目的地逃荒。去山西，闯关外，从这村逃到那庄，由这城奔往那县，挣扎在饥饿和瘟疫的死亡线上。山东范县是一个小城，我到那里的时候，竟挤不出逃荒要饭的人群。一些在根据地从未出现的、令人不忍目睹的事情发生了：

一位壮年汉子肩挑一对箩筐，一头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孩子，污面乱发，分不清是男是女。那汉子有力无力地喊着：“谁要孩子，按斤换粮，一斤换一斤！”他的妻子扑在孩子身上，疯叫着：“不！不！俺不！”

一位年过 50 的老妇，领个头插草标、面黄肌瘦、衣不遮体的姑娘，喃喃地哀求行人：“哪位先生行行好吧，把俺这闺女领去吧，她

才十八岁，您老给她碗剩汤就行，领去吧，救她一命吧。我老婆子不要钱，也不要粮……”姑娘在老妇凄惨的乞求声中，扑簌簌地流着泪……

妇女的疯叫，姑娘的泪水，老妇的乞求，孩子的无言，这一切似乎刹时都变成了刺入我们心上的钢刀……

指战员们把能拿出来东西都拿出来了。有的同志把孩子抱在怀里，给他两块干粮，又无可奈何、恋恋不舍地放下了他……

我们应该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些受苦受难的人。但当时全区受灾的村庄达 1600 多个，有 80 万人断了粮菜，其中有 800 多个村庄已空无一人。春寒未过，连树皮树叶也是干枯的啊！即使把部队所有的一切都献出来，也解决不了问题，更何况我们的物力、财力已经少得极为可怜了呢？

军区供给部长傅家选同志从八路军总部后勤开会回来，对我说：“现在华北各地旱情都非常严重，总部指示各区部队要和党、政、民一起自己救自己，上面拿不出更多的钱和粮食来，如今我们的钱袋和米袋也空了。既要救自己，又要救群众，这怎么办哪？”这个红军时期的老同志，老后勤，一向被战士们称为“主意多，办法多的好管家”，也愁得连觉都睡不着了。

办法还是有的。这就是我们根据中央和毛主席有关指示精神提出的：依靠群众，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多打胜仗；开展生产，军民自救。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冀鲁豫平原没有下过一场透雨。田地开裂，小河干燥，卫河、微山湖、东平湖的水位也急剧下降。夏、秋两季，又大面积减产，地方政府征粮更为困难。这时间，指战员们每天只能吃些南瓜和少量的杂合面，有时甚至连南瓜汤也喝不上。在这种情况下，要同总兵力已增至 12 万余人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其艰难苦困是可以想见的。然而，冀鲁豫军区部队并没有动摇自己的战斗意志和抗日必胜的信念。指战员们纷纷表示：朱总、彭总号

召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我们也要与冀鲁豫人民共存亡！有的同志豪迈地说：“有我们在，就有祖国山河在，我们与这块国土同在！”

的确，环境和条件虽然异常艰难，但部队的对敌斗争和各项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秋天，我们收复了梁山，恢复了东明、长垣、兰考地区，新建了南华、滨河两县，与此同时，还轮训了各地抗日武装，扩大了民兵联防，并配合地方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开展了合理负担、减租减息运动，使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更加扎实。

这期间，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刘少奇同志来到冀鲁豫军区。少奇同志是从苏北经山东到延安去，路过我们这里的。

这是九月上旬。日寇第十二军团长喜多诚一正在频繁调动平汉和陇海铁路沿线的部队，准备对我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发动“扫荡”。得知少奇同志要来的消息，我们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能在这种艰难困苦的年月里见到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听取指示；担心的是少奇同志的安全。经军区党委研究，给部队下了死命令：要用生命保证少奇同志的安全。

一天下午，我们刚将反“扫荡”的任务布置下去，少奇同志就在我们的部队护送下，安全地来到了军区机关驻地红庙。掩映在绿树丛中的这个小村，十分隐蔽。化了装的少奇同志，头戴黑色礼帽，身穿灰布长衫，显得刚健朴素，神采奕奕。我们在场的，除了军区几个领导同志外，还有边区党委和行署的领导同志。当我向少奇同志一一作了介绍后，他非常高兴，瘦削的脸庞上带着亲切的微笑，热烈地握着每个同志的手，不住口地向大家问好，表示慰问。

看到中央的代表少奇同志，同志们虽有满肚子的话要说，可又恨不得立即听取他的指示。然而考虑到他在充满风险的路上长途跋涉，已经很疲劳了，都劝他早些休息。但少奇同志不肯，他笑着对大家说：

“你们在这里坚持斗争好几年都不累，我走了几十里地，还是

在你们的‘重兵保护’之下，累什么？不累，不累，能见到同志们不容易，我们还是先谈谈吧。”

少奇同志一坐下来，就认真地听我们的汇报，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着，偶而插几句话，也多半是进一步询问或提一些与我们商量的意见。我们汇报完了，请他作指示，他说：

“我过去从没有来过冀鲁豫，对这里的情况了解得很少。听了大家的讲话，我了解一些情况，可要我作指示，现在还不行，我还说不出什么对你们有用的意见。这样吧，晚上我们再谈谈，然后我再讲点意见好吗？”

少奇同志没有马上讲话，但他那平易近人，谦虚谨慎和深入细致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吃饭后，少奇同志又把军区的几个主要领导找在一起，听我们继续汇报几年来创建冀鲁豫根据地的情况。他对根据地建设中遇到的问题 and 困难，问得非常详细。

夜已经很深了，他还没有睡意，我们几次催他休息，他都说：

“你们多讲一些。把情况讲透，把你们对中央的意见和要求提完。离天亮还早，不要着急嘛！”

在我的记忆里少奇同志是吸烟的，但那一天他一支也没有吸。我问：“少奇同志，你戒烟了吗？”

少奇同志摇摇头，笑了：“不是戒了，是没有了。”

那时我们军区的几个领导同志都不吸烟，也没有拿烟招待人的习惯，听说少奇同志断了烟，我们赶紧派警卫员去找来了半包烟给他。

少奇同志吸着烟，精神似乎更足了，他又听我们讲了一会儿，才根据我们的情况，就根据地的发展、巩固；地方政权的健全、建设；统一战线工作；反“扫荡”斗争等，作了详细的指示，提出了很好的而且是切实可行的意见，同时还给我们讲了国际上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形势。

少奇同志这次路过我们这里,除了听取我们的汇报之外,还找区党委、行署的负责同志,一些机关和部队的一般干部,和党外爱国人士谈了话。

少奇同志的到来,对整个冀鲁豫地区各方面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和鼓舞。

眼看敌人的大“扫荡”将要开始了,我们心里很着急,劝少奇同志早些离开冀鲁豫。他却笑着说:“有你们在,还怕敌人把我‘吃’了?我还想多待些日子,同你们一起反‘扫荡’哩!”

少奇同志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考虑到敌人这次“扫荡”的规模不会小,战斗势必十分激烈,我们还是再三劝他离开。

少奇同志终于同意了。于是我们派部队护送少奇同志从安阳地区的地下交通线通过日寇沿平汉铁路设置的封锁线,安全到达太行山根据地。

三、曙光在前

毛泽东同志在《祝10月革命25周年》一文中曾说:“我们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5年多了,我们的前途虽然还有艰苦,但是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得见了。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不远的了。”^①今天的青年同志很难想象,在抗日战争还处于严重困难的1942年,这些话给了坚持敌后斗争的我们以多大的鼓舞和力量。

人们知道,曙光到来的黎明前夜虽然短暂,但却是最黑暗的。而战争的胜利又不象自然界的曙光会自己出现,它要靠我们的流血牺牲去取得。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战争胜利的曙光和黎明,是先烈们的鲜血染红的。

送走少奇同志之后,我们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先后粉碎了日寇对濮、范、观中心区和湖西地区“铁壁合围”式的两次大“扫荡”。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845 页。

然而，我们却有 2000 多位同志为胜利 倒下了。代价是何等高昂啊！象八分区政治部主任魏金山、六分区十团团团长肖明等同志，都是同敌人拼搏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的。1943 年初，又传来水东军分区政治委员唐克威同志英勇献身的消息。

唐克威是冀鲁豫地区土生土长的共产党员。还在 1939 年，驻濮阳的国民党直南专员丁树本搞反共高潮的时候，他就担任我们驻丁部的办事处主任。他和丁树本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40 年，反共越来越激烈的丁树本遭我们歼灭性的打击逃跑后，中央决定我们向豫东挺进，恢复和发展新四军四师曾建立的水东根据地。1943 年 1 月，水东地区正式划归冀鲁豫边区。区党委、军区即决定唐克威任地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没有想到他到水东不久，竟在一次反“扫荡”中光荣牺牲。从此，再也见不到这位坚定、无畏又十分乐观的好同志了。后来军区参谋长阎揆要告诉我们，唐克威是在 1000 多日伪军将水东军分区机关和部队包围后，带着独立团，主动出击的。敌人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把他的手和腿都炸伤了。他躺在地上仍然坚持指挥战斗，直到机关的同志和大部分部队冲出包围圈，才倒在血泊中……参谋长说到这里，在场的同志都沉默了。那天风雪交加，满天的飞雪象是把人们的心搅碎了似的，我一闭上眼睛，唐克威的形象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到了春天，无情的灾荒仍然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存。当时刚到边区担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的黄敬同志，为救灾工作花费了很大的心血。有天晚上，他把一些灾情报告递给我，推了推近视眼镜，心情沉重地说：“这样严重的灾荒，不但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也会影响部队的情绪和作战，我们得赶紧想办法啊！”

我知道黄敬在晋察冀和冀中呆的时间很长，而那里和冀鲁豫同是平原，特点和条件相似，便要他谈谈那里的经验。我说：“反正

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

“对啊，我们在冀中就是这个办法。”黄敬详细地讲起冀中的党组织和军队如何领导人民群众办救灾合作社的事。说：“办法很多，比如纺纱织布，烧砖烧瓦，搞各种运输等等，总之，因地制宜，着眼生产，群众自己救自己。”

听完黄敬的介绍，我很高兴。我说：“办合作社，这个办法好！灾民有了组织，就不会外逃，社会秩序可以稳定下来了。”于是，我们又讨论了组织合作社的具体办法。

经过广泛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灾民合作社如雨后春笋，在冀鲁豫根据地内普遍办起来了。有纺织的，运输的，打井的，熬硝晒盐的，形式多种多样，并结合开展减租减息，反贪污，反汉奸，反黑地，借粮，赎地，改选村政权，实行合理负担，来巩固灾民合作社。这样，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发展到 20 余县，仅山东省的运（河）西几县参加的群众即达 20 万余人。人民群众齐声称赞：“这会，俺们再也不用逃荒要饭了，共产党、八路军把死路变成活路，俺们得救啦！”

老百姓确实得救了。有一天，我和黄敬到东平县走了一趟，县委领导同志高兴地向我们汇报：从合作社办起来后，群众生活有了着落，谁也不愿意离乡背井了。比如，一个灾民织了一匹布，可赚 30 元，按当时米价买回 3 斤 4 两米，每天还可得到贷粮 2 两；参加运粮的，1 人每天所得的粮，除自己吃外，还可养活一个人；掘井的，一眼土井可得贷粮 30 斤，一眼砖井更多，可得贷粮 300 斤；晒硝盐的，每人每天可收入 60 元，能买谷子 5 斤。贷粮从哪里来的呢？主要靠我们的县政府和合作社出面，向地主借，其次是靠反汉奸，靠以物换物从外地购买，靠从敌人手里夺取。比如 2 月份，他们就从地主那里借了上百石粮度春荒。

听罢汇报，黄敬对我说：“形势有了好转，但是还不能太乐观，春耕季节快到了，牲口、种子还是个大问题。”

我说：“劳力的问题不大——我们可以派出部队，抽出骡马帮

助群众，至于种子嘛，要看你这位党委书记的了。”

春耕开始后，我们通过各行政专员公署及县区抗日民主政府向人民群众发放了种子和贷款，部队牵着骡马，协助当地老百姓耕地、送肥，麦收时又帮助搞运输。与此同时，还在党、政、军、民中开展每天“人省一两粮，马节二两料”的节约运动；在部队中号召学习“南泥湾精神”，贯彻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开荒种地。^①这时，尽管日、伪顽对根据地的“蚕食”、“清乡”、“扫荡”依然不断，尽管各地战斗异常频繁、激烈，但由于我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坚决贯彻党中央生产自救的方针政策，加上“老天”帮忙，连降几天透雨，干旱基本解除，到麦收过后，冀鲁豫的形势就开始好转了。征粮任务超过了原定计划。

那时，冀南军区在敌人的严重摧残和自然灾害的双重袭击下，正是最困难的时期。我们派部队把几万斤粮食秘密运送到冀南地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治委员宋任穷同志都高兴得不得了，他们让带队的同志捎话给我和黄敬等同志，表示“万分感谢”，说是“雪中送炭”。过后还专门给我们发了电报。说实在的，我当时觉得很惭愧。因为我知道，这么一些粮食对于冀南几十万受苦受难的人民来说毕竟是太少了……

毛泽东同志说过：“战争不但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②事实正是这样。上半年，由于我们在经济竞赛中打了胜仗，使几十万灾民稳定下来，结果根据地和抗日武装也大大发展了。我们不但从敌人手里夺回了1100多个村子，改造了村政权，而且发展了77个民兵联防区，约22万多人的人民武装，把原来掌握在反动阶级手里的武器大部转到了可靠的农民手里。更令人鼓舞的是，毛主席在延安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著

^① 这个方针是毛泽东1939年春天对陕甘宁边区提出的。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973页。

名报告,在全党发起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这时在冀鲁豫党内也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和开展。我们按照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与检查工作的指示》,检查了军事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总结了经验教训,并派出了大批党员干部到晋冀鲁豫参加轮训,同时整顿了各地基层党支部。所以,军民情绪空前高涨起来了。

6月下旬,当我和黄敬等同志从各地检查完工作,回到濮阳西北道口村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庆祝胜利时,人民群众为表达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感激之情,慰问演出了各种地方戏,足足热闹了好几天。

沸腾的道口刚刚平静下来,却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和愤慨的消息。蒋介石正在调动胡宗南(第八战区副司令)指挥的三个集团军(缺一个军),撤离黄河防线,进攻陕甘宁边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过不几天,黄敬拿着朱总向蒋介石发出的“抗议电”和毛主席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总部转来的油印件),告诉我:延安已经召开了紧急动员大会,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发表了声明和通电,支援陕甘宁边区;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人士也在纷纷集会,声讨蒋介石制造内战的罪行。讲到这里,黄敬问我:“全国都动起来了,我们怎么办?”

我接过他递来的电报和社论,看了一会,回答说:“要问怎么办,我的意见是一个字:打!多打几个胜仗,用实际行动支援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黄敬表示赞成我的想法,并派通信员把阎揆要参谋长和崔田民主任一起叫来,研究作战方案。

当时,对我们根据地蚕食最厉害的有两股敌人。一股是豫北杜淑伪军。该部原属国民党第一战区,两个月前投降日寇,改编为伪二十七军,隶属降将庞炳勋指挥,共有两个师(四十五师和四十六

师)和两个独立旅,约1万人。从原来盘踞的平汉路汤阴至新乡一线已侵入我豫北卫(河)南根据地,企图向鲁西南伸展。另一股是顽军李仙洲部(国民党第二十八集团军,李为总指挥),奉蒋介石之命,于1942年11月由皖北越过陇海铁路,侵占我湖西根据地边缘的丰(县)、砀(山)、单(县)、鱼(台)一带后,现正向曹(县)东南地区进犯,并企图东犯普南。

这就是说,顽军在东,伪军在西,对我冀鲁豫根据地形成了两面夹击之势。

我们研究决定:首先打击盘踞在军区门口的伪军文大可部,再兵分两路粉碎李仙洲和杜淑的进攻。东歼李仙洲,由我和崔田民指挥;西歼杜淑,由苏振华和阎揆要指挥;黄敬留守军区机关,坐镇濮、范、观中心区。

文大可原是国民党三十九集团军石友三部的教导师副师长。1940年“石高事件”发生后,他率领该师投敌,被编为伪军暂编三十一师,并任师长,奉日寇之命来到朝城。

朝城,名义上叫城,实际上是个大镇,离范县只有几十公里。文大可部虽称一个师,实际上只有3000多人,并且分散在各个碉堡和据点,加上内部派系斗争,矛盾重重,战斗力不强。针对敌人的弱点,我们以二、三、四分区各一个团担任主攻,并由民兵大队配合,在7月9日夜开始向朝(城)南地区的敌人发起进攻。部队、民兵和当地人民群众对文大可恨之入骨,一听到枪响,即刻投入战斗。仅三天时间就拔掉了92个据点和碉堡,毙俘敌700多人,缴获一批武器,收复了朝城周围大部地区。文大可带着残部,躲进离城较远的几个大据点里,再也不敢进犯我根据地中心区了。黄敬立即派地方工作同志,到收复区建立基层政权。

7月下旬,朝南战斗结束不久,我和崔田民按照预定的作战方案,组织了一个人数很少的“小前指”,率先从朝城地区出发,冒雨渡过黄河,进入鲁西南,很快集中了二、五、六3个军分区的6个主

力团和游击队、民兵，在曹县东南地区发起了反击李仙洲顽军的战役。

时值盛夏，闷热异常。青纱帐里毒蛇、蚊虫逞凶。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要对付李仙洲指挥的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4个师和20000万多人的国民党地方部队，任务是很艰巨的。战前，我和崔田民在五分区驻地召集连以上干部作了动员。告诉大家，对李仙洲我们是先礼后兵。前一段我们对他作了不少工作，但他倚仗人多枪多，视我们的耐心工作为软弱可欺，与日寇沆瀣一气，蚕食我根据地，杀害我抗日干部和人民群众，气焰嚣张得很，这次必须给他以狠狠的打击！

我们首先向曹县以东李仙洲总部外围的村寨发动攻击。李仙洲大为震惊，急忙命令聂松溪（师长）的二十一师，曹班亭（副师长）的暂编三十师，常振山（旅长）的保安第七旅等向他收缩靠拢，以待丰（县）北地区的侯镜如率部救援。敌人此举，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也是求之不得的。因为我们打敌首脑机关的目的，就是要调动敌人，以便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我高兴地对崔田民说：“敌人果然上钩了！”

翌日凌晨，东路部队在李仙洲总部驻地天宫庙的北面打响不久，西路部队经过长途迂回，也在天宫庙南面打响了，并很快形成四面围攻。夜幕降临后，东路部队派人来向我请示：“常振山率部窜进小范楼村，想要逃跑，怎么办？”崔田民在旁边对我说：“可不能让他跑了！消灭这股反共最积极的顽固派，对分化瓦解李仙洲的部队会有很大作用的。”我点了点头，立刻对来人大声说：“命令九团，包围小范楼，消灭常振山！”

九团团长沙何光宇一接到命令，立即带领全团，以快速的动作赶到十几里路外的小范楼，向保安第七旅发动猛烈攻击。疲惫不堪的常振山，怎么也没有想到刚占这个村子，就遭到八路军的袭击，他声嘶力竭地命令部队抵抗。战斗持续到第5天深夜，在敌人极度疲

劳时，何光宇同志突然命令全团所有司号员吹响冲锋号，一鼓作气攻进了村子。有些还在睡梦中的敌人，没等完全清醒过来，就乖乖地做了俘虏；有些顽抗的敌人，被我们的战士用手榴弹、刺刀送进了坟墓；惊慌失措的常振山带着一些警卫部队仓皇逃跑。李仙洲的一个旅，就这样被我们一个团吃掉了大部。

这时，李顽总部及其二十一师、三十师等部，正被我东、西两路部队包围在天宫庙南面的陈楼、陈庄两村里。部队攻了几天没有攻下来，都很着急。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决定将村周围的水源和粮道切断、卡死，围而不攻。一连5天，烈日炎炎，热气蒸腾，四五千顽军猬集一团，缺水断粮，只得杀马充饥，士气更加低落。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不少顽军士兵弃枪逃散，一些下级军官带着整营、整连的部队逃到我方阵地，交械投诚。

李仙洲一边加紧对部下的控制，一边要侯镜如急速救援。

当时，十九团团团长吴大明同志向我建议：在敌人固守待援时，我们来一虚留生路，纵敌出逃，然后打他的伏击。

我们采用了吴大明的建议，并派二十团配合他们。第二天上午，我赶到十九团时，吴大明兴奋地向我报告：他们把想突围的聂松溪的部队，一下子吃掉了千把人。

这场“引蛇出洞”的伏击战，给敌军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我们则准备利用这个有利机会，加强对陈楼的攻势。就在这时，我接到侦察员的报告：侯镜如带着九十二军军部及五十六师、一四二师各一部，已进到单县以西地区，正向我军逼近。我们立即改变计划，命令东路三个团阻击侯镜如；西路三个团包围陈楼和陈庄。经过几天激战，敌人虽然伤亡很大，但终究实现了两部汇合。面对这种形势，我们重新调整部署，寻求在运动中歼敌的时机。

8月上旬，我们在单县南面的黄岗集又同李仙洲打了一仗，把他最得力也是最反动的曹班亭30师消灭了大半。李仙洲带着4000人，分3路向陇海铁路以南移动，想向苏、皖交界处逃跑。当

时大家一致的意见是要抓住敌人,即使不能全歼,也要再吃掉他一部分。否则会给新四军的同志增加压力。

经过我们东、西两路部队又追又堵,终于在丰县以南的刘庄包围了侯镜如的 2000 多人。

刘庄是个大集镇。汉奸富户住高楼瓦房,穷苦百姓住茅屋土舍,离老远就看得十分明显。侯镜如想抢占大堤未成功,转而固定这个镇子,在四周抢修了工事,布下了密密麻麻的鹿砦。

8 月的风雨说来就来。战斗刚打响,在大风、巨雷中,担任突击任务的七团和十团的指战员们,高喊着“打进刘庄去,活捉侯镜如”的口号,冒着大雨,趟着泥水,勇猛地向敌人冲去。他们进到镇子里和敌人展开了激烈地巷战。最后,把敌人压缩到几幢房子里。战斗到第二天拂晓,大部分敌人被消灭。可惜的是侯镜如在暴风雨的夜晚逃走了。

经过 1 个月零 2 天的战斗,我们总共消灭了敌人 5900 多名(其中俘虏纵队司令以下官兵 2700 百人,分化瓦解 2000 多人),彻底粉碎了李仙洲对我边区进攻蚕食和企图东进鲁南计划,开辟了南北约 100 华里,东西约 90 华里的根据地,新建了成武和曹县两个抗日县政府。

这期间,苏振华和阎揆要指挥的西路部队,在河南省的浚县、长垣等地全歼了伪军杜淑的 46 师及两个独立旅,共 560 多人,建立了卫南、滨河、滑县 3 个抗日县政府。

这两个战役,总共消灭敌军 11000 多,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蚕食冀鲁豫根据地的企图,对改变这个地区的敌我力量对比起了巨大的作用。

曹东南战役结束不久,我和崔田民带着“小前指”返回军区机关驻地红庙,同黄敬、苏振华、阎揆要等同志汇合。大家见了面都十分愉快。黄敬不知从哪里搞来了白面,包了顿饺子,还弄来瓶“泉州大曲”,给每个人的瓷碗里倒了一点。他举着碗对大家说:“我们平

日里不喝酒，今天例外，既是犒劳，也是庆贺，都喝一点吧！”

碗是端起来了，可是谁也喝不下去。酒是香的，为庆祝胜利也是应该喝的。然而，我们想起在这两个战役中伤亡的 750 多名战友，心情都变得沉重了。想起他们，怎能喝得下这酒呢？

我站起来提议说：“大家既然都喝不下去，那我们就把这酒用来祭奠那些为胜利而献身的烈士们吧！”

酒从缸子里洒到地上，带着芳香渗进泥土里，大家的心似乎才得到一些慰藉。

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失败，也是日寇阴谋的破产。日本侵略者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由津浦、陇海、平汉铁路沿线，调集了三万多人，采取陆、空配合，步、骑、车、坦、炮协同作战，从 9 月下旬开始，对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动了 43 天的“秋季大扫荡”。这次大“扫荡”最后虽然被我们粉碎了，但是，我五分区司令员朱程同志却英勇地牺牲了。

秋季“反扫荡”胜利结束不久，我们又和伪军孙良诚部打了一仗。

孙良诚是我们的老对手。此时，他已投降日寇，充当伪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官衔，仰仗日军的庇护，乘我们避实就虚、转入外线作战之机，从东明县重整旗鼓，以步步压缩、大筑据点的战术，蚕食了濮阳与濮县之间方圆数十里地区。当时，他手下有两支主力：一支是以赵云祥为军长的第四军，一支是以王清翰为军长的第五军。他亲率总部坐镇濮阳城东南的八公桥，欲以赵、王两军，威逼我军退出根据地中心区。为了打退敌人的进攻，我和黄敬等同志经过研究，决定采取钻心战术（也叫“牛刀子”战术），袭击孙良诚总部驻地八公桥，捣毁敌人首脑机关。

作战计划在军区干部会议上下达后，大家讨论十分热烈。绝大多数同志认为，这着棋下得好，可以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但也有的同志认为：八公桥位于敌人纵深，防守极其严密，周围群

敌环伺，互为拱卫，袭击它过于冒险。

为打消一些同志的顾虑，黄敬政委引经据典地说：“兵不厌诈，以奇制胜，古来有之。用孙大圣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办法，可以给敌人致命的打击嘛！”

苏振华政委指着地图，接着说：“前几天，我们乘敌人立足未稳，派二分区把范县东面的侯庙、莲花池，北面的虞铺这三处敌人全部歼灭，孙良诚会以为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东北方面，暂时不可能攻击他的总部。再说，现在‘扫荡’的日寇已经各回原防，伪军失去了庇护，心里发虚，时机对我十分有利。要打敌人指挥中心是得冒点险，但总的看来，利多弊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胜的条件还是不少的。”最后，我归纳大家的意见，说：

“应当承认，这一着是险棋。敌人前有五军，后有四军。八公桥附近还有三十八师两个团和一个特务团防守，装备不错，气势很盛，所以我们轻视不得。但是也要看到，孙良诚过去吃过我们的亏，心有余悸，这是一。其二，敌军是拼凑起来的部队，兵力分散，内部不统一，便于我集中优势攻其一点。其三，八公桥既在敌人纵深，也在我根据地内，便于我秘密接近。其四，敌人觉得坐拥雄兵，防范严密，必然思想麻痹。有这么四个有利条件，再加上我们的努力，这一仗是可以打胜的！”

经过会议，统一了认识，部队摩拳擦掌，斗志倍增。

这时，华北平原已经进入严寒的冬季。为了迷惑、调动八公桥的守敌，我们首先来了个“声东击西”。由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段君毅率领七、八两团，连同分区机关，从范县转移到鄆（城）北地区，故意远离孙良诚部队，摆出强攻郟城守敌刘本功部的架势。

黄敬政委对曾思玉、段君毅说：“这正应着《红楼梦》中的一句话哩，叫做真作假来假也真，假作真来真也假啊！”

这出戏确实演得“真”。部队刚在鄆北驻扎下来，就派出侦察员

和小股部队，到郟城附近的敌人据点周围大造声势。有的找到伪保长，故意恫吓说：“我军在这一带集结，准备攻打刘本功，走漏了消息要找你们算帐”有的把敌人哨兵抓来，详细讯问据点的设防情况，然后放他回去通风报信。有的通过内线关系，把假情报直接送到刘本功的指挥部。同时大搞练兵。这一来，把刘本功搅得日夜不安。他急忙收拢部队，增哨加岗，并拼命地向孙良诚呼救。

不几天，我们获悉：孙良诚得到我军要攻打刘本功的信息十分高兴。八公桥的敌人本来天天向乡保长要民夫赶筑工事，如今也要得不紧了；修筑围砦的敌人，也停了下来。显然，敌人被我们搞懵了。

我和黄敬、苏振华同志经过商量，决定导演第二幕：“侧攻两门镇”。

两门镇，在八公桥西侧，相距不远。担任攻打这个镇的主角，是四分区政委张国华同志。出发前我对他说：“老张，攻两门镇是咱们这出戏的重要一幕，就看你们的了。”

张国华这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将”，我在“抗大”的同学，大声地说：“放心吧，对付‘二鬼子’我们还是有办法的！”说罢跨上坐骑猛加一鞭，飞奔而去。

第二天下午，两门镇战斗打响不久，张国华派人来向我们报告：战斗打得很顺利，已经歼灭了敌人两个连，孙良诚从八公桥东面的徐镇抽调一个团，正向两门镇增援。

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非常高兴，望着黄敬、苏振华说：“敌人果然听从我们的指挥，现在该是全面拉开战幕的时候了！”

他两个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同声说道：“对。是时候了，我们下令吧！”

命令很快下达了。

五分区司令员昌炳桂同志，带七、八团迅速进到濮阳至东明一线，阻击敌四军。

三分区司令员马本斋、政委刘星、副司令员赵健民指挥三十二团、回民支队及县、区民兵武装，也进到濮阳一带，准备牵制、袭扰敌五军。

这时，鄆北、郟北、昆吾、濮阳等县的游击大队也都积极行动起来了。

一切部署就绪后，我和阎揆要参谋长，随二军分区主攻部队，经过一夜急行军，从鄆北地区到达了距八公桥不远的火神庙。分区参谋长潘焱同志跑来向我们报告：敌人还是没有一点动静。这情况说明，敌人丝毫没有察觉我们的意图。

11月16日下午4点钟左右。我们经过40多里强行军，来到了八公桥附近。

八公桥是豫北一座大镇。敌人在镇子四周修筑了坚固的围墙，高约一丈左右。围墙上密布炮楼和碉堡。围墙外面有堑壕、铁丝网、地雷……不能不承认，这是十分完整的防御体系。

这几天北风大作，直刮得黄尘翻滚，河流结冰。镇子里的敌人悄无声息，连围子外的哨兵也躲进碉堡避风。一看这情况，我立即命令曾思玉和潘焱指挥七、八团攻城，命令助攻部队把周围电话线切断，将镇子严密包围起来。

曾思玉、潘焱先派七团巧妙地通过布雷区，剪断铁丝网，越过护城河和外壕，架起云梯翻过围墙，打开寨门，后续部队一拥而入。等我和阎揆要参谋长把指挥所移到镇子里，敌人才发觉八路军攻进了他们精心设防的八公桥。

敌人想顽抗，可是已经晚了。碉堡、炮楼、屋子里的所有敌人，都被我们的战士堵住了。被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惊醒的敌人，抱头鼠窜，四处躲藏，乱成一团。部队打得顺利极了，没有多久，就消灭了守敌，攻占了八公桥。

第二天一早，潘焱跑来报告说：伪二方面军参谋长甄纪印被我们活捉了！

不一会，甄纪印被战士们押来了。尽管一夜战火，他装束依然严整，连风纪扣都扣得死死的。他好象还没有从激战中清醒过来，嘴里老是絮叨着：“真没想到，真没想到。”我和军区的其他负责同志和他谈了话，大家做了不少工作，把他放了回去，让他把我们的政策告诉孙良诚。

八公桥战斗是一个典型的攻坚战、夜间袭击战，也是一个典型的歼灭战。这一仗，共消灭敌人 1150 多人，俘虏军官多名，缴获枪支 1531 支(挺)，掷弹筒 14 个和一批战马、电台，兵工厂全套机器三部，粮食和军用物资 69 车。战后，全镇人民群众欢声载道，庆贺我们的胜利。部队指战员分头宣传抗日，气氛极其热烈。最有趣的是，这天下午，濮阳县的邮差来给敌人送信，一到城门口，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一夜之间，城门口的哨兵竟换上了威武庄严的八路军战士。

日寇得知我们攻占了八公桥，捣毁孙良城总部的消息后，急红了眼，从开封城里开出 80 多台汽车，装满鬼子兵，象疯狗似地扑来，要找我们算帐。可是，我们早就从事先派出去的骑兵侦察支队那里得到了准确的情报，敌人赶到时，我们已经将部队分散转移了。

在战斗中度过 1944 年新年不久，刚刚主持开完区党委会议的黄敬，兴冲冲地走来问我：“老杨，听说上级来了指示，要你带部队到延安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是真有这事吗？”

“真有这事。几天前我就接到命令了，因为正在开会讨论制定新的一年斗争计划，我怕影响大家的情绪，所以没有马上说。”我尽量用平静的语气回答。说实在的，我已有好几个晚上没有平静地睡着觉了。因为这将意味着：我在华北 7 年多，其中在冀鲁豫 5 年零 3 个月的艰苦抗战生活就要结束了；我和几十万患难与共、血肉相连的父老乡亲就要告别了；我和同生死、共命运的战友、同志和部队广大指战员就要分手了。我最不忍离别的，是埋葬在这片神圣的

国土上的战友、同志和骨肉同胞。想到这里，我又不能平静了，于是望着黄敬激动地说：“我是不愿意离开同志们的，但是你们知道，我又不能不离开大家……”

黄敬虽然和我并肩战斗时间不算长，但是作为一个党的工作干部、政治工作干部，他当然很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他没有多讲什么，只是很动感情地说一句：“去吧，去到延安，把大家的心愿汇报给党中央，汇报给毛主席！”

1月31日，我和黄敬、苏振华、阎揆要等同志依依话别，率领三团、十一团、十六团、十九团、三十二团和回民支队，从当时属山东省的濮县杨集，开始踏上了远去延安的征程。

卫东战役和石友三的下场^①

李 达

“卫东战役计划”，于1940年2月22日下达部队。参加这次作战的部队，共17个团，其区分及任务是：

一、冀南军区诸地方部队，以王宏坤同志留在冀南指挥游击，控制卫河渡口，策应卫东作战。

二、先遣纵队、筑先纵队，在卫河以西只留小部为鲁西北支队，消灭南乐、朝城、冠县地域之高树勋部，向东进展。

三、一一五师独立旅杨勇部和挺进纵队第五支队为鲁西支队，归杨勇同志指挥，消灭濮阳、观城、范县的石、高部。

四、冀鲁豫支队杨得志部为豫北支队，消灭濮阳及清丰地带石、高部队，并以一部控制卫河渡口，防止顽军向西南逃窜。

五、冀中7个团、冀南5个团为中央纵队，归陈再道、刘志坚同志指挥，与鲁西支队共同消灭石、高两部，策应太南作战。

由中央纵队抽出两个团左右的兵力为战役预备队。

此次战役由宋任穷、程子华同志统一指挥。

卫东战役的开始，比磁武涉林战役早一天，3月4日凌晨一时，我军发起总攻后，很快就攻克了濮县、观城、仙庄、六塔集、卫城集等地区，俘虏了顽军800余人，并击溃了由范县进至观城以北阻我前进的王金祥部1个团。

^① 编者注：本文选自《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

5日深夜，顽军分成数路向南逃跑。我军穷追猛打，在濮阳城东和东南击溃顽军两个团。3月11日，卫东战役胜利结束，我毙、俘顽军3600余人。

同一天，蒋介石严令鹿钟麟、朱怀冰、石友三、孙良诚、丁树本等部不准退过黄河，由庞炳勋统一指挥，继续向八路军进攻。可是，蒋介石的这个命令已经于事无补了。

我军在反顽斗争取得胜利之后，就适可而止，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暂时休战，将反磨擦作战告一段落。

在我师停止反磨擦作战之后，“磨擦专家”们并不死心，总想再较量一下。

4月1日，石友三及丁树本在菏泽日军500余人的掩护下，分两路进占东明城，并积极北犯，妄图重占直南^①地区。4月5日，石友三部和丁树本肆无忌惮地分别进至徐镇、保安集以东和两门西北地区。

我冀鲁豫支队、冀中赵谭支队第二天就在两门西北的小韩集一带将丁树本部击溃。丁树本没捞到便宜。自知不是对手，就率领残部逃往豫西去了。8日，我东进纵队、冀鲁豫支队和赵谭支队又向石友三部进攻，石友三见此处立足不得，只好率部南撤到曹县、定陶地区。

至此，我军共歼灭石友三、孙良诚等部6000余人，将其部队驱赶到了我根据地的边沿地区。

由于我军高举“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旗帜，正确地、恰如其分地执行了“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和策略，终于取得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数次进攻的完全胜利，第一次反共高潮就这样被我们粉碎了。

^① 直南，即河北（原直隶）省南部地区，包括今河南省北部地区。

我军在这几次顽反战中，伤亡了 4815 人。这就是顽固派制造磨擦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是抗日力量一个不小的损失。

可是，国民党军队中的顽固分子出于反共的本性，并没有因此而罢手，他们也从来没有间断过磨擦活动。特别是那个流氓军阀石友三，由于和日寇秘密勾结，几次被我包围时都得到日寇的配合，因而得以逃脱。朱、彭总副司令几次指示我师，对付石友三部是一个长期艰苦的工作，只有军事政治双管齐下，才能取得成效。

事态的发展，正如朱、彭总副司令几次指示我师，对付石友三部是一个长期艰苦的工作，只有军事政治双管齐下，才能取得成效。

事态的发展，正如朱、彭总副司令所料，我们同石友三的斗争，一直延续到 1940 年年底。

在以后的几次战斗中，我军从缴获石友三部的密件及有关军事文件中又多次抓到了石友三公开投靠日寇的证据。如，宋任穷、肖劲光同志在 8 月 12 日向师首长报告说，他们缴获的山东日军饭田部队的机密通报中载，石友三于 7 月 7 日派代表到郛城报告该部移动情形；7 月 11 日又派代表到郛报告该部部署情况。

蒋介石知道石友三其人打八路军积极，就对他采取了拉拢的方针。1937 年底，提升他为六十九军军长，将新六师高树勋部拨归该军建制。第二年，又提升他为第十军团军团长，不久，又委其为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这时，石友三的野心复萌，将第一八一师一下子扩编成新八军，并由原来的每旅两个团扩编为三个团。1939 年夏天，蒋介石为了武装石友三打八路军，特地发给他汉阳造步枪 800 枝，马克沁机枪 30 挺，步枪子弹 100 万发，并且一次给他发了半年的薪饷，加委他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1940 年 7 月，石友三部被我紧紧包围，不能脱身，他给其弟石友信写了一封密信，云：“石师长慎初弟：总部及各军被八路军包围，攻打甚急，望速往清丰联络日军扫荡，万急。兄友三。”

石友信接信后，率部伪装成我游击队模样，混出了包围圈。他派副师长文大可到清丰同日寇联络，文返回后，在团以上军官会议上说：“为了解总司令（指石友三）的围，我今天进城向日本人说了半天好话，日本人才答应出动一个联队，这是很大的面子。”

石友信接过来来说：“我们当前有两个敌人，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八路军。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把他们都打败，就只有拉一个，打一个。日军乐意跟我们合作，现在八路军打我们，我们就只好拉日军去打八路军，让他们对消了，天下就是我们的了。你们要对下面官兵讲清楚。”

石友三没有如蒋介石所愿打垮八路军，其通敌罪证反而被我抓住。因之声名狼藉，已无大用。蒋介石就密令卫立煌、高树勋处决石友三和石友信。

1940年11月下旬，石氏兄弟被除掉之后，蒋介石遂任命高树勋为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毕泽宇由总参议升为六十九军军长。^①

12月3日，集总将这一情况通知我师，并指示我师利用这个机会，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争取高树勋、孙良诚和石友三部下的工作。

宋任穷同志按照集总和师首长的指示精神，建议杨得志、崔田民同志具体负责高树勋、孙良诚^②部的统战工作。高树勋将军以后在我党我军长期争取下，终于1945年平汉战役中毅然率部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成立民主建国军。

^① 毕泽宇同其部教导师师长文大可，于1941年11月3日在山东韩城率部投降日军。

^② 孙良诚于1942年4月22日在鲁西南的定陶、曹县地区，率第六十九军、十三旅及特务旅共二万五千人投降日军。随同投敌的有新编第六师师长王清瀚，暂编第三十三师师长赵云祥，第一八一师师长陈光然，新编第十三旅旅长黄贞泰，特务旅旅长郭俊峰，冀察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丁树本，第二纵队司令夏维礼，警备处处长孙玉田，汪精卫命令其部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孙良诚为总司令。

回顾反磨擦斗争这段历史,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维持,是贯彻执行我们党的既联合斗争,斗争中要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策略而取得的。当时,大敌当前,一切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的条件和基础。只讲团结,不作必要的斗争,统一战线也不能够维持。就晋冀鲁豫区来讲,如果不给反共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以坚决回击,打不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整个华北抗日根据地以至全国抗战的神圣事业,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正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因而赢得了广大人民和中间势力的拥护与同情,积蓄和发展了抗日力量。谁个相忍为国,谁个破坏团结抗日?这是国人有目共睹的。我党我军同国民党军队相处之中,总是以抗战大局为重,始终坚持不打第一枪的原则,委曲求全,仁至义尽,做了大量的工作和许多让步,为维护双方团结尽了最大努力。而当反共顽固派向我猖狂进攻,我忍无可忍,被迫实行自卫还击时,仍然是为了坚持团结抗日的方针,适可而止,不使事态扩大。我军取得反磨擦斗争的胜利以后,又主动撤出太南地区,再次表示了我们党同国民党的合作是诚心诚意的,始终如一的。

冀鲁豫军区部队发展概述

夏 川

—

冀鲁豫边区,在战争年代,是一个独立的战略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华北敌后一个斗争艰苦、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平原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则是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胜利地进行九次战役,华东野战军反复征战。后又都从这里转入战略进攻,有过特殊贡献的解放区。

这块英雄的土地,处在河北、山东、河南及安徽、江苏五省结合部;东依泰岱,西靠太行,是联系山东、华中和延安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全区除少数山峦、湖泊外,是一望无际的广阔平原,地瘠民贫,文化落后,封建势力强大,阶级矛盾尖锐。繁衍生息在这里的 1200 万劳动人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由于是五省结合部,也就形成了鞭长莫及,五管,五不管,想管无法管的状态。这就为千百年来穷苦农民聚众起义;近 20 多年来,共产党人发动群众,进行反抗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仅历史上有过黄巢、宋江等无数起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而且在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便在边区各地星罗棋布地建立了党组织。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领导工人、农民群众进行抗捐、抗税、罢工、暴动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激起了中国

人民的极大愤怒，普遍展开了抗日运动。冀鲁豫区的党组织，及时地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相结合，使革命力量和同情革命的进步力量，又有了明显发展。因而，1937年7月，一经抗击日本侵略的枪声，在芦沟桥响起，全区党组织，便在统一号令之下，迅速点燃了抗日救亡和武装起义的熊熊烈火。

二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历史转折关头，根据党中央，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扩大主力部队，创建抗日根据地，并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爱国将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冀鲁豫区的鲁西北、直南、豫北、泰西、湖西，以及鲁西南各县，在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同时，纷纷举行武装起义，组建抗日武装，而直南、豫北的河北民军第二路第四支队、鲁西北的第六区游击司令部第十支队、泰西的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和湖西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便逐渐发展成为开展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

1938年8月，我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各一部，在河南省安阳、内黄一带发起漳南战役，基本上肃清了方圆百里以内的伪匪军，协助直南特委开辟了安阳、内黄、汤阴、浚县、滑县地区。

随后，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挺进湖西，改称苏鲁豫支队。在丰县、砀山连续打击敌伪，后又向沛县、鱼台、单县发展。1939年2月，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一部，与先期到达的旅独立团、特务团、和当地游击武装合编为冀鲁豫支队，从直南、豫北的内黄、滑县、濮阳，一直活动到鲁西南的曹县、定陶、和湖西的金乡、单县。沉重地打击了敌伪军和勾结敌人的地方顽杂部队。

正当国民党先后召开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制定了一整套反动政策，阴谋以军事进攻消灭我抗日力量。冀鲁豫区的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在鲁西北、直南、豫北，和苏鲁豫地区，制造反共磨擦事件的严峻时刻，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师直属队及三

四三旅六八六团于2月底到达鲁西。决定创建泰西根据地，并分兵到泰西、运西，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建立政权，不到5个月，部队迅速发展，编成一一五师独立旅。

这些主力部队的到达，有力地促进了湖西、直南、豫北、鲁西、运西等地各项抗日工作的开展。群众组织普遍建立，党组织日益壮大，县、区政权陆续展开工作。在各个根据地粗具规模的情况下，鲁西区党委、苏鲁豫区党委（后改为湖西地委）和冀鲁豫区党委先后成立。接着，鲁西军区也在8月宣布成立，由一一五师独立旅兼军区，杨勇兼司令员，中共山东分局并决定将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也划归一一五师独立旅建制。10月，肖华率冀鲁边区带来的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机关及五支队、六支队各队到达鲁西与独立旅合并，沿用三四三旅番号，仍兼鲁西军区，肖华任三四三旅政委兼军区政委，杨勇任三四三旅旅长兼军区司令员。下辖黄河支队、运河支队、泰西支队以及四个军分区。

1940年4月30日，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三四四旅、独立游击支队、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到达直南、豫北地区，与冀鲁豫支队合并，成立冀鲁豫军区，由第二纵队兼军区，杨得志任第二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第二纵队政委兼军区司令员、崔田民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兼军区政委。

10月下旬，一一五师与地方部队统一整编，鲁西地区的运河支队、泰山支队和晋西独立支队第二团，整编为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兼鲁西军区，杨勇任旅长，苏振华任政委；已调湖西地区的黄河支队整编为一一五师教导第四旅兼湖西军分区，邓克明任旅长兼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任政委；1941年7月冀鲁豫地区之第二纵队新三旅和新二旅第四团，整编为教导第七旅编成，昌炳桂任旅长、赵基梅任政委。

从此，在平汉、津浦、陇海三大铁路干线之间，逐步形成了冀鲁豫、鲁西、湖西各有不同战略作用的作战地区，但都面临着敌、伪、

顽、匪、会的夹击形势,使各区军民不得不在同敌伪进行顽强斗争,坚决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进攻,和平息土匪、会门的骚扰、暴乱中,求得巩固和发展。

三

抗日战争到1941年,整个冀鲁豫区进入相当困难的时期,日、伪兵力显著增加,到处安据点,修公路,为加强其侵略统治,除经常进行合围,“蚕食”、“扫荡”外,还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为加强对敌斗争的领导,战胜来自各方面的困难,中共北方局、集总决定:冀鲁豫、鲁西两区于7月1日合并。合并后的冀鲁豫军区所属主力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杨得志、副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并兼冀鲁豫军区政委、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崔田民。第二纵队下辖:教三旅、教七旅、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及冀中军区的南进支队。冀鲁豫军区下辖7个军分区。教四旅和湖西地区在冀鲁豫、鲁西两区合并时,改由山东分局直接领导,在军事上为一个军分区,由教四旅兼管,隶属山东军区。

部队整编完毕后,主力部队大都推向边沿区积极展开反“蚕食”斗争。并不断反击国民党顽军和地方顽杂部队的进攻,使敌人“扫荡”后的沙区,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运东局面有了新的发展;考城以东开辟了新区;湖西地区保持了一段稳定的局面。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边区区划、组织机构,也不断变化。

1942年6月,取消了第二纵队番号,各种武装力量由军区统一领导。杨得志任冀鲁豫军区司令、杨勇任副司令、苏振华任政治委员、阎揆要任参谋长、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秋,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奉命划归冀鲁豫军区建制,与第三军分区合并,马本斋任司令员。10月20日,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调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同时,又将湖西地区重新划归冀鲁豫边区建制。

1943年1月,水东地区划归冀鲁豫地区;7月,将第三军分区

划归冀南军区。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鲁豫分局。1944年2月，杨得志奉命带6个团去延安。6月，冀鲁豫、冀南两区党委、两军区合并。新的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宋任穷，副司令员王宏坤、杨勇，黄敬兼政委、苏振华任副政委。下辖十一个军分区和水东军分区。1945年10月，冀南、冀鲁豫两区重新分开。分开后的冀鲁豫军区，杨勇任军区司令员、张霖之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下辖6个军分区。1946年11月，水东军分区又划归新成立的豫皖苏军区。

从此，一直到平原省军区成立，冀鲁豫军区的编制、区划，始终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局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和冀鲁豫边区相一致的冀鲁豫军区。

四

冀鲁豫军区部队，从1937年9月组建游击队开始，由小而大，由弱而强，各种武装部队，都经受了千锤百炼，和复杂战斗情况的考验，无数光辉战绩证明，这支英雄部队，没有辜负冀鲁豫1200万人民的期望，无愧于人们所给予的勇敢、顽强、能攻、善守，有良好战斗作风的称誉。

抗战之初，刚刚建立的游击武装，就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敢于攻入肥城、宁阳，处决奸顽维持会长；敢于和来犯的日本侵略军鏖战小濮州；敢于在单县、砀山一带，截击西犯日军；敢于夜袭津浦路界首车站，用“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一一五师主力前后到达直南、豫北和湖西、鲁西之后，各地武装部队得到了发展，提高了战斗力，并能配合主力部队进行震惊中外的陆房战斗、梁山战斗。经过第三次精兵简政，取消了第二纵队番号，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统一整编，各种武装力量均由军区领导，紧缩了机关，充实了连队，部队战斗力又有显著增强。不仅进行了影响较大的濮县古云集战斗，奇袭孙良总部的八公桥战斗，湖西

的巩大庄战斗,还发起了卫南、朝南等战役,给伪军杜淑、文大可等部以重大打击。

随着国际形势的日益有利,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一再失利,日军相继南调,而由伪军接防的情况下,我军区部队连续展开对敌攻势。恢复了清丰、内黄、朝城等县城;击毙了日军在邯郸的联络部代理部长名取正雄大尉,击毙了在单、虞、碭山边联日反共的国民党山东第十一专区专员曹班亭;俘伪冀南道尹薛兴甫,及日本顾问7名、伪县长5名,恢复了昆山、张秋大部地区,和卫河以东全部地区,打开了东平、汶上的局面,扩大了定陶东南部,和水东睢县、杞县地区的抗日根据地,扫除了我中心区通向鲁西南和湖西之间的交通障碍。

1944年,冀鲁豫、冀南两区合并,进一步加强了全区的军事力量,特别在英美盟军开辟了第二战场,苏联红军攻克柏林之后,又对敌展开局部反攻,收复了朝城、濮阳、莘县等县城,大量歼灭了日、伪、顽、匪的有生力量。

苏联红军于1945年8月对日宣战,我军区部队及时地组成三路大军,进行了一个半月的反攻作战,到9月底除少数县城仍为日、伪军盘据外,东起津浦铁路,西至平汉铁路,北起德石铁路,南至黄河岸边,纵横千余里的广大地区,全部为我们所控制。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领导全国人民,展开了一场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我军区部队,一面解放残留在根据地的日、伪军据守的城镇,一面由军区主力部队编成的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和其他兄弟部队一起,在刘、邓指挥下,进行了著名的邯郸(平汉)战役。不久,第一纵队奉命北上,我区部队又组成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继续和留在军区的地方武装,扩展对敌攻势,彻底肃清了根据地内的全部敌伪据点。

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内战全面爆发。根据战争形势的需

要，第一纵队返回边区，与第七纵队合并为新的第一纵队，又从军区抽调部队组成第十一纵队。在整个解放战争中，编入野战军的冀鲁豫军区部队，不论在陇海战役、鲁西南战役，淮海战役，还是渡江作战，向大西南进军，始终保持了自己优良的战斗作风，作出了力所能及的最大贡献，直到把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

留在边区的地方武装，对临近地区的每一个战役，无不竭尽所能，积极配合主力作战。在敌人大军压境，反复拉锯的情况下，则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主力南下后，又在区党委领导下，坚决清剿土匪，安定社会秩序，协助政府、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冀鲁豫军区部队，就这样在党的领导下战胜了各种困难，走过了自己的光辉道路。

对冀鲁豫军区第二、六军分区 一些情况的回忆

裴志耕 鲍鸿光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先后在冀鲁豫军区第二、六军分区工作过,现将我们能够回忆起来的一些情况,整理如下:

一

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组建于1940年4月,在组建分区以前,有我赵谭支队(后改编为新三旅),即由赵基梅司令员、谭辅仁政委领导的七、八、九三个团,在这一带活动,打击敌人。后来赵、谭率主力(七团、九团)去鲁西南,留下八团归二分区指挥(不久也调走了)。

二分区刚成立时,没有司令员,副司令员有两个,一个是周桂生,还有一个是李静宜(李原系顽杂军范龙章部四路军副司令员兼一大队长,经我党做工作,起义过来的)。政治委员是张荫魁,参谋长戴元仁,政治部主任鲍鸿光,分区所属的县有:濮阳县、滑县、高陵县、长垣县、封邱县、延津县等。分区机关和部队主要在濮阳、高陵、滑县活动。

二分区在冀鲁豫军区和地委的领导下,紧密地和根据地的群众团结一致,与日、伪、顽、会等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受了日寇对我的多次扫荡,特别是灭绝人性的“四、一二”大扫荡。在敌强我弱、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运用毛主席制订的游击战术,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打了不少胜仗。其中夜袭反动顽杂军邵鸿基部驻

长垣县沟家村一个大队,取得成功,就是一个例子。1941年2月,由参谋长戴元仁,政治部主任鲍鸿光率新四路和军区特务连(当时敌我兵力相当,我主力部队也未参战)抓住了敌人不得人心和战斗力不强的弱点,采用夜间奇袭的办法,取得成功,俘敌60余人,缴获枪支30余支,活捉了大队长刘子泉。当然,也有失误的时候,使我们受到一些损失。如1941年3月,分区副司令员周桂生、李静宜政治部主任鲍鸿光,率八团、新四路和分区特务连去濮阳县东南地区活动,协助地方开展工作。部队驻环城村一带,当晚两门镇的地下工作同志送来情报,说两门镇、老岸镇增加了敌人,本来应该尽快转移的,由于个别领导思想麻痹,指挥上也有错误,没有转移,结果被驻两门镇、老岸镇及附近据点的日伪军3000余人(还配有汽车30多辆,坦克3辆)包围了。我军和敌人从早上5点打到下午2点,才摆脱敌人。这次虽然粉碎了敌人企图围歼我们的阴谋,但我军也受到损失,共伤亡和被俘80余人,这是1次非常沉痛的教训。

1941年4月12日,日、伪军对我沙区进行大扫荡,当时敌人的兵力有日寇三十五师团、独立第一混成旅团有1万余人,当地伪军和反动会门武装也有1万余人,共有2万多人,还配有汽车、坦克百余辆,向我清丰县城以西、内黄县城以南、濮阳西北、滑县东北部进行扫荡,这就是日寇对我进行的“四、一二”大扫荡。当时冀鲁豫区党委、行署和军区都在合围圈里,为保存自己,伺机歼敌。我主力部队在司令员杨得志同志亲自指挥下,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安全地转移到鲁西地区。在这次扫荡中,敌人疯狂地实行了三光政策,使沙区根据地遭受到一次空前的浩劫。房屋被烧尽,沙区枣树林被毁坏不少,粮食、财物被掠一空,鬼子见人就杀,被杀害的群众有四千余人。经过日伪的多次扫荡,我军的损失也很严重。当时二分区剩下的兵力,连同县区武装在内,总人数还不足1000人。

1941年7月,冀鲁豫军区和鲁西军区合并。两区所属主力部队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纵队司令员是杨得志,军区司令员是崔田

民,苏振华任纵队和军区政委,唐亮任纵队和军区政治部主任,卢绍武任纵队和军区参谋长。原鲁西部队改为一、二、三、四军分区;原冀鲁豫军区的一、二、三分区改为五、六、七分区。六分区司令员唐哲明,政治委员裴志耕,副司令员李静宜(1941年10月唐哲明调走后,李为分区司令员),参谋长程绍祥,政治部主任鲍鸿光,副主任顾汉臣。

分区机关经常驻在濮阳县的井店、千口一带。当时分区所属的部队和兵力,卫河大队约有兵力400人左右;新四路一大队有百把人;分区警卫连有20人左右,高陵县县、区武装约有100余人,滑县县、区武装只有20多人,卫南、濮阳、昆吾等县、区武装加起来也不超过100人。加上分区机关,全部人员不足千人。此外,1941年下半年,军区决定,从南进支队调部分主力组成了一个游击支队,到沙区帮助六分区开展对敌斗争,归六分区指挥,兵力有100多人。

在两个军区合并以后,原冀鲁豫区之一、二、三地委改为五、六、七地委。当时六地委的地委书记是赵紫阳,专员是杨锐。裴志耕、鲍鸿光参加六地委。六地委下辖的县有:高陵县、濮阳县、滑县、卫南县、昆吾县、封邱县、延津县、浚县、滨河县。

六分区和六地委经常同住在一起,军队和地委关系很融洽,工作很协调。地委书记赵紫阳同志很关心部队的工作,有机会便到部队慰问,对各县、区武装的恢复和建立,也很重视,亲自部署、经常检查、督促,取了得明显的成绩。

六分区在军区和地委的领导下,在专员公署的关怀配合下,克服了艰难困苦,经过努力,到1942年底,武装力量已发展到约3000人,民兵也有很大的发展。1942年12月,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决定,从此,区党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分别兼任军区政委、分区政委和县大队政委,区委书记也兼任区武装中队的指导员。那个时候,也实行干部下放降职使用政策,继续实

行精兵简政政策。1942年底,冀鲁豫军区第五、六军分区合并为第四军分区,南进支队机关改为四分区机关,支队长赵承金任四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张玺兼任四分区政委,为了加强对部队的领导,由张国华同时任四分区政治委员。1943年2月,裴志耕调巨南工委工作,鲍鸿光留在四分区任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原五、六军分区的领导同志,也分别调出或改任其他职务。

二

1941年至1942年底,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最艰苦、最困难、斗争最残酷的时期。天灾人祸同时袭来。日、伪对根据地频繁扫荡,实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搞囚笼政策等等,伪军、顽军和反动会门组织也接连不断地来袭扰,给根据地人民带来极大的灾害。加上当时旱灾、蝗虫灾害很严重,许多地方的庄稼被旱死,蝗虫灾害危害也很大,有时蝗虫一来,普天盖地,很快庄稼全被吃光,使根据地的人民缺衣少吃,民不聊生。军队也很困难艰苦,粮食筹不来,服装不能按时发放,各县武装科的干部经常和民兵吃、住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当时抗日军民一方面要同日、伪、顽、会斗,另一方面要同自然灾害斗。

在这段时间里,六分区在冀鲁豫军区和六地委的领导下指挥下,在地方政府的密切配合下,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在坚持对敌武装斗争,保卫党、政机关,保卫根据地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做了一些工作,其中主要的有六个方面。

一、壮大自己队伍、积蓄抗日力量。沙区根据地军民,遭到敌人频繁的扫荡,特别是“四、一二”大扫荡,蒙受了重大的损失,部队伤亡较大,减员较多。有的被打散,有的同志回了家。县、区武装也遭到严重的损失,所剩兵力不多,这对我们打击敌人,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是极不利的。因此,壮大发展我们的队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只有我们的力量加强了,才能变被动为主动,有力地打击敌

人。在壮大和发展武装力量方面,我们做了三方面的工作:第一,用各种办法,动员被打散的人员和跑回家去的人员回部队,尽快地将这些人员收集起来,很重要,因为这部分人员有基础,回来后就能参加战斗;第二,广泛宣传抗日主张,号召农民参军,保卫家乡,保卫根据地,当时有不少青年踊跃参军;第三,与地方党组织、地方政府密切配合,尽快建立和恢复县、区武装。在这方面六地委很重视,抓得很紧,派出得力干部会同我们去恢复和建立县大队,对县大队的建设也很关心。1941年秋,滑县县大队成立时,地委书记赵紫阳同志鼓励大家说:“我站在沙岗上,遥望你们的胜利”。滑县县大队刚恢复时,不到10个人,到1941年底发展到近百人,1942年6月,就发展到200人左右。在地委的关怀下,各县的县大队也相继恢复、建立起来了。李益三在卫南县也搞起了有400人左右的武装力量。在这同时,各县的区武装也有很大的发展,有的发展到30多人,有的发展到40多人。到1942年底,我们六分区所属部队和各县、区武装已发展到近3000人。更可喜的是,有不少地方的群众,自己武装自己,他们自己凑钱买枪,保卫自己,白天带枪生产,夜间站岗放哨。尤其是滑县对叛徒吴兰田盘踞的地方和高陵县对孙步月盘踞的边缘地区,群众的联防工作搞得更好。

二、提高部队素质,加强部队战斗力。由于部队和县、区武装发展较快,新增加的人员大部分是农民。军政素质、群众纪律、组织纪律等方面都较差。因此,提高部队素质,加强部队的战斗力,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急任务。只有这项工作做好了,部队战斗力才能提高。为提高军政素质,我们一方面进行政治教育,提高政治觉悟,当时进行的主要内容有:宣传抗日,进行我军宗旨和光荣传统教育等。组织纪律的好坏,是衡量部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针对我们有的部队纪律性差的情况,进行了纪律教育,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通过教育,部队军政素质都有明显的提高,在抓部队素质的同时,我们侧重抓了对卫河大队的改造工作。卫河大队是由刘杰

三在我党领导下，第二次组织起来的部队（第一次组织起来的部队和我党领导的四支队合并为一个正规团了）。刘杰三是当过 20 多年土匪的头子，1938 年我党派唐哲明同志去同他结拜把兄弟，经过细致的工作，争取过来的。这个部队的大部分干部、战士都是刘的老部下或亲戚，成分复杂。为了改造这个部队，我们从 3 个方面进行工作：①派得力干部进行政治工作。曾派焦家福去当参谋长，袁建勋任政治处主任，段宏伟任组织股长，梁锡光任政治处特派员，苏文任供给处长，还派了一批指导员和连长、排长。这些同志到部队后，积极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开展强有力的政治工作。②团结改造刘杰三。我们分析了刘杰三的情况，认为刘杰三虽然是当了 20 多年土匪的头子，但他有正义感，通过工作，他愿意抗日，愿意跟共产党、八路军干革命，这是主流。对于他的缺点、错误是可以通过工作改造他的。刘杰三在部队很有影响，改造好刘杰三，是改造好这个部队的关键。我们改造他的基本原则是团结他、信任他、尊重他、关心他、改造他。采取的办法是：经常同他谈心，交流思想，谈国内外形势、谈抗日前途、人民军队的宗旨，特别注意及时传达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对他的关怀和信任（杨司令员对刘很关心，对他的改造经常有指示）；刘杰三很善讲话，开会请他参加，请他讲话，这样既可以教育部队，也可以教育本人；因为他是卫河大队司令员（实际是大队长）我们大胆地把对部队的指挥权和管理权交给他。特别是当他的老部下犯了纪律，要处理时，事前都主动征求他的意见，对他及家属的生活，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尽量照顾他、关心他。这些都使他体会到共产党对他是信任的、尊重的、关心的。当然，对他的缺点、错误我们也不迁就，而是耐心说服教育，让他心悦诚服。这些工作是通过袁建勋、焦家福、段宏伟等同志做的。后来，刘杰三同志，成为一个能听党的话，各方面表现都很不错的干部。对卫河大队部队的教育，侧重进行了我军的宗旨和光荣传统教育，并进行了纪律教育和整顿。做到奖惩分明，对好的表扬

鼓励,对差的批评教育,对个别屡教不改的企图叛变投敌的坏分子,坚决给予镇压,如原三连排长王修士(刘杰三的老部下),一贯表现阴奉阳违,虽经反复教育,仍不改变,企图叛变。经征得刘杰三同意后,报军分区批准,逮捕了他。他在被押送军分区途中,行凶逃跑,我将其击毙。事后在全大队公布他的罪行,对部队震动很大。通过改造,使卫河大队成为一个比较好的部队,在保卫沙区斗争中,打了很多好仗,后来这个部队发展成为一个正规团。

三、坚持武装斗争,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当时经常袭扰根据地的敌人有:日寇驻在安阳的一个联队、伪军吴兰田、反动会团孙步月、土顽王太公、石友三、李小孩等部。敌伪据点密布在我们周围,他们装备有的比我们好,兵力数十倍于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避开敌人主力,开展游击战,基本原则是:打击侵犯根据地之敌,积极捕捉战机,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不论什么情况下,都不和敌人打消耗战。对顽杂军则采用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他们中立或为我服务。由张永平、魏志明同志领导的沙区游击支队,较好地运用了这些原则,他们充分发挥了小部队机动灵活的特点,依靠当地党组织和群众,与民兵互相配合,发扬了英勇顽强不怕艰难困苦的斗争精神,积极主动地寻机歼敌。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经历大小战斗数十次,毙、伤、俘日伪军数百人,缴获了一大批枪支、弹药、马匹。装备了自己,游击支队除补充减员外,还扩大100多人,有效地保卫了沙区根据地。得到了吕正操司令员和军区首长的鼓励,地委书记赵紫阳、专员杨锐同志也曾亲自到该部进行过慰问。

抓住有力时机,主动出击敌人和在运动中伏击敌人也是我们常用的方法。1942年11月,敌人又对我沙区进行扫荡。这次扫荡,在军区和地委的正确领导下,进行反扫荡的,机关、部队都未受到什么损失。但地委、专署、分区机关仍在敌人的包围圈里。当时来沙区检查工作的张玺同志(区党委的主要领导人)指示地委、专署、

分区机关都要跳出沙区。只留下赵紫阳和裴志耕同志带领沙区游击支队，坚持斗争。有一天民兵报告，日寇一个小队，白天到破车口一带抢东西，晚上没有回去，赵紫阳、裴志耕同志分析研究了情况后，认为鬼子人数不多，临时在外过夜、防备不严，便决定派部队去消灭他们，并找来当时沙游的政委苏克之同志作了交待（苏是1942年夏接替魏志明任沙游政委的），由苏克之同志带领部队在民兵配合下，隐蔽接近包围了敌人，那天夜里特别黑，日本鬼子正在村口烤火。我们速战速决，这一仗消灭10来个日本鬼子，还缴了一挺歪把机枪及部分武器、弹药，而我无一伤亡。从此，日寇小部队再也不敢晚上留在外头过夜了。还有一次，我们得知有300多伪军，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要经过梁村一带，我们便派部队在那里埋伏好，当敌人路过时，在友军的配合下突然袭击他们，这一仗共消灭敌人几十人，缴获了一批武器、马匹，而我也无一伤亡。

不和敌人打消耗战，做到情况不明的仗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不打、敌多我少兵力相差悬殊的仗不打。记得1941年初冬，我六分区机关住在滑县的杨桑村，部队有新四路一大队和分区特务连，战斗部队不足200人。有一天夜间，日、伪军包围了我们。第二天等我们吹起床号时，敌人向我们打机枪，因我们不明情况，决定不予抵抗，突围撤退了。事后知道那天包围我们的是日寇和伪军孙步月的部队，有600余人。为了更好地保存自己，广大军民平时就挖了许多壕沟。沟有一米多深，宽约两米，做到路路相通，沟沟相连。这些沟起了重大的作用，一举三得：当敌人进攻时，我们和群众可以隐蔽撤退，当我进攻敌人时，可以隐蔽接近敌人，还可以阻碍敌人的汽车、坦克前进。

四、组织和扩大民兵，训练民兵。民兵是沙区根据地抗日力量的重要组织成部分，我们始终把组织、扩大和训练民兵，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来抓。为使民兵得到发展，我们直接给县武装科、

部署组织民兵的任务,提出要求,经常去检查、督促(县委也布置、检查);我们还派干部去组织民兵训练,帮他们学政治、学军事、战术(主要是游击战)、学技术(教他们射击、投弹等技术)。再就是组织他们在实战中锻炼和提高技能。

由于党政军一起抓民兵工作,因此,民兵发展很快,战斗力不断提高,广大的民兵,在配合部队作战、站岗放哨、传送情报、抢救伤员、看守和押送俘虏,打扫战场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五、与根据地人民共同度过灾荒。1941年、1942年,连续发生的旱灾和蝗虫灾害,使沙区根据地一带的军民生活更加贫困。许多群众以树叶、树皮充饥,部队的粮食以杂粮为主,有时也很难保证,部队经常自己筹粮,困难很大。有一次,裴志耕同志来了一位战友,到中午留他吃饭,司务长出去筹粮,到下午一点多,午饭的粮食还没有搞来,不是群众有粮不给,的确当时群众太困难了。因此,战胜和度过严重的灾荒,成为根据地军民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战胜灾荒,度过难关,根据地的党政军民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有:地方政府成立灭蝗虫指挥部,发动和指挥军民消灭蝗虫,当时采用的方法可多了,有响器队、烟雾队,扫帚队赶虫队等等,一方面把蝗虫赶跑,如响器队和烟雾队;另一方面消灭它,如扫帚队专门扑打低飞的蝗虫,赶虫队则把那些不会飞只会爬和跳的幼虫赶到事先挖好的沟里埋掉。为解决群众的生活,政府和军队叫地主献粮,记得我们也曾组织部队到下堤一带、黄河以北地区向地主征过粮。军民进行生产自救,也是当时渡过灾荒的补救办法。由于党政军民共同努力,终于度过了灾荒。经过这一斗争,军民关系更加密切了。

六、分化瓦解伪、顽军和会门组织,也是我们一项重要工作。当时的伪、顽、会门的情况很复杂。有的死心塌地投靠日寇,积极反共、残害抗日军民。如叛徒吴兰田,投靠日寇的反动会门头子孙步月等,有的是处于中间状态的,表面上他们既不抗日,也不反共,如阎希孟,还有一部分有一定的民族气节。我们对这些人采用不同的

斗争方式,总的原则是不树敌过多,积极争取可以争取的力量。对那些投靠日寇,积极反共的,坚决打击,对中间状态的尽量争取,争取不过来,使其保持中立也行;对那些有一定民族气节的则联合他们。我们争取伪、顽、会门的主要力法是利用社会关系做在伪、顽军工作的人员的工作。由于我们积极做工作,对促进伪、顽、会门组织的分化,起了很好的作用。顽军邵鸿基的一个支队副司令叫师风山的,经我们做工作后,于1942年9月率领200余人,枪支百余支在滑县的牟家村起义,改为我分区的独立支队,1942年底滨河县成立后,改为该县的县大队。顽军阀希孟,也在一段时间内和我们和平共处,这对我们抗日是很有利的。

此外,我们还想办法派人打到敌人内部去搞情报和分化瓦解敌人。记得我们曾派张会之打到伪濮阳县政府去工作,派敌人干事宋紫英利用关系长期住在濮阳县宪兵队长孙明远家里,对分化瓦解敌人、搞情报都起到积极作用。特别是敌人的行动搞得比较准,基本上做到只要敌人有行动,我们事先都能知道。

三

我们处在敌人包围之下,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能够坚持在沙区斗争,并且在斗争中不断地壮大自己,消灭敌人,最主要的原因有五条:一是有军区和地委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二是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濮阳、滑县是我党有一定基础的地区,群众觉悟高,抗战热情高,他们在人力、物力方面都给予了巨大的支援,他们还直接参加了对敌人的斗争,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三是在战术上,我们运用了游击战,注意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基本原则,积极寻找战机,出其不意消灭敌人,对那些情况不明,没有把握或敌强我弱兵力悬殊的仗,坚决不打;四是注意不断加强政治工作,充分发挥党支部和党员的作用,加强纪律教育,使部队保持了较高的革命斗争;五是沙区有利的地形,也对我们起到重要的作用,沙丘多、枣

林多不利于敌人的汽车、坦克和骑兵活动，枣树密有利于我们隐蔽，有利于我们同敌人周旋。

40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这些幸存者，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举国上下，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的大好形势下，愉快地欢度晚年之时，每每想起当年和我们一起战斗，生死与共，为革命捐躯的战友和同志时，心情总是难以平静，我们深切地怀念地委组织部长张建亭同志，怀念卫河大队政治处主任袁建勋同志，怀念原卫南县县长耿廷舟同志，怀念为革命牺牲的战友和同志们。

（根据裴志耕、鲍鸿光同志回忆及屠荣居同志收集的资料，由吴秋奎帮助整理）

依靠人民 坚持抗日

——我在南乐工作时的回忆

刘镜西

南乐地处三省之间，南临清丰、北靠大名、东连鲁西、西接豫北，是冀鲁豫三省的接合部，为旧政府鞭长莫及之地。但在抗日战争期间，却成了我们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1938年至1939年间，南乐也和周围各县一样，在党的领导下，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各村先后都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和农教会、青教会、妇教会以及自卫队、儿童团等。群众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抗日救亡的热情相当高涨，特别是在和顽固派丁树本的斗争中，显示了群众的坚强力量。

我是1940年7月初到南乐工作的，1944年4月初调离南乐。在这4年中，基本情况概括起来就是：对敌斗争十分尖锐、连年灾荒十分严重，人民生活十分痛苦。但是南乐的党，南乐的抗日政府，南乐县的抗日武装力量和南乐的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在艰险危难的斗争中，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根据当时总的形势和我们的主要工作及政策，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1940年到1941年，从整个形势讲，在敌人方面对其占领区采取巩固其统治，逐步对我根据地进行蚕食的方针。南乐的敌人首先分割封锁控制县西，逐步向县东蚕食。他们修清南大公路，挖清南大封锁沟。并在这条仅30华里的沿线上，就修了南清店至五花营等10来个炮楼和据点，使我在县东、县西的联系上十分不便。因此，在1940年底，经上级批准，将县西的五六两个区划

归卫河县，撤回了县西的工委和办事处。南乐县就剩下县东四个区了。敌人在这一段时间内，对县东除“五·五”大扫荡外，还进行过3次较大的扫荡。首先在吴家屯修了炮楼并在炮楼附近建立伪政权，实行保甲制，不断抓伏抢掠。但是，城东四个区绝大多数村庄，均在我们掌握之中。我们一方面发动群众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方面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准备坚持长期斗争。敌人扫荡，我们就反扫荡。如韩森固战役和王落战斗。敌人修炮楼，我们就打炮楼，如对吴家屯的炮楼攻打3天。敌人建立伪政权，我们则打击伪政权。敌人修公路我们就破公路。敌人挖封锁沟，我们就平封锁沟。总之，我们和敌人的斗争是针锋相对的。

在建设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中，我们主要作了以下工作：第一，壮大独立团，建立县、区基干队，组织各村游击小组，打击抓扶抢粮的敌人，保护群众。第二，健全县、区各级政权。县政府实行三三制，改革征收制度，实行统一累进税，贯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政策。在金融上推行边币打击伪币，查封敌货，打击资敌。第三，加强了统一战线工作。组成了参议会，建立了参议士绅会，把十二团正以下近百人的上层民主人士团结到抗日阵线上来。使之帮助政府，支持群众，反对敌人，对我们以后坚持抗战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第四，关于会道门问题，就是“快刀会”配合敌伪向我们根据地的冲击。“快刀会”由濮阳徐镇，经过清丰象一阵风一样传入南乐，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因此如何正确处理“快刀会”，是南乐当时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经过全党努力，揭发其内幕，教育其群众，瓦解其组织，从1940年7月到9月，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第二阶段，从1942年到1943年，这是南乐在整个抗日时期最残酷最困难的阶段。为什么这样说呢？一个是，敌人在这一阶段残暴地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大量修建炮楼。先后在吴家屯、韩张、千口、东节村等村修了几十个炮楼和据点。从县城到大名、清丰修了公路，挖了封锁沟。南乐县西边是南清大公路和封锁沟。北边元城、

东边朝城、南边清丰县的敌人也把据点和炮楼修到南乐的边沿上。客观上对南乐形成了包围的形势。敌人在各村建立伪政权实行保甲制度。与此同时敌伪抽调大量兵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合击,疯狂镇压抗日力量。另一方面,就是1942年南乐遇到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灾荒,也给我们坚持抗日战争,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仍继续坚持发动群众进行抗战的方针,但在对敌斗争的策略上有所改变。比如,在对待伪政权上,过去是打击伪政权,不准其建立,变成掌握伪政权,派政治上较好的参加伪政权,以应付敌人。为了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对挖公路封锁沟和扒炮楼也改变了策略。割电线和对待敌人的派粮派款问题也采取了欺骗敌人的方法,对敌人进行斗争。这一段,最突出的是加强了对敌伪军工作。因为当伪军的人,真正死心塌地当汉奸的是少数,多数是为生活所迫。我们通过对被捉住的伪军进行工作和对炮楼敌人进行喊话,发放“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证件等方法瓦解敌人,建立了许多敌伪关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对待灾荒上,实行精兵简政,大力开展救灾工作,千方百许减轻灾荒的程度,降低死亡率,保护人民的生命。

第三阶级,1944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应付太平洋战争,抽调兵力,外线作战,华北敌人兵力不足。南乐的敌人,这时已成了强弩之末,扫荡的次数减少了。在我们方面,由于灾荒已经有所缓和,抗日力量进一步壮大,在战略进攻方向上,实行敌进我进。1944年1月,我们一举把樊庄、三里庄、袁庄三个炮楼拔掉了,敌人也不再修了。1944年4月2日将东节村的伪军炮楼也拔掉了。所以,从1944年初到我4月离开南乐,这是敌人处于守势我们趋向进攻的阶段。

以上谈的是南乐的大体情况,现在就几个问题,分别谈一下:

一、政权的组织状况及其征收政策

(一)政权的组织状况

我1940年7月到南乐时,南乐县东县西还是一个县,西县叫办事处,县政府在县东。全县划分为六个区,县东四个,县西两个。从张果屯以西永顺沟以南,孙、赵庄、烟庄、大屯、唐王庄一带为一区。张果屯、丁、苏、魏庄、三王落、四小陈到李范、杜家村、武家村、大周村为二区。永顺沟以北,召固以东,象福堪、罗村、罗町、牛村、才文、七霄平、八韩平、十二耿落为三区。从韩张一直到清大公路以东、永顺沟以北,象西部、东部、任村、崇町、寨里、五花营、谷金楼、岳连、平邑等是四区。从南乐城以西到元村,公路以北为五区,公路以南为六区。一区区长叫魏荫璋(现在叫魏向远),二区区长张树声,三区区长宋朝兴,四区区长李敬宾,五区区长韩士朝,六区区长李参之。县政府秘书先是张志,民政科长是王长祥,财政科长开始是李丹林,后是胡通三,再后是端木斌庭,建设王子质科长,教育科长郭友德,后来是孟蔚文,司法科长周含山,粮食科长王国定,交通站长宋崇礼,公安局长韩斌之(1940年冬调走,由贾贯之接替)。公安局有个公安队,二、三十人,还有个武装科,后来改为武委会,先是张志任科长,以后是范江任科长。

(二)实行统一累进税的情况

实行统一累进税是对旧的征收制度的一次大革命,也是抗日政府的重大政策。过去都是按地亩折银两,每年按麦秋两季缴纳,不论贫富,有一亩地就得缴纳一亩的钱粮,穷的也不少缴,富的也不多缴。

统一进累税是根据全民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方针,实行合理负担,即穷者不出、中农少出、富者多出的累进计征。

累进率的制定,是比照我在清丰时行之有效的原则制定的。详细数字已记不清了,大体是:免征点是1亩,即每户每人1亩以下

者(含1亩)免征。每户每人1亩1分到3亩者,按1亩税率征收。每户每人3亩1分到5亩者按1.3亩的税率计征。每户每人平均5亩1分到10亩者按2亩税率计征。每户每人10亩1分到15亩者按2.5亩税率计征。每户每人20亩者按3亩的税率计征。20亩以上的税率就记不清了。另外对烈军干属和鳏寡孤独、老弱残废者可酌情减征或免征。

南乐过去的征收地亩钱粮册在户南房王景手中,抗日政府成立后,王景把册子交给他儿子王树理,而王树理把持着不交给我们,要征收得由他组织一部分人去征。因之我们下决心实行统一累进税,把原来的钱粮册全部废除,全县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为了实行统一累进税,1940年在三区韩平还开了三期训练班,各区都派人去参加,在训练班中,除学习统一累进税的实施办法,还学习了抗日政府的各种政策通过学习对区乡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有一定提高。

二、县武装部队的建立发展及进行的几次主要战斗

我到南乐的时候有个独立团,我兼团长,副团长叫赵尊康,政委是付润泽,后来换成张连文。各区都有一个区干队。县独立团成立时有一、二百人,后来发展到三、四百人,开始只有一挺机枪,后来搞到七挺机枪,一挺重机枪。独立团在那一带,作为县的武装来说,战斗力是比较强的。记得1940年的冬天,有一股国民党的逃兵,约30来人,既不进县城,也不走根据地,晚上住到魏家窑,被我们的侦察员发现。当夜,独立团把他们包围,缴了三挺轻机枪和10多支步枪,然后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此后县独立团声威大振,很快壮大起来,分区常常把独立团作为骨干武装使用。后来在沙区打李英的战斗中,又得了两挺轻机枪和一挺重机枪。1941年春夏之际,这支部队正式升级为分区独立团。独立团升级后,1941年夏初

我们成立了县基干大队，二百多人，我兼大队长，县委书记是唐晓声兼政委，大队付叫文光德，付政委是姚培善。总支书记路德。大队下分三个中队。这是南乐人民组织培育起来的又一支坚强的抗日武装。在党的领导下，在南乐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它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保护了群众，为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以后，县里还成立了一个青年营，郭如春任营长，李勤学任付营长。这支队伍以后编入南下支队了。后来宋朝兴、魏焕文、吴少白还带头参军成立了一支部队，在大反攻时随主力军南下。

在这一阶段，我们同敌人进行了以下几次比较大的战斗。

韩森固战斗。时间大概是1941年秋后。南乐城里的鬼子到一、二区进行扫荡。南下支队（即赵谭支队）和县大队配合，把鬼子包围在韩森固村外，从上午一直打到天黑，消灭鬼子数10人。后来城里的敌人出来增援，用汽车把被包围的死的活的都拉走了。这一战斗，虽未把鬼子全部消灭，但对南乐人民是个极大的鼓舞。

1942年下半年，我们到四区去活动，在小楼与敌人遭遇，被敌人包围了。形势相当危急，我们商定，文大队付指挥部队向西攻击，我带领干部和后勤人员从东南突围，结果一下子冲出去了。那次仗打的不错，在我们处于被动的情况下，打破了敌人的包围，我们无一伤亡，这是很难得的。

吉村战斗。这是我参加的战斗中打得最漂亮的一次。1943年三、四月间，我们大队在苏魏庄住。清丰仙庄的敌人，有30几个鬼子，二、三百伪军，在大吉村进行扫荡抢掠。吉村是我的老家，我在这里比较熟，估计敌人抢劫之后，回仙庄时一定要从谢吉村、张吉村西经过一片开阔地往南去。如果我们在谢吉村南边小杨庄西头一条东西路沟里打敌人的伏击，地形条件十分有利，一定能给敌人一个很大的杀伤。我们商定后，由我带路从苏魏庄出发（苏魏庄在大吉村的东边）。从苏魏庄向南有一条路沟，经李安、巩营一直通到小杨庄。我们就在小杨庄西头的路沟里埋伏下来。不出所料，敌人

从大吉村往南去，正好钻到我们的伏击圈里，敌人在开阔地里跑，我们在沟里用机枪扫射。如果我们的机枪手打的再准确些，把那股敌人不能全部消灭，也能消灭大部。结果只打死、打伤 7 个日本鬼子，其他的都跑掉了。打扫战场时，实际打死的 3 个，打伤的 4 个。我们把鬼子的尸体抬回来（活着的也抬回来）。可是老百姓抬时，四个活的被群众摔死了两个。尽管我们给群众讲俘虏政策，但群众还觉不解恨。这次战斗对南乐县大队来说，真正消灭了一部分鬼子，而我们毫无伤亡，还是第一次。从此仙庄的敌人再没有到这一带来抢掠过，群众十分高兴。

县大队打过很多胜仗，但也有失利的时候，最突出的是吉干战斗（我和文光德同志都不在）。吉干村离南乐县城才十几里，我们的大队在那里住 3 天，最后被敌人包围。在战斗中，歪把机枪丢失，副政委姚培善被俘，押到魏家窑，被我们在伪军中的一个关系放了回去，战士牺牲 30 多人。这是南乐县大队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损失。另外一次是王落战斗，大概死伤十几个人，在仇庄开的追悼会。除这两次战斗失利外，其余的仗都是打得比较好的。

关于第一次拔东节村炮楼问题。1942 年“四·三”扫荡后，敌人在东节村修了两个炮楼，马路以北是伪军炮楼，马路以南是日本炮楼。日本炮楼有 12 人，一挺机枪，十来枝步枪，两把手枪。伪军炮楼修的高，日本炮楼修的低，炮楼低对他们了望不利。于是在 1942 年 6、7 月间，他们要把原来的炮楼加高。当时东节村的支部书记姚洪显，民兵队长姚步宾，村长吴玉奇，他们几个一商量，认为趁敌人修炮楼要民伕的机会进炮楼，把炮楼拔掉，是有可能的。他们就到县里找我们。谈了他们的想法，我们一听有道理，觉得这个办法可以考虑。但有两方面的情况让他们注意。修炮楼的时候，敌人如果人在外边，枪放在屋里，人和枪不在一起，那就好办。如果他们荷枪实弹的在那站着，你们硬从他手里夺，就不好办。再一个就是炮楼离千口不远，敌人进行增援，怎么办？这些问题都要考虑进

去。最后决定智取，不硬打。修炮楼一开始，敌人拿着枪监视民伏，戒备很严，可是咱们的民伏只是干活，都没有其他行动。两三天之后，他们就麻痹了。把枪都挂到炮楼里边，然后有到外边看的，有到楼上看的。另外，有个给日本做饭的，是东节村人，和民兵刘六民关系很好，刘六民找他谈话后，他表示愿作内应。这时，我们认为拔掉东节村炮楼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就和东节村的干部研究了拔炮楼的具体办法。大概是阴历7月6日，我们大队一部分隐蔽在日本炮楼南边的苇坑里，主力布置在炮楼的西边，防止千口敌人的增援。那一天，刘六民带领民兵与伙夫一起进炮楼。当时，大多数日本鬼子都在外边，刘六民等一进门，就把门一关，外边的鬼子进不去了，枪都在里边。可是炮楼里还有两个日本鬼子在睡觉。刘六民等就拿着菜刀，把睡觉鬼子砍死，又把炮楼上边一个监工的鬼子揪了下来，摔死了。下边的鬼子哇哇乱叫，都被民伏用铁锨、镢斗把他们砸死了，这个炮楼的日本鬼子被消灭了。随后就把武器拿出来，正在运子弹的时候正巧有一架飞机从此经过，因不了解情况所以子弹没运完，就把那个炮楼烧掉了。县大队那挺歪把机枪就是这次得的。正是在敌人疯狂时期，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影响很大。所以，冀鲁豫军区杨得志司令员传令嘉奖说：“你们的英勇行动轰动了边区，震撼了华北”。这个炮楼拔了以后，日寇气急败坏的对东节村进行了野蛮的报复，血腥屠杀。东节村被烧200百多间房屋，被打死活埋了50多口人。但是，东节村党的基础是相当好的，东节村人民是坚强的人民，他们并没有被敌人的烧杀所吓倒，所屈服，依然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直到抗战胜利。这是南乐人民的光荣，南乐人民应该为此而骄傲。东节村一共拔过两次炮楼，这次拔的是日本炮楼，第二次是1944年4月2日我调离南乐前夕通过关系，拔掉了伪军炮楼。

关于打吴家屯炮楼的问题。1941年冬天，由我县原来的独立团打的，军分区魏明伦、吴国章同志亲临指挥，一直打了3天，终因

我军缺乏攻坚手段而没打开。后来从分区运来一门大炮，也因炮弹不足，没解决问题。虽然炮楼没打开，但在离县城敌人据点近在咫尺的地方，一直打了3天，这件事的本身，对敌人就是个很大威胁，而且显示了我们的力量，大大鼓舞了人心。

三、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贯彻全民抗战的方针，把地方的士绅、知名人士、包括十二团正及他们的下属，团结到抗日方面来，是相当重要的一件工作。因他们当时都是地方的实力人物，如果被敌人拉过去，那将对我们的抗日工作十分不利。为此县政府成立了南乐县参议会。经常开参议士绅会，进行民族气节的教育和讲解政府的政策法令。参议会主任是周含山，副主任是王敏修，为人正派，颇孚众望。周含山还是共产党员。王敏修是我们八路军一个将领的父亲。在参议士绅中，比较有名气的有：张永川、张建初、王公田、李丹林、赵铭丹、赵子纯、唐望斗、赵冠民、魏子顺、阎秉素、高步升、常汉堂、赵冠经、张坡山、任善长、任捷三、张殿选、唐建德、位书锦、库子章、运锡九、任贡三、李冠时、张明德等。参议中有五个党员。这些参议抗日的立场上是坚定的，对我们政策法令是拥护的。在我们扩大武装时，十二团正的12把大机头，都交给了我们。中队长的手枪也交给了我们，县西参议赵铭丹是小儿科大夫，有时敌人请他去看病，他就提出条件，得允许宣传抗日，要是不叫说抗日的話，他就不去。有一次杨法贤请他看病他也去，去了就宣传抗日。他说：“谁不让我宣传抗日，我根本不去，去了以后杀头也得宣传。”这个人就敢这样作。赵子纯，抗日热情很高，敌人捕住他以后，在残酷的刑罚下，宁死不屈，始终未暴露我们政府的情况。南乐有参议士绅，在抗日时有些人确实表现很好，他们一直跟着我们坚持抗日，未发现投敌的。又如县西的参议到县东开会要过封锁沟是很危险的。县西划归卫河以后，他们还到县东来开会。所

以说,南乐的参议士绅在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情况下,表现是很好的。这说明我们南乐的统战工作做的比较好。

四、对敌斗争

我在南乐四年时间,贯彻始终的就是对敌斗争问题,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一)敌人对南乐的几次大扫荡。

首先是“五·五”大扫荡,时间是1940年的阴历5月5日,这次扫荡规模比较大,因我冀鲁豫根据地,直接威胁到平汉、津浦、陇海三条铁路的交通,因此敌人抽调开封、新乡之三十五军团,又调集了兖州、泰安、徐州、安阳、邯郸、大名之敌,共约3万余人,分12路向我进行扫荡。这次扫荡,敌人主要是想寻找我们的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但是我们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早已跳出合击圈外。除在濮阳、清丰有小规模战斗,互有伤亡外,无大的战斗。这次敌人扫荡的方式是梳篦战略,象用篦子梳头一样过了一下。因为敌人对解放区的统治才开始,尚未建立起伪政权。所以“五·五”扫荡对南乐党政军民所造成的损失并不太严重。如果说损失的话,是大扫荡造成了一时恐怖气氛。

第二、1941年冬,敌人对南乐的二区和清丰的五区,进行了一次大扫荡,除步骑兵外,还出动了汽车和飞机。那一天县政府住在小陈。敌人的骑兵、飞机和汽车,从魏庄方向直扑向小陈,敌人是针对县政府的。敌人到了小陈村边,我们才发觉,形势相当危险。县基干大队一面战斗,一面从村后的路沟里向西撤退。突围时,我身边只剩了一个警卫员,从小陈西头向魏庄方向突围。而敌人就是从魏庄方向朝我们扑来,幸好有一条很深的路沟,我们从沟里走,敌人的汽车、骑兵只能从平地上走,行动不便。所以才得安全脱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最大的损失是二区的张树声、公安助理张学古、财政助理马孟仁被捕和小陈庄的人民遭受了敌人的抢劫。

第三、“四·三”大扫荡。1942年4月3日(古历2月28日),日寇第一混成旅团约三、四千人和伪军数千人,对我南、清、观结合部进行的一次铁壁合围。从南乐讲,敌人的合击点是以千口为中心的。那时,南乐城东大片地区是我们的天下,县东边背靠着濮、范、观大片根据地,只有离县城几里路的吴家屯一个炮楼,自然形成了后方。因此,军区、行署、专署的后方机关,如军区的被服厂、印刷厂、修械所等,都驻在那里,人很多,物资也很多。因此,这次扫荡对我们是相当危险的。这次扫荡是日、伪军东从观城,南从清丰、北从元城,西从南乐县城,同时向我二、三区合击的。4月3日早晨敌人就进入到我们的二、三区,到12点四面八方的人集中到千口,到后半夜才逐渐撤退,整整扫荡了1天。在这次扫荡中,我们县大队从东边冲出去了,分区机关从北边突围了。就是县政府没有突出去。这次扫荡,南乐三区1个站岗的民兵被打死了,清丰、南乐、观城被敌人赶过来的群众有的被伤,二、三区群众的牛、鸡、车、粮、家具等东西,被敌人用来烧着做饭吃,毁坏了不少,但我们部队、机关、干部和后方的物资却损失不大。这一方面是因为通过敌伪工作事先得到了情报,我们有所准备,更重要的是南乐县的人民和清丰县的人民政治觉悟高。比如,在一天扫荡中,我们很多干部,特别是部队后勤机关的外地人,都和群众在一起被敌人围起来,但是没有一个人向敌人告密说这个是县长、那个是科长。就是我在侯庄被敌人关到房子里的时候,也还是张果屯的农民秦树宝领我跑出来的。大家都是生死与共的,所以才避免了重大损失。县政府不是没有冲出去吗?县政府那时住在柴庄。我于4月2日去福堪参加分区布置反扫荡的会议。“四·三”早晨我从福堪往南走到罗町,听到四面敌人扫荡的枪声,少顷,胡秘书和贾局长(贾贯之)带着公安局的犯人也来了,一同到良旦村。在四面被敌人包围的紧急情况下,只能果断的采取紧急措施。一是档案文件,立即就地埋藏。二是干部就地分散在群众中隐蔽。当时这样处理了。三是犯人,其中9人是汉奸

(不都是南乐人),就地枪毙了,其他还有 30 多人,不该死刑的,对他们讲了讲话:“现在敌人扫荡,把你们放回家,等扫荡过后,你们再来县政府报到,则从轻处理,如果谁不报到,就从重处罚。”县政府的家具,马匹等交给罪比较轻的犯人带走。我的马就是让前王落一个姓苏的犯人带走的。扫荡过后,所有的犯人都回来了,带走的全部东西都带回来了。

第四、“五·三十”扫荡。1942年5月30日,清丰、南乐等县的敌人向我二、三区合击。这时我们从行署回来,一进南乐县境,正好跑到敌人的包围圈里。南下支队独立营也被合围到里边,我见了营长李登瀛同志。于是我就跟独立营一同从牛村、才丈之间的路沟突围到元城。这次扫荡对我党政军民均无大损失。

第五、1943年春天,环境更加恶化,我大队分散活动,我带独立营一个排在三区住。这个排有 30 多人,一挺机枪,排长叫小温。头天晚上我们得知敌人要扫荡二、三区的情况,半夜即向一区转移,穿过永顺沟的封锁线,刚走到韩森固,侦察员从前面回来说,敌人就在眼前,于是我们就仓促的走进一个小土围子边隐蔽,和敌人只有一墙之隔。敌人从路沟里走,连走路的声音都可以听见。我们作好了战斗准备,把机枪架起来,对着敌人。如果敌人进来,我们就打。另外从小围子的东南角扒了个口,不得已时就从路沟里向王落小陈方面转移。敌人从天不亮直到早饭时才过完。我们隐蔽了一两个小时。敌人这次扫荡主要是对二、三区进行合击,我们的部队已经转移,干部也作了隐蔽,所以损失也不太严重。

(二)发动群众,开展反蚕食斗争。

敌人占领县城以后,逐步向外蚕食,不断的修公路,建炮楼、架电线、安电话。我们对这个问题,开始是针锋相对,斗争十分尖锐,且持续时间较长。敌人修炮楼要民伕,开始我们是不让群众去,后来看到群众很为难,不去不行,于是就让群众去了磨洋工。在敌人修公路问题上,敌人白天修,我们就组织群众晚上扒,天天这样,时

间长了群众就受不了,因为生活困难,劳动强度大。为了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后来组织各村轮流破。在敌人挖南北封锁沟的问题上也是这样,敌人挖,我们填。后来我们总结一下经验从1942年以后,就不要群众挖路填沟了,不过在割电线问题上,仍是天天割。敌人在每一个电线杆下派一个民伕看守,谁丢了电线谁负责。群众为应付敌人,叫我们天不亮把电线割走,然后把看电线的人捆在电线杆上,再叫联络员去报告,这样敌人也没有办法,因此南乐敌人的电话经常不通。有时我们也让它通,那就是我们想偷听敌人的情报的时候。

(三)反资敌,反抢粮,查封敌货,从经济上封锁敌人。

敌人占领南乐之后,经常向各村派粮。开始,我们不让送,群众也不愿送。但是不送,敌人要抓人抢掠。经过对敌斗争锻炼的南乐人民用象割电线那样的斗争手段来应付敌人,群众把粮食送到炮楼附近,我们打两枪,再把粮食拉回来,让联络员去向敌人报告,说粮食被八路军拉走了。这样敌人也没有办法。后来干脆各村游击小组打几枪就行了。再者就是对付炮楼敌人抢东西。敌人建炮楼之后,不断到各村抢掠,危害群众。有时,我们的干部从炮楼附近经过时,他们打枪抓人。我们的作法是,对小股抢粮的敌人,予以打击,一般的对炮楼用喊话的方法进行教育。对屡教不改的用武装手段来教训他们,即我们拂晓进村埋伏在附近,用机枪或十几支步枪对准炮楼门,待敌人早晨出来时进行袭击。到晚上再喊话告诉他们,为什么要打,如果继续不听话,就天天整你们。这样,敌人就不敢在炮楼附近的村庄胡作非为了,干部经过炮楼附近时也不敢再随便打枪了。在经济斗争上我们的基本政策是,凡是敌人需要的东西,我们都进行控制;凡是从敌占区到根据地来的毒品、化妆品、纸烟等有害的东西,我们就一律查禁;凡是运进我们需要的物资,如药品、军用品等,我们都予以奖励和保护。

(四)开展敌伪工作,分化瓦解敌人

伪军当中不少是贫下中农,他们当伪军有的是为生活所迫,不一直都是死心塌地的汉奸,这部分人是可以教育争取的。所以我们在1942年以后对这方面的工作就大大加强了。一方面对伪军进行教育,要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自己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另外我们还利用各种关系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方法,派人打入敌人内部进行敌伪工作,掌握敌人活动的情报,配合武装斗争,打击敌人。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例如,姚培善被俘,就是通过一个敌伪关系放出来的。敌人宪兵队的一个排长是我们派进去的,1943年配合三十二团曾经打过一次南乐县城,就是那个排长作为内应,因时机不成熟,结果城未打开,而那个排长也暴露了,不得不撤出来。第二次拔东节村炮楼,也是通过敌伪关系解决的。东节村村长吴玉奇的姐夫叫霍子勉,霍与炮楼里的伪军队长是好朋友,通过这种关系打通了工作,虚打几枪,他们就投降了。城南樊庄那一片炮楼,是通过马朝的儿子马双喜的工作,一晚上拔了3个炮楼。我们对伪军炮楼的工作也很有成效,有时在日本人扫荡最厉害的时候,我们的干部可以到伪军炮楼上躲避起来。干口、节村等敌人的大据点我们也可以征收,可算得上是有敌人无敌区了。总之我们对敌伪工作是下了工夫的,在碉堡林立的敌占区,能够坚持工作且能保护群众利益。

(五)掌握伪政权,建立我们的政权

敌人为了加强它的统治逐步建立伪政权,在其占领区设有伪村长和联络员。开始我们采取取缔政策,不让建立,谁当伪村长就抓谁,后来环境日益恶化,炮楼逐渐增多,采取取缔政策反而对群众不利。所以我们根据实际情况,不建伪政权不行时,我们就采取掌握控制的政策,让它为我们服务,应付敌人、保护群众、侦察敌人的情报。要把伪政权掌握在我们手中,真正能为我们办事,就必须控制伪村长、联络员的人选,凡是不可靠的伪村长联络员一概取

缔,换成能给群众办事的人来当。对伪村长的要求一要接受抗日村长管,给敌人报告和运东西得有抗日村长同意。二是随时向我们报告敌人的情况,对危害群众真给敌人办事,我们决不客气。所以那时的伪政权始终在抗日政权掌握之下。南乐这个根据地所以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或者说有敌人无敌区,在那样严酷的情况下,一直坚持下来,群众没有动摇,除敌伪军中有我们的工作外,伪政权掌握在我们手中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不仅敌人据点外边的政权我们能掌握,就是敌人据点里面仍然有我们的抗日政权。比如千口不是个大据点么?但千口据点里面,我们照样可以征收公粮。当然我们对这里的政策是象征性的,并不要求数量。那时抗日村长冯金良,财粮主任马孟仁,住在据点里也常出来参加会议汇报工作。东节村也是敌人的据点,有伪军炮楼,又有日军炮楼,敌人自认为统治很严密。我们的抗日村长吴太奇同志可以征收粮食。四区寨里村的情况和千口、东节村大致相同。总之在敌占区坚持抗日工作,除有一个坚强的抗日政权外,掌握和控制好伪政权也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

(六)建立小联防区的重大意义。

小联防区是南乐二区最东南角的六个村庄,包括张庄集、李家村、樊村、杜家村、武家村、阎村。这个小区,地处山东、河南两省和清、南、观三县的接合部。这里地质多碱,收成不好,房子也很简陋,绝大部分是土房。这6个村总共也不过500多户,约二、三千人,在旧政府时是个穷乡僻壤,鞭长莫及的地方。就是抗日政府初建时也不常来,后来由于敌人不断扫荡合击,这里才逐渐成为南乐县和二区领导机关的后方,病号住在这里,重要会议也在这里召开,少得可怜的一些物资也存放这里,部队休整当然也在这里。这6个村庄,对南乐抗战是功德无量的。

到1942年这个小联防区的处境也很困难,周围有不少炮楼,西边张庄集至柴庄敌人炮楼只有七、八里路,北边阎村至枣科和马

村的敌人炮楼最多不过 10 里,南边离老化里炮楼,西北离千口敌的据点都仅有 10 多里路,只有东边几里宽的一条东西走廊,直通我濮、范、观大块根据地,是南乐和上级领导机关来往交通的主要通道。因此,这里面积虽小,它的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正是这样,它引起了敌人的注目,从 1943 年到 1944 年曾多次向小联防区进行袭击,但都被联防区的自卫队和游击小组打退了;一直到抗战最后胜利也未被敌人占领过。

小联防区在强大敌人多次袭击下能够岿然屹立,固然和二区的同志,深入细致的宣传组织工作分不开,但主要还是小联防区的人民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坚强的抗日热忱的结果。

五 关于 1942 年大灾荒

南乐的这次大灾荒,除天灾之外,还有敌人的抢掠,是天灾人祸相伴而行的一场浩劫。1942 年大旱无雨,麦季 秋季和 1943 年的麦季,连续三季庄稼绝收,可把南乐人民苦透了。苦到什么程度呢?我想用一些典型的事例来说明。比方街上、集上,随时可以拾到因饥饿而被抛弃的小孩,用不了 100 斤粮食就能换到一个媳妇。南乐县相当多的家具、东西,为了不被饿死都弄到外地去换粮食了。人口大量外逃,许多妇女被死亡所迫到范县、濮县寻找婆家。在这次灾荒中被饿死的约有 17000 多人,光四区就死了 9000 多人。如当时我到香七固走了一遍,一个人也没有看见。路上看到被饿死的人露尸荒郊。大楼村,我们也去看过,几乎也没有人了,剩下的不过几十个人。人吃的东西主要是糠菜,扫帚籽,麻糝饼。象张果屯、韩张、王落、吴村集卖饭的大都是谷子面玉米面的黄馍,全县几乎没有看到卖麦子面馒头的。在三区一个四合院,200 斤粮食就可买到手。能够吃的树叶、树皮、树根都被吃光了,全县所有牲畜全被杀死充饥了,真是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惨不忍睹。至今想起那种惨状,不禁令人泪下,从这几个方面可以说明,灾荒的严重程度和南乐人民

在灾荒中所受的苦难。灾荒和敌人的骚扰破坏，对人民的生命是很大摧残。但在精神上，南乐县的人民没有吓倒，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除饿死逃荒者外，剩下的一直坚持斗争。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除坚持对敌斗争外，全县党政军用最大的努力对群众的生命进行挽救。首先所有机关的用粮，一律从外地运。其次就是从根据地运粮救济群众。但这是有限的，单靠从根据地运粮还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从长远计，决定搞以工代赈，生产自救。凡能纺线的，发棉收线，按质论价给粮食，有劳动能力的到根据地做挖河修堤等工作，以工换粮。另外就是开展“借粮运动”，向地主、富农借粮。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因为既要借粮，又不能影响团结抗日，这就困难了。研究的结果，第一要借，不借不能保护全县人民的生命，第二是留够他全家吃用的，第三说明借粮是积德行善救人活命的事。如果不借大家都挨饿你们也吃不好，且是有借有还。我们下决心用大力进行说服教育工作，要求富农以上的都借。考虑到万一有人就是不借怎么办？如无措施，会影响多数人。经研究，用通过地主、富农的佃户、雇工摸清他们粮食埋在什么地方，他如果说没有粮食可借，即点出地点，让他们把粮食拿出来，借给群众。为借粮开了全县参议士绅会，进行说服动员。对群众说明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不要伤感情。这样经过艰苦细致耐心的工作，圆满地达到了借粮目的。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既达到借粮救灾的目的又没有发生因为借粮引起投敌的现象，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对丁树本统战工作的回忆

罗士高

1937年底,八路军四支队司令员唐哲明同志到武汉见冯玉祥。这时我正想找共产党,恢复失掉的组织关系。我在北大时的同学宋裴如是冯玉祥的秘书。他告诉我,丁树本想要个政治部主任,问我愿不愿去。并告诉我,唐哲明来了,他是丁树本四支队司令员。我想,既然唐哲明是八路军,找到他就能找到共产党。本来在武汉也能找到党,但既然这条路很顺利,我当然同意走这条路。于是我回答宋裴如,说愿意去。这样,我就拿了冯玉祥的介绍信和唐哲明见面了。回来在火车上我向唐说明我的情况、要求和主张,唐很赞成。我们先到郑州,又到东明,找了个地方过了黄河到坝头——到了丁树本管辖地方。这样我就通过丁树本的上司冯玉祥的介绍(其实我和冯玉祥根本不认识,完全是老同学宋裴如的关系),于1938年初到了丁部。

那时丁树本是六县专员,我们党为争取丁树本就地抗战,积极和他搞统一战线,差不多一年的时间(1938年),在统战问题上丁树本的态度还是积极的,表现也是好的。

到了部后,我当了政治部主任,副主任是晁哲甫同志,组织部长张伟,张同时又是党内支书。我就是通过张伟恢复了组织关系。张后调黄河支队任政委。李进杰搞宣传。平杰三搞民运(民运科长),后朱景汉(濮阳坝头附近人)接平杰三搞民运。

当时的政治部完全是我们控制的,为争夺青年,1938年冬,连着举办了3期训练班,每期1至2个月,共几百人。在训练班讲授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同时也秘密发展党员。

1939年春,丁树本到洛阳受训,接受了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领导,受钱受衔。从洛阳回来后,丁树本极度右转,走向破坏统战、背叛人民的反动道路。其表现有三:

- (一)取消政治部;
- (二)宣布他的部队内不要共产党;
- (三)原政治部的人集训。

我和晁老公开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战。丁也知道我们发展党员,支持“救国会”和“八路军办事处”。因为我们喊的是国共合作,他也不好反对。政治部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宣传积极抗日,不抗日活不成,很得人心,很有影响。丁树本各旅政治部的主任也都是我们的人:一旅政治部主任陈如海,二旅何亦然,三旅浦东修。我们争取青年,进行抗日教育,积极争取丁树本。我处的地位很好,因为我是冯玉祥介绍来的。丁树本不敢奈我何。我和晁老经常讲抗日的主张,讲到了树本于三八年秋主动提出统一战线、军民合作、抗战到底的三大主张,这真是我们政治工作的一大成绩。于是我们借此大宣传特宣传丁树本的三大主张,弄得丁没有办法。

1939年丁树本解散政治部后,利用救灾的名义到渠村、徐镇一带放些粮,收买人心,提高他的威望。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跟着他走一趟,每到一处,就大讲特讲丁司令的三大主张。他不讲,我们讲,他捞不到什么。结果丁没有叫我们跟到底,转到清丰便叫我回来了。

当时我也考虑,丁会不会对我下毒手,因为丁树本从洛阳回来,带来政治处长安顿信、参谋长李克昌,这两个人都很坏。我想,下毒手也只能是安、李二人,但他抓不住我什么毛病。我当时对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唐克威这样说过:“安顿信、李克昌、王致义(一旅长)、吴乃康(秘书长)虽坏,但我是他们老子派的,周围都是八路军,所以他还不敢怎么样我。”唐克威同志也这样认为。他们只能怀疑我是共产党,但不知道我是共产党,一直到他们走,我都坚持宣

传共同抗战。

黄河支队要招兵，丁树本找我说：“你们政治部搞黄河支队，弄得人心很乱。”我说：“抗战怎么能背着粮食？”他说：“招兵！我们收兵都很困难。”我说：“抗日嘛！”丁说：“我把他们的枪收了。”我说：“那就不对了。怎么能下抗日武装的枪呢？”丁说：“我准备还给他们。”后来，丁树本把人放了，把枪还了。这说明他对我们不满，但还不敢作绝。

1939年底，讨伐叛军石友三，部队打过来，我们并不收拾丁树本，但丁心有顾虑，把部队一拉向西走了，走前没有给我说。临走，丁给我一封写给宋任穷的信，叫我送去。我先找唐克诚，告诉了他。我拿着信跑了一天，在坝头附近找到宋任穷、程子华。信的内容说明把部队向西拉，希望以后见面。宋又回了一封信，仍叫我转回去，我找丁树本，在两门一带碰到刘晏春同志。那里有我们一个游击队，我呆到那里，找了一个老乡把信送去。这个老乡真的把信送到了，丁派一个骑兵排接我，结果被×××把人家解决了。但我不知道。送信老乡转告说了要我去。我去了，因为我不知道他的骑兵排被解决的事。上午我和他们都见面了，丁说要和宋司令见见面，叫我转告。下午丁又说，这样吧，叫我的参谋长全权代表我和宋司令见面。晚上丁又说，另外约时间再见面，部队要转移一下。

我想丁树本这样一天三次改变主张很不好，可能有情况（实际是他的骑兵排被解决所致），我和唐克威、程子华说，我们不宜在此久停，我们得走。他们俩坚持要了的回信，我说：信我们已经送到，口信也已经得到，任务已完成，你们不走我走，我的身份他们都知道。我决定走，骑马不行，我找他们要一辆好自行车，天不亮我就跑了。到两门又碰到刘跃先（晏春），他说你来得好，不来了树本可能要收拾你。我在刘晏春那里吃了饭，就回到八路军办事处唐克威那里。

（孙建岭、徐书荣整理）

回忆濮阳八路军办事处

王鹏程

濮阳是冀鲁豫区建立党组织较早的县。从1929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党领导濮阳人民进行过有如“温邢固事件”、“罢教运动”、“盐民斗争”、“姚家暴动”等多次政治的和武装的斗争，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西安事变后，根据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精神，1937年秋，首先在清丰县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第二年，即1938年麦后，根据直南特委的指示，决定将办事处迁驻濮阳城内。这个办事处的名称叫做：“国民革命第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部办事处”（习惯叫法为濮阳八路军办事处），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直南豫北地方办事处。

盘据在濮阳的丁树本，曾在国民党冯玉祥部办事，1936年由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委为濮阳县长，至1938年丁已是冀鲁豫边区八县保安司令兼濮阳专员。当时丁树本实际辖不了“鲁”，因为鲁有国民党范筑先部。那时丁树本内部已经有我们共产党的人，平杰三同志已经在这里，晁哲甫同志是主要负责人，罗士高同志是丁部的政治部主任，组织部长卞慎吾，宣传部长晁涌光（晁哲甫的侄子），都是我们的老同志。

让我进濮阳和丁树本接头是直南特委组织部长刘晏春同志给我谈的。他说：“杰三、晁老和士高同志已在丁部，你去和他们商量，搞好统一战线，掩护地下党，组织抗日救亡运动。”他交给我一封朱总司令和徐向前副师长给丁树本的信：信的内容是向丁说明要在

濮阳设八路军办事处，希望他协助。

去濮阳那天。是跟刘晏春同志一道去的，但他不出面，为了显示力量，我带了一个排护送。我们到了濮阳城北门，国民党害怕八路军，岗哨不让进城，没有办法，只得住在城北门外一个小店里。晚上晏春同志和我商量，决定由我自己持信进城。到县衙丁的司令部后，几次传达都不接见。第一次传达说丁不会客，第二次又说了不在家，第三次，我急中生智，对传达说：“你跟丁司令说说，看到底接见不接见？”传达刚走，我就跟了上去。当时丁树本正在房厦下散步，此人大个胖脸，很有一表军人风度。传达报告后正和他谈话，我也到了跟前。丁见后吃了一惊，传达也吓了一跳。丁树本只好接见我，握手以后，到了丁的办公室。我递过朱总、徐副师长的信，丁客气地说：“我欢迎你们来，支持你们在这里建立办事处，往后凡能用着兄弟之处，定尽力帮助。”

“丁司令开通，能顾全大局。”

“都是为了抗日吗。”

套话之后，我说：“北门外还有我们几个人，司令的部下不让进来。”“叫他们进来，我马上通知。”他边说边站起来喊到：“来人！”

“到！”进来了一个年轻的侍卫，立正听候。

“通知北门岗哨，让他们把王主任带的人放进来！”

“是！”年轻的侍卫敬礼转身去了。

接着，丁树本坐下来又说：“关于你们八路军办事处来濮阳之事，我已委托罗（士高）主任，打个电话让罗主任来和你们谈谈。”

罗士高同志来了，丁给我们互相做了介绍。接着丁说：“我忙，你们谈吧，一切由罗主任安排。”说罢就走了。

丁树本走后。我和罗士高同志说话就方便了。士高同志说：“咱们走吧。”出了门，又对我说：“这下好了，以后再用不着偷着来了，可以公开了。我已经在南街牛万里同志表兄弟的杂货铺安排好了，给养用具都有。我说：“晏春同志也来了。”士高同志高兴地说：

“那更好，晚上我们见见面。”当晚，我和晏春同晁老见面。晁老说：“没想到你们来，丁树本这段表现可不大好，不过既然来了，估计他也不敢怎么样。”接着晁老介绍了一些丁部的情况，最后研究了一下开展工作的方法。

办事处人员不多，连同通讯员只有十几个人。我是主任、王士喜是秘书。日常一些具体工作多是王士喜去做。晁老是丁树本的政治部副主任，和罗士高同志接触是公开的，为保护晁老的身份我们平常都不和他多说话。

当时晁哲甫同志和士高同志帮助丁树本制订了抗战纲领——即统一战线、军民合作、抗战到底的三大主张。我们表示拥护丁的三大主张。虽然这些办法因丁树本的政治立场未能全部执行，但在稳定群众和促进丁树本抗战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自从办事处进驻濮阳，和丁树本的统战工作来了高潮。以共产党员安法乾为主任的“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总队等党的外围组织相继安到了濮阳城内，救国总会建立以后，区救国会活动都公开了。救国总会还以抗日的名义举办训练班，实际是为党培训干部。晁哲甫、罗士高、晁涌光等党的同志都到训练班讲过课。同时以我党员陆辉同志为负责人的丁部宣传队、话剧团也积极配合行动。另外丁的第一旅政治部主任陈如海，第二旅政治部主任何亦然，第三旅政治部主任浦东修（彭德怀副总的内弟）都是我们的人，说明丁部的政治工作我们都抓住了。由于我们的积极工作，这段时期内，在抗日统战问题上，丁树本表现得还不错。

因为丁树本说过“一切由罗主任安排”这样的话，所以我可以公开到士高同志的住处。他住房的夹山墙有个小洞，安着小门，我拿有钥匙，当士高同志不在时，党的秘密文件可通过这个小洞转给他，同样有关丁部的情况，也可通过这个小洞取走。

对我们，丁树本也是很留心的，他常过问办事处的事。当他发

现有群众武装和我们联系时，便问我：“你们又有小部队啦？”我解释说：“是群众的抗日活动。”当他发现办事处常有外人来往时，就弦外有音地问我：“你们办事处乱点不，连穿破烂衣服的人也招待？”我说：“兵荒马乱，群众生活是很苦的，今天的情况，穿好衣服的人实在没有穿破衣服的人多啊。”

丁笑笑说：“你真会回答问题。”

我说：“本人直爽，只是说句实话罢了，请丁司令指教。”

丁勉强地点点头：“说的是，说的是。”

工作中，明争暗斗也是有的。在我们开办训练班的同时，以王照临为主的丁树本国民党党部办事处，石友三的军团办事处，张荫梧的民军办事处以及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的办事处都相继开办了训练班，和我们对着干，争夺人。后来便和国民党发生了摩擦。有这么第一回事：活动在濮阳南部两门、大桑村一带的“黄河支队”，一次卡了丁的三车子弹（木轮辘车），并把丁的参谋长曹××的家抄了，还派了他的钱。直南特委知道后，通知办事处，让把子弹还给他们。可是还没等我通知“黄河支队”，丁的一个团便借此开到两门、大桑村把“黄河支队”包围了。“黄河支队”司令员鲁明同志不在家，政委张炜同志没有经验，国民党要张出来商谈，结果张被扣留，于是强迫张下令交枪，张照办了。政治部主任刘培岑同志也没有办法，因为政委已经下了命令。枪被下了之后，张炜向我作了汇报，我说：“马上汇报给特委。”汇报后，特委书记王从吾同志亲自来了，他持“直南豫北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名信片到了濮阳城里，我和王从吾同志一起去见丁树本，丁狡猾地说：“不知道，枪一定要还。”第二次见了，我们说明子弹已经归还贵部。丁说：“已经查明了，团长撤职，旅长记过。”当把枪归还我们之后，第二天我又找到了丁说：“你们还扣压着我们一个人，而且我们的枪也不够数。”丁说：“人要放出来。”于是让我将被扣的同志领了回来，同时又赔给我们六把盒子枪，从此我们的工作小心了。

那时候在丁部搞统战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朱总司令这样说过：“搞这工作，嘴里要有千军万马，心中得标分寸尺度，不然，使得腔大了伤害统战，使得腔小了失掉立场，这里有个原则问题。”我亲身体会地感到总司令这句话的含义是多么深刻啊！

通过直南特委作工作，争取了国民党滑县县长陈曙辉，把他的全部人员武装一起接收了过来（当时这样说：连鞭带牛一起赶）。我们把“黄河支队”改编为第三大队，让陈曙辉当司令员，鲍其祥当副司令员，刘汉生同志任政委。这个三大队充实到了黄克诚部，在“黄河支队”之前，还有个第四支队。国民党高树勋给番号叫“河北民军第一路第四支队”。后来又以丁树本的名义改成“冀鲁豫八县保安司令部民军第四支队”，名义上归丁树本指挥，实际组织上是独立的。共产党员唐哲明任司令，刘汉生、张增敬先后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7月，邓小平、宋任穷叫把四支队先后调到卫河北岸广平附近，改编为八路军陈再道东进纵队一个团。于是丁树本向我提出：“你们光吃蛋，可别带吃鸡呀（意思是别连根拔），都给拉走了，弟兄们反映很大。”

还有接收土匪司令王瘸子（王希太）一事。王在考城、兰封、商丘一线很有势力，有五、六百人，敢打敢拼，很能作战。特委便派于子元同志（即于百文，曾是濮、范、观联立乡师第一任支部书记），打进王希太的部队，任他的参谋长，工作上和我们办事处联系，经过于子元同志多次工作，王希太同意拉部队到八路军这边来，由办事处负责接收。于是我们在东明县布置了贴标语、喊口号，组织群众集会欢迎的热烈场面。以表示我们的真诚。特委让我给他们讲讲话。我便把共产党团结一切力量抗日救国的道理和他们的正义行动讲了一番。他们有个惯例：要赏钱。于是我跑国民党东明县长张惠僧那里借了一百块现大洋赏给了王希太的弟兄们。因为张是丁树本委任的县长（实际是我们派的），所以丁知道后便把张的县长撤了。后来张到濮阳见了我的面说：“你办得好，我拿一百块现洋买

了个罢官。”张被撤职后，丁树本又委任吴殿卿（外号吴扒皮）当东明县长，此人很反动。我们的队伍在那里呆不住，决定把人拉到黄河北岸来。但王希太的部下多是当地人，怎样动员也不愿过黄河，结果一个晚上跑的只剩几十号人。请示特委，决定建立八路军陇海支队，委王希太为第一支队司令员。并派于子元同志任考城县县长。考城县政府便成为我们在陇海线上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在这一点上，王希太是出了力的。因为王希太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每次开党员会，总是有人陪着他说说话，后来当他知道了自己当了八路军还不是共产党员时，竟张嘴大哭了一场。

为了开展东明的工作，当时又在东明建立了八路军分办事处，由县委书记张恩同兼分办事处主任。同样为了开展濮滑边的工作，也在濮阳、滑县交界的两门建立了濮滑边分办事处，由李广录任主任。

丁树本右转最显头的是 1939 年春参加了国民党洛阳会议之后，据说他在洛阳向国民党第一战区行政长官卫立煌汇报了他的抗日统一战线纲领，丁的本意是表功，结果反受了批评，于是把他留下受训，致使丁走向更反动的道路。丁从洛阳回来还带了国民党党务人员，回濮阳后即成立了国民党指导专员办事处及各级党部；在军队又成立了特别国民党党部，改组政治部，排挤我党干部和进步人员，同时开办军政人员训练班，集训一切他们认为不可靠的青年，强迫集体入党，实行所谓“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晁哲甫同志及时地对我说：“丁头有变化，要注意。”果然，不久便在他的《胜利报》上公开登出对“民先”组织的声明。声明说：“民先既非本党领导，又非共党外围，理当取消。”接着便中断了对“抗日救国会”的给养供给，还撤销了实际由我们掌握的丁部宣传队……直南特委秘书长牛万里同志代表特委和我商量，决定救国会由群众送给养，但多是红薯之类。宣传队的几十号人救国会管不了，养不起，便由我们八路军办事处接管了。有个会说书的骆驼沈冠英（濮阳海通人，1978

年在郑州逝世，生前为河南省曲艺协会副主席），我把他搬了出来，到农村说唱演出，一方面宣传，一方面解决生活问题。

丁树本发觉晁哲甫同志并不为他所用时，便千方百计牵制晁老的活动，他想了办法，每天叫晁老给他讲辩证法。”因为晁老是社会名人，所以丁树本也尊称他“晁老师”。国民党党部的主要负责人王照临很坏，但他不敢怎么罗士高同志，因为罗是冯玉祥介绍到丁部的。

这个时候，杨得志司令员和崔田民同志（政治部主任）带部队过来了，杨带了三四四旅六八八团一个连，丁知道后问我：“来了多少人？”我说：“一个支队。”丁又问：“为什么骑洋马戴钢盔呀？”我说：“是从日本那里夺来的。”六八八团的一个民运部长也吹嘘：“一个钟头就把濮阳扫成平地。”所以丁很害怕。

1939年冬，开始了第二次讨逆斗争，国民党杂牌军石友三部南下盘据濮阳，我党为争取丁部继续抗战，与丁进行谈判，但丁坚持反共立场，与我党对立，公开叛变，随石友三带兵南窜，沿途逮捕、杀害我地方工作人员。尽管如此，为了统战工作，咱们并不马上进城，而是提出了“空城待丁”的口号，并且张贴标语：“拥护丁司令抗战到底！”、“欢迎丁司令重回濮阳领导人民抗日！”同时，还在刘、邓部队驻防的濮县白衣阁段君毅同志的家里，由程子华同志主持研究，徐向前、宋任穷同志和我联名向丁写了封希望他留下来坚持抗战的信，特选派罗士高同志亲自送去，但没有把丁树本争取过来。

之后我病了，肺病到了第三期，领导确定让我休息。为了加强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党明确唐克威同志接替了我的工作（在这之前唐克威同志已经来了）。当我养病要走的时候，我找晁老谈话，晁老说：“党对你的工作是满意的。咱们几个，不求有功，但也无过，功不大，过也没啥。”他安慰我好好养病，病好之后，再投入新的战斗。

（孙建岭整理）

高陵县的创建

陈瑞光

(一)

高陵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而建立的一个县。建立的时间是1940年4、5月间。建县之前该地区称为濮(阳)滑(县)边区,是把河南之滑县北部(即上堤部分)和河北濮阳之西部合并组成,西濒卫河,北靠内黄,是两省(河北、河南)四县(濮、内、滑、浚)的结合部。高陵县和内黄县都是沙区,在地理条件和对敌斗争环境方面关系密切。当时两县分属两个地委和分区管辖,但由于上述原因,在对敌斗争方面,有临时统一指挥的联合委员会的军政领导组织,由第二军分区、专署有内黄、高陵两县的主要领导人共同组成。此统一指挥是1940年夏保卫麦收时建立起来的,大概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始终保持着这一组织形式。高陵县所属的第二军分区领导机关经常在黄河大堤以南的各县活动,故在军事指挥上,第五军分区的统一指挥要多于第六军分区,这是当时的对敌斗争形势所形成的一种客观趋势。

第一届高陵县委的主要成员有:县委书记由我担任(原名陈锐,现名陈瑞光),县委副书记孙明三兼宣传部长,组织部长赵汉森,组织部副部长王俊文,县长赵润普,县人民武装部长田裕民,县大队长白健,县抗联主任刘淮,县财经科长王斌等。

(二)

抗日战斗时期,沙区的斗争一直是很紧张而频繁的,在1940

年至 1941 两年期间,有两次较大规模的扫荡,这就是 1940 年的秋季大扫荡和 1941 年的“四·一二”大扫荡。这两次大扫荡,都给高陵县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此外,还有些虽然是纯地方性的斗争,但是其尖锐程度和对地方的危害也是很大的。例如:滑县白道口的敌人和汉奸地主武装孙步月部频繁而残酷地对高陵县的“蚕食”进攻和掠夺“清剿”。在 1940 年麦收之后到秋收这段时间,原冀鲁豫边区特别是第二、六分区,斗争形势很紧张。在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为了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进步力量,发展和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当时,以三四四旅一部由太行山东进冀鲁豫边区,引起了敌人的高度注意,吸引了较为庞大的兵力在边区周围和陇海路中段沿线。从麦收到秋收这段时间,不断进行扫荡,分路合围,扑捉主力,妄图一举歼灭或堵截我军南进通路。滑县、东明、长垣、濮阳一带国民党反动势力,配合日寇的大规模扫荡,蜂涌而起,组成反动的红枪会,进行武装叛乱。敌人侵占我们的一个地区又向另一个地区推进,很快使二军分区所属各县的大部分地区失守。这次叛乱的另一个反动因素,是原豫北地委组织部长吴兰田叛变革命,投降敌人,依靠敌人力量,发动叛乱,这对滑县、高陵及其他各县抗日力量和党的组织破坏很大。当时,赵谭支队和二分区部队的大部分,也在这时突破敌人主力的合围堵截向陇海铁路以南挺进,有些县区领导干部在此极端严重的恶劣环境下,因无立足之地也随军南下。因此,大部分土地很快成了敌占区。高陵县所属的滑县部分,下堤完全沦陷,上堤的三、四区也部分被敌人占领,由于党及时地发动群众,组织村村武装联防,依靠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并随时形成了武装联防线,才阻止和击退了叛乱武装的蜂涌进攻。初期,形成敌我两方完全对峙的武装斗争局面。敌人逐村“蚕食”、“清剿”;我方逐村争夺,村村固守。被敌人侵占的或被敌人“清剿”过的村庄,党的组织和抗日力量都遭到了严重破坏。战争的频繁和残酷程度是空前的。到了 1942 年的时候,情况才有所好

转,这时我抗日民主区域逐渐的扩大,敌占区域逐渐缩小,我方工作已深入到敌占区的中心。

另一次对高陵县摧残最厉害的战争,就是 1941 年的“四·一二”大扫荡。4 月 12 日,日本侵略者纠集平汉铁路沿线及周围各县日伪万余兵力,配有飞机、大炮、坦克、骑兵、采取“铁壁合围”的战术,向我冀鲁豫沙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高陵、内黄进犯,敌人用现代化装备和优势兵力,稳扎稳打,步步设防,分区“合围”、“清剿”、对所到之 120 多个村庄,实行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敌人扫荡的一周之余时间里,我沙区根据地遭到了极其惨重的破坏。高陵县委在敌人开始扫荡前的夜晚,通过敌占区工作关系,获悉了敌人进攻的情报。因此,立即报告了军区,当时军区首长正在高陵县境内卫河东岸的安化城指挥战斗。军区首长得到敌人扫荡的情报后,在 frontline 指挥所立即作了反扫荡的作战部署,决定由四团二营控制敌人,掩护主力部队向外线转移;县区组织武装工作队,配合民兵掩护群众隐蔽转移。敌人的大扫荡开始后,大部分村庄是按预定计划在村支部领导下向指定地点隐蔽的,由地方武装和民兵在群众疏散区域周围负责掩护。但也有部分村庄未能按照预定计划疏散,而向敌占区逃避了。个别村庄的党员和民兵,也有部分人把枪藏起来,随同亲人和群众向敌占区的亲戚朋友家躲藏了;有的继续坚持工作和斗争;有的消极悲观不敢出面组织领导群众进行斗争,甚至在敌人扫荡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还未返乡;也有个别人在敌区安居了。县、区干部中有二区区委书记和两个区干部随同群众插到了敌占区,但他们坚持了对本区群众的领导工作,并建立了临时领导小组,扫荡结束后及时返回工作岗位,同时他们毫无隐瞒的将此情况及时报告了县委领导。根据我现在的记忆,在日寇进行的多次扫荡中,高陵的县、区干部中没有被俘、被捕、叛变、自首的。经过敌人这次惨无人道的大扫荡,虽然善后工作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才恢复元气,但是高陵县的党员干部和

人民群众经受住了这一次严峻的考验和锻炼。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懂得了战争。从此，进一步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和信心。“四·一二”反扫荡的战斗结束后，人民游击战争一直在坚持并发展着。六、七月间，敌人派了几十辆汽车，满载着机械化装备的部队，在孙步月匪部配合下，窜犯到高陵县境内抢粮的时候，我高陵民兵组织的武装联防线坚不可摧，巍然屹立，他们各自为战，村自为战，一处枪声响，彼此相呼应，使敌人闻之丧胆，狼狈逃窜。在“四·一二”大扫荡之后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高陵民兵武装能攻善守，他们充分发挥武装联防的威力，战胜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为保卫沙区根据地付出了可贵的代价，冀鲁豫边区党委、军区和行署对高陵县人民武装斗争，给予了表扬和嘉奖。

(三)

高陵县自创建以来，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连续和日伪顽杂各种反革命势力进行了上百次的频繁而残酷的战斗，在严重的战争中经受住了考验，站住了脚，经过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保卫和发展了沙区抗日根据地，并一直坚持到最后胜利。主要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全县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和党中央关于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四·一二”大扫荡之前的一段时间，各村人民武装组织曾经形成一阵购买枪支的热潮，仅在1941年春节之后，一、三区的枪支就增加了约千支左右。一些较大的村庄民兵基干连、基干排迅速增多。这样以来，村里的负担重了一些，村支部的工作重点，主要是抓紧了武装建设和对敌斗争。这样相对地就忽视了其他应做的经常性工作，如村支部建设，党员的发展，小学教育等。因为每天都有战争，天天都在打仗，联防线上枪声一响，讯号一传，民兵们就紧急集合，随时参战，他们担负的其他工作都要停下来，一切为了打仗。这种优点突出，缺点明显的情况，

在各级领导中都反映出来了。问题在于怎样正确估计和发扬成绩，正视和克服缺点。可是，在检查当时的工作情况时，有些领导同志对经常性工作看得重一些，缺点强调得多一些，因此对当时当地的斗争形势和主要斗争任务就有些冲淡了。对如何围绕着主要的中心任务和正常工作相结合注意不够，一些群众中创造的典型也未充分肯定。同时，在发展人民武装过程中虽然出现负担过重的一些缺点，但是体现了广大群众坚持武装斗争的积极性，这是人民群众政治觉悟很高的一种表现。然而，对这个问题在某些领导同志中，认识并不统一，直到1941年秋，边区党委书记帮助高陵召开了县、区干部扩大会议，肯定了我们一年多来发展人民武装斗争的经验，并表彰了这条战线的成就，奖励了先进单位和英雄模范人物，才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1940年至1941年的两年中，在抗日反顽的武装斗争中，我们高陵县涌现出一大批革命英雄人物，他们的事迹实在动人，是可歌可泣的。遗憾的是我对许多英雄人物和村庄的名字记不清了。为了悼念这些英雄人物，我列举几件事例作这代表性说明：

第一，在高陵县联防线上的一些村庄，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一切服从于战备，不同于平常。民兵的枪支随身带，人不离枪，劳武结合，不管生产、赶集、开会、访友，都随时随地准备参加战斗，听到讯号的召唤，立即奔赴战斗地点；每户人家，平时都有准备好的一床被子，一个干粮篮子，随时准备支援前线，参加抬担架送伤员或运送军需军用物资；每个村庄的群众听到战斗讯号，在半小时以内可以达到村子净（即人净、物净、牲口净），村里只留下指定的民兵小队，准备痛击敌人。“四·一二”大扫荡时，在沙窝某一地点的村民，被敌人的“清剿”队紧紧包围，掩护哨的某村民兵小队，战斗到弹净之后和敌人肉搏而全部牺牲。还有这么一个英勇战士，在敌人进村后没转移出去，隐蔽在一家房顶上，当敌人要屠杀未来得及转移的乡亲时，他大喝一声，从房顶上一跃而下，夺过敌人一

支三八式步枪后，与群敌拚刺而牺牲。活动在沙窝硝河西岸群众疏散区外面的一个武工队，发现敌人“清剿”队要向赤手空拳的群众射击，他们将敌人吸引到自己埋伏地附近，转移敌人的目标，为了保护群众，他们的队员伤亡很惨重。在敌人“清剿”井店集周围几十个村庄的时候，用汽车群在“清剿”区外围布置成一个三角形，内圈是骑兵巡逻队，发现人群就射击枪杀。扫荡期间，敌人在各村都安了临时据点，村与村之间以轻重机枪构成火力网，封锁沟，不时的进行着疯狂地扫射。我们县委机关的几十个同志是一个战斗集体，时而被敌人包围在“清剿”区之内，时而我们又突破重围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夜聚明散，偷袭敌人，在那最艰苦的环境里，通联工作始终没有间断过，发挥了战斗队和指挥部的应有作用。

第二，高陵县的妇女民兵，在平时和战时都表现得很勇敢，有些典型村庄的事迹很动人。化村支部副书记、基干民兵连指导员，扫荡中领导“坚壁清野”时，挨家逐户检查，对不听命令擅自潜伏在村内的可疑分子捆绑扣押起来，毫不讲情面。敌人都进了村庄，她还带领着妇女民兵在严密搜索，严防敌特，堵塞漏洞。她对县、区领导派到该村工作的妇女干部，工作上协助，生活上照顾，并负责安全，管接管送，亲如姐妹。当该村的工作任务完成后，需去另一村庄的时候，她总要亲自带领民兵护送，直到送进村见了支部负责人，办完交接手续才返回本村。千口村妇救会长，对八路军战士特别是侦察连和交通站的同志，都亲热地称呼为“我们的老会长”。她全家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儿子都是八路军战士，一个新婚不久的儿子是侦察兵，由部队返家，眷密家庭，不想归队。老会长从民兵队长那里领受任务，要她务必动员儿子迅速归队，老会长和儿媳商量共同劝说他。一天当儿媳向婆母透露丈夫不想回主力部队，打算参加地方武装时，她母亲不动声色，晚饭时亲手做了点好菜，准备好酒，约儿子、儿媳一同晚餐，将儿子灌醉，趁儿子酒醉熟睡后，她亲自用绳索捆绑好，报告了村支部，派了几个民兵，由她亲自带领将儿子送到

部队,当面交给团首长,请求部队好好管教。之后,儿媳的情绪受到了影响,然而老会长严肃认真,不断耐心教育儿媳,鼓励她在后方好好工作。尽管她本人也很难受,但却从不表露,照常积极工作,好象家庭中沒有发生这件事一样。从此,老会长的事迹在八路军战士中传得普遍,更广泛了,她更进一步的受到了广大战士们的尊敬和爱戴了。

第三,高陵县三区(井店周围)是对敌斗争最尖锐的一个区。这里不但是日寇扫荡的重点,而且经常遭受汉奸孙步月匪部的侵扰,1942年秋,孙步月的一股匪兵窜犯到联防线前沿村庄北海头抢掠。三区区委书记李明德同志率区基干队和民兵向敌人反击,战斗越打越激烈,齐村联防各村的民兵越聚越多,踊跃前去增援。当时,县委正在开会,向地委巡视团汇报工作听取指示,我提议暂时休会,一齐去战斗地点指挥战斗,集合在齐村的各村民兵纷纷要求请战出击,于是我们又率领一部分民兵向北海头村挺进,与李明德同志并肩战斗,一鼓作气打退了来犯之敌,敌人由北海头向后村方向撤退了。因民兵们杀敌心切,奋起追击敌人至后村附近,目的是歼灭这股来犯之敌,给孙步月一个教训。可是,战斗正在进行中,敌方枪声逐渐稀疏,我怕中了敌人之埋伏,立即命令撤出战斗。民兵们大部分从西路返回联防,我们县、区几个领导同志边走边谈,行进到北海头村西,突然与敌遭遇,狡猾的敌人利用青纱帐为掩体,绕至该村的村东村北将我们包围,堵住了退却的后路。在这危机关头,李明德急迫让我带领同志们突围,他奋不顾身的负责掩护。当我们突破重围转移到堂上村时,李明德率的一个主力班被敌人紧紧包围在北海头西头一个苇塘里,抵抗的枪声依然在响。当我们带领一个民兵连第二次冲锋到该村接迎李明德时,他们除伤亡者已经全部被俘虏,敌人也撤回到了据点。战斗结束后,我们回到县指挥部,对这次战斗进行了讲评检查,总结了教训。同时,布置敌工站的同志通过关系了解被俘同志的情况和营救办法。数天之后,我们

从敌区获悉，三区区委书记李明德被解送到白道口叛徒吴兰田部。吴匪对他施行严刑拷打，百般摧残，逼他交出全区党员干部名单特别是敌占区的秘密工作关系，明德同志在敌人的棍棒、皮鞭面前坚贞不屈，痛斥伪匪。敌人一无所获，得到的回答除了“不知道”之外，只是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同志都在联防线上，你们有种就去抓，怕死的不革命，革命者不怕死！”最后，敌人无计可施，将他钉在白道口寨门上示众。在这生死关头，明德同志怒视敌人，骂声不止，他在挣扎时，裤子掉了下来。厉声责令匪兵替自己系好裤子，并嘲笑说：“我是堂堂的中国共产党人，死要死得光明磊落！”临终前，他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李明德同志英勇就义的精神，感动着白道口附近村庄赶集的人们，死前有人给他端水，劝他多保重，死后有人为他烧纸，悲恸得泣不成声。他的英雄事迹受到了沙区人民的颂扬，老年人痛哭不止，民兵们发誓为他报仇雪恨，青少年学生们学习宣传了他英雄就义的革命精神。县委得到他英勇就义的消息，在邵村南大庙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我亲自主持了这个追悼会并致了悼词。

(刘国贤整理)

尚和县的建立和对敌斗争

杨敬仁

1940年“五·五”(农历5月初5)大扫荡之后,日伪军占领了我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濮阳、清丰等县县城和交通要道的一些集镇。这时,盘据濮阳东部柳屯、文留、八公桥、户部寨一带的国民党顽军,以及当地会道门的快刀会,也蔓延起来。当时,敌我斗争相当紧张。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大大缩小了,并且被分割、包围、封锁,使县北部无法和南部联系,东部无法和西部联系,区委和县委都联系不上。有些党员、干部动摇了,有的弯腰回家或躲起来不干了。留下来的同志虽然不多,但都坚信在共产党领导下,抗日一定会胜利。特别是经过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后,对抗日战争能取得胜利更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不管形势多么紧张,环境多么艰苦、危险,绝不动摇。坚持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坚持上级规定的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指示,顽强的坚持斗争。

1941年1月在频繁的敌伪扫荡和我反扫荡的胜利中,冀鲁豫行政公署成立,晁哲甫被选为行署主任。为便于对敌斗争,根据我被敌人分割和县与县交界处敌伪力量较薄弱的情况,决定把县化小。在县与县之间的结合部,组建了几个新县。如将清丰县西北部分和南乐县西南部分合在一起建立了卫河县(县靠卫河),将清丰县西南部分和濮阳县西北部分合在一起建立了顿邱县,将濮阳县分成了三个县:濮阳县城南部仍叫濮阳县,濮阳县东南部建为昆吾县,濮阳县城东和东北部的清河头、柳屯、文留、岳村集、黄城、小濮

州一带建为尚和县。

尚和县这名字是根据历史起的。因历史上有个名人叫柳下惠，是柳屯一带人，柳下惠是圣人，圣之和者也，因他尚文尚武，所以就把濮阳城东北部这一块地方起名叫尚和县。

尚和县建立后，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县级党政领导力量逐步增强，逐渐由秘密和半公开活动，到公开活动以至到打开局面，做到有敌人无敌区（只有敌伪顽据点内有敌人）。1944年底尚和县和濮阳县全部解放，取得了这一小块根据地的抗战胜利。

尚和县地理位置很重要。他的东部是冀鲁豫边区最大的抗日根据地——濮（县）范（县）观（城）根据地。这3个县除敌伪军大扫荡时集中兵力搞铁壁合围敢到外，在中、小扫荡时敌人是不敢到的。所以这3个县敌伪军从未占领过。1941年夏，冀鲁豫边区和鲁西地区合并，成为大冀鲁豫边区，党、政、军、群领导机关都设在这里。尚和县西边过了敌伪封锁线是沙区根据地，而尚和县北部又是和清丰县南部交界，离敌伪军占领的濮阳、清丰县城据点都有20余华里，所以尚和县是前线。只要这里对敌斗争搞好了，群众发动起来了，实际上就使两边的根据地更加安全畅通。因尚和县是两边根据地的通道，就是尚和县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情况下，地下交通线也没有中断。如西孟轲以冯汉芝、李存仁为首的地下交通站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搞好尚和县的对敌斗争是有战略意义的。当然尚和县的对敌斗争也是得到两边根据地大力支援的。尚和县的发展和斗争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成立以前阶段，建县初期阶段，打开局面阶段，扩大解放区直至全县解放阶段。

（一）尚和县成立以前的阶段（1940年1月至1941年1月）

1940年1月，由于反复无常的国民党军阀三十九集团军司令石友三勾结日军进攻八路军，摧残抗日民主政府，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我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反击讨逆，将其击败。而原盘踞在河北省南部濮阳等五县的国民党顽固派、专员丁树本

也率部(有3个旅)跟随石友三一同南窜。这样濮阳、清丰等几个县全部被我军解放。在党的领导下,我地下党员和大批高小生、中学生,以及部分工农群众积极分子纷纷出来参加革命,县区抗日民主政权经过民选纷纷建立,而各级党组织、抗日救国会等群众团体、县区地方武装,也纷纷建立。在此基础上专员公署也建立了(安法乾同志被选为抗日专员),当时形势大好。濮阳县第一任抗日县长是王卓云,县委书记是常颂(以后以史向光),县政府秘书是郭廷相,教育科长是任子庸。农历5月5日日本鬼子大扫荡后,濮阳县城和较大的集镇都被敌伪军占领,到处修据点,建碉堡,修公路,挖封锁沟,我们的大块根据地就被敌人分割、封锁了。敌伪军还经常对根据地、游击区进行大、中、小规模不等的扫荡、包围和袭击。就这样濮阳县党政军民就开始了打游击,进入了艰苦斗争的时期。

为了便于对敌人进行斗争,当时的濮阳县委决定,在濮阳县北半部成立濮北工委和濮北办事处,统一领导濮阳县城以北几个区的对敌斗争。前时工委书记是裴学增(以后改名为赵锋光),但他一直未上任,以后是陈二扁。濮北办事处是政权机关,主任是郭廷相,副主任是任子庸。这个时期的对敌斗争是很艰苦、很复杂的。因敌强我弱,大片地区成了敌占区,我们可以活动的地区很小,只有濮阳、清丰两县交界附近的20几个村庄(孟旧岩、魏旧岩、任旧岩、西孟轲、李家村、田拐,几个小岩,南北田村、小岳村等)。就是这些村庄也不能连住几天,而是每天夜行军。一天换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时期的对敌斗争主要是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揭露敌人的阴谋罪行,打击出来扫荡的小股敌人,教育干部和群众坚定抗日斗争的胜利信心和决心,保存并逐步扩大自己的力量。

对封建会道门——快刀会的斗争,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我们采取了政治攻势和打击首恶的政策,很快解决了。如濮阳县东北部一个大的村庄叫东北庄,我八路军四团去就不让进村。在宣传说服无效的情况下打击了一下,并把其头子刘承武(曾当过国民党县

长)抓了起来(以后取保释放),这样才把快刀会的反动气焰压了下去,为我地方干部和地方武装这一带活动创造了条件。

1940年12月,盘踞在濮阳东部柳屯周围与日本侵略军相勾结的国民党顽固军十军团内部发生了石(友三)高(树勋)事件,高树勋把石友三杀了。这时濮北办事处就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始了争取高树勋合作抗日的工作,但没有成功。

(二)尚和县建立初期的艰苦斗争阶段(1941年1月至1942年6月)

1941年1月尚和县正式成立。我抗日专员安法乾亲到东北庄召集干部和各界代表会议,民主选举了郭廷相同志为尚和县县长,任子庸同志为县政府秘书,魏向远被任命为民政、司法科长,刘子仁同志被任命为财粮科长,刁嵩山同志为财粮科干部。就这样尚和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了。其它党群组织也开始建立。胡汉身同志被任命为县工委书记。阎草(金月)从冀鲁豫边区救国总会调来被任命为尚和县农民抗日救国会主任,杨敬仁从边区抗日救国总会调来被任命为尚和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以后又有李培恩同志调来被任命为县抗联宣传部长(1941年3月县救国会住在孟村被濮阳敌人包围时抓走)。另外,县基干队武装也开始筹建,已有人、枪20多。枪支来源,是在这之前打击封建会道门时把东北庄村的快刀会头子刘承武抓起来,一些地方士绅来保他,我们提出让他们把枪交出来后就释放,他交出20支匣枪,都是新的。这样使尚和县成立了20余人的短枪队。当时尚和县共分5个区:清河头、孟柯、赵村、黄城、小集这一带为一区;柳屯、岳村集、东北庄、这河寨一带为二区;柳屯、这河岩以东刘高庄、张堂一带为三区;小濮州、郭龙、石木头一带为四区;柳屯、清河头以南、文留西北一带为五区。当时由于三、四、五区都是敌占区,是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军高树勋、孙良诚部盘踞,而我尚和县力量还小,所以只有一区和二区建立了区抗日政权。三、四、五区没有建立。但三、四区王庄、刘高庄、张堂等村

都有我地下党支部和地下区委活动。如1943年在尚和县当过区委书记，解放后曾在中共中央党校教政治经济学的张磊同志，就是三区张村我地下党支部负责人。解放后曾任过云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王镜如同志，就是小濮州东南王庄村地下党员。当时尚和县一区区长是史振英，该区当时共有干部、通讯员七、八个人。二区区长是吉建一同志，该区当时只有他和通讯员两个人。但就是这两个人的勇敢活动（有时县级党、政、群领导机关也临时派来干部和他们一起活动），今天在这村，明天在那村，有时也钻进敌占区，搞宣传工作，搞统战工作，搞锄奸工作，搞财粮工作，搞保卫群众利益的工作，而扩大了党的影响。在这一时间我们完全是在敌人对我包围封锁，不断扫荡和蚕食进攻下坚持战斗的。当然敌人也被我反包围，因过了敌人据点封锁线那边又有我们的根据地、游击区。当时的形势是犬牙交错的。如当时的一、二区周围都是敌、伪、顽军据点，西南濮阳县城是日、伪军的大据点，往北白仓、疙瘩庙也是据点，而仅靠一区边沿的清丰县的张村、刘格集、永固集、官爷庙等都是清丰县城的日、伪建的据点。从濮阳到清丰县城45华里，敌人不仅修了很多据点、炮楼、碉堡，且公路边上还挖了宽三米、深三、四米的封锁沟，阻截我两边的根据地、游击区的互相联系。濮阳县城东部小集、刘五星、清河头、焦庄、营仁店是日、伪据点。而柳屯、大河寨、户部寨、文留、七宝寨、于家村、这河寨，以后又有东北庄等村庄都是高树勋部盘据。所以我们站在区的中间，离每个日、伪、顽军据点的距离只有十几华里，有的只七、八华里远。敌人有时分别出来扫荡，有时突然对我包围袭击，有时也搞大的联合进攻，合击夹击我们，企图一举把我们消灭。所谓联合进攻，就是濮阳、清丰两县的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高树勋部同时进攻合击我们。在敌人不断扫荡和进攻下，我们有时甚至不能在本县村庄居住，而迫不得已到紧临尚和县西北部划到顿邱县的几个旧岩村去住，并以此为基地往东往县内活动。

敌军对我进行较大规模的包围袭击有：

1941年3月×日早晨，濮阳日、伪骑兵突然将疙瘩庙西边的孟村包围，当时我尚和县抗联的杨敬仁、尹修亚、王涛、李培恩等四个同志住在这个村。日本鬼子逐户进行搜捕，除李培恩等因穿衣打扮不象老百姓被抓走外，其余三同志均在群众掩护下脱险。一个半小时后因有我游击队向该村打了几枪，而敌人不敢久留逃走了。

1941年5月×日，高树勋部在天刚亮时突然包围了西孟柯村。那天，我尚和县党、政机关和县区基干武装住在该村，由于我县、区基干武装英雄还击而突围脱险。

1941年5月×日十二点，濮阳敌人突然包围了魏旧岩村。当时，尚和县抗联阎草、杨敬仁、魏培仁（他本人是该村的）和县基干队一个侦察员住在该村。但都在群众和周围我游击队掩护下脱险了。

1941年5月×日，濮阳、清丰两县的日伪军对尚和县我经常活动的孟柯集北边的南北铁炉等村进行了一次联合进攻，还有坦克汽车，但因我们每天换住一个地方，敌人不知我们住在哪里而扑了空。

1941年6月×日，高树勋部突然向我驻在小寨的八路军一个连进攻，在我军英雄反击下被击退。

1941年6月×日，高树勋部突然包围了西孟柯村，搜捕我工作干部。当时有县抗联几个同志住在此村工作，也被群众掩护脱险了。

1942年2月×日，尚和县党政机关干部、县、区基干武装随华北抗日民军两个连一起活动（华北抗日民军是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司令员是朱程。1941年至1942年曾几次来尚和县活动。1941年春某夜曾袭击过濮阳城东关敌人，缴获大批医药用品，解决了一些我根据地军民缺少药品的困难。战斗结束后驻在尚和县后铁炉村）。某天夜行军天刚明，住到岳村集还未吃早饭就遭到敌

人的包围袭击。当敌人还未完全包围住时，在华北抗日民军和县基干武装联合英勇反击下冲出了包围圈。

1942年4月，尚和县、区党、政、群机关和基干队武装队八路军冀中南下支队一个连活动。天刚时，住到岳村集西南吴拐村，人困马乏，刚睡下连早饭还未吃就遭到清丰、濮阳、柳屯的日、伪军的联合大举包围进攻，机枪声、炮火声非常密集。但在我军坚决反击下打开了一条路冲了出来。这次有我一副团长在指挥战斗时英勇牺牲了。

另外，这个时期在一、二区东部对我们威胁较大的国民党高树勋部，他盘踞的村庄也经常成团成营地出来包围袭击我们。在东北庄村就和我八路军冀中南下支队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在黄城也袭击过我们八路军。1941年4月×日早晨，尚和县第一任抗日县长郭廷相带着几个同志去北田村工作，到村边发现有穿军装站岗的（当时国民党高树勋部和我八路军冀中南下支队穿的军装颜色一样），误认为是八路军，进去了，结果全部被捕。这是尚和县成立以后不久遭受的第一次大的损失。自此开始，经上级党组织和行署、专署批准，任命任子庸同志为代县长。

在这个时期，有时我军的正规军来这里活动，有时只尚和县县区党、政、群干部和基干队武装几十个人单独活动，一般是每晚夜行军换住一个村庄。白天中午12点以前一般是防备敌人出来扫荡袭击，而到下午特别到晚上敌、伪、顽军就不敢出来了，因为敌人知道夜晚是八路军的天下。所以我们就乘下午和晚上到各村发动群众和各方面的抗日工作，甚至还钻到敌占区去活动，扩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

在这一段对敌斗争中，需要提及的是县抗联通讯员李小三（孟村人）。县抗联在李家村住时，敌人来了，他白手夺了敌人的手枪，活捉了4名敌人，以后在孟轲集战斗中牺牲。

在这一时期，我们也抓了统战工作，经常召集开明士绅社会名

流会议,并对他们进行个别谈话,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揭露敌人阴谋,不当汉奸亡国奴,要抗战到底,请他们协助我们做一部分群众的工作。因为当时各个村政权、乡保长一般都在他们手里,做好他们的工作,对我党我军的活动有利。对此项工作,我们做得还是很有效的。

在这一时期,县抗日救国会的同志如阎草、杨敬仁在西孟轲村做了大量群众的工作。发动贫下中农对原地主村政权进行反贪污、反恶霸斗争。通过斗争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建立了民兵,建立了由基本群众掌握的村政权,也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组织,还建立了地下交通站。所以在此需要提一下的就是冯汉芝、李存仁两同志,他二人是1941年春在西孟轲村带领群众进行对敌斗争最坚决最积极的分子,是该村也是尚和县一区几十个村庄中最早入党的共产党员。依靠他俩把西孟轲村的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了。虽然在1942年春,西孟轲村西边四华里的疙瘩庙安上了日伪据点,但该村广大群众在他二人领导下,始终站在共产党八路军一边,站在抗日民主政权一边,成为我尚和县一区西北部对敌斗争最前沿的重要阵地。他二人还是我们党设在西孟轲村地下交通站的负责人。因濮阳至清丰中间敌伪军建立了不少据点炮楼,还挖有封锁沟,把我濮、范、观根据地和沙区根据地分割开了。为了使敌人封锁线西边的联系能够畅通,在敌封锁线西边都建有我地下交通站,东侧就建在西孟轲村。他二人承担了这一任务。不管环境多么艰苦危险,都保证了地下交通线的畅通。党的机密文件、上级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指示、决定,卫河日报、冀鲁豫日报等大批文件都按时安全传送到各县的党政机关和上级领导机关,并且也护送了大批干部过封锁线。如冀鲁豫区党委组织部长张玺同志到滑县一带任四地委书记时,要通过疙瘩庙和张村两个敌据点之间的封锁线,就是在夜间经冯汉芝、李存仁等同志护送过去的。

1943年冯汉芝成为尚和县一区区委委员,1944年他和李存仁都脱产到区工作。1947年李存仁还被任命为濮阳县七区区委书记(1952年病故)。所以这两个同志在建立尚和县一区根据地的的工作中是有一定贡献的。除西孟柯村群众发动较早较好外,县抗联的同志在李家村、田拐、惠小寨、藏小寨、小岳村等村也做了一些发动群众的工作。经过我们的工作都涌现出一批抗日的积极分子,如田敬安、惠朝坤、惠容修等,也建立了农会、青会、村政权、民兵等组织。

在这一时期还做了一些锄奸工作,打击了勾结敌人的地头蛇、汉奸,使敌人失去了耳目。

在这一时期虽然斗争很艰苦,但我们仍坚持了政治理论学习。当时主要学习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修养》和党报社论等。通过学习提高了觉悟,增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信心和决心。所以尚和县能在极其艰苦环境下坚持对敌斗争,这和当时坚持抓了对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抓了政治理论学习是分不开的。

在这一时期,县区党政领导机关、干部队伍开始扩大。如北里尚的齐林阁同志出来任一区民政助理员,北田村的郭相天出来被任命为司法科长。田拐的田敬安同志出来到县公安局工作。另外,上级也调来一些干部,如武素同志调来被任命为县武委会主任,专做发动、组织和领导民兵,进行战斗,保卫群众利益。辛平同志调来被任命为县抗日政府秘书。

这一时期虽然很艰苦,但总是坚持下来了,力量也扩大了,锻炼了干部队伍,这就为以后的大发展,打开局面,奠定了基础。

(三)尚和县打开局面的阶段(1942年6月至1944年4月)

在这一阶段的前半期,即从1942年6月到1944年秋收前这一年的时间里,尚和县的对敌斗争还是极其艰苦的。这不仅敌我斗争形势仍是敌强我弱,县城和大集镇村庄仍是敌、伪、顽军据点,只是柳屯一带国民党军高树勋部已撤走,换成了日伪军据点。而原

来的据点一个也没减少,相反在敌人蚕食进攻下还在根据地边沿增加了一些据点,如尚和县四区郭龙村就是重新增加的一个据点,驻有从文留来的国民党孙良诚的一个团。濮县高堤口也成了日伪军据点。八公桥、文留一带都是孙良诚部盘据。日、伪、顽军仍疯狂对我根据地、游击区进行扫荡、袭击、分割、封锁,企图消灭我们。尚和县五区和各敌、伪、顽军据点周围村庄仍被敌人占领,所以当时根据地、游击区仍比较小,相当一部分地区是敌占区。另一方面,自1942年6月以来,这一带严重的干旱蝗灾造成大灾荒。1942年尚和县一、二、五区麦、秋粮颗粒未收,大旱面积很广。随着旱灾来的是1943年的蝗灾。蝗虫飞过时常多到能遮天盖日,一天还飞过不完,落到哪一带,一天就能把那一带的所有庄稼啃光。大旱加上蝗灾、敌灾,使广大群众只有靠糠、野菜、树叶充饥,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外出逃荒要饭,到处发生饿死人的惨状。再加上敌人经常扫荡烧杀,使灾情更加严重。有的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用一斗粮食(30斤),就卖给了60岁的地主当小老婆,有的自卖自身,谁管吃就跟谁走。有的老婆饿的就不辞而别另嫁人了。广大贫苦农民为了度荒把自己本来很少的一点土地,只要一亩地能换一斗粮食也忍痛卖掉;而地主富农就乘广大贫苦农民没饭吃的机会极力进行剥削,用很少一点杂粮就把他们的土地夺走。许多地方连树叶树皮都吃光了,有的一天只能吃上一个红枣渡日,不少人全身浮肿,有的吃了某种树叶中毒而死,真是惨不忍睹。

以上这是尚和县在这一时期的前半期的困难情况。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在1942年后半年到1943年年底,尚和县的敌强我弱,在敌、伪、顽军分割、包围、封锁进攻下,斗争是极其艰苦的。这个时期我根据地、游击区缩小了,再加上大灾荒,更增加了困难。1942年是我华北敌后军民抗战最艰苦困难时期。

就在这艰苦困难时期,尚和县对敌斗争却打开了局面。经1942—1943年的对敌斗争和发动群众,在敌伪据点林立的情况

下,却建立了坚强的根据地;三、四两区只西南一面有敌人,背后却有濮、范、观根据地支援和依托,成为更加坚强的根据地,形成了群众性的拥护共产党八路军,坚决打日本的有利局面。

尚和县对敌斗争是怎样打开局面的呢?

(1)抓了县、区、党、政、军、群(指群众团体农会、青会、妇会等)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组织和思想建设。依靠这批力量艰苦卓绝的工作而逐步打开局面的。

自1941年“四·一二”(4月12日)日本侵略军对沙区实行杀光、枪光、烧光的三光政策的大扫荡后,小冀鲁豫边区和鲁西地区合并成为大冀鲁豫边区。而边区区党委和地委就开始注意加强尚和县的县区党政领导。特别自1942年后半年正是党中央提出“精兵精政”号召的时候,一部分领导干部层层下放。如冀鲁豫边区区党委组织部长张玺同志就下放到四地委兼任地委书记,原边区区党委宣传部长张承先到鲁西南(五地委)任地委书记,而地委的部分领导干部则下放到各县任职,县委和县群众团体的领导干部也下放到各区任职。这批经过艰苦斗争锻炼的有丰富经验的干部来到尚和县,使尚和县的党、政、军、群领导力量得到充实和加强。原来三、四区还没有建立区政权,这时也都建立了。

不仅力量有了,并且我们还抓了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提高其政治觉悟。还抓了在对敌斗争中考验和锻炼干部。在这一时期我们主要抓了对党中央规定的整风文件的学习(21个文件),抓了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文件、关于根据地党的一元化领导文件、《今年打败德国,明年打败日本》、《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指1942年是华北抗日最艰苦时期,这是黎明前的黑暗)等新华社社论,党中央关于开展拥军拥政爱民运动文件的学习,抓了朱总司令“论发扬革命英雄主义”文章的学习,还抓了对党员的教育,要求党员增强党性,在对敌斗争中,在各种工作中起先锋模范作用,要吃苦在前。这些学习武装了广大干部的头脑,进一步增强了对敌斗争的胜利

信心和决心,为把抗日战争坚持到底奠定了思想基础。另外,通过学习和锻炼,这批干部一般都能做到和群众同甘共苦,走群众路线,坚持并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群众打成一片。而县区领导干部在敌人对我分割、封锁、包围、扫荡,而使我上下级之间很难联系的情况下,一般都能根据当地当时的情况独立领导作战。所以,由于我们抓了县、区、党、政、军、群的领导力量和干部队伍的组织思想建设,这是尚和县在1942年、1943年极其艰苦困难情况下能逐步打开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时被任命的领导班子情况是:

县委会:张超为县委书记,胡(赵)汉身为组织部长,张健斗为组织副部长,马伯龙为宣传部长,杨真为敌工部长(曾兼过一段宣传部长)。

县抗日政府:任子庸代县长,辛平为秘书,马兴民为公安局长,刘子仁为财粮科长,郭万久为司法科长,郭相天为文教科长,武素为武委会主任。

县基干大队:史铭林为副政委(冀中南下支队派来的),孙二虎(孙祖涵)为大队副(华北民军派来的),以后大队副是刘金彪。县基干大队开始有两个连,以后发展到三个连。各个区都有区基干队,相当一个连。

群众团体:抗联主任梁明,农会主任辛亭(后到尚和四区任区委书记),县妇联主任吴林涛,青救会主任魏光明(以后任二区区委书记),县农会主任阎草(精兵简政后任尚和一区抗联主任)。原县青救会主任杨敬仁到四区任抗联组织委员兼青年委员,以后任一区抗联主任。

各区领导力量也加强了。一区区委书记由张健斗兼任(1944年后半年由魏向远任书记)。区长韩建民(1943年秋为陈桂森),抗联主任阎草(以后为杨敬仁),妇联主任李克胜。

二区区委书记杨真(以后是魏光明任书记),区长吉建一,抗联

主任黎光、黎琳。三区区委书记张磊(以后是鲁平),区长陈桂森(以后为韩健民),抗联主任葛秀珍。

四区区委书记马伯龙(以后是辛亭),区长汪杰,抗联主任管群,区妇联干部李曙光、段克强。

五区在1942年后半年时全部是敌占区。但也任命了魏向远为区长。另外,从县党、政、群机关也临时抽调了七、八个同志组成武工队,包括杨敬仁,在魏向远领导下经常进入五区一些村庄去,有时也到紧靠敌据点的村庄进行隐蔽活动,直至1944年初才打开局面而公开活动。

(2)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关于发动群众的方针政策,把群众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完全联系在一起。群众是真正起来了。这是尚和县能打开局面的原因之一。

首先,我们抓了救灾工作,使灾区贫下中农能有饭吃。当时在一、二区(尚和县西部、北边的不少县当时都是重灾区)广大群众没有粮食吃,非常困苦。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我们就抓了救灾工作。不仅在灾区工作的一、二区的干部能和群众同甘共苦,群众吃糠我们也吃糠,并且在不受灾的三、四区和县级党政机关也都节衣缩食,抽出自己的一部分粮食定量救济群众。另外,我们也发动群众搞生产自救和以工代赈。关于以工代赈,主要是组织灾区群众运粮,把尚和县东边濮、范、观根据地的粮食运到尚和县西边沙区根据地、游击区去,因为那里是重灾区,广大抗日军民没有粮食吃。当时规定能运一百斤粮食过去,给群众十几斤粮食的报酬,阐明运粮本身就是支援抗日,所以一号召群众就动起来了。当时组织运粮困难是很多的,因为要通过几道敌、伪军据点及其封锁线,还要对付敌人的扫荡、袭击、抢粮。所以不仅要组织群众运粮,还要组织武装保卫运粮。特别在过敌人封锁线和敌人据点附近时,更要注意武装保卫,准备随时投入战斗。这次大规模运粮任务(几百辆大车、独轮车)胜利完成了(究竟运了多少,已记不清了),不仅解决了沙区根

据地抗日军民的吃粮问题,而且也使尚和县一、二区灾民得到了一部分粮食。另外,为了抗旱,我们还发动群众挖土井,解决抗旱的水源问题。挖成一个,给粮食一半,也使群众得到了部分粮食。所以从救灾工作中使广大群众看到共产党八路军不仅坚决打日本,并且也确实是为广大群众谋利益的,从而使他们坚定了拥护共产党、八路军抗战到底的信心。

另外,在救灾的同时,我们还抓了开展民主民生斗争的群众运动。民主民生斗争的内容,主要是发动贫下中农对旧的地主村政权进行反贪污反恶霸斗争。因旧的村政权都是由各村地主富农掌握的,有的村是地富分子本人当村长、保甲长,有的村是利用狗腿子当村长、保长。有的地主村长对广大贫下中农剥削压迫很厉害,就象电影《白毛女》中的黄世仁那样,群众非常痛恨,但又怕他们。所以只要广大贫下中农被发动起来,而且组织起来,他们就敢于斗争。把地主村长打倒了,村政权这个刀把子就掌握在基本群众手里了。这个斗争本身就是让贫下中农当家做主。经过反贪污反恶霸后,因为证据确凿,就让地富村长把贪污剥削群众的粮食财物等交出来,由农会分给群众。斗争胜利了,贫下中农组织起来了,建立了农教会、青教会、妇教会和抗日村政权。这时我们就提出要保卫胜利果实,应解散地主武装(当时有的地富村长有乡丁、有枪支),让其把枪交出来,建立我们自己的武装——民兵,进一步引导群众积极抗日打鬼子。让群众认识到只有把日本侵略军打倒了,我们才能真正保卫住我们的胜利果实。关于民主民生斗争还包括其它内容。如减租减息、雇工增资、实行累进税等。还有1943年秋后发动的回地运动。把1942年大灾荒中地主乘广大贫下中农没饭吃之际,进行残酷剥削,把贫下中农的土地夺去,使广大贫农失去了土地,经过回地运动,从地主、富农手中把土地回出来,名叫土地还家。这就更进一步地解决了广大贫下中农的切身利益问题,因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一斗争的开展,广大贫下中农更进一步热爱共产

党、八路军,把共产党、八路军看成是他们的大救星,自觉地积极参加抗战。

关于民主民生斗争,我们都是按照党中央和冀鲁豫边区区委规定的方针政策进行的。因当时是抗日统一战线环境,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侵略军。应团结一切愿意抗战的中国人(包括开明士绅在内)一起打日本。当时规定的减租减息,增资增佃都是按党中央规定的二五减租二五增佃进行的。如按原来的租佃契约的规定,应交给地主租子1石粮食(当时1石为10斗,1斗约30斤),要二五减租就只交7斗5升,这样群众就可少交2斗5升,已交的就按二五减租从地主手里减回来。二五增佃是有的佃农租种地主土地原规定二八分,或三七分(地主得八或七),那就从地主所得的八或七中减二五下来还给佃农。关于累进税、合理负担,就是对农业税(交救国公粮)实行累进税。不是按每亩土地平均交多少,而是按各户占有土地多少来定。土地很少的不拿,土地平均2亩的、按1亩交1亩的拿,土地每人平均5亩以上的交粮更多。目的是为了减轻贫农的负担。回地政策是:譬如灾荒时地主、富农用1斗粮食买走贫下中农的1亩土地,回地时贫农仍用1斗粮食的原价把土地回出来。如长着的庄稼是买主种上的,收获的粮食由买卖主双方平分。如果是中农群众乘机用少量的粮食买走了贫农的土地,如何回地,可以由双方协商解决。

在开展民主民生斗争中,发动群众主要以党、群组织为主,县区政权配合。先从村庄比较大和地主势力也比较大,而且对周围村庄有影响的典型搞起,以取得典型经验后逐步全面展开。当时还在和日本、国民党顽固军打仗,还有敌伪、汉奸、坏人造谣破坏,群众还有不少顾虑。所以先搞典型示范较为稳妥。如尚和县一区当时就抓了胡夹寨这个大村的地主李友三为突破口,经过调查研究,发动群众诉苦。发现和组织积极分子,很快就把群众发动起来,再经过查帐小组查帐,查清了贪污的数字和证据,限期要他把贪污的粮

食、财物交回来，并立即分给了群众。这是贫下中农第一次翻身。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民兵、儿童团，以及由贫下中农当村长的村政权很快建立了，还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区委、区抗联还对其中最积极的又有一点文化的积极分子也提拔到区抗联、区政府工作，扩大了区级干部队伍。如李景学（原任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好修（曾任贵州省兴义地区轻工业局局长）、滑振民（曾任濮阳县县长）等就是由积极分子提拔到区里工作的，同时也提拔了其他村涌现的部分积极分子。如赵村的张质彬、张恩民等就提拔到区里工作。经过胡夹寨发动群众反贪污、反恶霸，推翻了地主村长李友三之后，对周围村庄影响很大。所以区委、区抗联就乘机分头到各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很快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在反贪污反恶霸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动群众搞了回地运动，群众的积极性更高了。一区这样，二、三、四区也是这样做的。同时，各村都建有民兵、自卫队、儿童团，坚持站岗放哨，查汉奸，打日本，对敌人形成了天罗地网，广大群众喜气洋洋。当时到处都是抗日打鬼子的歌声，拥护共产党八路军的口号声，每逢节日，村村敲锣打鼓，欢庆民主民生斗争的胜利。

经过民主民生斗争，广大群众被发动和组织起来，他们积极拥护共产党、八路军，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我们又进一步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提高其民族觉悟。所以当时各级党组织或县区政权有什么号召，广大村干部和群众都是积极响应的。如积极参加拥军优属活动，积极交纳爱国公粮等。如胡夹寨这个几百户的大村，一天就把应交的公粮数全交上了，不仅交的快，还是交的好粮，群众都认识到这是为了支援抗日。另外，不少青年积极参军，而各区的地方武装——区基干队，在1942年至1943年之间，就几次升级到县基干大队，大队又几次升正规军。同时不少村庄的民兵还积极主动到敌据点和交通线袭击敌人，使敌人不敢轻易出来。如胡夹寨离清河头敌伪据点只有六华里，从1944年初开始，敌人就没敢到过。

(3)我们抓了对敌斗争。当时尚和县除了三、四区东部有濮、范、观根据地可以依托进行对敌斗争外,而五区则完全是敌占区。敌强我弱仍是当时的主要形势。当时党中央、区党委号召不仅要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使各个村庄都成为对敌斗争的战斗堡垒。并且还指示要建立地方武装,建立民兵,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组织武工队和小部队活动(军队以连或排、班为单位活动),要向敌后的敌后进军,要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要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向敌人展开攻势。对此,尚和县的县区党、政、军、民都坚决执行了。由于尚和县抓了武装斗争,抓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并取得了胜利,这是尚和县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情况下能够逐步打开局面的重点原因之一。

第一、首先县、区党委都抓了县、区地方基干队武装的建立和扩大。当时县基干大队有两个连,以后扩大到三个连,区基干队相当一个连,都配备有专职的军、政干部。县委书记兼县基干大队政委,区委书记兼区基干队指导员。县长兼县基干大队队长,区长兼区基干队队长。武器,开始只有步枪(其中有钢枪,有土造枪),以后通过几次战斗缴获,机枪也有了。当时是依靠这批基干武装为骨干向敌人展开斗争的。一方面进行反扫荡,另一方面寻找机会主动袭击敌人。关于扩大基干武装主要是动员群众参军来扩大。另一方面也争取了少数土匪武装反正。如岳村集的秃子李七,就是这样的人物,我们争取他参加了二区基干队。还有二区基干队队副朱元良也是这样人物。因当时老实农民不敢出来,而他们愿打日本就留下来,以后几次战斗证明他们打日本还是坚决的。对惯匪翟马在1941年时也争取过,当时的冀鲁豫军区也派专人做过他们的工作,但因这个人土匪成性,反复无常,也吃不了八路军的苦,过来一段又叛变跑了。

当时的县区基干队武装在同敌人作战中是打过不少胜仗的。如在1942年冬某夜,县基干队钻进敌占区五区腹地的一个村,进

村就封锁了,上午敌人出来了,他们不知道该村驻八路军。当敌人走到离村很近时,埋伏在村边的县基干队就给敌人以突然袭击,打得敌人抱头鼠窜。过去敌人在该区是随便活动的,他认为他的占领区,一个人也敢到各村欺压群众。自这次打击后,他们再也不敢大胆活动了。又如在1943年初,县委机关住在一区田村,周围敌人来合围抢粮,县委机关和县基干队首先跳出了敌人包围圈,钻到敌人据点附近荫蔽起来。到上午约11点钟把敌情了解清楚后,县基干队就在副政委史铭林同志指挥下返回来分两路袭击敌人,冲进村里后敌人乱成一团,狼狈逃窜了。这次战斗缴了敌人十几支枪,把敌人抢老百姓的粮食等全部夺回来还给群众,保卫了群众利益。从此敌人再不敢轻易出来扫荡了。再如在1943年5月,我八路军的正规军和我县基干大队、区队积极配合,把尚和县四区孙良诚驻有一个团的据点(郭龙村)拔了,全歼敌人一个团。另外,我县基干大队、区队在1942年至1944年曾多次袭击刘格集、疙瘩庙、清河头、柳屯、焦寨、管仁店、这河寨、永固集敌人据点。

第二、组织广大民兵参加战斗。经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到1943年下半年村村都建有民兵、自卫队(18岁至45岁男青壮年参加)、儿童团,县区有专职干部领导民兵。当时是村村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可以说已建成和布满了对敌人的天罗地网。只二区民兵就有钢枪一千余支,还有几挺机枪。当时民兵很活跃,如二区民兵,每天在敌据点附近监视敌人,出来就打,打得敌人从柳屯据点到焦寨据点和这河寨据点仅六华里就不敢通过。民兵有时也配合县区基干武装和八路军正规军活动。如在1943年秋某天,清丰县日、伪军出来到尚和县一区藏小寨进行骚扰活动,当时小寨民兵就配合回民支队一个连给敌人以痛击,敌人狼狈逃窜。又如在1943年某夜拔除柳屯附近的管仁店敌炮楼,就是二区基干队和高庄、马头民兵化装成正规军七团去打的。当时因敌人被我们打怕了,已成惊弓之鸟。他们将敌据点包围以后打了一索机枪就喊话:“我们是八路军

正规军,今夜要拔你们的据点,缴枪不杀”。就这样敌人把吊桥放下来把枪全部送出来,20多个伪军就乘乘地一个一个下来投降了(其中也有我们事先对敌军工作的作用),然后就放火烧了炮楼,大火烧红了半边天,柳屯据点的敌人千瞪眼、乱打枪,眼看着火光不敢出来。这个据点一拔,对广大群众鼓舞很大,对周围敌人是个很大震动。另外,我们每年还组织民兵保卫麦收、秋收,打击抢粮的敌人。为了保卫群众的利益,各区都以民兵为骨干,各村自卫队参加,十几个村为单位组织群众性联防,不仅站岗放哨监视敌人,且每夜巡逻,并定有暗号,一村有事,发现敌情,村村民兵立即出动,这样搞得敌人不敢出据点一步。

关于组织民兵联防,不只各区自己组织,区与区之间、县与县之间也组织有联防。如1942年冬在尚和县四区武乡屯村就召开了濮县、尚和两县对敌斗争联防会议。濮县出席并主持会议的是濮县当时任抗日县长的韩哲一。尚和县出席会议的是武素、杨敬仁,会上决定“濮县民兵支援尚和县民兵”,“只要发现敌情,两县民兵联合作战。”

第三、抓了建立武工队和小部队活动,抓了向敌占区、向敌后的敌后进军的工作。当时整个华北都是日本侵略军的后方。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本来就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但经过开展游击战争,在一个地区根据力量对比,事实上就形成了我根据地、游击区和敌占区三种不同的地区。当时(1942年)在尚和县因敌强我弱,我根据地还是很小的,而敌占区和游击区还是占了大块面积。但经过1942年至1943年的发动群众,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了,敢打敢斗了,不仅原来的根据地巩固了,而且大片游击区也变成我们的根据地。在这一情况下,根据上级党的指示:“要向敌占区进攻”(包括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要向敌后的敌后进攻”。所以各区都组织了武工队。基干队武装也组织了以连为单位的小部队,有时以排为单位到敌区活动。而武工队一般都是由干部组成,七、八人或十几人

为一组,带枪到敌人据点和交通线的村庄去活动,向敌后进军。在一、二区深入到敌据点附近活动,不仅打击敌人,而且用更多的精力作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工作,揭露敌人的阴谋,宣传要打日本,要爱国,不当亡国奴。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宣传抗日必胜,日寇必败,使之树立抗日胜利的信心,在此基础上组织群众,这样的攻势是有效的。象二区已把工作做到敌人据点所在村庄(因敌人据点炮楼修在村边,炮楼周围修有很高很宽的围墙,围墙外边还挖有很深很宽的沟,里边还放了水,夜晚敌人全进了据点炮楼)。所以一、二区在1943年后半年到1944年初,实际上已做到了“有敌人据点无敌区,只有敌人据点之内是敌区的要求”,因敌区的广大群众是属于我们的。

向敌后的敌后进军主要是向柳屯、清河头以南的尚和县五区进军。有时化整为零,用武工队、小部队形式往敌区内穿插,有时是集零为整进去,寻机集中打击敌人。进去后开始是隐蔽的,这就是敌人进了村,也不知道我们住在哪几家,如敌人进到这几家,我们就突然给以歼灭性打击。一般是我们进村后先找村长(村长都是伪村长,被地主掌握,为敌人服务),说明来意,提出要求,要求村长对于我们住在哪家不能告诉敌人,如敌人来围剿我们,我们就决心在你村打仗,后果由你负责。这样讲了,虽然村长都是伪村长并和敌伪据点都有联系,但又因为是中国人,又怕在他村打仗,还怕八路军以后追查责任,也怕日本鬼子不饶他,他是两边怕,所以我们就利用他两边怕的心理进行活动。白天荫蔽,晚上就公开召开群众大会做宣传工作,今天在这村,明天在另一个村,待做到一些村庄有群众基础了,有依靠对象了,情况摸清楚了,把敌伪村长争取为两面村长了,并首先能为我抗日服务了,就白天也开始公开活动。另外,为了在敌占区能占住脚,除做好争取群众的工作外,还要做到坚决有力地打击敌人。只有打得敌人怕了,小股敌人不敢出来了,才能站住脚跟。当时武工队(以五区区长魏向远为首)、小部队活动

主要是打击出来欺压群众的小股敌人,打了几个小的胜仗,打掉了敌人的气焰。县基干队在五区也打过较大的仗。另外,为了能站住脚跟就要坚决镇压勾结敌人的地头蛇、汉奸。这些人不仅勾结敌人,而且都掌握一部分武装,在当地欺压群众。群众对他们又恨又怕。我们就集中抓了几个。如尚和五区十八郎村的杨存起是汉奸,领着给敌人修工事,欺压群众,反对共产党、八路军。我二区基干队和民兵了解他住处后,就给以突然袭击,抓出来当场枪毙了,对敌人震动很大,另外,尚和二区武装还抓到了尚和五区耙河村的耙朝君,是汉奸兼土匪,当场缴获了他的匣枪,又逼他交出了 20 多支枪,然后带到根据地,召集群众在公审大会上枪毙了。这对敌人震动很大,对广大群众真是大快人心。由于我们坚决打击了外出欺压群众的小股敌人,坚决镇压了地头蛇、汉奸,再加上宣传和组织群众,所以就使五区由原来的敌占区而逐步变成了我经常活动的游击区。

第四、抓了敌军工作,分化瓦解敌人。当时不仅八路军正规军有专做敌军工作的,而且县区也有专职干部利用各种关系做敌军工作的。尚和县的敌军工作是有成绩的。如 1943 年 5 月,我八路军正规军和尚和县基干队配合拔了尚和县四区郭龙村孙良诚一个团据守的据点,都是事先就得到情报,知道敌人明晨要换防(郭龙敌人全部到文留,文留敌人到郭龙),走的路线也知道了。所以我们大军都埋伏在郭龙(敌人出来的必经之路),结果枪一打响,半小时内就全歼了敌人,解放了郭龙村。其他据点也同样。敌人明天怎么活动,到哪个村去抢粮,有多少人枪,走哪条路,或敌人什么时候扫荡,事前情报就送出来了。如是小股敌人我们就埋伏突然给以打击。如是合围我们,我们就事先跳出包围圈,相机打击敌人。跳出包围圈一般都是跳到敌占区去,跳到敌据点附近去,在那里荫蔽,因为大批敌人到根据地来扫荡,而敌人占领区是空虚的。另外,我们做敌军工作,不仅要获得敌人情报,更重要的是还要分化瓦解敌

人,要使伪军做到身在曹营心在汉,自己是中国人,就应为抗日出力,不应该当汉奸。使他认清抗日必胜,不要死心塌地地当汉奸。如1943年初尚和二区基干队和民兵埋伏到敌据点附近,抓到一个从濮阳县坐马车到柳屯据点去的汉奸维持会长马连杰,吓得他跪下求饶。因他曾当过高小教员,所以我们做他的工作时,提出不许欺压老百姓,要把敌人怎样活动的情况及时送出来,否则以后抓住不客气。他都答应了,我们就把他放了。有的据点我们不仅做了敌军下层士兵的工作,并且还做了他们营、连长的工作。这就为1944年后半年解放尚和县全境,解放濮阳全县和其他县附近的据点创造了条件。

(4)我们还抓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首先我们的抗日县、区政府就注意安排非党人士。如当时的教育科长、司法科长都不是共产党员。当时的政权是在党领导下实行的“三三制”政权。目的是团结各阶层人士抗日。另外,当时统战目标主要是开明士绅、社会名流。一般都是本地上层人物。特别在群众未发动起来前各村村政权基本上都在他们手里,有些工作,如征收公粮等,还应通过他们去做。所以做好他们的工作很重要。而尚和县代县长任子庸二区区长吉健一都是本地人,又都是七七事变前教育界人士,我们就充分发挥他二人的作用,并充分发挥县区政府的作用,经常召开士绅名流和各界人士会议做他们的工作,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敌人的阴谋,号召他们支援抗日。就是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民生运动时,我们也做了他们的工作,给他们讲了要打日本就应发动群众,就应实行民主,但群众饿着肚子是不能打日本的,所以打日本就应执行二五减租二五增佃,就应当执行回地政策。号召他们要执行党的政策,这样减轻阻力。从当时看,我们的统战工作还是有成绩的。

(5)尚和县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能逐步打开局面,这和边区党委、地委的正确领导有关,和八路军正规军不断来尚和县活动打击

敌人有关,和有濮、范、观大块根据地的依托和支援有关,和整个解放区的胜利斗争形势有关。在1940年至1944年这几年,八路军正规军到尚和县活动打过仗的就有冀中南下支队,冀鲁豫军区四团、骑兵团、华北抗日军民(朱程司令员亲自率领)、回民支队(1942年冬马本斋亲率两个连到尚和县四区接敌区活动)等。所以说尚和县的对敌斗争不是孤立的。

(四)配合正规军作战,扩大解放区、全县解放阶段(1944年5月至1944年12月)

1944年初,在党中央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号召下,县、区党、政、军、民都展开了向敌区进军,和敌人战斗。广大群众也积极参战,破坏敌公路,割敌电线,填封锁沟,运送军粮,做拥军鞋、抬担架、慰问八路军等实际行动支援前线。1944年春,靠近尚和县一区北部的清丰县柳格集的日伪军据点被八路军正规军解放,尚和县基干队武装也参加了战斗。1944年5月,清丰县城被我八路军正规军(地方武装也参加了)解放,全歼敌人5000多,活捉了敌大名道道尹。清丰县全县解放对尚和县军民是很大的鼓舞和支援。因尚和县北边全部成为解放区。这时尚和县就乘机扩大战果。

1944年秋,在尚和县县区基干武装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下(包括在敌军内部工作)疙瘩庙的伪军任军功率一个连携械投降,拔除了这一据点。1944年9月一区基干队夜间突然包围了刘五星敌人据点(事先做了敌军工作),我们先喊话,敌人怀疑我们是土八路,说我们没有机枪。我们说我们是八路军正规军,就打了一梭子机枪,敌人相信了就全部带枪投降了,又拔除了这一据点。

1943年11月16日,我八路军大兵团作战,一举全部消灭了国民党顽固军孙良诚驻在濮阳县八公桥的总部。这个影响很大,濮阳城内的日、伪军和各据点敌人,以及孙良诚部盘踞的各据点都吓坏了,1944年10月,在我军进攻下濮阳全县解放。而尚和县是原濮阳县东北部的一部分,濮阳全县解放了,尚和县也就全部解放

了。

1944年10月,中共尚和县委在尚和县二区岳村集召开了全县党、政、军、群干部大会,由县委书记张超作了总结。自此,宣布尚和县建制撤消。各区分别划给濮阳县(尚和县一区改为濮阳县七区)、昆吾县(尚和县四、五区)、濮县(尚和县二、三区)领导。而尚和县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到此结束。从此,原尚和县各个区干部、群众就在各自新的县委领导下投入了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打败日寇、解放全中国这个新的更大的战斗而奋斗。

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底至1949年)又恢复了一段尚和县,但这一段因尚和县处在全部是解放区的环境,主要做了支援解放战争的工作。

尚和县抗日战争中对敌斗争的几条主要经验:

尚和县是在1941年1月建立的,是在敌人疯狂扫荡、分割、包围、封锁的极其艰苦的形势下,为便于对敌斗争而建立的。以后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经过深入的工作,经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经过武装斗争打开了局面,到1944年底取得胜利而结束,共四年时间。这四年应该说尚和县党政军民是完成了党交给的战斗任务的,党组织是起了领导作用的,全体党员是起了先锋模范作用。当然有成功、有失败、有经验教训。但总的说是成功的、胜利的。

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经验就是应建设一支坚强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对党无限忠诚、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对党的事业充满胜利信心和决心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只有有了这样一支队伍,依靠他们的艰苦工作才能打开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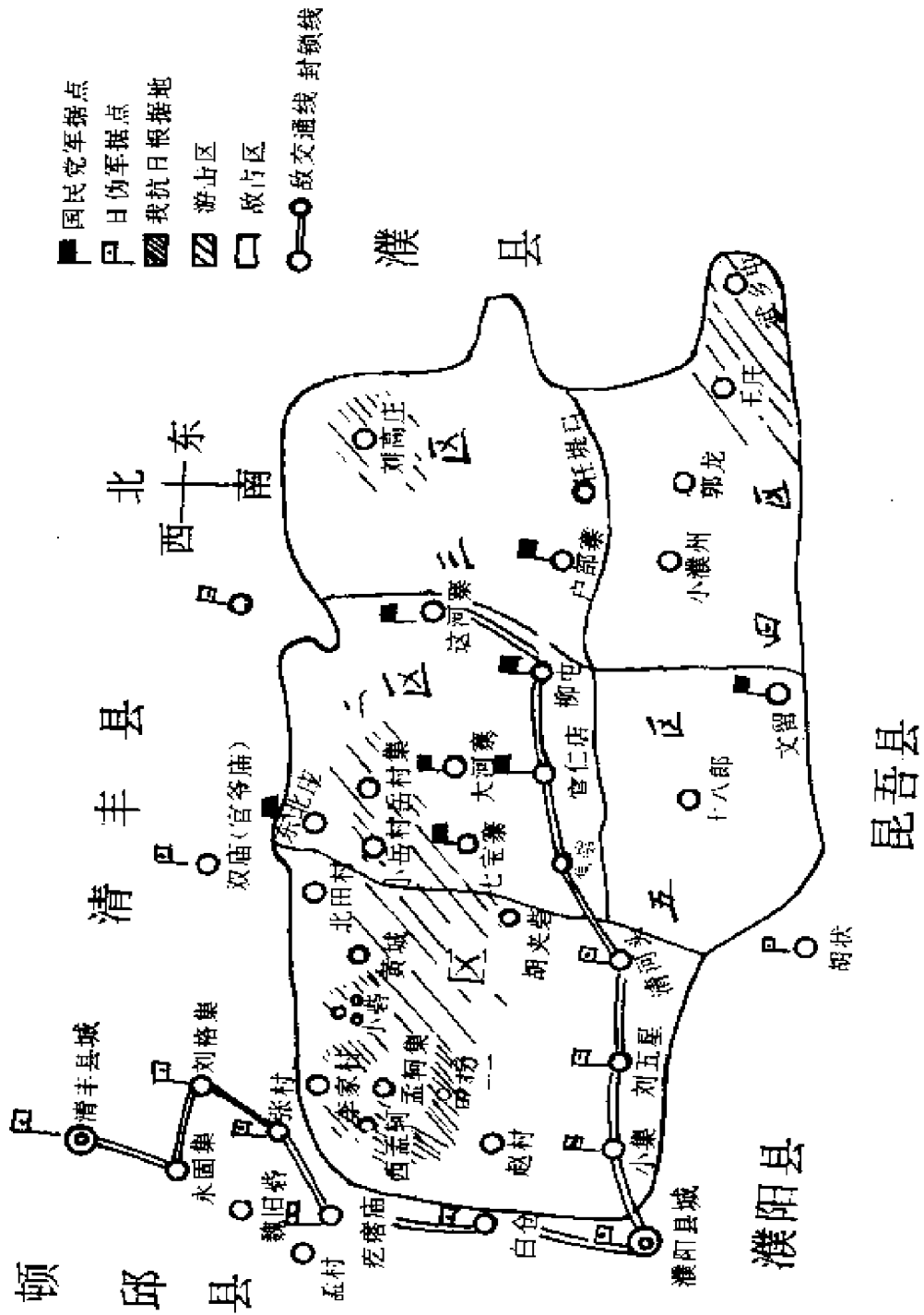
再一个经验就是一定要发动和组织群众“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只有群众发动起来了,虽然在敌强我弱、敌人对我分割、封锁、包围、扫荡的情况下,我们仍能站住脚,所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宣传和组织群众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时候也不能脱离群众。

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一定要抓武装斗争,抓人民战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尚和县这四年斗争历史(加上尚和县的前身——濮北办事处时期共五年的游击战争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尚和县抓了武装斗争,抓了地方武装和民兵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抓了军民团结,做到了军民团结如一人,并且敢于向敌、伪、顽军展开进攻而胜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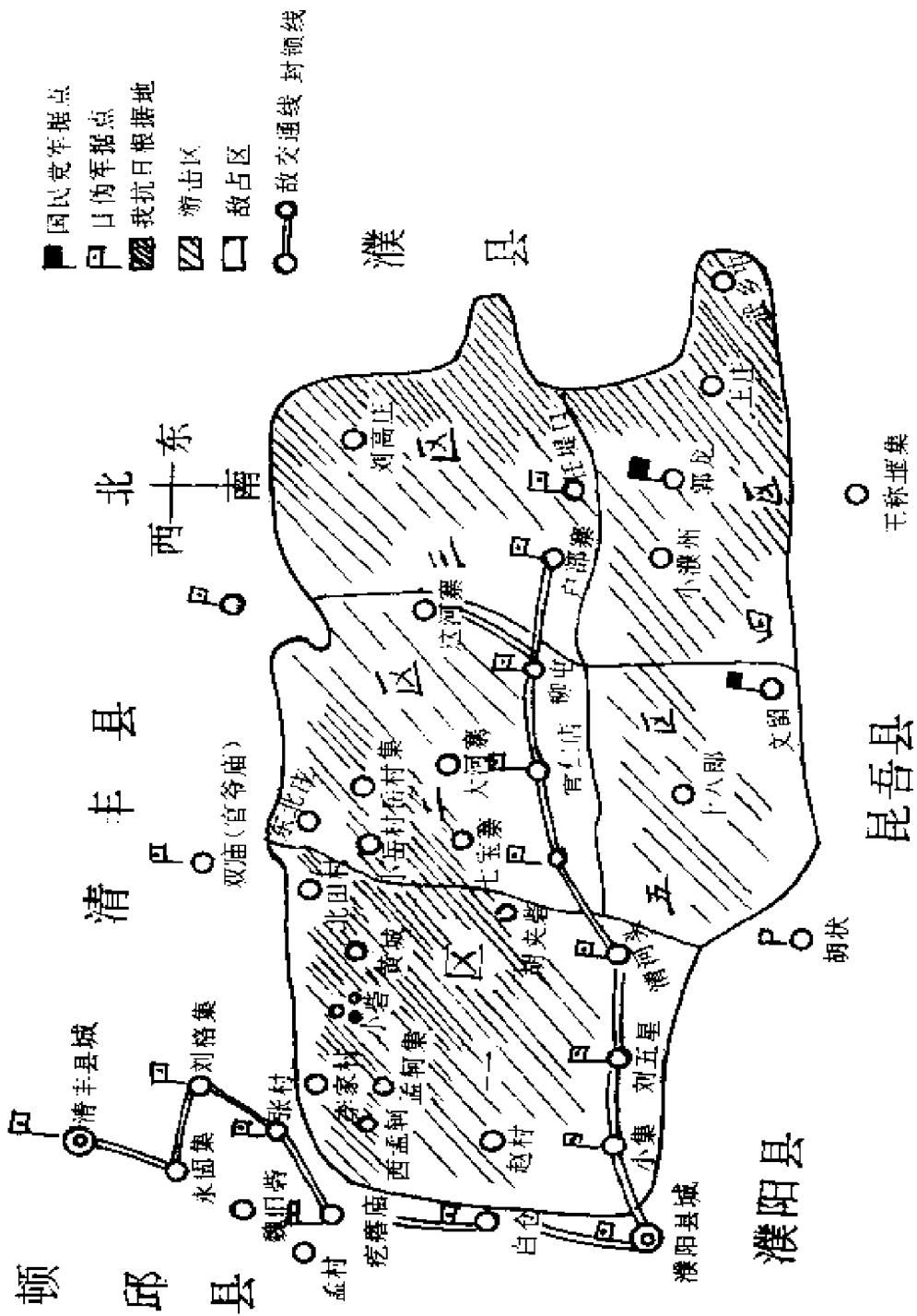
另外一个经验就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一定要坚决按照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才能取得胜利。尚和县当时是执行了党中央在抗日时期规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因而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了,把一切愿意抗日的人团结起来了,调动了各方面抗日的积极性。总之,相信党相信群众,依靠党依靠群众,坚决按照党中央规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这是尚和县四年艰苦斗争取得胜利的最主要的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结论。

附:对敌斗争形势图两个

尚和县 1942年5月前对日顽军斗争形势图(一)



尚和县 1942年6月至1944年5月对日伪顽军斗争形势图(二)



濮、范政民工作队纪实

张雨辰

1942年春,盘踞在濮县一带的顽军高树勋部南逃之后,我冀鲁豫边区的濮县、范县、观城,成为我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完整地三个区,由于长期遭受敌、顽的统治、破坏,这里的工作急待恢复开展。根据刘少奇同志路过边区时作的指示,冀鲁豫区党委决定,将区党委轮训队(党校)、救国总会民干校、行署政干校在校学习的干部,以及军区陆军中学的部分学员,共数百人(后来筑师师范部分学员也参加进来),组成濮、范政民工作大队,到濮县、范县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民生斗争,以巩固边区抗日根据地。我当时在区党委轮训队学习。在赴濮、范之前,边区领导同志分别向学员作报告,以武装学员的思想。其中,张霖之同志作了《土地政策》的报告;高元贵同志作了《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信锡华同志作了《支部工作与支部领导问题》的报告;万晓塘同志作了《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崔田民同志作了《武装政策》的报告。临行前,专署成润同志还作了《关于屯粮问题》的报告,高元贵同志作了《关于减租减息问题和合理负担》的报告,等等。工作队到县里以后,县领导同志介绍了县里的情况。这样,大家下到村里就知道怎样深入群众开展工作,掌握政策了。

工作队于1942年9月下旬到达濮县。同志们来自各地,大都互不认识,但是,大家住在一块都很高兴。开始,我被派到濮县三区。我们的工作组9月26日住到牛桥,第二天一早就碰上了日寇大扫荡,即有名的“九·二七”大扫荡。敌骑兵进村了,我才和肖村同志向南突围。越过桑村,这时濮县县政府、县大队在李桥与敌人

遭遇。在激烈地枪炮声中，我们顺黄河大堤向西南疾走，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中午跑到二区的一个小村子住下。两天后，我们从二区回来，仍住在牛桥村。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动员群众组织农会。作了几天的工作，收获很小。我又到苗王庄，从村长苗自然家做起，想先通过个别联系群众，建立关系，站稳脚跟，然后逐步深入开展工作。刚刚收到一些成效，又要我到菱花店村去掀斗争。过了几天，工作队在牛桥召开会议，又布置新的任务，要搞“简易”合理负担，即贯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抗战的方针，实行累进税，土地多的多负担，土地少的少负担或不负担，以减轻贫、雇、佃农的负担。搞了一段，我又去白衣阁东北一个叫柳行头的村子去。开始合理负担搞突击，急于求成，没有搞好。主要是地主、富农隐瞒土地，实行假当、假卖等手段分散土地，逃避负担。起初，由于我们没有深入发动群众，所以被其欺骗蒙蔽。搞了一阵子合理负担，接着又搞秋季突击征粮，3个村8天时间只完成了1/2。我们虽然终日奔跑，忙忙碌碌，但收效甚微。

为总结工作，工作队在胡屯召开会议，分析总结前一段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学习有关政策，同时还布置了减租增佃工作。这次会议以后，首先动员了一次突击破路备战工作，接着即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增佃工作。所谓减租、增佃，就是执行“二五减租”和“二五增佃”。那时候，地主剥削佃农的形式很多，但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大种地，即地主只出土地交佃农耕种，收获对半分。对这种形式实行“二五减租”，就是佃农在交地主地租的那一半粮食中，再减少百分之二十五。二是小种地，即土地、种子、肥料、农具由地主出，佃农只负责耕种收获，收下的粮食有三、七分的，有二、八分的（佃农得三或二份，地主得七或八份）。对这种形式则实行“二五增佃”，就是在佃农分得的一份粮食总数上，再增加百分之二十五。除此两种以外，有一种固定地租的形式，这是最落后的一种剥削形式，即地主只出土地，佃农租种，不管收获多少，收或不收，年终每

亩必须交地主几斗地租。对这种形式也实行“二五减租”。再有一种形式叫“青苗锄”，属小种地的一种形式，即地主先将土地下种后，待青苗长出来农忙锄地时，交佃农锄草管理，直到收割，所收粮食按一、九分，地主得九，佃农得一。对此亦实行“二五增佃”。总之，实行减租、增佃的目的，是为了适当减轻地主对佃农的剥削，以调动广大农民参加抗日的积极性。

工作开始时，我们还是用简单的方式搞突击，在焦庄三天就完成了减租、增佃任务，大家很高兴。之后我们又到陈楼，这个村子较大，本想三天完成，结果十余天还没有搞完，这才认识到减租增佃斗争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继陈庄以后，我又先后在全庄、赵庄、柳行头等十几个村庄领导群众进行了减租增佃斗争。后来回顾这一斗争，我们虽然做出了些成绩，但深感个人工作不够深入，在工作时往往急于求成，急躁病益行于表。

经过一段时间，初步实行了减租增佃，农会组织也在斗争中建立起来了。入冬，即开展反贪污、查黑地和办冬学等工作。这些工作较减租、增佃更须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例如查黑地，当时的地主、富农普遍地隐瞒土地，逃避负担。如果单看合理负担册子不行，单靠开会号召也不行，由于群众觉悟还不高，有顾虑，不敢公开出来斗争。所以必须深入群众做调查才行。为了接触群众，我们每天吃派饭，由村长把我们工作队员分到各户轮流吃饭，每户一天。轮到地主、富农家吃饭时，则与雇工一起在牛棚里吃，一边吃饭，一边作调查，了解这户地主有几块地，每块几亩几分。一天了解一户，回来对照合理负担册子，用这种方法一般就可以发现地主瞒了多少黑地。至于反村政权贪污，就更困难了。当时的村政权，有的直接掌握在地主、富农的手里，有的是地主、富农当台，找他们的代理人当村长。在叛军统治时期，大都有欺压群众和贪污行为。叛军走后，我们工作虽然开展，但进步力量优势尚未建立起来，有的村庄虽然把群众组织起来了，但还不巩固，所以，如果不把群众充分发动起

来,不公开地出来斗争,反贪污则是空话。

这一年冬天,我们工作队虽然遇到不少困难,但各项工作都有了很大的开展,农会、妇女会、儿童团、自卫队等群众组织都建立起来了,群众的觉悟也在斗争中越来越高,农村党的组织也有了很大发展,党的威信有很大提高,进步力量的优势,初步树立起来了。

工作队原定2个月完成任务,由于形势的发展,实际经过5个月才基本结束。1943年2月2日,正是阴历年春节,濮县县委在三区杨集召开全县第一次活动分子大会,总结工作队在濮县5个月的工作。县抗联主任刘缔、县委书记鲁明、区党委信锡华等同志先后到会作了重要报告。会议以后,工作队解散,队员各自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我被留下,调濮县县委组织部工作。

(1985年5月于北京)

睢杞太地区武装斗争十年(节选)

王广文

一、睢杞太抗日武装的初创时期

1937年冬,省委派张辑武同志任睢县县委书记,来睢县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先后在城内和王楼、苗楼、长岗等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支部,长岗支部有白辛夫(当时名白广业)、王广文、李青山等,支部书记为白辛夫。后来白去学习,我曾代理过支书。

党组织建立后,进行了一些公开的抗日宣传活动。建立了抗敌剧团,并曾到各个大集镇去演出,宣传抗日,同时秘密联络群众,发展党员,准备成立抗日武装。年底,在党的领导下,在县城里城隍庙内办了一个抗日训练班。共办了两期,训练对象主要是小学教员和青年学生,共训练了300余人,杞县县委书记王静敏同志讲政治课,谭子正同志讲军事课。

1938年5月,从商丘方向传来的大炮声,越来越近。从前线逃下来的散兵,成营成团的大股败兵,纷纷向西南方向跑。国民党睢县县政府也准备逃跑。趁此机会,我们在县委领导下,开始联络人,收缴或收集各种武器弹药,准备时机成熟时,拉起一支队伍进行抗日。

6月1日,日寇占领了睢县县城。在日寇进城的头两天,张辑武书记就从城内撤到城外,到城西附近的王楼。在王楼小学向带出的教育界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讲了话,要大家注意日寇突然袭击。

接着,他带领着这 100 多人向西转移到季芳李村,看到从睢县向杞县开进的日军用探照灯四处照射。由于没有经验,怕日军来袭,就把这 100 多人化整为零分散了。仅剩下 10 余人跟着张辑武到了英王村。

睢县沦陷后,有些地主纷纷投靠日军,成立了各乡的维持会。城里有罗殿卿,长岗集一带有张心楨、李继美、轩友礼,河堤岭一带有夏西陵、董蔚亭等。

张辑武同志到了英王庄,我向他建议:把这十几个人带到我家杨楼去,再凑一部分人好成立队伍。因那里离城较远,是个三不管的地方。商量好后,他先去我家。我回到长岗联保处。第二天,又带了几个回到杨楼。我们在杨楼大庙里住下,我当时召开了保长会议,我对保长们说:“日本已占领了县城,马上就会到各大集镇进行扫荡,成立维持会。西边各股土匪拉起来了,在到处抢枪抓人,我们各保的枪不集中起来是保不住的,我们只有把部队拉起来才能保住家。你们各保愿意参加就连人带枪一块来。如不愿参加,就先把枪借给我们抗日,将来只要不丢还还给人家。”第二天,各保便把枪送来了。很多是连人带枪一块来的。集合了一下有七、八十人。当即建立了支部。书记是张辑武,支部成员有王广文、李青山、田孝忠、任晓天。以后薛心贞和刘朝宾二人带来一个排。上级又派来了王海山同志(老红军)、张辑武又去杞县赵村和特委书记吴芝圃接上头。吴芝圃和张辑武一块来我到我家看了看,当天吴又返回赵村,第三天一早,吴芝圃带着以杞县大同中学师生为骨干的一支武装,并改编了一个多排的国民党散兵(这批散兵有四五十人,由两个排长带着),一共 100 多人来到我村和张奶奶庙。还有大同中学孟海若带付集看家队 20 余人,也到了我家。当时两个国民党散兵的排长看不起我们新成立的这支武装,想把部队重新拉走。吴芝圃就和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缴他们的械。于是吴芝圃假意请他们两位排长开会商量事情,我们就突然动手缴了他们的械,有两个想反

抗的被当场打死,把两个排长也枪毙了,其它的人全部遣散。这一次,共收缴两挺轻机枪,36支大鼻子钢枪。就在当晚,我们两部分武装合在一起离开了杨楼,开始了抗日战争的游击生活。我们首先转移到了大郑庄。在这里,由于分枪问题,我们中队曾和孟海若闹了一场风波。原来在下国民党那两个散兵排的枪时,孟海若带的看家队出了力。以后,他们要求分一部分枪带回付集,张辑武不同意。争执不下。经吴芝圃同志做工作,给了他们几支枪,风波才算平息。孟海若又把看家队带回付集。

1938年6月10日左右,部队在赵村进行了整编,成立一个大队。大队长由王海山担任,吴芝圃任党代表,杞县大同中学来的编为一中队,谭子正任中队长,王静敏任指导员。在我村成立的队伍编为二中队,我当中队长,张辑武为指导员。全大队合计约200余人。

我们活动到韦庄寨时,又会合了吴守训同志带来的三四十人。白辛夫到开封未学习成,也回来了,李培棠也从睢县县北来到韦庄寨,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刘寨的史绍尹同志也来了。于是部队在韦庄寨再一次进行了整编。吴守训同志编到我们二中队任中队副兼一排长,当时我们中队人最多,武器也较其它中队好,共有四挺机枪。所以,战斗力也比较强。

当时,我们党在睢、杞、太地区的武装,除我们这个大队外,还有姜郎山、苗久锐成立的部队(未和大队合编),以及李寿山成立的部队(李部党的领导人是王鸿钧)。付集孟海若的看家队也是抗日的力量,政治上靠近我们。

大队成立之后的第一仗,是打击何寨日军抢粮队。1938年6月底,大队在付集附近活动时,适逢杞县小胡岗的敌人出来到何寨抢粮。我大队由王海山率领立即主动出击。当两个中队快把村子包围的时候,被几个鬼子发现就打起来。打了近一个小时,几个鬼子从高粱棵里狼狈逃窜。我们缴获了日本的钢盔、战刀、两辆大车

和六匹骡马,还有鬼子抢的粮食。首次和日本交锋就取得了胜利,大大鼓舞了战士们抗战的信心,直到我们打扫完战场转移之后,日寇的援军才赶来,他们朝何寨村子里猛打了一气,最后还放了火,但我们已经走远了。只听到一些枪声和看到冲上天空的烟火。

游击队成立之后,物资供应成了突出的问题,一开始人少,几个党员首先拿出自己家的粮食供应部队,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所以供应非常困难。于是就提出要“合理负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抗日”的口号。首先向那些顽固分子和为富不仁的家伙,尤其是一些恶霸和准备投敌的地主,要粮要款,也学会了向群众派饭吃,直到后来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后,物资供应才有了一些保证。

二、从三支队成立到三个兄弟部队的会师

为了打击日寇,扩大影响,进一步发动群众,以壮大抗日力量,大队决定把部队的活动范围扩大到睢县县城西南的惠济河一带。听说到县城附近去,同志们精神十足。当时,高粱已长起来,我们趁着黑夜沿着马车路迅速行进,50多里走下来都不觉得累。

天将黎明时,向导说已到了宿营地刘吉屯。根据上级命令,把部队沿惠济河以西布防。我亲自查看了地形,指定了岗哨,规定了口令和集合信号,并把通向城里的吴桥桥头的大路截断,在路上放上鹿砦。并向前伸出潜伏哨和侦察员以及发现敌情后的联络信号,摆出一个防守惠济河的架势。其它各兄弟中队也是这样沿河部署的。进到惠济河一线以后,部队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大队改为新四军游击队第三支队,王海山任支队司令,吴芝圃任支队副司令。姜郎山、李寿山、苗久锐部均划归三支队指挥。

由于缺乏经验,当时这种部署兵力的办法,完全是一种打阵地战的战法。幸亏当时发了大水,睢县敌人没有出来,否则就凭我们这支装备极差的刚武装起来的老百姓,是根本守不住惠济河的。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司令部感觉这种办法不对头,才撤了出来,

向南边开去,开始用游击战术来和敌人周旋了。

部队在游动过程中,一面宣传抗日,一面组织发动群众,同时筹款,筹粮,铲除汉奸土匪。

当时各地情况很乱,3里、5里1队长,10里、8里1司令,都打着抗日的旗号,但大部分都是土匪或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他们到处抢劫老百姓,并暗地里和日本鬼子来往,所以当时确定对这些人也要坚决除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保护人民群众和抗击日寇的目的。

当时个别部队在执行政策上也出现过“左”的作法,如姜郎山部在尚屯曾下过愿意靠近我们的土匪尚永法的枪,甚至要枪毙他,逼得尚后来当了汉奸。接着姜又抓住申庄的地主申德高要枪要款等。

部队到了英王村,司令部决定消灭在长岗称霸一方,作恶多端,决心投敌的张心禛和轩友礼这股民团武装。这股敌人有400人左右。司令部集中了当时所有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计有大队所属两个中队,和李寿山、姜郎山、苗久锐的部队以及在党影响下的孟海若所带的部队。战斗一开始,首先包围了长岗,一、二中队从东门到南门,李寿山部队从大西门和小西门首先打进寨子,将敌压缩在东门里原伪区部的大院内。由于敌人在周围房子的外面筑起了高墙,中间有一座高达四层的“保险楼”(即碉堡),很难打。围打了3天3夜未能攻克,但敌人在里面也不好过。他们吃不好饭,喝不上水,6月的天气又热。最后他们没有办法,便在夜间从后墙挖了一个大洞,从洞里钻出来经过臭水坑时,由于渴得要命,都拼命去喝污水,这部分人在突围中被打死20余人,其余的逃跑了。这次战斗共消灭敌百余人,缴枪100多支,并烧了他们的“保险楼”。

部队转移到付集附近,这时支队个别领导接受了孟海若一个不正确的建议,在贾洼和倾向抗日的张曰汝和刘汝亭部打了一次错误的仗,双方都受了一些损失,这是不应该的。

由于在贾洼战斗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我们二中队战士情绪非常低落,怨言也不少,有很多战士想拉回长岗一带去活动。后来支队领导考虑到战士们的情绪,同意二中队回长岗一带活动。张辑武同志就带着我们回到了长岗。到长岗以后,群众对我们的到来非常欢迎。主动给我们筹粮筹款。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防止土匪的打劫。正在这时,忽然有一股土匪,在厚台岗抢劫,约有三、四百人,头子叫李广春,姜永彩。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就立即把部队开到草庙王,派人拿着信去和土匪交涉,叫他们马上撤走,否则就要消灭他们。(因吴守训认识里面的人,所以采取这种先礼而后兵的办法)。他们答应马上撤走。果然不久他们就撤走了。回到长岗后,老百姓非常高兴,对部队照应更好。这时部队因为回到了家乡,并且环境也不错,而且部队又有所扩大,就想留在长岗,不想走,张辑武同志考虑到远离大队,一旦遇敌人进攻就不好办,总觉得还是往西找三支队和大队一起活动好。他认为应从长远利益出发,不能光顾眼前一点利益,坚持要走,为了服从上级,我们勉强跟着张辑武回到了三支队。

三中队离开长岗时已经发展到了一百七八十人。我们回到大队后,就着手准备迎接从西华过到新黄河东岸的抗日东进支队。东进支队约有 2000 来人,由特委书记沈东平率领,支队长是胡晓初。下面有侯香山、屈中亭等同志。东进支队进入敌后杨庙以北时,吴芝圃带着我们去转楼和东进支队会合。我们和沈东平、胡晓初见面后,就一齐研究了敌情,确定了行动计划,决定向睢县东南迂回包围睢县县城,相机消灭鬼子的有生力量。

共同研究之后,就分开活动。我们三支队又回头向西,朝杞县活动。这时恰好碰上新四军的肖望东同志率领的先遣大队约有 100 多人来到水东(因那时豫东是沦陷区,所以当时的河南省委决定派先遣大队到豫东来抗击日寇。)

我们三支队和先遣大队在付集举行了联欢会。我们觉得象他

们这样才象老红军。由于东进支队和先遣大队的到来，豫东地区的抗日力量和声势一下子大起来，党的威信也空前提高，但同时也引起了日本鬼子的注意。

东进支队进入睢县后，首先消灭了潮庄集董蔚亭的地主武装三百余人，然后继续东进，这时沈东平带一侦察连去河堤岭，正好碰上日本鬼子出来巡逻的大队人马。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沈东平同志没有当机立断撤出战斗，而是退到一个村庄里坚守起来。他们占据一所楼房进行抵抗。但由于敌人太多，装备又好。结果敌人包围了楼房，后用燃烧弹把楼房打着了。将近 100 多人全部牺牲。沈东平同志也牺牲了。沈东平同志是东进支队党代表，由于他的牺牲，东进支队失去了主要领导，就撤到龙曲一带，接受三支队的领导。因那时吴芝圃是豫东党的主要负责人。后来我们二中队和东进支队配合还消灭了辛庄寨李潮见的土匪武装（约有 300 余人），得了不少战利品。

东进支队、三支队和先遣大队 3 支部队会合后，决定撤到新黄河以西去。当时说由于东进支队来豫东后打了董蔚亭和李潮见，声势太大，已引起鬼子注意，鬼子可能报复，要扫荡，先上河西暂避一下，整顿整顿，然后再回来坚持豫东的游击战争。实际上是到河西和彭雪枫同志从竹沟带来的队伍合编。西进前，我请示党组织，要求回长岗，把长岗的看家队带出来加入我们中队。党同意了我的要求，于是我回去说服了孟永舒和孟广汉，将看家队带了出来，准备西进时，我向部队作了动员，果然有一部分人不愿干了，他们要求脱离部队回家去。经劝说无效，就让他们走了，过河前又重新作了布置，决定留一部分人坚持睢杞太地区的斗争，就让孙其品留下领导，又把长岗的看家队整编了一下，成立了一个中队，由孟永舒当中队长，并把周忠元同志和李培棠同志也调到这个中队，加强其领导班子。

三、六支队的建立和挺进水东

三支队、东进支队和先遣大队，经过艰苦、长途行军和水上运输，到达黄河河套中间的吕潭休息了一天，参观了吉鸿昌将军办的吕潭中学，又继续前进，一路上连饭也没吃上，战士们饿的难受，靠着政治动员和思想工作，终于将部队带过了黄河，到了西华和扶沟之间的杜岗。1938年10月，在这里和彭雪枫所率领的游击支队会合了。

三股部队会合后，约有1000多人，不久部队开始整编，成立了新四军第六支队。原三支队苗久锐的一个中队归了从竹沟来的游击支队，编为游击一大队，代号“南阳”，大队长是黄思佩。肖大队和姜郎山的部队编为二大队，代号“信阳”，大队长是腾海青。原三支队一中队编成了六支队警卫连。我们二中队和长岗的看家队单独编成了三大队，代号“淮阳”，大队长是老红军，叫冯胜，六支队成立后，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吴芝圃任副司令员，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谭友林任副主任，张震任参谋长。

整编结束后，发了新四军的肩章、胸章。接着进行了一次整训。整训中，彭司令员曾亲自到我们连进行指导，给我们讲了红军的光荣传统，红军中兵和官的关系与旧军队中官兵关系的差别等……。对我们以后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河西整训结束后，于1938年11月1日，彭司令员率领我们往东过了新黄河。经过一夜的行军到达了太康和淮阳交界的棠棣、窦楼一带。尽管这次行军非常保密，仍被敌人发觉了。正在吃早饭的时候，淮阳县以北戴集的鬼子骑兵40来人向我驻地袭来，这是挺进敌后的第一仗，在彭司令员指挥下，仗打得很漂亮。张震参谋长率领一大队向敌人占据的小柏树林进行冲击。彭司令员来到我们连简单动员了一下，就带领我们，向敌人的左侧，迂回上去，两面一夹击，敌人很快就被打垮了，我获得了初战胜利。

敌人退后，我们全支队继续向东北进军。当天到安平、四郎集宿营。天将拂晓，我们又向南走约40里到五台庙住了一天。当天夜里就到了鹿邑东南的白马驿。当时鹿邑还未沦陷。原冯玉祥部的魏凤楼是县长，和我党关系不错（张爱萍同志在那里做工作）。

在白马驿我们休息了10多天，魏凤楼帮我们解决了部分棉衣。（他有军队约1000多人，因受蒋介石歧视，物资也较困难。所以，能给解决一点也算不错了）。

不久，彭雪枫率领我们回到了睢杞太地区以前三支队活动过的地方。首先是在西陵寺打了汉奸区长马培善，接着向西打了邢口和陶屯李五林这个大土匪，又到高阳打了大汉奸朱之固。这时在支队后方板木（后又移到赵集），成立了随营学校。我被调到随营学校准备任中队长。

这次回睢杞太地区打了几个胜仗后，原曾属三支队领导的李寿山部约四、五百人和李广居部约300来人都加入了六支队。但因这个地区小，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经支队领导决定，即带着整个支队向东转移，准备从柘城以南过惠济河上的大桥。敌人得到消息，准备截击。于是我们立即向南走，扬言要打淮阳和太康。鬼子得知我们向南后，即把守桥的部队撤回了柘城。我们又立即转过头来按原计划从大桥上过了惠济河，又回到鹿邑的白马驿一带。在白马驿稍事休整后，部队分头向永城以南进发到观音堂。在观音堂，部队进行整编，由三个大队编为三个团。因随营学校没有成立中队，就又让我到了一团。部队在永城周围连着打了许多仗，扩大了地方，建立了根据地，在涡、永、商、亳、肖、宿地区站住了脚。

水东地区留下的王介夫、冯敬宇、马庆华等同志以及孟海若的部队，坚持在付集、龙曲、长岗西南板木以东一带打游击，作战主要对象是土匪李卫国，还有日伪，环境相当艰苦。

1939年1、2月份，为了扩大抗日力量，开辟水东游击根据地，吴芝圃副司令员率领六支队的三大队（即“淮阳营”）及特务连二次

返回睢、杞、太，进入水东。冯胜、张辑武、白辛夫、吴守训等都随部队一齐回到水东。这次一回来，首先包围歼灭了长岗的伪区部及其区队 300 余人，活捉了伪区长李继美，接着向西又歼灭了大土匪李继书共 400 余人，缴获大批弹药物资。其它土匪一看形势不好，纷纷和我军联络，表示愿受我军整编，如土匪曹德林部二、三百人，就被编入了六支队。其它还有些自发的抗日武装，如杨凤寅、刘曰亭等部队数百人，也都被编入了六支队的建制。

为配合开辟水东区，冀鲁豫军区杨得志司令员亲自率八路军冀鲁豫支队，于 1939 年 3 月挺进水东。我们为了策应冀鲁豫支队，吴芝圃决定率领“淮阳营”进入杞县东北睢县西北尹店，去消灭刘子立的土匪武装（约千余人）。但因没有摸清情况，结果侦察部队吃了亏。因敌人已有准备，就没有打刘，而又长距离奔袭了通许练城的上匪郭片约四、五百人，消灭其大部分。杨得志同志率领的八路军在水东打了两仗后，即返回鲁西南地区，“淮阳营”又回到了杞县以南，住在瓦岗、赵村一带。由于“淮阳营”在这段时间打了几仗，揍痛了敌人。日本人对“淮阳营”恨之入骨，定要消灭之。于是便出动了 80 多辆汽车和坦克，从开封经杞县向瓦岗包围过来。“淮阳营”由于几仗打的不错，便麻痹起来，结果吃了大亏。吴守训同志负伤（吴伤较重，连夜送到商丘治疗，后怕暴露，伤未好就出院回涡阳新兴集去了）。敌人又袭击赵村，吴芝圃刚带部队转移走，敌人便把吴的家全都烧了。等日本鬼子走后，部队又在转楼一带连夜集合起来。由于损失较大，就撤出了睢杞太地区，返回了永城以南。

四、初建独立团

“淮阳营”撤回永城后，睢、杞、太地区留下王介夫、马庆华坚持斗争。马为地委书记，在宋吉屯和日寇战斗中牺牲。后党又派冯胜等人来水东、为了防止西边的大土匪李卫国、李五林的袭扰，当时决定在长岗以南，龙曲周围，板木、付集南边一带成立了许多由我

党领导的防匪的民团，上设总团，下设分团。每个分团人数不等，一般二三十人。这些民团在反匪斗争中也起过些作用，但群众纪律很差，扰害人民，经过整顿，都编入了独立团。

1939年夏天，冯胜在和汉奸土匪的战斗中是有成绩的，但政策观念差，杀人过多，以致使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陷于孤立。于是，冯胜被调回六支队，由兰桥同志来水东领导对敌斗争。当时韩达生同志任地委书记，将马庆华率领的那个大队编为一营；孟海若所部改编为二营；王其梅同志从西华过来带了两个连改编为三营；又编了侦察连和特务连，共约千把人（地方团都整编了），第一次建立了睢杞太独立团（后改为水东独立团）。1940年夏天麦熟时节，为了加强水东地区抗日力量，巩固和发展睢杞太抗日根据地，组织上将我、任秀及几个通信员共计5人派回水东地区，独立团团长沙桥同志派来通信员将我接到团部（在传李村李青山家）。在传要村住一天，独立团转移到隶家寨东边的经楼、李稍楼。驻睢县的30多名鬼子和汉奸出来向我们驻地进攻。我独立团在兰桥团长指挥下，一营正面阻击，二营和三营两面包抄，汉奸一看拔腿就跑，剩下的鬼子被我三面包围，打死5名，打伤好几名，其余的都跑了，此次战斗影响很大，部队和周围的群众情绪非常高涨。由于打了胜仗，部队产生了麻痹思想，忽略了敌人可能进行的报复。结果部队只向南走了25里，就在太康县的门楼张住了下来，敌人当夜集中了豫东各县的鬼子和八、九十辆汽车、坦克，分几路向我合击过来。刚吃过早饭，就有一路敌人接近了我独立团一营三连。这一路敌人约有40多辆汽车，很快地向烧饼李围上来，兰桥团长立即命令三连进行阻击，掩护全团分别转移，战斗非常激烈。三连伤亡40多人，敌人也付出很大代价。这时敌人其余四、五十辆汽车也赶到了。情况对我们十分不利。正在这时，突然从西边过来一块乌云，暴雨夹着雷声，立即使地面变得泥泞起来，这一来鬼子的汽车就只能在原地空转，走不动了，使我们顺利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老百姓都说：“这真

是天助独立团呀！”

门楼张战斗后，独立团大部分转移到黄河套附近，一营和团部住在一流岗北头郭屯，兰团长给我讲上级决定让我去一营接替营长田维谨同志的工作。

麦收以后，部队开始征粮，准备自建伙食单位（以前都是向老百姓派饭吃）。这时青纱帐已快起来了，我们准备去杞县东北打大汉奸刘子立部。但走到西陵寺西南一带的村庄时，忽然碰上了鬼子进行扫荡的大队人马。因青纱帐快起来了。日本鬼子想趁青纱帐起来之前消灭我们。于是，他纠集了豫东所有的伪军，连同鬼子约有数千人，对水东实行“扫荡”。中心区的各大集镇，都有装载着鬼子的汽车二、三十辆，鬼子和伪军象梳头、网鱼一样搜索前进。我们和鬼子在邢堂碰上后，立即向南撤退。团部和二、三营先后撤回新黄河套里隐蔽起来，一营由我带着撤至长岗西北角3里的马窑、肖堂村。侦察员回来说：“西边申纪、久庄有敌人，南边的厚台岗还有敌人。”于是我们没敢停留，就在白天，继续转移，副营长王丙章带两个连向南转向西，进入新黄河套里去了。我带着一个连向东南到达徐楼东头，又派人侦察了一下，说是厚台岗、传李都有敌人。于是，我干脆将部队带入敌占区大张村的海子里。派一个排往东南侦察，相机转移；一个排往北警戒王梢楼之敌。果不出所料。睢县张心禎的伪军已到了王梢楼。这时鬼子20余车汽车也到了长岗，接着到了徐楼。这种情况我们在大张看得清清楚楚。这时我已把部队分散，身边只剩一个通信班了。我命令他们隐蔽好，不许暴露。汽车经过徐楼向潮庄去了。我们未被发现。张心禎派一个侦察员（是我的熟人）出来侦察，见到了我。他对我说：“你们在这里不要动，我回去不让张心禎的部队往这里来。”这时太阳已经平西了。我即通知大张北边的一个排撤回，又将大张海子里东边那个排也集结起来，就向西到白庄，在那里弄了点吃的。天还不黑，我们从长岗集东边绕过去，在马集一带将两个排化整为零，暂时隐蔽，在敌人四、五

天的大“扫荡”中，我们这两个排不但一个人也未损失（每天夜聚明散，帮群众干活，并发展新入），反而又发展了十几个人。

敌人“扫荡”过后，青纱帐也长起来了，本来我们应该继续贯彻“扫荡”前制定的“深入敌后，打击敌伪，逐渐扩大游击根据地，壮大抗日力量”的正确方针，深入杞北，发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但不知什么原因，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又采取了背靠蒋管区而向前推进的办法。

在逐渐推进的过程中，曾经打了几仗：独立团集中力量向睢县以南出击，打了伪二区夏楼夏西陵，将夏打死，得了一部分枪支，还有两匹好马。

回到中心区后，就准备在付集南边宋吉屯伏击由太康去杞县的鬼子汽车，但等了一些时候，敌人未来，就撤回村吃饭了，但就在吃饭这段时间，敌人的汽车开过去了，于是我们绕路追了上去，在付集北的五里屯，终于追上了。车上全是鬼子，打得非常顽强。打了一阵，还是接近不了敌人，敌人还是跑了。这一仗有点得不偿失，我副营长孙其昌负了伤，通信班长阵亡。

不久，我们集中力量打了杞县南 25 里槐野岗土匪李五林部。打了一夜也没有全部消灭敌人，就撤出了战斗。我营副营长王丙章同志牺牲了。这次战斗之后，我们进入河套整训了半个月。

有一天，部队在太康苑寨召开大会，正在进行军事比赛。忽然从太康县出来 80 多名日本鬼子，乘 12 辆汽车，并带有小钢炮向我进攻。我当即请示了团长，决定由我带一营一连在苑寨东门进行阻击，掩护全团撤退。等三营二营撤走之后，其它的部队由孙其昌同志率领撤了出去。最后我和一连才撤出了战斗。这次战斗，一连损失较大。孙其昌同志带两个连向北，在开阔地上也负了伤。整个部队进入河套里面的马屯，在那里建立了后方。又停了几天，就接着苑寨未完的比赛，继续进行。一营在这次比赛中获得总优胜奖旗。

1941 年初，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顽军也对我水东

地区发动了进攻。加之我们独立团执行中央关于“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的指示，思想上不够明确，也不够坚决。过分信任国民党，驻地背靠着国民党，因此在“皖南事变”以前，1940年11月，国民党搞磨擦，我独立团在太康马屯的后方就遭到国民党正规军八十一师的突然袭击。二营受到部分损失，撤出战斗，团部带领后方也撤出马屯，转移到豫皖苏边界永城一带去了。团主力离开水东时，一营留下我，二营留下马玉堂带一个连在睢县和杞县以南活动，征收粮食布匹准备过冬，独立团向东去时将一营副营长孙其昌和团部总支书记马一鸣派到国民党淮阳县柳林区大队工作，掌握该部队。当时柳林区区长是我地下党员薛朴若。临走时独立团党委指示：如柳林区环境恶化，不能存在时，就向北和王广文、马玉堂靠拢。

独立团到达豫皖苏边时，那里也正在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围攻。

豫皖苏边之永城、夏邑、涡阳、蒙城、肖县、宿县一带，原是彭雪枫六支队的中心区。“皖南事变”前，兵力已发展到3个主力团，3个纵队，加上地方部队，共约1万余人。

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何柱国骑兵军、国民党五十军（军长张克侠、副军长何基沣）向彭雪枫进攻。五十军之陈瑞亭团起义，他指挥的另一个团被我消灭；他带的一个团向淮北转移时，被特务追上，陈被打重伤，警卫员被打死，部队又被特务拉走了。我党派去之工作干部方振铎逃出。敌人再次进攻时，彭雪枫部二团被敌包围歼灭，三团一营，即原“淮阳营”被歼，一营剩二个连（一个连连长郭志德，一个连副连长孟昭贤）。敌人包围二团时，彭雪枫带的骑兵连也被围。在敌进攻下，彭雪枫乘马逃出，被敌骑兵追击20余里，因骑马快速，得以脱险。

睢杞太独立团由兰桥率领随彭部东撤，过津浦路时，也被敌歼灭一个连。其余都撤到了路东。

由于损失过重,兵力悬殊,彭雪枫六支队乃撤出路西,到了淮北地区。

五、重建独立团和以后的残酷斗争

独立团撤出水东区之后,我和马玉堂所带的两个连合编为独立营。合编时原二营副营长张兴智(共产党员)要求离开部队到河西顽专员韦昌方或国民党四十军那去。当时我不同意。马玉堂同志说:“还是让他走好了,革命不能强迫,你不让他走,如不辞而别,树立一个敌人,还不如同意他走。他还答应走了以后给做工作,搞情报。如能安住脚,再给他那派人去做敌人那里的工作。”我最后虽然同意了,总觉得这人环境紧张时动摇,还能算一个党员吗?

独立营编制好以后,由我任营长,马玉堂任教导员。继续坚持水东区,打击敌伪,反击国民党正规军和土顽的联合进犯,并利用敌顽的矛盾,隐蔽活动。但当时我们对隐蔽活动缺乏经验,仍穿军衣靠近敌区活动。那里敌伪顽都寻找我们,企图消灭之。结果我们在孙聚寨南曹庄活动时,遇到鬼子20余辆汽车的围攻。我带的一个连受到很大的损失。连长、指导员均牺牲了。我只带了6个人突围出来,伤亡30余人。不久,马玉堂同志带二连在龙曲北瓦岗附近又遭到日本骑兵40余人的袭击。部队撤出时,连长负伤,指导员战死,伤亡10数名,才撤出战斗。

我和马玉堂感觉敌伪顽都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力量又逐渐的减少,看来越来越困难了。正在这个时候,淮阳县柳林区我党掌握的区大队由马一鸣、孙其昌、孟凤喜几位同志率领向北渡过了新黄河,到达太康以北与我们会合了。我介绍了这个地区顽固分子和我们搞摩擦的情况。他们认识不足,还以为和独立团在时差不多,还说到这边来时就没碰上土顽,于是就靠近土顽驻在堰里芝麻凹,在王桥放了个排哨,到天明就让土顽的一个部队给搞掉了。我们从堰里打出来,部队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当天夜里我们集合了所有的

部队,和地方上一些负责同志,住到睢杞边的申纪村。在那儿召开了党的会议,研究了当时的情况,提出要接受教训。并指出:上级没有指示,我们不能撤出水东,跳到华北去,要继续坚持,但要生法和上级取得联系,得到上级的领导和及时的指示,最后意见统一起来。继续坚持水东,并重建了独立团。由马玉堂任团长兼政委,我任副团长,马一鸣任政治部主任,孙其昌任三营营长,二营直属团部。并令我去华北和冀鲁豫军区联系,张剑石去淮北找新四军四师联系。我去华北的主要意图是想取得华北对我们的领导,因为离得近,只隔陇海路,必要时人员和物资上还能给我们以支援。我到鲁西南(冀鲁豫五分区),见到了赵其梅(分区司令员兼政委)。他指示我们:要我们隐蔽活动,不要过于刺激敌人,应穿便衣活动。为了便于联系,双方可以建立地下交通。你们根据情况,可以向北发展,到杞县以北和陇海路南侧活动。这样,可以不受敌伪顽的夹击。至于你们要求归军区领导的问题,要请示上级,甚至中央批准才行,我们作不了主。

在鲁西南地区我呆了半月。以后,由地下交通领我通过敌区回到了水东。由于在孙聚寨以南战斗中部队受损失,地委书记韩达生被俘,扣压在睢县城里。我听说组织上正在营救,他不久就可出来,我就在睢杞边郭河村一带等他。但他放出来以后,到郭河村未停,就向西到一流岗去了。他在那里召开区委书记以上的会议。我脚跟脚地也到梁寨联络站见到了他,那时前独立团一营营长田维道从东南跑回水东来了,因未得到淮北的通知,韩达生地委书记怀疑他是开小差回来的,就交待我先把 he 看押起来。由我负责带领阎彬、王可均共 3 人到一家牛屋里把田看起来。大概夜里 10 点钟,顽军八十一师一个营包围了梁寨,我即和阎、王二同志带着田出村。但两次都未出去,他们 3 个也跑散了。我第二次跑到联络站,韩达生和郑杰、刘振邦、马一鸣他们已离开联络站。我不得不和联络站的小通信员小岗一块向西跑了出来,敌人打枪问口令都没有理他,

终于算跑出来了。

我突出敌人包围之后，向西跑到张汗锅的东北地。在那里住着由独立团派出的阎有祥成立的 20 余人的一支小部队。我让小岗去通知他马上集合，带到这里来，我在一个岔路口等他。

阎有祥带着小部队来到了我等他的地方。我给他介绍了情况。说敌人大约有一个营包围了梁寨，我们有些同志可能还没出来，韩先生（即韩达生）也在里边，你带着这支队伍去袭扰一下，看咱里边的人能趁敌人混乱的机会出来不能。我就到东边的联络站等着，看情况的发展。第二天我让小岗去侦察情况，回来说：“天明敌人在梁寨翻了一天，将韩达生、郑杰、刘振邦、阎彬、田维谨捉走了。马一鸣、王可均事先逃出，没有被捉。这次被围，我们受损失很大，被俘的都是主要领导干部。”

1941 年夏，我们着手开辟杞县以北。这时由于水东地区失去主要负责人地委书记，经报告到淮北四师，很快派王其梅和薛朴若到水东区。王其梅任独立团团团长兼政委，我任副团长。马玉堂去太行学习，未走到党校中途就失踪了。独立团成立了军政委员会。王其梅任书记。有一次，军政委员会讨论青年战士李振河的问题。因李在敌区扩军违犯纪律，王主张处决，我不同意，认为可以教育。王说他有最后决定权，将李振河立即枪决。当时使我感觉在一起不好相处。我要求兼二营营长，而离开了团部。薛朴若在团部任政治处副主任，他要求到二营担任教导员。不久，团军政委员会决定在水东建立政权。为了和敌顽政权有区别，我们的专区取名叫“联办”，县叫“办事处”，区叫“分会”。当时抽出薛朴若、杨宏猷、李良同志到地方建立政权。杨去杞县北，李去杞通当县办事处主任，薛在杞南当联办主任。

王建一从东南回来二营任教导员。秋后我俩到杞东北开辟新区。孙其昌和杨宏猷于 1941 年秋到杞西北黑木、白兵一带开辟新区。1942 年杨在杞北和王法周（1942 年派去的）一起，建立了两个

区政府和一个县大队。虽然土顽薛汝海也在杞北活动,1941年时和我们还没有大磨擦,但从1942年磨擦就开始了。

1941年12月份,我带独立团二营在杞北活动时,王其梅同志让王建一和我去冀鲁豫军区汇报工作,接受指示(因为要过铁路,二营也去了),杨得志司令、苏振华政委就如何坚持水东,从政治到军事都给了我们很多重要指示。经过一段休息,决定我去太行学习。因日本扫荡冀南未过去铁路,就折回到冀鲁豫军区陆军中学学习文化。为了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我们中队下地方工作半年。1942年1月,上级派林耀彬同志到独立团任团长,王其梅同志不再兼任团长,只担任政委。二营也从冀鲁豫返回水东。1942年是水东区斗争比较艰苦的一年(上半年我不在水东,了解情况不够详细)。蒋介石的正规军和土顽全面向我进逼;鬼子和汉奸经常出来“扫荡”;天旱又水淹,蝗虫遍地。群众说河南有四大灾害“水、旱、蝗、汤”,主要就是指的情况。

1942年上半年,军事斗争十分残酷。日寇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到处制造无人区。对解放区实行分割、封锁,在外围增修公路,建封锁墙,挖封锁沟,对我老区进行蚕食,企图彻底消灭我们。国民党密令其一部分部队投降日寇,配合起来夹击我军,还美其名曰:“曲线救国”。在水东区,顽专员所属曹拾一部第二纵队积极配合日寇向我区进攻,企图将独立团赶走或消灭于水东。

我水东区根据上级党和军区的指示及面临的形势,决定不能撤出这块用鲜血换来的地区,应和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集中力量打击最顽固和较弱的敌人,不打则已,一打力求歼灭,针对敌伪蚕食,采取敌进我进对策,坚决粉碎敌人的蚕食政策。经过几次较量在谷树岗打击了顽专员的主力一纵队,打死了伪杞县县政府负责人王昌杰;在天池凹又和顽专员的一纵打了一仗,毙伤其二十余人,将其击溃;在黑木对土顽较强的一股薛汝梅部作战时,袭击了他的集合场,薛汝梅腿被打断。这时土顽的气焰才不那么嚣张了。

当时日本搞“强化治安”运动。睢县的汉奸孟昭华很猖狂。只要我们去睢县活动,他就要打你。他们各区有区队,各乡有乡队;睢县县警备队千余人,连同区乡的部队近2000人。到1943年春,我们就很难去睢县县境开展工作。另外,由于灾荒,不但群众没有饭吃,我们部队就更加困难。不得不去敌区征粮。象作战一样,到敌区筹了粮很快回到中心区分散埋藏起来;征不到时,或和敌人打上时,回来就没有饭吃。黄河套里和大堰一带就更苦了,一个村就有死光的。饿殍遍野,尸体无人掩埋,那时真是“人吃人,狗吃狗,小老鼠饿的啃砖头”的年代,听说有一家,男的把自己的女儿都杀掉吃了。各村十室九空,群众能逃的逃了,逃不掉的就活活饿死在家中。

1942年秋后,王其梅也去太行学习。1943年初,唐克威同志被派到水东任地委书记,水东地区局势虽然稍有好转,但只是部队多了一点,而敌人对水东的进攻一点也未放松。这时没有饭吃成了党政军民的严重问题,唐克威刚到水东,在杞县东南常沿村庄时,遇到鬼子的12辆汽车袭击,部队伤亡四、五十人,唐克威同志不幸牺牲,党又派李中一同志来水东任地委书记。当时困难就说不清有多大,除了敌、伪、顽的联合进攻之外,还有四大害的折磨。我们把从敌区筹来的有限的粮食分给群众,也解决不了问题,人民都拿树皮充饥,每个人都饿得皮包骨头。

1943年麦子快熟了,群众有了一线希望。外逃的人有一部分回来准备收麦。但敌、伪、顽也都在准备抢粮。我水东独立团和地方政府为了不让敌人抢走一粒麦子,也做了充分的战斗准备。政府提出“快收、快打、快藏,颗粒归仓”的口号。正在掩护麦收防止敌人抢粮的时候,林耀彬团长调回冀鲁豫军区,又派我回到水东掩护征粮和防止敌伪抢粮。我带领两个连靠近敌区积极活动。一次在于镇反击伪军抢粮时,把伪军赶到马岗消灭一部,第二天我在郎智岗住时,杞县伪军李玉林部和鬼子拉着大车到杨屯抢粮,我即令四连正面攻击敌人,令三连由右侧迂回。四连在杨屯南地尚不影人的高

梁地里和鬼子拼了刺刀,打死鬼子5名,伤敌数名。我们伤亡十数名,双方都撤出了战斗。敌人把伤号装上车。粮也不抢了,很快撤回杞县,我们保住了群众的麦子,群众非常拥护。

1942、43年,由于敌人军事上的蚕食扫荡和政治上的强化治安运动,加强特务活动,我们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很多遭到破坏。睢县大汉奸孟昭华对我区积极进攻;日本宪兵又利用靳其昌、郭敬毅、韩晋甫等叛徒、自首分子,先后破坏了孙聚寨、长岗的党组织,抓走了苗泽生(即苗久锐)、郭永福,打死了靳鸿昌、王仰山、郭效诚等共产党员。跑到东南去的有曹宗昆、刘作民等,跑到了开封的有孟庆昌、袁子杰、李金祥。曹鸿被逼也进了城。这时睢县党的地下工作遭受很大损失。地方武装被挤出了所在地区,我独立团的活动也受到了很大限制。到1943年底,睢县成了敌人推行“强化治安”运动的模范县,但我们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克服了种种困难,还是坚持下去了。

六、水东的大发展时期

1944年,日本鬼子数万人西渡新黄河占领了郑州,打通了平汉线。国民党的正规军和其它杂牌军三、四十万人没有怎样抵抗,就投敌、叛变、逃跑,乱做一团。已往占据新黄河套的顽军这时也腹背受敌,力量大大削弱。一时,水东成了日寇进攻豫中、豫西的后方,其守备兵力也不太强。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水东区抗日力量大发展的条件。

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分区李中一政委让我带四个连到睢县活动,打击最忠实于敌人的汉奸孟昭华。我首先铲除了孟昭华的坐探、特务及其爪牙,继而消灭了大据点周围的乡据点、炮楼及乡队武装。我们部队先后拔除了五行、厚台岗、季芳李、英王等据点;杞县大队等拔除了西陵寺据点。潮庄据点也被争取过来。其它一些据点也被兄弟部队相继攻克。此时,孟昭华这个大汉奸所创建的

“模范县”被摧垮了。睢县开始建立了抗日县政权和县、区武装。

在我中心区，发动群众，进行了减租减息，建立了民兵，破坏敌人交通网，村与村之间的大路挖成交通壕（便于我打击敌人，和疏散隐蔽，敌人的汽车也不能横冲直撞了）。这样就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水东的游击根据地。

1944年2月，我在杞县付集附近活动时，独立团张刚剑团长带一个排，从杞北到付集以南小李庄住下（他爱人也和他同行）。这个村有些坏人和长岗的汉奸队有联系，这些坏家伙把张团长的行踪密报了孟昭华驻长岗的特务大队长李国栋。李即带队伍出来袭击，包围了小李庄。正巧我和参谋长孙子植带两个连住在大张村，和小李庄相距很近。看到敌人包围了小李庄，我们即主动出击，将敌人打的抱头鼠窜。我乘胜追击，追到离敌人长岗据点只有3里地时才收兵。这次战斗，援救了张团长，俘敌10余名。得步枪7支，八二迫击炮1门。

小李庄战斗后，汉奸孟昭华即开始走下坡路。不久，作战参谋韩仁勇带二营在宋吉屯活动时，适逢付集的汉奸和日军1个小队向我中心区进行“扫荡”。我待敌接近，突然出击，打得汉奸丢下日军就跑。日本鬼子掉在后面，3面被我包围，大部被我歼灭（死数名，敌小队队长和翻译官等五名鬼子被俘），我得三八式步枪3支，机枪1挺，掷弹筒1个。我部直接和日寇作战，取得这么大胜利还是第一次。以后经过教育我把日军小队队长和翻译等5人都放了回去。付集敌据点也撤走了。

1944年麦收前，得到淮北对我水东区的指示，新四军四师彭雪枫师长率十二旅和骑兵团到津浦路以西，拟恢复豫皖苏边区，让独立团向宁陵、柘城地区活动，予以配合。我独立团主力即进到胡钺城以北活动，并建立了宁柘县政府，王建一由部队抽出担任了县委书记。

1944年麦收后，冀鲁豫区党委为了发展水东大好形势，进一

步向新黄河以西挺进,决定加强水东区的领导和武装斗争。派余克勤和袁振二同志带南下大队进入水东,准备建立分区。他们过了铁路,就在民权县杨城干脆彻底地消灭一股汉奸 300 人。我们伤亡不大。部队过来第一次打了胜仗,情绪非常高涨。随即再向南进到中心区板木一带。1944 年 7 月 4 日与水东独立团胜利会合。地委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部队也进行了改编,独立团改编为 3 个大队,南下大队为一大队,程政杰为大队长;原独立团抽调 3 个连为二大队,我兼大队长,通许大队上升为三大队,毛存林为大队长。

地委书记为袁振同志,副书记为李中一同志,独立团的领导是余克勤、袁振、李中一、王广文、苗丕一、孙子植等。强调党政军实行一元化领导。

此后,部队就积极活动,扩大地区,打击敌伪顽,主动进攻敌人,1944 年 7 月 17 日,我全团出击。

8 月 10 日,我团包围歼灭了睢县东南河堤岭伪孟昭炳(孟昭华之弟)部 300 余,活捉了孟昭炳,缴枪甚多。

9 月,我团又包围了长岗据点(内有伪区长张心顺以下 200 余人)。战斗一日一夜,未能攻克,睢县日军 40 余人来援,与我们打援部队进行了激烈战斗。最后敌人还是进到长岗北门,将张心顺的部队接走了。至此,睢县以南大的据点已不复存在。

随后,我团进一步深入孟伪老巢榆厢铺,包围歼灭了伪五区孟昭章(孟昭华的二弟)以下 200 余人,一个月的功夫将孟昭华这个大汉奸的武装消灭将近一半。他们的丧钟越敲越响了。

睢县的伪军受到沉重打击之后,我们抗日县政府很快扩大了 6 个区。县大队也健全起来了,这时大约有 300 人。另外,还有区队。接着,我们在太康北五集的南边包围、全歼了从太康出来抢粮的伪保安团马忠诚部,俘获其团长以下 200 余人,缴获大批物资,开辟了太康县以北地区。

1944 年秋季,地委指示我率领独立团三大队去开辟淮(阳)太

(康)西(华)地区,建立县政府,成立县、区武装。我去了1个多月的时间,打了齐老家的地主武装和东夏亭的土匪部队。很快建立了县大队,成立了100多人的武装;抗日县政府也建立了。我把3个连队留下,继续巩固扩大淮太西地区,带着一个连,于1944年10月返回睢杞太中心区。我带着二连从太康南马厂过新黄河向北走,和团部联系上后,我当天就住在吴庄。这天我正带着部队出操,忽然得到报告,从商丘出动的鬼子小池骑兵联队约有500来匹马已到龙曲。我立即和孙参谋长商量一下,让他赶紧通知团直迅速向西南转移,我带二连进行掩护。战斗打响后,我们迫使敌人展开队形。敌人用大部分兵力向吴庄西南迂回,用少部分兵力向北牵制我们。我们打了一阵,即向西北撤退;到板木后,又折向西南庄林,这时侦察员报告说:“听到了敌人的马叫”。我立即将连队集合起来转移到河套柳树林里去了。敌人骑兵当夜住在高贤集,第二天到了太康。二大队留下的3个连由刘影和罗凤岐带领。由于思想麻痹,遭到小池骑兵联防队的袭击,损失1个连,3个连长均壮烈牺牲。听到此信后,分区余司令和我立即返回淮太西,将打散的部队收集起来,回到河套里,夜间又在太康西被伪专员郭馨波的部队所包围。我带着二连突破包围圈。第二天才回到了中心区。不久,刘影同志被送华北学习。接着我和分区袁政委,还有毛存林同志一起去华北开练兵会议两个多月。在这期间,孙子植参谋长率二大队在白庙活动时,被鬼子、汉奸偷袭,损失近百名人员。苗县长负伤,县大队的赵教导员被俘。我从华北回来时已是1944年12月份了。

七、从组建三十团到日寇投降

1945年1月,中央军委指示:“水东分区应以睢县、杞县、太康、通许为重点,肃清淮阳、西华地区之日、伪军和土、顽、杂,控制新黄河渡口,渡河开辟水西,向商水、上蔡地区及其以南发展。”

冀鲁豫分局为执行中央指示,并打通和新四军五师的联系,于

1945年1月派冀鲁豫军区的老八团(后改为二十八团)南下进入我区。首先在睢县南第二次消灭了河堤岭孟昭炳重建的伪区队二、三百人。然后进入河套,与我三十团会合。这时两个团约2000多人,很快发展了水东地区的大好局面。

1945年3月6日,接到命令,成立冀鲁豫军区第十二军分区(抗日胜利后改为六分区),并组建三十团,上级命我任三十团团长,苗丕一同志任政委,白健同志任政治处主任。下辖三个营。一大队编为一营,营长柴鸿泉,教导员史煌;二大队编为二营,营长贺永源,教导员苏桐卿;三大队编为三营,营长韩任勇(后换曹宗),教导员杨夹生,团部直属有侦察连、警卫连,机关设3个处(参谋处、政治处、后勤处),部队正式番号为“冀鲁豫军区三十团”,属冀鲁豫军区建制,归十二分区领导。

1945年5月,我带两个营,在睢县南竹柳和张岚峰部宋团打了一仗,打死他两个营长,歼敌近百人。

不久,我军继续西进,推进到河西的鄆陵、扶沟、西华一带。国民党为了阻止我军继续发展,就派中将张公达、少将耿明轩率领“泛东挺进军”及其所属第五纵队2000多人进入河套,妄图挡住我们。我分区决定集中老八团、三十团,再加上特务营约3000人,消灭这股敌人。于是在岗子叶寨周围我部将这股敌人全部包围起来。经过两昼夜激战,终于将其全部歼灭。活捉中将总指挥张公达,少将纵队司令耿明轩,少将参议杨××,顽专员兼太康县长郭馨波。缴获电台5部及其全部武器。老八团乘胜向南推进到周口、上蔡一带,准备和新四军五师打通联系,不久,华中又派王法祥率领一游击支队进入河西,开辟这一地区。

在三十团西去时,我带四连和一个侦察班留在睢县坚持,并于1945年麦收前趁机消灭了睢县南草寺庙之敌。

为适应豫东及豫东南的大好形势,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十二分区,上级又派冀鲁豫中央分局党校警卫团进入水东地区(后改为二

十九团),由分区余克勤司令员统一指挥。该团和三十团配合,打了住在阳固西北(兰封县境内)马集的顽第二专区的薛汝梅、张之谦、汤变生部约六、七百人,除零星突围跑了一点外,其余全部被歼,俘虏三、四百人,还缴获五挺机枪。然后,三十团又配合二十九团在通许东南欧阳岗歼灭了伪和平救国军六十三师侯殿卿部 700 余人。二十九团负责打援,阻击通许县城日本鬼子的援兵。我三十团包围六十三师,打了一天一夜,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迫使敌人全部投降。二十九团则将日本鬼子,增援部队九辆汽车,100 多人给以沉重打击,击毙鬼子 30 多名,并俘虏 6 名,迫使鬼子逃回通许县城。

经过我军英勇奋战,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后,杞县、通许边区除四所楼还有一些伪军外,鬼子全部撤走。我们的活动地区逐渐扩大。在通许西北,陈留以南又建立一个区。

日寇投降以前,我区已逐步扩大为十县:即杞南、杞通、睢宁、睢县、宁柘、太康、淮太西、扶太西等。过去经常被鬼子扫荡、骚扰的我十二分区中心区,此时已大为巩固,部队也能安安静静在一个地方住,不用经常转移了。于是,分区又命令二十九团和杞县县大队立即渡过新黄河进入河西,开辟西华、扶沟、鄢陵、许昌、尉氏等新的地区。

八、从日寇投降到第一次反“反围剿”

1945 年 8 月,日寇投降。党中央号召我军向敌人实施包围、进攻,准备受降。国民党顽固派却命令广大抗日军民就地待命。我们不听蒋介石的胡言乱语,迅速地向中心城市和交通线逼近。冀鲁豫分局为了贯彻执行中央指示,迅速成立了豫东指挥部,由段君毅同志率十五团进入陇海道南,并命令三十团准备进军开封,接受日军投降。后奉命改变计划,首先打了杞县,后又打下通许,最后又集中两团主力(十五团和三十团)围歼了太康郭馨波伪顽合流的杂牌部队 500 人(除一小部分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消灭)。

正在我们乘胜打击敌人，迅速扩大水东根据地的时候，国民党也乘机抢夺胜利果实来了。六十八军刘汝珍部和河南省保安团，及一些土、顽、杂、匪，还有原伪和平救国军第四方面军张岚峰部，一齐向河西、水东发动了全面进攻，要向我军收复“失地”。

我军根据中央的指示：“和敌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决定用战斗来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我分区为集中主力打击来犯之敌，立即将去河西的廿九团撤回水东。廿八团由于敌人封锁了黄河渡口，和国民党大军压境，未能撤回，即转向南与新四军五师靠拢了。廿九团返回水东，与分区和三十团会合后，在十二分区余克勤司令和袁振政委率领下，开始了保卫水东胜利果实的战斗（豫东指挥部为执行新的任务，率领十五团返回了冀鲁豫中心区）。进行了日寇投降后的第一次反“围剿”。

国民党六十八军刘汝珍部，越过新黄河，首先占领了太康，然后分兵三路，先后占领了杞县、睢县、民权等县城，完成了对水东“围剿”的部署。接着即集中了伪顽合流的土杂武装和省保安团及张岚峰的全部力量，进一步伸向我中心区，占领各大集镇，大规模地对我实行“围剿”。本来我军为了有效地进行反“围剿”，曾决定避开敌人的锋芒，然后找机会打击敌人，但因为缺乏和国民党正规军作战的经验，对国民党认识不足，再加上政治工作未及时跟上，因此起初人心较乱。另外，当时是坚持或撤离水东，领导上思想也不够明确。所以敌人大军一压境，一些应留下坚持的部队也撤出了自己的地区，跑到河套里去了。

后来军区来了命令：要坚决打击和牵制向北进犯的一切敌人，以减轻对华北的压力。于是分区决定，我们要集中全力坚持水东的斗争，不惜一切代价与敌周旋。能够拖住敌人就是胜利。分区领导召开了党委会，明确了形势和任务，统一了干部思想，这才开始扭转整个水东的局面。

为了更好地保卫胜利果实，我们对部队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

克服了许多人认为“抗战胜利,应该回家”的思想,让大家充分认识到国民党的凶恶本质;真正认识到,要想过好日子,光抗战胜利还不行,还必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只有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才能回家过安生日子,否则,抗战胜利的果实将被蒋介石匪帮劫走,人民就得重新受苦受罪。经过反复教育,广大干部、战士提高了认识。军心才算稳定下来。

为了粉碎敌人对我区的大规模的进攻,我们决定首先消灭杞县南赵村驻扎的敌六十八军一一九师三五五团(一说三三六团)。我廿九团、三十团和特务营由杞北向杞南远距离奔袭该敌。但走至李店集时,侦察员得到消息,该团有一个营(二营)白天出来抢掠,没有回赵村,住到了马庄寨。马庄寨没有工事设施,比较好打。于是,我们请示分区,决定先打马庄寨,并首战获胜,歼敌一个营部和其他各连共约 200 余人。

马庄寨战斗的胜利,对全区影响很大,大大扭转了水东地区部队和群众的沮丧情绪,增强了广大军民和国民党正规军作战的信心。认为敌人虽然多、武器装备虽然好,但也是可以被打败的。许多跑回家的战士,有的又回到了部队。不久,经过全区军民的英勇奋斗,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就被粉碎了。

1945 年 10 月,虽然已签订“双十协定”,但敌人仍不断地向根据地进犯袭扰。到 1946 年夏天,敌人又对我进行了第二次“围剿”。我水东地区进入解放战争时期。

水东抗战

余克勤^①

编者按：该文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回忆了当年冀鲁豫军区水东军分区（后改为十二分区）指战员，鏖战豫东，消灭日伪军的几个战斗片断。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总题下的六个小标题，是作者写的六篇回忆录，为阅读方便，我们将其合成一篇，文字略有删节。

首战告捷

1944年6月底，我南下大队肩负着中央和冀鲁豫首长的重托，离开了鲁西南的白茅集。7月1日从兰封（现为兰考）、内黄之间越过陇海路，进入水东地区，在杞县北部的崔林与前来迎接我们的水东地方党政领导和地方部队会合，水东的敌人就惊恐万分，驻防民权的伪保安大队当即组织了300多人的“敢死队”（也叫“飞勇队”）赶奔杨城，抓兵拉夫，构筑工事，修建据点，企图阻我南下大队向水东挺进，断我水东与华北的联系。

杨城属于民权，是位于杞县东北与民权西南交界处的一个大寨子，四周有围墙，正北靠寨墙是一座四合院，大院南墙掏有射孔，街道口设有鹿寨，内挖有防护沟。敌人派少数部队在寨外警戒，主力部署在四合院及其周围的主要建筑物内，四合院是敌人固守的核心阵地。杨城敌人的动向和兵力部署，都被我侦察得一清二楚，

^① 余克勤，当时在冀鲁豫军区，任水东独立团团长和水东分区、十二分区司令员，离休前任洛阳步兵学校校长。

决心全歼该敌，扫清我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给水东人民一个“见面礼”。我南下大队指战员精神大振，几天的行军疲劳一扫而光，同志们个个摩拳擦掌，挥臂请战，争要艰巨任务，迅速作好战斗准备，整装待发。

7月2日上午10时许，部队从杞北的崔林出发，跑步向杨城接近（崔林距杨城约15华里），11时许，部队便按预定部署将杨城之敌四面包围起来。战斗一打响，我各连的勇士们，便利用房室、街道、寨墙等有利地形，勇猛地向敌人冲击。守敌凭借预先设防的工事死守顽抗，我各连战士毫无畏惧，前仆后继，英勇杀敌，一条街、一座房地同敌人争夺；我连、排指挥员，个个身先士卒，一面指挥，一面冲杀，我攻击部队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当我一连突破南门，向北逼近时，二连各排已突破敌人设置的鹿寨、壕沟等防线，正压向敌人的核心防御阵地——四合院，水东一连也占领了敌人的炮楼，控制了两翼。守敌见势不妙，企图突围逃跑，他们组织了百余人的“敢死队”向我发起反冲击，在我猛烈火力打击下，突围之敌全部被歼，寨内固守的敌人，见突围无望，便依托四合院这一核心阵地拚死顽抗。我一、二连的同志们乘胜组织了几次攻击，均未奏效，担任突击任务的我一连三班、四班的同志们接连伤亡，激起了我指战员对敌人的无比仇恨，战士们为牺牲的战友报仇的心情象烈火一样，奋不顾身地向顽敌冲去，在火力掩护下，迅速机智地接近四合院。我三连一排越过围墙，爬上房顶，向院内、屋内之敌猛甩手榴弹，集中火力射击，守敌无处躲藏，弃枪四处逃窜。这时，我一、二班也压向四合院，前后经6小时激战，守敌全部被歼。伪保安大队长贾宪德、中队长杨凡伍等均被我活捉。这一仗，缴获轻机枪两挺，小炮两门，手枪30余支，步枪300多支，根据毛主席“武装群众”的教导，我们将缴获的全部武器，交给了杞北的党组织，他们用这些武器，很快建立了杞北大队，担负起了保卫杞北、保卫华北通向华中通道的重要任务。

杨城首战告捷，给了水东人民一个“见面礼”，人民欢欣鼓舞，敌人闻风丧胆，我军士气大增。揭开了水东地区抗日战争反攻阶段的序幕。

战斗结束后，我南下大队即向杞南挺进，沿途敌伪顽军，畏我打击，不敢向我袭扰，7月4日，我们便顺利到达杞南，与坚持在水东地区斗争的党、政、军同志们会合，开始了扩大水东根据地的斗争。

再战再胜

1944年7月4日，我南下大队到达杞南和坚持在这里斗争的“水东独立团”胜利会合。为了鼓舞士气，我们举行了联欢庆祝会。会后部队稍作休息，便进行整编扩建。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便于我军歼灭敌人，整编后的部队，仍用“水东独立团”的番号。团长余克勤，政委袁振，副团长王广文，副政委李中一，参谋长陈子西，政治处主任苗丕一。下辖3个大队，另外还领导指挥6个县大队。这3个大队是：一大队，由南下大队编成，二大队，由原水东独立团编成，三大队，由杞通大队（原独立二营）编成，团直有一个特务连。机关设有参谋处、政治处、供应处和卫生所（这些也是筹备中的分区机关）。6个县大队是：芝圃、克威、达生、庆华、淮太、睢县。经过整编扩建后的“水东独立团”，由于南下大队的编入，质量更高，战斗力更强。在杨城胜仗的鼓舞下，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大振，全团指战员，都想在扩大水东根据地的斗争中，大显身手，杀敌立功。

我们选准了距我最近，对我威胁最大的长岗之敌为攻击目标。长岗，是睢县的一个大村镇，靠近杞、太边界，是睢县西南的门户。这里由伪军孟昭华部把守着，包括伪区长张心顺在内，兵力约200余人。孟昭华是睢县伪军头子，他效忠日军，推行反动政策，因此睢县被日伪军树为“豫东模范县”，在日寇支持下，孟昭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百姓恨之入骨。长岗就是孟昭华设在睢县西南的一个核

心据点。日军凭借这个据点，不断向我睢杞太中心区蚕食。当时正是小麦刚收罢不久，遭受 1943 年“水、旱、蝗、汤”之害和日伪洗劫之苦的睢、杞、太边的群众还没有来得及吃一顿饱饭，刚收到家的粮食就被日军抢劫一空。为了保证我中心区，保卫麦收，拔掉敌人据点，夺回被抢走的粮食，我们研究决定，先打长岗之敌，给睢县敌人一个武力警告！

战斗打响后，睢县伪军头子孟昭华急令骑兵连救援。我伏击部队突然开火，敌人猝不及防，人仰马翻，鬼哭狼嚎，乱作一团，四处逃窜。我一大队，首先突破东门，一部乘势向东南角的仓库攻击，其余同敌人逐屋、逐街地争夺，战斗打得十分激烈。

次日下午 4 时许，日本鬼子也来救援，一部分敌人在日军接应下逃跑，其余敌人全部被歼。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缴枪百余支，轻机枪 1 挺，掷弹筒 2 个，击毙日军 7 名，缴获粮食数万斤，军马数匹。我们用这些马匹组建了一个骑兵排。

长岗战斗获胜，拔除了睢县西南的伪军据点，扩大了根据地，夺回了被敌人抢走的粮食，一部运回中心区，解决部队的吃粮，减轻人民的负担，其余全部就地分给生活困难的农民。群众感激地说：“八路军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

打下长岗，我们向敌人发出警告，谁胆敢再向我根据地进犯，定叫他有来无回！谁敢再继续作恶，我们就首先把谁消灭！

这一仗的胜利，再显了我军的军威，八路军、新四军在水东人民的心目中，地位更高了，为了消灭敌人，保卫家乡，保卫水东，扩大抗日根据地，青壮年纷纷参军入伍，部队迅速得到补充，在地方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组织领导下，群众很快掀起了生产、支前的高潮。

生擒孟昭炳

长岗战斗后，睢县的伪军头子孟昭华，听到我们的警告害怕

了，他一方面令睢县的伪军各据点加强防守；另一方面又不甘心示弱，急令他的三弟孟昭炳带一个大队，拉十几大马车的地雷和手榴弹，加强对他的核心据点河堤岭的防守。

河堤岭，是睢县东南部的一个大集镇，它座落在睢县柘城公路上，是睢县东南的重要门户。守住这里，既能保住县城的安全，又可东袭宁陵，南犯柘城、太康，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孟昭炳来到后，各据点的敌人对我中心区不断袭扰。

我水东独立团的同志们，看到孟昭华猖狂活动，非常气愤，都说：“我们八路军说话是算数的！”强烈要求攻打河堤岭，再给孟昭华一个武力警告。

我们分析攻打河堤岭，孟昭华不会坐视不管，因为这个据点对他来说很重要，又是他亲弟孟昭炳防守，孟昭炳又最得母亲疼爱，他势必来援，我们可以一举活捉。

为了达到这一战斗目的，我们决定“围点打援”。令二大队一部在白庙东南靠近公路的荣楼附近设伏，其余部队四面包围河堤岭，并施以佯攻，以引蛇出洞。

1944年8月14日（农历6月26日）拂晓，部队按预定部署占领了阵地，我军对河堤岭开始了佯攻。在双方手榴弹的引爆下，伪军的地雷纷纷起爆，顿时，浓烟四起，火花四溅，弹片横飞……。

到了太阳快要正午的时候，敌人从白庙方向来了。我伏击部队急于歼敌，未等敌人进入伏击圈，抢先打响出击，敌见势不妙，回头就跑，结果我只吃掉敌人一个排，其余全跑了。从俘虏口中得知，孟昭华头天就到商丘去了，没有回来。

援兵被我击溃，孟昭华未来，我们只好一心收拾孟昭炳。

在正式强攻以前，我们首先对孟昭炳开展政治攻势，宣传我们的政策。告诉他，你们的援兵已被我击溃。你现在四面被围，完全孤立，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放下武器，缴械投降，可以放你们回去；二是拒绝投降，负隅顽抗，死路一条。

我们包围河堤岭后，没有切断敌人电话线路，目的是叫他们向孟昭华求援。我们知道，孟昭炳是他妈最疼爱的儿子，就紧紧抓住这一点开展政治攻势，问他，你有什么话要对你妈讲吗？他说：没有啥说的。孟昭炳不知我们的厉害。他认为，他们的兵力多，武器装备好，工事坚固，特别是他驻守的大庙核心阵地，可称得上“固若金汤”，光靠步枪手榴弹是难于攻破的。他气焰嚣张地说：来吧！你们来打吧！

政治攻势他不接受，只好强攻。我们一声令下，围攻部队一齐向河堤岭攻击，经过逐屋、逐院、逐街地冲杀争夺，把敌人压向了大庙核心阵地。这里有座二层楼，是孟昭炳的指挥所，并有机枪射孔，庙内连同孟昭炳的老婆在内，有五六百人防守，周围布满了地雷。在我们强攻大庙的时候，南门只用机枪封锁。这里确实难攻，由于敌人火力封锁甚严，几次冲击都不能奏效。战士们急中生智，为了减少伤亡，顶方桌，盖湿被，顽强地向敌人冲击。在部队攻击最困难的时候，我命令仅有的一门迫击炮架在孟昭炳指挥所的西北角方向一个墙头上，一炮便从孟昭炳住的楼下西山墙穿过，东山墙爆炸，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敌人惊恐乱叫：“八路军有大炮！”顿时乱作一团，纷纷向南门突围逃命。他们哪里知道，我轻机枪对准南门“发言”了，随着机枪连射的“答答”声，敌人一个个应声而倒，孟昭炳的老婆被打死，孟昭炳也受了伤。在我军喊杀声的震撼之下，敌人纷纷举手投降。

孟昭炳被我们生擒了。当战士们把他带到我面前的时候，他血流满面，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我问他：你是想死，还是想活？想死，马上就可要你的命，想活，答应我们两上条件。”他哀求说：“只要饶我一命，什么条件我都答应。”我看他是要活命，就对他说：“你哥孟昭华很坏。蚕食我中心区，封锁断绝我药品来源，你看怎么办？”他立即表示，只要让他的勤务兵回去找他妈，要什么药品都可以如数送来。当时我们就让卫生员给他上药治疗。我们抱着试试看的态

度答应了他的要求。结果第二天他妈果然按我们的要求派人把药物送到了我们指定的地点。我们看他可以利用，便向他提出两个条件：一、从现在起，睢县护城堤以外的地方属我们，不准你们再出来袭扰；二、不准你们再到处抢粮抓人。这两条他一一答应照办。

在我们审问孟昭炳的时候，同时把其他俘虏也集中起来进行教育，宣讲了我党和我军的抗日主张，宣传了我们的俘虏政策。指出他们是被迫当伪军的，只要放下武器，不再作恶，就可得到宽大处理。同时宣布：你们可以把你们死伤的人运回县城。我们按照快打、快放、快撤的原则，在孟昭炳答应了条件，签了字之后，立即派侦察排长以余司令副官身份，带8名民工用担架把孟昭炳抬到县城，交给了他的母亲。孟一见到他妈，便讲了我们保他性命的条件。他妈除完全接受我们的条件外，还当着我们的面骂孟昭华。我侦察排长顺势以方便“看望”孟昭炳为由，向他妈要了一个出入敌占区的通行证。这样，便打通了进入敌区，筹济药品，搜集情报的通路。

我们打下河堤岭后，群众对我军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赞不绝口。他们编了一个顺口溜：

八路军，点子多，
头顶上，顶方桌。
方桌上，搭被窝，
被窝上，把水泼。
不怕死，往前挪，
吓得敌人打哆嗦！

河堤岭战斗，既是军事仗，又是政治仗，不仅消灭了敌人，拔除了据点，巩固了中心区，扩大了解放区，又打通了进入敌人营垒的道路。经长岗、河堤岭等战斗的打击，孟昭华不敢再嚣张。我们在县南大片地区又建立了6个区的抗日民主政府。县大队、区小队也随之武装、组建起来，水东根据地扩大了。

从南下大队进水东，到河堤岭战斗结束，仅仅一个半月时间。

我们转战数百里,连续打了杨城、长岗、河堤岭3个胜仗。这是我军发扬了“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连续打几仗)的作风”,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叶寨歼灭战

1944年8月,睢县河堤岭战斗结束后,附近各县的敌人,知道我们的方针是“拣最坏的打”,纷纷撤离靠近我中心区的据点,龟缩县城,不敢出来。解放区扩大了。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除一方面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外,主力部队则转战于睢(县)、杞(县)、太(康)中心区的边沿地带,继续开辟新的解放区。

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1945年1月,我们正式宣布冀鲁豫军区第十二分区(亦即水东分区)成立。^① 司令员余克勤、政委袁振、副政委李中一、参谋长陈子植,原水东独立团机关成为分区领导机关。

我们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军队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的教导,除了组织所属部队保卫解放区,扩大根据地外,主要力量放在帮助地方党加强根据地建设的工作上。经过不长时间的努力,就建立健全了杞南县、杞北县、杞通县、庆华县和睢县等抗日民主政府。并用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扩大了地方武装。我们将保卫县政权,巩固根据地的工作交给了地方武装部队。我主力部队,继续扩大解放区,开辟水西,向南发展。

1945年1月,中央军委发来关于“水东分区,应以睢县、杞县、太康、通许为基点,肃清淮阳、西华地区之日、伪军和土、杂、顽,控制新黄河渡口,渡河开辟水西,向商水、上蔡地区及其以南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认为这个指示非常及时,极为重要,它是打通我水

^① 编者注:据《冀鲁豫日报》1945年4月2日报导,十二分区成立于3月6日。

东地区与新四军五师的联系；沟通我华北和华中两大根据地交通的战略决策。为了保证中央军委这一指示的贯彻执行，我冀鲁豫军区首长又派出二十八团（原八分区八团），于元月底进入我区与我三十团配合作战，加强了我水东分区的作战力量。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我八路军、新四军遵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削弱敌寇，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指示，开展了更大规模地反攻作战。一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国民党，看到抗日战争将要胜利，急令他的反动军队，抢夺地盘，放着日本鬼子不打，极力阻扰我军向日、伪军的进攻。

正当我分区部队，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准备向南发展的时候，国民党“泛东挺进军豫东剿共总指挥部”在中将总指挥张公达的策划组织下，依仗自己的第五纵队，联合当地的日、伪军队，在河南省太康西南部的逊母口、姜庄、白庄、叶岗、叶寨等地一线设防。企图阻止我向南发展，并伺机围剿我水东根据地。

针对一这情况，我们决心集中兵力，歼灭该敌，扫除开辟水西，向南发展的障碍；进一步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条件。几个月没有打大仗的我三十团指战员，早就急得手发痒了。他们几乎天天向我们请战。二十八团虽刚到我区，但他们从干部到战士都想在新的地区的战斗中显示一下军威，天天向我们请战。

1945年2月19日（正月初六）夜，我们的部队按预定部署，从数十里地以外，连夜奔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叶寨敌指挥机关压来。20日拂晓完成了对叶寨的四面包围。敌人成瓮中之鳖。

天亮之后，我到第一线察看了情况，下令强攻。我三十团一营在火力掩护下首先从北门打响。接着我二十八团也从西门开始攻击。各攻击部队先后同敌人展开巷战。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四处作响。战斗打得非常激烈。经过反复的逐屋、逐院的冲杀争夺，我二十八团终于突到了敌人指挥部所在的地主大院跟前。与此同

时,我三十团也攻入北门,并一举夺取了敌人的电台,切断了同外边的联系。我军的包围圈已紧缩到敌指挥部所在的大院周围。这所大院,座北朝南,有东、中、西三座楼房,都筑有枪眼,是敌人的核心阵地。面对敌人机枪火力的猛烈射击,我们的干部战士毫无惧色,一个个象猛虎一样,争先恐后地往上爬。战士们占领西楼居高临下,猛投手榴弹,扔瓦片,顺势冲入院内,活捉敌“豫东剿共总指挥”张公达。盘据东楼的敌五纵队司令耿明轩和伪专员兼太康县长郭馨波还正凭借有利阵地进行顽抗。为减少伤亡,决定先对其开展政治攻势,并叫张公达向其喊话、劝降。在兵临城下,战则亡的情况下,耿明轩等顽敌举手投降。

叶寨战斗历时二十六、七个小时,歼敌 1600 余人,缴获全部武器装备。其中有电台 5 部。活捉敌中将总指挥张公达、少将纵队司令耿明轩、少将参议杨昌杰 3 个将官。并俘伪专员兼太康县长郭馨波等以下数名军官。

这一战斗的胜利,扫清了我军西渡黄河,开辟水西,向南发展的道路;打通了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交通;新开辟了扶太西(扶沟、太康、西华三县交界地区)、淮太西(淮阳、太康、西华三县交界地区)两个县的解放区。扩大了我水东根据地,为尔后向南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当时,就任我“扶太西”第一任县长的孙卫和同志高兴地唱道:“二月里来春风吹,我军南下大示威,河套里边打一仗,消灭坏蛋五纵队。缴大炮,得电台,活捉顽匪总指挥。”

重克欧阳岗 全歼日寇中队

1945 年 2 月,叶寨战斗胜利,3 月初,我军在杞县召开了庆捷大会。

根据地军民对我军的重大胜利,无不欢欣鼓舞,纷纷表示决心,要用实际行动,努力生产,支援前线;积极歼灭敌人,扩大根据

地；保卫中心区，建设抗日民主政府。在我区部队的帮助下，相继成立了扶太西、淮太西（淮阳、太康、西华三县交界地区）两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并召开了庆祝会，扶太西新任县长是孙卫和，他写诗记述庆祝会的盛况：“三月里来，一十五，成立抗日新政府。逊母口来开大会，扶太西县大庆祝。送贺帐，敲锣鼓，群众纵情秧歌舞，从此抗日又民主。”

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解放区一片生机，迅速组织群众，生产自救，重建家园，万人出动，打堤筑坝，开荒种地，支前抗敌。孙卫和县长亲临指挥，与民同干，并赋《打堤诗》：“前方夺胜利，后方快打堤，开荒又生产，建设扶太西。”

在建设新区的同时，我三十团如期控制了尉氏吕潭以东，淮阳以北大片地区，开辟了通向水西的道路。

1945年5月14日，二十八团在我三十团的掩护下，由吕潭附近的新黄河渡口，出敌不意地渡过黄河，一举攻克扶沟县城。接着向水西挺进，开辟新区。我三十团仍留水东，在扶太西地区，积极开展军事行动，保卫新解放区。

我们送走二十八团不久，冀鲁豫军区首长又派二十九团（代号120部队），于6月10日进入我区。在我们统一指挥下，二十九团同我三十团一起，在水东地区作战，保卫解放区，策应二十八团在水西的军事行动。

1945年5月8日，法西斯德国被迫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虽已山穷水尽，但仍然进行垂死挣扎。日寇企图在夏收之际，组织扫荡，抢夺粮食，以供军需。

6月中旬，河南省伪保安联队头子候殿卿派600余人，首先出动。他们占领了以通许县东南部的大集镇欧阳岗，企图以此为基地，四处扫荡，抢掠夏粮。欧阳岗，地处杞通（杞县、通许）公路南侧。敌人砍树木，扒民房，修工事，筑碉堡，挖壕沟，设鹿寨。群众恨之入骨。

我区军民早有警惕。部队处于临战状态，枕戈待旦。我们考虑，欧阳岗之敌是日寇直接派遣，靠近我中心区，对我威胁最大。我们决心攻打欧阳岗。吸引开封、通许的日军来援，这是“围点打援”歼灭日、伪军的好时机。根据这个决心，我们把围攻欧阳岗的任务交给了三十团。把设伏打援的任务，交给二十九团和分区、专署两个警卫连担任。分区警卫连和专署警卫连，是两个齐装满员连队，装备好，战斗力强。我们有意让他们在同强敌的交战中得以锻炼。根据这个意图，设伏区兵力部署是：将专署警卫连放在杞通公路北侧的李庄，担任迎头阻击任务。分区警卫连放在公路南侧的李芳华庄占领阵地，担任拦腰攻击的任务，二十九团（120 部队）的 3 个连，分别占领公路两侧的老庄、大安庄、前塔湾，担任扎紧袋嘴，断敌退路的任务，这个设伏部署，是以杞通公路为轴线，形成了纵长约 400 米，横宽约 130 米的口袋阵。只要敌人钻进来，就休想出去。

1945 年 7 月 1 日夜，我军按预定部署，趁夜进入各自的阵地。三十团完成了对欧阳岗之敌的四面包围，午夜发起攻击。但因敌人工事坚固，防守严密，火力猛烈，我几次攻击均未奏效。突进去的一个班壮烈牺牲。天亮后，我军重新调整了力量。在我火力掩护下，战士们猛打猛攻，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寨墙防线。守敌不得不退守小寨核心阵地。固守待援。

不出我之所料。2 日上午 10 时许，驻通许县城的日军，以一个中队的兵力急驰救援。他们分乘 5 辆汽车，急速向欧阳岗驶来。公路上尘土飞扬，马达隆隆。我伏击部队顿时精神振奋。战士们目不转睛地盯住尘土飞扬的方向紧握钢枪，严阵以待。随着敌人马达声临近，他们刀出鞘，弹上膛，拧开了手榴弹盖，作好了歼敌的准备。

敌人钻入“口袋”了。当日军第一辆车开近我专署警卫连时，指挥员一声令下，全连突然开火。鬼子惊呆了。就在这时，我分区警卫连的机枪排开火了。轻重两挺机枪，是我们从日军手里缴来的，火力猛，是当时的先进武器。老机枪射手孟继喜同志，迅速瞄准头

一辆汽车,几个点射,就把敌车油箱打着了。接着又打坏了第二辆车。我二十九团的同志们这时也扎死了口袋嘴。日军进不能进,退不能退,乱成一团,便象疯狗一样,纷纷跳下汽车,向李芳华庄扑来,企图抢占这个村庄。我分区警卫连先以火力射击,日军虽遭伤亡,但因兽犹斗,拼死地向警卫连冲来。在双方子弹所剩无几的情况下,我警卫连战士象猛虎一样,向敌人扑去。在庄北面的高粱地里,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与此同时,我二十九团的一部,也从西南方向压了过来,在李芳华庄西北角坟地里,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经过几个小时的拼杀,80余名日军除3名被生俘外,全被我击毙。日寇中队长加木也未能生还。我英雄的八路军战士为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血洒战场。在他们倒下去的时候,还手握钢枪,瞪着双眼。情景十分感人。这些英雄形象,在我的印象中至今历历在目。

来援的日军被歼,伪军也被我击溃,欧阳岗之敌成了瓮中之鳖。在我强大政治攻势下,由伪保安联队参谋长韩清云首先出示白旗,宣告投降,接着欧阳岗之敌全部缴械。

欧阳岗“围点打援”战斗,历时30多个小时,完全按预定计划获得胜利。共击毙日寇中队长加木以下80余名;生擒谷川副班长以下3名日军;俘虏伪保安联队副司令马子万、参谋长韩清云以下官兵600余人;缴获汽车3辆(已烧毁);打坏汽车两部;缴获轻机枪9挺,步、马枪629支和许多军用物资。

欧阳岗战斗的胜利,对我水东地区的形势影响极大。人民欢欣鼓舞,敌人闻风丧胆。这次战斗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保卫了解放区,保卫了麦收。同时,支持了二十八团在水西的斗争,为夺取抗日战争在河南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对于这一胜利,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告捷消息。7月27日,我《冀鲁豫日报》发表消息,醒目标题是:“水东八路军先机制敌,重克欧阳岗,歼敌80人,毁汽车5辆,俘日伪军600余。”我水东军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胜利之本

1944年7月到1945年9月,我们在水东地区总共征战了14个月。在这期间,几乎是天天行军,月月打仗。据不完全统计,经我们组织指挥的大小战斗就有20余次,歼敌5500多人,缴获武器装备甚多。通过这些军事斗争,打开了局面,巩固了睢杞太中心区,扩大了根据地,帮助地方党建立了杞南、杞北、杞通、睢县、睢宁、宁柘、太康、淮太西、扶太西、河西等10个县政权;组建并装备起了各县的县大队和区小队;实现了消灭敌人,壮大自己,控制中原,沟通联系(华中与华北、陕北的联系;新四军四师与五师的联系)的战略任务。

总结胜利之本,我认为有五条:

第一,是党的领导和上级的支持。我们在水东转战期间,党中央、中央军委不断给我们指示,及时指明斗争方向。冀鲁豫军区首长不仅具体指导,而且还先后派出了二十八、二十九两个主力团进入水东,加强我们的作战力量,这是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二,是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我们在水东,始终坚持了毛泽东同志为我军规定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三项原则。根据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结合水东的实际,制订了我们自己的作战指导原则,所以无往而不胜。

第三,是人民的支援。人民是子弟兵的母亲,是人民军队的靠山,是我军战斗力的源泉。我们来到水东时,人民由于“水、旱、蝗、汤”四害和日、伪、顽、杂洗劫,生活极为困难,但是他们宁肯自己吃糠咽菜也全力保证子弟兵的吃穿。不仅如此,还担负担架、送伤号、养护伤号。许多父母把自己的儿子主动送往部队,满足了我们补充、扩编的需要。仅一年时间,水东就由近千人的武装发展到8千余人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而且越战越强。这是水东人民无私支

援的结果。

第四,是军内外的坚强团结。我们在水东时,无论是军内还是军外,无论是困难时期还是胜利时刻,无论是本地干部还是外地干部,都非常团结。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心眼,就是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我们就是靠军内外的坚强团结才胜利的。

第五,是指战士们们的英勇作战。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过:“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我水东分区的部队就是这样的一支英雄部队。长期转战在水东的三十团,为开辟和巩固水东根据地立了大功。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团,为扩大水东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各县大队、区小队在保卫解放区,建设根据地的斗争中也建立了自己的功绩。许多同志为解放水东,保卫水东而英勇牺牲了。没有他们的英勇作战,甘洒鲜血于水东,取得这样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胜利是指战士们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代表我们这些幸存者,向为开辟水东革命根据地而壮烈牺牲的同志们表示深切的悼念,向他们的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和感谢。

以上这几条,集中到一点就是:依靠群众、相信党,路线、政策记心上,团结一致齐奋斗,革命目标定实现。战争年代是这样,现在搞四化建设也是这样。“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一定胜利。”

(卢文星整理)。

关于水东地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回忆(节选)

杨宏猷

1938年5、6月,豫东相继沦陷,我党在睢杞太地区开始组建抗日武装,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力量,在诞生的头三年里,只知道扩大队伍打仗,不知道建立抗日政权,也不知道改造利用旧政权为抗日服务。筹集部队粮款是依靠个人捐献、缉私和向富户募捐,部队基本上不供给,伙食全是吃派饭,穿衣靠自己,没有优抗制度,烈军工属家庭困难不能解决,群众的各种疾苦也无法解决等等。这是摆在抗日前进路上的大困难,不解决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这支队伍的扩大与巩固。

一、建立政权

1941年8、9月间,领导上确定建立水东联防办事处(以下简称联办),并定为专区一级的(灰色)政权,委任薛朴若同志为联防办事处主任(薛朴若同志当时化名为崔廷)。

联办建立之后,即着手建立联办警卫连,该连从1941年秋建立,到1942年春发展为五、六十人的连队。

1941年秋,虽然建立了联办,任命了主任,建立了警卫连,但未派科长一级干部到联办工作,在我们中心区也未建立县、区(灰色)政权,而只有一个警卫连在各地活动,与其他地方武装同样,只是一个小武装单位,并未担当实质性政权工作,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1942年6月。

1942年6月,根据地委决定,建立杞南、杞通、杞北3个中心分会即(灰色)县政权,并任命李建光为杞南中心分会副主任,李良为杞通中心分会副主任,杨宏猷为杞北中心分会副主任。3个中心分会均无主任,工作由副主任全面负责。并同时命令这三个中心分会各建立3个分会,即(灰色)区级政权,杞南为一、二、三分会,杞通为四、五、六分会,杞北为七、八、九分会。各中心分会接到这个决定后,立即建立了中心分会的机关。如杞北先后任命魏超杰为武装科长,孔泽友为财政科长,甘文之为民运科长。并积极着手建立各分会,大约于7月9个分会都先后建立。专、县、区三级(灰色)政权机构开始形成。

联办在建设县、区(灰色)政权的同时,也开始进行本身的建设,大约于1942年夏秋之间先后任命张少耕为联办财政科长,侯杰为民运科长,刘影为武装科长,杨宏猷兼任教育科长。

1942年12月在唐克威同志的领导下,地委在杞南谷熟岗村召开工作会议,各县负责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除研究了反顽和对敌斗争,军事活动,建立根据地各项任务外,还认真讨论了政权工作。会议决定把中心分会改为办事处,并明确规定了办事处和分会的三重性,即:政权性;办事处和分会要把政权的各项任务负担起来;武装性;办事处和分会要领导县区地方武装;群众性;要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各项任务承担起来。为此,并要逐步建立、健全联办,办事处,分会的机构设置。

这次会议的决定,是水东政权建设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因为它不但明确了(灰色)政权的性质、任务,而且指出要设置相应的机构,更重要的是政权工作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列入议程,这对政权工作的开展、健全和充实起了极大作用。

联办、中心分会(后来的办事处)、分会在1942年建立之后,几年来先后主要干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发展地方武装

在中心分会辖区内水东领导上确定了一个独立营或一个大队为各中心分会的武装力量,但建立的9个分会则大部没有武装。因此,中心分会为开展地方工作必须抓紧筹建分会的武装。

领导确定分会的武装命名为某分会常备队,常备队的规模为中队(即连队级)。从1942年6月开始到1942年底,9个分会的常备队,都先后建立了起来,大的常备队有五、六十支枪,小的也有二、三十支枪,这就为开展地方政权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配备干部

1942年联办命令建立了3个中心分会和9个分会,并指定了3个中心分会的负责人,但中心分会机关是空的,大部分会尚无负责人,为开展地方工作,必须任命分会负责人,必须逐步建立和健全中心分会、分会的机构。为此,中心分会(办事处),选拔干部,任命了各分会主任。如:杞北之七分会主任,先为魏超群,后为韩致安,八分会主任先为宋省五,后为魏超杰,九分会主任先为王乐超后为周振科。中心分会(办事处)设立了武装科,财政科(科长孔泽友),民运科(科长甘文之),分会则相应配备了助理员,从1942年到1943年春,各级政权,在组织上比较健全了。

(三)放赈救灾

1942年冬和1943年春,水东地区灾荒严重,灾荒情况是杞南、杞通很重,杞北较轻,临杞通和国民党接触多的我南部、西部地区最重,往东北方向较轻,国民党力量大的地区和我区反顽时间长的地区重,而日伪统治区较轻,重灾的地区人被饿死1/3或1/10不等。这是因为我们中心区日本抢,汉奸抢,国民党抢,土匪也去抢,而当时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制止几种人的抢掠行径,所以灾情重,但在我中心区国民党去抢次数少些,而在和我们争夺的地区,国民党游杂部队经常出出进进,经常去抢,所以灾情更重。

日伪军、国民党游杂部队、土匪抢的粮食除吃一小部分之外,

其余粮食弄到哪里去了？余粮户因怕抢而卖的粮食哪里了？如果这些人抢的粮食、卖的粮食还是卖在当地，则水东灾荒决不会这样严重。那么，这些粮食那里去了呢？

当时日军了解到有灾荒，就采取大量收购粮食，大量倾销海洛因毒品的办法囤集粮食。国民党游杂部队的官兵、土匪、汉奸大量吸毒贩毒，这就中了日寇的奸计，中心区的粮食，不管是抢去了的还是卖掉的，经过各种渠道被日寇以毒品换走，囤集起来了，所有粮食一到日寇手中再也不能返回农村。

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我党决定了取给敌区的方针，各办事处和分会根据这个方针，每夜都派出小股部队深入敌后，征集粮食。我们征集的粮食除供给我们部队、机关食用，以减轻中心区负担外，并做以下两件事：一是抽出一部分粮食保证烈军属中困难户的补助，初步开展了拥军优属的工作；二是抽出一部分粮食给予中心区最困难户以救济；并在中心区各村埋上大锅放粥救济难民。由于这两项工作的开展，不仅为巩固和发展地方武装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而且使党和政府同人民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关系。

（四）征收抗日公粮

水东领导鉴于 1943 年大灾荒严重缺粮的教训，也鉴于各级政府已比较健全，因此在麦收前决定：从当年麦收后，即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征收抗日公粮的工作，部队要以全力打击敌伪顽对根据地的抢掠，而征粮的组织领导则全由各级政府来负责。

联办根据党的决定，立即召开了办事处主任会议，在会上作了下述决定：

1、征收抗日公粮，实行合理负担，确定免征点，按累进税征收制度。

对每口人只有 1 亩地的贫农免征公粮。1 亩以上，地少者少征，地多者多征。对每人只有 1 亩至 2 亩地农户，每亩征收粮 2 斤，而每人有 3 至 4 亩的农户，每亩地征公粮 4 斤，如果每人拥有 10

亩地,则每亩就征 15 斤或更多,以此类推,以达到对贫农不征粮,对中农少征粮,对地主,富农多征粮的目的。

2、鉴于抗日根据地遭受战争破坏极为严重,生产凋弊,也鉴于根据地要担负除公粮以外的各种勤务,因而对根据地要少征,对边沿地区要多征,并要尽最大努力向敌占区多征公粮,以达保障供给根据地人民以休养生息的目的。

3、鉴于敌占区运粮不便,可折价征款,在边沿区,也可征部分现款,以充实我政府财政。在根据地则应全部征粮,一般不予折款,以保证粮食供给。

凡征 1 斤粮,同时要征 2 斤柴,敌占区折款,中心区柴存各户备用。

4、经过讨论联办确定了全区征收数字,并把任务分配给办事处,夏季征购总任务我的印象是五、六百万斤(记得不准)。记得杞北分配的任务大约是一百七、八十万斤。

5、要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如干部会议、联保主任、保甲长会议,地方开明士绅会议,村民大会等,讲清征收抗日公粮的必要性和累进税法的意义,宣布各村各单位的任务数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号召大家积极交纳公粮,交好粮,并号召大家做好藏粮工作,防止敌人抢掠。

6、部队领导决定,在麦收之后,为阻止敌人到根据地抢粮,要以反抢粮为中心努力作战,办事处、分会,必须根据这一决定,领导县武装配合主力打击抢粮敌伪军,以保卫根据地人民利益。所以 1943 年及以后的军队作战,实际是抢粮与反抢粮的斗争。

根据联办上述部署,各办事处分会进行大量的工作,夏征任务于 7、8 月就胜利完成了。同年 10 月、11 月又进行了秋征。以后每年两次征收抗日公粮的工作,已成为各级政府重要工作内容。

(五)彻底改变供给制度

以征收抗日公粮为契机,彻底改变了供给制度,充实了财政,

改善了部队生活。过去吃饭靠派饭，花钱靠缉私和罚款。这个制度有三大弊病：一是部队生活极为艰苦，二是负担不公平。还有一条就是扰民，每住进一村，住群众房，烧群众柴，借群众被褥，派群众麸料，特别是每家需给战士做饭吃，常此下去，给中心区的群众带来很大负担。

1943年政府征收了两季抗日公粮，不仅有了粮，也有了钱。因此，部队、党政机关都建立了自己的伙食单位，不再派饭吃了（偶而必须派一天，也往往付给群众以较高的报酬），衣服、被褥、零用钱，战士困难救济，治病，以及各种供给都有明确的规定，而且都有保证。供给制度的彻底改革，保证了部队党政机关的供给，改善了部队、党政机关的生活，又解决了负担不合理、不公平的问题，并且扰民问题也基本予以解决。同时，水东地区财政力量也大为充实了。

（六）建立优抗制度

从1938年组军开始，直到1943年，水东地区没有优待抗属制度，部队官兵及抗日工作人员家中的生活困难，领导从不解决，包括因抗日而倾家荡产者在内。1943年我政府开始建立优抗制度。例如：对抗属因缺乏生产劳动力的，建立代耕制度，对生活有困难的进行救济，每逢节日进行慰问等。这个制度很快就在水东全面执行了。

（七）肃清土匪

在1942年肃清土匪安定地方秩序的基础上，1943年继续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到1943年底，在水东抗日根据地基本上已根绝了匪患。例如：杞北在1942年夏季以前，在中心区牵牛架户，拦路抢劫，杀人越货时有所闻，但到1942年底这种事已很少，而到1943年夏这种情况在中心区已基本绝迹了。其办法也很简单，这就是：其一、中心分会、分会采取开各种会议的形式，宣布禁止各种土匪行为，当土匪的必须改过自新，过去的事既往不咎，不改的抓到杀头等等。其二，一经宣布，政府就全力进行这个工作，从1942

年秋到 1943 年上半年，政府共处决了两三个土匪司令，如：张凤翔、潘传炳等。并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子弹。其三，每枪毙一个土匪，我们就开大会贴布告，宣布罪状，教育其他土匪。就这样使中心区的小股土匪都洗手不干了，到 1943 年底中心区可以说已根绝了匪患。

(八)进行反资敌

1942 年冬开始进行的反资敌工作，只是取得部分的成绩，而大量的工作则是在 1943 年进行，并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水东地区的群众在 1942 年以前是多方面负担的。地方上的大土匪头子派粮派款，国民党各游杂部队，县区政府派粮派款，并有许多苛捐杂税，日寇汉奸派粮派款，这种多方面负担的情况引起三大问题：一是群众负担很重造成人民生活更加困难，二是各种敌人在中心区来来往往穿梭活动，并和地方坏人互相勾结，为非作歹；三是坏人可在地方横行，他们派粮派款，保甲、劣绅从中贪污狼狈为奸，我党不能为人民作主，人们不敢向我们靠拢。所以，虽然是我军经常活动地区，也只能称为中心区（我党我军占优势的地区），而不能称为根据地。

为了进行根据地的建设，在 1942 年，县区政府建立之后，就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反资敌工作。

所谓反资敌，就是反对以粮款资助敌人。就是说，凡我党我军占优势的地区不得给敌人交纳粮款。

办事处指挥地方武装，把主要的匪首消灭掉，匪首派款问题解决了，凡是在反顽胜利的地区，不准向国民党县区政府、及游杂部队交粮交款，资顽问题也解决了；但要求我区人民不向日寇伪军交粮交款就困难了，因为敌伪不仅占据县城而且大集镇都设有据点，随时可出动武装深入我区。在我政府一宣布反资敌要求后，敌伪即大肆宣传：如有村不向他们交粮交款，他们就要放火烧村庄，抓人、杀人等，以威胁群众，另一方面，旧政权的联保主任、保长、甲长，在

向敌交粮交款时还可中饱一部,所以他们以资敌为奇货和敌伪勾结共同威胁群众。广大农民怕敌伪报复,都愿交纳粮款以免祸(如杞北八卦庭党支部派党员到办事处要求向敌伪交纳粮款)。在这种情况下,如我政府硬性禁止,定会造成不良后果。但如任其向敌伪交粮交款则反资敌工作就要夭折,究竟如何办?经反复研究议定三条:1、要贯彻反资敌斗争必须改造旧政权,就是要把与敌伪勾结的贪污中饱的旧政权所有人员,如:联保主任、保长、甲长及其办事人员撤下来,而代之以愿意抗日的廉洁奉公的,热心为农民办好事的革命者,担任这些职务。这就是建立革命的两面政权。所谓革命的两面政权,就是由我们选拔的、愿意抗日的、廉洁奉公的革命人员来组成的基层政权,又为敌伪所承认,他们为抗日政府认真办事,但表面上也为敌伪作些事以应付敌伪。只有改造成这样的政权才能和我们共同行动,把反资敌工作做好。2、政府宣布反资敌政策,原则是不准资敌,鉴于敌人很残暴,群众愿意交纳粮款,换取平安的意见,对每次如何具体行动可以商议。因此,敌伪每次派到各联保、各保甲的具体数字和时间要求等情况,都要随时报到分会,办事处以便具体研究对策。

3、在上述两项工作做好后,我们就和基层政权同志研究对敌伪进行欺骗战斗。具体方法是:敌伪派粮派款数字下达后,保甲长按照敌伪要求收些粮款送县城或据点,但我们政府派出游击小组已在县城或据点附近等候,见到之后,送粮送款人员伪装逃避,我游击小组鸣枪追击,把粮截下,交我们政府,交粮交款人员则于当天跑到据点或县城内把拦截粮款情况告诉敌人,并要求敌人想办法,而敌人往往是把保甲人员大训一顿了事。敌伪事后调查,收粮收款、送粮送款和被抗日政府截去都是真的,枪声为证,有时还开收条呢!他们怨不到保甲长和群众了,这样搞了几次之后,以后就搞假的(装些糠之类)。再后,则干脆叫联保主任,保长找到敌伪告诉:“新四军及其政府人员在我们当地来来往往,而给皇军收款是

千家万户的事，又瞒不住他们，我们一收起就被新四军截走了，所以皇军派的我们给皇军收的粮款等于替新四军收的，这事怎么办？请想个办法呀！”至此，敌伪只有一个办法，派部队扫荡我们，进行武装抢粮。所以，我们的反资敌，到1943年底已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九）发动赎地运动

“早年发槐树，灾年发财主”1942年冬和1943年春的大灾荒期间，广大灾民为了活命，开始以一斗、半斗的粮食为代价，卖掉一亩土地，后来则是一碗、两碗粮食为代价卖掉一亩土地。而豪绅地主、汉奸、土匪头子则趁农民严重饥荒之机大发荒财，以极低的价格，把大批土地攫为已有。大批农民失掉了土地，倾家荡产，生活无着。因灾荒引起的这个社会问题，是十分严重的。对此，我们党立即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即农民可以原价赎回在灾荒期间卖掉的土地。并决定这个决定由各级政府负责组织实施。

联办根据党的决定，立即于1943年麦收时发出布告，内容是：

1、首先说明在灾荒严重时农民以非常低的价格卖掉土地是不正常的，大批农民失掉土地必然会引起严重的社会不安，这对各阶层人民都是不利的。

2、为了把大量土地归还给农民，政府规定从1942年8月到1943年6月凡是农民出卖的土地都可以用原价赎回。

3、根据上述规定，卖主可持原价交给买主，买主即应将土地契约交回卖主，其土地立即归原土地所有者。

4、如有违抗不交契约，不执行上述规定者，政府均将予以严厉制裁。

各办事处，各分会根据联办的决定立即在各自辖区，召开各种会议，如干部会，开明士绅会，村民大会等，传达布置赎地工作，接着各级干部就深入到各失掉土地的农民中了解情况，进行动员，在各级政府的努力工作下，在中心区迅即掀起一个赎地高潮。

要把赎地工作真正做好,也是需要做艰苦,细致工作的。一是农民是保守的,他们认为既然卖给了人家,再赎回来,好像自己输了理;二是买地的多是地主、恶霸、匪首、汉奸、有权势的人,而农民怕以后他们报复,不敢赎。针对这种情况,我各级政府必须深入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农民真正了解,趁大灾荒之机,乘人之危,以极其不公平的价格,攫去农民的大量土地,是不义的,而我们根据政府法令以原价赎回则完全是正义的,合理合法的行动。我们不仅使农民有了这个认识,并使全区开明士绅也真正认为赎地是正义的,正确的。他们说:“农民失掉土地无法生活,一部分人必然铤而走险,引起社会动乱,而动乱对所有人都不利。再是乘人之危,价格太不公道吗!”在我们反复宣传下,赎地是正义的,正确的,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的同时,我党和政府还组织失掉土地的农民,互相串连,把一个村、几个村失掉土地的户组织起来,一齐到地主家去赎地。并推举代表和地主讲理(事先作好准备),开始我们政府还派人参加,这样人多了,政府出头,群众就不怕了。地主只有乖乖地收了原价,交出契约。一个成功,处处行动,所以迅速形成一个赎地高潮。根据地大约只有一个多月,农民已把灾荒时期失掉的土地全部赎回了。

根据地的赎地运动,极大地震动了边沿地区的农民,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失掉土地的农民,在生活绝望中看到了根据地赎地,鼓起了他们的勇气,他们有时结伙,有时个别的来找政府,要求赎回他们的土地,政府对这个情况,采取了以下措施:

1、对来人热情接待,充分支持他们的要求,把根据地人民赎地的经验、办法告诉他们;

2、我政府中地方武装,尽可能多地到边区活动,召开各种会议宣布政府赎地法令,并命令他们必须贯彻执行;

3、对个别拒不执行赎地法令的地主,予以拘捕,除强迫他们把土地赎给农民外,还给予必要的处罚。经过以上工作,在边沿地区

也迅速掀起了赎地热潮,大约于 8、9 月份,在边沿地区,因灾荒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基本上赎回了自己的土地。

边沿地区赎地运动的开展,影响了敌占区部分农民也提出了这一要求,我政府对敌占区要求赎地的农民,除采取对边沿地区上述措施外,把支持农民赎地这一任务,交给深入敌后的小部队及武装工作队执行。因而,敌占区部分在灾荒期间失掉土地的农民,也赎回了自己的土地,敌占区这工作一直持续到 1944 年。

由于上述各项工作的开展,不仅使当时各项工作大大前进一步,而且为以后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由于农村社会秩序安定(消灭了土匪)和负担的减轻(由多方面负担变为一方负担及合理负担),不仅当年农民生活改善了,而且为以后生产大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由于部队生活的改善和优抗制度的贯彻执行,部队巩固了,当年就扩大了武装部队,而且为以后部队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由于上述工作的发展,我党我军我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大大的密切了,群众把党看成是真正的救命恩人,解放区迅速扩大了。根据地由原来的敌伪顽人员交互来往的局面,被我们一方活动所代替,根据地基本形成了。1943 年是水东转变最大,成绩最突出,各项工作走向正确轨道的一年,也是为今后大发展奠定基础的一年,这是应大书特书的一年。

(十)反对走上层路线

1941 年到 1942 年,水东开辟不少新区。如:杞北全是新开辟地区,杞通大部是新开辟地区。为了很快站稳脚跟,开展工作,党曾指示尽可能广泛地团结当地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为此,我党各地作公开工作的领导人,可与当地上层士绅,开明人士广泛开展交朋友工作以便引导他们协助我抗日工作。这项指示当时完全是对的,在新区工作的同志也都坚决进行了这个指示,因而团结了各阶层。但经过一年多的工作,情况变了,首先,我们了解了所接触的一些上层人的复杂情况,他们有些是真心抗日,拥护革命的,这些人

受到群众拥护也真正为我们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也有一部分是恶霸、劣绅，长期欺压人民，在群众中有民愤，这些人所以要接近我们，有他们的各种动机。有些是利用和我们的关系。抬高他自己的地位，继续欺压人民，有些则是想利用我们保护他自己的安全，甚至有些表面和我们合作，暗地勾结敌人，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表现、动机和情况。其次，由于各项工作的开展，广大基本群众逐步团结在我党周围，我如继续和这些土豪、劣绅经常亲密过从，使这些豪绅有恃无恐、部分群众会对我们产生疑虑和不满，对发动、团结基本群众极为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原来我们所联系的上层人物进行具体分析，并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真正开明的应继续团结他们；对中间的应鼓励，团结愿意抗日的一面，教育批评其动摇落后的一面；对民愤较大，压迫人民，怙恶不悛，并利用我们继续为非作歹的豪绅、坏人应进行坚决的斗争，直至予以镇压。例如：杞北在1943年先后枪决了孟广生、王远候，朱纯章等在初期和我有不少联系的上层人物。

但我们党有不少同志，并不都是能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上层人物的状况，进行分析、区别对待，而是重感情讲义气，对自己在开始所交的朋友不愿进行了解分析，而且盲目地听他们表白，相信他们超过了相信群众，继续与这些人来来往往，大吃大喝。这就引起广大群众的猜疑与不满。给我党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在1943年冬和1944年春提出反对走上层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存有这方面缺点的同志都是比较负责任的同志，又都是本质上很好的同志，其所以犯有这个缺点，是觉悟不高，认识模糊，感情用事造成的。因此，这次反对走上层路线，不是搞什么运动，也不是搞什么斗争，而是向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说明问题，敲响警钟，或者在一定的场合，开展一些和风细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式，声势并不轰烈，但对同志们思想上震动很大，教育很深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水东政权领导奠定一个正确的思想路线。

(十一)开展生产运动

在根据地各项工作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尤其是消灭了土匪,打退了土顽对根据地进攻之后,根据地内的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了,根据地人民因而提出了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要求,从整个根据地来讲,只有发展生产才能保证我军供给。因此,联办大约在1943年就发出大力领导根据地人民发展生产的指示,主要内容是:

1、向根据地人民反复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号召根据地人民学习吴满有努力生产,劳动致富。

2、对抗日烈军工属,要切实组织好代耕。各级政府要检查一次代耕制度的执行情况,并认真加以落实,以保证搞好烈军工属家里的生产。

3、对缺少劳力或无劳力的鳏寡孤独户,各级政府应动员其亲属邻居给以帮助,以保证这些农户生产的正常进行。

4、对牲畜、农具缺乏的农户,政府要组织他们互相帮助(如,提倡合犍等),以利生产的进行。

5、各级政府除大力领导人民搞好生产外,各级领导人,还要直接领导政府干部、地方部队帮助群众进行劳动。

各级政府根据联办的指示,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各县办事处主任,分会主任率领政府干部,地方部队为烈军工属,为缺少劳力的群众进行劳动,不少领导人带头拉犁拉耙推磨打场,不仅推动了劳动生产的热忱。而且树立了劳动光荣的新风尚,更加密切了党群、政群、军民关系。

政府领导根据地人民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劳动致富,保障抗日供给,不断提高根据地人民生活水平,决不是一个短期的运动,一时权宜之计,而是贯彻我党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一个重大战备任务,是政府长期的重要工作。所以,从1943年冬开始,提出发展生产任务之后,在根据地只要一有可能,就从各方面帮助人民发展生产,这个工作在以后收到很好的效果。例如:1945年水东根据地

内人民的生活,不仅较 1943 年前大有提高,而且较抗日战争前,也有很大改善。1938 年前,每到春季是乞丐满街的。到 1945 年虽说不上乞丐绝迹,但已很少见到。而到了 1946——1947 年则乞丐确实绝迹了,根据地广大人民虽说不上都丰衣足食,但绝大部分农民都已好坏填饱肚子了。这与 1943 年政府发动的生产运动并坚持下去是有很大关系的。

(十二)发动群众减租减息

在 1944 年夏季以前,水东是没有搞过减租减息的。根据形势的变化,地委决定,要在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当时发动群众的工作是各级政府直接领导,并设有民运科(谷熟岗会议明确规定要领导群众工作)。所以,当时联办根据地委这个决定,立即把这项工作安排到各办事处。主要精神是:

1、政府确定实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法令,必须一律执行。

2、各级政府要广泛宣传这个法令,发动人民群众认真执行这个法令。

3、要贯彻和执行减租减息,必须发动和组织农民成立农会,形成力量,才能取得效果。

4、当年的租息必须按照法令减下来。至于往前退赔几年,可由农会依据不同情况讨论决定。

5、要把党的政策交给农民,用党的政策武装农民,并在实际行动中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例如:打击地主,中立富农,团结中农,依靠贫农;再如,对大、中、小地主,对开明地主,与有民愤的恶霸劣绅地主,应区别对待等等。各县搞减租减息运动先搞试点取得经验,武装骨干,以逐步推广,求得波浪式发展。

各级政府根据地委和联办的部署,立即在各自地区开展减租减息的试点,而到冬季和 1945 年春,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就全面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使根据地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1、一盘散沙的广大农民，分别组织为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并把这些救国会联合起来，组成抗日联合救国会（简称抗联）。除这些群众组织之外，农村的积极分子又在各村组织了民兵，拥有农民自己的武装，农民由被压迫被统治一变而为农村的强大统治力量。

2、在旧社会农民受到地主、恶霸、豪绅、官僚、土匪等多种人的剥削、压迫，在我党我军占优势以后，在根据地内，由于打退了顽军的进攻，消灭了土匪、及反资敌、赎地、合理负担、反贪污等社会政策的实施，农民所受的压迫有所减轻，但由于没有组织起来，自身无什么力量，所以，仍然受到了不少方面的剥削和压迫。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农民有了自己的组织，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农民对各种剥削和压迫都在组织内提出，并予讨论。一作出决定，大家采取行动，消除这些不合理的剥削和压迫。所以，在运动过程中，农民扬眉吐气，由被压迫阶级变为统治者，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是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3、地租减轻了，高利贷的利息减轻了，地主不能随意退佃了，在反恶霸和退租退息中，人民又得到了实惠，因而穷苦农民的生活大大改善了，生产也好转了，根据地内兴起了参军参工、参加革命的热潮，形势一片大好。

二、加强了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

1942年以前，水东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军政委员会，他统一领导党政军各项工作，而地委则只是在军政委员会领导下领导地方党的机关。在县一级，县委只负责秘密党的领导，军队的党则直接归团党委的领导，中心分会，分会（后来的办事处）常备队的党组织则直接归主任、副主任领导，主任、副主任则直接归军政委员会或地委领导。县委和中心分会的关系是互通情报，互相支持进行协商的性质。

1942年秋，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因是9月1号发出的，所以叫“九·一”决定），决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应为党的各级委员会。据此，在水东应该取消军政委员会，地县最高领导机关应为地委和县委，这个决定虽然是9月1号发出，但传达到水东已经到了1942年冬天，由于水东当时灾荒严重和战斗的频繁，特别是这个改变不仅要做好思想工作，而且要作好在建制上、组织上、干部配备上各项工作，所以贯彻实施这一决定，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到了1943年冬至1944年，这个决定可以说基本得到贯彻，具体表现在：

1、地委领导上的改组和干部配备任务完成了，李中一任地委副书记兼水东独立团政委，主持地委工作（因无书记）并兼组织部长，1942年的地委书记马乙鸣改任地委组织部副部长。联办建立党组，党组书记参加地委为常委。

2、各县委的班子已调整就绪，先后重新任命了县委书记、副书记、委员。在行政上任命了办事处主任、副主任，个别无主任者，明确由副主任负责主持工作。主任或副主任参加县委为委员，在调整地、县领导班子的同时，各区的干部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和配备。

3、前面已经说过，各县除区常备队归中心分会（后期归办事处）领导外，其余固定在各县的武装，均直接归团司令部领导，和县委只是协商关系。也就是县委不领导武装。在1942年冬到1944年春，各县都先后建立起县基干武装——县大队，这个县大队，既归团部领导，也归县委领导，属双重领导，由县委书记兼大队政委，办事处主任或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兼任大队长，各个区常备队，一方面归县大队领导，同时又归区委领导，也是双重领导，并由区委书记兼指导员，分会主任兼队长。这就保证了县委、政府对县武装的领导和指挥。

4、在各级党委健全之后，各级政府必须由其负责人定期向同级党委汇报工作；政府各时期的工作安排和重大措施必须由其负

责人向同级党委提出报告,并讨论通过,才能交政府部门具体实施,这在1944年已正式成为工作制度,并彻底予以贯彻执行。

由于“九·一”决定在水东的贯彻执行,工作进一步充实完善了,党委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大大加强了,政府工作经常列入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对此后政府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就,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政权工作的大发展

1944年秋到1945年夏,是水东的大发展时期,当然也是政权工作的大发展时期。

从1944年4、5月间,日寇决定打通京广线,而国民党军一触即溃,日寇决定打通郑州、洛阳、南阳、许昌、信阳等地区。至此,河南已全部成为沦陷区。根据这一新的形势,中央于1944年夏作了关于开辟河南工作的决定,据此,我太行、太岳部队挥戈南下渡过黄河,开辟郑州以西至洛阳伏牛山区为抗日根据地;华中新四军军部也派彭雪枫率第四师西越津浦铁路线,活动于永城、夏邑及涡蒙之原豫皖苏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五师扩大了在信阳驻马店一带的抗日活动,河南抗日形势一派大好,在这种情况下,冀鲁豫军区也于7月决定建立水东第十二军分区,^①并派余克勤同志任司令员,袁振同志为政委(任地委书记)带了300多人南下。

水东原来部队建制是独立团,袁、余来后,建立了分区。水东原来只有李中一副书记主持工作,现在又来了地委书记;水东的武装,除地方武装外,独立团只有4个主力连400多人,现在南下大队又来了4个中队300多人,合起来分区已有近800人左右的主力部队,上述情况说明,余、袁这次到水东。使水东在武装力量上,军事指挥上,政治领导上得到了加强。

^① 编者注,十二分区于1945年3月6日建立,在此之前仍为水东独立团。

1944年7月,南下大队来水东后,先打掉民权之杨城据点,接着大约于8月份先后打掉了睢县之长岗、河堤据点,克威大队也于此时打掉了睢西北部之君店据点。这样睢县西部、西南部已成我之大片解放区。而睢西北也成为克威县的部分解放区,这就彻底粉碎了从1939年到1944年日寇所经营5年的豫东模范县的顽固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联办大约于9、10月份,建立了睢县县政府并任命苗久锐为县长,与此同时,太康北部也成为大片解放区,联办命令建立庆华县政府,辖区主要是太康北部(县名庆华,是为纪念1939年牺牲的水东特委书记马庆华),任命杨震为县长,也就在这个时期,分区在解放睢县西部之后,即派刘影、罗枫奇率二大队去淮阳县西北部开辟淮(阳)太(康)西(华)边区,联办为配合军事上的行动,决定建立淮太西县政府并任命段锦堂为县长。至此,水东在联办领导下已拥有6个县的县政权。

1944年冬,我部队挺进敌后,开辟了宁陵、柘城西部工作,联办决定建立宁柘县政府,并任命孙卫和为县长,但由于部队很快撤出,县政府未能组成,也就撤出来了,接着就去扶沟的崔桥、吕潭、白潭及太康的芝麻洼地区建立了扶(沟)太(康)西(华)县政府,孙卫和任县长,这已是1945年春天的事。至此,联办已领导了7个县的县政府。

1944年秋到1945年夏,是水东大发展时期。这个发展是建立在1944年夏季,以前各项工作已经走向轨道并在群众中已经有了雄厚的基础上发展的,是有阵地有基础的发展。所以,这个发展就容易取得成效,并且易于扎实和巩固。1942年底,我军经常活动以及政令所及地区,只有杞县的大部和通许、民权、太康一小部,而对睢县则基本进不去。其余各县都是极少的。这时根据地人口大约30万左右,加游击区也不过四、五十万人口,1943年底稍有发展,但只是发展些边沿区,政令所及区,根据地扩大了很少,而到了1944年则根据地、游击区均大有发展。1944年底,我们活动地区包

括杞县全县,睢县、太康、通许大部,民权、兰封、陈留、开封、宁陵、柘城、淮阳、西华、扶沟各一部。我军纵横驰骋在北至陇海铁路,南至淮阳西部和西华东部,东至宁陵、柘城西部,西至陈留、通许城周围,这个近200万人,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这个地区内,我们建立了约六、七十万人口的巩固的根据地,而游击区和我政府政令所及区,则尚有近百万人口,也就是说在这个地区内,除敌伪据点及少数敌占区外,均为我根据地和游击区或者我活动虽不多,但也必须执行我政府部分法令,如:征粮征款等,可以说我活动的地区大约已是拥有一百五、六十万人的地区了。

改变政权名称——办事处改为县政府,分会改为区政府,但地区仍沿用联办名称。

水东从1941年秋建政开始,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各级政府一直采取灰色名字,如:地区政府叫联防办事处,县叫办事处,区叫分会,为什么不直接叫县、区政府呢?

水东地区是敌后,也不完全是敌后,几面都是日伪占领区,但西南面,即太康西部、通许南部以及扶沟、西华等则是蒋管区,也就是水东地区西南部是与蒋管区接壤的,蒋军为防日寇渡河西进,在这一带常驻有重兵,而且驻有专县区政府机关,日寇为防蒋军东进,也在这一带驻有重兵,蒋日经常处于前线对垒状态,我水东处在蒋日双方对垒中间,双方都强大,我方相形极为弱小,为不刺激蒋方,所以采取灰色政权形式。

但是,1944年夏,日寇要打通京广线,河南全省沦陷,水东已完全处于敌后,形势变了,所以,我们灰色政权改为正式政权。

1944年8月10日,杞南开大会宣布,建立克威县政府,杞南、杞通也均于10日左右召开大会宣告县政府成立,这三个县的名字是杞南改为芝圃县,杞通改为达生县,杞北改为克威县,这三个县名,主要是纪念吴芝圃创建水东和在斗争中牺牲了的韩达生和唐克威两个地委书记的。

在宣布成立县政府的同时，也宣布成立了区政府。

三个县政府的县长是：芝圃县长：王建一；达生县长：李子骥，克威县长：韩致安。

这时候的联办主任是薛朴若，副主任郑华；秘书主任夏仲远；武装科长杜思训；财政科长王焕，民教科科长杨宏猷（兼管民政、教育、司法，所以叫民教科）。联办建立了党组，党组书记郑华、成员薛朴若、夏仲远、杜思训、王焕、杨宏猷。

以上是我对水东地区抗战时期政权建设概况的回忆。

血海深仇“九·二七”

杨怀钧

日寇突然“铁壁合围”，我军奋起浴血鏖战。

“金凤却暑，玉露生凉。”我冀鲁豫军民欢乐地渡过了中秋节。正当我部队整训，党政干部下乡。广大群众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积极开展生产运动，迎接更大胜利的时候。1942年9月27日（阴历8月18日）拂晓，晴天霹雳，范县四周突然响起枪声，日寇是有计划、有准备进行的，据敌人《华北治安战》所载，敌第十二军根据其所谓年度“肃正”计划，早已进行彻底摧毁我鲁西根据地的准备工作，在日寇村宁次的指挥下，土桥司令官亲自主持了由兵团长以下主要干部参加的图上战术、兵棋教育，现场指挥等研究工作，各参加作战部队在作战企图严加保密情况下，进行了对我军战法训练。

日寇这次“扫荡”妄图对范县附近根据地采取“铁壁合围”（敌人称完全包围），突然袭击战术，使之彻底覆灭，日寇参加作战的部队有石田支队的步兵5个大队。轻装甲车1个中队，大熊支队5个步兵大队轻装甲车1个中队，高原支队的骑兵两个中队，炮兵1个中队，步骑兵6500余人，连当地伪军共30000余人，并有飞机10余架，坦克30余辆，汽车400余辆，予以配合。

敌人的具体作战计划和作战方法是：于9月25、26日，命大熊支队在聊城、莘县附近，石田支队在郓城、巨野、济宁，高原支队在濮阳附近分别集结兵力。26日夜间运动兵力，27日拂晓前到达预

定展开线。随后由控制线指挥各队前进，逐渐将包围圈压缩到以范县单堂（高码头村东一个村）为中心的半径30华里的地区。敌人还设想、估算并实施由集结到展开线，由展开线到我根据地的行程。甚至规定了展开正面每个分队300至500米的距离，以此计算出包围的周长。他们还注意了各分队之间的横向联系，各队控制若干预备队。此外，还编成了政治工作班和特务工作班，作为包围圈压缩后专门负责侦探间谍部队，他们认为这是对我军在大平原上善于四散逃跑所适用的特殊战法。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将我根据地党、政机关一网打尽，将我军主力部队一举歼灭。

敌人苦心制定了的“肃正”计划破产了。我主力部队和一部分地方政权，打破了日寇包围圈。分别突围，挺进敌后。

我军教三旅（辖七、八、九团）的大部，保卫边区党委、行署、军区首脑机关。驻在白衣阁、杏子铺、胡楼、代庄、殷庄、仝庄、赵庄一带共2000多人。9月26日夜間，听到南部枪声，开始没认为是敌人大举“扫荡”，天明探知敌情。遂向东北方向转移。至姬楼又向西行。在道口一带乘敌包围圈尚未形成，顺利突围。挺进到濮阳、滑县井店镇根据地。

行署的下属部门，多数驻在龙王庄一带，银行驻梁庄，兵工厂驻宋楼，医院驻田柳寺，报社和书店驻梁庄、赵庄、孙庄、由于他们平时提高了警惕性，并注意保密工作。因而损失不大，南下支队和回民支队（6、7月间由冀中来此）的主力，在范县北部机动转移至外线。

在这次“扫荡”中。战斗最激烈的是曾思玉（教三旅政委、二分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同志指挥的甘草固堆突围战，9月26日黄昏，他带领七、八、九团的第一连和各团班长训练，共四个连的兵力，驻到郟城以北的李楼，27日拂晓前，探知日寇“扫荡”的敌情，立即往黄河以北转移，到旧城附近某村集结后，上午7点左右，发现敌人打着太阳旗分路向我猛扑过来，于是立即召开连长指导员会，决定

乘敌人合围圈未形成前,从东北寿张方向打出去,各连经过紧急动员,作好战斗准备,上午9点钟左右向东北方向运动时,四面八方突然响起了枪声,逃难的群众越来越多,飞机在天空扫射,敌人开始向我屠杀了。密集的人群血肉飞溅,尸横遍野。指战员们没有眼泪和悲伤,只有愤怒烈火充满胸膛,党支部号召党员起模范作用,为死难烈士和父老兄弟报仇,为人民立功。中午,日寇“铁壁合围”圈形成了。我军被迫转移到黄河故道的沙滩中,指战员持枪挺胸,愤怒地盯着敌人,下午3点钟左右,敌人的包围越来越小,后来转移到甘草固堆以北路沟内时,寿张县基干大队黄队长向曾政委报告东北方向有敌骑兵和坦克,曾政委和八团参谋长王晓在一个掩体里,观察了周围敌人势态,判断东北方向不能硬碰,西北、西南方向可能会碰到敌人主力,从正南广阔沙滩突围亦没把握,最后发现甘草固堆东北角方向千米左右是一弱点,遂命令各部立即突围。不久,我军喊杀声与手榴弹声响成一片,但不一会停了下来,因敌人封锁了路沟。突围未成,一连副连长王清山牺牲了,这时敌人纵深炮火,向我准备突围的方向猛烈轰击,企图制止我们突围。指战员请示曾政委再次突围,在此紧急的情况下,命令4个连队在600米宽的地段内,向黄河以南的李集、杨集勇猛冲杀,英雄们霹雳般的喊杀声,威振敌胆,一举攻破了鬼子的阻击阵地,经过一场浴血奋战,鬼子伤亡百余,我军亦付出数十人伤亡代价,突围胜利后,我军赶到甘草固堆村东头,继续向南挺进时,发现东北方向敌人骑兵向突围方向奔来。曾政委为掩护部队和群众迅速南进,遂命骑兵班长朱孝治带领骑兵班打马猛跑,扬起尘土,造成疑兵,先敌占领东北庄村,阻敌激战,看情况不利时,向西转移,吸引敌人,再转向南来,以保证部队南进。朱班长执行了命令,迟滞了敌骑,保证了我部队并掩护了2000多地方干部和群众通过了黄河沙滩。这次突围胜利了。

扫荡时,二分区后医四所驻在旧城、王庄、甘草固堆。据当时的

看护员于永海同志回忆“该所有干部医生 50 人，轻重伤员百余人，所部和特重伤员驻甘草固堆。9 月 25 日，获悉日伪在附近县增兵，有所警惕，待发现敌情后，干部在该村南地瓜地内，脚蹬手扒掩体，上有薄土和秋叶复盖。27 日中午，敌人骑兵遍地搜查，被其踏伤一些同志，但他们都忍痛严守纪律，未暴露目标，轻伤员化装成群众，重伤员隐蔽在地瓜窖内。留一气孔上盖柴草，他们每天只能吃一顿晚饭，伤员在不能换药的合围圈中心，坚持了几天。29 日晚，在我部队的保护下，安全往西北转移到东西王观村。这次“扫荡”除了炊事班长付登弟筹给养被俘（到济南释放）和于永海找领导联系时被敌发现打伤脱险外，余无伤亡。由于他们机智隐蔽，虎口存身，“扫荡”过后受到领导表扬。

原驻鄆城北部石楼教三旅的一部分，9 月 26 日晚获得敌人“扫荡”的消息，立即转移，未与敌人遭遇，因而没有损失。

当时，范县县大队和政府机关约 200 人，驻一区葛口，上午 10 时左右，西部敌人来临，县长成润和县大队李墨林率领向东转移到七区（今高码头阳谷段）一带。待发现北金堤和东部临黄堤已被敌人占领后，始知已陷入敌人包围圈内。在此圈内，很难找到空隙冲出去，只有暂时潜伏在距临黄堤不远的一条路沟内，直到下午三、四点钟，听到正南旧城（当时原范县八区）方向枪炮声密集，估计那个地区正在进行较大战斗，合围的敌人碰上了我们的主力军，又发现前面临黄堤上，只见旗不见敌人活动，判断可能已抽调那里去了，（事后才知曾思玉率部从甘草固堆突围）经派一个战斗组，匍匐前进，接近临黄堤，进行武装侦察。证实堤上确实没有敌人，遂率大队掩护县政府机关冲出包围圈，随着冲出去的还有几个区队和一些后方机关人员。傍晚进驻寿张县境内，当晚派出侦察员，得知敌撤离范县，随带领县区队和干部返回范县，结合各区安慰群众和进行善后工作。

范县县委书记王镜如，当时也住葛口，“扫荡”时带领一部分同

志往东转移,不久与葛口东部的独立旅相遇,与专署部分同志向东北找到了敌人的薄弱点,顺利地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到达寿张莲花池一带,待敌人撤退后,即回到范县。

濮县县政府驻马桥,26日拂晓闻北面枪声,有人认为是白衣阁一带驻着行署机关可能是军事演习,但是县长韩哲一果断地说,如是演习,事先会通知咱们。拂晓,又听到东北枪声和汽车响,知是敌人开始行动了。于是紧急集合,向南转移,天明看见西边牛桥有人牵牲口,背包袱乱跑,韩县长说,这是日寇“铁壁合围”,于是占领了李桥,准备突围。八九点钟,分区刘星政委也带着人到这里,连同县政府工作人员,特务营战士和跟随的群众,约有千余人,韩县长命令部下速跑通过黄河,他在后掩护。黄河改道后虽然没水,都是沙滩,陷脚难行。还未走到河当中,敌骑兵六七十人冲向我们,韩县长率领向敌射击,鬼子挥舞洋刀扑向我们,乱杀乱砍,我们与敌人展开了搏斗,这时跟随韩县长的于金生同志,子弹打光了,韩县长的枪梭子打飞了,敌人仍向我军民冲杀。在来不及转移的情况下,于金生和韩县长暂作了隐蔽。

在这次战斗中,有不少同志倒在血泊里,凶惨的日寇也付出了代价,丢下了6具尸体和3匹洋马。黄昏后,郭瑞江和盛景春(濮县突围干部)找到韩县长和于金生研究了如何找部队,迎接新的战斗问题。

烧杀抢掠空前浩劫,血海深仇永世难亡。

日寇残酷的“扫荡”,我军政首脑机关,领导干部和主力部队,分别突围,虽无遭受严重损失,但我地方机关、学校和群众却受到日寇烧杀奸淫,抢掠的严重灾难,是范县抗战八年中的一次最大浩劫。

敌人到白衣阁一带,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年近花甲的冀鲁豫边区参议员杨敬斋先生遭杀害,粮、柴、车、牛、房屋被烧,曹丙坤之祖母活活被烧死,将白衣阁附近村的群众围到白衣阁村东河坑内,

四周架起机关枪，其中被捆的干部和群众互相解开，带头冲出，当场被打死，有的用刺刀杀害，有的按到水里，这一次白衣阁和附近群众伤亡数十人。

这次“扫荡”伤亡最多，损失最大的是范县八区（今张庄乡）旧城、江庄、孔庄、甘草固堆一带。中午 12 点钟左右，敌人的合围圈已到旧城东部二、三里的黄河故道，南部已到李菜园（距旧城 3 里）西部已到江庄、孔庄（距旧城 2 里）。我本人（家住旧城南 7 里杨楼）也被日寇赶到李菜园村北，当时日伪持枪赶着我们成千上万的人，走到李菜园村北距旧城二里的大窑附近，窑内不知是我部队，还是地方武装，突然向敌人鸣枪射击，当敌人卧倒准备进攻的关键时刻，我区干部祁××认为时机已到，高呼老乡们冲啊！我在此时也高呼，并带头向南冲，当时汉奸喝令谁跑打死谁，并鸣枪镇压，但敌人主要是北进合围，在正面我军阻击的情况下，未能制止群众的逃脱，狠毒的敌人，将我冲击的群众打死打伤数十人。敌人包围大窑后，在窑北杀害我干群百余人。这股敌人到达旧城村西南古塔（此塔 1937 年已倒）时，又在那里杀害我百余人。

我边区地方机关和学校，如边区文联，抗大分校校部，陆军中学，筑先学院，财经学校，南下支队直属队的后梯队等单位，大部驻在范县，因情况不明，被敌人合围在旧城、甘草固堆附近，这些单位在此情况下，建制已乱，有的化装隐蔽，有的突围脱险，有的负伤，有的牺牲，抗大分校训练处长孙厚甫同志，在敌人四面包围，上有飞机扫射的情况下，站在坟头上高喊：“有枪的同志快来集合，用机枪开道，快冲出去。”但因临时组织，准备不足，终未冲出，只有少数脱险，多数被俘、牺牲，他本人也光荣牺牲。边区文联鲁森同志被俘后，押送济南，后混在群众中释放，筑先学院也有部分损失，这次突围后，学生大部分隐蔽脱险，个别负伤。遭受损失最大的是陆军中学，该校于 1941 年建立，杨得志兼校长，学员多是连级以上干部，学员近百人。有部分武器，当时住在范县玉皇庄村，他们多是外来

干部，在往东转移时，由于人地两生，隐蔽不便，在旧城附近战斗中，少数脱险，多数负伤、牺牲、被俘，陆军中学教员付仲骅和营长罗少维，就是在这次被俘后，押送到济南的。

敌人在江庄、孔庄一带，将围困的群众炮轰、枪杀、刺刀捅。连同逐个进行审查时打死的，共杀害了百余人。

东部敌人发现甘草固堆村北有我军主力，便在该村东南向西北猛烈炮轰，再加敌机反复扫射，使我密集逃难的群众，伤亡 200 多人，甘草固堆村西北，尤其严重，紧跟我军突围的群众也有不少伤亡。

中午，原范县县城（今莘县古城镇）一股敌人向南合围，西部和南部八里庄一带的敌人，则往东往北攻来，在耿王庄一带向东压缩，约在下午两三点钟。到五里井村南一里的坟坊内停住，敌人先后发现群众中有带武器的地方干部，开始了血腥的屠杀，在他们检查中，认为不是良民的就用刺刀捅，指使狼狗撕咬。凄惨景象，目不忍睹，此处伤亡数十人多是农民，仅赵耿王庄就刺死刺伤两个青年。敌人将其余群众都往南赶到薛堂村，当晚多数逃脱。

这次“扫荡”，范县人民特别是二区（陆集）群众无不怀念英勇战斗壮烈牺牲的田子建同志，当时他是二区区长，区部住在丁沙窝村，上午他带领助理员曹文瑞、吴风其和通信员石玉斌等不过 10 人，往北转移，走到旧城村西面，听到北边枪响，计划从西面突围，可是被西边的敌人发现并向他们射击，正在准备还击的时候，石玉斌同志腿部中弹负伤。田区长含泪语重心长地安慰说：“玉斌同志，在这紧急的情况下，我们顾不得照顾你啦，得马上突围，你找个地方隐蔽起来吧！”遂将石的一支步枪拿去，转移阵地，继续战斗，敌人越来越近，有认识他的汉奸高喊他的名字叫他缴枪。他们在两个坟头之间，发扬了“人自为战”的英雄主义气概。坚贞不屈，奋勇还击，终于和吴风其、曹文瑞等同志壮烈牺牲。

敌人这次“铁壁合围”的目的是消灭我主力部队和俘获我地方

干部,由于我们军民干部亲密无间,因而包围圈内的人都成了俘虏。有的人乘其战斗逃脱,有的人乘其黑夜走去,有的人是押到村内逐个审查。在审查后他们将 1000 多名可疑的人,押送到济南去。

这次日寇对范县烧杀抢捕是抗战的空前浩劫,我军干群伤亡千余人,房屋用具被焚烧,粮食牲畜被抢掠,妇女被遭塌,更令人厌恶的是禽兽不如的敌寇,竟在水缸里拉屎,在饭锅里撒尿,在井里投脏东西,目击者回忆起当时的凄惨景象,至今犹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和基层干部,在敌人威迫下,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李楼(龙王庄南)农会主任魏小会,因为掩护群众逃避,自己来不及躲藏,被敌人抓住,敌人逼着他要粮,问谁是地方干部和八路军,他始终未暴露任何情况。最后被绑在床上活活烧死。

在这次“扫荡”中,范县不少地方干部和基层群众发扬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掩护了外地干部,照顾了负伤同志。范县文教科长沈玉珂是外地干部,在葛口教师岳子川同志的掩护下,安全突围及时返回工作岗位。筑先学院学生高维、于瑞亭收筑先学院一位负伤同志程永康(长清人)带到家中治疗照顾,旧城一带不少外地负伤干部,都由当地村干部和群众给予治疗照顾。

我们的干部对敌搏斗,机智勇敢,被俘脱险,范县二区抗联主任陈华锋同志隐蔽豆棵里被敌人发现的时候,他将钢笔、笔记本埋好,不动生色的站出被俘,晚上赶到旧城以北吕庄的场里,他刚解开绳头,准备逃跑,被日寇发现,用刺刀将其头部砸了几个血泡,鬼子走后,解开绳子逃跑,有一哨兵急来追赶,不幸华锋同志绊倒,鬼子抓掉他一只鞋,陈华锋同志挺身把鬼子推得两脚朝天,乘机逃脱,次日头带血泡,脚被扎得鲜血淋漓,找到领导汇报脱险经过,受到领导的表扬。

在日寇“扫荡”时,被俘押到济南的干部,不怕牺牲,秘密研究了越狱计划,罗少维同志带领一班人经常叫出去做苦工,日子长了

鬼子不大注意了,5条枪搁在一旁,罗少维同志指挥这班人暴动,约在下午4点多钟他拿了一支枪,接着老红军黄兴华同志也拿枪带领同志逃跑,但被日寇发现,开枪打死了黄兴华,其余的同志被抓回,英勇牺牲。不久以付仲骅、田兵、孙学志为首的6、7人,夺了敌哨兵的枪,刺死敌人,逃回根据地,受到军区党委的通令表扬。

“九·二七”“扫荡”至今已有43年了,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日已建交,文化科技互相交流,经济贸易平等互利,两国人民已经和平友好起来了。当年日寇侵华战争,是日本军阀、财阀所发动,这场战争不仅我国被惨杀1000万军民,而且广大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死亡也达180万之多。日本人民是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

为了揭露日本军侵华罪行,警惕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最后再写几句话,做为这篇回忆的结束语。

“王道”称霸挥屠刀,“乐土”万里草木焦。

“共存”灭绝炎黄裔,“共荣”神州废墟高。

两国人民灾惨重,共盼万代固邦交。

教材犹饰侵华史,浩劫岂能再重遭。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组织机构沿革 (侧重河南部分)

抗战爆发后,冀鲁豫边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战,开创了包括平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德石路以南,陇海路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水东、水西地区,在1941年7月至1946年11月,曾先后归冀鲁豫边区领导)的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其领导机构和行政区划,经历了从直南特委到习称小冀鲁豫、中冀鲁豫、大冀鲁豫四个时期。

一、直南特委,直南、豫北地委时期(1937.11—1940.4)

(一)党的组织

1. 中共直南特委 (1937.11—1939.2)

1937年11月在清丰县梁村建立了中央直南特委,直属北方局领导。

书 记	朱则民(1937.11—1938.7)
副 书 记	刘大风(1937.11—1938.4)
组织部长	王从吾(1938.1—7)
宣传部长	刘汉生(1938.1—2) 刘宴春(1938.2接任)
统战部长	晁哲甫(1938.4任职)
军事部长	唐哲明(1938.1—6)

刘汉生(1938.6接任)

1938年3月,中共北方局派李菁玉到河北省南宮县建立了中共冀鲁豫省委(同年11月改为冀南区党委)。冀鲁豫省委成立后,直南特委归该省委领导。1938年7月,朱则民调任冀鲁豫省委宣传部长,其后特委的组织情况是:

书 记 王从吾(1938.7——8)
郭 森(1938.8——10)
王从吾(1938.10——1939.2)

组织部长 刘晏春
宣传部长 郭 超(1938.4任)
民运部长 安法乾(1938.7任)
统战部长 晁哲甫(1938.4任)
军事部长 刘汉生(1938.6任)
秘书长 牛万里(1938.6任)

直南特委辖清丰、南乐、濮阳、滑县、濮内滑、内黄、长垣、考城、大名、东明、濮县、范县十二个县委(工委)。

中共清丰县委

书 记 王冠儒(1937.10——11)
安法乾(1937.12——1938.8)

中共南乐县临时工委

书 记 郭献瑞(1937.10—1938.2)

中共南乐县工委

书 记 郭宪瑞(1937.10——1938.8)
郭良才(1938.8接任)

1938年2月,为便于开展工作,特委决定撤销清丰县委、南乐县工委,在清丰、南乐县城以东以西分别建立边东、边西县委。

中共边东县委

书 记 晁哲甫(1938.2——4)

中共边西县委

书 记 刘同方(1938.2—4)

1938年5月,特委决定撤销边东、边西县委,恢复清丰、南乐县委。

中共清丰县委

书 记 安法乾(1938.5—8)

王志刚(1938.8—1939.1)

姚伟杰(1939.1任职)

中共南乐县委

书 记 郭宪端(1938.5—1938.8)

郭良才(1938.8—12)

白 潜(1938.12—1938.8)

中共濮南工委(1938.3—1939.2)

书 记 李广录

中共濮北工委(1938.6—1939.6)

书 记 张志刚

裴学增(1939.3离)

张乐善(1939.3任)

中共濮阳县委(1938年6月建立)

书 记 李广录(1938.7离)

张建廷(1938.9—1939.10)

中共濮内滑边县委(1937年9月成立)

书 记 刘玉峰(1937.9—10)

平杰三(1937.10—1938.5)

中共内黄县委(1938年9月成立)

书 记 马冠群(1938.9—1939.6)

中共濮滑边工委(1938年初建立,1939年春改为滑县县委)

书 记 蒋中岳(1938.初—1938.8)

赵紫阳(1938.9——1939.6)

中共长垣县工委(1939年3月建立,4月改为县委)

书 记 李广录

中共濮县县委(1938.2由山东划入,10月又划归鲁西特委)

书 记 孔繁阁(1937.7——11)

张建国(1937.11——1938.6)

王镜如(1938.6——9兼)

中共范县县委(1938.2由山东划入,10月又划归鲁西特委)

书 记 王继魁(1937.11离)

金 瑞(1937.11——1938.5)

王镜如(1938.5——9)

刘庆三(1938.9——10)

2. 中共直南地委 (1939.2——1940.4)

1939年2月,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直南特委改组为直南、豫北两个地委,仍归冀南区党委领导,区党委代表王从吾。

书 记 郭 超

副 书 记 刘玉峰

组织部长 王志刚

宣传部长 白 潜

民运部长 安法乾(兼)

统战部长 晁哲甫

秘 书 长 袁 声

地委下辖清丰、南乐、大名、内黄5个县委及濮北、大名五区2个工委,共有党员6000多人。

中共清丰县委

书 记 姚伟杰(1939.3——6)

杨 节(1939.6——1940.3)

张 超(1940.3——1943.1)

中共南乐县委

书 记 白 潜

书 记 张进宝(回族,1939.9——1940.4)

中共内黄县委

书 记 马冠群

郭良才 (1939.6——1940.10)

中共濮北工委(1938.6—1939.6)

书 记 张志刚

裴学增(1938.6——1939.3)

3. 中共豫北地委(1939.4——1940.4)

书 记 王从吾(兼)

组织部长 吴兰田(1939.6叛变)

宣传部长 唐克威

民运部长 安法乾(兼)

统战部长 晁哲甫(兼)

1939年6月,王从吾赴延安,冀南区党委派信锡华为区党委代表,这时豫北地委的组织情况是:

书 记 信锡华(代,1939.6——9)

刘晏春(1939.10任职)

组织部长 张建廷(1939.6任职)

宣传部长 赵紫阳(1939年7月接任)

民运部长 安法乾

统战部长 晁哲甫

豫北地委辖濮阳、滑县、东明、长垣四个县委和滑长封工委,共有党员9000余人。

中共濮阳县委(1939年7月建立)

书 记 张志刚(1939.3——7)
张泽民(1939.7 任职)

中共滑县县委

书 记 赵紫阳
李作民(1939.7 接任)
马瑞华(1939.10 接任)

中共长垣县委(1939年3月建立)

书 记 李广录(1939.3——7)
陈 平(1939.7 接任)

中共滑长封工委(1939年秋建立)

书 记 李拯亚

中共考城县工委

(1939年6月成立,10月划归中共鲁西南地委领导,工委改为县委。)

书 记 马瑞华(1939.6——10)
蔡西峰(39.10——41.9)

4. 中共鲁西南地委(1939.7.1——1940.4)

1939年5月,中共山东分局决定苏鲁豫特委改为苏鲁豫区党委。7月1日,建立鲁西南地委。

书 记 戴晓东
组织部长 王健民
宣传部长 袁复荣
统战部长 刘齐滨
军事部长 宋励华
民运部长 于子元

地委下设曹县、定陶、东明、菏泽、考城等县工委。

中共考城县委

书 记 蔡西峰(1939.10——1941.7)

中共民权县委

书 记 刘勤初(1939.8——12)

杜润生(1939.12——1941.3)

二、小冀鲁豫时期(1940.4—1941.7)

(一)党的组织

中共冀鲁豫区党委(1940.4——1941.7)

1940年4月18日在清丰西王什建立了冀鲁豫区党委。原属苏鲁豫区党委领导的鲁西南地委划归冀鲁豫区党委领导。

书 记 王从吾(未到职)

张 玺

副 书 记 张 玺(不久接任书记)

组织部长 信锡华

宣传部长 刘晏春

初建时区党委下辖4个地委：

中共一地委

书 记 郭 超(1940.4——1941.7)

组织部长 王志刚(1940.4——1941.7)

宣传部长 白 潜(1940.4——1941.7)

统战部长 安法乾(1940.4——1941.7)

民运部长 李进宝(1940.4——6)

地委下设清丰、南乐、内黄、大名等县委。

中共清丰县委

书 记 张 超

中共南乐县委

书 记 马天胜(1940.4——8)

中共内黄县委

书 记 郭良才

中共二地委

书 记 赵紫阳

组织部长 张建廷

宣传部长 魏晓方

统战部长 杨 锐

地委下设东明、长垣、濮阳等县委。

中共濮阳县委

书 记 张 华(1940.6——1941.2)

中共长垣县委

书 记 马瑞华

中共三地委

书 记 唐克威

组织部长 刘玉峰(1940.4——8)

宣传部长 杨 节

地委下设濮阳(上堤)、滑县、濮内滑、滑长封等县委。

中共濮阳县委

书 记 张 华(1940.3——6)

中共滑县工委

书 记 李作民

中共濮内滑边县委

书 记 刘玉峰

陈 瑞

中共滑长封县委

书 记 李明远

中共四地委

书 记 戴晓东

组织部长 王健民

宣传部长 袁复荣

统战部长 刘齐滨

军事部长 宋励华

民运部长 于子元

地委辖定陶、菏泽、曹县、民权、考城等县委。

中共考城县委

书 记 蔡西峰

中共民权县委

书 记 杜润生

韩国典(1941.3—1943.8)

1940年6月10日日军对冀鲁豫边区进行大扫荡,后三地委并入为二地委,四地委改称三地委。这时全区党组织有20个县级单位,共有党员26284人。

中共一地委

书 记 郭 超

副 书 记 唐克威(1940.6—1941.7)

组织部长 王志刚

宣传部长 白 潜

民运部长 杨 节

统战部长 安法乾

地委下设6个县委:

中共南乐县委

书 记 马天胜(1940.4—8)

唐晓声(1940.8—1944.4)

中共清丰县委

书 记 张 超(1940.3—1943.1)

中共内黄县委

书 记 陈瑞光

中共尚和县委(1941年2月成立)

书 记 陈金斗

中共卫河县委(1941年3月建立)

书 记 马天胜(1941.3—11)

中共顿邱县委(1941年3月建立)

书 记 姚伟杰(1941.4 离职)

赵振邦(1941.4 任职)

中共二地委

书 记 赵紫阳

组织部长 张建廷

宣传部长 魏晓云

民运部长 李进宝

统战部长 杨 锐

地委下设 10 个县工委：

中共滑县县委

书 记 李作民

马瑞华(1940.10 接任)

中共濮阳县委

书 记 张 华(1940.3—1941.2)

中共昆吾工委(1941.2 建立,1943 年月改为县委)

书 记 宗凤鸣(1941.2—1942.12)

中共卫南县委

书 记 李明远

中共高陵县委(1941年2月在濮内滑交界处成立)

书 记 陈瑞光(1941.2—12)

孙明三(1942.1—12)

中共卫西工委(1940年10月建立)

书 记 李先贤(1940.10—1941 年秋)

中共长垣县工委

书 记 许阴森

中共濮东工委(1940.7 建立,1941.2 撤消)

书 记 宋乐三

中共濮北工委

书 记 赵峰光

中共濮南工委

书 记 张 华(兼)

中共三地委

书 记 戴晓东

组织部长 王健民

宣传部长 袁复荣

统战部长 刘齐滨

民运部长 于子元

军事部长 宋励华

地委下设曹县、考城、民权、定陶、菏泽、东垣、东明等县工委。

中共东垣工委(1940.10 成立)

书 记 毕玉琦

李垣生

陈 平

中共考城县委(1940年4月成立)

书 记 蔡西峰

中共民权县委

书 记 杜润生

韩国典(1941.3—1943.8)

(二)冀鲁豫军政委员会

为加强冀鲁豫边区党政军的统一领导,经北方局批准,1940年4月,组成了冀鲁豫军政委员会。

委 员 黄克诚、杨得志、张玺、崔田民、信锡华、安法乾、
晁哲甫。

书 记 黄克诚
崔田民(6月接任)

(三)政权组织

1、汤阴县抗日县政府(1938.9成立)

县 长 刘汉生(1938.9——1939.1)

2、考城县抗日民主政府(1938.10建立)

县 长 于子元

3、东菏长濮滑五县联防办事处(1939.10成立)

主 任 杨履谦

4、浚县抗日县政府(1939年秋建立)

县 长 孙子方

5、冀南六县行政督察专署(1940年4月15日建立)

专 员 安法乾

参议主任 晁哲甫

秘书主任 罗士高

专署下设濮滑东长办事处、滑长封延四县边办事处

濮滑东长办事处

主 任 杨 锐

副 主 任 贾心斋

滑长封延四县边办事处

主 任 邢宜理

6、冀鲁豫行政主任公署(1941年1月15日成立)

行署主任 晁哲甫

副 主 任 崔田民

贾心斋

秘 书 长 罗士高

行署下设 3 个专署：

一专署

专 员 安法乾

专署下辖 6 个县政权：

南乐县政府(1940 年 3 月成立)

县 长 刘法尧

刘镜西(1940.7 接任)

清丰县政府(1940.3 建立)

县 长 袁士先(1940.3——1944.5)

内黄县政府(1940 年 1 月建立)

县 长 马冠群(1940.1——1941.12)

尚和县政府(1941 年 2 月由濮北办事处改建)

县 长 郭廷相(1941.2——4,被捕叛变)

卫河县政府(1941 年 2 月新建)

县 长 刘法尧

刘子良(1941.3——1943 春)

顿邱县政府(1941 年 3 月新建)

县 长 牛万里(1941.3——1944.5)

二专署

专 员 杨 锐

专署辖 6 个县政权和 3 个办事处：

滑县县政府(1940 年 4 月建立)

县 长 韩 明(1940.4——1941.5)

濮阳县政府(1941 年 2 月由濮南办事处改建)

县 长 王阜云(1940.3——11)

郭友德(1940.11——1941.9)

昆吾县政府(1941 年 2 月由濮东办事处改建)

县 长 史向光(1941.2——1942.8)

卫南县政府

县 长 耿廷舟

高陵县政府(1941年2月新建)

县 长 赵润普

范文山(1942年夏任职)

长垣县政府

县 长 刘子良(1940.3——9)

濮东办事处

主 任 张晓民

濮北办事处

主 任 郭迁相

濮南办事处

主 任 高连庆

三专署

专 员 刘齐滨

专署辖菏泽、曹县、东垣、曹南、成曹等抗日县政权；

东垣县政府(1941年3月成立)

县 长 郭心斋

(四)军事组织

1、河北民军四支队(1937.10成立)

支 队 长 唐哲明

副支队长 刘大风(安明)

肖汉卿

参 谋 长 张静岑

张西三

政治部主任 刘汉生

张增敬

2、黄河支队(1938.8成立)

司 令 员 鲁德明
政 委 张 伟
参 谋 长 吴近仁
政治部主任 刘培岑

3、八路军游击队第二支队(1938年10月成立)

司 令 员 鲍其祥(1938.10——11)
 陈曙辉(1938.11——1939.3)
政 委 刘汉生(1938.10——1939.3)
副司令员 鲍其祥(1938.11——1939.3)
参 谋 长 鲁德明(1938.12——1939.3)
政治部主任 王从吾(兼,1938.10——1939.3)
政治部副主任 李景岩(1938.10——1939.3)

4、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部驻濮阳办事处(1938.6设立)

主 任 王鹏程(1938.7——1939夏)
 唐克威(1939夏——1940初)

5、冀鲁豫支队(1939.3新建)

司 令 员 杨得志
行动委员会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崔田民
参 谋 长 卢绍武
支队下设5个大队：
第一大队
大 队 长 刘 震
政 委 李雪山
参 谋 长 耿良太
政治部主任 周正华
第二大队
大 队 长 章 健
政 委 常五清

副大队长 冀炳南
参谋长 张赤民
政治部主任 南偕地

第三大队

大队长 鲍其祥
政委 刘汉生
参谋长 鲁德明
政治部主任 李景岩

第四大队

大队长 杨履谦
政委 李一非

第五大队

大队长 王伯生
胡健成
政委 宋励华
参谋长 陈丽泉
政治部主任 王石钧

6、冀鲁豫军区(1940.4—1941.7)

司令员 黄克诚
杨得志(1940.6 接任)
政委 黄克诚(兼)
崔田民(1940.6 接任)
参谋长 韩振纪
卢绍武(1940.6 任职)
政治部主任 崔田民
唐亮(1940.6 接任)

军区下辖 3 个军分区：

第一军分区

司令员 朱 程

政 委 闻允志

王凤梧(1940.8 接任)

副司令员 张锡珩

颜东山

参 谋 长 戴元仁(1941.6 任职)

政治部主任 王焕如

分区辖县级军事组织:

1、清丰县卫东大队(1940.3——4)

大 队 长 袁士先(兼)

政治部主任 刘镜西

2、清丰县独立团(1940.4 建立)

团 长 韩朴斋

政 委 刘香斋

3、清丰县基干大队(1941.1 组建)

队 长 袁士光

政 委 张 超

4、南乐县独立团(1940.4——1941.6)

团 长 刘法尧(1940.6——9)

刘镜西(1940.9——1941.7)

5、内黄县大队

队 长 马冠群

政 委 陈瑞光

6、尚和县大队

队 长 郭迁相

政 委 陈金斗

7、顿丘县大队

队 长 牛万里

政 委 赵振邦

8、卫河县大队

队 长 刘子良

政 委 马天胜

9、昆吾县独立团

团 长 史向光

政 委 宗凤鸣

10、卫南县独立团

队 长 耿迁舟

政 委 李照远

11、高陵县独立团

队 长 赵润普

政 委 陈瑞光

12、长垣县独立团

队 长 刘子良

政 委 许阴森

第二军分区

司 令 员 (缺)

政 委 张荫魁

副司令员 周桂生

李静宜

参 谋 长 戴元仁

政治部主任 鲍鸿光

分区下辖的县级军事组织：

1、濮阳县青年大队(1940. 2——4)

队 长 冉正合

政 委 鲍鸿宾

2、濮阳县独立团(1940. 4——12)

团 长 王卓云

政 委 裴志耕

3.滑县独立团

第三军分区

司 令 员 张耀汉

政 委 赵基梅(1941.7 离职)

参 谋 长 孙子植

政治部主任 郭心斋

分区辖河南的县级军事组织：

东垣县大队：

队 长 郭心斋

政 委 毕玉奇

李恒生

三、中冀鲁豫时期(1941.7——1944.5)

(一)党的组织

中共冀鲁豫区党委(1941.7——1942.12)

1941年7月1日,根据北方局和集总决定,冀鲁豫和鲁西两区合并,仍称冀鲁豫边区。合并后区党委仍属北方局领导。

书 记 张霖之

副 书 记 张 玺

组织部长 张 玺(兼)

宣传部长 张承先

民运委员会书记兼妇委书记 刘宴春(1941.7——1942.10)

民运部长 刘宴春(1942.10——1943.7)

社会部长 信锡华

两区合并后,原鲁西区之一、二、三、四地委不变,原冀鲁豫区

之一、二、三地委改为五、六、七地委。此时，区党委共辖7个地委，一个工委和一个实验县。据1941年12月底统计，区党委辖县委51个，共产党员36993人。其中在河南省境内的有二、五、六、七、八地委。

中共二地委

书 记 万 里

组织部长 赖汝舟

李广录(1942.5接任)

宣传部长 白 桦

民运部副部长 刘 蒂

二地委辖寿张、范县、濮县、鄄城、郓城、济宁、汶上7个县单位，5个县委，3个工委。其中寿张、范县、濮县现为河南南分。

中共寿张(今台前)县委

书 记 高黎光(1941.6—1943.6)

中共范县县委

书 记 鲁 森(1941.3—10)

王镜如(1941.10—1942.10)

成 润(1942.10—12)

中共濮县县委

书 记 李 坚(1940.7—1942.10)

鲁 明(1942.10—1943.7)

中共范(县)寿(张)朝(城)阳(谷)工委(1941年12月建立)

书 记 刘秀山(1941.12—1942.秋)

邵汝群(1942秋—1943年秋)

中共五地委

书 记 郭 超

副 书 记 唐克威(1942离职)

组织部长 白 潜

宣传部长 陆凤翔
统战部长 安法乾
民运部长 杨 节
办公室主任 孙汉章

地委下设 7 个县委：

中共南乐县委

书 记 唐晓声

中共清丰县委

书 记 张 超

中共尚和县委

书 记 陈金斗

中共卫河县委(1941 年 3 月建立)

书 记 马天胜

魏明光(1941. 11——1946. 5)

中共内黄县委

书 记 张 华

张善言(1941. 12——1942. 1)

李剑英(1942. 2——12)

中共顿邱县委

书 记 赵振邦(1942. 4 任职)

中共高内县委 1942 年 8 月,内黄县委与高陵县委合并成立高内县。

书 记 白 潜

中共六地委

书 记 赵紫阳

组织部长 张建廷(1942. 6 牺牲)

张泽民(1942. 6 任职)

宣传部长 魏晓云

统战部长 杨 锐(兼)

秘书长 黄鹤鸣(1942.6—11)

地委辖 6 个县委,1 个县工委;

中共滑县县委

书 记 马瑞华

中共濮阳县委

书 记 常 颂(1941.2—1942.9)

宋乐三(1942.9—1943.11)

中共昆吾县委

书 记 宗风鸣

常 颂(1942 年秋接任)

中共卫南县委(1941 年滑长封延四县边办事处改为卫南县委)

书 记 李明远

张泽民(1942 年接任)

中共长垣县委

书 记 许阴森

中共高陵县委

书 记 陈 瑞(1941.1—12)

孙明三(1942.1—12)

中共卫西工委

书 记 孔 森(1941.秋—1942.4)

石侠风(1942.5 接任)

中共七地委

书 记 戴晓东(1941.7—1942.12)

组织部长 王健民(1943.1 离任)

宣传部长 陈 瑞(1941.7—1942.9)

李恒生(1942.9—12)

统战部长 刘齐宾(兼)

军事部长 宋励华

民运部长 于子元

敌工部长 李一非(1941.7—1942.8)

地委辖菏泽、考城、东明、民权、齐滨、东垣、定陶(工委)等县委。其中在河南境的有考城、民权、东垣、曹商、民兰考5个县边工委。

中共考城县委

书 记 蔡西峰

杜润生(1941.9—1942.3)

曹鸣和(1942.4—1943.5)

中共民权县委

书 记 周致远(代理)

曹、商、民、兰、考五县边工委(1942年7月建立,1943年9月撤销)

书 记 李济民

中共东垣县委

书 记 陈 平

王克狄(1941.11接任)

中共八地委(1942年7月建立,12月并入二地委)

书 记 唐克威

组织部长 邵子言

地委辖昆山、张秋、寿张、东平、汶上等县委。其中寿张及张秋部分地区现属河南区划。

中共寿张县委

书 记 高黎光

中共张秋县委

书 记 王化克

1942年10月,北方局派原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并将湖西地区划归冀鲁豫边区。12月,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边区实行了第三次精兵简政,区党委部分领导干部下到地委、军分区工作,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军分区和县区武装政委,原则上由地、县、区委书记兼;对地委、专署、分区的区划进行了调整。原一、四地委合并为一地委,二、三地委不变,原五、六地委合并为四地委,原七地委改为五地委,湖西为六地委。

中共冀鲁豫区党委(1942.12——1944.6)

书 记 黄 敬
副 书 记 张 霖 之
组 织 部 长 张 霖 之(兼)
宣 传 部 长 张 承 先
民 运 部 长 刘 宴 春
社 会 部 长 信 锡 华
秘 书 长 韩 宁 夫

中共二地委

书 记 董 君 毅(即段君毅)
副 书 记 万 里
组 织 部 长 高 明
宣 传 部 长 马 诚 斋
民 运 部 长 杨 节(1943.1——5)
 吴 肃(1943.5——11)
 刘 蒂(1943.12接任)

地委辖濮县、范县、观城、寿张、张秋、鄆西(工委)、临泽、郛北、鄆北、汶上(工委)、东平等十余县。其中在河南活动的有濮县、范县、寿张、张秋等县委。

中共濮县县委

书 记 鲁 明(1942.10——1943.4)

杨 节(1943.5——1945.4,兼)

中共范县县委

书 记 陈 瑞(1942.12——1943.1)

李明实(1943.1——1944.1)

中共寿张县委

书 记 高黎光(1941.6——1943.6)

李仲勋(1943秋——1944年秋,兼)

高黎光(1944秋接任)

中共张秋县委

书 记 王化先(1941.4——1945.8)

中共四地委

书 记 张 奎(1942.10——1943秋)

张国华(1943年秋接任)

副 书 记 张国华(1942.10——1943年秋)

赵紫阳 (1943年秋任职)

组织部长 郭 超(1943.7——1944.1)

宣传部长 赵紫阳

民运部长 段 毅(1943.7兼任)

地委辖清丰、南乐、昆吾、尚和、卫河、滑县、滨河、顿丘、卫南、
长垣等县委和延浚汲淇四县边、安阳东部工委。

中共南乐县委

书 记 唐晓声

姚会彬(1944.4——1945.7代)

中共清丰县委

书 记 陆凤翔(1943.1——1944.8)

中共尚和县委

书 记 张 超

中共昆吾县委

书 记 常 頌

中共濮阳县委

书 记 宋乐三

史向光(1943.2 接任)

中共卫南县委

书 记 张泽民

中共滑县县委

书 记 马瑞华

张 华(1943 年秋——1946.5)

中共滨河县委(1943 年 1 月,在濮滑东长四县边交界处建立)

书 记 蒋中岳

徐 枫(1938.8 接任)

中共顿邱县委

书 记 赵振邦(1941——1944.12)

中共卫河县委

书 记 魏明光

中共高内县委(1943 年 1 月建立)

书 记 白 潜(1943.1——12)

鲁 明(1944.1——12)

中共延 浚 汲 淇四县边工委(1943 年夏建立)

书 记 李先贤(1943 夏——1945.6)

中共安阳东部工委(1943.9 建立)

书 记 林 晓

中共卫西工委

书 记 石侠凤

中共五地委

书 记 张承先(1942.12——1943.6)

刘 呈(1943.7——1944.5)

副 书 记 戴晓东(1942.12——1944.5)

张承先(1943.7——1944.5)

组织部长 戴晓东(1942.12——1944.5 兼)

宣传部长 徐剑平(1942.12——1944.2)

李春兰(1944.2——1944.5)

军事部长 宋励华(1942.12——1944.5)

民运部长 逯昆玉(1942.12——1944.5)

地委辖齐滨、荷泽、定陶、考城、东明、南华、东垣、曹西、兰封等
县委及曹商民兰考工委。

考城县委

书 记 曹鸣和(1942.4——1943.5)

李建英(1943.5——1944.4)

范 璜(1944.5——1945.6)

李垣生

东垣县委

书 记 张志刚(1944.11 接任)

兰封县委(1942 年成立)

书 记 李绪三

中共曹(县) 商(邱) 民(权) 兰(封) 考(城)工委:

书 记 李济民(1943.7——9)

中共六地委

第一书记 唐 亮(1942.12——1943.1)

第二书记 潘复生(1942.12——1943.1)

书 记 潘复生(1943.1 任取)

组织部长 陈汉如

宣传部长 郝中士

统战部长 郭影秋

民运部长 鹿渠清

军事部长 郭彩秋(兼)

地委辖单县、金乡、丰鱼、单西南等县委(工委)。其中单西南工委活动在单南和虞北的结合部。

中共单西南工委

书 记 丁润桥(1941.10——1944.7)

中共水东地委

1941年3月,中共睢杞太地委改名为水东地委。1941年12月,中央决定水东地区由冀鲁豫边区代管。1943年1月,正式划归冀鲁豫边区建制。

书 记 马一鸣(1941.3——1943.1)

唐克威(1943.1任职,同月牺牲)

李中一(1943.3——1944.7)

袁 振(1944.7——1945.3)

副 书 记 马一鸣(1943.1——1944.7)

李中一(1944.7——1945.3)

张剑石(1941.3——1943.1)

组织部长 马一鸣(1943.1——1944.7兼)

宣传部长 刘勤初(1941.3——5)

民运部长 张剑石(1943.1——1944.7)

社会部长 贺林良(1941.4——1945.3)

敌工书记 刘 影(1942冬——1944秋)

路肖寒(1944秋——1945.3)

地委辖杞南、杞通、杞北、睢太、民权、鄆尉等县委:

中共杞南县委(1944年8月,改称芝圃县委)

书 记 孙廷甫(即孙一鹏 1943.1——1944.8)

王建一(1944.8——1945.3)

中共杞北县委:

书 记 徐麟村(1945.3——8)

刘振邦(1942.4——1943.8)

徐济生(1943.8——1944.1)

中共杞通工委(1944.8改为运生县委)

书 记 苗久锐(1943.3——1944.7)

张增文(1944.11——1945.8)

中共睢太县委

书 记 贺林良(1941.4——1944.8)

中共民权县委

书 记 周致远

中共鄆尉县委(1945.7建立)

书 记 李荣明(1945.7——9)

(二)政权组织

冀鲁豫行署

1941年7月7日,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此后冀鲁豫行署隶属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其所辖一至七专署改称晋冀鲁豫边区十六至二十二专署(地委、军分区名称不变)。

主 任 晁哲甫

副 主 任 董君毅

贾心斋

秘 书 长 王卓如 刘铁之

行署辖8个专署,其中十七、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专署与河南有关。

十七专署

专 员 邹鲁叔

副 专 员 张 方

专署辖范县、濮县、观城、寿张、昆山、张秋、东平、汶上、鄆城、临泽、郟城等县,其中范县、濮县、寿张属河南部分,张秋县的部分

地区属河南区划。

范县县政府

县 长 刘玉汝(1940.3—1941.3)
孔百川(1941.3—1942.9)
成 润(1942.9—1943.12)
王 彪(1943.12—1944.4)
刘镜西(1944.4—1945.4)
陈辑五(1945.5—8)

寿张县政府

县 长 郭少川(1940秋—1945.5)

濮县县政府

县 长 韩哲一(1941.1—1942.11)
马继孔(1942.11—1944.6)

张秋县政府(1941年在寿张、阳谷、东阿三县交界成立)

县 长 夏仲远(1942春离职)
柏洁民(1942春—1943.6)
李克东(1943.6任职)

范(县)寿(张)朝(城)阳(谷)办事处

主 任 樊瑞卿

二十专署

专 员 安法乾

专署辖南乐、清丰、尚和、卫河、内黄、顿邱、高内7个县政府：

南乐县政府

县 长 刘镜西(1940.7—1944.4)
胡通三(1944.4—1945.8)

清丰县政府

县 长 袁士先

尚和县政府

县 长 任子庸

卫河县政府

县 长 刘子良

内黄县政府

县 长 张 志(1941.12——1942.12)

顿邱县政府

县 长 牛万里

高内县政府

县 长 张 志(1943.1——1944.12)

二十一专署

专 员 杨 锐

专署辖6个县政权：

滑县县政府

县 长 张惠僧(1941.8——1942.4)

范文山(1942.12——1946.10)

濮阳县政府

县 长 史向光(1941.9——1943.2)

李松延(1943.2——1945.10)

昆吾县政府

县 长 封禹卿(1942.8——12)

马 达 (1943.1——1944.5)

卫南县政府

县 长 耿廷舟

贾清泉

长垣县政府

县 长 刘子良

高陵县政府

县 长 赵润普(1941.1——11)

范文山(1941.12——1942.12)

二十二专署

专 员 刘齐滨(1941.9——1942.4)

袁复荣(1942.6——1943.9)

专署辖考城、东明、东垣、曹县、菏泽等县,其中在河南活动的有考城、东垣县政府。

考城县政府(1942年8月成立)

县 长 李明勋(1942.8——1942.12)

于子元

东垣县政府(1941年3月由东垣办事处改建)

县 长 郭心斋(1941.3——1943.6)

二十三署(1942年7月建立,12月撤销)

专 员 王笑一

专署辖张秋、寿张、东平、汶上、山等县:

张秋县政府

县 长 柏洁民(1942年春——1943年6月)

寿张县政府

县 长 郭少川

1942年12月,冀鲁豫边区在精兵简政中,对行政区划也进行了调整。十六、十九专署合并为十六专署,十七专署不变,十八专署划归冀南,二十、二十一专署合并为十九专署,二十二专署改称二十专署,湖西地区改称二十一专署。

十七专署

专 员 邹鲁风

成 润(1944.3接任)

副专员 张 方

专署下辖与河南有关的县政府:

范县政府

县 长 成 润(1942.9—1943.12)
王 彪 (1943.12—1944.4)
刘镜西(1944.4—1945.4)

濮县政府

县 长 马继孔(1943.1—1944.4)
袁士先(1944.4—1945.4)

寿张县政府

县 长 郭少川

张秋县政府

县 长 柏洁民
李克东(1943.6 任职)

十九专署

专 员 罗士高(1942.2—1944.8)
副 专 员 杨 锐(1942.2—1944.8)
张惠僧(1942.12—1944.8)

专署下辖卫河、濮阳、高内、滑县、滨河、卫南、南乐、清丰、尚和、昆吾、顿邱等县：

卫河县政府

县 长 刘志良
刘法尧(1943 年夏至秋)
郭良才(1943 年秋—1945.9)

顿邱县政府

县 长 牛万里
熊正阳(1944 年 5 月接任)

濮阳县政府

县 长 史向光
李松延(1943.2—1945.10)

高内县政府

县 长 张 志

南乐县政府

县 长 刘镜西(1940.7——1944.4)

胡通三(1944.4——1945.8)

清丰县政府

县 长 袁士光

陈桐源(1944.5 接任)

尚和县政府

县 长 任子庸

昆吾县政府

县 长 马 达(1943.1——1944.5)

吕 谦(1944.6——1945.12 代理)

滑县政府

县 长 范文山

滨河县政府(1943年1月,在濮阳、滑县、东明、长垣边界地区建立)

县 长 郭涤生

邛 来

卫南县政府

县 长 耿廷舟

贾清泉

延浚汲淇四县边办事处(1943年10月建立)

主 任 姚步霄

二十专署:

专 员 袁复荣(1942.6——1943.9)

管大同(1943.9——1944.7)

专署辖齐滨、菏泽、定陶、考城、东明、兰封、南华、东垣等县:

东垣县政府

县 长 赵河普

兰封县政府

县 长 徐锡鹏(1942——1945)

考城县政府

县 长 于子元(1943.1——9)

郭心斋(1943.9——1944.4)

二十一专署:

专 员 郭彩秋(1942.12——1944.6)

副 专 员 牛连文(1943.2——1944.5)

专署辖单县、虞城、鱼台、丰县、单西南、徐北、钜南等地。其中单西南办事处,活动在单南、虞北的结合部。

单西南办事处

主 任 孟静之(1941.10——1947)

水东抗日联防委员会办事处(1941年8月建立)

主 任 崔 挺(即薛朴若)(1941.8——1944.8)

副 主 任 孙卫和(1942.11——1943.1)

郑 华(1943.1——1944.8)

办事处辖杞通、杞南、杞北、睢太四个县级办事处,1942年1月至1943年1月称中心分会。

杞通办事处

主 任 毛春林(1942.1——1943.1)

孙卫和 (1943.1——1944.2)

李 良 (1944.1——8)

杞南办事处

主 任 夏仲运(1943.1——1944.1)

陶均安 (1944.2——1944.7)

杞北办事处

主 任 孙其昌

睢太办事处(1943年夏建立)

主 任 苗泽生

孙卫和(1944.3—6)

(三)军队组织

冀鲁豫军区

1941年7月,冀鲁豫与鲁西两军区合并为冀鲁豫军区,两区主力部队合并为八路军第二纵队(兼军区)。

司 令 员 崔田民

政治委员 苏振华

副司令员 杨 勇

参 谋 长 卢绍武

政治部主任 唐 亮

军区辖8个军分区,其中在河南活动的有二、五、六、七、八分区。

二分区

司 令 员 周桂生

政 委 关盛志(1941.7接任)

参 谋 长 潘 焱

政治部主任 汲 新

军分区辖现属河南的县级军事组织:

1、濮县抗日基干大队(1941年1月组建)

队 长 刘培岑(1941.1—1942.6)

韩哲一(1942.6—11兼)

政 委 李 坚

鲁 明(1942.10—1943.4)

2、范县抗日大队(1940.3组建)

队 长 孔百川(1941.3—1942.9)

成 润(1942.9—1943.12)

政 委 鲁 森(1941夏——10月)
王镜如(1941.10——1942.9)

3、寿张县大队

队 长 郭少川(兼)
政 委 高黎光(兼)

4、张秋抗日大队

队 长 柏洁民(兼)
政 委 王化先(兼)

五分区

司 令 员 朱 程
政 委 王凤梧
副司令员 颜东山
张锡珩
参 谋 长 戴元仁(1941.7——1942春)
赵东寰
政治部主任 王焕如
魏明伦

军分区辖现属河南的县级军事组织：

1、尚和县大队

队 长 任子庸(1941年4月任职)
政 委 (缺)

2、清丰县基干大队

队 长 袁士先
政 委 张 超

3、卫河县基干大队

队 长 刘子良
政 委 马天胜(1941.3——1942.10)
魏明光(1942.5任职)

4、顿丘县基干大队

队 长 牛万里

政 委 赵振邦

5、南乐县基干大队

队 长 刘镜西

政 委 唐晓声

六分区

司 令 员 唐哲明

李静宜(1941.10 任职)

政 委 裴志耕

副司令员 李静宜

戴元仁

参 谋 长 程绍祥

政治部主任 鲍鸿光

军分区辖现属河南的县级武装组织：

1、濮阳县大队

队 长 刘子明(1942.1—1942.4)

政 委 史向光

2、滑县县大队(1941 年秋建立,1943 年改为十八支队,1944

年改为滑县独立团)

队 长 贾 英(1941 秋—1943)

史文标(1943 年任职)

政 委 白征戈

3、昆吾县大队

队 长 刘子明

政 委 陈玉峰

常 颂(1943.1—1944.5)

4、卫南县大队

队 长 耿廷舟
政 委 张泽民

5、高陵县大队

队 长 赵润善
范文山
政 委 陈 瑞

七分区

司 令 员 张耀汉
政 委 赵基梅(兼)
副 政 委 张荫魁

军分区辖河南的县级军事组织有：

考城县大队

大 队 长 李荣村
政 委 杜书润
曹明和

八分区(1942年7月建立,12月并入二分区)

司 令 员 吴继章
政 委 韩 明
唐克威
副 政 委 高亨承
参 谋 长 张甲勋
政治部主任 魏金山

军分区辖河南的县级军事组织有：

1、寿张县大队

大 队 长 郭少川
政 委 高黎光

2、张秋县抗日大队

大 队 长 柏洁民

政 委 王化先

水东独立团

团 长 马玉堂(1941.3——12)

林耀斌(1941.12——1943.4)

政 委 王其梅(1941.5——1942.9)

马一鸣(1942.9——1945.3)

副团长 王广文(1941.3——1945.3)

政治部主任 马一鸣(1941.5——1941.12)

苗丕一(1941.12——1945.8)

水东各县武装:

1、杞县县大队(1940年8月成立)

队 长 何复顺(1941.1——1942.11)

孟繁馨(1942.11——1943.1)

政 委 王建一(1941.1——1944.8)

2、杞北大队(1941.11组建)

队 长 王法湖(1941.11——1943年底)

政 委 侯 杰(1941.11——1943年底)

3、通许县大队(1941.1建立)

队 长 毛春林

4、杞通大队(1941.3——1941年底)

队 长 王安胜(1941.3——6)

毛春林(1941.6——1941年底)

政 委 张克刚(1941.3——11)

1942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主力部队地方化和精兵简政精神,八路军第二纵队和冀鲁豫军区合并,同年12月,对各军分区进行了调整。原一、四分区合并为一分区,南进支队与原五、六分区合并为四分区,教七旅与原七分区合并为五分区,教四旅与原湖西分区合并为六分区。其中在河南活动的有二、四、五、六分区。

鲁豫军区(1942.12——1944.6)

司令员 杨得志
政 委 黄 敬
副司令员 杨 勇
副政委 苏振华
参谋长 阎揆要
政治部主任 崔田民

二分区

司令员 曾思玉
政 委 段君毅(兼)
副司令员 周桂生
参谋长 潘 焱
政治主任 尹 斌

范阳春(1943年下半年任职)

军分区辖河南的县级军事组织有：

1、濮县抗日基干大队

队 长 马继孔
政 委 鲁 明

2、范县抗日大队

队 长 成 润(1942.9——1943.12)
王 彪(1943.12——1944.4)
刘镜西(1944.4——1945.4)

政 委 陈 端

3、寿张县大队

队 长 郭少川
政 委 高黎光

4、张秋县抗日大队

队 长 柏洁民

政 委 王化先

四分区

司 令 员 赵承金

政 委 张国化

第二政委 张 玺

副司令员 朱 程(1943.1——5)

赵东寰(1943.6 接任)

参 谋 长 赵东寰(1942.12——1943.6)

胡乃超(1943.6 接任)

政治部主任 王焕如

军分区辖河南的县级军事组织：

1、濮阳县大队

队 长 封离卿(1943.1——1944.5)

政 委 常 颂(1943.1——1944.5)

2、卫河基干大队

队 长 刘子良(1941.3——1943 春)

刘法尧(1943 春——7)

郭良才(1943.7——1945.9)

政 委 魏明光(1942.5——1946.5)

3、顿丘县基干大队

队 长 牛万里

熊正阳(1944.5——12)

政 委 赵振邦

4、尚和县大队

队 长 任子庸(1941.4——1944.10)

政 委 张 超(1942.12——1944.10)

5、清丰县基干大队

队 长 袁士先(1941——1944.5)

陈桐源(1944.5 任职)

政 委 张 超(1941——1943.1)

陆凤翔(1943.1——1944.5)

周国玺(1944.5 任职)

6、南乐县基干大队

队 长 刘镜西

胡通三(1944.4——1945.8)

政 委 唐晓声

姚会彬(1944.4——1945.7)

7、昆吾县大队

队 长 马 达(1943.1——1944.5)

政 委 常 颂

五分区

司 令 员 赵基梅(1942.12——1943.6)

朱 程(1943.6——9)

昌炳柱(1943.9——12)

赵基梅(1943.12——1944.5)

政 委 张承先(兼,1942.12——1943.7)

刘 星(1943.7——1944.5)

副司令员 吴大明(1941.7——1942.12)

张耀汉(1942.12——1944.7)

宋励华(1944.5 任职)

副 政 委 张承先(1943.7——1944.5)

参 谋 长 李东朝(1942.12——1944.5)

政治部主任 谢福林

分区辖河南的县级军事组织:

考城县大队

大 队 长 于子元

郭心斋
第一政委 曾明和(1942.4—1943.5)
李建英(1943.6—1944.4)
政 委 范 璞(1944.5—1945.8)

六分区

1943年11月,原第三军分区划归冀南军区,六分区改为三分区。

司 令 员 邓克明
王秉璋(1943.1接任)
政 委 唐 亮
潘复生(1943.3接任)
副司令员 郭影秋
副 政 委 潘复生(1942.12—1943.3)
参 谋 长 匡 斌
政治部主任 戴润生

军分区辖有关河南的县级军事组织:

单西南大队

队 长 孟静之
政 委 丁涧桥

水东独立团

团 长 林耀斌(1942.12—1943.4)
张刚剑(1943.4—1944.7)
政 委 马一鸣(1942.9—1943.1)
唐克威(1943.1)
李中一(1943.3—1944.7)
副 团 长 王广文(1941.3—1945.3)
副 政 委 韩 明(1943.1—1944.7)
参 谋 长 陈子植(孙子植,1943.1—1943.3)

政治部主任 苗丕一

水东各县武装

1、杞南大队(1944.1由杞县大队改建)

队 长 孟繁馨(1942.11——1943.1)

王其法(1943.1——1944.8)

政 委 王建一

2、杞北大队

队 长 王法洲

杨宏献(1944年初——1944.8)

政 委 侯 杰

徐济生(1944初——1944.8)

四、大冀鲁豫时期(1944.6——1945.9)

为统一和加强冀鲁豫边区和冀南地区对敌斗争的领导,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冀鲁豫边区和冀南地区合并成立冀鲁豫分局(亦称平原分局)。根据北方局决定,冀鲁豫和冀南两区党委,于1944年5月11日正式合并,并相继组成了新的冀鲁豫行署和冀鲁豫军区。全区共辖13个地委、专署和分区,共115县。其中在河南活动的有八、九、十、十二、十三地委。

(一)党的组织

中共冀鲁豫中央分局

书 记 黄 敬

宋任穷(1944年7月,黄敬因病离职后代理书记)

组织部长 宋任穷

宣传部长 李菁玉

民运部长 张霖之

秘 书 长 张 玺

办公室主任 郭绍汤

中共八地委

书 记 段君毅

万 里(1945年6月接任)

副 书 记 万 里(1944.5——1945.6)

郭 超(1945.7任职)

组织部长 高 明

宣传部长 马诚斋

金 凤(1945.6任职)

民运部长 许景贤

杨 节(1945.4任职)

地委辖濮县、南峰、昆山、张秋、汶上、南旺、郛城、鄆城、郛巨、临泽、昆吾、尚和、范县、东平、清丰、南乐、寿张等县委,其中濮县、寿张、范县、张秋、清丰、南乐、昆吾、尚和县委在河南区划内活动。

中共濮县县委

书 记 杨 节(1943.5——1945.4)

李 坚(1945.4——1947.8)

中共范县县委

书 记 吴 肃(1944.1——1945.10)

中共寿张县委

书 记 李仲勋(1943.10——1945.3)

高黎光(1945.3——8)

中共张秋县委

书 记 王化先

中共尚和县委

书 记 张 超(1942.12——1944.10)

中共清丰县委

书 记 陆凤翔(1943.1——1945.5)

周国玺(1945.5——1946.6)

中共南乐县委

书 记 姚会彬(代理)

中共昆吾县委(1944年10月,尚和县和昆吾县合并为昆吾县)

书 记 李明实(1944.6——1945.5)

宗凤鸣(1945.5——1947.6)

中共九地委

书 记 张国华(1944.7任职)

副 书 记 赵紫阳

组织部长 白 潜

宣传部长 赵紫阳(兼)

安法乾

魏晓云

民运部长 李进宝

统战部长 杨 锐(兼)

地委辖卫河、濮阳、滑县、卫南、长垣、内黄、高陵、顿邱、延津、卫滨、滨河等县委:

中共濮阳县委

书 记 史向光

中共滑县县委

书 记 张 华(1944.5接任)

中共卫南县委

书 记 张泽民(兼)

中共卫河县委

书 记 魏明光

中共顿邱县委

书 记 赵振邦

中共滨河县委

书 记 徐 枫
林 远(代理)
常 硕(1945年7月接任)
王愈明(1945年8月接任)

1944年12月,高内县分为内黄县和高陵县:

中共内黄县委

书 记 孙明三(1945.1—1948)

中共高陵县委

书 记 晋 明(1945.1—7)

刘松波(1945.8—1948.7)

中共卫河县委(1945年1月,顿邱县并入卫河县)

书 记 魏明光

中共卫滨县委(1945年6月,延浚汲淇四县边办事处撤销,建立卫滨县和延津县)

书 记 马瑞华

中共延津县委

书 记 于 健

中共卫西工委

书 记 石侠风

中共十地委

书 记 刘 星(1944.5—1945.8)

副 书 记 张承先(1944.5—1945.8)

戴晓东(1944.5—1945.8)

组织部长 戴晓东(兼)

宣传部长 李春兰

民运部长 逯昆玉

武委主任 宋励华

社会部长 王镜如

地委辖菏泽、东明、南华、东垣、齐滨、曹县、定陶、考城、民权、虞城等县委。其中活动在河南的有东垣、考城、民权、虞城县委：

中共东垣县委

书 记 张志刚

王镜如(1944.8 接任)

王克敌(1945.8 接任)

中共考城县委

书 记 范 瑛

杨建英(1945.7——1946.11)

中共虞城县委

书 记 展 奇(1945.8——12)

中共民权县委(道北：1944年8月成立)

书 记 李绪三

中共十二地委(1945年3月，冀鲁豫分局决定将水东地委改为十二地委)

书 记 袁 振(1944.7——1945.8)

副 书 记 李中一(1944.7——1945.8)

组织部长 马一鸣(1943.3——1945.3)

社会部长 贺林良(1941.4——1945.3)

民运部长 张剑石(1943.3——1944.7)

地委辖芝圃、达生、克威县委和淮(阳)太(康)西(华)工委、宁柘商工委和睢县工委：

中共芝圃县委

书 记 王建一(1944.8——1945.3)

徐麟村(1945.3——8)

中共达生县委

书 记 张增文(1944.11——1945.8)

中共克威县委

书 记 白 健(1944.8——9)
李培堂(1944.9——1945.8)

中共扶太西县委

书 记 张超海(1945.3—10)

中共宁柘商县委

书 记 张超海(1944.8——12)

中共睢县县委

书 记 苗久锐(1944.7——10)
张 申(1944.11——1945.11)

中共庆华县委

书 记 贺林良(1944.8——1945.8)

中共鄆尉县委

书 记 李紫阳(1945.7——9)

中共淮太西县委(1944年8月建立)

书 记 程锦堂(1944.8——1945.8)

1945年5月,冀鲁豫八团、特务团西渡黄河、挺进水西,开辟鄆城、上蔡、西华、商水、扶沟等新区,6月建立了十三地委、专署和分区。

中共十三地委

书 记 王其梅(未到职,管大同负责地委工作)

组织部长 施德生

宣传部长 刘清训

民运部长 孙一鹏

地委辖鄆上西、西华、鄆扶等县委;

中共鄆上西县委

书 记 赵舒天(1945.5——10)

中共西临鄆县委(1945年6月建立)

书 记 冯明高(1945.6——10)

中共鄆扶县委

书 记 施德生(兼)

中共开封工委

书 记 李苏波(1944.6—1945.4)

丁 一(1945.4—9)

(二)政权组织

冀南与冀鲁豫两区合并后,两行署于1944年6月15日合署办公,翌年5月4日,合并为冀鲁豫行署。原十六专署改称一专署。原冀南的6个专署,依次改为二、三、四、五、六、七专署,原冀鲁豫的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一专署改称八、九、十、十一专署。1945年3月,水东联办改建为十二专署,6月在水西建立十三专署。

全区共13个专署。其中在河南区域活动的有八专署、九专署、十专署、十二专署、十三专署。

冀鲁豫行署

主 任 孟夫唐

副 主 任 徐达本

贾心斋

八专署

专 员 成 润

副 专 员 张 方

专署辖清丰、南乐、昆吾、尚和、濮县、南峰、寿张、鄆城、观城、范县、张秋、郛城、临泽、南旺、汶上等县。其中清丰、南乐、昆吾、尚和、濮县、寿张、范县、张秋在河南境内。

清丰县政府

县 长 陈桐源

南乐县政府

县 长 胡通三

昆吾县政府

县 长 吕 谦

尚和县政府(1944年10月撤销)

县 长 任子庸

范县县政府

县 长 刘镜西(1944.4——1945.3)

陈辑五(1945.3——9)

寿张县政府

县 长 郭少川

濮县政府

县 长 袁士先(1944.4——1945.4)

吉建一(1945.4——1947.10)

张秋县政府

县 长 李克东

九专署

专 员 杨 锐(1944初任职)

副 专 员 张惠僧

专署辖卫河、濮阳、滑县、卫南、滨河、内黄、高陵、顿丘、浚县、
延津、卫滨等县：

卫河县政府

县 长 郭良才

滑县县政府

县 长 范文山(1942.12——1946.10)

滨河县政府

县 长 郭涤生

邙 来

浚县公民村

县 长 杨贯一

内黄县政府

县 长 熊正阳(1945.1——1946.12)

延津县政府

县 长 于少翕

濮阳县政府

县 长 李松廷

卫南县政府

县 长 王 彪

高陵县政府

县 长 葛叔华(1945.1——1947.7)

顿邱县政府

县 长 熊正阳

卫滨县政府

县 长 张欣如(1945.6——1946.6)

十专署

专 员 管大同

张耀汉(1944.8——1945.8)

副专员 华 夫(1944.8——1945.8)

专署辖菏泽、定陶、齐滨、复程、南华、东明、东垣、考城、民权、虞城十县。其中东垣、考城、民权、虞城属河南区划。

东垣县政府

县 长 赵普润

张 岸

民权县政府

县 长 陈丽泉(1944.秋——1945.8)

考城县政府

县 长 郭心斋(1943.9——1946.5)

虞城县政府

县 长 郑美臣(1945.5——12)

十二专署

1944年9月,水东办事处改为水专署。1945年3月,改为冀鲁豫第十二专署。

专 员 薛朴若

副 专 员 郑 华

专署决定将杞南、杞通、杞北、睢太办事处改为芝圃、达生、克威、庆华等抗日县政府:

芝圃县政府

县 长 王建一(1944.8——1945.3)

徐麟村(1945.3——8)

达生县政府

县 长 李 良(1944.8——1945.8)

克威县政府

县 长 韩致安(1944.8——10)

孙其昌(1944.11——12)

杨宠献(1945.1——1948.12)

扶太西县政府

县 长 孙卫和(1945.3——8)

张少耕(1945.8——10)

睢县县政府

县 长 苗久锐(1944.8——12)

刘建民(1945.1——10)

宁(陵)柘(城)商(邱)县政府(1944年8月成立)

县 长 孙卫和

太康县(亦称庆华县)政府(1944年7月成立)

县 长 杨 震(1944.7——1945.9)

淮太西县政府(1944年8月成立)

县 长 段锦堂

鄆尉县政府

县长 李建光(1945.6—1945.9)

十三专署(1946.6建立)

专员 管大同

秘书长 沈彬

专署辖鄆(城)上(蔡)西(华)、鄆(陵)扶(沟)、西华等县:

鄆上西县政府:

县长 侯杰(1945.5—10)

西临鄆县政府(1945年6月建立)

县长 甘文枝

鄆扶县政府

县长 徐鹤琼(1945.8—9)

时尧(1945.9—10)

(三)军队组织

冀鲁豫军区

1944年5月,冀南、冀鲁豫两军区合并为冀鲁豫军区。

司令员 宋任穷

政委 黄敬

副司令员 王宏坤

杨勇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苏振华

参谋长 曾里怀

政治部代主任 朱光

后勤部长 傅家选

军区辖13个军分区,与河南有关的有八、九、十、十二、十三分区。

八分区

司令员 曾思玉

政 委 段君毅
万 里(1945.6 接任)

副司令员 何光宇

副 政 委 尹 斌
郭 超(1945.7 接任)

参 谋 长 潘 焱

政治部主任 范阳春

分区辖与河南有关的县级军事组织

1、尚和县大队

队 长 任子庸

政 委 张 超

2、清丰县基干大队

队 长 陈桐源

政 委 周国玺

3、濮县基干大队

队 长 袁士先

政 委 杨 节

李 坚(1945.4 接任)

4、范县县大队

队 长 刘镜西(1944.4——1945.4)

陈辑五(1945.4——1945.8)

政 委 吴 肃(1944.6 任职)

5、寿张县大队

队 长 郭少川

政 委 高黎光

6、张秋县抗日大队

队 长 杨岭山

政 委 王化先

7、南乐县基干大队

队 长 胡通三

政 委 姚会彬

8、昆吾县大队

队 长

政 委 李明实(1944.6——1945.5)

宗凤鸣(1945.5 接任)

三分区

司 令 员 张国华

政 委 张国华(兼)

副司令员 赵东寰

参 谋 长 胡乃超(1944.7 牺牲)

政治部主任 王焕如

刘振国

分区辖县级军事组织：

1、濮阳县大队

队 长 刘子明

政 委 史向光

2、卫河县大队

队 长 郭良才

政 委 魏明光

3、顿丘县基干大队

队 长 熊正阳

政 委 赵振邦

4、滑县独立团

队 长 范文山

政 委 张 华

5、卫南县大队

队 长 王 彪
政 委 张泽民

6、滨河县大队

队 长 郭涤生
 丘 来
政 委 常 颂
 王愈明

7、内黄县大队

队 长 熊正阳
政 委 孙明三

8、高陵县大队

队 长 葛淑华
政 委 鲁 明
 刘松波

9、卫滨县大队

队 长 张欣如
政 委 马瑞华

10、延津县大队

队 长 于少奋
政 委 于 健

十分区

司 令 员 赵基梅(1944.5——1945.1)
 刘 星 (1945.1——6)
 吴大明 (1945.6——8)

政 委 刘 星

副司令员 张耀汉(1944.5——7)
 宋励华(1944.7——1945.8)
 刘德海(1944.7——1945.8)

副政委 张承先(1944.5—1945.8)

参谋长 李东朝(1944.5—1945.8)

政治部主任 谢福林

分区辖有关河南的县级军事组织：

1、东垣县大队

队长 赵普润

张岸

政委 张志刚

王镜如(1944.8 任职)

2、考城县大队

队长 郭心斋

政委 范璜

3、民权县大队

队长 陈丽泉

政委 李洪三

4、虞城县大队

队长 郑美臣

政委 展奇

十二分区(1945年3月6日成立)

司令员 余克勤

政委 袁振

副司令员 张刚剑

陈子植

副政委 李中一

参谋长 陈子植

政治部主任 金绍山

分区辖县级军事组织：

1、芝罘县大队

队 长 王其法(1943.1——1944.8)
 王建一(1944.8——12)
 陶均安(1944.12——1945.7)
政 委 王建一(1941.1——1944.8)
 徐麟村(1944.12——1945.8)

2、克威县大队

队 长 杨宏猷(1944年初——8)
 韩致安(1944.8——10)
政 委 徐济生(1944初——8)
 李培棠(1944.9——1945.8)

3、达生县大队

队 长 李 良
政 委 张增文

4、鄆尉县大队

队 长 李建党
政 委 李紫阳

5、扶太西县大队

队 长 孙卫和
政 委 张超海

6、宁柘商县大队

队 长 孙卫和(1944.8——1945.3)
政 委 张超海(1944.8——12)

7、睢县县大队

队 长 苗久锐(1944.8——12)
 刘建民(1945.1任职)
政委 张 申(1944.11——1945.8)

8、庆华县大队

队 长 杨 震

政 委 贺林良

9、淮太西县大队(1944.8——1945.8)

队 长 曹宗正

副政委 薛培渡

十三分区(1945年6月建立,10撤销)

司令员 汪家道(未到职)

政 委 王其梅(未到职)

副政委 李士才

参谋长 常志义

政治部主任 杨 劲

分区辖县级武装组织:

1、郟上西县大队

队 长 侯 杰

政 委 赵舒天

2、西华县大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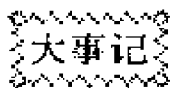
队 长 甘文枝

政 委 冯明高

3、郟扶县大队

队 长 徐鹤琼

政 委 施德生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大事记 (侧重河南部分)

1937年

7月7日 抗日战争爆发。

7月8日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发表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8月 刘宴春重新组织濮县县委。

8月22日至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在抗日战争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8月25日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下辖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三个师,全军共4.6万人。

8月 共产党员晁哲甫、王振华等酝酿筹建冀南文化界抗日守土后援会,在直南、豫北地区,联络党外开明人士高镇五等,发表宣言,并立即组织宣传队分赴农村,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后因遭到国民党大名专员马运昌、濮阳专员丁树本的反对而流产。

9月初 组织“冀南抗日救国十人团”。共产党员晁哲甫、平杰三等人，利用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训处长张荫梧的名义，建立“冀南抗日救国十人团”。团长平杰三，组织委员安法乾，宣传委员冯叶莘。该组织很快发展到清丰、濮阳、内黄、南乐等县，并在各县建立了分团，共有团员三百多人。

9月25日 毛泽东发出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根据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确定了全党搞武装，抓政权，放手发展自己力量的方针，提出了每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要“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中共冀鲁豫边区各地党组织根据上述指示，大力发动群众，组织各界人民抗日救国团体，把组织和参加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作为党的中心任务。

10月 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随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退驻邯郸，指示冀鲁豫特委负责人张玺，迅速派人恢复大名以南各县党的组织，成立直南特委，利用各方面的关系，建立我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就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并批准张玺的建议，同意刘大风任临时直南特委书记。

10月 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释放政治犯的协议，刘汉生、王从吾、张增敬等共产党员陆续从南京、大名、濮阳出狱，立即投入抗日救亡斗争。

10月 晁哲甫在清丰六塔召集冀南文化界救亡图存会议，决定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国运动。

10月 临时直南特委在清丰青石碛村召开会议，讨论了以农村党组织为核心，以抗日救国会会员为骨干，组建抗日武装问题，提出誓死不当亡国奴，武装起来保卫家乡，就地坚持抗日武装斗争的口号，决定争取同情和支持抗日的地主武装参加抗日队伍，并派赵秉谦、齐樵去做国民党民团领导人赵冠经的争取工作。

10月上旬 山东省委决定，建立中共鲁西南工委，领导曹县、菏泽等县的党组织，白子明任书记。翌年5月上旬，鲁西南工委改

为特委。

10月 进步爱国人士张慧僧在滑县上官村召开全县绅士会议，共同商讨抗日救国保地方问题，决定成立滑县抗日保安总队，张慧僧为总队长。全队编为80个中队，共有长短枪1400多支。

10月下旬 刘大风和驻南乐的石友三部一八一师学兵队长、共产党员张克威取得联系，在南乐、清丰一带组织了五、六十人的一八一师抗日游击队，张克威兼任队长，刘大风任副队长（实际是政治委员），袁也烈任参谋长。不久，一八一师南撤，河北省保安司令高树勋部进驻清丰，直南特委通过地下党员唐哲明同高树勋联系，将一八一师游击队改为河北民军第一路第四支队。支队长唐哲明，副支队长刘大风，参谋长张静岑，政治部主任刘汉生。这时四支队已发展到二、三百人，二百多条枪，编为三个中队，一个通讯排。

10月 清丰、南乐、濮内滑、内黄、濮滑县委（工委）成立。王冠儒、郭宪瑞、刘玉峰、马冠群、蒋中岳分别任书记。

10月 王从吾、平杰三、张增敬、刘汉生利用与濮阳专员丁树本的统战关系，在濮阳井店、化村一带，组建了冀鲁豫边八县保安司令部第八大队。大队下辖三个中队，共有一百余人枪。

11月5日 日军占领安阳。27日，伪河南自治政府在安阳成立，肖瑞臣任主席。

11月 直南特委派张静岑到滑县瓦岗扩军，成立了四支队三大队，共集合一百多人，长短枪四十余支。

11月 中共直南特委在清丰县梁村正式成立，朱则民任书记，刘大风任副书记，王从吾任组织部长，刘汉生任宣传部长，晁哲甫任统战部长，唐哲明任军事部长。特委辖内黄、清丰、南乐、濮阳、滑县、长垣、濮内滑、考城、大名、东明、范县、濮县等十二个县委（工委），共有党员一千二百余人。

12月15日 日军侵占清丰、南乐县城。高树勋率部南退，唐哲明也随同南下。为加强四支队的领导，中共北方局派肖汉卿、陈

耀元、漆汉臣三位红军干部来到四支队，肖任副支队长，陈任二中队长，漆任三中队长。从此，四支队的军事政治素质迅速提高。

12月 晋冀鲁豫省工委在焦作成立，张萃中任书记（不久王卓如接任书记），聂真任组织部长，王卓如任宣传部长，薛迅任妇女部长。工委下辖直南、豫北、鲁西、晋南四个特委，以八路军驻国民党第一战区联络处干训部的名义进行活动。此时，王卓如到清丰古城集向临时直南特委和四支队的负责同志，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抗战形势与任务、统一战线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

冬 濮县县委在大赵庄开会，由刘晏春提议，成立“冀鲁豫边区民众抗日义勇队”，鲁德明任队长，王鹏程任政治部主任。

1938年

1月30日 鲁西北特委从范筑先部争取到第十支队番号，以山东第六专区游击第一支队为基础，吸收冠县、阳谷、范县、寿张等县党组织和政训处掌握的抗日武装正式组建第十支队，张维翰任司令，王幼平任政治部主任。

2月21日 中共直南特委为联合各界抗日武装力量，发表了《为联合抗日敬告各武装部队书》，号召成立统一的抗日指挥部。

2月 晁哲甫、晁涌光等人赴山西晋城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学习。1938年1月，从山西返回清丰。2月，直南特委决定撤销清丰、南乐县委，以南乐、清丰、大名公路为界，南乐、清丰县城以东成立边东县委，晁哲甫任书记，南乐、清丰县城以西为边西县委，刘同方任书记。边东县委成立后，晁哲甫团结当地士绅，成立了一千余人的清丰县抗日自卫团，并吸收当地知识分子，在清丰六塔和县城，先后举办五期军政干部训练班，培养了700余名抗日干部，为开展直南抗日救亡运动创造了条件。

2月 直南特委在井店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向各县党组织布置了三项工作任务：（一）发展党员，宣传抗日的有利条件和前途，

提高群众抗日的信心；(二)动员坚定的学生、农民和抗日救国十人团中的骨干，携带枪支继续参加和支援四支队，扩大抗日队伍；(三)贯彻党的统战政策，争取士绅、民团参加抗日，防止地主武装汉奸化。

2月14日 直南特委决定四支队开到沙区活动，队伍经过千口、化村、太平到达井店，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时八大队编为四支队的第四中队，四支队发展到四百多人，270多支枪。此时张增敬任政治部主任，刘汉生任副主任。

2月 直南特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四支队的行动方针问题，决定把四支队拉到了树本所管辖的小濮州一带活动。

2月 敌兵分两路再犯豫北。7日再陷南乐，8日重占清丰，9日攻陷内黄、濮阳，11日攻陷汤阴，13日占领长垣、淇县，15日占领封丘，16日辉县失守，17日新乡沦陷……至2月底，整个豫北几乎全部沦陷。

2月 为进一步做好丁树本部的统战工作，直南特委决定在濮阳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王鹏程、唐克威先后任办事处主任。

2月 四支队奔袭南乐县城，消灭了汉奸维持会，枪决了维持会长何炬之。随后，又袭入清丰县城，捕捉伪维持会20多人，镇压8人。

3月 郭心斋在考城县郭小湖村建立了“抗日自卫队”，开始18人，后发展到300多人。

3月 四支队收复清丰县城。

3月9日和11日 3月8日，四支队开到小濮州驻防。9日上午，敌30多个骑兵来犯，四支队副支队长肖汉卿指挥四支队，从正、左、右三面隐蔽，包抄敌人，乘敌不备，把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这次战斗，共打死鬼子4人，缴获三八式马盖枪四支，战马一匹，和部分子弹、药品。11日，四支队在小常庄配合了树本部阻击日军，激战一昼夜，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终于打退了敌人疯狂反扑。四

支队两次作战均获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当地群众的抗日热情。同时,也鼓舞了士气,教育了友军,使丁树本对四支队的战斗力甚为佩服,放弃了渡河南逃的打算。

3月 小濮州、常庄战斗后,原鲁西特委书记刘宴春同朱则民、王从吾取得联系,后经请示北方局,将山东濮县、范县划归直南特委领导,刘调直南特委任宣传部长。同时,刘宴春领导的鲁西和濮阳交界一带的游击队,合编到四支队,四支队发展到六、七百人。

3月25日 日寇制造长垣县“黄学惨案”。屠杀无辜群众一千七百余入。

3月 中共直南特委与国民党濮阳专员丁树本正式建立了统战关系,在我党帮助下,丁树本提出了“统一战线、军民合作、抗战到底”的三大主张。按照独立自主的原则,我党与丁树本达成了三项协议:(1)四支队受共产党领导,单独打游击;(2)丁树本不向四支队派干部;(3)四支队同意用丁部番号,将河北民军第一路第四支队改称为冀鲁豫八县保安司令部民军四支队,并商定由罗士高、晁哲甫分别担任丁部总政治部正副主任,张炜、李景岩、平杰三分别任总政治部的组织、宣传、民运科长,按照八路军的建军原则整顿部队。其后,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开办了抗日军政训练班。

3月 冀鲁豫边区省委在南宫成立,陈菁玉(即李菁玉)任书记,于光汉任组织部长,马国瑞任宣传部长。直南、豫北和鲁西北地区统属冀鲁豫省委领导。同年8月19日,冀鲁豫省委改为冀南区党委。

3月 清(丰)南(乐)大(名)抗日救国会成立,马采三任会长。

3月28日 日寇围攻浚县城,该城军民奋起抗击。次日,日寇占领该城,惨杀群众数千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浚县惨案”。

4月上旬 四支队再次收复清丰县城,逮捕了24名汉奸,处决8名。

5月初 四支队打进南乐县城,伪县长何举之闻讯逃跑,其弟

何举贤等汉奸被逮捕，并处决了八、九人。接着，四支队又收复了离大名十公里的龙王庙，缴获了一大批军用物资。

4月16日 内黄井店镇一带的绿林武装司令刘相友，在唐哲明、张增敬等多次争取教育下，率领400余人携带四百多支枪加入了四支队。此时四支队发展到千余人。其活动范围扩大到南乐、清丰、濮阳、内黄、滑县、濮县等县全境，在冀鲁豫三省结合部形成了一个广大游击区。

4月21日 党中央发出对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全面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平原地区广大的发展抗游击战争是可能的。在范（筑先）专员、丁（树本）专员地区，仍有原来的政府，应即通过统一战线的推动，迅速改造与加强政府，使之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

4月 直南特委宣传部长刘宴春在濮阳称湾村召开濮、滑、东、长四县党的负责人会议，成立了四县边抗日救国联合会，牛万里、鲍洪光、高连庆先后任会长。

4月 滑县抗日救国会在高平成立。

春 共产党员于子元等在考城县韩集奉家祠堂举办抗日青年训练班。

春 中共党员于子元和鲁西南地下党同志团结王道平共同抗日，组织了陇海抗日支队，成为鲁西南一支抗日力量。

5月9日 日寇出动300多人向濮县城北七里堂进行突然袭击，范筑先临危不惧，沉着应战，歼灭日军50余名。

5月 直南特委在南乐近德固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朱则民、王从吾在会上就党的发展、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组织抗日救国会等问题作了布置。

5月 直南特委决定：撤销边东、边西县委，恢复清丰县委和南乐县工委，安法乾、郭献瑞分别任书记。

5月 直南特委决定撤销濮内滑中心县委，建立内黄县工委，

刘汉勋任书记。

5月 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成立,安法乾为总会负责人兼总会党团书记。总会成立后发一宣言,号召各党派、各阶层、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并派出工作团,到所属各县帮助建立了抗日救国分会。

6月6日 范筑先率队在濮县石墓头伏击日寇运输队,毙伤敌近百人。随后范部收复了濮县。

6月 范县农民抗日救国会在高码头成立。

6月 四支队奉命开赴冀南,升编为一二九师东进纵队第七支队。不久,又整编为东进纵队第三团。

6月 八路军三四四旅六八八团李松林到浚县,通过工作,将地方群众武装“滑浚淇三县人民抗日自卫军”改编为豫北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司令孙思昉、政委李松林。

7月 直南特委将四支队留下的一个连和濮县、清丰等县的抗日游击队合编为黄河支队,共200余人枪,支队司令鲁德明,政治委员张炜。

7月 根据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的决定,鲁西南特委与徐西北区委合并,成立苏鲁豫特委,王文彬任书记,白子明任组织部长,孙衷文任宣传部长,张如任军事部长。

7月 在晁哲甫的倡导下,清丰县建立了抗日战争动委会,晁哲甫任主任,下设组织、宣传、总务、动员分配、锄奸、武装、青年、妇女、农民九个部,它与县救国会合署办公,既管粮草的征收分配,也管治安、武装和农青妇群众工作,是我党领导下的半政权性质的群众组织。

7月 考城县工委成立,马瑞华任书记。

7月 冀鲁豫省委决定大量发展党员,规定7月为“冲锋月”,8月为“突击月”,9月为“国难月”。并以各特委为单位制定了竞赛计划。经过3个月突击发展,直南特委共有支部124个,正式党员

1786 个,比原来增加百分之百。

夏 南乐县工委举办了三期农民、青年、妇女抗日训练班,培训抗日积极分子 500 余人。在此基础上,各村纷纷成立“救国会”,建立和发展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党的队伍也得到较大的发展。

夏 朱总司令在晋东南故县村向三四四旅代杨得志布置开辟冀鲁豫边区任务时指出:你们去的这一片,属于冀鲁豫三省边区。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如今,这里对确保太行山,沟通山区与平原的联系,扼住日军南下和西进,起着很大作用,所以无论如何要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里。

8 月 为加强同丁树本的统战工作,直南特委决定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由清丰迁到濮阳。同年底和 1939 年春,总会在濮阳四次举办培训班,培训附近各县青年学生,抗日积极分子 500 余名,有力地推动了濮阳、东明、东垣一带的抗日活动。

8 月 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成立,刘齐滨任会长。不久,在东明、曹县、菏泽、民权、考城等县设立了分会,在总会统一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群众运动。

9 月 10 日 陈再道、王新亭统一指挥东进纵队,青年纵队、六八九团、新一团等部,渡过漳河,在安阳、内黄等地发起漳南战役,连克回隆,楚旺、吕村集、崔家桥、大韩集等伪匪据点。共歼伪匪军郭青、李台、王自全等部四千余人。

9 月 杨得志、崔田民率部挺进豫北,在滑县地区,同韩先楚(团长)、康子祥(政委)领导的六八九团会合。

9 月 16 日 根据集总命令,一一五师六八八团、六八九团与一二师青年纵队、新一团等部组成漳南兵团,由王新亭、杨得志统一指挥,执行肃清浚县、滑县、淇县等地区伪军的任务。25 日,解放滑县、道口;26 日,追歼伪军扈全录部于淇县刑盆口,俘其 1400 余人。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基本上肃清了平汉路以东,漳河以南,卫河以西,滑县以北,南北百余里内的伪匪军。帮助直南特委开辟了

安阳、内黄、汤阴、滑县、浚县等地区，成立了以刘汉生、张子政为县长的汤阴、安阳抗日民主县政府，这是直南、豫北地区成立最早的抗日民主县政权。

9月 中共内黄县委成立，马冠群任书记。

9月下旬 冀南区党委在南官县韩庄村召开活动分子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各特委书记、专员、县委书记等。会上李菁玉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徐向前作了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报告。

10月18日 六八八团由临淇进入汤阴县，协助汤阴抗日政府缴了原接受我军改编后又阴谋叛变的土匪武装司华生部的械，并派出教导员鲍其祥等干部，重建汤阴县大队。

10月 考城抗日县政府在考城、东明、曹县结合部建立，于子元任县长。这是我党在豫东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抗日县政府。同时建立了县大队，张耀汉任大队长。县政府和县大队建立后，工作进展很快，相继建立了三个区政权，县大队由开始时40多人，后来发展到400多人，并进行了抗日反匪活动。1939年3月，根据统战工作的需要，考城抗日县政府奉命撤销，县大队编入冀鲁豫支队。

10月 寿张、阳谷、东平三县边县委建立，万里任书记。

10月 濮县、范县、观城由直南划归鲁西特委领导。

10月 肖县中心县委成立，书记戴晓东。该中心县委领导肖县，宿（县）西、永（城）北、夏（邑）东、砀（山）南五县党的工作。

秋 直南特委派遣黄鹤鸣到滑县六区桑村一带扩军，在地方党的协助下，一百多名青年农民参军，成立了八路军东进纵队第一支队第二大队，杨庆然为大队长。

秋 濮滑东长四县边抗日救国联合会在甘露寺、称湾等地先后举办抗日救国训练班，共训练基层干部1500多名。

深秋 杨得志奉命率部返回晋东南，在长治，高平一带进行冬季练兵。

11月19日 丁树本在濮阳县两门东南牛寨,将黄河支队二百余人包围缴械。经八路军驻濮阳办事处多次交涉,丁被迫将枪支归还给黄河支队。

11月 三四四旅六八八团三营、旅警卫营和接受我党改编的国民党获嘉县大队合编为三四四旅独立团,团长刘震,政委李雪三。随后挺进冀鲁豫边区抗日。

12月 冀鲁豫农救会、妇救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直南分队部成立,姚恒光被选为农救会主任,傅秋香、范世钧被选为妇救会正副主任,梁伯琪、李静轩被选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直南分队部正副分队长。

12月 濮、内、滑三县边区抗日救国会成立,会长平儒珍。

12月中旬 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副团长覃健,参谋长张赤民奉命率第一营两个连到鲁西南地区活动,与原范筑先部冀炳南之十三支队合编为三四四旅特务团,团长覃健,政委常玉清,团下辖三个营,共800余人。

年底 中共直南特委决定,黄河支队与汤阴县大队合编,组成冀鲁豫游击第二支队,支队长鲍其祥,政委刘汉生,参谋长鲁德明。

12月 冀鲁豫第二支队挺进到滑县、长垣、东明地区开辟工作。

年底 直南特委独立大队建立。中共直南特委在滑县山木村建建立独立大队,大队长江鸿楚。至1939年秋,部队发展到2000多人,后编入新三旅八团。

1939年

1月15日 中共鲁西区党委成立。区党委下辖鲁西、泰西、鲁西北三个特委。区党委书记张霖之,组织部长赵鐔,宣传部长朱则民,民运部长徐运北,统战部长董君毅(即段君毅),秘书赵伊坪。3至6月,撤销特委,先后建立七个地委,其中观城、濮县、聊城、范

县、阳谷、寿张、朝(城)南为二地委,申云浦任书记;郟城、巨野、菏泽、嘉祥、濮(县)南、汶(上)西、东(平)西、寿(张)南为七地委,梁仞仞任书记。

年初 中共豫北地委派李振亚等八名干部以八路军豫北大队工作队名义,到滑长封三县边开辟工作,以马赵庄为中心组织起一支六十余人的游击队,后发展为二百余人的滑长封边区游击大队。

年初 在濮滑工委书记赵紫阳等人争取下,国民党滑县县长陈曙辉率县大队 300 余人接受我军改编,参加冀鲁豫游击第二支队,陈曙辉任司令,鲍其祥任副司令,刘汉生任政委。不久,陈赴延安抗大学习,鲍其祥任司令。

年初 寿张县工委成立,赵凤升任书记。

2月20日 杨得志、崔田民奉命率部二次东进冀鲁豫边区。总部给的任务是:到冀鲁豫扩大部队,待命回山西。

2月 直南特委在濮阳后化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决定将直南特委改为直南、豫北两个地委。直南地委辖:南乐、清丰、濮内滑、大名四个县委,濮北、大名五区二个工委,共有党员 6000 余人。地委书记郭超,组织部长王志刚(朱志纯),宣传部长白潜,民运部长安法乾兼(后是杨节、李进保)。豫北地委辖:滑县、濮南、长垣、东明等县委和滑长封工委。地委书记王从吾(兼),王去延安后刘宴春接任,组织部长吴兰田(后叛变投敌),宣传部长唐克威(后是赵紫阳),民运部长安法乾(兼)。晁哲甫兼两个地委的统战部长。

2月 中共长垣县工委成立,陈平任书记。

2月 罗荣桓率部开辟鲁西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率部到达鲁西黄河两岸开辟抗日根据地。

3月9日 冀鲁豫支队成立。杨得志兼任司令员,崔田民任行动委员会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卢绍武任参谋长。支队下辖五个大

队，四千余人。支队建立后，采取积极打击敌伪，扩大我军影响，壮大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的方针，由濮阳、内黄、滑县一带开到鲁西南地区进行活动。

3月 杨得志率一、五大队 1000 余人，护送从延安派到豫皖苏边区工作的 50 多名党政军干部过陇海路，到睢杞太地区。配合新四军游击支队和地方武装，打击了杞南的李振国部以及民权县的尹店、徐庄、黄庄、代寨等村的土顽和通许县练成集的伪军，尔后经民权返回冀鲁豫边区。

3月25日 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在地方抗日武装李富春部的配合下，围攻虞城县城，守城伪军五百余人反正，为开辟商、虞、单、成、曹五县边打开了局面。

3月 考城县大队在崔杨坝智取土匪王二响鞭，俘其百余名，获枪百余支。

3月 濮(阳)北工委成立，张志刚(乐善)任书记。

4月 长垣县工委改为长垣县委，书记李广录。

4月 滑县反动地主孙祥甫、孙步月兄弟，勾结当地土匪武装盘踞白道口、井店一带，强迫群众参加会道门，组织反动武装，疯狂进行反共，反人民抗日的罪恶活动，并于 1939 年初，制造了“血洗邵村”惨案。为此，我冀鲁豫支队第一、第二大队于 1939 年 4 月发起反攻，围歼了盘踞白毛善的“反共自卫团总部”，俘敌孙甫祥以下 500 余人，并立即处决了孙祥甫，瓦解其分团部 27 个。其后，孙步月继任反共自卫总团团团长，盘踞郭小砦等村，继续与人民为敌。

4月 冀鲁豫支队一大队拔掉许河据点，歼灭伪军马风乐部二百余人。

4月30日 冀鲁豫支队五大队攻克民权县城北王桥镇伪据点，歼伪军一个中队 100 余人。

4月 直南、豫北地委传达学习彭德怀在韩村集对时局的指示。

春 丁树本在直南、豫北地区公开反共，直南、豫北地委对于丁树本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行为，进行了尖锐斗争。

春 濮滑工委改为滑县县委，书记赵紫阳。

春 豫北地委组建教导大队，全队共 2000 余人，大队长刘子明。

5 月 直南特委派杨锐（杨一峰）到长垣县西樊屯做杂牌军高子白、刘凤桐部的争取工作，说服高、刘率部（五百余人）接受我党改编，编为直南三大队第一营。因高、刘皆系兵痞土匪出身，经不起我军艰苦生活的考验，不久即先后潜逃。

5 月 直南豫北地委布置两个月“突击”发展党员计划。在这次“突击”发展中，党员人数得到大量增加，到 1940 年区党委成立时，党员由 1938 年的 1000 余人，发展到 26284 人，在二年中增加了 23 倍多。滑县工委，党员由原来的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余人。这时，我党处于公开或半公开状态，在边区组织起 30 万群众，1.1 万余人的武装。

5 月 豫北地委在滑县中冉村成立豫北大队，全队共 2000 余人，组编三个营，一个骑兵连，一个骑兵通讯排，二个特务连。

6 月 5 日至 23 日 敌伪 6000 多人进攻我濮阳地区。

6 月 28 日 石友三趁日寇“扫荡”我冀鲁豫边区之时，指挥所部一八一、三八等师及孙良诚、李树春等部 3 万人，自称“新中央军”，向濮阳、濮县一带进犯。

7 月 1 日 鲁西南地委建立，戴晓东任书记，王健民任组织部长，袁复荣任宣传部长，宋励华任军事部长，刘齐滨任统战部长，于子元任民运部长。该地委辖曹县、考城、定陶、菏泽、东明、民权等县。

7 月 1 日 鲁西南军民粉碎日伪军七路“扫荡”。

7 月初 中共鲁西南地委派共产党员李东成来民权、宁陵、商丘三县边一带，搞地下工作。先后在孙六、柳汉、宁陵县城等处建立

了联络站和联络点，了解敌情，传递情报，加强与豫皖苏区的联系。同时，在当地武装中开展统战工作。

7月中旬 南乐县长魏汉彬疯狂反共，迫使我党领导的抗日组织靠募捐维持生活。

7月 豫北地委以八路军东进纵队名义在滑县杉木村举办随营学校，校长唐克威，大队长牛万里，政治特派员鲍鸿光。全校一个大队，四个中队，每期3个月，学员300多人，共办四期，训练1000余人。

7月底 建立寿张县委，书记徐坤（即徐继彦）。

8月1日 寿张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杨朴民任县长。

夏 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在彭明治支队长的率领下，由湖西南下越过陇海路进入夏邑县境内，建立了夏邑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几个区政权，杨道显任县长。

夏 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开辟寿张县，建立了一、二、三区抗日民主政权。

9月下旬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杨得志、崔田民创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指出：冀鲁豫边区是山西和山东、华北和华中的结合部。在战略上有重要意义。你部应作长期打算，坚持冀鲁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创造、扩大、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从此改变了“扩大部队，待命回山西”的任务，在长垣、濮阳、滑县、东明、菏泽五县边界设立了五县联防办事处，抗日民主人士杨履谦任主任。同时，一一五师独立旅在阳谷、寿张地区对向我军挑衅的山东保安第一旅齐子修部进行反击，歼灭1000余人。至年底，部队扩大到1.7万余人，为创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0月 冀南区党委在濮阳上堤成立了代表办事处，信锡华为办事处负责人。办事处下设宣传、组织、油印三个科，共有工作人员二、三十人。在办事处领导下，直南、豫北两个地委，逐步健全了县委（工委）、分区委、总支、支部四级党的组织；进行了整理支部和审

查干部工作；将直南地委刊物《光明之路》、豫北地委的《战斗生活》合为《卫河》月刊。区代办事处出版了党报《新中国时报》，豫北地委还出版党报《群声》；全区党员发展到 2.49 万余人，对发展武装不大胆，争取政权不积极等偏向，有了基本纠正。

10 月 20 日 日寇集中兵力五千余，分兵三路再次大举围攻鲁西南根据地。至月底，被我粉碎。

10 月 丁树本下令解散大名二区救国会，成立动委会以对抗救国会；密令停止对救国会的供给；强令解散民先等。我党对丁进行了斗争，在濮阳召开救国会代表大会，并举行游行示威，抗议丁解散大名二区救国会，组织救国会员下乡，加强对各区救国会的领导，巩固了农村阵地。滑县救国会运来大批物资，以解决供给问题。

10 月 豫北地委召开县区干部扩大会议，会上地委书记刘宴春传达了中央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纠正了对丁树本的右倾思想，布置了充分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力量，规定各县都要建立一个青年大队，地委直接领导整顿独立大队和豫北大队。同时，批判了党内怕麻烦不愿当村长的思想，注意掌握政权。

10 月 直南、豫北地委传达贯彻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建立了地委、县委、工委、分区委、总支、支部领导系统。边区由区代一人统一领导，各级党委均有干部三、五人，并开始建立会议、汇报、报告、交通及内部工作等制度。

秋 长垣县委办《曙光报》并成立独立中队。

秋 成立浚县抗日政府，孙子方任县长。

11 月 8 日 日寇集中约一个师团的兵力，对鲁西南进行第三次围攻。冀鲁豫支队在敌重兵严密封锁下，安全转移，使敌扑空。

11 月 建立滑长封工委，书记李振亚。

11 月 国民党顽军进驻两濮地区进行反共活动。

11 月 成立虞商曹单成五县边青年挺进大队，郑杰（即关美臣）任大队长，王开基任政委。下辖三个中队，共有四百多人，活动

于五县边区，负责开辟商丘、虞城北部的敌占区。

11月 考城县抗日武装配合冀鲁豫支队在楼庄消灭日军一个小队。

12月5日 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到冀鲁豫边区视察工作，在山东馆陶县小营镇召开鲁西北、直南、豫北地委和冀南三分区县团以上干部会议，作了坚持抗日斗争和整顿军纪的报告，讲了党的统战政策和斗争策略问题。

12月 建立浚县情报站，王质夫任站长。

12月31日 内黄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马冠群任县长。

1940年

1月 鲁西南军分区组织十九团三个连、齐滨县基干队、考城县游击大队和葛庄游击组，攻打王桥据点，毙敌百余名，活捉包括两个中队长在内280余人，缴获长枪310支，匣枪6支，战马8匹，马车3辆。

1月 直南、豫北地委传达学习中央六月政治局决议。

1月28日 直南、豫北地委召开党政军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研究统一对外宣传，对内教育问题。

1月 冀鲁豫支队五大队在考城县西南楼庄遭到大股日军包围，苦战近一天，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最后突出重围。

1月 延安《军政杂志》发表张赤民《一年来敌对冀鲁豫边的“扫荡”与我们反“扫荡”斗争》一文。文章说：一年来，我军在冀鲁豫边区平原游击战争中，与敌进行过大小战斗101次，毙伤日军680名，伪军785名，俘伪军590名，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2月6日 八路军总部为统一太（行山）南、豫北的作战指挥，决定将太南地区之八路军第三四四旅、新一旅、决死三纵队、冀鲁豫支队、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等部合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集总副总参谋长左权兼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杨得志任副司令员，韩振

纪任参谋长，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唐亮任副主任。纵队下辖新编第一、二、三旅和三四四旅，全纵队 2 万余人。

2 月 9 日至 16 日 冀鲁豫部队参加冀南反顽作战，毙、伤、俘顽军二千八百余人。石友三部遭我沉重打击后，向河北省曲周县日军求援，并在日伪军三千余人的掩护下逃过漳河，退到冀鲁豫地区清丰县东南一带，向卫河以东的高树勋、丁树本等部靠拢。

2 月 20 日 我鲁西南军分区二十团团团长徐茂礼带队到兰封县三区，与区联防队队长张绍儒联系，建立了联防抗日阵线。在一个多月里，曾三次袭击日军，数次破坏陇海铁路，割敌人军用电线，挖断公路，缴获了一些敌人的马匹、枪支、弹药等物资。

2 月 21 日 冀鲁豫支队在固城集、柳格庄与石顽展开激战。

2 月 28 日 冀鲁豫支队突破石顽濮阳以南防线，歼敌一个营。

2 月 豫北地委提出反顽固、反倒退、反投降口号。

2 月下旬 丁树本密令其副司令陈明绍与石友三部袭击我军，蓄意制造分裂。

2 月 濮县、范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王鹏程、刘玉如分别任县长。

2 月 直南、豫北地委布置审查干部、整理支部、扩大武装工作。

2 月 直南、豫北地委召开地县级民运部长会议，研究关于统一战线中的斗争策略等问题。

3 月 豫北地委组织部长吴兰田叛党降敌，拉起反共武装灭共自卫团，疯狂屠杀我党员干部和革命家属 3700 多人。

3 月 4 日至 11 日 为解除顽军石友三部对冀南地区和冀鲁豫边区的威胁，我根据地军民乘其立足未稳，在卫河以东地区进行自卫反击。经八天激烈战斗，共毙伤俘顽军 3600 余人，顽军于 11 日逃至民权县以东，陇海路两侧地区。当天，蒋介石严令鹿钟麟、朱

怀冰、石友三、孙良诚、丁树本等部不准退过黄河，要继续向八路军进攻。

3月 清丰抗日自卫团改编为卫东大队，袁士先任大队长，刘镜西任政治部主任。

3月 南乐县独立团成立，团长刘法尧，政委傅润泽。

3月 南乐、清丰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刘法尧、袁士先分别任县长。

3月 东进纵队青年第一大队成立，下辖三个营一个骑兵连。大队长王卓云（兼），政治部主任鲍鸿宾。

3月 在冀鲁豫支队的影响和争取下，国民党第一战区人民自卫军第四路第一大队大队长李静宜率所辖部队于1939年底脱离国民党，接受我党领导，并于1940年3月正式改为新四路，李静宜任司令员兼一大队队长。

3月31日 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第二纵队转往华中支援新四军。

4月1日 石友三、丁树本部，分两路进占东明县城，并积极北犯，妄图重占直南地区。五日、石、丁部分别进至濮阳徐镇、保安集以东和两门西北地区。

4月6日至8日 为打败顽军反扑，4月6日，我冀鲁豫支队、南进支队，先后将在濮阳县西南大小韩集一带的丁树本部击溃，在我沉重打击下，丁树本率残部逃往豫西；8日，我东进纵队、冀鲁豫支队和南进支队，向东明、菏泽北部的石友三部进攻，石率部退向东明以南曹县、单县、定陶一带。我军主力进入东明，活捉处决了顽县长吴致岑，建立了东明县抗日民主县政府。

4月中旬 我讨逆军作战指挥部在仙庄集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宣布讨顽战役胜利结束，讨逆指挥部撤销。并宣布南进支队留在冀鲁豫边区坚持抗日反顽斗争。支队共辖十六、二十一、二十六三个团，支队司令赵承金，政委谭冠三，主要活动在清丰、南乐、濮

阳、内黄、滑县、濮县、范县、观城一带。

4月 活动于滑长封边的国民党李旭东部 3000 余人叛国投敌，李充当伪第六军副军长，在滑长封边区大肆捕杀抗日军民，取缔抗日组织，使这里一度出现的轰轰烈烈的抗日局面被镇压下去。滑长封工委大部人员转到内黄上堤一带，留下少数干部坚持斗争，滑长封边游击大队合并到分区三旅九团。

4月 赵谭（即赵基梅、谭辅仁）支队在滑县两门与地方部队整编，改编为第二纵队新三旅，韩先楚任旅长，赵基梅任副旅长，谭辅仁任政委。全旅辖七、八、九三个团。教导大队，除五百余人编为军区独立营外，其余 1000 余人分别编入八团和九团。原豫北地委领导的豫北大队编为九团，独立大队编为八团。

4月15日 经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筹备，南乐、清丰、濮阳、东明、长垣、大名六县代表，在清丰县安庄召开军政民代表会议，成立冀南六县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选举安法乾为专员，晁哲甫为参议室主任，罗士高任专署秘书主任。这时，我党在冀鲁豫边已成为执政党。

4月15日 鲁西行政主任公署成立 鲁西各界在东平县戴庙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将原鲁西北、泰西两行政委员会合并成立鲁西行政主任公署，选举肖华为主任，董君毅为副主任。下设泰西、运西、运东、鲁西北专署，张耀南、杨勇（兼）、夏振秋、王笑一分别任专员。从此，统一鲁西各县抗日政权的领导。

4月18日 中共冀鲁豫区党委成立 为巩固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加强对冀鲁豫边直南、豫北、鲁西南地区工作的领导，北方局于3月底决定，由王从吾、刘宴春、崔田民、杨得志、信锡华组成冀鲁豫区党委，王从吾任书记（未到职），信锡华任组织部长，刘宴春任宣传部长。4月18日至5月2日，区党委在清丰县西王什召开区级以上活动分子大会，会上信锡华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边区党的任务》的报告，杨得志、刘宴春还分别就军事、宣传工

作作了报告。4月30日,太南区党委书记张玺随三四四旅到达冀鲁豫边区,任区党委副书记,不久任书记。此时,冀鲁豫边区共辖十五个县,26384名党员。区党委下设四个地委:一地委,郭超任书记;二地委,唐克威任书记;三地委,赵紫阳任书记;四地委,戴晓东任书记。日寇进行“五·五”大扫荡后,二、三地委合并,改称二地委,赵紫阳任书记;四地委改称三地委,领导人未变。

4月30日 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三四四旅、豫北独立游击支队、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奉集总命令,在黄克诚率领下,挺进冀鲁豫地区,与冀鲁豫支队汇合后统一整编,杨得志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卢绍武任参谋长。纵队辖:三四四旅,刘震任旅长,康志强任政委;新二旅,田守尧任旅长,吴信泉任政委;新三旅,韩先楚任旅长,赵基梅任副旅长,谭辅仁任政委;华北抗日军民第一旅,朱程任旅长,闻允志任政委,南进支队赵承金任司令员,谭冠三任政委。同日,根据集总命令成立了冀鲁豫军区,黄克诚任司令员,崔田民任政委。军区下辖一、二、三三个军分区,一分区司令员朱程,政委闻允志;二分区副司令员周桂生、李静宜,政委张荫魁;三分区副司令员张耀汉,政委戴晓东。为加强对冀鲁豫地区党政军的统一领导,经北方局批准,由黄克诚、杨得志、张玺、崔田民、信锡华、安法乾、晁哲甫组成军政委员会,黄克诚、崔田民先后任书记。此间,黄克诚同志作了《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传达。

4月 濮阳、考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王卓云、陈丽泉分别任县长。

4月 冀鲁豫边区青年抗日救国总会成立,杨泽江任主任。

4月 冀鲁豫联合抗日中学创立,校长晁哲甫。该校按照抗大方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办学,组织学生学习抗战理论、党的政策和文化知识,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

春 冀鲁豫军区军政干校成立,杨得志兼校长,余克勤任副校

长,郑思群任政委。

5月1日 戴晓东率领三地委机关干部五十余人和地委独立营一百五十余人及郑美臣青年挺进队,由黄河北濮阳回到鲁西南地区,并在李楼将独立营扩编为独立团,张耀汉任团长,在地委领导下开辟鲁西南抗日根据地。

5月15日至17日 日伪1.5万余人,对冀鲁豫边区进行大扫荡,石友三、高树勋部配合敌人进攻卷土重来。我军二纵队集中七个团,向东明集一带顽军展开全面攻击,攻克顽军据点十余处及东明县城。至此,我军控制了北起朝城,南至东明,西起卫河,东至运河,包括清丰、南乐、濮阳、濮县、内黄、观城、朝城、范县、东明、鄄城等十个县城在内的广大地区,使冀鲁豫和鲁西抗日根据地联成了一片。

5月中旬 冀南六县行政督察专署在清丰张仪村召开第一次县长会议,会议由安法乾主持,他讲了建立政权以来的形势及今后的中心任务,崔田民代表黄克诚讲了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政策。会上布置了征粮征款、准备反扫荡和巩固根据地等工作。

5月15日 冀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决定成立财政委员会,黄克诚统一领导边区的财政工作。根据财政委员会的指示,冀南六县专员公署于5月24日颁布《本区财政统筹统支办法》,要求建立会计、审计、预决算制度,进行税收、田赋征收等工作,对边区财政收支实行计划管理。从此,边区财政工作逐步走上正规。

5月20日 十八集团军总部命令三四四旅即日南进,旅长刘震、政委康志强率六八七团、六八九团和新二旅六团,从东明、曹县出发,向豫皖苏地区开进。

5月25日 二纵队一部攻入滑县城,歼日伪军500余人。

5月下旬 设立清西办事处。后改为清西工委,清西工委仍归清丰县委统一领导。

6月上旬 黄克诚率三四四旅和新二旅经濮县、郟城、巨野、

金乡、砀山、南下华中地区,执行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任务。黄克诚南下后,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兼任。崔田民接任军区政委。同时,彭明治率苏鲁豫支队,从湖西地区南下华中。

6月10日(农历五月五日) 日寇集中驻开封、新乡三十五师团,驻商丘第四旅团等地兵力共8000余人,汽车、坦克170余辆,分三路向我濮阳西部地区进行合击。我二纵队新三旅八团在滑县的小渠、黄冈村与敌进行激战,毙伤敌军400余人,击毁汽车26辆,然后分路突围。在小渠战斗中,我三营营长张海月率全营指战员阻击,张海月及大部战士壮烈牺牲。敌以为发现我军主力,随又调集日伪军2万余人,于6月10日分十二路向清丰、濮阳、内黄合击,妄图歼灭我二纵队领导机关。我二纵队领导机关,在杨得志司令员率领下,及时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指挥新二旅四团,新三旅、民一团等部,在外线分散活动,打击敌人,迫使敌人于18日结束扫荡。通过这次大扫荡,敌人抢占了清丰、南乐、濮阳、内黄、长垣、滑县、东明等县城,并在滑县、浚县等地建立据点三十余处,初步形成了对我根据地的封锁包围。这时全区党员由四月份以前的26284人,减少为11205人,地方武装、基层政权和群众团体的损失也相当严重。之后,区党委在内黄县南张保村总结了这次反扫荡的经验教训。

6月下旬 冀鲁豫军区整顿充实地方武装。在“五·五”大扫荡中,冀鲁豫地方武装损失半数以上。为予以充实,冀鲁豫军区将原四个军分区调整为三个,并配备了专职副司令员。各分区整顿了县、区武装,恢复和组建了民兵,这时全区共有正规武装11500人。

6月28日 石友三顽军卷土重来,重占我濮县城及濮阳、清丰、观城、范县一带,企图在日伪军支持下控制清丰、濮阳以东地区,联合鲁西北顽军齐子修等部,切断我华北与华中、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与此同时,在日伪顽军的煽动下,反动会道门快刀会和土匪武装,也乘机发展起来,使我冀鲁豫地区的党政机关和地方

武装,遭到严重损失。

6月 冀南银行冀鲁豫办事处成立。邓开祥任主任。

7月11日 根据集总命令,我军由宋任穷、杨得志、杨勇组成的讨匪司令部,指挥由冀鲁豫我军和晋西独立支队组成的左、中、右三路大军,对再犯我根据地石友三部进行反击战。11日至17日,在范县房子铺、颜村铺一带重创顽军,共毙伤顽军2700余人。26日,日军由寿张出动快速部队2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向我奔袭,妄图挽救顽军的危局。石友三在日军支持下,深沟高垒,暂取守势,并勾结唆使封建地主和会道门头子,欺骗胁迫群众组织“快刀会”,对我根据地中心区造成严重威胁。从1940年8月中旬开始,我军采取政治、军事双管齐下的斗争方针,配合地方党和政府,以各种方式开展对顽军和反动会道门的攻势。8月30日,晋西独立支队在范县西南道口村一带,歼灭外出抢粮的石友三一八一师700余人。9月3日,该支队又在濮阳南部之郭龙、大小屯一带,将给石军送子弹、军饷的顽军一个团大部消灭,俘国民党军校学生120余人,成功地执行了切断了石军交通补给线的任务。我濮阳、濮县、范县等县委和县政府,组织武工队、县大队、民兵等,积极配合主力,孤立顽军据点,消灭外出抢粮、抓丁的零星顽军,至11月底,直南一带的反动会道门相继瓦解。12月1日,顽军石友三部发生“石高内讧”事件,高树勋将石友三及其胞弟石友信处死,夺取了第三十九集团司令职务。至此,与顽军石友三的斗争胜利结束。

7月 新三旅八团在濮阳县南花庄附近,截击日军一个通讯中队,缴获战马80余匹,毙敌20余人。

7月 由于形势恶化,为便于领导,濮阳分设濮东、濮南、濮北三个办事处。滑县设立滑北办事处。

7月 东垣县委、长垣县工委建立,张志刚、许荫森分别任书记。

夏 冀鲁豫区党委机关报《卫河日报》创刊,刘祖春任社长兼

总编辑，白映秋任副社长。

夏 在滑、长、封工委的基础上，建立卫南县。县委书记李照远。

夏 国民党滑县县长贾心斋宣布脱离国民党，率领政府职员及县府武装接受我党改编，受到我党热烈欢迎。随即宣布成立滑县抗日民主政府，韩明任县长，贾心斋任政府首席参议。

夏 设立濮滑东长四县边办事处。杨锐任主任，贾心斋任副主任。

8月21日 华北抗日民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冀鲁豫军区一分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闻允志赴集总汇报工作，在南乐夜渡卫河时，突然受到敌汽艇袭击，不幸光荣牺牲。其后，王凤桐接任政委，魏明伦接任政治部主任。

8月 我党派干部开辟卫西。

8月 一地委警卫部队青年营与南乐独立团合并升级为军区独立团，后改为一分区基干团。赵遵康为团长，李苏波，张久先后为政委。该团活动在南乐、清丰、濮阳、内黄一带，成为打击日伪军骨干力量。

9月2日至28日 新二旅四团和南进支队一部，粉碎敌人对沙区的六路合击和九路扫荡。

9月 南乐全县实行统一累进税。

10月 建立中共卫西工委，李先贤任书记。

10月17日 一二九师新三旅七团于滑县王伍寨奇袭押运军用物资的日伪军一个营，截获数十车粮食、棉衣、药品和几部电台。

10月 南乐县基干团连续打击伪、顽军。

10月 为适应战争环机，二纵新三旅、新二旅四团、军区的独立营、团进行了一次缩编，将团属营取消，独立团改为独立营，编余的营团级干部80余人编为纵队中层干部队（简称中干队）。

秋 张秋县委、县政府建立，王化任县委书记，夏仲远任县长。

秋 中共北方局和集总派李大章和周桓率巡视团到冀鲁豫边区检查工作。

秋 冀鲁豫区党委召开组织工作会议,传达了北方局关于建党工作的指示和共青团未经转党即作了党的工作的党龄计算问题的指示。决定抗战前的共青团员未经转党作了党的工作的,党龄由入团之日计算。

秋 南乐县参议会成立。

11月 南乐独立团在魏家瑶消灭顽军一部,俘40余人,缴获轻机枪3挺,步枪30余支。

11月14日 日军两千余人,纠集伪顽军各一部,自清丰、濮阳、滑县、长垣等地分八路合击沙区。我二纵队新三旅七团,在滑县以东顽强阻击自滑县、长垣出动之敌,掩护纵队和地方机关安全转移后撤出战斗,打破了敌人的合击计划。

11月 中共苏鲁豫区党委改为湖西地委,该地委辖:单县、金乡、丰县、鱼台、沛北、单县、虞城、沛滕、砀山等县。

12月8日 我军攻克古云集,歼灭顽军暂一师2000余人。同时,我军一部收复观城。至此,顽军被压缩在濮县城及其周围四、五里的狭小地区,改变了冀鲁豫根据地斗争形势。其后,冀鲁豫边区转入暂时的休战状态,得到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

12月 我二分队部队歼顽一个大队,毙伤俘大队长刘之泉以下百余人,缴枪50余支。

12月 杨得志指挥新二旅四团、军区独立团在内黄县东南之碾头,歼灭抢粮日军28人,伪军300余人,生俘日军8人,缴获大炮一门,轻重机枪各一挺,步枪300余支,战马5匹。

12月29日 新三旅八团在濮阳南丁村与日军遭遇,在战中政治部主任王伟民英勇牺牲,濮阳县县长王卓云负伤。

年底 南乐独立团歼灭伪李英部300余人,缴轻机枪3挺,重机枪1挺,步枪百余支。

12月至翌年1月 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先后召开两次军政委员会,研究部署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等工作。朱程在会上传达了集总关于发展抗日武装和加强民兵工作的指示。

1941年

1月7日 日军25人,伪军150人,从考城许河出发下乡抢粮,我分区独立团两个连和县大队在刘璃阁设伏,全歼日伪军,拔掉了日本在许河设的据点。

年初 1940年12月,刘杰三从冀南返回沙区,在井店一带扩军近千人,组成冀鲁豫支队第六大队,1941年初,该大队改编为卫河支队,刘杰三任队长。

1月8日至14日 我二纵新二旅四团,新三旅九团,及民一旅、独立团等部,配合地方武装及广大民兵,积极地展开了反封锁斗争。先后攻克内黄西马上、阳邵集,店集、乔岳村、西野庄、东永建、魏流河等据点,并在围攻内黄县城时,打垮增援之敌,缴获机枪1挺,步枪300余支,又袭入濮阳县城,共歼俘日伪军600余人。

1月中旬 濮、范、观军民粉碎敌人大“扫荡”。

1月18日 冀鲁豫我军经四小时激战。攻克内黄魏流河据点,全歼守敌。

1月 冀鲁豫区党委成立后至1941年1月,共办训练班三次,每期多则一月少到半月,共训练县区干部44人。其间内黄、南乐、滑县等县县委办了七期训练班,训练支干、小组长以上干部162人。1941年1月后,区党委的训练班正式改为党校,确定训练县区级干部,每期三个月,以学习党的政策与党的建设为主要课程。同时,各地、县也举办区干、支干训练班,共训练近千人。其中高陵县委基本上将支干训练了一遍。

1月15日 冀鲁豫边区行政主任公署成立,晁哲甫为主任,

崔田民、贾心斋为副主任，罗士高为秘书长。行署机关设在内黄县大堤口村，行署下辖三个专署：直南为一专署，安法乾任专员；豫北为二专署，杨锐任专员；鲁西南为三专署，刘齐滨任专员。

1月28日 冀鲁豫军区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对1941年全年的政治工作作了安排。

2月6日 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崔田民等致电朱彭总副司令，要求严惩亲日派、表示誓为新四军之后盾。

2月9日 教七旅两个营在范县东南魏胡同、栖风楼村歼灭外出抢粮抓兵的高树勋部暂二十七师一个营，俘虏300余人。

2月 为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冀鲁豫边区调整行政区划。规定以十八户为一个行政村；以三十个到六十个行政村为一个行政区。并决定撤销办事处，划分小县。一地委的南乐、清丰县城以东，仍为清丰县；南乐城西南，清丰城西北，内黄城东北为卫河县；内黄与濮阳十五区之一部（井店东之硝河坡）仍为内黄县；清丰城、濮阳城西北及东北之一部划为顿邱县；濮阳城东，清河头、柳下屯、小濮州以北为尚和县。二地委，濮阳城南、西南仍为濮阳县；濮阳城东南为昆吾县；滑县城东、南与西南为卫南县；滑县城东北与西北为高陵县，东明城西北与西南划为东明县；东明城东北部与长垣县黄河东之一小部划为东垣县（划归鲁西南地委）；长垣县除东部之一部划归东垣县外，仍为长垣县。三地委除新建东垣县外，基本未变。

2月 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在内黄县大堤口村召开全区活动分子大会，会议由区党委书记张玺、组织部长信锡华、宣传部长刘晏春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地、县级干部六、七十人。这次会议传达讨论了北方局的九月指示，李大章同志对边区工作的总结，北方局高干会议、县书联席会和北方局组织部长会议精神，学习了杨尚昆《关于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基本政策》的报告，总结了1939年10月以后巩固党的工作，制定了1941年的工作计划。这是冀鲁豫边区党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从此，边区执行的各项政

策,都逐步纳入中央政策的轨道。据此次会议统计,全区之直南、豫北、鲁西南三个地委,共有 887 个党支部,10505 名党员。

3 月 3 日 东(明)、长(垣)、濮(阳)、两门、老岸之敌,以汽车三十七辆,坦克车六辆,步兵二千余人,骑兵百余,扫荡我濮阳东南地区,我冀鲁豫部队在沙固推毙伤敌军 60 余人,毁汽车 5 辆,完全粉碎敌之扫荡。

3 月 原新二旅四团、独立团、新三旅九团、民一旅等部,在地方党及广大群众支援下,对南清、南内、濮滑、濮阳等敌人的公路封锁线展开全面大破击。

3 月 东垣县委和抗日民主县政府成立,毕玉琪任书记,郭心斋任县长。

3 月 湖西中学创立,校长李贞乾(兼)。学校共办八期,为党培养三千余名干部。

3 月 我二分区八团、新四路、特务连及骑兵排,在濮阳东南司马村,被敌伪军包围,战斗竟日,粉碎敌人歼灭我军阴谋。

4 月 8 日 我军歼伪李英部百余人。

4 月 12 日 日军三十五师团及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各一部,约万余人;伪剿共军第一路、伪新中央军二十四路及当地伪军、反动会门武装万余人,配有汽车、坦克百余辆,向我清丰以西、内黄以南、濮阳西北、滑县东北、卫河以东之沙区进行“扫荡”。我军以一部主力结合地方武装、民兵坚持腹地斗争,领导机关和大部主力部队,分二路迅速突围,转向观城,在外线袭击敌人。军区四团打进濮阳东关,袭击了日军医院,俘敌八十余人。第五军分区一团,在民兵配合下打到了清丰,连克白仓、疙瘩店等据点,毙俘日伪军百余人。内黄、高陵两县的基干大队在主力部队配合下,先后攻克永建、碾头、柴庄等据点。我鲁西南部队积极配合沙区反“扫荡”,将企图北犯的国民党顽军高树勋部阻击于濮县古云集。这样以来,搞乱了敌人的部署,打破了敌人的合围,迫使敌人于二十日退出沙区。敌人

在九天的“扫荡”中，施行绝灭人性的“三光”政策，烧毁村庄 140 余个，民房五万余间，屠杀群众 4000 余人，所有财产抢掠一空，并将沙区枣林砍伐殆尽，妄图彻底摧毁我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反“扫荡”结束后，我党政军群机关迅速返回沙区，抽调 120 余人，组成五个善后工作队，配合当地党政群机关，进行善后工作，筹集救济粮 10 万余斤，边币 20 多万元，以及被服、家俱、农具等大量物资安排群众生活，帮助群众开展生产自救，领导群众继续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对乘机骚扰抢掠之敌伪、土匪、会门进行了打击和镇压，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

4月14日 中共北方局对边区党发出指示。指出：边区党不管从组织上、思想上、党的领导或党与群众的结合上都还不够坚强。

春 冀鲁豫区党委召开南文保会议，分析了整个形势，重新组织了力量。

春 南乐青年营成立，营长郭如春，全营共 300 人，1941 年底合并于南进支队。

春 经黄友若、胡紫青、傅凌云做工作，浚县天门会 11 个中队被我党掌握控制的有 5 个中队、1 个分队、1 个区队，共达 600 余人。还在有些中队里建立了党支部，为后来天门会起义奠定了基础。

春 南进支队二十四团、配合南乐独立团，将日军百余人包围，毙敌 20 余人。因敌援兵到，我军主动撤出战斗。

6月2日至6日 高树勋部万余人进犯我濮县以南地区。我新四旅在濮阳东南白罡集、濮县陈庄等地歼其 900 余人，俘顽军副旅长以下 170 余人。

6月28日 顽军高树勋趁日寇扫荡泰西山区之机，向濮、范两县蚕食，我鲁西军区七团配合兄弟部队，在濮县东北庄、白衣阁对顽展开激战，击毙顽军 700 余人，俘虏 200 余人。

6月 卫西工委改称为“浚滑汤淇四县工作团”，黄友若为团长，胡紫青为副团长。6月13日冀鲁豫军区与鲁西军区以及两区所属武装部队在观城红庙村举行联欢大会，宣布两军区奉集总命令合编为冀鲁豫军区及第二纵队，并以杨得志为纵队司令员，杨勇为纵队副司令员，崔田民为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为纵队兼军区政治委员，唐亮为纵队兼军区政治部主任，卢绍武为纵队兼军区参谋长。7月1日，冀鲁豫军区召开高干会议，检讨过去冀鲁豫区及鲁西区之工作，布置今后工作。会议历时八天，对两军区合并后工作之推进具有极大意义。7月7日，冀鲁豫军区宣告成立。并于当晚召开了盛大晚会。

7月1日 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冀鲁豫、鲁西两个区党委从7月1日起，合并为冀鲁豫边区党委。张霖之任区党委书记，张玺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承先任宣传部长，信锡华任民运部长，刘宴春任社会部长。9月初，各界代表开会选出新的行署领导成员，晁哲甫任行署主任，董君毅、贾心斋任副主任。合并后之区党委隶属北方局领导，行署隶属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领导。合并后之边区党政军机关主要负责同志共同组成新的军政党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区各项工作。两区合并后，原鲁西区之一、二、三、四地委不变，原冀鲁豫区之一、二、三地委改为五、六、七地委。区党委下辖七个地委，一个工委和一个实验县委，依次为泰西、运西、鲁西北、运东、直南、豫北、鲁西南地委、巨(野)南工委，昆山实验县委。泰西地委辖五个县委，三个县工委；运西地委辖五个县委，三个县工委；鲁西北地委辖六个县委，二个县工委；运东地委辖六个县委，二个县工委；直南地委辖五个县委，一个县工委；豫北地委辖五个县委，一个县工委；鲁西南地委辖五个县委，一个县工委。全区共有党员36687人。

7月7日 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召开 参加大会的有各地选出的参议员133位。9日，大会主席团决议将该会名称改为晋冀

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冀鲁豫边区应邀组织了 20 余人的代表团,在团长赵明甫、党团书记陈桐源带领下前往参加,因遭敌伏击,除傅秀香(女)和李××到达外,其余未能出席。18 日,会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30 日,选举了边区临时参议会正副议长及委员,议长为申伯纯,副议长为宋维周、邢肇棠。31 日,会议选举杨秀峰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戎伍胜(戎子和)为边区政府副主席。边区政府成立后,冀鲁豫行署归边区政府领导。8 月 24 日,边区政府决定全区划为二十二个专区,冀鲁豫行署所辖一至七专署改称晋冀鲁豫边区十六至二十二专署(地委、军分区名称不变)。

7 月中旬 冀鲁豫军区部队大部推向边沿区,展开反蚕食斗争。

7 月 水东地委书记马一鸣到冀鲁豫边区汇报工作,并请求帮助。冀鲁豫边区本兄弟之谊,抽调 30 多个干部支援水东,并帮助训练干部 70 余人,还从经济、军用物资上进行了支援。

8 月初 我教七旅二十团,在考城以东地区拔除了杜楼伪据点,开辟了白茅、大寨、张君墓地区。

7 月中旬 南进支队二十一团,在濮(阳)、清(丰)、南(乐)一线积极进行反封锁斗争。8 月 5 日,在清丰城北唐庄伏击敌人,毙日军中尉以下官兵 40 余人,毁汽车一辆,缴获步枪 30 余支,掷弹筒一个。8 月中旬,共动员群众 2500 余人,组成四个破袭中队,分段破袭南乐至清丰间敌已修成的公路和封锁沟。一夜之间,使封锁沟变成了平地,公路变成了深坑沟道。8 月 20 日在清丰城北卞城村袭敌人,毙伤敌伪 23 名,生俘伪军 12 名,缴步枪 25 支,战马 6 匹。8 月 25 日,袭入南乐城南之南清店伪军据点,全歼伪军 50 余名。南进支队三次成功的袭击、伏击战斗,创造了边区小部队游击战的范例,受到二纵和军区的表扬。行署主任晁哲甫在南清店战斗结束后,还特别写信慰问。

7月 日寇为确保其占领区,在华北地区继三月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之后,第二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各种手段密切配合的“总力战”,发展伪军,增设据点,修筑公路,封锁交通,破坏组织,进行清剿、扫荡,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等,在冀鲁豫边区的进攻步骤是:在二地委,以济宁为后方,从东南向西北夹击;在五地委,集中力量摧残沙区,控制卫河,由西北向东南进攻;在六地委,强化敌占区(卫南、东明、长垣),镇压游击区(濮阳、滑县),全面进攻基本区(高陵);在七地委,则推行“以华制华”的间接统治办法,利用汉奸、伪军为其服务。当时我党采取的斗争方针是: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巩固与扩大基本区,坚持游击区,加强政治攻势,加紧伪属工作和内线工作,瓦解其部队,打破敌伪的包围、封锁和“蚕食”。

7月 中共中央发出对冀鲁豫边区工作的指示指出:冀鲁豫地区是华北、华中联系的枢纽,在战略地位上极为重要;巩固这一地区最中心的问题是健全党委的领导;在争取优势与对日伪顽的斗争中,要善于利用和掌握中日矛盾及日伪顽之间的矛盾;要注意纠正某些部队不尊重地方党政部门及违背政府法令的行为。还指出,必须认真实行人权保障条例,严格禁止随便杀人的现象。

7月 冀鲁豫军政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决定下半年工作以巩固边区为基本方针,把开辟新区与巩固基本区联系起来。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武装斗争,积极向敌区进攻。同时深入进行改造村政权、整理党支部、发动群众等工作。中心区,除昆山实验县外,确定二分区为边区中心区,范县、寿张、郟城为中心区之中心。根据地的发展方向基本上向南,目前则向东北发展,打击齐子修。7至9月,扩充正规军5000人。10至12月,整理青抗先、自卫队。地方武装的名称,军分区为基干团,县为基干大队,区为基干中队。

7月 冀鲁豫区党委在内黄太平、丁姜村召开建设沙区根据

地活动分子大会,会议共开了四天,区党委代表信锡华在会上作了建设沙区根据地的报告。

8月1日 《冀鲁豫日报》创刊,陈沂任社长,刘祖春任副社长。不久陈、刘调离,罗定枫为代理社长兼总编辑,张鲁泉为副社长,该报到1949年8月21日,改名为《平原日报》。

8月9日 军区召开武装会议,大会历时13天,对边区武装工作进行了详细讨论和布置。

8月14日 冀鲁豫军政党委员会作出对无正规军活动的一、二、五、六军分区,取消军政党委员会的决定;有正规军活动的三、四、七军分区予以保留。属于军政党委员会的工作,统一于党委领导,以克服军政党委员会与党的双重领导的弱点,建立正常的党、政、军、民领导系统,加强地方党对武装斗争与政权工作、群众工作的全面领导。

8月17日 朱程司令员率民一团攻入濮阳东关,歼灭日伪军20余人,缴获大批药品。

8月 冀鲁豫区党委召开地书联席会议,会议对各级组织机构作了明确规定,对整理支部、审查干部等工作制定了统一计划。据统计,这时原冀鲁豫区,共有县委15个,工委3个,分区委76个;共建立县政权10个,区政权53个。

8月 各县人民武装力量加强;滑县成立县大队,并组织了对敌斗争指挥部;濮阳县成立武工队;高陵县组织了民兵联防线,在边沿地区积极开展对伪军孙步月部的斗争。并配合主力部队,坚持内线作战,实行村自为战,人自为战,打击汉奸清剿队,从而粉碎了敌人的清剿扫荡和“治安强化”政策。

9月1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公布。主要内容是:保卫边区,坚持华北抗战;加强和扩大武装力量;实行民选各级政府;坚决镇压死心踏地之汉奸;优待敌伪官兵俘虏;努力加强根据地经济建设;实行自由贸易;调节劳资双方利益;实行减租减息;征

收农业统一累进税等。

9月14日 军区政治部组成三个巡视团巡视工作，第一巡视团赴二分区帮助建立中心区工作；第二巡视团赴沙区帮助五、六分区工作；第三巡视团到抗大巡视工作。

9月 教导第四旅十团三营插入虞城北部地区，攻打了袁寨的伪四区部和董寨的伪商会会长董谦修的看家武装之后，董谦修向我军提出谈判。10月15日，李汝太作为我军代表来到董寨，向董谦修及几个伪区长讲解了我党我军的政策，提出了具体谈判条件。通过谈判，对方接受了我方条件，为进一步开展敌军工作创造了条件。

9月 单(县)虞(城)县委和单虞办事处成立，丁涧桥任书记，孟静之任主任。

9月 卫河县委书记马天胜英勇牺牲。

10月5日 冀鲁豫农、工、青、妇、文群众团体联合发出《政民配合的指示》指出：为应付日寇自“治安强化运动”总力战的新进攻，加强根据地建设，我政民间必须有高度的密切配合，政府所颁布的各项法令，群团干部要保证实现；各级群众团体的干部和会员要严格遵守政府的各种法令，尤其是财政经济制度；今后要做好优待抗属、抵制日货、屯积秋粮等工作，遵照行署训令，积极破路，10月15日至11月15日为破路月。

10月8日 冀鲁豫边区成立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支部，选举水野清夫为支部书记。

10月15日 全区破路突击周今日开始，全区所有人员均停止工作参加破路。

10月 六地委书记赵紫阳，在濮阳西掘地村召开会议，对如何开展对敌斗争作了指示。

10月 日伪军对我湖西根据地进行“拉网扫荡”，仅虞城、砀山、夏邑交界处，就被敌烧毁村庄数百个，我党政机关遭受一定损

失。

初秋 伪孙步月部窜入北海头村抢掠，高陵三区区委书记李明德率区基干队和民兵出击敌人，后在掩护其他同志撤出中被俘。李明德在敌人百般摧残下，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把他钉在白道口镇寨门上，李明德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

秋 冀鲁豫军民掀起破路挖沟高潮，凡是交通要道两旁，都挖了大小交通沟。村村相连，路口皆通，沟沿两旁种植树木和农作物，夏秋季节，枝叶遮天蔽日，成为天然帐篷，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秋 八路军总政组织部长周桓来冀鲁豫开办各县主要负责人轮训班，周桓讲党的建设，崔田民讲政治形势、统一战线和党的政策，段君毅讲政府法令，通过训练，使各县领导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有很大提高。

秋 冀鲁豫四地委给卫西工委布置四项任务：一、扩大武装，控制武装；二、做好天门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三、加强地下党的发展工作；四、确保冀鲁豫通往太行山交通线的安全畅通。

秋 冀鲁豫边区学生救国联合筹备委员会成立，青联主任王克兼任主任。

11月24日 五分区顿丘县基干大队，袭击丁砦之伪军，缴获人枪各二十余。

11月 冀鲁豫行署颁布《冀鲁豫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

11月 冀鲁豫边区工会召开第一次分会主任联席会议，高光宇在会上作《今后边区工运任务》的报告，指出：今后工会的总任务是深入进行工人合理合法的民主民生运动，改善工人生活，大量发展新组织，动员工人参军、参战、参加民兵、自卫队，开展对敌武装斗争。

11月底 五分区军民粉碎敌人对顿邱的扫荡，毙伤日伪军

150余人,缴重机枪1挺,轻机枪2挺,步枪50余支。

11月 单西南工委和办事处建立,丁涧桥任工委书记,孟静之任办事处主任。

12月12日 冀鲁豫军区举行民兵检阅大会。

12月29日 赵遵康团长率独立团,在顿邱县顺河集,毙俘敌伪中队长以下170人。

12月30日 行署举行劳军大会。

12月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水东地区归冀鲁豫边区代管。杨得志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亲切接见了水东代表,就如何坚持水东地区作了重要指示,并决定派干部和部队加强水东地区的力量。

12月 冀鲁豫军区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全区部队立即进行精简整编。精简整编后,全区主力部队共有15408人(医院、抗大、后勤未计算在内),使部队在指挥和训练上更加直接、灵便,从组织上为转变大兵团作战思想,开展小部队分散的游击战打下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以主力兵团二至三个连组织游击支队,各军分区以基干营、团组织之,积极开展对敌交通斗争,打击小部敌伪,镇压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分子,配合党政民开展全面政治攻势。

12月 范寿朝阳工委和办事处成立,齐秀山任工委书记,樊芯卿任办事处主任。

冬 太康县委建立,贺霖良任县委书记。

本年 开辟由冀鲁豫到太行山的第二条交通线。

1942年

1月8日 《晋冀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公布。

1月17日 敌扫荡我南乐、清丰地区,敌小宋大队长及燕井指挥官被击毙。

1月20日 冀鲁豫边区《文化生活》创刊号出版。

年初 冀鲁豫军区加强对伪张岚峰部的分化瓦解工作。

1月 冀鲁豫军区党委派林耀斌、苗丕一随同王其梅、王建一到水东，林耀斌任独立团团团长，苗丕一任政治处主任。

1月 水东我军开辟杞北·杞通地区。

2月 冀鲁豫区党委决定开始实行减租减息及合理负担政策，同时开展反奸、反霸、反资敌斗争。

2月 日伪军为加紧扫荡湖西地区，在虞城的张庄、前王楼、朱屯、高李庄、汪场、侯庙等村安设了据点。为打击敌人的气焰，李汝太组织张合银等，向日伪发动政治攻势，在县城散发了宣传品。5月3日，教导第四旅十团抽出60名神枪手，攻打了三庄集伪区部。6日，再次攻打了董寨。10日，李汝太只身闯入伪王集区部和董寨，分别向伪区长赵青山和董谦修的亲属交待了政策。之后，董谦修和几个伪区长到我根据地悔过认罪，制定了立功赎罪公约。

2月26日 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做出《关于办理区党委党校各地分校的决定》，在运东、秦西、鲁西北、运西、鲁西南、沙区设立分校。

2月 八路军二纵队和冀鲁豫军区召开军事工作会议。会后游击支队由12个增加到20个，地方武装和民兵联防也得到整顿和加强，对敌斗争更加机动灵活。

2、3月 一地委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郭超任书记。同时，分区成立了敌工总站，李苏坡任站长。各县区党委都建立了敌工站。

2至3月 日伪军对南乐、清丰、卫河等地进行“扫荡”，我五分区民一团、卫河大队两次插入卫河一带开展反“扫荡”斗争。3月8日，民一团三个连被包围，团长万连友率部突围，不幸光荣牺牲。卫河一带变为游击根据地。

2月 我南进支队二十一团抽调150余人组成游击支队先后数次到沙区，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同地方武装组成对敌斗争委员会，共同对敌。在八个月的活动中，作战41次，攻克据点5处，恢复与扩大了40多村庄，俘敌80名，打死敌人93人（其中有中、小

队长八人)毙伤伪军 312 人,俘 11 人,缴获部分武器;并结合开展政治攻势,争取伪军 223 名回家,游击支队自身扩大到 220 余人。同时,支持民兵作战 19 次,打击了敌人,提高了民兵军事、政治水平。我教七旅二十团游击支队,在鲁西南坚持斗争,开辟了东(明)长(垣)、南华(菏泽西北)地区。一分区武工队,在卫河、清丰、南东、濮阳一带,多次袭击敌伪据点,4 月以少胜多,奇袭县庄集据点,俘伪军一个排 30 余人,后打进濮阳城内,活捉日军官 2 人。

2 月 冀鲁豫军区成立抗大陆军中学,杨得志兼任校长,余克勤任副校长;郑思群任政治委员,潘焱任教育长,全校先后共培训学员六百余人。

3 月 18 日 边区文联正式成立,鲁西良任主任,1943 年后,巩固为主任。

3 月 日伪出动两千余人,分别由叛徒吴兰田和陈坚带领,分两路扫荡我滑县东部根据地,抓走 800 余人,其中党员 255 人,革命干部 6 人;这些人除少数逃回外,有的被杀害,有的被押送东北鞍山当劳工。

3 月 水东独立团在杞县付集消灭伪区政府,又袭击了西门里的日军据点,缴获轻机枪一挺,三八式步枪十余支,打死日军一、二十人。

4 月 3 日至 7 日 敌第一混成旅团 3000 余人及伪军一部对南乐、清丰以东、观城以北地区实行铁壁合围大扫荡,我五分区机关和特务连与教导队受敌包围,与敌展开激战后胜利突围,在此次“扫荡”中,敌在清丰仙店设了据点。

4 月 22 日 国民党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在鲁西率三十九军、十三旅及特务旅共 2.5 万余人投降日军,敌任命其为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

4 月 28 日 日军三十二、三十五师团等部及伪军万余人“扫荡”郟、观、濮地区,以武力威逼高树勋部投降。我军配合高树勋部

作战,攻克濮阳城,毙敌 120 余人,毁敌汽车十辆,掩护高树勋部转移至范县我根据地休整,并收容其失散人员和枪支,使高树勋部摆脱被歼危险,分路撤向陇海路以南,濮阳一带地区为我军收复。区党委、行署、军区及各学校抽调五百余人,组成民运工作团,由团长申云浦带领,开辟昆吾、尚和、濮县等新区工作,成立昆吾县工委和抗日县政府,宗凤鸣任县委书记,封离卿任县长。

4 月 水东抗日中学成立,王其梅兼任校长,刘影任政委。

春 睢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春 南乐二区东南张庄集、樊村、李家村、杜家村、阎村、武家村,从 1942 年起,建立民兵联防,在敌碉堡林立、多次进攻的恶劣环境中,岿然屹立,是南乐在八年抗战中唯一没有遭受敌人蹂躏过的地方。

5 月 3 日 冀鲁豫边区党政军民,为纪念“四·一二”反扫荡胜利一周年,二十·二十一专署在内黄西路洲沙邱上召开群众大会,建立了“四·一二”阵亡将士暨殉难同胞公墓碑。

5 月上旬 日伪军“扫荡”南乐、清丰以东地区,安设据点 16 处,从西南占去我根据地濮范观中心区一部分。切断了我濮范观中心区与巨南、湖西的联系。

5 月下旬 为打破敌人的封锁,沟通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太行抗日根据地同集总和党中央的联系,解决干部过路问题,冀鲁豫军区派军区敌工部副部长王乐亭到沙区正式建立工作团,同年 8 月,工作团改称办事处。1944 年,为统一敌占区工作的领导,军区将办事处改为敌占区工作委员会,书记王乐亭、办事处从建立起至抗战结束,先后护送过路干部四千余名,并向根据地输送了大量情报和军用物资。

5 月 30 日 南乐、清丰、大名之敌 5000 余人,对南乐二、三区进行合击,我南进支队独立营长陈登瀛率独立营掩护党政干部突围,无大损失。

5月 冀鲁豫四地委派干部加强卫西工委,石侠风任书记、朱天德任组织委员,李先贤任宣传委员。

6月4日 冀鲁豫边区开始进行第二次精兵简政,边区军政党委会撤销,全区各项工作统一于各级党委领导之下;取消了二纵队的番号,各种武装力量由军区统一领导,杨得志任司令员,杨勇任副司令员,苏振华任政委,阎揆要任参谋长,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军区后方供给卫生机构合并为后勤部、处,并紧缩机关,充实了连队,使各级领导机关更加精干,进一步从组织上加强了对敌斗争的领导。

6月30日 中共北方局发出对冀鲁豫边区工作的指示。指出:冀鲁豫边区已进入空前艰苦时期,要求冀鲁豫全党、全军反对麻痹思想,对敌人的进攻要提高警惕性;反对空谈,以切实的工作,做好充分准备;迅速改变斗争方式与组织形式;把群众日常利益与革命要求联系起来,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基本区坚决实行减租减息,反贪污浪费等,联系改造村政权,整顿或建立党支部;在接敌区发动群众,须从保护群众利益,减轻群众对敌负担,反黑差,反“蚕食”开始,号召群众武装自卫;在敌统治薄弱的敌占区可开展隐蔽的游击战争。为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党必须进行艰苦的组织工作,正规军必须坚持分散活动。

6月 原冀鲁豫六地委组织部长张建廷壮烈牺牲。

6月 杞南、杞通、杞北中心分会相继建立,中心分会为联办领导下的县级政权。三个中心分会当时下辖九个分会,分会为区级政权。不久,又在睢太边建立一个分会,直属水东联办领导。

7月 冀鲁豫军区发起夏、秋攻势,共拔除日伪军据点四十余处,歼日伪军千余人,毙伤俘日伪、土杂顽军四千余人;开辟了东明、长垣、考城等地区,滨河、卫河、尚和、昆吾、濮阳、卫南等县工作均有所恢复,打通了鲁西南与濮范观中心区的联系。同时,深入敌后的政治宣传,鼓舞了敌占区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我五分区军民

一团配合六分区新四路,在滑县、长垣等县新区开展游击战,攻克马兰、焦虎、牛屯等伪据点,并迫使内黄伪军百余人起义。

7月22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建立专区及县经济委员会,任务是繁荣群众工商事业,调剂粮食,组织对敌经济斗争,协调经济工作的配合进行,经济委员会以专员或县长为主任委员,并由其指定财粮、工商、银行及主要商店的经理以及监委若干人组成。

7月8日 南乐县东节村党支部为打破敌人安设据点的计划,保卫秋收,党支部书记姚丙乾、抗日村长英玉奇、民兵队长姚洪、民兵英雄刘六民等人,伪装到敌据点做泥、瓦、木工,突袭日军,打死九人,遂将炮楼烧毁,受到军区和行署嘉奖。说:“你们的革命行动,轰动了全区,震撼了华北。”敌人为了报复,调集日伪军400余人,于7月30日包围东节村,刺杀、活埋群众180余人,烧房800余间,对日寇报复造成的恶果,抗日民主政府尽最大努力,进行了救济和安置。

7月中旬 南进支队伏击由六塔去清丰的日伪军,全歼伪军一个中队,缴获部分武器,8月10日,攻克清丰东楼集据点,毙日军10人,俘日军2人,将日兵尸体送回仙庄集敌据点,附信宣传我党的优待俘虏政策。次日,敌中队长回信,对我军表示感谢。

6月 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来冀鲁豫边区,面示边区领导同志,北局同意水东暂归边区领导,以便更好地帮助水东工作的开展。

7月 水东地委组织部长张剑石,独立团政治处主任苗丕一到冀鲁豫边区汇报工作,并送去二、三十个抗中学生,杨得志、张霖之指示:要提高警惕,防止顽军突然袭击,要隐蔽发展,小部队活动,坚持斗争。张、苗回来时带回与新四军四师联系的密码。

7月 民兰考商曹五县边工委建立,李济民任书记,工委活动于曹县东南及商丘的孙付集、谢集和民权的吴屯一带,1943年7月工委撤销。

8月22日 考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县长李明勋。

8月 冀鲁豫第八军分区成立。冀鲁豫军区为加强对昆山、张秋、寿张、东平、汶上等地的领导,决定在该地区建立第八军分区,吴机章任司令员。同时,建立八地委,唐克威任书记,设立第23专署,王笑一任专员。11月,二、八地委合并,撤销了八地委。

8月 敌为确保华北,经过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之后,抓紧在太平洋战场的暂时局部胜利和新冒险以前的空隙,提出了在一年半内消灭共产党、八路军的恶毒计划,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展开了对根据地的全面扫荡与进攻,企图将整个华北变成它冒险的兵站基地。在冀鲁豫边区,首先,敌将进攻重点指向我中心区(濮、范、观地区)。其次是,采取跃进式的“蚕食”办法,在离中心远的地区打钉子,并依据这种钉子再向我中心周围压缩和“蚕食”。其三,实行“以华治华”、“以华乱华”的方针。派遣大批特务潜伏根据地,进行拉拢破坏活动;大量扩编伪军,利用伪军统治;挑动顽军、土匪、会门反对我们,强迫敌占人民成立反共自卫团队等。其四,实行分割封锁。清剿扫荡,在根据地修公路、筑碉堡安据点,挖沟开河,把根据地分割为互不联系的五大块,然后再用较大兵力分块进攻。

8月底 冀中区吕正操部经我区安全转赴太行。

9月1日 冀鲁豫区党委发出关于支部对民兵领导的决定。指出:支部应当把领导民兵当成一个重要任务。要求党员在民兵中要占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民兵指导员由支部副书记担任,支干会要定期讨论,检查民兵工作,要保证民兵质量和民兵教育训练的实施,注意吸收兵中的积极分子入党等。

9月1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布禁止敌伪钞的通令。

9月 冀鲁豫边区工农青妇各救会做出《关于组织各级抗联的决定》。

9月中旬 刘少奇由华中返回延安的途中,经湖西地委、冀鲁豫七地委(鲁西南地委)到达冀鲁豫中心区,在听取了湖西地委、七

地委及区党委的工作汇报后,就革命战略和策略,当前工作,群众运动,党内斗争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指出:你们没有被敌人挤跨赶走,是很大的成绩。对敌斗争要有战略眼光,不要轻易搞大兵团作战,对伪军要以政治瓦解和争取为主;要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不搞减租减息就是机会主义;要做好生产救灾工作等。

9月24日 国民党河南省十二专署顽军头子薛剑光、薛汝梅、张鹏先、侯殿卿、丁建华、田树恩部数千人,对睢杞太独立团实行夹击,张、侯、丁部偷袭我水上根据地聚台岗,薛、田部偷袭我杞北根据地,党领导军民集中兵力,奋起反击,取得了反顽斗争的胜利。

9月27日 日寇驻华北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第三十二、三十五师团主力及十七个县的伪军3万余人,出动坦克30余辆,汽车400余辆,飞机10余架,对我濮范观中心地区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企图一网打尽我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和部队。我主力部队与党、政、军机关已于26日夜转移到了外线,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曾思玉率领四个连队,在范县甘草固堆与敌激战,随后又率军民冲出敌人的包围。在反扫荡中,我共毙伤俘日伪军350余人,缴枪百余支,我后方机关、学校和地方武装受到较大损失。二分区司令员徐秋,八分区政治部主任魏金山,教导三旅民运科长陈伟,我行署参议杨静斋、孙仰周,陆军中学教育处处长孙厚甫、南进支队敌工科长冉世英等壮烈牺牲。日本反战同盟黑田被敌包围后,拉开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

9月 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长张承先带领徐枫等四人,到水东检查工作,在聚台岗召开地委会议,传达了区党委的指示,会议作出两项决定:1、要整顿部队,搞一个拳头,免被敌人吃掉,开辟杞北根据地;2、水东独立团根据中央部署实行精兵简政,将所辖两个营及直属单位精简为四个战斗连和一个特务连。

9月 在我军争取下,顽军邵鸿基部下师风山率300余人起

义,编为六分区独立支队,师风山任支队长,年底,改编为滨河县独立大队。

9月 中共冀鲁豫区党委从党校、民政干校、陆军中学等处抽调五百余名干部,组成政民工作队,在信锡华带领下,以濮县、范县、观城为中心,开展以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反贪污、查黑地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至年底,中心区的群众基本上发动起来,并创造了经验,锻炼了干部,奠定了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的基础。

9月 水东独立团在杞县南的天池洼与顽专员范景新部遭遇,展开了激烈战斗。顽军予谋吃掉我们,我军英勇作战,王其梅亲率指战员进行反冲锋,从拂晓打到黄昏,挫败了敌人的计划。当夜,我军主动撤出战斗。

10月初 水东独立团南下,向顽军侯殿卿、张鹏先部发起攻击,在杞南蔡固村击毙张鹏先,歼敌百余人。侯殿卿见势不妙,逃回老巢。经过几次战斗,收复了杞南、杞北中心区和聚台岗根据地,改变了过去敌、顽对我夹击的局面,扩大了水东根据地。

10月5日 杞南大队长何复顺在与日寇作战中牺牲。

10月 盘踞在东庄的伪一路军李英部千余人到我根据地张固、李后、马集等村抢掠,我五分区民一团等部,迎头痛击来犯之敌,毙伤伪旅长唐海廷以下百余人,此后东庄之敌很长时间不敢外出。这一胜利曾受到军区表扬。

10月20日 中共北方局发出《对冀鲁豫区党委、军区工作的指示》。指出:根据地未能在顺利时期得到应有发展,主要是某些领导对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缺乏深刻认识。要求将工作重点放在基本区,尽可能争取与日伪顽保持相持局面,把巩固根据地与正确运用对敌伪顽斗争的策略结合起来。工作中心是发动群众,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坚持改造区村政权;整顿巩固党组织;加强健全武装,特别是加强地方武装;健全经济建设等。对日、伪、顽、匪、会门斗争的基本策略,在于拆散其联合。总的要求是作长期斗争的打算坚持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

10月 北方局决定调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

10月20日 北方局决定，将湖西地区由山东分局划归冀鲁豫边区。

10月下旬 教三旅一部和教七旅在曹县崔坝，反击进犯鲁西南地区的顽军苏鲁豫挺进军十三纵队孙性斋部。毙伤俘其1200余人。并乘胜向盘踞在民权县以北之顽苏鲁豫挺进军第八纵队张盛太、十二纵队马逢乐等部进击，消灭其官兵数百人。此时，鲁西南根据地向南扩展到陇海路附近，民权县抗日民主政府和民(权)兰(封)考(城)游击队建立，基本上打通了与水东地区的联系。

10月 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发出《关于反对敌寇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指示》。指示全区要对敌展开思想战，强化民众联防的群众游击战；加强敌伪军工作，开展防谍锄奸工作；积极开展武装工作队活动，彻底粉碎敌之“治安强化运动”。

10月 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趁日寇扫荡我根据地之机，唆使孙震第二十二集团军两个步兵师，河北保安十二纵队占据了濮县城，在昆张设据点20余处。

10月 五地委、五分区派李冠卿等人到陇海路开封至商丘段进行敌伪工作，在民权县内黄集建立汴商段敌工站，李任站长。不久，李冠卿进入开封，建立开封敌工站。

秋 水东地委发动群众战胜灾荒，号召将一切能吃的食品、树叶、野菜、草根储存起来。武装部队白天打击敌伪顽匪的抢粮骚扰，夜间深入敌占区筹粮和夺取敌人的粮食运回根据地，解决水东地区党政军人员的吃粮问题。并对贫苦群众放粮发款，进行救济。

秋 冀鲁豫主任公署在濮阳井店建立了“德兴隆”商店。商店下设：业务、会议、保管三个股和顺河、元村、古城等三个分店。“德兴隆”开始只经营粮食、布匹、油类、食盐等，以后还经营军火。它对

稳定物价,繁荣市场,活跃农村经济,广开生产门路,帮助灾民渡荒,解决军需民用困难,打破敌人封锁,作出了重大贡献。

秋 高陵、内黄两县合并建立高内县,县委书记白潜,县长张志。

11月至12月 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召开全区高干会议,区党委书记黄敬传达了中央“九·一决定”和北方局“十月指示”,并根据指示精神对边区几年的斗争作了总结。会议通过认真地讨论,统一了思想认识,进一步明确了工作方向、策略和具体可行的措施。会议决定当前的紧急任务是:(一)将分散活动的小部队大胆地伸向敌后,实行“敌进我进”方针;(二)确实开展民主民生斗争,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斗争;(三)改造区、村政权,整理财经工作;(四)整顿县区武装、民兵武装和主力军;(五)正确运用对敌、伪、顽、匪和会门的斗争策略,拆散其联合;(六)加强党的领导,实现一元化。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边区党的思想,增强了党的团结,保证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对边区局面的逐步好转起了重要作用。

11月 冀鲁豫区党委派宣传部长张承先到鲁西南领导发动群众工作,并任地委书记。

11月 日伪3000余人扫荡沙区根据地,五分区独立团在反扫荡中歼敌50余人。党政机关、群众及伤病员均安全转移,未受大的损失。

11月 “九·二七”大扫荡后,为坚持昆张地区的斗争,上级决定组成以吴忠为支队长。邵子吾为政委的昆张游击队。部队组成后,深入敌区,在20多天的时间内,连续取得四次战斗的胜利。从而坚定了根据地军民的胜利信心。

12月 冀鲁豫边区实行第三次精兵简政,冀鲁豫区党委和地委、分区进行调整,军区、分区政委由地方党委书记兼任。

冬 我四分区政治部主任鲍鸿阁、参谋长戴园仁,率部在青城

袭击顽军邵鸿基部第五大队，俘虏其大队长刘自泉以下 100 多人。

下半年 冀鲁豫军区成立濮阳办事处 李一非、毛定远先后任主任。

11 月 濮阳县委书记宋乐三被日军濮阳宪兵队逮捕。翌年 1 月 19 日，在濮阳城南英勇就义。

年底 冀鲁豫边区联合抗日中学与筑先抗战学院合并为筑先师范，校长张景韩、党组书记卞慎吾。后张景韩调离，卞慎吾任校长。

本年 冀鲁豫沙区出现百年未有的大灾荒。由于旱情严重，夏秋几乎绝收，加之日伪的烧杀抢掠，沙区发生了特大灾荒，不少群众饿病，许多农民逃往他乡。仅南乐一县就饿死 1.7 万多人。为战胜困难，我党采取了如下紧急措施：（一）反资敌，反抢粮，打击敌人；（二）组织部队从非灾区向灾区运粮，赈济灾民；（三）领导群众生产自救，发放贷款，粮食种子等；（四）发动群众向地、富借粮；（五）严格管理集市贸易，稳定物价，进行缉私，打击伪钞等。

1943 年

1 月初 中共中央决定水东地区归冀鲁豫边区建制。冀鲁豫区党委派唐克威等同志到水东工作，任水东地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韩明任副政委。同时，还派一批党政军干部到水东工作。唐到后即 在杞南谷熟岗召开了地、团干部会议，传达上级指示，分析根据地的形势，决定分散游击，发动群众，粉碎敌人扫荡，并提出：“誓与水东共存亡”的战斗口号，鼓舞了广大指战员和水东人民的抗日斗志。

1 月 新四军四师党委为加强水东领导力量，派刘基干、苗泽生等八位同志到睢杞太地区工作。次年春，又分批派来营连干部三、四十人。

1 月 14 日 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冀鲁豫行署决定在濮阳、滑

县、东明、长垣边界地区，建立滨河县，蒋中岳任县委书记，郭涤生任县长。

1月20日 晋冀鲁豫边区财政总局发出通令，提出1943年的奋斗目标是：粉碎敌人掠夺与封锁；缩小伪钞的流通区域和范围，贬低其价值，以维持物价稳定；积蓄物质力量，准备反攻。为此，冀鲁豫行署于29日又颁布了《修订统一市场货币暂行实施办法》。区党委为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调韩哲一为工商局监委，杨寿山任工商局长，张铁铮为副局长，安法乾为副监委，并调整了专区和县工商局的干部。在各集镇成立了交易所和大商店，使统一市场货币的工作顺利实现，这些措施对巩固抗日根据地起了很大作用。

1月27日 冀鲁豫行署公布《清理黑地奖惩暂行办法》。

1月27日 日伪军千余人扫荡水东地区，地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唐克威率一个连突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1月 冀鲁豫行署召开粮食工作会议制定供给方针，要求对粮食工作加以整理，清理尾欠征收，实行高度节流，保证不再预支、超支，度过严重困难；整顿粮食制度，加强财粮机构，实行分区财粮统一供给，保证不再增加人民负担。

1月 为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自上年底至本月初，冀鲁豫边区组织了142支小部队和游击队，深入敌占区进行活动。四分区部队和二十一团继续抽调主力连队组成沙区游击支队，开展对敌、伪、顽、匪、会门的斗争，鼓舞了沙区人民坚持斗争的信心。五分区先后组成六支游击队到敌占区活动，宣传群众，打击敌人。六分区抽调13人组成武工队，后以该队为骨干，组成多支武工队，积极活动，建立了隐蔽的游击根据地。同时，南支二十一团全部换上便衣，在滑县以南、延津以北活动，开辟新区，扩大根据地。

年初 冀鲁豫区党委召开敌工会议。会上区党委书记黄敬指示：水东是西有黄河、北有陇海、东有津浦的三角地带；日寇在开封、商丘驻有重兵，又有顽伪协助，敌我力量悬殊。从战略上讲，这

是一个不易存在的地区,要保护这块根据地,首先在军事上采取隐蔽发展,不要过分刺激敌人,敌伪工作要提到战略地位上来。

2月26日至28日 敌扫荡我五分区。日伪军万余人分七路扫荡我五分区,我十九团被包围,在突围时受巨大损失,伤亡数百人。

2月 水东地委派薛丕渡、叶本瑞到淮太西边开展工作,恢复了杨庄、王庄、薛孟庄三个党支部。

3月初 伪邵鸿基部约千人进犯我滨河县大小索庄一带。四分区骑兵团和南支二十一团,从北、西两面夹击来犯之敌,并派一个连迂回到敌人背后,形成瓮中捉鳖之势。经激战,顽敌一部被歼,一部缴械投降,共歼顽600余人,缴获轻机枪九挺,步枪数百支。从此,邵鸿基部不敢向我轻易进犯。人民群众欢欣鼓舞,热情慰劳部队。部队赠送枪支帮助滨河县建立区县武装。

3月18日 冀鲁豫行署发布《简易合理负担暂行办法》。

3月20日 冀鲁豫军区《战友报》创刊,胡痴任社长,梁秋任总编辑。

3月 水东独立团全歼日军一个小队。

3月 仙庄据点伪军200多人,到吉村抢粮。南乐县基干大队在小杨庄西头伏击敌人,毙伤俘日伪军21余人,我无一伤亡,这一战斗对当地群众是一个极大鼓舞,仙庄据点的敌人从此再不敢到这一带抢掠。

4月至5月 孙殿英、庞炳勋先后率部投敌。

4月 冀鲁豫区党委城工部建立,黄敬兼部长,李一非、闫海清、李苏坡为副部长。其后,为加强陇海线的对敌斗争,城工部决定建立了豫鲁工委和豫鲁办事处,李一非任工委书记,李苏波任办事处主任。

春 顽军中的马明(原名朱恭德)经地委敌工委员会书记刘影作工作,打死了该连长朱克启,率领全连100多人起义。

春 我新三旅九团逮捕反动会门头子周立文,经行署副主任贾心斋,专员杨锐批准,在八里营召开群众大会,立即枪决,从而粉碎了反动会门的疯狂进攻,为以后的工作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春 水东我军毙伤敌伪近百名。

春 六地委组织统战工作团,做国民党一战区苏鲁豫皖边十八纵队司令蒋嘉宾的统战工作。此后,地委书记潘复生曾到蒋嘉宾的司令部虞城县张集乡康楼村,邀他到单县终兴集参加六地委召开的群英会。会议期间,潘复生和专员郭影秋、分区司令员王秉璋会见了蒋嘉宾,要求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待机起义。

春 十六团配合南乐县大队歼灭抢粮之敌。

春 长垣工委书记许阴森被捕,河西划归卫南县领导。

春 冀鲁豫四分区敌工部在长垣设立长封联络办事处。冯剑仇任站长,金杯哲任副站长。任务是开展对长垣、封丘、东明、兰封四县敌伪军的瓦解争取工作。

春 我党派丁一打入兰封警备队,丁以副官身份在兰封、民权、商丘一带开展地下情报工作。

春 水东地委派张方明转入开封从事地下工作,1944年建立了城市工作组。1945年10月建立了党支部。先后发展党员27人,并在开封新街口设立小开书店,团结教育知识分子。

春 根据军区政委苏振华的指示,五分区陇海情报站搞到了日伪对冀鲁豫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计划和行动地图,及时送到根据地,使我军减少了损失。5月,情报站负责人李冠卿做了争取伪省长陈静斋的工作,向陈讲了我党的抗日纲领和对敌伪反正人员的政策,使陈坚定了投靠我党的决心,向我党写了反正决心书。1944年日寇西进豫西前,陈参加了日伪高级军事会议。会后,将日寇要收缩三十三据点,集中兵力西进的情报提供给我们,使我们乘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春 睢民两县伪军七百余人联合对我睢杞民边界处的金盆、

老庄、八封亭、黄土岗、小河湾一带扫荡，我水东孙其昌独立营和杞北办事处一二分会常备队以不足 200 人枪的兵力，采取麻雀战术，敌进我退，敌退我追，袭扰打击，冷枪杀伤，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反扫荡胜利。

春 水东联办决定清匪。在此次清匪中，管玉成部被我争取，和我们一道抗日。谢传冢等部枪支被我收缴，土匪司令潘传炳、著名匪首郑老八、赵老十等怙恶不悛，不思悔改，被镇压。通过这次清匪，安定了社会秩序，密切了党群关系，提高了我党我军和各级政权的威信。

春 十八集团军情报处长腾代远调郭有义（化名郭成和）由安阳到开封任情报站站长。该情报站归总部情报直接领导。

春季 冀鲁豫行署发出生产救灾指示。指示各级政府成立生产救灾委员会，组织灾民以工代赈，男耕女织，生产自救。并用组织生产合作社，运粮、打井、熬硝晒盐、贷款借粮等办法度过灾荒（当时打一口井贷粮七百斤）。同时，政府发放春耕贷款 1000 万元。沙区向地主借粮 5.52 万余斤。边区党政机关组织所有牲畜帮助灾民春耕；军队在 4、5、6 三个月中，每人节约小米 5 斤，马匹节约料 10 斤，全区节省小米 1500 万斤以上。节余的粮食，除供边区度荒外，还将一部分粮食拨给冀南，作为生产粮投资。

春 濮阳敌工站建立，孙福臻任站长。

5 月 21 日 伪睢县警备大队大队长孟昭华率警备队 5 个中队和骑兵队及各区自卫队共 600 余人，向我军宋华贵部驻地汤庄、大张、厚台岗一带进犯，我军闻讯转移。睢太办事处主任苗泽生和王林征等因指挥群众疏散转移。不幸被俘。

5 月 高内、清丰、南乐、卫河、顿邱等县开展赎地斗争，经过说理、烧契，贫苦农民原价收回了自己的土地。

5 月初 沙区办事处护送邓小平同志赴太行。

6 月 水东联办颁布赎地法令，至秋种前，从中心区至边缘区

许多土地重新回到了贫苦农民手中,使根据地人民生活得到了保障。

6月 冀鲁豫行署召开第一次司法工作会议,会议由行署司法处长王化云主持,传达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司法会议精神,总结了上半年的司法工作,确定了抗战利益高于一切,为抗日各阶级谋福利,减轻封建剥削,扶植群众民主运动的工作方针。

7月 杨得志率部重新开辟虞商曹单成五县边区,经过30多天激战,全歼盘踞在这一带的李仙洲部,击溃了当地土顽李子义部,恢复了党的活动,发展了地方武装,有200多个村庄组织了民兵联防,成立了五县边联防委员会,郑杰为主任。

7月 我三十二团奔袭南乐东门,俘伪军20余人。

夏 水东根据地开始实行征收公粮政策,改变以往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吃派饭的办法。实行这种政策后,夏季全地区共征收公粮约五百多万斤,使根据地的后勤供给得到了保证和改善。

夏 四地委副书记、宣传部长赵紫阳和滑县县委书记马瑞华,抗联主任纪登奎,在滑县陈家营召开县区干部会议,号召全面开展减租减息,增资增佃斗争,创造了开展雇佃贫运动的经验。

夏 中共冀鲁豫四地委决定,将卫西工委划分为两个工委,以浚县同山为界,同山以南为“延浚汲淇四县边工委”(对外叫八路军工作团),由李先贤任书记;同山以北仍为卫西工委,由石侠风任书记。

7月8日 冀鲁豫行署发布《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工作方针》。指出:巩固根据地的中心一环是发动群众,改造与建设政权。同时须稳定物价,节衣缩食,搞好以支援灾区生产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冀鲁豫第十八专署根据行署的指示精神,于7、8月份部署了生产救灾工作。发动组织群众,聘请辅导员,进行货换麦种,抢种小麦,取得了良好效果。

7月11日 冀鲁豫行署决定加强中学教育,并将濮范中学和

运西中学并为冀鲁豫边区第一抗日中学，直属行署领导。

7月13日 冀鲁豫行署发出《关于扑灭蝗灾，抢救秋禾的指示》，要求各地根据具体灾情，统一指挥，彻底扑灭蝗虫，并订出以蝗虫兑换小麦，以及照顾贫苦农民利益的出工办法。经灾区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基本上战胜了蝗灾，保住了秋苗。

7月 冀鲁豫边区召开群众大会通电全国反对内战。

7月30日至8月19日 原国民党第二战区豫北指挥官杜淑部，于1943年5月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六军，隶属伪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指挥。7月10日，杜率八千余人，结合伪滑浚保安联队，向我卫河以南地区大举进犯，并企图进犯我鲁西南，配合李仙洲部对我形成夹击之势。我冀鲁豫军区指挥第十六团、二十一团、新四路、卫河支队、骑兵团一部及部分地方武装，在军区政委苏振华、参谋长阎揆要指挥下，乘杜淑部孤军深入，兵力分散之机，采用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术，于7月30日发起卫南战役，到8月19日，共歼杜淑部五千六百余人，缴获轻机枪三十五挺，长短枪二千余支，解放村寨三十余处，残敌逃窜至淇门镇，收复了被敌伪占领的卫南地区。在此次战役中，我二十一团团团长李亚峰光荣牺牲。此后，边区形势逐步好转，我军开始进入局部反攻阶段。

8月15日 匪首袁金华长期盘踞南丈，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为恧匪平民愤，我考城县大队配合军分区十九团、二十团经过一天多激战，消灭袁匪500多人，获枪200多支。匪首袁金华在袁家楼毙命。

8月 伪军齐子修部九团团团长张新泽在范县率部起义，与寿张县基干大队合编为冀鲁豫军区抗日第三支队，张新泽任司令员，杨劲任政委，曾长柏任副司令。

8月 区党委副书记张霖之到滑县、卫南检查了开展雇佃贫运动的情况，其后为《冀鲁豫日报》写了《站稳脚根、放下圈子》的社论，在全边区推广了滑县经验。

9月11日 冀鲁豫区党委发出准备反扫荡的指示。指出：希特勒死期将至，整个局势与日寇极端不利，为应付最恶化局势，敌之扫荡必更严重。为此，必须立即做好下述准备工作：(1)充分认识环境严重，坚定胜利信心；(2)坚持腹地分散坚持与外线积极出击相结合的反扫荡方针；(3)加强地方武装与民兵建设；(4)迅速完成公粮征收，开展藏粮运动；(5)保证破路计划迅速完成；(6)彻底紧缩机关，抽出干部加强区村领导，切实掌握民兵自卫队；(7)发动群众及其他地方工作，应在备战姿态下继续进行。

9月21日至10月12日 日军为摧毁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掠夺秋粮，调集三十二师团、五十九师团、三十五师团、骑兵第四旅团，在伪二方面军孙良诚部配合下，共3万余人，对我冀鲁豫边区进行秋季大“扫荡”。在这次历时20多天的反“扫荡”中，我主力部队跳出敌之合围圈，转向敌后，进行外线作战，共进行大小战斗315次，攻克敌据点、碉堡74个，攻入东平，延津两个县城，袭击了东明、考城、濮阳、平阴四个县城，毙伤日伪军1374名，俘日军两名，伪军2744名，缴获大批武器。

9月 安阳工委建立，林晓任书记。

9月 我军七、八团在县大队、各区队配合下，攻克寿张县侯庙等据点，将敌全歼。

10月2日 驻水东国民党顽军将新黄河沿岸土堤扒开11个口子，淹没我杞南、杞通、睢太中心区三分之一的土地。

10月12日 延、浚、汲、淇四县边区抗日行政办事处成立，姚步霄任主任。

10月 四地委副书记、宣传部长赵紫阳带领豫北支队、分区十六团等抗日武装进驻滑县，在县基干武装配合下，将驻扎在北范庄、路寨、八里营等村的伪军扈全禄部2000余人全部歼灭。

10月 打入开封伪机关的八路军总政治部保卫部的姜达生(胡贵民)改归冀鲁豫十地委领导。姜达生除收集情报外，还发展了

党的组织,使敌伪机关内的工作逐渐展开。

秋 八路军总部锄奸部在开封建立工作站。

秋 卫河县长刘法尧牺牲,郭良才接任县长。

秋 水东地区建立健全县、区民兵组织,配备武装干部。大力开展民兵工作。

11月15日 冀鲁豫军区《战友报》发表《加紧宣传毛泽东思想》专论。

11月17日 在杨得志亲自指挥下,我六、七、八团在曾思玉同志率领下,协同兄弟部队和民兵奇袭濮阳八公桥孙良诚总部,经激烈战斗,全歼孙良诚部八大处、警卫团和骑兵营。活捉孙良诚的总参谋长甄纪印,俘虏官兵3000余人,马500余匹,缴获迫击炮两门,轻重机枪30多挺,长短枪2000余支,兵工厂机床30余台,和其它胜利品甚多。其后,我军乘胜扩大战果,横扫滑县、长垣、封丘土顽,拔掉大小据点百余个,歼敌3000余人。此役使冀鲁豫边区濮范观中心区和二、四、五分区连成了一片。

11月 冀鲁豫区党委发出关于整风学习的指示,确定:1943年8月1日至1944年8月,为边区深入整风的一年;成立由书记负责的区党委整风委员会,同时指出,学习文件,反省自己,检查工作,三者不可偏废。

11月 冀鲁豫区党委决定重新划分三、四分区。将观城、朝城、昆吾、尚和、清丰、南乐划为三分区,马本斋任司令员,刘星任地委书记兼政委,郭超任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以回民支队及南进支队三十二团为基干部队。将卫河、濮阳、高内、滑县、滨河、卫南、长垣划为四分区,赵承金任司令员,张国华任政委,以南进支队(缺三十二团)及骑兵团为基干部队。

11月 奉集总命令,冀鲁豫三分区划归冀南,与冀南之卫东、清平等县组成冀南军区第七军分区。

11月 为加强领导,统一冀鲁豫与冀南两区的对敌斗争,中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鲁豫分局，任命黄敬为书记，宋任穷为组织部长，张霖之为组织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长，李菁玉为宣传部长，张玺为秘书长，郭绍汤为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通称平原分局），下辖冀南、冀鲁豫两个区党委。

11月26日 冀鲁豫区党委在观城红庙召开高干会议，会议历时四十七天。会议期间，黄敬、苏振华、张霖之、徐达本，分别作了对敌斗争、整风、群众工作、财政经济工作报告，宋任穷作了冀南游击战争的坚持与灾荒问题的报告。最后，黄敬作了总结。会议认为，1943年边区从根本上扭转了被动局面，开始取得战争的主动权。会议对1944年的工作，提出五项具体要求：（一）展开全面对敌斗争，扩大各种武装力量，抓紧空隙进行部队整训，提高战斗力，为大反攻做好军事准备；（二）大力发展生产，党政军带头掀起全区性的生产运动，克服困难，度过灾荒，为大反攻做好物质准备；（三）继续深入地发动群众，巩固树立基本群众的优势，扩大农村统一战线；（四）普遍深入地开展整风学习，审查干部，克服党内不良倾向；（五）进一步贯彻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整体观念，团结广大群众，搞好边区建设工作；（六）加强敌占区工作，要造成有敌人无敌区。为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会议决定撤销原三分区，将原六分区改为三分区，水东区改为六分区。

11月 考城县大队配合十九团，二十团在小宋消灭土匪马三（马逢乐的三弟）数百人，获枪100多支。

12月20日 冀鲁豫行署颁布《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暂行条例》。

12月 十八集团军总部情报部，派曾洁光（化名曹省三）抵开封，以开封市妓女检治所为掩护建立联络站，归郭有义领导。

12月 我五分区民一团一部，在琉璃阁设伏，一举全歼从长垣城外出来抢粮的日军13人，缴获轻重机枪各1挺，步枪10步，我连指导员谷儒席，副连长秦纯阳，英勇牺牲。

12月 冀鲁豫区党委城工部,为加强城市工作,决定成立开封工委,李苏波任书记,李冠卿任副书记。工委成立后,先后在城东区、城西区和教育界建立了支部,大力开展工作,为反攻积蓄力量。

12月31日 冀鲁豫区党委发布《关于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

1944年

年初 冀鲁豫军民对日伪军发起春季攻势,连续拔除范县、寿张等县城及周围的敌伪据点,使日伪军龟缩县城,不敢出动。

1月 豫鲁办事处改为豫东办事处。豫东办事处的工作重点是做伪四方面军张岚峰部的策反工作,配合水东、淮北我军扩大解放区,办事处机关移驻睢县南轩庄。此时,冀鲁豫开封特支书记姜达生前往商丘,与打入伪军张岚峰部的王飞霄取得联系。王将其在该部发展的教育团团团长杜新民等四名党员关系交姜领导。5月,杜新民出任伪十八师师长。接着上级领导又派出十多名同志进入十八师,协助杜新民工作。

1月27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通令裁撤十八专署,其原管辖之南乐归冀南区领导,观朝、清丰、尚和、昆吾四县归第十七专署领导。

1月 南乐县大队一夜拔掉敌人3个炮楼,俘伪军分队长以下近200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支。

2月7日 冀鲁豫军区回民支队兼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马本斋,在范县张清营病故,遗体送至莘县张鲁集安葬。党中央在延安为其举行了追悼会。

2月7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出春季生产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加强冬季后期的生产工作,把一切劳动力,半劳力组织起来,搞好春季生产

2月8日 冀鲁豫军区司令杨得志奉中央军委命令,率冀鲁

豫军区二团、十一团、十六团、十九团、三十二团及回民支队。开赴陕北，走后，由杨勇主持军区工作。

2月25日 冀鲁豫抗战学院建立，徐达本兼任院长。

3月 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指示，区党委和军区决定成立豫鲁工委和办事处（即陇海办事处）。军区敌工部长李一非兼工委书记，李苏波任副书记和办事处主任。工委和办事处的任务是开展陇海路沿线开封、商丘、徐州等大中城市的工作，瓦解伪军，组织武装起义，保护铁路两侧来往交通。

3月20日 冀鲁豫成立全区整风学习领导委员会，各地委和区党委军区直属部门成立学委分会，领导本单位整风。从此，全区各级干部的整风学习迅速开展起来。

3月 我党进一步加强对伪十八师的瓦解工作。我党进一步加强伪十八师师长杜新民的起义工作。在十八师和十六师六十二团分别建立了党支部。

3月 苗清华率部投诚。经我四分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对盘踞在延津县沙店之伪军开展政治攻势，伪军苗清华、刘尚德率伪保安团第三大队200余人向我投诚。改为延（津）浚（县）汲（县）淇（县）四县边抗日游击大队，苗任大队长，李先贤任政治委员。

4月3日 南乐县大队和东节村民兵第二次拔掉东节村炮楼，俘伪军队长以下50人，缴枪40余支。

4月17日 日骑兵300余，伪军千余，分三路向我长垣小渠包围，我被围民兵200余人奋勇突围而出。日、伪对手无寸铁的600名群众以刺刀屠杀，投入井中，剩余尸体及幸存生命一时者，又积薪纵火烧杀，顿时火光冲天，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小渠惨案”。

4月 五分区我军夜袭伪据点。冀鲁豫五分区出动一个营，夜袭商丘县溱吴庄伪据点。俘敌80余名，敌炸弹厂、被服厂的机器，全部被我军带走。

春 水东独立团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先后拔掉了睢县的王行、

后台岗、姬房李、英王、西陵寺等伪据点，扩大和巩固了睢杞太根据地，重建了睢太办事处。

春季 边区军民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机关抽调大量马匹，在沙区进行开荒生产，共开荒万余亩，种菜 7000 余顷，打井 200 余眼。二分区各直属单位，在范县颜村铺一带，建立了粮菜生产基地。基本上实现了粮菜自给，还自做衣服和鞋子等，通过生产救灾，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广大群众对我党更加热爱，抗日、生产情绪更加高涨。

春 南乐县军民积极打击日伪，先后拔掉东节村、后陈家、干口、韩张等 30 多个敌伪炮楼。

春 滑县抗日中学建立，李升阁、石一斌先后任校长。

5 月 4 日 边区各界青年在范县大王庄隆重纪念“五四”青年节。

5 月 冀鲁豫边区扩军 1 万余人。

5 月 6 日 四分区部队收复内黄县城。肃清卫河以东的东庄、魏流河、田达等全部日伪据点，继克卫河西岸之楚旺镇，毙伤俘伪军李英部官兵 1300 余人。

5 月 9 日 六分区部队将联日反共的国民党山东第十一专区专员曹班亭，在单（县）虞（城）碭（山）边经营多年的据点李楼、柴庄等据点攻克，毙俘曹班亭以下数百人。

5 月 11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向河南敌后进军的指示，要求北方局、华中局和冀鲁豫分局，分担发动与指挥河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

5 月 21 日 伪二十四集团军新五军之七、八两师配合豫北灭共自卫团吴兰田部，向滑县中心区进犯抢粮。我四分区二十一团予以反击。歼敌四百余人，在双村营战斗中，分区参谋长胡乃超负重伤，在抢救中牺牲。当年 8 月，在滑县万古村为胡乃超烈士举行了

2000 多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并修建了烈士陵园和烈士纪念碑。

5 月 29 日 冀鲁豫军区七团在分区炮兵连和南乐、观城、范县等县基干大队配合下,奔袭清丰县城,俘在该城参加日军驻各县联络员例会的伪冀南道尹薛兴甫以下官员 40 余名,日本联络员 7 名,伪军官兵 1300 余名,毙邯鄹陆军联络部代理部长名取正雄大尉等日本官员 7 名、伪军 200 余人,解放了清丰县全境,我军解放清丰县城给敌人以很大打击,使沙区和濮范观中心区联成一片,使南乐敌人和濮阳伪军处于孤立状态,冀南道的伪保安队,从此一蹶不振。

5 月 中共冀鲁豫分局党校成立,黄敬兼任校长,苏振华任副校长,张玺任秘书长并代理教育长。

5 月 水东地区张刚剑、薛朴若、马一鸣等 30 人,到冀鲁豫平原分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1945 年元月返回睢杞太工作。

5 月 冀鲁豫行署对下半年工作发出指示,要求各级政府下半年把贯彻民主民生法令,开展生产运动作为中心工作。同时,要配合部队开展对敌攻势。

5 月底 冀鲁豫我军春季攻势结束,在此次攻势作战中,我各分区部队共毙伤俘日伪军约近万人。攻克据点,碉堡 200 余处,收复朝城、内黄、清丰三座县城,恢复了昆(山)张(秋)大部地区和卫河以东全部地区。

6 月 5 日 水东独立团重创日军一个中队,毙伤日军少佐指挥官以下 100 多人。

6 月 20 日 中共冀鲁豫、冀南两区党委联合作出拥护冀鲁豫中央分局成立和两区党委合并的决定。

6 月 15 日 冀南、冀鲁豫两行署合署办公。

6 月下旬 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央关于向河南敌后部队的指示精神。抽调三个连组织了南下大队。由余克勤、袁振率领,向水东挺进,准备组建水东军分区。

夏 刘影在杞西成立“泛东挺进支队”。

夏秋 冀鲁豫、冀南两区。大部分县、区发生蝗灾，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政府发动群众，利用各种办法捕蝗救灾，使灾情大为减轻。

7月2日 南下大队全歼民权保安团300余人。

7月4日 冀鲁豫军区南下大队与水东独立团会师，会师后，南下大队与独立团奉命合编，新建水东独立团，团长余克勤，政委袁振。

7月 水东独立团副团长王广文率四个连的武装西进，先后在东夏亭、刘屯、齐老一带，歼敌伪军1000余人，恢复了睢太西根据地。

7月 原高内县分设为内黄、高陵两县，内黄县委书记孙明三，县长熊正阳，高陵县委书记鲁明，县长葛淑华。

8月7日 冀鲁豫分局关于加强水东工作给北方局电，指出：自余克勤、袁振南下水东后，月来该区又有发展，现有睢杞太、杞兰民、杞通陈三个基本区，其中睢杞太边区最大（东西一百余里，南北四十余里）部队编为一个直属连，3个大队，共7个连，19个区队，2200人。

8月9日 十分区部队，在菏泽、考城、东明、曹县一带发动攻势，连克日伪据点20余处。

8月 水东独立团连战皆捷，14日，独立团在河堤岭战斗中，以“围城打援”的战术，歼灭伪保安团百余人，缴获全部武装弹药，迫敌放弃英王、河杨集、姬芳李、轩老等六个据点。18日，水东独立团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向睢县伪军孟照华盘踞的长岗、潮庄、赵庄等据点猛攻，激战两昼夜，将据点全部攻克，击溃援敌300余人，俘伪中队长以下140余人，毙敌80余人。缴获麦子30余万斤，战马百余匹。我部伤亡48人，此次战斗胜利后，姬房李等6个伪据点慑于我军之威力而撤退，睢县南部30余里的地区得以解放。

8月至12月 水东地委开辟宁柘商地区，建立了宁柘商县，

张超海任县委书记兼大队政委、孙卫和任县长兼大队长。

8月 淮太西县、县政府建立,段金堂任县委书记兼县长。

8月 太康县政府成立,李正风任县长。

8月 开封工委获得敌伪的城防情报,及时转交新四军。

8月 延津县伪自卫团团长沙子和在我分区办事处和延浚汲淇四县边工委争取下,率部四百余人,在卫南黄塔村起义,接受我军改编,改编为抗日支队,贾子和任支队长,李先贤任政委。此后,延浚汲淇四县边区由游击区变为根据地。

9月6日 奉中央军委指示,冀鲁豫军区骑兵团和七、十两团组成南下支队,由王秉璋指挥,于9月6日越过陇海铁路,进入水东地区,协同新四军四师进行反顽作战,此时,水东地委改由袁振任书记,李中一任副书记。

9月 南下支队在太康张帝臣村伏击伪保安团3个大队歼敌500多人,活捉了伪县长李一岱,县保安团长马德成,击毙了县宪兵队长谢桂芳。

9月 新四旅等部在滑县焦虎、原庄一带歼伪李旭东部3000人。

10月12日至31日 我军粉碎日伪扫荡,收复濮阳县城,平毁大小据点30余处。

10月 冀鲁豫分局机关刊物《平原》增刊,发表冀鲁豫九地委副书记赵紫阳《滑县群众是如何发动起来的》专文,该文系统总结了我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增资增佃斗争的经验,推动了全区群众运动的深入开展。

10月 尚和与昆吾县合并,合并后仍称昆吾县,李明实任县委书记,吕谦任县长。

10月 顿邱县撤销。

10月 单虞办事处改为临河县,尚格东任县委书记,周冠吾任县长。

10月 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宋任穷在濮阳召开县、团以上干部会议,对濮阳县城解放后的工作作了具体指示。

秋 睢杞太民兵联防大队成立,大队下辖三个连,另有常备队、大队长王其法,教导员武士道。

秋 豫鲁办事处主任李苏波到商丘与伪张岚峰谈判,提出以下条件,1、张的部队应撤出在睢杞太、夏永亳解放区的据点,不再向解放区抢掠;2、保证商丘一带抗日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3、提供日军和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张当面同意,实际只是应付。

秋 九分区十六团、二十一团和骑兵团联合作战,在滑县城东北一带歼灭孙殿英部两个团,俘敌数百人。

秋 水东专署建立 水东联办和所辖的办事处先后改为专署和抗日民主县政府。专员薛朴若、副专员郑华、专署下辖7个县:芝圃县、县长王建一;达生县,县长李良;克威县,县长韩致安;庆华县,县长杨震;睢县,县长苗九锐;宁柘县,县长孙卫和;淮太西县,县长段锦堂。

专署和县政府建立后,在农村废除了保甲制,逐步建立了区、村政权和农救会、民兵、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同时建立了专、县抗联,统一领导各群众组织。

秋 集总锄奸部开封情报站掌握了敌伪的基本情况。

12月5日 冀鲁豫八分区命令七团。配属分区炮兵连、特务连,奇袭寿张县城,全歼伪军400余人,沦陷了六年的寿张城获得解放。

12月 我九分区二十一团、十六团、骑兵团、新四路在卫南县大队配合下,将滑县何庄等村投靠日寇的伪匪2000余人包围,除一个大队逃出外,其余1500余人全部就歼。匪首王太公被击毙。

冬 张绍儒、徐锡鹏在兰、民、考边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冬 黄敬赴延安治病,宋任穷代理冀鲁豫中央局书记。

年底 冀鲁豫边区学联建立,负责人胡绍华。

年底至次年初 冀鲁豫行署在濮县马陵道口召开第二届司法会议,历时五十多天,主要讨论解决人民政府和人民司法机关对群众运动的立场问题,以便更好地扶植民主民生斗争。

本年 冀鲁豫全区武装部队共作战 2709 次,收复县城 7 座,攻克据点 445 处。迫使日伪军放弃据点 654 个,毙伤俘日伪军 4.07 万余人(内俘日军 12 名)。除水东外,冀南和冀鲁豫地区全部联成了一片(原冀南军区部队在本年前五个月的战绩未统计在内)。

1945 年

1 月 21 日 冀鲁豫军区党校警卫团和太行七、八军分区主力部队,对驻道清路沿线日伪军发起道清战役,这次战役历时二个多月,共歼日伪军 2500 余人,收复国土 2000 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75 万,建立了修(武)陟(武陟)、温(县)孟(县)、温(县)陟(武陟)、原(阳)武(阳武)四个抗日民主县政府。

1 月上旬 冀鲁豫军区八团南下水东。协同水东部队作战,开辟豫中。

1 月 23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冀鲁豫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指出:最近冀鲁豫根据地有极大发展,人口将近 2000 万。超过太行、太岳数倍,为敌后最大根据地,但减租减息大半尚未实行,各种政策尚不完全正规。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尚不巩固。为此,中央提议,北方局即时进至冀鲁豫根据地工作,普遍发动减租减息斗争,求得根据地进一步巩固。

1 月 29 日 八团和水东独立团一起,在睢县南部河堤岭,消灭汉奸孟绍炳新建的伪区队 300 余人,活捉了大队长孟绍炳。

1 月 中共冀鲁豫分局作出《关于开展大城市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地委、县委成立城市工作部,抓紧当前有利形势,开展大城市工作,确定济南归一地委,徐州归十一地委,开封归十地委,新乡归九地委;对德州、邯郸、济宁等城市也分别作了规定。

1月 中共冀鲁豫分局决定将水东区改为第十二地委。同时，水东专署改为十二专署。

2月22日 在水东区太康县西南叶寨一带，我八团与三十团，经两天三夜激战，全歼阻我西进的顽泛东挺进军总部及其所属第五纵队2000多人和日伪军一部，活捉顽泛东挺进军中将总指挥张公达、少将纵队司令耿明轩、少将王昌杰和国民党专员兼太康县县长郭馨波。经此次战斗。我军如期控制了扶沟县吕潭以东，淮阳县以北地区，扫清了开辟水西地区的道路。

2月 开封情报站在伪军内部发展党的组织。

2月 冀鲁豫三分区派地下党员携带宣传品到虞城广为散发。同时，对汉奸和日伪军司令部以送贺年片的名义，开展政治攻势，在给汉奸送的贺年片上画有关公，并题词“万古世春复循环，日本失败在今年，身在曹营心在汉，过关斩将美名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打日本”。此事轰动全城，影响极大。

3月1日 冀鲁豫边区第一届群英大会在濮阳城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各分区各部队机关选出的英雄模范186人。

3月6日 冀鲁豫军区十二分军建立，余克勤任司令员，袁振任政委。同时，水东独立团改为冀鲁豫军区三十团，团长王广文，政委苗丕一。

4月15日 冀鲁豫九分区特务营、炮兵连、八分区七团、十六团、二十一团，南下支队和高、内两县民兵万余人，向盘踞郭小寨的日伪军孙步月部发起总攻，激战三天，攻克郭小寨，毙敌1000余名，俘敌500余名。至此，硝河西、卫河东一带沙区全部解放。

3月15日 扶太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县委书记与县大队政委张潮海，县长与县大队长孙卫和。

4月18日 冀鲁豫分局就减租减息、反恶霸、反贪污等问题给十二地委发出指示信，指出：减租增佃增资与取消超经济剥削等民生斗争。其目的是为组织佃农和雇工，提高其政治地位，树立领

导核心,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巩固农村统战,在经济上,主要是通过反黑地,反贪污、反恶霸斗争予以削弱,在民主斗争中,解决贫农赤贫的一部分土地问题,对高利贷的处理原则是:抗战前的高利贷,因时间久远,除个别恶霸地主外,一般不进行减息和还帐倒地,抗战以来的高利贷需进行减息。但要根据欠债户的阶级成分不同。实行不同的减息办法。

4月24日 冀鲁豫三、七、八、九分区部队发起南乐战役。经三昼夜奋战,打下了南乐县城。击毙日伪军35人,俘伪东亚同盟自治军第三旅旅长杨法贤以下2000余人,缴迫击炮两门,掷弹筒10具。轻重机枪50余挺,步枪1700余支,修械厂、粮食等胜利品甚多,同时,扫除南乐周围据点32处,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在此次战役中,地方武装和民兵积极合作战和群众对部队的大力支持,热情慰问,对取得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4月 冀鲁豫第十分区部队向陇海路北考城地区伪剿共军马逢乐部发起攻击,攻克了李堡、张北采等据点,毙俘日伪军500多人。

4月 冀鲁豫军区三十团一部在王广文的带领下,智取睢县草寺庙伪据点,歼敌300余人。

4月23日至6月11日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冀鲁豫边区代表杨得志、崔田民、王从吾、晁哲甫、徐运北、刘晏春、信锡华、杨泽江等参加了大会。

春 水东地区掀起春耕生产高潮。

春 十二专署建立豫东中学。

春 冀鲁豫行署在尚和县一区东干城召开边区参议会,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参加了会议。

5月1日 虞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县长郑杰。同时建立县大队、郑杰兼大队长,大队辖四个区队,共500余人。

5月1日 九分区特务营伏击伪二十二团,伪团长王洪勋被

我俘虏。

5月4日 冀鲁豫、冀南两行署合并为冀鲁豫行署，孟夫唐任主任，徐达本、贾心斋任副主任，原冀鲁豫行署所辖之十六、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专署，改称为一、八、九、十、十一、十二专署。

5月5日 冀鲁豫行署为庆祝我军攻克南乐，大名在清丰马村召开祝捷大会，宋任穷、杨勇、贾心斋等出席了大会，与会军民3万余人。

5月10日 冀鲁豫九分区部队，攻克滑县姜庄据点，歼灭伪军600余人。

5月12日 八团从扶沟吕潭附近偷渡新黄河，攻占伪据点南曹。27日，消灭盘踞在郾城五沟营的伪暂编第八师，继而，攻克砖桥镇、贾寨、西夏亭、逍遥镇等据点。至7月，解放人口近百万，拥有4500平方公里的解放区，建立了郾(城)上(蔡)西(华)鄆(陵)扶(沟)、西华等抗日民主政府，经冀鲁豫分局批准，建立了冀鲁豫十三地委、专署和分区，地委书记王其梅(未到职)，组织部长施德生、宣传部长刘清训、民运部长孙一鹏；专员管大同、秘书长沈斌；分区司令员汪家道、政委王其梅、副政委李士才。郾上西县委书记赵舒天，县长侯杰；鄆扶县委书记袁声。县长时尧；西华县委书记冯明高，县长甘文枝。

5月 考城县基干队配合我主力部队先后攻克李堡、张君基、胡楼等据点。

6月1日 建立中共虞城县委，书记展奇。

6月10日 为进一步加强水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分局决定党校警卫团(即二十九团)调到十二军分区，团长汪家道，政委金绍山。

6月20日 冀鲁豫军区成立豫东作战指挥部，司令员王秉璋，政委董君毅，副司令员余克勤，副政委袁振。参谋长陈明义、政

治部主任王幼平。8月23日,指挥部带领十五团进入水东地区。

6月28日 十分区部队歼顽军2400余人,攻克虞城县城。从此,鲁西南和湖西两块根据地联成一片。

6月30日至7月7日 二、三、四、七、九分区部队,配合太行军区,发起安阳战役,攻克日伪据点70余处,歼灭日军220余人,伪军6200余人。

6月 驻太康日军四人向我投诚。

6月 九地委决定撤销延浚汲淇四县边区办事处,设立卫滨县。县委书记李先贤,县长张欣如。

7月上旬 我军攻克扶沟县城。

7月 西华县开展回地运动。

7月 建立鄆尉县委、县政府,李柴明任书记,李健光任县长

7月 水东地区在杞县建立革命烈士纪念碑。

7月 水东我军攻克日伪据点欧阳岗。

8月10日 刘伯承、邓小平和滕代远在延安电示宋任穷等“迅速夺取城市并积极破坏交通”,指出:冀鲁豫主力之任务为相机夺取开封、新乡、归德三城及沿线城市,解除该区的伪军武装,并准备打击北上之蒋军。

8月11日 蒋介石命令我军“就地驻防待命”。同时委任华北伪军头目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吴化文、张岚峰、门致中等分别为国民第一路至第六路先遣军总司令,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8月11日 冀鲁豫军区、行署发出联合命令,号召全区军民动员起来,解除日伪武装,进占大中小城市和交通要道。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其后冀鲁豫军区组成南北中三路大军,中路军由宋任穷、杨勇、苏振华直接指挥共13个团,任务是消灭新乡以东伪第五方面军及地方杂伪武装。相机攻占开封、新乡等城市,并破坏平汉线汤阴至新乡段,陇海线开封至徐州段及新(乡)汴(开封)铁路;南路军由王秉璋、董君毅指挥,共8个团,任务是协助中路军攻占开

封,阻止蒋军北开;北路军由王宏坤指挥,任务是向安阳、邯郸以东伪军进攻,相机攻占该两城。此外,各分区组织地方武装,围攻腹地各城镇日伪据点。配合外线作战。各县民兵纷纷组织反攻营,开赴前线,配合主力进行作战。

8月14日 豫北天门会起义,参加起义的有天门会第一、四、五、十八中队,第一警备队,3个分队,1个区队和2个卫士班,共约600余人,起义后,改编为“浚汤支队”,杨贯一任支队长,胡紫青、宋再明任副支队长。

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冀鲁豫边区各救总会,发出告各救国会员,儿童团员、姐妹团员书,号召各救会员参军参战。全区立即掀起了参军参战高潮。

8月20日 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斗争形势,党中央决定正式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副书记薄一波;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司令员腾代远、王宏坤,副政委薄一波、张济春、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济春(兼),副主任王新亭,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党委和军区。从此,这几块根据地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8月20日 我军攻克延津县城,全歼守敌1500余人,缴获轻机枪15挺、步枪500余支。

8月21日 我军攻克阳武县城,并切断了新汴铁路。

8月21日 我军攻克封邱县城,歼日军一个小队,俘伪庞炳勋部十一师全部官兵2000余人,缴获机枪60余挺,兵工厂1座。

8月21日 我军对开封形成包围之势。

8月22日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着重夺取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巩固扩大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注意组训部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的指示。冀鲁豫军区于8月25日重新调整部署,以中路军一部攻长垣、曹县、保卫鲁西南门户,配合新四军及山

东部队扫清陇海沿线残敌；另一部夺取滑县、汤阴县，切断平汉路。我南路军迅速夺取水东地区的县镇。留在根据地腹地的各部队继续扫清残敌，积极策应主力在外线作战。

8月23日 我军攻克浚县城。

8月26日 我军攻占封邱留光集据点，全歼伪刘凤桐部 1200 余人，缴获迫击炮 5 门，重机枪 7 挺，轻机枪 70 挺，步枪 1200 余支，战马 150 匹。

8月26日 我军攻克通许县城，全歼守敌。

8月27日 我军攻克杞县县城，全歼守敌。

8月27日 我军攻克民权县城。

9月1日 我军攻克长垣县城，歼灭伪军 1200 余人。

9月2日 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冀鲁豫分局和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在清丰单拐村举行了数千人参加的庆祝大会，热烈欢呼中国人民战胜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伟大胜利。

9月5日 为配合我军反攻，在我党帮助争取支持下，伪第四方面军张岚峰部之独立师 2000 余人，在师长魏凤楼率领下，由淮阳西北柳林集开赴西华东夏亭宣布起义，部队经过整编，组成冀鲁豫军区豫东纵队，魏凤楼任司令员，王丽生任参谋长，魏志仁任政治部主任。

9月5日 我军解放虞城。

9月6日 我军攻克滑县县城，共歼伪吴兰田部 1000 余人。

9月20日 杜新民率部起义 经冀鲁豫区党委和新四军四师的长期工作，伪张岚峰部十八师师长杜新民率近四千名官兵，在永城县酆“城举行起义，12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总司令部委任杜新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军长。

9月25日 我军攻克太康县城，击毙敌伪 200 余人，俘 300 余人，缴获迫击炮 1 门，手炮 2 门，轻机枪 4 挺，步枪 247 支。战马 32 匹。

9月29日 我军攻克汤阴县城，全歼伪刘月亭部 3000 余人。缴获轻机枪 140 余挺，重机枪 4 挺，迫击炮 4 门，子弹 30 余万发，兵工厂 2 座。

9月底 我军攻势作战胜利结束，冀鲁豫腹地除济宁、嘉祥、巨野、郓城、菏泽等县城尚为日伪军盘踞外，在东起津浦铁路，西至平汉铁路，南到新黄河，北联德(州)石(家庄)铁路。纵横千里的广大地区全部被我控制。全区新旧解放县城共 60 余座。其中属于河南者有：濮县、范县、寿张、清丰、南乐、濮阳、长垣、内黄、封邱、延津、浚县、滑县、汤阴、阳武、民权、虞城、通许、扶沟、杞县、太康等县。

军占领地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

(1937年12月22日)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

第一 方针

一、维持治安的宗旨,是我军存在的需要,促进军占领地区的全面安定,并以帮助奠定新政权的基础为目的。

二、首先完成军队驻地及主要交通线附近的治安,逐渐向外扩展而及于全区。

三、目前在地区内各要冲分驻日本军队,凭其威力尽快恢复民众原有的自卫能力,指导中国机关自行维持治安。

第二 要领

一、有关维持治安担任区域的划分,如附件所示(附件未到手——笔者)。

二、投降的武装团体,解除武装后使之归农或当劳工等,给以生活出路。

归顺部队根据性质另作考虑。

三、对匪帮的讨伐,重点指向共军,特别对已建成的共产地区,努力尽早将其摧毁。对一般土匪兼用宣抚怀柔政策,尽量从归顺者手中收缴武器,使其另谋生路。

四、迅速复活县及乡镇的行政组织，使之统辖于新政权之下，策划恢复发挥各地的自卫能力，促使民心之安定。

五、自卫机关由警察队（公安局）及保卫团（联庄会、民团、保甲）组成。前者常驻在县城及县内要地，担任警备与公安工作；后者在各乡镇以壮丁编组，与警察队协力担任清乡、剿匪工作。

六、警察队及保安团，由身分有保证的当地良民充当，原则上不收用归顺者、土匪及投降兵等。但在警察队编成以前，可暂以冀东保安队代替警察队使用。

七、铁道、通信线路及飞机场的保护，应组织利用爱护村。

八、为了警备通信，除军用通信以外，恢复县有电话线，并尽可能增设电话线。

九、为了便于警备兵力的移动，设法修整道路和增设飞机场。

十、在军事上许可的限度内，增开交通列车，同时确保主要道路及水路的安全，以促进物资交流，安定民众生活。

十一、加强统辖各种宣传机关，使之有重点地进行活动，号召民众主动协作，以期改善治安状况。

十二、军队指导县长、乡长、镇长等，收集有关肃正讨伐匪贼及守备兵站等方面的情报。使用警察队及保卫团修整警备用通信网及交通要路。其它一般行政事务，由特务机关长负责指导省政府以下单位，协助军队的治安工作。

十三、在边远地区的警备队，尤其小部队，应保持军纪和风纪，特别改善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同时监督日人进入内地后的行动，并取缔其非法行为。

十四、治安工作通过扫荡兵匪，实施应急救济、促进物资交流、恢复与加强行政机关，以求迅速安定民心，严格取缔与本工作有害的军人军属及一般日人的不良行为，以防止民心叛离。

第三 实施上的注意事项

其一 自卫机关

一、警察队的编组，因各县的状况而异，初期担任治安的兵力大概 200 名以下，主力在县城，其余在警备区域内各要冲，根据匪情随时准备出动讨伐。警察队的武器暂以步枪进行装备，尽量使用原有武器，其中不足部分则发给一部分没收的武器。

二、自卫团（河北、山西为保卫团，山东为民团或联庄会，河南为保甲）在各乡镇以壮丁组成，分为常备团丁（有工资）和散住团丁（无工资）。前者驻守县城，经常进行训练，担任剿匪工作；后者在农闲时实行一些训练，平时搞家务，当匪徒袭来时，立即集合进行乡镇自卫或援助比邻乡镇。自卫团有长久的历史和传统，在未受战祸地区中可利用其现有团体，其因战祸而溃散的团体则可予以恢复（特别重视利用原来存在的自卫团——笔者）。各自卫团均使用其现有武器，其武器被军队或匪众没收者，暂时可使之徒手担任收集传送情报工作，一俟没收武器时，再发给武器以加强自卫能力。

三、警察队及自卫团所需军费，根据地方特性，委托中国方面筹措。

四、警察队及自卫团的训练，按照需要，由警备地区的负责兵团与有关特务机关协议后，适当进行。

五、铁路爱护村，由铁路两侧村民组成，在铁路（包括通信线路）保卫方面，主要进行收集情报等活动与铁路守备队协作。

爱护村所需军费，由该村负担，但应适时发给奖金等，施行奖励办法。

其二 共军的处理

一、对共军应彻底进行扫荡。对此，在共军地区，应一面进行讨伐，一面采取宣传及其它方法，尽量灌输防共思想。

对于与共军合流或被共军操纵的匪众，应迅速设法使之与共

军脱离。

二、对于受南方抗日势力唆使的政治匪众，应努力予以击溃，尤其要消灭其组织领导者。

三、对匪化的地方自卫团及当地居民，结合讨伐进行宣抚，使其重新就业。

四、对盘踞外国租界的共产党及抗日团体，主要依靠宪兵及中国警察机关，查明其动静，以适当手段使之逐渐减少，如有可能则一网打尽。

五、在劝告归顺投降时，要利用新政权的名义，以保持他们的体面，这对归顺工作有利。

其三 有关治安的行政领导

一、军占领地区有关治安肃正工作，军队(兵站)与军特务部(特务机关)之间的业务关系如下：

1. 县警察及各乡镇自卫团的组织，根据特务机关长的指导，由中国机关施行。但在中国机关统辖力量达不到的战线地区，应与特务机关紧密联系，由军队指挥官进行指导。

2. 对警察队及各保卫团发给武器时，特务机关长应与兵团协议，由兵团发给。武器的保管和监督，按照保甲条例，打上烙印进行登记。

3. 警察队及保卫团的训练指导员，尽量由中国人担任，需要由日本军人充任时，则由该地区警备部队派出。

4. 县警备队及乡镇自卫团，对于有关收集情报、讨伐兵匪、保护铁路、通信线路等警备业务，应受该地区担任警备的指挥官管理。

5. 铁路警察队(护路警察)的有关警备工作，受铁道守备队长指挥；有关警察工作受日本宪兵的指挥。

6. 警察队及保卫团所需军费，均由中国方面负担，军队不参与此事。

对人事如有意见,应由有关军队指挥官通报特务机关长,经其同意进行处理。

7. 警备通信网及道路网的整備工作,警备军队指挥官应与特务机关长妥善协议,指导省及县政府、乡镇公所等负责进行。

8. 有关配给石油、食品、燃料及以协助贩卖棉花和其它农产品等工作,特务机关长应使宣抚班担任之。在远离特务机关(宣传班)的地方,当地军队应在中国方面与特务机关之间进行介绍工作。

二、特务机关对中国地方行政进行幕后指导时,应考虑下列各条,指导省政府努力使之主动进行活动,指导县政府以下机关迅速恢复原状。

1. 在任命新政权的县长时,尽量以治安维持会推荐的当地有声望者充当。如此既便于加强治安,并可减少与治安维持会的摩擦,同时还可防止中国官吏惯于榨取的积弊。

2. 在治安尚未稳定时期,县政府机构不必拘泥一定形式,可适应县内实际情况,建立简易的机构,随着治安的恢复,再使之完整。

3. 使县管下的各乡镇治安维持会组成乡镇公所,迅速进行联系,将其置于县的统辖之下。

4. 县长以下的薪俸及县行政费用,原则上以县的收入支付。建设警备道路及警备队的薪俸与警备工作有直接关系的经费,必要时由省政府予以补助。

5. 县长不得以私人班底组织县政府。

6. 在大部分受水灾的县,县的行政方面应以全力进行救济,在冬季发给食品及燃料,在来春配给耕种用的种子。县政府的机构、县长的任命,均须考虑适应上述任务。由于战祸严重荒废的地方,例如山西省境内,更应照此办理。

7. 铁路两侧 500 米以内,应注意不使种植高秆农作物。

其四 警备交通网的建设

一、为维持治安，整修警备电话及兵力移动所使用的道路，极为重要。

警备电话最有利的办法是恢复原有的县用电话。因为县用电话是连结县城和县内各警备区的电话，在收集情报、指挥警察队及保卫团工作上最为理想。

调动兵力所使用的道路，因即将进入结冰期，修建道路有困难，应延至来春解冻以后再修，此时可修整河川渡口的设备等。在冰冻期间，汽车于平原公路上皆可通行，必要时，部分在道路以外也能行驶，因此没有必要在此期间修建汽车公路。

其五 宣抚

一、宣抚班隶属于军特务部长，派遣至各军及方面军直辖兵团的管区之内。

二、被派至各军及直辖兵团的宣抚班，其配置及担任地区，应根据军(兵团)警备要求及特务机关的行政指导，由两者协议后决定。但在作战期间，应将宣抚班隶属于军。

三、宣抚班的有关警备事项，应在警备军队指挥官管理下，一般行政事项应在特务机关长管理下进行工作。但到中国方面能发挥行政机能时，宣抚班对一切行政则不要加以干涉。

四、报纸、广播、传单、演讲等有关治安工作的宣传，在方面军管辖之下，由各兵团各部队指派负责人，进行贯彻始终的坚强有效的宣传。

其六 物资对策

一、内地的食品(食盐除外)不足，并非只是由于铁路运输力的减少，主要是由于都市周围农产品的供应被匪贼或战祸所杜绝。有鉴于此，必须在排除此种障碍的同时，扫荡天津各水路中途的匪贼，努力打开水路运输。

二、对食盐、火柴、石油、棉布等日用品，宣抚班及当地军队应

与特务机关联系协助运输。

三、为控制食品、日用品价格的暴涨,应采取适当措施,按照需要规定公定价格。

四、棉花的收购是农村救济上第一件应办事项,为此,应力求棉花运输路线的安全。同时,监督收购人员不得乘农民的危困进行压价。驻在该地的军队、宣抚班、宪兵等应调查收购情况,与特务部联系后,命令不法收购人员离开收购地区。

其七 其它

一、军队及军人的举动应严肃正当,恩威并施宣抚工作的第一要义。与此相反,部分军人军属由于不小心而对中国人有不正当行为时,宣抚工作的成果即将毁于一旦。有鉴于此,各部队长应对部下严加教育,并使监督机关进行监视,在许可的范围内,采取军中娱乐措施,以防发生过失。

二、军队对讨伐兵匪、守备兵站线及与此有关的军队本职工作应力求精通,对中国方面的指导应由特务机关(宣抚班)担任,以免增加军队的烦琐事务。

三、为防止不良日人进入内地,实行居住许可制,除经特务机关长或宪兵官员许可者,一概禁止居住。在领事馆警察出入的地区内,对日人的取缔,在原则上属于警官的任务。

四、宪兵在本职工作以外,担任治安警察工作,根据需要,指导中国警察的业务,但不得干预行政。

(选自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第66至73页)

东平湖西方剿共作战(“1”)号作战)

(1942年9月27日~10月5日)

敌情 盘据东平湖西方鲁西地区一带的共军,除经过1939年6月十二军的作战及1941年1月第三十二师团讨伐外,未受过大的打击。特别是第一一五师教导师第三旅,几年来在鲁西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地盘。当我方压力加强时即退散潜伏,压力减弱时即行活动,不断袭击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从准冶安区夺取粮秣,对民众进行政治工作。在本年5月的冀南作战时,因第三十二师团调往华中(参加浙赣作战),避免了我方的打击。该地区从7月份前后开始,企图进一步加强根据地,似正扩充兵力,特别是乘我第三十二师团地区警备力量空虚之际,大有加强活动的趋势。

现已判明中共正规军兵力约六千五百人,正在不断游动。

作战准备 第十二军根据年度肃正计划,早在进行彻底摧毁鲁西根据地的准备工作。在土桥军司令官亲自主持下,由兵团长以下主要干部参加了进行图上战术、兵棋教育、现场指挥等研究工作。各参加作战部队在作战企图严加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了对共战法的训练。

本作战的设想为“军以约10个大队的步兵对范县附近(第一期作战)及东平湖西方(第二期作战)共军根据地采取完全包围、突然袭击战术使之彻底覆灭”。参加作战的部队为:石田支队(第三十二步兵团长石田保忠少将指挥的步兵5个大队、轻装甲车1个中队)、大熊支队(第五十九师团步兵第五十三旅团长大熊真雄少将指挥的步兵五个大队、轻装甲车一个中队)、高原支队(骑兵第二十五联队长高原孝大佐指挥的骑兵两个中队、轻装甲车一个中队、骑炮兵一个中队)。作战开始日期,预定为9月27日。

注：土桥军司令官根据过去的研究和冀南作战的经验，企图彻底普遍采用“完全包围对共战法”。其所设想的机动行程，估算为：由“集结地”到“开展线”（形成包围圈）约40公里（汽车的夜间运行距离），由“展开线”到“敌根据地”（目标中心点）约24公里（徒步白天攻击）。展开正面每个分队的间隔定为300至500米，以此计算出包围圈的周长。在行动中要特别注意横向联络，各队应控制若干预备队。要编成政治工作班（由新民会支援）、特务工作班（由宪兵队支援），作为包围圈压缩后专门负责侦察剔抉的部队。这是对付在大平原善于四散逃避的共军所适用的特殊战法。但在地形、敌战斗力情况不同时，此法则难以适用。

第一期作战（9月27日至29日）第十二军于9月25、26日，命大熊支队在东昌、莘县附近，石田支队在郓城、巨野、济宁，高原支队在濮阳附近分别集结兵力，26日夜运动兵力，27日拂晓以前到了预定的展开线。随后由控制线指挥各队前进，逐渐将包围圈压缩到中心地区（单堂）。

各队经过小型战斗，于16日以后攻进以单堂为中心的半径约三十公里的地区内。包围圈内的敌军几乎都身穿便衣、藏起武器、伪装难民逃走了，只有石田支队在旧范县附近与一部分强有力的敌军遭遇，经过激烈战斗将其击溃。以后各队在作战地区内进行了扫荡剔抉，直到29日为止。

第二期作战（9月30日至10月5日）第一期作战完成后，留下部分兵力在范县附近扫荡，各队主力伪装要返回原驻地的姿态，大熊支队在东昌附近、石田支队在巨野附近、高原支队在郓城附近，秘密进行了下次作战的准备工作。当时，在东平湖西侧仍潜伏有约两千五百名共军。

各队于10月1日夜秘密开始行动，2日晨在预定和包围线上展开，随即向东平湖西岸同时压缩进攻。敌方似乎并未料到我方的攻击，力图撤退和化装便衣，一部分强有力的部队与大熊支队进

行交战被击溃。各队将敌主力压缩到我方的第三包围圈内,自 18 时开始猛烈攻击,歼灭敌之大部。

战场一带 1 日夜间下了长时间的暴雨,各部队行动困难,但仍极力搜索和扫荡敌人。10 月 5 日大致达到预期目的,结束了战斗。

在此期间,由县警备队及石田支队炮兵队在东平湖东侧构成阻击线,担任防止敌军逃脱和捕捉俘虏任务,并对东平湖中的岛屿和湖岸进行了扫荡,扣留了民船。第六直协飞行队在指挥联络、侦察敌情方面进行了特别有效的协作。

作战效果及其后的状况 在上述两期作战中,交战的敌方总兵力约有 7,360 人,其中敌遗尸 1,252 具、俘虏 1,250 人。我方战死 9 人、伤 72 人。这与过去进行的对共战相比,效果极好,取得了显著的战果。

如上所述,由于我方采取“完全包围突然袭击战法”,使当面共军未能积极集中兵力进行突破,因而我方得以较薄的包围网进行压缩。但从我方来看,还有必要进一步做好加强横向联络、隐蔽作战企图和轻快运动的演习和训练,以及匪民分离和收容运送俘虏的准备工作。

在我方搜索剔抉敌人之时,敌军教导第三旅约 2000 人分散化装西去,逃往井店镇根据地(濮阳县西方约 75 公里,河北、河南省境附近)。

井店镇根据地虽经我军一再讨伐,近来仍逐渐增强扩大,正在与山西方面联系,并对滑县(濮县西南约八十公里)南部方面积极进行工作。为此,我方部署于该方面的特殊工作队和中国军逐渐受到了威胁。

第三十五师团为了迅速摧毁上述根据地,以便于推进豫北地区的治安肃正建设,于 10 月 31 日拂晓突袭了井店镇,随后在该地区附近进行了扫荡剔抉。

(选自《华北治安城》(下)第 220 至 224 页)

中共方面的贫困及其对策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华军、官、民全力以赴的治安肃正,中共根据地受到压缩,在军事上、经济上都陷于极度贫困。在中共各种文献中一般叙述如下:

(一)日军对华北解放区开展了扫荡、“三光政策”、思想战及特务工作的总力战。其扫荡方法有“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展转剔抉”等等,企图消灭我军的生存条件。这种连续进行的扫荡造成了从未曾有过的严重的局面,加上这一时期华北各地区发生了天灾,由于饥荒,军民只得吃树叶草根,局势越发严重。

(二)1942年一年中,冀中平原的扫荡达到了最残酷的地步,更加上实行了治安强化运动等,使我方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三)日军在太行军区进行的“四·二九”、“六·一二”扫荡,规模大且彻底。我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左权同志在该战役中殉国。由于敌军的蚕食政策,更加上春季的大旱灾,粮食生产降低到三分之一,积储粮草枯竭,群众的贫困出现了空前绝后的惨状。

(四)1942年是山东国民党(重庆方面)掀起反共高潮的一年。过去想暗中投敌以求自保的反共军,现在竟发展到纷纷公然投降日军,企图借敌人的力量共同消灭我军。我根据地因敌人扫荡及经济封锁,粮食极端困难。

针对这种形势,中共采取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土地政策,实行精兵简政、开展整顿三风(整风)运动以及生产自救(增产)

等各项政策。

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边区内各级行政、立法机关实行三三制，企图以此加强统一战线。三三制是在边区立法机关参议会的人员分配上，按中共党员、党外左翼人士及中间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通过选举选出的制度，是把中间阶层吸收进统一战线，以紧密联系群众的政策。三三制的实行，使边区政权的性质形成了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目标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在克服经济危机上起了极大的作用。“边区”是实行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的行政地区，与重庆政府统治地区不同，是在性质不同的政权下实行另一种政治的地区。战后一个时期，中共曾称之为“解放区”，经过发展，合并构成了新中国的基础。

彻底实行新土地政策

为了保护中、贫农，提高他们的生产热情，彻底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减少佃租降低贷款利息），力求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同时对于地主、富农采用交租交息政策（保证交纳佃租、利息）以团结他们使之抗日。由于削弱富农阶级及富农生产不利于边区经济，因而转变为凡不反对抗日的地主、富农，采取与之协作的政策，1941年以后更加强调了这一政策。由于减租减息政策很难彻底实行，至1943年10月党内发出了“开展降低佃租运动”的指示。

实行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是为了解决各个边区的财政困难、减轻人民负担自1941年以来实行的政策。要求军队采取精锐主义提高素质，不盲目增加兵员。尽量精简行政机构，提高工作效率。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采取上述各项政策的同时，在军事方面

扩大发展了适应作战地区情况的民众武装组织,大力开展了主力军、地方军、民兵形成一体的人民游击战争。

例如冀鲁豫边区,为了扩充民众武装,在1941年前后公布了“冀鲁豫边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团暂行条例”,其内容摘要如下:

第一章 总则

一、本队定名为冀鲁豫边区军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

二、本队为不脱产的人民武装组织,凡在县政府法令规定的年龄内(年满16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性公民及16岁以上45岁以下的女性公民)的公民均编入本组织。

本队在执行任务时受政府指挥,但组织的性质是群众自卫的武装团体。

三、本队的目的是以抗日人民武装的自卫力量保卫乡村抗日根据地、抗日政权、抗日团体等,并争取民众利益,实现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

四、本队的基本任务如下:

(一)进行人民游击战争。

(二)与抗日军队协同作战。

(三)维持抗日治安、担任抗战勤务。

五、本队为了执行基本任务建立了下列各队:

(一)警备自卫队(简称自卫队)、(二)妇女自卫队、(三)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四)模范班、(五)公私企业团体内的工人自卫队。

(参加青抗先的为16岁以上23岁以下的男性、参加模范班的为20岁以上35岁以下的男性。20岁以上23岁以下的男性根据个人志愿决定参加青抗先或模范班)。

六、青抗先与模范班统称“民兵”。

民兵为人民武装中的高级组织,因此以志愿参加为原则进行组织。任务比一般自卫队更大。即:农忙期从事生产,利用农闲期

尽量进行训练，在有事之际参加战争，是武装自卫队的骨干。

七、警备自卫队执行下列各项具体工作：

(一)抗日警戒、铲除汉奸、肃清密探。

(二)破坏道路、围壁，实行空室清野。

(三)传送情报。

(四)救护伤病员、运送战斗器材、支援医院工作。

(五)缝洗军衣(妇女自卫队)。

八、民兵队除一般自卫队的工作外，并执行下列工作：

(一)配合军队参加战斗。

(二)对敌人据点进行封锁警戒，保护地方政权的生产、财产。

(三)封锁敌方交通线，进行游击活动。

(四)侦察敌情。

(五)援助、保护战时避难民众。

第二章 (除以下各项外均略去)

十六、本队的编制及指挥系统如下：

(一)县级大队部设正副大队长、教导员各一名(由县武装科长兼任大队长，在武装科合并办公)指挥领导全县自卫队。

(二)各队设中队部，设正副中队长、政治指导员各一名，指挥全区自卫队(区武装助理员兼任中队长、合并办公)。

(三)在村庄多的区，根据实际情况，在区与村之间设立中心村区队部，设正副队长、政治指导员各一名，指挥全中心村的自卫队和基于自卫队。

(四)以行政村为单位设分队部，设正副分队长、政治指导员各一名，指挥全村自卫队。

(五)分队下设小队，小队下设班。小队及班均设正副队长、班长各一名。以5至15人组成一班，以2至5个班组成一个小队，以2至5个小队编成一个分队。

三十六、在敌占区的自卫队组织，为了避免敌人的破坏，可利

用各种隐蔽方法。

开展整顿三风(整风)运动(译略)

生产自救运动

为了克服财政、经济困难,首先以粮食、被服的自给自足为目标,力求全面发展根据地内的农、工、商、运输业的生产。为此,“在中央统一、分散经营”原则下,组织党、政府、军队、人民大众的一切劳动力,大力开展生产竞赛、表彰劳动英雄以及发展为大众服务的合作社等工作。军队也从1942年起,除采取自给自足的办法减轻人民的负担外,还担负起支援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的劳动和对敌警戒的任务。

对当时的受灾民众,在“保证不饿死一个人”口号下,进行了救济活动。这一生产运动到1944年以后,在各方面都达到了自给自足的程度。并且在壕沟防卫线外的游击区,也开始了军民协力的大规模生产运动。毛泽东在1945年4月也说:“大家看,我们自己,在没有生产自给的时候,何等困难,一经生产自给,何等舒服。”

以上是针对1941年、1942年的困难,中共方面实行的对策概要。胡乔木也说:“由于进行了这样的努力,克服了困难,根据地更加巩固,从1943年起,又逐步扩大了。”(以上均按日文译出,未与中文资料核对——译注)

重建冀南根据地实况

以上是中共方面克服困难的全面情况。下面再举出冀南根据地重建的具体事例。冀南地区在4月底开始的日军的肃正作战中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但从6月下旬左右,很快地进行了重建工作。在中共的资料中有如下叙述:

我们决定根据敌方势力强弱不同而形成的各地区的特点,采取不同斗争形式的方针。

在敌方统治时间长、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例如平汉路沿线地区等地，仍然坚持“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把重点放在秘密工作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瓦解伪军伪组织工作。与此同时，领导人民进行日常的合法斗争，保护人民利益、积蓄抗日力量。

在接近敌方主要交通线、重要据点或敌方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则一面坚持秘密工作，一面团结组织群众进行隐蔽的武装斗争。例如由干部及当地民兵打击敌方的特务活动，加强扩大抗日军队和抗日政府，争取团结群众开展社会统一战线工作和向伪军、伪政权内部进行渗透工作。

在我方力量占优势的地区，开展群众游击战争，实行革命政策，破坏伪政权，进行反“蚕食”，反“治安强化”的斗争，牵制和抵抗敌军的进攻，阻止其行动。

在我方游击根据地，推进武装建设，动员群众投入保卫人民日常利益的斗争，建立区村政权，加强群众游击战，进行改造环境工作。

以上各项措施均适应情况的演变进行，主要以党、政、军、民形成一体为根本。这样才能做到正确判断敌情，把合法与非合法斗争手段恰当地结合起来进行有效的游击战争。

我冀南军民在敌人的4、5月份大扫荡后，按照“夏防计划”休整兵力，并利用植物生长茂盛期进行了秋季攻势的准备工作。

在以后的一年战斗中，使日军死伤4000余人，打死打伤和俘虏伪军7000余人，缴获步枪5000余支，机枪50余挺，完全弥补了春季作战中的损失。同时，平原地区军民开展了连续不断的政治攻势，报复敌方的“治安强化运动”。特别是为了对抗敌人的1942年秋季“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我方开展了“第六次政治攻势”，宣传了我方的“两年来的胜利总清算”，使敌人尤其是伪军产生了空前的动摇。

1942年11月至次年3月的5个月期间，开展了强有力的游

击战争和全面性的群众斗争,给伪军组织以决定性打击,使其士气大为低落

平原地区军民乘敌方兵力不足、纪律松弛等空隙,进入敌人后方建立了小据点,把敌占区改造成了游击根据地。军区和区党委详细调查了敌方地区的情况,做了充分周密的准备工作,挑选与当地居民有联系的干部,组成了数十个精干的武装工作队,秘密潜入敌方占领区,说服当地有力人士,宣传抗日政策,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接着武装工作队和抗日政府工作队又对敌方特务、汉奸、有民愤的坏分子由群众进行公审、抗日政府判决,对其中的罪大恶极分子处以死刑,并要求其余的反省悔过。同时选择适当时机,对敌方的军事设施进行破坏,向群众显示我方的威力,掌握伪组织,进一步领导群众开展了对敌斗争。例如反对与敌人协作、反对出民夫、反对交纳棉花、反对纳税等等。这样,成功地建立了小根据地。对此,敌方根据确保占领区的方针,加紧实行了强制征壮丁、配给制度等措施,这样就必然与群众形成对立,因而我方的小根据地陆续不断地增加。

如上所述,在武装斗争支持下或以武装斗争为核心,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合法工作与非合法工作互相结合起来,建立起能够打击敌人的任何进攻、保护抗日力量的体制。

由于采取了上述方针和措施,冀南地区春季的混乱状态在6、7月间即已停止,8、9月间扭转了危局,10月以后扩大了游击区,在游击区及敌占区内建立了小据点,逐渐缩小了敌方占领地区。

其次叙述一下“道沟”、“坑道”斗争情况。这种斗争方法是平原地区军民在对敌斗争中的一种极为有效的发明创造。

冀南平原没有山区那样可以利用的险要地形,既少森林也无湖泊,是一望千里的平地。除在植物生长茂盛时期外,没有可隐蔽部队行动的东西。敌人在“四·二九大扫荡”后,随时都可以对我方根据地村庄进行袭击。据统计,1942年冀南地区的交战次数为平

均每天7次,1943年2月为平均每天9次。在这样的斗争形势下,为了便于我军部队的活动和打破敌方的严密封锁、拖延和阻止敌军快速部队的行动,平原地区军民花费了极大的劳力,改造了所有道路,把大部分道路挖深修成了“道沟”。即把道路按可以通过牛车的标准,挖成五尺宽、三尺深的深沟,挖出的土堆积在沟的两侧做为人行小道。在与此道沟相隔一至二华里的地方再挖成同样的沟道,构成平行道路以便于往返通行。此等道沟纵横交错修成蜘蛛网形状,因而使我方可以通行无阻。在受到敌人攻击时可做为隐蔽掩护物体,便于分散退避,同时又可隐蔽地接近敌人。相反,道沟阻碍了敌军车辆部队和重武器的行动,敌军用填埋的办法进行时,则比我方步行的速度还要慢。

大规模地构筑道沟是在1940年开始的,但当时还很原始,在军事上的效果也不大。以后经过多次失败和试验,至1942年以后终于发明了这种有组织的新的道沟战法,加上建成了“坑道”和乡村堡垒,创造出了“地下战场”。

“坑道”也是随着斗争的发展而改进的,最后形成组织得极为复杂的设施。各户都有自己的秘密洞穴,村内有通往各户的村坑道,此外还有连通各村的“干线坑道”。这是我军和游击队的藏身地方。也是面临敌人优势时的退避通道。这样就使我军能够神出鬼没地行动。尤其是坑道增加了我军和群众接触的机会,使群众得以勇敢地和敌人斗争。

冀南平原长达几万华里的“道沟”和“坑道阵地”,虽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打击和削弱了敌人,积蓄了革命力量并使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译注同前)

(选自《华北治安战》(下)第260至268页)

清丰事件^①

5月29日,爆发了清丰事件。这是日军改变警备时的一幕悲剧。根据生存者的回忆,事件的概要如下:

河北省冀南道以北为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旅团长小松崎力雄少将)的警备区,濮阳县以南为第三十五师团的警备区。当时共军在该地与山东省交界地区的农村已经根深蒂固,并且逐渐扩大势力。大名、成安县成为冀南军区第一军分区;南乐、清丰、内黄、观城、朝城县为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濮阳县为冀鲁豫第四军分区的根据地。我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为了实现新方针,进入5月份,逐渐集结分散驻守的小部队,放弃了距铁路沿线较远的清丰县。(根据治安良好地区的警备由中国方面负责的方针。)

在县联络员中间有不少人对于这一措施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这种作法是对该地区有友好关系的中国人见死不救,对中国方面在心理上会有很大影响,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后退的表现。为此,道联络员川本说服邯郸陆军联络部长加藤次郎大佐,结果得到允许,只用中国方面的保安队夺回清丰县并确保该地。于是,由各县联络员领导从各县保安队中选拔的部队(主力是清丰、大名、南乐县的保安队),在南乐、大名集结。总兵力共4,800人,以之编成冀南剿共保安联合军。5月23日开始进攻清丰县,很容易

^① 此事件发生在1944年5月29日。

地攻占了该城。

此后中共也未反攻,恰好各县联络员齐集该地,为了鼓舞士气,决定在清丰县城内召开5月份的联络员例会。28日晚,联络部的代理部长名取正雄大尉、道公署的薛道尹,在大约三百人的教导队护卫下一同来到县城。29日道尹亲自部署了县城的警备,在原来警备队的旧址召开了联络员会议,讨论研究了收购粮、绵和清丰县的警备等问题。在会议当天,大名县警备队的藤坂大尉率一个护卫小队前来,通知全员要赶快由清丰县撤出。然而趾高气扬的联络员们反对撤走,会议继续开到黄昏。

当天夜里,全体人员逐渐就寝,突然遭到共军的袭击。保安队在城上布防时,县城已完全被包围,立即全面展开了激战。夜3时共军突破东关拥入城内,顿时,由各处抽调而来的保安队东奔西窜,混乱不堪,完全丧失战斗意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名取大尉命令全体突围。但是,突破两、三重的包围是非常困难的。到第二天的夜里,离此最近的南村集日本警备队赶来时,只剩下日本人8名、保安队30多名,名取大尉、川本道联络员战死,薛道尹被俘。

数日以后,加藤联络部长在旅团两个大队的支援下,经过三天的时间,在清丰县城内外收敛了数百具尸体。由于这一事件的发生,冀南道的保安队一蹶不振。此后南乐县城被袭击,松田联络员等战死,第二年大名县城又遭袭击,百田联络员战死。

清丰县事件,说明军事和行政调整的困难。日军是中国方面的后盾,中国方面为了确保和扩大治安圈,必须首先能达到不需要日本联络员指导的程度,最重要的是中国人的自主和实力。中国人本身也必须有这种要求。

(《选自《华北治安城》第335至337页)

新乡特务机关

在河南省北部省特务机关设在开封，并在豫东道东部(骑兵第四旅团地区)的归德、(今商丘一带——译注)、豫北道(黄河以北第三十五师团地区)的新乡设置了支部。新乡特务机关长河野又四郎大佐(当时是中佐)是在中国工作过15年的中国通。关于豫北的状况，他曾作如下叙述：

(一)特务机关的工作重点，根据地点、时间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例如北京特务机关以指导政治、文化为重点，天津则以经济、济南以农业生产为重点。从时期的变化来看，新乡特务机关工作重点在1941年为农村开发，1942年为获取物资和招降工作，1943年为治安工作，尤其是饿荒对策，1944年则以对投降部队及警备队的指导为重点。在什么时期应做什么工作是根据兵团长的方针和特务机关长对形势的判断而决定的。由于是在异国战作地区的行政，在工作方法上尤须思想灵活随机应变以达到目的。但从日本国内来的官僚却多以低效率的机关化的方式进行工作。

(二)在我军占领下，得到优秀的当地领导人非常困难。在新乡特务机关负责地区的24个县中，有20个县的县知事是事变后从满洲来的，这些外来的知事虽然有工作热情和办事能力，但与民众不能融洽。当地出身的知事虽然熟悉地方情况并与居民有联系，但多缺乏工作能力。这是特务机关长进行幕后指导最感困难的事。

(三)在反共工作上，我方的理论模糊不清，又提不出具体的实

践办法,加以民族、语言、习惯不同所造成的弱点以及日军的统治欲、高人一头的思想等等情况,反而被中共所利用。

(四)日军占据的地方不过是点和线的“骨头架”,特务机关指导中国军、官、民扩大治安地区,要给骨头贴上肉。为此,比较可靠并有实力的是县警备队,其次是有乡土感情、早已形成组织的保甲自卫团。那些不想再战而投降的部队软弱无力,即使强令他们进攻中共地区,只能落个向敌人缴械而归的结局。

(五)招降工作由当地部队进行,特务机关负责支援和接收。投降过来的部队是对讨伐、警备都无用的“食客”,简直是沉重的负担。

(六)确保粮食是每年都面临的问题。中国农民历来遭受大规模旱灾、蝗灾、水灾三重苦难。在饥荒的年头各地有很多人离开农村,大部分往江苏省、一部分往山西省逃荒,直到第二年春天为止。特务机关采取从其它省份买进杂粮,以及开发清河县水田地帯(引水工程)、利用粮食平衡仓库等办法勉强进行救济。

(七)其它:诸如采取谋略从敌方取得中国方面武装团体使用和弹药,在濮阳、滑县等敌方地区收买棉花、粮食、收集铁路用的枕木(以盐交换)、“引黄济卫”工程、爱路工作、维持特务机关工作人员纪律等等。

特务机关工作涉及很多方面,但多是一时难见成效的。

(选自《华北治安战》(下)第233至235页)

卫立煌向何应钦报告袭击

豫北八路军密电

(1940年6月3日)

特急部长何 3964 密据高树勋感戍电称(一)敬日我新第十六军兵力两团及第二十九军一部分向温庙陈家(濮县西南)之奸党进剿战竟日,奸党不支,分向东北范县窜去。是役毙伤奸党 270 余,俘 30 余,获马步炮 32,马骡 42 匹,手榴弹 140 余。我伤亡官兵 82 员名;(二)有奸党约千余窜犯瓦屋颊山、里寨一带(濮县西北),经我徐团击退。计毙伤奸党 20 余,我伤亡 6 员名;(三)宥午我邵鸿基支队一部,向濮阳县文留集附近游击,毙伤奸党 30 余,我亦伤亡士兵 11 名;(四)我段清洲纵队主力进剿清濠属小冯村老河沿之奸党赵承金部,计毙伤奸党 230 余,获手步枪 13 枝,我伤官兵 57 名等情谨闻洛卫立煌江亥总日印。

(摘自《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第 3 辑第 12 册)

熊斌电蒋袭击八路军情况

(1940年7月16日)

渝委员长蒋卷密报机密石友三文电称(一)盘据大杨铺、白羊寺、大屯、龙王庄(在范县西南30里)一带之萧华、杨勇两部并朝城方向加增之共匪共约1.2万,异常顽强,尤以萧华部为甚,经孙良诚部,邵鸿基部,及一八一师之张旅,新六师之一旅并新四旅终日痛击卒将该匪击退,一部向黄河南逃窜,大部溃退据玉皇庙一带。我各部正追击中;(二)是役毙伤匪约千五百,俘获另报。我阵亡营长王毓龙、于耀光两员,伤亡官兵千余员名等情,谨闻取熊斌銑申办劾印。

(摘自《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第3辑第12册)

高树勋报告袭击豫北八路军密电

(1941年5月)

(一)1941年5月4日电

重庆孔处长密译呈军令部部长徐钧鉴一：自濮观交界之古云集及清濮交界之麦村一带将汉奸党大部击溃后，匪确死伤4000余人，其残部及由卫河与聊城、临清各方增来之匪共万六七千人，仍分窜于观、清、范等县南部，及濮县东部地区，准备向本军进犯。正分会令各部长清剿中。二、连日杨勇、许寿青、杨得志等部匪军及番号不明之一部共约四五千入窜集濮阳县南15里铺毛岗、马棚及濮阳东南边界之石基头、王称堙、白岗一带地区，向本军防地南面施扰，饬由新八军孟旅长昭进带三团及张支队长栋臣率领一部分途兜剿中。三、孟旅长今晨九时在文留集南之齐王庄一带与匪2000余遭遇，激战3小时，毙匪200余，获枪30余枝，机枪1挺，子弹数千粒。我伤亡百余，刻仍在激战中，张支队今拂晓将向濮阳附近之匪驱逐后，即向白岗之匪进剿，除令各部队并力兜剿务期痛歼外，谨闻职高树勋叩辰支申智。

(二)1941年5月24日电

重庆孔处长密译呈部长何钧鉴(一)敬早四时我进剿部队开始分途推进，由李副师长率陈田两团分向常庄一线温庙前进，沿途击溃匪之残余部队，至卯时方与匪在温庙、王称堙集、后陈家一线发生激战。同时刘李两团及骑兵一部由孟旅长指挥，进至尚楼及王庄

以南地区,后与寺台村、齐王庄之残余匪军接触,我骑兵亦与进至金钢集以西地区,压迫匪军。左翼各线战况至为激烈。(二)今晨我朱师长率刘、王、宋三团及骑兵由濮县南杨楼、彭楼分沿大堤向后陈家、赵庙推进,猛攻匪军。右翼温庙、后陈家之匪受我三面围攻,已呈动摇,支持至午匪全部由侯官、温庙向黄河对岸溃窜。朱师长指挥刘、王、宋各团跟踪追击,李副师长率陈、田两团由温庙沿堤转向西南,急进策应孟旅,所攻寺台村、齐王庄,均经我李刘各团攻占。该匪溃窜白岗,我军乘胜尾追,匪复窜东寨、李河渠渡河东窜。我各路追击部队进到河东董口,项城一带会合。后以匪军复窜向东北范境及部分于酉刻折回彭楼、白岗各地,刻已肃剿散匪,建立据点。是役计俘匪 30 余名,毙伤匪 270 余,获马步枪 33 枝骡马 12 匹,手枪弹 170 余枚,我伤连长 1 员,排长 2 员,士兵 50 余人,阵亡士兵 21 人。谨闻职高树勋叩辰敬智

(摘自国民党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

汤恩伯报告袭击黄河支队密电

(1941年5月23日)

急喻委员长蒋铤午敢电计呈突密据何总司令转徐师长贺辰电称：1、派骑九团全部携弹药2万发，并耿蕴斋、刘瑞歧两部驰往应援。复电卅支队蒋嘉宾部积极进攻匪黄河支队根据地，藉以牵制之敌；2、据随张特派员荣田北上之李团附桂青报称，江苏专员董汉槎率驻沛部队约四千余抵东在南北辔口集附近，与匪黄河支队邓初明即彭雄部四千余双方反复层层包围，战斗颇激烈，匪我伤亡均重。冬耿少孚派兵两营前往增援现匪在辔积岗附近与我军隔河对峙中等情谨闻取汤恩伯叩梗午敢印。

(摘自国民党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

我所知道的敌寇对冀鲁豫边区 的一次大扫荡^①

邢汉三

冀鲁豫边区是日本军河南军管区的辖境,驻开封的日军兵团部,负有“清扫”冀鲁豫边区抗日力量的主要责任。

1941年至1942年秋,驻河南日军连续五次推行凶残无比的治安强化运动,给我方革命势力以严重损害,在敌人自认为河南沦陷区内已能确保,我冀鲁豫边区已陷入孤立的情况下,乃于1942年冬初,调动日军驻开封兵团部所能指挥的全部兵力,倾巢进攻,使用的兵员近四万人,坦克车、装甲汽车数百辆,并有敌空军支援,经过月余时间方暂告一段落,敌人使用兵力之多,持续时间之久,都是在河南沦陷区所罕见的。四十三年过去了,这次重大斗争的经过详情,还鲜为人知。我当时曾亲自参与了这次活动,现就所知择要写出,以资参考。

一、“扫荡”的序幕

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在其后一年中,是日军最猖狂、最嚣张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各地的日益活跃,给他们在欢庆胜利的心情上投下了暗影,他们为着确保华北兵站基地,决心用较多兵力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

^①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邢汉三,原名邢幼杰,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伪河南省公署宣传处长和伪新民会事务长等职。

武装。1942年冬，日寇对冀鲁豫边区的大扫荡，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影下发生的。

1942年下半年，我冀鲁豫边区的武装力量，敌人并未敢轻视，他们为着彻底消灭抗日势力，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当时的开封日军兵团部，辖区除河南沦陷区外，冀南的邯郸、大名、濮阳，鲁西的菏泽等地均属之。日军在开封、新乡、濮阳、邯郸各驻一个旅团，加上一些特种部队，官兵约5万人。在犯我边区的两周以前，曾在开封召开了军事会议，作了军事部署：由开封、商丘、新乡、邯郸、濮阳五路进兵，总指挥部设在濮阳。散会以后，各路军先秘密调动，向冀鲁豫边区内黄、浚县、长垣、滑县等地集结。侯令同时发动总攻。

当时日军驻开封的兵团长是井关中将，毕业于日本陆大，军事有一套本领。1942年夏调到开封，正想借此大显身手，在他到濮阳前线指挥军事之前，除前边说的召集日本军头目会议之外，还对伪军大头目、伪政府委员，也都以巩固地方治安为名，作了适当部署。伪新民会的日本头目也根据日本参谋长指示，召集伪省公署宣传处，伪新河南日报社，伪开封市新民会、开封市公署、开封市妇联以及其他有关单位，组织随军宣传队，又指示省剿共委员会派员担任对共情报工作。这些人随同日军开到什么地方，当时没有公布，也以军事机密为名，不许参加人员询问。可是对随工作人员的纪律，要求极为严格，一行一动必须由日军负责领导人批准。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伪报社附设的印刷所，接到伪新民会交印的大批反动宣传品，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其中有各色标语、告民众书等，限当夜印好。伪报社的职工忙了一夜，天刚破晓，伪新民会就派人取走，交由陆军宣传人员点收备用。

这支随同日军开往前线的宣传队，以日本驻开封特务机关辅佐官可儿廉平大尉任队长。全队近30人，分为3组，组长由队长指派，事前可儿已召开了组长会议。出发前又由可儿点名训话，各组长召集所属组员，分发了宣传品，交待了任务，大约早7点左右，他

们分乘 3 辆卡车,每辆车上除宣传队人员一个小组外,另有伪省署警卫队兵十多人作为护卫。这支宣传队的组编,也是事前日军准备工作之一,他们的目的是为着欺骗中国人民,麻痹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二、“扫荡”的经过

敌军大部队进犯冀鲁豫边区时,因我主力部队已先期分散转移或隐蔽,故未发生大规模的激烈战斗。只有一些地方的武装和民兵,伺机在夜间向小股敌人进行袭击。敌人在根据地及其数百里的村镇内,到处奸淫烧杀,抢劫财物,逮捕他们认为有抗日嫌疑者。白天抓捕,夜间酷刑审讯,大约进行半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些日子里,每夜都有被害者的惨叫声,每天早晨村外有成群野犬争食死尸。几天之内,死尸已满街巷,无人过问,数以百计的村镇,成为人间地狱。甘充敌人鹰犬的叛徒吴兰田及其走卒,为敌人作眼珠,带领敌人,对我方军政干部、党员进行指认,几经他们指认的,不容分说,即行捆绑,装进日军卡车,押到开封,进行酷刑严讯。被这些坏家伙指认的,因有不少我党党员及军政干部,但因他们敲诈不遂或过去有嫌疑而被陷害的群众也不少。据当时估计,除被残害致死者外,仅被押到开封的不下五百人。

可儿廉平所带领的随军宣传工作人员,除约及半数的过去由日伪宣抚官出身会日语甘为敌效劳者外,大部对日寇的残暴行为,均极不满。他们的任务是散发传单贴标语,对群众作宣传,可是村民跑的跑了,没有跑的被日寇押起来了,向谁来宣传呢?标语、传单街头贴的也不少,根本没有人看,他们虽轻闲,就是常饿肚子,睡草窝,挨训斥,生闷气,他们回到开封时,多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好象旧社会初出监狱的囚犯。伪报社随军去的记者,常代表这些人向可儿队长诉苦,有时能够多领一些干粮,就算幸事。另一半宣抚官通日语的,都充当了日本的翻译,为日本做效忠奴才,打骂群众,审讯

“嫌疑犯”和日军同吃同住，合伙分赃，满载而归。随同日本的新闻记者，特别是日军同盟社的记者，他们都常常和日本军大队长以上军官一起行动，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坐吉普和小轿车，可以任意向外发消息，各伪报社的记者一切活动，需听可儿廉平指挥。向外发通信，需通过可儿才行。在开封出版的伪《新河南日报》，虽是伪省署机关报，有随军记者前往，但因对日军的待遇有所不满，采用半怠工的方法对待。日军在边区的罪恶活动，除日本军发布的战报不得不发表外，自动写稿很少。这是当时随军宣传队活动的大致情况。1942年末，在边区的扫荡才告一段落。

三、接踵而来的政治迫害

日军井关团长心黑手狠，不以军事上的胜利为满足，必欲根除抗战势力而后快。在军事扫荡大致告一段落后，又采用了以下措施。

(1)利用叛徒吴兰田，巩固其新占领地区。由日军委派吴兰田为濮阳、内黄、长垣、滑县、浚县五县联防司令(陆军少将衔)，由日军司令官赏给黄呢子军服一套，军刀一把，军马三匹，并划定以上五县为吴兰田所成立的伪军区，五县的伪县长，应听吴指挥，各县保安队吴可以任意调动。因为这五个县除濮阳、长垣外，全是伪河南省公署辖区，吴兰田这个伪官，自当和伪河南省公署有隶属关系，日军特务机关长，依照日军兵团长指示，特令伪河南省长陈静斋准备大量慰劳品，带同伪省政府宣传处长刑幼杰，日文秘书刘际唐，中文秘书张直，警卫队长乔国臣等到滑县境内吴兰田的司令部进行慰劳，吴兰田和伪省长会晤后的互相吹捧，全部表现出汉奸们的丑恶嘴脸这幕丑剧，完全是日本特务机关长和日本军驻濮阳的旅团部的参谋导演的。

伪省长陈静斋等人，由日本特务机关长大泽侃次郎率领，先到濮阳和日本军旅团长会晤后，由旅团部派一参谋陪同前往叛徒吴

兰田匪部驻地白道口、吴已早有准备，大街小巷都贴有欢迎伪省长和大泽机关长及“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一类的标语，吴兰田及其走卒均在白道口镇东门外迎接。该镇是内、滑、濮、浚四县边区的大镇，原有居民三四百户，周围有土寨墙和壕沟，镇内驻有日军一个中队，日军中队长也和吴兰田一起出迎日伪头目，陈等和大泽在东门外下车后由日军参谋分别作了介绍，大泽和日军参谋等去日军中队部，陈静斋一行随同吴兰田去他的司令部，时已暮色苍茫，陈等和吴略事寒暄，即行休息。晚饭以后，日伪军头目和吴兰田共同商讨，决定第二天上午10时召开群众大会，由吴代表地方官民，欢迎陈静斋一行，同时由陈训话，表示对吴兰田一伙叛徒的慰问与鼓励。

第二天上午，大会在该镇西北角空场内举行，场内连夜塔起主席台，作了简单布置，白道口周围十里内居民，在半劝说半强制情况下，陆续到了到了会场。事后伪报所作报道说是参加民众万余人，实际可能有两三千人，会议于十时半开始，由伪省宣传处长邢幼杰致开会词，说明开会的意义，接着吴兰田至欢迎辞。把陈静斋吹捧一番，表示以后决心为伪省长效忠。陈静斋念他的讲演稿时，因时当隆冬，天气阴沉，西北风紧，台下衣服破烂单薄的群众冷不可耐，会场周围位置的伪军又不让出场，场内人声嘈杂，秩序难以维持。吴兰田大声呼喊，叫群众少待，陈静斋丢三拉四地把讲稿念完，就草草收场。这幕丑剧共演了一个多小时，在日本人都没有出场，这可能是为着更能欺骗群众。

当天下午，陈静斋又召集了附近各村村民代表、有名望的士绅举行了座谈会，征求他们对该地区和全省行政工作的意见，这也是又一幕滑稽剧。因为参加会议的人，都是吴兰田指派的，他们所代表的，都是吴兰田一伙的意见。

第三天早饭后，陈静斋一行由长垣经封丘返回开封，日军兵团部连编带导演的这幕滑稽戏唱完了。这是在边区军事斗争告一段

落,日军所操演的一项政治斗争的经过概况。

(2)对被俘人员进行审讯处理。在月余的军事扫荡中,由于叛徒吴兰田的告密指认,这些被俘人中多是我方中下级军事及地方区、乡、村的干部,共产党员占较大的比重,日本兵团部却把被俘人员关押在开封城内西北隅(即原开封地方法院)的看守所内,加带脚镣手铐,白天派人说教,晚上严刑审讯,用尽酷刑,经过半年多的时间,用尽种种残忍卑鄙手段,才结束了这一罪恶活动。

在这一活动中,日军兵团部亲自主持,除用尽酷刑外,还想出不少花样。其中之一派“军管小组”张玉芳现身说法。张玉芳是国民党军某师参谋长的女儿,在一次作战中被俘。因受不过日军的严刑威吓,向敌人屈膝,为讨好日军,自慰为日军效劳,经日军兵团部把她送到伪公署宣传处任办事员,白天到宣传处上班,晚上仍在日军兵团部住宿,宣传部伪职员背后称她是“军管小姐”。她的主要任务是对被俘的我军政干部作宣传,按照日本人的指示,以她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引诱被俘人员从实招供,争取皇军宽大。按日军规定,每周去五天,有一天向日军汇报取得的“战绩”,日军负责人根据她的工作情况给予奖赏或批评,张玉芳为争取好成绩,对被俘人员使用种种手段,如拉同乡、认亲戚、飞媚眼、软硬兼施,不听她劝说引诱的人,常常受到日本人的酷刑。在约半年的时间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此外,新民会、宣传处的重要头目,轮流对被俘人员讲世界战局,宣扬皇军赫赫战世,责令被俘人员认清形势,考虑自己前途,是日军诱骗被俘人员的另一种方法,因为当时敌势方强,在各战场上取得一些暂时胜利,少数被俘人员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发生动摇,新民会的乌毓筠、程立云,宣传处的邢幼杰、蒋鸿经,都是日军指定轮流给被俘人员作时事报告较多的人。

到1943年秋,日军对被俘人员的审讯工作即将结束,被俘人员中被暗害、被折磨致死者约有半数,越狱潜逃、托人情、行贿赂被

释的各有一部,最后剩下 23 人,被日军释放。

1943 年秋末冬初的一个中午,伪省公署会议厅中摆了 5 桌酒席,每桌宴席各 8 人或 9 人,主客各半,主人以伪省长田文炳为首,日军兵团部参谋长和日军特务机关长都准时参加,伪省公署的厅处长和其他各机关的大头目,是经事前决定的陪客。被释放的人员均身着伪军新棉军便衣,新理的发,看来象入伍的新兵。出席作陪的客人,事前都由伪省署秘书长传达了伪省长的旨意,不许向客人问姓名年籍,不谈有关政治的事,仅谈风花雪月。宴会开始后,伪省长和被释人员代表分别讲了简单的应付门面的话,又演了日军攻占新加坡等地的电影,经过约一个小时就散场了。被释人员事前已领了释放证及旅费,一出省署大门就各奔前程了。

上文所写历史资料,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冀鲁豫边区的一次重大斗争,影响颇大,但迄今为止,尚未能看到记述这次斗争的翔实材料。我本人虽因年老健忘,且历时已久,回忆所及,和实际经过,或有出入。但 1942 年冬陈静斋去白道口慰劳叛徒吴兰田,我是陈的重要随员,开会是我主持的,伪报用大标题标出,作了详尽报道。1943 年被俘人员释放的送别会,我又是参加人之一。这些经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据我所知,了解这次斗争经过现仍健在的有包头师范学院副教授侯东鲁,他是伪《新河南日报》记者,当时随日军进行过采访,陈静斋去白道口时他也去了。开封市图书馆离休老馆员肖凤桂,滑县人,家距白道口不远,和吴兰田是中学同学,文中的部分史料是他提供的。

(1985 年 12 月写于河南大学)

